
祖國四十四年：從革命之子到反對鎮暴
海外二十八載：從民運骨幹到政治學人
進出中組部
一個紅二代理想主義者的另類人生
● 閻淮 著 ◎李銳、楊繼繩 序
明鏡出版社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真相》系列105
進出中組部
一個紅二代理想主義者的另類人生
◎閻淮
明鏡出版社
mirrorbooks.com

目录

序：变革远未成功，后人更需努力……5

前言：特权是“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7

“伯乐不常有”……7

青年干部局的几件事……10

“统治阶级”的阶级自觉性……15

自序……20

上部　从革命之子到反对镇暴……21

第一章 干部子弟的舒适园校……22

第一节 生于苏北，艰难北上东北……22

第二节 哈尔滨省委幼儿园的半孤儿……30

第三节 特殊的东北干部子弟小学……37

第二章 大名校中的小名人……45

第一节 俞正声之父建立的一机部小学……45

第二节 北京二中平民学校走读三年……51

第三节 干部子弟云集的北京101中……65

第四节 清华大学极左的学生干部……78

第三章 老红卫兵头头的反思……84

第一节 反校党委，保工作组……84

第二节 红卫兵总部委员上了天安门……90

第三节 云贵保省委回京反文革……103

第四节 社会底层调查与博览内部群书……112

第五节 工宣队的统治与我的反抗……121

第四章 自我奋斗小有斩获……133

第一节 甘肃五年从工人干到厂长……133

第二节 北京煤机厂的杰出表现......142
第三节 大煤炭部不安分的小干部......147
第四节 煤炭部副部长的刺头秘书......152
第五章 大要害部门的小异类......158
第一节 被陈元劝进但拒当李锐与陈云的联络员......158
第二节 调整湖南省级领导一显身手......165
第三节 独撑记录在案和选调生的前期工作......172
第四节 参与考察习近平与建立第三梯队......185
第五节 整党唱反调与莫干山会议出风头......205
第六节 李锐离中组部与调整山西领导......217
第七节 重逢清华的高干子弟朋友......226
第八节 因婚变邓颖超欲赶我出中组部......234
第九节 与江泽民的密切关系和频繁接触......241
第十节 为改革吏治创建北京人事科研所......247
第六章 为十三大政治改革效力......257
第一节 组建北京组织人事科学研究所......257
第二节 薄一波王震召集七高干子弟座谈会......265
第三节 组织撰写干部制度改革思路......270
第四节 赵紫阳批示“设想”纳入十三大报告......278
第五节 在康华公司大展手脚的一年......287
第七章 刻骨铭心的春夏之交......294
第一节 6月4日凌晨身边伤亡数十人......294
第二节 欲与屠杀“被暴民”的体制决裂......300
第三节 法国驻香港总领事批准我去巴黎......307
下部 从民运骨干到政治学人......312

第八章 民阵法国分部主席......313
第一节 开记者会，发表文章，谴责镇暴......313
第二节 主动干难民工作，被动当分部主席......323
第三节 我为什么离开民运......338
第九章 浩然研习营与两次台湾行......345
第一节 胡志强推荐我入浩然营......345
第二节 访问台湾马英九多留我一周......356
第三节 在台北的孙中山思想研讨会引言......363
第十章 一篇论文惊动美台新三方......367
第一节 三场重要的学术会议......367
第二节 与美国国务院有关的两次闭门会议......377
第三节 在夏威夷结识的人物......386
第十一章 新加坡二号人物请我进他的智库......391
第一节 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概况......391
第二节 1992至95年撰写的主要论文......398
第三节 吴庆瑞对我的重视和优待......406
第四节 江泽民发护照，吴庆瑞给绿卡......417
第五节 在新加坡接待的中国来访者......429
第十二章 李光耀让我到英文媒体......440
第一节 特殊优待与首战告捷......440
第二节 两年撰写百余篇专栏文章......448
第三节 零距离管窥新加坡......469
第十三章 参加各种会议及帮助流亡者......477
第一节 哥伦比亚大学客座研究员......477
第二节 定居洛杉矶的闲云野鹤......487

第三节 对三位著名流亡者的帮助 499
第四节 文革五十周年的三场研讨会 508
第五节 2015至2017年三次赴纽约开会 517
后记 531
版权 534
附一：简体版编后记 535
附二：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与陈云的远见 545
附三：反思不是妖魔化：和曹征路谈《民主课》 563

序：变革远未成功，后人更需努力

李锐

阎淮的回忆录放在案头。我认识作者已经35个春秋了，不可谓不熟悉。

父辈为打江山立下汗马功劳，其子女注定与大多数同龄人有不同的童年。如听过真实的枪声，有幼儿园阿姨的呵护，受大院文化的熏陶。“红二代”的身份在出生时即被赋予，他们的前途已被党安排好了。作者从干部子弟小学经由干部子弟云集的北京101中，到清华大学机要系，沿着预定的轨道前进。他在煤机厂起步，从工人到厂长，经煤炭部到权力中枢的中央组织部。1982年我被派到组织部成立青年干部局，他到局里工作。

他从文革中汲取教训，从中外先贤名著里获得养分，在基层接触劳苦大众；也源于他的性格和父母的言传身教；因此随着年龄增大，阅历增加，越来越具有独立思考的意识。



2017年5月10日，李锐在家中为作者回忆录之序定稿。

拐点发生在1989。目睹政治风波，亲历血腥之夜，他离国出走了！与绝大多数流亡者不同，他并没有身处危境，是可以不走的，但他还是从容地离去。这显示他的出走更具理性。“镇暴”后，他毫不犹豫与这个体制告别！

此后二十多年，他以一个深谙中国官场的资深学者供职于欧美亚的研究机构，包括法国社科院、夏威夷东西方中心、新加坡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新加坡《海峡时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俄亥俄大学等。如此丰富的经历，每每有精到深刻的时政评论、研究报告和学术著作问世。他以广阔的视野观察中国，研究中国，探索着中国的出路。

我们早年投身革命，可说为救国救民、实现理想而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胜利后，努力工作的同时，困惑于多次党内斗争，严酷的现实距美好的理想渐行渐远。其中部分人最终觉悟了，成为“两头真”的老人。

大多数“红二代”只关心父辈打下的江山代代相传，永不变色。阎淮这样的“红二代”，认同我们“两头真”的理念，要推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使祖国走上民主、法治、宪政、富民、强国普世规律的道路！

回忆录首要是真实，真实才能获得正确的认识，真实是回忆录的生命。既有过五关斩六将的辉煌，又有走麦城的尴尬；既展现人生轨迹，又剖析心路历程；还要勇于检讨过去、敢于承担责任。能做到其中一项，就是一部成功的回忆录。而阎淮的回忆录，这几项都做到了！

更难得的是，阎淮在波澜壮阔的时代风云中往往处于漩涡的中心，他的回忆录更具价值，读者能从中看到七十年来社会的变迁和他的跌宕人生。他无论何时何地，处境顺逆，始终坚守良知的底线，秉承以民为天的理念。他用一生的践行告诉我们——变革远未成功，后人更需努力！

2017年5月10日

前言：特权是“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

杨继绳

阎淮是我清华大学的校友，是“红二代”。不过，他不仅早就放弃了“红二代”的特权，也早就放弃了“红二代”的思想，站在中国大多数老百姓的立场思考问题、观察社会。他的回忆录就是证明。这本书信息量大，有很多“干货”。这些“干货”有很高的史料价值。阎淮的文字朴实，不雕琢，不粉饰，从而增强了这些“干货”的可信度。他让我为这本书写篇前言，诚意难却，只能从命。

这本书记录了作者在东北、在北京的中学生活、在清华的经历、在煤炭系统的经历，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状况，读起来饶有兴味。书中对境外民运活动的介绍、他在国际学术舞台上的学术活动的记录，也很有价值。苏联解体、东欧易帜时，在众多的人认为中共政权也要崩溃的时候，他却认为“中国不会随着苏联东欧的变迁，而在民主化上有丝毫松动。”残酷的历史证实了他的这个预言，也验证了作者的眼光。

我觉得最有价值的是作者在中组部的那一段经历。从中可以看出中共干部选拔制度、选拔程序、选拔标准的基本情况，暴露了这种干部制度的弊端。

“伯乐不常有”

多年以来，中国的官员采用委任制。委任制，是指任免机关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直接委派干部担任领导职务的一种制度。委任制是任人唯亲和排斥异己的制度条件，是吹牛拍马之辈向上爬的便捷通道。那些具有独立人格的人，即使能力强、品质好，也难被委任。没有权力制衡的委任制是劣者上、良者下的逆向淘汰制度。这种制使得下级对上级层层依附、上级对下级层层

控制。山头、派系由此而生。宋庆龄给他的美国朋友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中国现在形势不错，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政府正在改革；二，中国如果不解决官员委任制，不把国民教育搞上去，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将付诸东流。”

韩愈曰：“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是不是千里马，不是在赛马场上一比高低，而是由“伯乐”“相”出。显然，“伯乐”必须是大公无私且有识人慧眼，多数选官者是不具备这些条件的。除了不具慧眼以外，他们有利害计算、有亲疏远近。他可能任人唯亲，可能嫉贤妒能。所以，“伯乐不常有”。因此，“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闲，不以千里称也。”

阎淮曾工作过的中共中央组织部，应当是出“伯乐”的地方。青年干部局的任务就是挑选“千里马”。可惜的是，中组部和其他地方一样：“伯乐不常有”。

1981年5月8日，陈云在杭州撰写《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陈云文选》第3卷第292-297页），首次提出“中央组织部要成立青年干部局”。1982年3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组织部青年干部局正式成立，局长李锐是陈云指定的，首批局员也由陈云办公室审定。建立这个机构的目的是解决文革后干部队伍“青黄不接”的问题。这当然是从革命事业的大局考虑。但陈云也有他的选拔标准。他曾说过：“让我们的子女接班不会挖祖坟。”持这种选拔标准的人就不可能是“伯乐”。

阎淮是青年干部局的重要成员，说重要，因为陈云长子陈元是他的“铁哥们”，是陈元极力把他拉进来的，准备让他当李锐和陈云的联络员。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写入了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的标准。当时全国县处以上干部，（军队干部由解放军总政治部管理，中组部不管理不统计。）共计81万人；大学教育程度只占

6%，高中22%，初中以下72%；领导干部绝大多数50岁以上。干部“四化”是当务之急。

选拔“四化”干部由谁来执行？青年干部局。青年干部局要按“大佬”的意志行事。

阎淮书中谈到中组部调换省一级领导人时写道：“调换省级班子在北京有两项功课必做。一是由主管副部长签字，到中组部档案室查阅该省领导的个人档案。空手进去、空手出来，不许抄录、只准记忆。二是拜访大佬。组织工作的潜规则：每个重要省市的人事都要请示有关的中央首长。如北京——彭真和万里（二人意见相左），上海——陈云，广东——叶帅，湖北——李先念，山西——薄一波。湖南应该是黄克诚，但他不愿管。”我曾看到一位山西老干部写的资料，说薄一波对山西用人的强力干预，薄不喜欢的人不可能到山西当一把手，山西几乎成了薄一波的“自留地”。当时很不理解，读了阎淮的这段话后就理解了。阎淮的书中写了很多选拔干部的情况。他们在选拔时是很认真的，也选了一些好干部。但是“让我们的子女接班不会挖祖坟”的思想在多处体现。抄录书中的两件事：

陈元，西城区委书记，我近20年的铁哥们，市委把他列为候选第一名。我和其妹陈伟兰（北京青干处副处长）当然回避，由赵龙飞小组直接考察。考察组全体最后讨论名单时，都认为陈元仍应列为头号后备。我是私心极重的组长，特爱惜羽毛，拍板陈元在第四名，其妹陈伟兰非常支持。2月7日考察组与市委交换意见时，市委书记段君毅、市长陈希同、人大主任赵鹏飞等诸常委悉数参加。……当我依次介绍后备干部的建议培养方向时，对高干子弟素有好感的段书记（1982年段就把国家计委陈元工程师、市委组织部刘延东干事和陈昊苏等三人越级提拔为北京三个重要区的副书记）发话：“我们最优秀的陈元，年内就要提到市里，还是排在头里吧！”我只能送个顺水人情。2月9日我向中组部领导汇报北京考察结果时，李锐对我“坏笑”：“你

朋友排第一呀！”我立即清白自己：“我就怕你们说闲话，把陈元放在状元、榜眼和探花之后的第四名。老段坚持，我没办法！”（陈元下半年升任市委常委，98年任开发银行行长，2013年在邓朴方卸任后，陈任政协副主席达副国级，终于修成正果。）

需要补充一点：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段君毅坚持把陈元列为最优秀的第一号选拔对象，后来又有革命元老王震到中组部说项，准备安排为北京市委副书记。但是，在党代会的差额选举中，陈元连市委委员都没选上。“大佬”就将陈元安排到不需要选举的中国人民银行当副行长，接着调任国家开发银行行长。

还有一例：

旅游局下属的工艺品公司经理薄熙成（薄一波之子），勇于改革敢于创新，我们一致同意提拔薄为副局长。5月底，考察组与市委讨论重要局长人选。北京书记段君毅说：“我看小薄可以当旅游局正局长。”我说：“我和熙成算朋友，他才三十出头，副局长锻炼几年再转正，对他和薄老都有益无害、对改善老干部和干部子弟的形象也有利。”再次开会时，段书记对我说：“小阎，我问一波同志了，他说熙成当正局长好。”我哑口莫言。

对薄熙成的任命最终还是他老子说了算。青年干部局只能“哑口莫言”。“大佬”说了算的任命制，是中国的一大特色。“大佬”们“举贤不避亲”。有“大佬”们的坚持，哪里还有“伯乐”说话的机会？

青年干部局的几件事

“统治阶级要有统治意识。”这是陈元多次对阎淮讲的。陈元还说：“对干部子女政策的出发点应是阶级利益，它是阶级政策的一部分。”青年干部局发生的几件事体现了这个思想。

第一件事：“记录在案”的双重标准。

1983年4月23日，中央组织部下发“中组发[1983]6号文件”：《关于“文化大革命”期间高等院校学生造反组织重要头头记录在案工作的意见》。文件说：“对造反组织的重要头头和有严重问题的人，应由大学认真负责地将经过调查核实的材料，通知其现在单位和有关省委组织部，记录在案。今后，凡从文革的大学生中选拔领导和选派出国，必须与他们原大学联系，取得其当时的表现材料。”“记录在案”工作由青年干部局负责。阎淮写道：

1983年4月27-29日，我代表中组部在北京大学“留学生宾馆”，主持北京各高校党委副书记和组织部长参加的“记录在案座谈会”。在开场白中我说：“我理解‘记录在案’就是去年社会上清理文革中有问题的‘三种人’(即：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在大学的翻版。不同的是，‘清理’是面对面，定性后严肃处理；‘记录’是背对背，青年学生就不处分了，记下来以后留神就行了。”三天会议，就是贯彻“6号文件”。……但会上不乏“杂音”，北大书记提出：“高干子弟当头头，是否记录？”北工大跟着“敲边鼓”：“鼓吹血统论的谭立夫呢？”清华组织部长与我熟悉，也将一军：“老阎，你们清华红卫兵推倒二校门，你朋友贺鹏飞记不记？”我公开保证：如实向上级反映，一周内明确答复。私下向清华领导交底：“老人家们”此举专为“整治”批斗他们的造反派，岂能拿自己子弟开刀！成立青干局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对付造反派红卫兵。

会议结束次日，我回中组部向李锐汇报会议情况，并请示“高干子弟问题”。李锐：“你对清华领导说得好，就是那么回事！”随后，李锐向秘书口述一份电话稿，让部办公厅立即通知北京组织部，转告各大学——文革初期保守的老红卫兵头头，不在“记录在案”范围。

第二件事：让陈楚三写红卫兵的情况。

1983年，在中组部青干局的清华校友李志民找到陈楚三，说中央大力平反冤假错案，解放了一大批干部，这些干部多年关监狱、住牛棚，与世隔绝，对“文革”中的红卫兵怎么回事不太清楚；他希望陈楚三写个东西，介绍红卫兵的起源和发展。

陈楚三推脱不过，花了大约半个月时间，用稿纸写了一万字左右。当时，《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公布。陈在信中认为，毛主席确应对左倾错误负主要责任，但中央其他负责人也有左倾错误，例如，蒋南翔就是被刘少奇打倒的；红卫兵正是左倾错误的产物。信中简述了中学红卫兵产生的背景是左倾错误的影响，以及他们后来成立“联动”反中央文革被打成反革命；简述了大学红卫兵部分人因反中央文革也被打成反革命，举了地质学院朱成昭以及报纸上报道的韩爱民等例子。

陈楚三的信中对红卫兵是跟着林彪四人帮“受骗上当”的说法提出异议：“我是共产党员，应当听党的话。叶帅在接见军队院校师生员工大会上说过，林彪同志只有59岁，身体非常健康，这是我们革命事业胜利的重要保证，让林彪同志作为我们的副统帅，这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最可庆幸的大事。周总理则不止一次说过，江青同志是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不听林彪的、江青的，那么总理的话、叶帅的话我们听不听？信不信？要是都不听，还能当党员吗？如果一定要说我们受骗上当，那就是受党中央的骗，上党中央的当了。”

陈在信中特别提出“八旗子弟”问题：“许多干部子弟运动初期敢于造反，紧跟毛主席和党中央；但当自己的父母受到冲击、被打倒，就患得患失，不那么‘紧跟’了，有些人逍遥了，有的还因此对毛主席和党中央产生怀疑。比较起来，大批工人、贫下中农和普通干部子弟反而无私无畏，坚决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陈楚三写的材料寄给青年干部局李志民，后被送到陈云那里，1984年2月

27日，陈云作了如下批示：

耀邦、（剑英暂不送）、小平、紫阳、先念同志：我建议将此信和陈楚三的材料均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并加发整党指导委员会和中组部。孔丹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有关部门应当研究。这些红卫兵不属于“三种人”，其中好的还应是第三梯队的选拔对象。清理“三种人”是一场政治斗争，要防止有人将水搅浑。像陈楚三这样的人要特别警惕，绝不能让他们混进第三梯队，但也要给出路。

陈云批示中说的“此信”是孔丹和董志雄给陈云的信，信中说：

“在当前整党中，有人散布一种舆论，说什么‘老红卫兵’也是‘造反派’；有的地方和单位竟把‘老红卫兵’在‘破四旧’中发生的问题当作‘三种人’问题来清查；还有的人仅仅因为担任过“老红卫兵”组织的负责职务或参加过‘西纠’、‘联动’这类在‘老红卫兵’中名声比较大的组织，就被视为“文革”中有严重问题，而影响到对他们的使用和提拔。凡此种种，我们觉得同中央有关文件、中央领导同志有关指示的精神都是相违反的，需要澄清和纠正。否则将不利于整党，不利于清理‘三种人’和建立第三梯队的工作。”

“我们认为在这次整党中，‘老红卫兵’虽然也需要结合自己的经历，总结经验教训，提高觉悟，但对他们在文革初期的缺点或一般性错误，绝不应当再予追究，对中央文革曾强加给他们的种种罪名，更不应该再拿来作为追究他们的依据。相反，倒是应当充分肯定他们在文革中的主流并调动他们的积极因素，依靠他们和广大的中青年和‘三种人’进行斗争。”

陈云的批示以《“中央政治局会议文件[1984]2号”，84年2月27日》发给有关部门。此后，孔丹和陈楚三就有完全不同的命运。前者代表高干子弟的命运，后者代表普通子弟的命运。孔丹北京四中上高三时赶上文革（是“西纠”的头头），文革后直接考上社科院吴敬琏研究生。1981年研究生毕业后

任张劲夫秘书，以后调光大集团任部门经理、集团副总经理、总经理，中信集团总经理、董事长等职。

陈楚三，父亲陈潭秋是1921年7月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的13位代表之一，1943年被新疆军阀盛世才杀害。陈楚三1960-1967年在清华大学上学，文革中是温和的造反派。1968年分到贵州水电部第九工程局当工人，1985年到北京联合大学自动化工程学院当教师，1992年到实创总公司担任部门经理、总经济师，1995年到一家民营企业担任副总经济师、董事、监事会主席直到退休。陈楚三的父亲陈潭秋虽然不是普通人，但早已牺牲，陈楚三没有权力的庇护。

阎淮的书中写了选拔“第三梯队”的情况，“文革中的表现”是最重要的选拔标准，但这个标准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要求：平民子弟和“红二代”不一样；保过文革后得势高级领导人的红卫兵青云直上，反对过文革后得势的高级领导人的学生终生不用。

第三件事：管教干部子女的文件被否定。

阎淮在书中写道：

尽管干部子弟在文革初期的“历史劣迹”不被“记录”，但在1983年“严厉打击刑事犯罪”运动中，一些子弟的“现实罪行”引起民众的强烈不满。体谅民情的胡耀邦在12月8日中央书记处第101次会议提出，中央应该下发《关于对干部子女管理教育问题的通知》，让全社会共同监督子弟们。此文件应该由中组部青干局起草，但我们局内意见分歧，一时无法下笔。干部子弟反对发文件：“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都摘帽平反了，这不又搞出一个‘干部子弟分子’！”平民子弟赞成：“有些干部子弟太不象话了，该好好管管！”一向观点分明的我，有些“二乎”了，痛恨子弟中的害群之马，又怕发文件伤及无辜。于是我向李锐建议：“开个子弟座谈会，听听大家意

见。”

1984年3月3日，由青干局召集，李锐主持的“干部子女座谈会”在中组部召开，主要讨论“干部子女文件”发不发，若发写什么。先后发言的有：陈云之子陈元、崔月犁之子张晓彬、于光远之女于小虹、孔原之子孔丹、耿飚之子耿志远、邓拓之子邓壮、秦邦宪之子秦钢、王其梅之子王昌为、史立德之子史元旦、陈毅之子陈昊苏和李大钊外孙女李虹。陈元多次对我说过“统治阶级要有统治意识”，这次他又“首发”，高屋建瓴地提出问题：“如果一个阶级对自己的子女都没有把握，他就不配称为统治阶级。对干部子女政策的出发点应是阶级利益，它是阶级政策的一部分。”孔丹的发言有代表性：“中央精神可以理解，想发文件用心良苦，但左右为难。现在这么多大事，发这个文件是添乱！”最后李锐总结：“你们一致不同意发，确实不好发。我们对干部子女是关心的，大家要争气。”胎死腹中此文件，李锐与我皆欣慰。十年后，我们又谈起此事，共同反思：“当时真应该有个管束干部子弟的文件！”

青年干部局发生的这几件事清楚地表明：“统治阶级”在保卫自己子女的利益是毫不含糊的。对子女的安排是一个家庭最大的利益，“统治阶级”一直维护和争取这个利益。

“统治阶级”的阶级自觉性

陈元校友说;“统治阶级要有统治意识”。“统治阶级”、“统治意识”，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德意导意识形态》中提出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1卷第52页），时间是1846年，指的是德国社会。100多年以后，陈元校友重提这个概念指的是什么呢？这时的中国，什么是统治阶级呢？

阶级本来是属经济范畴。列宁说：“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

个集团的劳动。”（《伟大的创举》，1919年6月28日，《列宁选集》第4卷第10页）怎样占有呢？通过占有生产资料。经过农业集体化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以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已经消灭。也就是说，1956年以后，中国经济上的阶级已经没有了，旧的生产关系被消灭了。

《共产党宣言》说：“如果说它（指无产阶级）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么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和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消灭了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无产阶级）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73页）。按照这段话，陈元校友说的“统治阶级”不可能是革命成功以后的“无产阶级”。

那么，陈元校友说的“统治阶级”指的是什么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按这个说法，“统治阶级”就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或者说是“全体人民”。然而，这个1954年宪法中确定、以后多次修宪时没有改动的说法，解释不了当今的社会。这也违背陈元校友的意思，他说的不是“全体人民”的利益，而是说“对干部子女政策的出发点应是阶级利益，它是阶级政策的一部分。”从陈元校友强调“阶级利益”是“干部子女”的利益，他说的“阶级政策”，是维护“干部子女”利益的政策——从逻辑上分析，他说的“统治阶级”是不是特权阶级？是不是权贵阶级？是不是网上说的“赵家”？

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学家们描述中国的社会结构时，通常用“阶层”、而少用“阶级”。“没有阶级意识的阶级是不存在的。阶级与‘层次’的区别就在于有没有阶级意识。”（莫里斯•迪韦尔热：《政治社会学——政治学要素》，杨祖功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43页）如果处于同一阶层

的人们有一种认同感和归属感，并且愿意为这个阶层的共同利益而采取自觉的行动，那么，这个阶层就有了一种共同的意识——阶级意识。一个阶层产生了共同的阶级意识以后，就成为一个阶级。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急剧分化，成为不同利益的阶层。说“阶层”，而不用“阶级”，是因为各个阶层的人们还没有形成共同的阶级意识。一个开放社会，社会阶层流动通畅，今天处于底层，明天可能向上流动，从而缓和阶层矛盾。开放社会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实现阶层和谐。如果社会阶层固化，社会底层向上流动的通道被堵死，底层社会就容易形成阶级意识，就会为共同的利益采取自觉地的行动，就可能发展为阶级斗争了。这样，中国社会就无宁日。

过去一直认为，“赵家”只是“闷声发大财”，拿不出或不愿拿出什么理论依据。陈元校友的话表明，他们不仅是“闷声发大财”，还有明确的“阶级意识”。有了这个“阶级意识”，搞阶级特权就可以理直气壮、肆无忌惮。所以，自文革后期以来，干部子弟占有了一切有利的先机：参军、保送上大学、提拔当官、公费出国留学、下海经商……凡是好的机会，干部子女都首先占有。下海经商以后，他们又利用父兄掌握的公权或余威轻而易举地成为巨富。这么多一连串不公平事件为什么无法阻止？是因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意识”强烈地维护其“阶级利益”。

如果说，八九十年代中国的第二号领导人陈云的长子的话带有理论色彩的话，那么，中国第一号领导人邓小平长子的话就有实践的操作性。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原所长陈一咨曾有一段对话：

邓问：“一咨，你说说看，改革是什么？”

陈答：“任何改革都是利益和权力的再分配。要使那些穷苦老百姓富裕起来，政府就要给每个人创造平等竞争的机会和环境。”

邓笑着说：“你说的是原则。现实地说，我觉得改革就是：谁有本事，谁就从国家那儿捞一块！”邓朴方接着说：“过去国家把什么都管起来了，

现在国家要松绑，要放权，就是要利益共享，谁能捞一块，就让他捞一块。”

陈说：“照你这个说法，那谁离权力近不就可以捞得多，还是一般老百姓吃亏吗？”

邓说：“你看历朝历代，总是能人先得利嘛！”

陈说：“不然，现代社会的实现，是要给每个人创造平等竞争的机会。”

邓说：“你说的不错，但这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开始能做到的。总是一部分能人先富起来，再达到共同富裕。”（《陈一咨回忆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3年，第294-295页）

“从国家那儿捞一块”，“离权力近的人捞得多”，这正是中国改革中发生的真实情况。中国的巨富多半是离权力近的人。离权力远的人不仅捞不着，还会被剥夺。“统治阶级的统治意识”就是“赵家人”搞特权的意识，就是“从国家那里捞一块”意识。特权阶层其所发能“捞一块”，是因为有制度条件。这个制度就是“权力市场经济”（也可称为“权控市场经济”），即权力操纵和控制下的市场经济。由于对公权缺乏必要的制衡，掌权者利用手中公权进行权钱交换、权权交换，一个个权力中心成为吸金“黑洞”，财富快速地向有权者和买权者集中。改革开放30年后，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到了不可容忍的程度。“统治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宣扬，会召唤出“被统治阶级”的“阶级意识”。所以，我对陈元校友的“阶级自觉性”十分震撼。近年来中国民间的“仇官”“仇富”情绪就是“被统治阶级”“阶级意识”的萌发。如果“统治阶级”还继续以“统治阶级的统治意识”大搞特权，就会逼出“被统治阶级”为保护“阶级利益”采取“自觉的行动”。试想一下，这时的中国将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2017年6月2日

自序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断言："性格即命运"。——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性格决定了我起伏跌宕的命运，必然提高我的精神维度。不安分守己的特质可能缩短我生命的长度，无疑增加了其宽度与高度。理性的超乐观主义，使我在逆境和险境中，不颓废不沉沦、身心健康地存活至今。

国人慧语："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在家时，小中大学皆入名校，并顺利入队入团入党。一帆风顺主要靠父母的革命干部身份。（此论断曾招致红二代朋友异议，我确信：在人事登记表有"家庭出身"的时代确实如此！作为妥协，我愿加上："次要靠个人奋斗和运气。"）——出外时，在国内外各种各样社会中的沉浮，则缘于各路各色朋友的关照。（其中不乏中国、台湾和新加坡的男一号及男二号。）

马克思说："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尽管已不信奉他的学说，却依然认同此论说。故此回忆录难免提到影响和干扰我命运的各种"关系"，本书亦可称为：人生与关系。与我生命轨迹有交集、又不幸被此书牵连者：若有冒犯，见谅！

诱捕毛泽东的亲密助手"四人帮"后，我由行政职务转任党的书记。在就职演说中我申明："因纪律所限不能说出全部真话，但我保证所说的话全部真实；我将真诚地对待每一个人、每一件事。"——真诚是我做人的准则，真实是我作文的原则。故本书所述全部事件的时间、地点、人物、情节四要素，皆为：真时实地、真名实姓、真事实情（除某女性用其家原姓）。

我的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即将展现与剖析于此。正如岳麓书院楹联所云：

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

上部　从革命之子到反对镇暴

——四十四年在祖国（1945～1989年）

第一章 干部子弟的舒适园校

——东北娃子十年（1946～1956年）

第一节 生于苏北，艰难北上东北

1-1 出生送老乡，满月双反悔

1945年8月9日，苏联百万红军出兵中国东北，一举击溃日本关东军，其间美国在日本投下两颗关键的原子弹；8月15日日本投降，中国抗日战争胜利。

9月江苏。中国共产党人的喜悦和幸福还没有尽情享受，新的战斗任务即刻下达。苏北的新四军四师奉党中央之命，抽调一批地方干部紧急赶赴东北。副县级的父亲阎韫，被任命为县委书记，带领内定的县长、县大队长、公安局长、财政局长和农会会长等五、六人，日夜兼程奔赴黑龙江，与国民党抢占地盘，创建中共基层新政权。（中华民国政府在抗战胜利后将东北三省划分为九省，哈尔滨附近属于“松江省”。中共建政后恢复东三省，松江省回归黑龙江省。本文为行文方便，统称黑龙江。）

“二八、七、团”是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规定男干部结婚的三要件。即28岁、参加革命7年的县团级领导，可以和女党员结婚。规定是抽象的严肃的组织作出的，却要由具体的情义之人执行。因此，游击的新四军就比正规的八路军宽些，地方干部就比部队干部松些。1943年三条标准都差一丁点的父亲，经淮北区委组织部长谢邦治（1950年代任司法部副部长）批准，“抢跑”结婚了。



本书作者九个月了。摄于1946年夏，黑龙江呼兰县。

抗日战争突然结束，革命形势骤然紧张。临行前，父亲说服已经怀胎九月的母亲，孩子出生后立即送给老乡；母亲坐完月子立刻去东北，与丈夫会合继续革命。为共产主义革命、为人民解放，可以抛弃亲生骨肉——多么崇高的理想，纯真的信仰！

10月底，淮安。我一落地就被送给根据地的贫苦农民。一个月后，母亲临行前与我诀别，刚满月的我一直傻哭。看到骨瘦如柴、病病秧秧的送出的儿子，母亲泪如雨下、心痛难忍。当时国共两党已签署《双十协定》，共军要撤离江浙，白军将至，老乡对收养共党的红孩子似有反悔之意。母亲想起一年前难产夭折的女儿，决定不能再失去儿子，决心抱我千里北上寻父。于是，革命之子当了一个月的普通老百姓之后，又回到革命阵营。于是，就有了您现在阅读我这个“革命干部子弟”回忆录的可能性。

1-2 母亲带我经朝鲜到哈尔滨

父亲的老战友谢邦治，匆忙离开苏北前，留下警卫员随后护送他的妻子、幼女和我母亲三人去东北。现在警卫员的护送任务又被母亲擅自增加了我这个小累赘。

年底，时任哈（尔滨）北地委书记谢邦治的妻子、女儿和警卫员，以及呼兰县委书记阎辐的妻子、儿子一行五人，开始了她们自己的万里北上长

征。为了避开国军，在华东我们绕过城市、行进在乡间的小路上。在平原，警卫员挑着的一根扁担两只箩筐中，装着“谢女”和“阎子”。当时既无“出生证”、又无处报“户口”，且户主“男当家的”都不在；故我俩皆为有姓无名氏。在山区，警卫员抱一个背一个。我与人民军队和年轻军人的近距离、甚至零距离接触，我对他们的深厚感情，应该说从0岁就开始了。此后，他们又多次保护我。44年后的1989年6月3日晚，在天安门东面和南面，我两次救助了被打伤掉队的年轻战士，也算小小的回报吧。

出江苏进山东，在胶东我们与山东军区赴东北的一些地方干部汇合。在烟台附近等船时，突遇国军巡逻，我们几十人躲进一个破楼里。两位母亲的手放在自己孩子的口鼻上，谁哭，就捂死谁。算我们命不该绝，俩孩儿都没出声。俗话曰：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却是大难不死还有后祸。在去Korea（汉译高丽，当时还没有后来的朝鲜和韩国）的中轮上，一天一夜我吐得死去活来大哭大闹，搞得整船不得安宁。前几天还夸我乖、想收我为义子的叔叔阿姨们，开玩笑说，还不如当初在破楼里捂死他呢！母亲后来曾对我说：“当时急得没办法，在气头上，真想把你扔下大海！”我答：“呸，假想！”元稹云，“曾经沧海难为水”，我却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可能从此落下病根，我不但晕船晕车晕飞机，还晕秋千晕摇椅。就像心脏病患者离不开“救心丸”，我是出行必带“乘晕宁”，娇气无比！

1946年初，登陆北高丽。我作为不满半岁的中华民国国民，身无有效证件和签证，就算偷渡出国，但是没有非法进入外国。因为，日本1910年吞并韩国，1945年日本投降撤出高丽，此时此地是“三无状态”：无国家、无政府、无国民军。尽管马克思说“工人阶级无祖国”，但是我们有组织：朝鲜共产党（现在朝鲜劳动党的前身），有亲人：苏联红军；我们离开了祖国，却回到了家，安全了！在亲人解放红军的护送下，我们首次光天化日、大摇大摆地登上征途。经丹东回到我的祖国，我诞生的国家，当时叫“中华民

国”。由南满到北满，这里既不是国民党统治区，也不是共产党解放区；既不像在华东那样危险，也不似韩北那么安全。中共得东北，但立足未稳；苏军欲支持，却不便公开；国军占辽西，急欲北上；在这种混沌混乱状态下，我们“孤儿寡母”五人小分队，继续艰难前行。

1-3 父见母留我而盛怒

1946年春，我们终于到达了长途跋涉的终点，两位母亲心目中的新延安：哈尔滨。她们没有参加过“北上抗日”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但是，她们经历了抗日胜利后，自己的北上万里长征。在林彪召开的东北局干部会议礼堂的休息室里，两位妻子以同样欣喜兴奋的心情，带着孩子，期盼与可能是生死之别半年之久的丈夫同志劫后重逢。但是，在主观漫长、客观短暂的等待之后，结果却有天壤之别。谢家伉俪幸福拥抱，喜极而泣，全家大团圆。阎氏夫妻却爆发了相识以来最大的争吵，28岁的丈夫怒目指责，24岁的娇妻委屈落泪，半岁的傻儿子惊吓大哭。此情此景当时是空前的，现在可以说也是绝后了。

“录像回放”——

会议结束，（林彪的报告历来言简意赅、简明扼要）广播传出：“谢邦治和阎辐：快到休息室去，你们的老婆来了！”父亲听说“老婆来了”，大喜，健步如飞奔向休息室。见到母亲怀抱个小累赘“拖油瓶”，惊而大怒。严厉指责埋怨不断：“当初你答应孩子送人，为何反悔！现在这里形势严峻、工作繁忙，怎么能要孩子？”



衣服上缀着“阎怀”。其实父母为我起单名“淮”，是为纪念在淮北抗战八年，也为了纪念我的出生地淮安。

母亲满腹委屈、满腔牢骚：“老乡不敢收养，孩子病得快死了。我一路上千辛万苦、九死一生，把你们阎家宝贝大儿子完整无损地带给你，我还成罪人了？咱们离婚！我一个人既能养好孩子，又能干好革命。”

当晚母亲赌气住进招待所。次日父亲道歉，接回爱妻和娇子。几十年后母亲提起此事还耿耿于怀、忿忿不平。

为了纪念在淮北的抗战八年，也为了纪念我的出生地淮安，父母为我起单名：淮。文革前入党后，我挺得意自己与某位伟人经历相同：“原籍外省、生于淮安、东北读书、北京革命。”出国后，反周恩来人士由名字得知我的出生地时，总不屑地说和“周某人”一样。还有人引用清朝秦涧泉的诗：“人从宋后少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让我少提淮安。现在我对毛泽东有较多负面评价，但对周恩来还残留些许怀念。

因名字而引起的另一个“不幸”是：新四军干部身在两淮（淮南淮北）、心怀延安，多为子女起名“延淮”，故在新四军后人联谊会中各色“延淮”不绝于耳。如，大学同学、副总理刘延东之姐刘延淮（三野后勤司令刘瑞龙之女）。党中央的干部在延安的怀抱中，常为子女起名“延怀”，又如，中学同学、名医李延妮之兄李延怀（参加遵义会议的李卓然之子）。

国人对三个字姓名的熟人，常省略其姓、直呼其名。因此，常有人问我，你叫什么“延淮”？一一我只能回答：“我不叫什么，只叫阎淮！”

1-4 土改农民赶走国民党

1945至47年，父亲任黑龙江省呼兰县委书记（见《呼兰县志》），母亲任下属区委书记，我们家就住在县委小院里。

小院对面是个豪宅大院，门口挂着“国民党县党部”和“县政府”两块大牌子。听说大院里身穿中山装、佩戴“青天白日”国民党党徽的，原先都是东北伪满州国小官；“光复”后摇身一变，成了曲线救国的地下特工。不知果真如此，还是我方蓄意丑化？他们是“本地干部”近水楼台先得院。强龙难压地头蛇，何况爹妈们那几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也算不得强龙。当时国共内战还未爆发，对方还是友党，此地也是“三无状态”：既无共军、又无国军、也无民兵与还乡团，双方岂能不“和平共处”。

我们寒酸小院门脸狭窄，只能挂三块小牌子，除与对门相似的共产党县委和县政府外，还有“县农会”的牌子。关键就靠这多出来的第三块牌子。父亲母亲们到处建立村、乡农会，苦口婆心地讲述“剥削理论”、启发教育穷苦农民的“阶级觉悟”、发动赤贫的勇敢分子带头斗争富裕农民（地主和富农），进行暴力土改，即毛泽东诗词所谓的“分田分地真忙”。我以为成功者必需备齐“三天”因素：先天素质、后天勤奋、老天机遇。而能力低、欠勤奋、运气差，三者具其一的多数农民，过去辛辛苦苦一辈子，也未必能混得上一亩三分地。现在一觉醒来，天上掉大馅饼、白白得了“三十亩地一头牛”，可以“老婆孩子热炕头”。多数人瓜分少数人的财产，“多数暴力的民主”何乐而不为！他们知恩图报，还能不拥护共产党、反对国民党？没几天，翻身夺田的农民，就在“给”他们土地的我父母们的“启发”下，“自发”地用共产党党旗上的镰刀和斧头等冷兵器，民不血刃不伤一人，就把友党及其不友好的“中华民国呼兰县政府”赶跑了。看来，镰刀斧头确实

比青天白日管用。国民党在这个东北的小县里，像15年前一样，又一次实行了“不抵抗主义”。不一样的是，上次是几十万的国民党军队面对张牙舞爪的外国军队，这次是几个腰上别着袖珍手枪的国民党“党工”面对成千上万义愤填膺的本国农民。我党的三块小牌子挂到对面大院门口，友党原来的两块大牌子废物利用，当劈柴烧饭了。

呼兰成了我们的“党天下”。父母们建完农会又建设党组织，有了党员再建立村、乡政权，有了政府就该动员农民了。于是，青年积极参军、拼死捍卫土改果实，中年踊跃支前、保障“东北野战军”后勤补给，老弱妇幼发展生产、巩固基层政权。

据《呼兰县志》记载，“1946－48年，呼兰连续三年被评为全省支前模范县，一共参军1.7万人，占18－35周岁青壮年人数的40%。（惊人的比例！——笔者注）他们参加了解放全国的各个战役，有600余人牺牲，有十几位成长为将军。东北解放区规定：‘年龄在17岁至50岁之男子、18岁至45岁之妇女，及所有的运输工具都有担负战勤之义务。’呼兰共出担架队8500人、战勤车2000余辆。1948年全县共产党员从抗日战争的零到1948年近千人，建国前达三千人。”

一个小县竟能如此，可见一斑。拥有二战胜利的“天时”、苏军占领的“地利”、剥夺少数富裕农民因而得到多数贫穷农民拥护的“人和”；共产党真能、真该，占领东三省、“解放”全中国！国民党岂能不败！

高中时富农出身的刘同学告我：其父被点了“天灯”活活烧死，以及土改时的种种酷刑。我问父亲，他答：“东北土改只为农民参军支前，没有精力和必要搞那些花样；解放后咱老家确实残酷土改，但你不要公开乱说。”我不知父亲是否在自我辩白。1989年出国后，我公开谴责暴力土改；90年访台湾，对和平土改推崇不已。

1-5 革命奶妈哺育我

我们家没紧跟组织入住大院，小院成了家属院，我们也充分享受了胜利成果，住房宽绰了。父母大部分时间在乡下，说是家，其实经常只有奶妈和我俩。当时有了孩子的领导夫人，自己大多也是个小领导，要全心全意干革命工作，哺乳的差事只能交给刚出“月子”的农妇。我和妹妹都有奶妈。用个士兵待遇的农妇，“解放”出十来年党龄的女领导干部，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是合算的。

奶妈，中国千百年形成的不人道的职业，被我党继承传统、发扬光大了。我们革命奶妈的“过去”要出身贫农，“现在”算参加革命工作、享受供给制待遇，“将来”还是建国前参加革命工作、享受“离休”100%工资的待遇。她们比党的第三代核心以后和以下的所有领袖和领导的名义待遇都高，这些高官们只能算“退休”干部。奶妈，工作职务是保姆，家中称呼叫阿姨，和现在的家政服务员一样。但是雇佣关系截然不同，家里分得土地、自己参加革命，奶妈把对党的全部感恩之情都报答到党的子女身上。我不是她亲生的孩子，但是她对我确实比对自己亲生的骨肉还要亲，“不是己出、恰似己出、胜过己出”。担任区委书记的母亲几个月才来县上开一次会，顺便回家看我；“有奶便是娘”，我只认奶娘、不认亲娘。不谙世事的我，当时确实感觉：日夜陪伴的有奶的奶妈，比偶尔“来访”的无奶的亲妈更亲。几十年来，我们和奶妈家，还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对她们家几代人的困难，父母和我总是给以力所能及的经济援助和政治后门。



1948年春，在东北野战军总部所在地黑龙江双城县。

我在感恩奶妈的同时，也感谢党给了我的一切，人民给了我一切。1989年赴法国干民运，江总书记让父亲转告我："共产党对得起你。"——确实如此！但是，我嘴上还是斗胆回答了一句："它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天安门的冤魂吗？"心里还在想，它对得起奶妈们吗？

第二节 哈尔滨省委幼儿园的半孤儿

1-6 父亲任牡丹江市委书记

我不是神童，三岁以前的事儿基本不记得。上述情节大都是父母所告，如若有误不是我忽悠你，就算爹妈逗我玩吧。我也不弱智，三岁以后的事情该记得了。以下的记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前，是亲身经历的自我回忆；80年代之后，辅以当时的日记和有关资料。为节约篇幅，不重要的事件只写年月；避免牵连无辜，次要人物只记姓氏职务。



父母与我。摄于1948年2月，黑龙江双城县。

1948年，父亲因小有政绩，调到全省最大县、东北野战军（四野前身）总部所在地：双城，任县委书记。虎头傻脑、可爱可笑的我还被"东野"的

林罗刘首长（司令林彪、政委罗荣桓、参谋长刘亚楼）抱过身体、亲过脸蛋、掐过屁股。1971年林彪倒霉后我再不敢提此事。三岁的我，被送到哈尔滨的省委幼儿园。在喇嘛台下的红军街上，开始了22年的学习生涯。其中除去初中3年走读外，共有19年是住校生活。双城县属哈尔滨市管辖，父亲到市委开会，必来幼儿园看我。母亲怀孕了，定期到哈尔滨的苏军医院检查，母子也常见。秋天她在苏军医院生了妹妹，依我之例，按出生地起单名：滨。

“土改分田地，农民争参军，军多地盘大，扩大解放区，军壮粮草丰，攻城占地广。”我这么瞎总结的，如此良性循环，共产党的事业在进步，共产党的干部也在“进步”。据《呼兰县志》统计，“呼兰随军南下的地方干部达2000余人，后担任县处级四五百人、厅局级一百多人、省部级十几人。”因此，1949年父亲也顺理成章、水涨船高地，升任牡丹江市委副书记，1950年转正（见《牡丹江市志》）。母亲升任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党能安排这种夫妻档，从侧面说明了当时党风的清廉端正。

1-7 撕日历想早日回家过年

四岁，我开始了在时间和空间上都远离家庭的孤单住校生活。刚入幼儿园时，集体生活的新鲜兴奋劲头还没过去。加之父母每季度都能来看我，寒暑假还可以回家，所以，第一年不知不觉滑走了。建国前后，党的工作分外繁忙，父母又到较远的牡丹江担负了更重要的职务，再不可能公私兼顾地经常长途跋涉来看望我。而我则本能地“以小孩之心、度大人之腹”，觉得有了妹妹，爹妈不再喜欢我。没有妹妹时，我一调皮捣蛋，父母就说，“你要是女孩就好啦！”——请看，证据确凿！

所幸幼儿园的老师阿姨特好。周末，家住哈尔滨的同学回家了，阿姨给我们几个留园的孩子开小灶。节假日，临近郊县的同学也都走了，老师带我一人逛公园下饭馆。开学后，我当然不放过吹牛的机会，说玩得多好、吃得多香，害得有的“赖小孩”下次放假不愿回家。大班同学欺负我，老师保护

我罚站对方；我与同龄小孩冲突，阿姨向着我；我压迫小朋友，她们只批评我而不罚站。当时我这个傻孩子自我感觉超良好，愚蠢地以为：因聪明漂亮父亲官大，她们才会对这么好。懂事后我才明白，其实我相貌丑陋并且愚蠢笨拙，东北局和省委大官“海了去了”，俺爹算个啥？她们是可怜我这个半孤儿，用金子一般的善良之心像慈母一样地温暖着我。

1949年，父母到牡丹江后，整个夏秋天都没来看我，我急得找到园长阿姨。

“爸爸妈妈啥时候来接我？”

“他们来信了，说年底接你回家过年。”

“那，什么叫‘年底’呢？”

她指着墙上的日历，“那东西变薄了，就是年底，你就能回家见爸爸妈妈了。”

从此，我天天隔着窗户翘着脚看“那东西”，但是一连几天，它好像都没变化。大约熬过一星期我终于忍不住了，趁办公室没人溜进去把“那东西”撕得只剩几张。出来后偷偷乐——很快就可以回家了！焦急地等待好几天还没人接我，我又忍不住了又去找园长阿姨。

我哭着说：“你和妈妈都骗小孩！‘那东西’都变得特别薄了，怎么还没人接我回家？”

她把我抱在怀里哄我：“好孩子别哭！那东西一天只能撕一张，自己变薄了你才能回家。”

我看到她眼中的泪花，伸出小脏手去擦，“只许小孩哭，不许大人哭！”

她听见我的傻话，在镜子中看到被我脏手擦花的脸，笑了。

我天真地笑了，但还不依不饶：“你又哭又笑，没羞没臊！”

她幸福地笑了，把我抱得更紧了。随后的周末，园长阿姨把我带到她家

里，让我尽情地吃喝玩乐，使我度过终生难忘的愉快温馨的一天。



4岁的作者与父母，摄于1950年1月，哈尔滨幼儿园。

1-8 遇土匪警卫员救我一命

真的年底终于到了，父亲的警卫员来接我去牡丹江。牡丹江是北满两条重要铁路：滨绥线（哈尔滨一绥芬河）和图佳线（图门一佳木斯）的交叉点，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智取威虎山》中的“滨绥图佳”保安旅，其实就是牡丹江保安旅。

1949年底这里的胡子土匪、国军散兵和潜伏特务仍然很猖狂。我懂事后第一次坐长途火车，什么都好奇。火车经常开开停停，警卫员坚决禁止我下车看热闹；东北冬季天黑得特早，他也不许我在窗前看灯火。

突然火车紧急刹车，窗外声响大作。我说放炮竹了，起身要看。他一把推倒我，全身压在我身上，迅速掏出盒子枪。我喊叫：“轻点，把我压疼了！到家告我爸，你欺负小孩！”他捂住我嘴，小声但严厉地喝斥：“不许出声，胡子来了！”果然枪声和炮竹声不一样，枪声中我们的车窗被子弹击破了，碎玻璃乱溅。小孩谁不怕胡子？我吓傻了、我老实了。他仔细听着双方的枪声小声说：“别怕！我们车上的火力强过他们车下的，我们会赢的！”

一会儿枪声停止了，车开了。我重新坐起来，突然感觉后背硌得慌，回

头一看，一颗子弹头嵌在我座位的靠背上。真悬！若不被警卫员压倒，我小命就呜呼了。再看警卫员，正在用从背包里拿出的绷带，包扎被碎玻璃溅伤的刚才搂着我的左手。他用右手拔出那颗子弹头，说：“你人小命大。”我活过来了，要拿他的枪玩：“我还没摸过真家伙呢！”他立刻变了脸色，又严厉地斥责我：“这家伙是我命根子，不能离开我，也不许你碰！”我嘟囔：“别的警卫员叔叔都挺和气，跟我都挺好。怎么就你‘各色’？”他看我生气，也不哄我（后来知道，怕我纠缠、还要玩枪）。哼，你不哄我，我还不理你呢！我一路上不再和他唠嗑，他也乐得安宁。

火车终于到牡丹江了，回家了。看见分别快一年的爹妈和妹妹，高兴极了，忘了和警卫员的假生气。家里又多个小妹妹，按出生地命名的惯例，起单名：江。妈妈给警卫员重新包扎后，他和我们全家人共进“家宴”。饭后，父亲把警卫员和我单独叫到书房：“说说吧，一路上怎么样？听铁路局说遇到土匪了，刚到时看你们都有点气。”我又想起了路上的不快，刚要诉苦撒娇就被父亲制止。“让叔叔说！”警卫员简单汇报后，父亲对我吼起来，“这大半年你被幼儿园阿姨溺爱，惯坏了，太任性！今天叔叔救你一命，不是他扑倒你，用身体保护着你，小狗命都没了。你还这疼那疼的！”我吓得想哭、又不敢哭，知道一哭就要挨揍。“快跪下，给叔叔磕个头，谢谢叔叔救命之恩！”警卫员赶紧扶起要行大礼的我，连说：“可不敢！可不敢！”我按父亲修正后的指令，给叔叔鞠了个大躬。



2017年5月，作者赴朝鲜，向志愿军烈士纪念碑鞠躬。

很快我们成了好朋友，寒假后，他又送我回去，到了哈尔滨幼儿园，我赖皮不放他走。我说，“你小时候肯定没住过幼儿园，跟我享几天福吧。”他答应了。我当时还真以为他沾了我的光呢，其实他是去省军区汇报工作。我们一起玩了两三天，他经常拿个木头疙瘩削啊锉呀。一天早晨起床，我床头放个木手枪，却找不到叔叔，我很伤心，几天都闷闷不乐。但我不会大哭大闹了，因为向叔叔保证过，要像他们解放军一样坚强。园长说，他是眼圈红着离开的。后来听说：在叔叔的坚决要求下，爸爸放他去了朝鲜，这位英雄的连长牺牲在三八在线。－－当年我恨美国臭鬼子，现在更恨朝鲜烂暴君；为了金氏王朝，我们伤亡百万像叔叔一样年轻优秀的中华好儿女。2017年5月我赴朝鲜，唯一深鞠躬的地方，就是志愿军烈士纪念碑。

来东北寻父的路上，解放军保护了半年，保住了我一条命；去牡丹江探亲的途中，解放军保护了半天，挽救了我一条命。几十年来，每每听到“亲人解放军”的称谓时，我真是别有一翻亲切暖流在心头。他们真是我“最可爱的人”，直到1989年春夏之交那个血腥的夜晚！

1-9 不满七周岁艰难上学

1952年春，父亲调到哈尔滨，任省委工业部长。生了四个孩子的母亲，

厌烦党务，对医疗感兴趣了，转任省立医院院长，开始了她30多年的卫生工作。我可以每周回家了！这可是小孩最幸福的事。另一个幸福骄傲的事儿，是三岁和四岁的两个妹妹也进了我们幼儿园，我由孤苦伶仃的“半孤儿”摇身一变成为拥有两个鼻涕孩、跟屁虫的小头目，神气多了。由此，我们兄弟姐妹之间，几十年来都“没有礼貌”地只直呼大名，从不称哥姐；因为在幼儿园和学校，叫一声哥哥姐姐，就会引来回头一大片。

时间很快来到8月。我们大班要毕业了。幼儿园为我们每人准备了书包和全套文具，我们也练习了毕业典礼的演出节目。突然，晴天霹雳——东北教育部门规定：年满七周岁方可入小学。即1945年9月前出生的才有资格上学。10月生日的我要留园、留级了！不由得让人感慨，东北学习苏联的正规化真彻底，东北人引以为傲的高岗国家副主席兼东北正主席真厉害！我想起刚学会的歇后语：“麻子敲门，坑人到家了！”——高岗有轻微麻子，咱不敬啦！

8月中旬的毕业典礼，我不能和毕业班一起站在台上表演，又不愿意坐在台下，沦落到中班的小屁孩们中间。我一个人坐在教室里暗泣，母亲在旁陪伴安抚我。会后，母亲和幼儿园长进行了一次长谈。“孩子幼小的心灵怎么能承受如此巨大的打击呢？他这一年怎样在小一班中度过呀？这次挫折对小孩一生的成长发展，都是永远的阴影。”妈妈终于以母亲对母亲的情感说服了园长。一、同意我毕业。二、向小学出具证明：我的身心智力发展完全符合小学标准。三、向教育局反映，应让我破例。

我感谢园长，这么通情达理，这么具有人性，富有人情。现如今，这些人类的良知多么缺乏呀！我四年的幼儿园生活就这样圆满结束了。从幼儿园到小学，1948-58十年住干部子弟园校。老师和阿姨比父母陪伴我的时间更长，关心得更多。从喂饭喂水到把屎把尿，从洗头洗脚到洗衣洗澡，从剪指甲钉扣子到打针吃药量体温；事无巨细包罗万象，使我从刚记事的小毛孩到

风华少年，身体健康成长。

更重要的是，心理精神的健全发育。集体生活培养了集体主义，老师阿姨的慈祥善良，教育了我与人为善、同情弱者。如果说我性格中，刚毅坚强是在中学和大学形成的；那么我性格中，温良淳朴的真善美则是在幼儿园和小学培养的。至于质量中丑陋的方面，除了先天的劣根性，就是抵制不了假恶丑的诱惑，在这酱缸、粪坑般的社会中熏陶污染的。

第三节 特殊的东北干部子弟小学

1-10 只有百人的哈尔滨育才

建国初，全国各大城市都有一所干部子弟的寄宿学校命名为“育才小学”。哈尔滨当然也不例外，但是哈尔滨育才的具体情况却非常例外。它只有百十名孩子，只管学生的吃喝拉撒睡、即只住宿不读书，我们要走到一里外的经纬小学上课。现在的经纬小学网站称：她是一所享誉全国的历史名校，1949年被确定为哈尔滨重点小学。当时党政机关很精干，在哈尔滨的省地级干部本来就不多，其学龄孩子就更少了。

哈尔滨育才的的来历：1947年，第四野战军的军官奔赴前线，子女留在后方无暇管教。四野政委、后来建国十大元帅之一罗荣桓，决定成立哈尔滨“南岗干部子弟学校”。首任校长是罗夫人林月琴。1948年底，辽渖战役结束，四野进关。为了减轻干部的后顾之忧，罗帅决定把由南岗学校演变的四野随军小学留在沈阳。按首长夫人任校长的惯例，由东北主席高岗的夫人李力群执掌。1950年，抗美援朝开始。为躲避美国飞机轰炸，高夫人率学校迁回哈尔滨，当地的干部子弟也进入该校。1951年朝鲜战争缓和，学校迁回渖阳，更名为东北育才小学。哈尔滨的干部子弟百余人，搬到道里区的一栋带花园的大洋楼，成为哈尔滨育才。

80年代，我发现两位交往甚密的朋友是哈尔滨育才的低班校友。他们

是：中央组织部青年干部局的崔武年，其父崔健时任哈尔滨锅炉厂厂长，后任浙江省委副书记；北京四通公司总裁万润南的夫人李玉，其父李昌时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后任中纪委书记。

1-11 经纬小学的两个阶级

由于当时干部待遇实行供给制，我们的服装文具和日常用品都是由学校统一发放的高档货，在上课的经纬小学与平民子弟有显著的差别。育才校内的生活也非常优渥。哈尔滨的生活原本就很俄罗斯化，加上学校的生活主任是苏联阿姨，我们的饮食基本是奶油果酱罗宋汤、牛奶糕点大列巴，饭前喝汤、餐后水果。由幼儿园一路过来，都是这种生活，倒也顺理成章、心安理得。但是在经纬小学郊游时，我们带的高级点心与平民同学的干粮反差极大，我不由得违反纪律分些点心给他们。回育才后，我被遵守纪律的好学生告状，老师赞赏地批评了我。

周末回家，我忿忿不平地向父母谈起此事。他们教导我："现在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必然存在贫富差距，我们是比老百姓富裕；但不要横着比，应该竖着比，他们比解放前好多了，将来到了共产主义就大家都富裕了、都一样好了。"由此，我树立了为实现"让百姓子弟也能吃上糕点"的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的崇高理想。但是，供给制"进步"成工资制后，有形的干群之间的待遇差距扩大，无形的特权和特殊化更令人瞠目，共产主义似乎渐行渐远。

父母确实遵循领袖的教导，按毛泽东在《反对自由主义》中所说，"不把自己混同于普通的老百姓"，他们与叔叔阿姨们开口闭口"老百姓"长、"老百姓"短。（在众多小孩中，只有不太讲礼貌的干部子弟，对没有亲戚关系的男女老干部，礼貌性地称呼叔叔阿姨。）耳濡目染和切身体会，使我在实践中确实感到"我们"与"老百姓"真不一般。文革中看了南斯拉夫副总统德热拉斯（现译为吉拉斯）的《新阶级》，我才在理论上认识到：干部

及其子弟确是“新社会”中的“新阶级”！但是，父母也经常教导我：“父母的一切都是老百姓给予的，父母给你的，更是他们给的。你更应该感谢他们！”从小就知道我们在政治上不是老百姓，但我愿意为缩小相互的经济差距而努力。应该说，很早我就有了点平民意识，是新阶级中的小异类。

平民同学的吃穿用都不如我们育才孩子，但是他们也有优越性一一有钱！再穷的爷爷也隔三差五地给孙子千儿八百的，再乖的儿子为老子打酒时也偶尔或经常贪污一二百元。而钱对我们则是，爹妈绝不给、育才不许带。在经纬小学门口的“小人书”摊上，壹佰元（忘记告诉你了，它只相当现在的一分钱。）可以看三本薄书或两本厚书。育才的“少爷”只能在爷爷的孙子面前“装孙子”，争取被允许在他们旁边看“蹭书”。“孙子们”只让平时架子小、没有“老爷范儿”的“小少爷”占这个便宜，我当然独占鳌头。育才图书室里都是苏联的《卓娅与舒拉的故事》和中国的《刘胡兰》之类的主旋律革命小人书，我的正统革命思想在此启蒙。书摊让我另开眼界，《三侠五义》和《三言二拍》使我有了“忠孝仁义”的人性朦胧。

1953年3月初的一天，育才的苏联阿姨们从领事馆回来，（她们经常去领事馆，偶尔带些“洋零食”，奖励我这样的听话乖乖孩。）对着墙上的并排挂的毛泽东和斯大林的领袖像相拥而泣，我们莫名其妙的中国小孩劝阻无效、大惑不解。我还拉着一位与我“相好”的苏联阿姨：“谁欺负你们了，我帮你找他算账！”第二天，我们也真心实意地抱头痛哭起来（并非1976年那样的政治悲痛传染病），并且废寝忘食、餐无味眠不香。因为电台广播了那个当时是悲讯、其实应该是喜讯的消息：苏联领袖斯大林逝世了。60多年过去了，此情此景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因为这次痛哭是我的空前绝后，此后我对各种领袖逝世，除对胡耀邦和赵紫阳悲伤外，更多的是沉思。23年后的1976年9月9日，当天安门广场上常驻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五大领袖画像中仅存者逝去时，我表面镇静内心激动。因为我

知道，正如当年“老大哥国”因斯大林去世，而掀开历史崭新的一页；“小兄弟国”也将因毛泽东去世，而步入崭新时代。不是说“苏联的今天是我们的明天”吗？不过，就像大跃进时的口号：“一天等于20年”，中国的“明天”却发生在斯大林去世的23年之后！

1-12 父亲调长春汽车厂

我家邻居、副省长饶斌（1980年代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1953年调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任厂长，次年说服父亲也去到长春。饶夫人张矛着的《饶斌传记》说：“设备安装工作是联结基建和生产的重要环节。为加强长春一汽安装工作的统一领导，第一机械工业部1954年成立一机部机电安装公司，阎辐任经理。”妻不离夫，母亲随任汽车厂医院院长。“一汽”的学校刚建成，条件较差，我又被顺理成章地一个人留在哈尔滨。幼儿园的质量无所谓，弟妹们理所当然地去长春了。

我又成了“半孤儿”，但和五年前不同了，爹妈说我是大孩子了。因为是大孩子，与全家分开时我强忍着没有哭出来。因为是大孩子，寒暑假没人接送我了。也因为局势稳定了，局级领导没有连排级的警卫员了只剩下营科级的秘书，而秘书是不管长途接送孩子的。在哈尔滨，育才老师送我上火车，把我交给列车员；四五小时后秘书在长春的站台上接我回家。我像行李似的被转运，但不在行李车厢而在软席车厢，因为据说供给制时孩子与家长“同等待遇”。长大后我一直坐“硬板车”，直到几十年后当了部长秘书，才与首长同等待遇地回到软席；而后到了中央组织部，又因工作需要、与“机关单位”同等待遇地有了软席特权。直到1988年，我任康华公司局级领导时，才摆脱了与其他人和机关的“同等待遇”，靠自己“待遇”了软卧。但是，当时飞机已普及，偶尔坐火车，我也愿意与下属同坐硬席热闹；因此，我从未享受因自己而得到的这等待遇。

远离父母的独立的集体生活，从小培养了我的生活自理能力和对不同环

境的适应能力；这对我今后的成长和发展影响深远。

1-13 烈士小学的两个阶层

1955年中共中央批转教育部报告，决定取消各地的干部子弟学校，即干部子弟学校也招收平民子弟，只住宿不上课的小小的哈尔滨育才首当其冲，合并到“东北烈士子弟小学”。当地干部都转走了自己的孩子，我们十几个外地户在1955年初、我三年级下学期时，转到“烈小”。

解放前夕，东北抗日联军仅存的重要将领、时任东北两个小省省长的冯仲云和周保中提议，经过东北政府批准在哈尔滨建立“东北烈士子弟小学”——共和国历史上唯一的烈士子弟学校。她招收抗联和四野的烈士子女，学生住校全部实行供给制。校址在“东北烈士纪念馆”旁边。朱德元帅曾亲临学校慰问师生，中央新闻电影厂曾来校录制纪录片《东北烈士子弟学校》。现更名为继红小学，是哈尔滨重点小学。这里的生活条件与育才有天壤之别，其特点就是一个“大”字。宿舍大，床位由几个变成几十个，就像由软卧小包厢换到了硬卧大车厢；饭厅大，由十几桌变成百余桌，就是由安静的小餐厅到嘈杂的大食堂。当时的感觉是：我的同学们由父母双全、温文尔雅的幸福“公子”变成缺父少母、粗野蛮横的孤儿“小胡子”。更让我不能忍受的是:“胡子”处处对“公子”看不惯，当然要时时欺负我们了。此时我已会写信，坚决要求父母接我去长春，他们答应了。我在“烈小”只读了一学期。



九岁的我。摄于1955年初，哈尔滨育才小学。

回到长春温暖小洋楼的家中，我忘不了控诉烈士小学和烈士子弟。父亲严厉地批评我、耐心地教导我："你的观点非常错误。和爸爸一起参加'一二九'的北京青年、延安抗大的同学，后来大部分牺牲了；苏北八年抗战，多少战友就死在身边。没有这些先烈就没有你我今天的一切。'烈小'就该和'育才'一样标准，烈士子弟应该得到更好地照顾。"从此，我对'烈小'的同学有了愧疚感，对后来遇到的烈士子弟更尊敬和尊重了。

1-14 汽车厂小学与鲜族少年

1955年秋，我转到长春的小学，住校读四年级。它的正式名称是"长春汽车厂职工子弟小学"，但是因为远离厂区需要住校，费用不是普通工人负担得起的，况且工人家庭的学龄孩子又不只一个。因此，它实际上还是干部子弟学校，只不过干部的级别由哈尔滨育才的"省局级"降为"局处级"而已。我的生活轨迹和生活习惯还是哈尔滨育才的延续，只是生活标准相应地略有下调，但是十岁的我完全可以适应，因此不必赘叙。

不爱文艺爱体育。父亲五音不全，遗传基因的必然性，使四个子女无一例外的都是俗称的"左嗓子"；遗传基因的递减性，使我这个老大最"左"，弟弟小四较弱。幼儿园时自己不懂事、老师特懂事，我跟着阿姨、伴着同学瞎哼哼，老师不指责、我还自得其乐。小学了，我懂事了、老师不

懂事了，左嗓子倍受歧视。从此文艺与我绝缘，一辈子不能参与只能观赏——水平太凹，不敢称“欣赏”。



1956年夏，离开长春一汽前全家合影。

五官的生理缺陷，不影响四肢的发育。尽管我先天不足，一、父高不过1米7，母高不过1米6（我们子女基本与父母分别同高）；二、产前根据地条件艰苦；但是后天补给充足，北满一直是共党后方，比关内好多啦。因此四肢发达，个子不高短跑较快，成了学校足球队的边锋。住校的干部子弟学校，各方面的条件都比周围的平民走读小学优越，因此我们打遍全区无敌手。唯一怵头的是朝鲜族小学，他们踢球真有特点，正面褒奖是勇猛加顽强、负面指责则是野蛮加赖皮。一、不认输：他们控制的球出了边线和底线不承认，球触手不认账，球刚进球门又被救出不算数。（其实我们也如此，但不那么明目张胆而已。）二、不服输：万一他们输了，肯定要求明天再赛。明天没空？后天！三、不能输：万万一，他们又要输，合理冲撞（足球规则允许的）和不合理冲撞必然接踵而来，星星之火即将燎原、一场恶战一触即发。公子哥哪是“高丽棒子”的对手，只好输球免灾。当今国人指责中国男子足球队负于南亚小国时，我同感于国人；国人指责国足“恐韩症”时，我则同情于国足——半个世纪前，我就恐韩嘛！不打不相识，我还真交了几个鲜族小朋友，作为个体他们的较真和义气，令我佩服让我学习。几十年后，在海

外结识些韩国人，他们刚看到我的扁平脸和小眼睛，都以为我也是韩人。我开玩笑说，我是北京的鲜族人，不会说韩语。熟悉后，他们都说我的性格也像韩人。这可能是当年鲜族小朋友的正面影响吧。

干部子弟，小学入（少先）队、中学入（共青）团、大学入（共产）党，顺理成章天经地义。在长春我入队了，不值一提。值得一提是，在长春汽车厂父亲与江泽民相识并成为朋友，本书后面将辟专节详细叙述我家两代人与江泽民的交往。

1956年“一汽”设备安装完毕，开始生产解放牌卡车，父亲被调到一机部机关。全家离开长春进入北京，我结束了十年的东北小孩生活，即将开始14年的北京学生身份－－前十年学习文化，后四年革文化的命。

第二章 大名校中的小名人

——北京学子十年（1956～1966年）

第一节 俞正声之父建立的一机部小学

2-1 可亲可敬的黄敬部长

1956年秋天，我作为五年级的插班生，和两个妹妹进入第一机械工业部子弟小学，开始了北京的学习生涯。一机部小学坐落在朝阳门外红庙，她是那年初由一机部部长黄敬（中共十八大常委俞正声之父）用部长基金、学习苏联刚建立的。学校很气派，有两座崭新的五层大楼，南面的是教室楼，北面的是学生宿舍；大楼的东面是一个普通中学都少有的标准运动场。学生全是部机关及直属院所的孩子，每周六下午由大轿车接送回家，周一早晨再送回学校，其余时间全部在校住宿。伙食很好，由一机部补助，每个班都有专门的生活阿姨照管。学习、生活和文体活动开展的生动活泼，是完全苏式的教育，体育比赛和文娱表演都是朝阳区的第一。



1958年小学毕业。

我最后两年小学生涯印象最深的是：某天课后，全校几百同学到礼堂迎

接部长。黄敬说：“我刚从苏联东欧回来，就带着礼物来看望孩子们。外国领导问我有什么爱好，我说喜欢玩具。他们又问我有几个孩子，我说千八百个。他们就给了这一大堆。”随后，他在主席台上展示了遥控的汽车坦克拖拉机。我们更感兴趣的是占了半个主席台的一套铁路系统，有客车货车、车站、立交桥和平交路口，非常逼真。（后来在游艺室里，我多次把玩和研究黄部长历次赠送的各种玩具，还趁老师不注意拆装过几个简单的，不幸一次失手、无法复原，挨了批评，就此金盆洗手改此劣习。）会后，我们每人还分得一小包洋糖。

毕业前听说46岁的部长，因“反冒进”被毛主严厉批评，患精神疾病，不幸身亡。我们全校师生都很悲痛。爱玩馋嘴的我，更因无人再送好玩的玩具和好吃的洋糖，而格外伤心。80年代初，我结识了黄敬次子俞敏声，共同回忆起五十年代我的幸福与他的不幸。

2-2 品学兼优的乖乖孩

北京小学的两年，可以用“乖乖听话”和“学习优秀”八字概括，即所谓品学兼优的好孩子。当然身体也不赖，你若说叫“三好学生”，我也不谦虚。确实得过许多奖状，但是同学之间“内斗式”的评选三好运动，好像真的没搞过。

乖乖孩。学校的生活管理是全盘苏化的，纪律严格。早起床、中午觉、晚熄灯，铃声响必执行。三餐排队进饭厅，食不语、饭不剩。在外地时，也是类似要求，小鼻涕孩们只有听喝儿的份儿。现在不同了，十多岁的叛逆少年，走南闯北、杀进京城的少爷小姐，谁没转过三四所学校、没见过点世面？例如，学校规定平日不许出校门，吃零食。就有胆大的主儿偷偷溜出，逛商店买糖果。校方派遣值日生，设门岗堵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还是有人让“走读生”代购。忘了告诉你，学校旁边就是机械部的教育基地，有三个大中专学校。（1958年三校合并为北京机械学院，文革后子弟小学更名为

机械学院附小。）其数量不多的子弟是我们羡慕嫉妒恨的走读生。老师发现后，明令禁止。富有经济头脑的同学，一毛钱的零食分两成给走读生，结果还是屡禁不止。我不属于上述有为少年，不是我不馋，哪个孩子没有健全的味觉和结实的肠胃呢？我是有贼心没贼胆，十多岁了，也见过不少世面，就是没长多少本事。表现，温良恭俭让；内因，生性懦弱；外因，温室里的小草弱不禁风。所以，我就成了守规矩的乖学生。

孩子们凑到一块总会有各种各样的故事发生。最重要的就是找喽啰，划地盘、争老大，男的有帮、女的有伙。但这都是大个子的事情，我们小个子有的跟着起哄，我略有自知之明，躲到一边不掺乎其间的纠纷。现在回忆，我童年竟未打过架（挨打不算），算什么男孩！为人父后未打过儿子，算什么男人？文弱的性格在“大革文化命”的时代才有所改变。

学习好。低年级时聪明淘气、不用功成绩好，同学羡慕；高年纪则让老师佩服了。主要是数学课上解应用题，老师给出一种解法，我通常能想出另一种解法，有时比老师的还简捷。因此，得到“小华罗庚”的雅号。还是我们东北人心中的英雄林总所说的好：“我脑瓜好、聪明，没办法，爹妈给的嘛！”——良好的自我感觉，一直延续了整个中学时代；考进清华大学后，方知山外有山、人上有人，我算老几呀？！

2-3 小学的朋友们

荆其柱，《二十一世纪》杂志前主编、“中”有成就的作家。小学毕业后失联，读到我发表的《回忆清华文革》后，才恢复联系。他回忆说：“班上有个小个子阎淮，很有意思让人顿觉不一般。是精得不可思议的小家伙，走路身板直直，眼睛晶亮，是纯粹的精豆子型人物。他的学习成绩很好，说话也是嘎巴嘎巴的利落，别人找不出他的毛病来；重要的是他山不靠、水不拢，不招灾不惹祸，也就没有谁找到能够欺负他的岔口。但看那个劲头，若是出了纠纷也是个难缠的家伙，不会轻易善罢干休，那个心眼与顽强执拗的

劲头谁知道深浅？谁沾上谁倒霉，老师倾向他，就不用说了。这小家伙在团伙之间，悠哉游哉优哉地，活得很是滋润。这个阎淮走路、学习和游戏都有这个优哉游哉、慢条斯理不快不慢的劲儿。后来看过他文革中的回忆，知道这个劲头一直保留到晚年。”



1958年夏小学毕业，同小队同学合影。前排右为作者，中排左为钱海亮。

荆其柱还回忆了两位同班好友：“钱海亮也是阎淮那样的人物，父亲钱敏是一机部技术司司长，后来升为电子部长。钱后来去了上海新华小学。在这上海最好的小学里，有几个日后成为国家领导人的同学，其中也有一个‘悲摧’林立果。钱讲，别看自己小，个子大的立果总听他的话，是其马崽。还有个风云同学、干部子弟姜阳是班上一个团伙的头目。文革中是石油学院大庆公社的头头，保康世恩、余秋里，很是得到周恩来关照。他的身边有一群将军子弟跟随，随时准备进入打架状态。”

“阎淮、钱海亮和姜阳三人，叱咤风云一时之后，奔赴天南海北，还是一样有能力，有一番作为。一辈子都不消停，因为聪明与成熟，他们总在人先，总争人先。争得了人先，也就争得了磨难。无论是那能耐还是那磨难，也不是平常人所能享受得了的。”

——作家的描述确比我的自述精彩！这就是60年前同学眼中的我。自认为是乖乖孩，不招惹是非。原来人家看你是“小精豆”、难缠的主儿！我以为自己是长大了，才变坏的；其实小学就不是个“善茬”，而是个“蔫坏”

的主儿！

小学没开窍，因此不但“同桌的你”记忆消除，而且“同班的你”几乎全都印象归零；除了两位功课优秀、后来成为清华大学校友的女生。

郭庆丰，父亲是一机部教育司长，在一机部“司局长中院”里，住我家楼上。大学毕业分手时，我们在清华大操场，顺着跑道漫步了半个马拉松，聊天到快天亮。随后我奔赴五千里外的大西北，她到五十米外的教学楼。近五十年来，我绕着地球到处折腾“一世无成”，她不出清华园桃李天下著作等身。我回忆清华的文章发表后，她在北京找到在美国的我，恢复联系。

季逑，高级知识分子出身，高级的秀气和傲气。中学六年无联系，在清华重相逢，只能算普通朋友；毕业时聊上个把小时，便各奔南北。毕业后联系再次中断，只听说她负笈美国，学业和事业皆有成。1989年自我放逐到法国后，发表文章《我为什么离开中国》。在万里之外美西的她，千方百计联系上我；电话询问的意思是：“可有经济危机，我愿全力扶贫。”银子我没要，感激之情永存心底。我到美国后，与她全家多次相聚。

看来，发表文章，可以寻觅众多失联故交。眼下这本回忆录出版后，又不知会有多少意外惊喜，也可能收获旧识的指责。谁让你干了那么多坏事，得罪了那么多熟人呢！——只能认了、忍了！

2-4 搞笑老师变“右派”

1957年自然气候和政治气候一样，都是倒春寒，夜里大风刮开窗户，教室的暖气片冻裂了。自然课刘老师开玩笑说：“我正要讲‘水结冰体积膨胀’课，每年我都要冻坏自家一个玻璃瓶，今年正好暖气冻裂了，一举两得，老师省了个瓶子，学生记忆更深了。”我们这些傻孩子觉得挺有意思，都跟着傻笑。

5月台湾发生美军误杀刘自然被判无罪，引发反美暴乱；国内媒体自然不会放过美台矛盾的“刘自然事件”，把刘渲染成反美英雄。从此，我们就把

自然课刘老师叫作“刘自然”了，还有调皮的同学把自然课本的封面上，加一个刘字，书名成了《刘自然》。对这一切，爱搞笑的刘老师还是一贯的嘻嘻哈哈，有时就假装生气地说：“我没被打死，还活得好好的呢！”我们照例跟着傻笑。

到了夏天，刘老师可就活得不好了，没有被打死，但被打成了“右派”。大字报上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状挺多，我都看不懂，懂的就是“社会主义的宝贵财产损坏了，还幸灾乐祸”，当然指的是冻暖气事件了。后来，“刘自然”不见了，我们自然也不会经常被逗得哈哈傻笑了，但是我们都非常想念幽默可爱的刘老师。当时不懂事，只知道小孩可以信口开河胡说八道，大人可不敢乱开玩笑，要倒大霉的！

2-5 建红领巾公园和轰麻雀

六年级的两次劳动至今记忆犹新。

1957年秋天，我们到现在的“东四环”附近劳动了一个星期，修建红领巾公园，漫山遍野的白衬衣蓝裤子红领巾颇为壮观。我们周围几个普通小学的孩子都是步行往返，我们当然是大巴接送。平民小孩不服气：“同样是义务劳动，我们学校还比你们远，为什么你们坐车、我们走路？”我心里也为此不平，但还嘴硬：“谁让你们是走读学校呢？走读就得走路！”30年后，我领着戴红领巾的儿子到红领巾公园去玩，自豪地说：“这是在红领巾时代的爸爸，对社会的唯一贡献。”

1958年春天，全北京开展三天的“除四害灭麻雀”运动，学校停课。我们高小生是消灭麻雀的主力军，天不亮就走出校门，在周围的农田旁摇摆着笤帚毛巾、敲着锣鼓脸盆。据说不让麻雀落地休息，就可以累死它们、摔死它们。认真地折腾了半天，没看见累死的麻雀，倒把我们累个半死。不过，学校送的饭菜挺可口，中午我们轮流吃饭休息。下午大家不太认真了，蹦蹦跳跳像郊游似的，挺快活。后来听说麻雀又不是“四害”了，再不能郊游似

地轰麻雀了，挺遗憾的。

第二节 北京二中平民学校走读三年

2-6 平民学校与“中院”生活

1958年我“中考”数学100分、语文80，差一分没能跨区进入干部子弟云集的101中，只好上了东城区最好的北京二中。开创了我从幼儿园到大学，22年学习生涯中唯一的三年走读生活，也是我大学前的16年，唯一的平民学校。快13岁的我，第一次独立地步入真正的社会。过去十多年，平日在干部子弟的小学和幼儿园中养尊处优，假日在父母带领下，“从事”文体娱乐和社交活动。朦胧少年走出“子弟圈”，进入市井社会，就像《红楼梦》里的农民刘姥姥进了豪华的大观园，看什么都新鲜；不同的是，上下两个阶层反向进入对方地盘。

从崭新的窗明屋亮的现代化洋楼教室，步入低矮阴暗的近百年老屋，我对北京二中的初始印象确实是：压抑感。老师从年轻活泼的叔叔阿姨变成饱读诗书的老学问（如英文教师是剧作家曹禺的太太），过去点头叫老师，现在鞠躬称先生。我心想：先生不是旧社会的坏人吗？调皮男孩子们（二中是男校）流传：“先生先死、学生后死！”最可气的是，每个学生左胸前别个小布牌，印着三排字，上排：北京二中、中排：阎淮、下排：初一3班。就像国民党士兵胸前缝的那个牌牌，那是等他战死，通知家属的。我们这个可是管活人的。学校里干点小坏事，老师和校工一眼就看出你是哪班、姓甚名谁，一转身立马一状告到班主任，回头你就有好果子吃了。我们都恨这小牌牌，一出学校就摘掉，不能让满世界都知道我是谁，在校外的社会上还继续被管制。第二天上学，校门口的值日生检查可恨的小牌牌，我们赶紧从兜里掏出，别在胸前。假如头天换了衣服，小牌牌丢在家里，算你倒霉，回去取！

我对真实现实的复杂社会、对多维多彩的大千世界，时时新鲜、事事好奇。而新同学们对我这个本地异乡的外星人，惊讶奇怪则源自三个方面。

首先，我的天真礼貌（尊称“傻帽”）。中学生有“碎银子”了，到“公家地界儿”买糖果，同学叫“喂”和“嘿”，我称叔叔阿姨；他们讥笑我：“售货员是你亲戚呀？让‘丫挺的’多给点！”去“私人小摊”，同学对“老头”讨价还价，临走还抓上一把铁蚕豆；我对“老爷爷”，则是言听计从毕恭毕敬；同学见义勇为，帮我去买，果然多了一倍。

其次，我的“苞米茬子”口音。干部子弟小学，师生来自五湖四海，口音山南海北，谁配笑谁呀？二中不同了，基本上都是京油子的“胡同串子”，他们在笑话之余，还帮我正音。无奈我听力欠佳，13岁已定音，同学笑我“知吃屎”不分。几十年来，外地人尊称我讲北京官话，北京人笑我发“茬子音”。

最后，我的“子弟”身份。当时我家住在南小街的“羊尾巴胡同”（难听吧？政府英明：文革后改为阳照胡同。）六号的一机部司局长“中院”，日军占领时期是“将校楼”，三层高楼在一片平房中鹤立鸡群、格外刺眼。同班有作家严文井、画家吴冠中等高级知识分子的公子，他们大都住在二中北面，放学向北走。与我一路南行的，大都是住在南小街一带的城市贫民子弟。他们早就知道，有个过去日军的、现在中共的神秘“高干楼院”；因为有看门老头，可望不可进。我带他们到院里玩、来我家中帮他们解决数理化难题，顺便吃点高价食品。胡同串子和洋楼公子很快就成铁哥们了，还送我顺口溜：“高级点心高级糖，高级小孩上茅房。”

说到住家，就谈谈“中院”吧。现在人们对“大院”耳熟能详，如军队各总部和各军兵种大院、国家机关的部委大院、院校工厂等企事业大院，形成中国特色的“大院文化”，文革后许多文艺作品都有表现。大院里居住着从一般干部到单位首长，军队首长则住在大院中的小院。国家机关的部长

们，除在百万庄的申区集中住了一小批、个别的在大院中居住两个单元之外，大部分在城里有四合院，有些还附带花园，属于货真价实的“小院”。

我们的司局长“中院”则别具一格，北面日式的三层楼21户，中间国民党接收后扩建的两层楼4户，共居住25家司局长。南面大门的西面是门房、再西是看门傅大爷一家的住房，东面是一排仓库。院子的西边是锅炉房、公共浴室和放映过小电影和幻灯片的小礼堂；院子东边是几排平房，住着二十几位司机和勤杂工人。我们一百多个孩子，不分阶层、随机分帮、“打”成一片，打人者改天就可能与挨打的“结盟”、挑衅昔日战友。我们的潜规则是“战败国”从不到“联合国”（家长处）告状。暑假我们结伙去什刹海，看门的女儿教我弟妹游泳；我的自行车练会了好几个司机的孩子。家长们就不同了，司机对首长恭恭敬敬、领导对工人客客气气，但是彼此从不走访往来。我家来过工人修理水电，父母也拿糖果招待；但来做客聊天的，就只有司局长夫妇们了。

小脚奶奶苦口婆心谆谆教导我：“别老玩！读好了书，将来就像你爸爸那样坐小汽车；读不好，就当司机给大官开车；读得再差，就像咱院扫地的、只能给大官开车门。”文盲的老太太，都看得出“中院”等级分明的阶层！尽管我不是为“坐小汽车”而学习，高中入团、大学入党，我还是绞尽脑汁、不厌其烦地检讨祖母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

初中三年，基本是三年“人祸困难时期”。从中院的汽车，也可看出大跃进的成果：58年爸爸们一人一辆小轿车；59年两三个人“拼一车”；60年改成大轿车，小车司机们也坐这车到部机关干杂活去了；61年取消专车，官老爷们去挤公交车了，还有一位伯伯被人在车门口挤下来摔伤。这也是困难时期党的中级干部，企图“与民同苦”缩小特殊化的壮举。但是每月特供的肉蛋糖豆照发不误，百姓戏称“糖豆干部”。这年父亲由东城的一机部调到西郊三里河的国家计委，他不堪长途跋涉挤公交，毅然放弃了中院的四室二

大厅两大门，还有大浴室、大小方便二个厕所，共200平方米全木地板的豪宅，搬到面积减半的计委宿舍。我结束了5年的“中院”生活，即将开始长期的“大院”生涯。

2-7 大炼钢铁和三级运动员

1958年大跃进高潮中，二中与全国同步，校内大炼钢铁。老师和高中同学起早贪黑汗流浃背地在小高炉前奋战，终于把钢炼成铁、把铁变成渣。我们初中小孩只是干些搬运材料、端茶送水的辅助活，也够累的。二中位于内务部街、民国初期的内务部，庭院狭小，只垒了两座小高炉。老师开玩笑说：“我们是二中，两个就够了。”我当真了。心想：“我向往的北京101中在郊区的圆明园，有的是地方，那不得伺候一百多个炉子，还不累死人，多亏中考没超过180分！”

大跃进是全面的，文艺体育也不例外。我文学艺术都不行，不能在墙上写打油诗、画宣传画，参加不了赛诗赛画。但是，我爱打乒乓球，尽管水平很凹。体育老师让我赢了三个三级运动员，确切地说，让他们输给了我。于是我就跃进成了乒乓球三级运动员，还有国家体委大红印的正式证书呢！以后在高中和大学，高手如云，我从不敢说自己的“三级”，就像公社干部避讳“亩产三万斤”一样。

大跃进之后，就轮到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了，很久以后才知道：实际上没有灾害只有困难。于是开始了“劳逸结合”，首先是劳动课停了，接着是体育课也基本停了，最后就连知识课也压缩了。58年累死了，59年闲死了。

父亲时任一机部基建局副局长。全国重点项目——黑龙江省富拉尔基的中国第一重型机械厂1954年开建后，进度缓慢。大跃进了，形势逼人。分管这个项目的父亲只得兼任建厂总指挥，58年后绝大部分时间在黑龙江“一

重”工作。（1975年我从甘肃调回北京，落户口时发现父亲的户口是1961年从黑龙江迁入。说明他当时迁走户口，破釜沉舟建好“一重”的决心。）母亲随夫进京，一机部调来的干部应由一机部分配，但一机部没有医院，就把母亲交给了卫生部。母亲不是卫生部的嫡系，当然不会分在市区的好医院，就被委任为在郊区的卫生部直属第七医院院长。困难时期“中直七院”下放北京，改名海淀医院。母亲毫无怨言，吃住在医院全身心投入新的革命工作，周末才回东城的家。平日家中只有年迈的奶奶和我们四个孩子。

2-8 文体活动丰富多彩

如前所述小学住校六年，“子弟”学校管理甚严，平日不许出校门一步。现在走读了，上无父母管教，下没兄姐督促，有如放虎出山，真是大民主、自由化了。

我中午在学校吃食堂，每月省下一、二斤粮票，卖给某同学（其父是吃定息的资本家，超富），得几元钱；加上零花钱，也算小财主了。我是有钱、有闲、有自由了，于是就像现在的“大款”一样，开始投资涉足影剧界了。

家近东单、校近东四，邻近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和中国实验话剧院，三大著名话剧院三年中所演话剧，一览无遗（每场投资三角钱的最便宜票）。周围七八家影院，中外新老电影也一网打尽（学生票五分或一角）。也常去天桥，路南天桥剧场的歌剧舞剧芭蕾舞和路北小剧场的相声曲艺杂技，我是雅俗共赏、土洋结合，不会看门道、也会凑热闹。特土的还有老东安市场内北京曲艺团的表演，十分钟两分钱，像现在停车收费一样，进门发个时间条，出门算钱；现已近绝迹的单弦坠子、天津快板、山东快书、各种大鼓应有尽有。此外唯一发祥于北京的北京曲剧和刚恢复的“北昆”在西单剧场的演出，以及同样好懂、经常演现代戏的评剧，我也爱看。唯有程序化、慢节奏、净古装的京剧不敢光顾。

不看影剧时，也经常看书到半夜，涉猎中国封建社会的四大名著和众多非名着、以及欧美资产阶级经典作品和苏联修正主义的“解冻”文学。

以后在高中入团和大学入党时，我都不断地检查自己当时所受到的“封资修”影响，即封建阶级的四维（礼义廉耻）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修正主义的三和路线（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其实质就是用人性论取代阶级论。检查归检查，影响却是根深蒂固的，似乎已经溶化到血液中，渗透到骨髓里，它左右着我今后的人生轨迹。1984年在中央组织部整党汇报时，大家都说自己受左的影响较深，唯独我说“自己思想里右的东西比左的多”，这令一些具有反思精神的人感到很惭愧。（见崔武年着《我的83个月》，34页，香港高文出版社，2003年。）

“文体不分家”，我的文艺生活丰富多彩，体育活动也必不可少。困难时期，学校解散了体育运动队，我们初中乒乓球队也自动消亡。自发性团队式运动本来就少，十多人的足球队很难凑齐，我是不足一米六的矬人，五、六人的篮、排球队的大个子们也不愿意带我玩。我从事的只能是个体性运动——游泳和滑冰。

夏天去北京唯一公开开放的什刹海游泳场，那里有三个游泳池，蘑菇池半米深是小孩戏水的乐园；50米长的标准池人山人海，既像煮饺子似的，又像个超大浴池，是主要的泳池；我能游100米后考取了深水证，立刻离开了这饺子锅，奔向跳水池。

跳水池水深三米，有跳板和跳台，开始当然是在一米跳板上蹦蹬，跳入水中也潜不深，很快就不过瘾了，跃跃欲试新的高度。三米的跳台对初中小孩是非常高了，第一次上去，向下一看，头都有点晕，闭着眼睛一迈腿，也不知怎么就稀里胡涂、四脚朝地掉入水中。同伴们耻笑我，指点我应该像运动员那样头向下入水。初生牛犊不怕虎，我为了挽回面子，再次蹬上高台。

头向下、双手前伸、双腿弯曲，作出优美标准的跳水姿势，双腿一蹬、跃向空中。说时迟那时快，啪地一声，我前胸猛拍水，整个人平入水中。上岸后，胸脯都红了，疼痛好几天。从此至今，在高台上我只敢跳“棒冰式”，即头上脚下“立正姿势”入水。但这也有好处，潜得深，可以直接入水两米多，再向下潜游几下，就能触到3米的池底，然后沿着池底潜游到距离上岸扶梯最远的池边后升出水面，最后再顺着池边在只有几个人的泳池中畅游半圈，到扶梯处上岸。这特别惬意、很有趣味。跳水池只让跳水，不许长距离游泳，避免被跳水者砸伤游泳者。我这样先像深海鱼潜泳，后似黄花鱼溜边，就能躲过救生员的督察。几个水性类似的同伴也学会我的伎俩。泳池半月换一次清水，圣人曰“水至清则无鱼”，跳水池却是“水至清则无人”。水清后，救生员一眼望穿夏水，我们无法故技重施，况且新水不到20度，冷池不是久留之地。没几天，我们就又浑水摸鱼了。

作为国庆十周年的献礼项目，北京又先后建成陶然亭和工人体育场两个公共游泳场，地方远些，人也少些，标准泳池由“煮饺子”变成“下馄饨”，清爽多了，跳水池设施新、条件好，其它辅助器材也高级。喜新厌旧的我转向新欢，在那里也教会了弟妹们游泳。

但是，现在我怀念的仍然是什刹海，那是我学习游泳的启蒙地，在那个大浴池里第一个暑假喝的“饺子汤”，比我一辈子喝的脏水都多。什刹海天然野泳湖是我坚持冬泳，后来也强迫儿子冬泳的场所，一直到我出国。她是我的“井冈山”，从这里启程，我几乎游遍祖国的江河湖海，北起松花江、南到万泉河，西从青海湖、东至渤、黄、东、南，中国四大海。从什刹海开始我先后游过印度洋、大西洋和太平洋，也在北极圈内的江湖中冻泳。在国内，我在中直机关游泳比赛中获过奖。半个世纪后，在美国南加州华人游泳运动会上得了几枚金牌。

游泳是平民的运动，5分钱的门票、5角钱的泳裤谁家出不起？滑冰可是

贵族的活动，一双冰鞋就要青年工人半个月的工资，百姓几家出得起？我当然要赶这个时髦。我是长子，父母还是舍得花钱的。半大小子精力过剩，寒假滑冰还算正经事儿，总比无所事事、无事生非好。将来脚大了鞋小了，还可以弟妹继承，也不浪费——我的不孝想法。

我滑冰开始的地方，就是电视剧《梦开始的地方》中陶虹所说的："五湖的水，四海的水，不如什刹海的冰场美。"游泳场四周有围墙，游泳时脸又向下，无法欣赏风景。无遮拦不收费的冰场就不同了，周围真美！我理工男，无文学细胞、笔拙不会形容，你看看名词《沁园春•雪》就知道"北国风光""分外妖娆"了。什刹海泳场和冰场，你让我呛了多少水、摔了多少跤？半个世纪后，我仍然怀念《阳光灿烂的日子》（姜文）在那《血色黄昏》（老鬼），在这里《玩的就是心跳》（王朔）的《与青春有关的日子》（叶京）。军队大院的知青作家大都钟爱此地，他们在上述作品中不厌其烦地讲述着文革时什刹海冰场的风流轶事。

文革前的什刹海可没有头戴羊剪绒皮帽、身穿国防绿军装的军干子弟们，拍婆子和叉架的情景。那时的滑冰者和风景一样美，傻蛋的我不会滑，陌生的老师主动教导；笨蛋的我摔了个狗吃屎，许多人抢着来搀扶。这里美中不足的是周末人太多。我会滑之后，周末就花5分钱进对门的北海公园，到另一个海上去滑了。初级冰者用花样冰刀，中级的用跑刀，高级人士是冰球刀。我所谓会滑也就是用花样刀而已，并且像《解放军进行曲》第一句那样，"向前，向前，向前！"不会倒退，更不会玩花样了，真是有辱花样刀的美名。上高中兴趣变，不再滑冰。到欧美后，改滑雪，别有一番风情。

2-9 天安门前欢迎外宾

北京二中是重点学校，又距长安街不远，所以我们初中的少先队员这三年是天安门广场的常客。那年头别看我国挺穷，朋友倒不少。去广场列队欢迎外国政要，每年都有个十次八次。

初一时，新鲜好奇加之“菜鸟”听话，每次都认真热情，高举鲜花或小旗死劲摇动，梗着脖子大声吼叫：“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外宾车队过后，胳膊酸疼了、嗓子沙哑了。穿着整齐的队服和白球鞋疲惫地回家时，中院里的小学生又把我像外宾似的迎接，小屁孩儿们围着我问长问短，抢我手中的残破的鲜花或彩旗。顿时，我忘了酸痛沙哑和疲惫，俨然也成为要人，自豪感和幸福感油然而生。

初二时人皮了、身也疲了，粗俗地说开始“当和尚撞钟”了，用台湾话说是“摸鱼”了，文雅地说是滥竽充数。就像“山寨版”《海港之夜》唱的：“手臂你轻轻地摇，喉咙你低低地喊。”同学们从初一时对中外领袖的崇敬，进化到议论起黑黄白各种肤色夫人的仪表容貌和服饰装束了。

初三时，烦了！与苏联东欧交情掰了，外宾中漂亮的白太太少了，黑娘娘多了，没意思了。十年国庆时，从不迎宾的伟大的毛主席都见过了，其他不太伟大的国产领袖，见几次也就审美疲劳了。和尚庙男二中情窦初开的少男们，对站在旁边女十二中的美少女更感兴趣，对她们指手画脚评头论足。散会后，更有胆大妄为者前去搭讪，要护送美女回家，当然被她们女生严词拒绝，更被我们男生恣意取笑。

2-10 建国十年国庆游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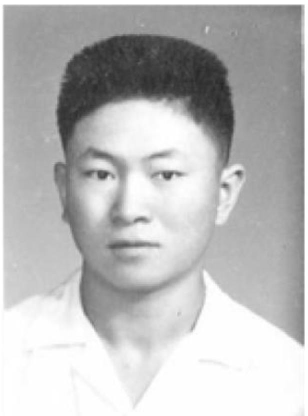
当年，每年国庆都有军队阅兵和群众游行。少先队游行的主力是初中生，初一“菜鸟”刚升中学一个月，还来不及训练；初三准备中考，就不麻烦“老大哥”了；初二学生义不容辞当仁不让。1959年9月1日，开学了，也就开始游行训练了。上午上课，下午训练，一周两三次，一次一两小时，不累。起初本校学生在学校操场，后来东城几个学校在东单体育场合练，好像没有到天安门前彩排过。

司局级干部，每年都可到天安门旁的观礼台观礼阅兵和游行。我非常羡慕父亲能经常见到天安门上的毛主席。（某年，父亲从东北赶回，小有不

适，未带病观礼。我心里埋怨他觉悟不够高！）今年我也行了！9月30日晚我兴奋得很晚才入睡。

10月1日天不亮我们就去学校集合，由大巴拉到前门，走到天安门广场中间的指定位置，时间是早7点，在我们与天安门之间已经整齐地排列了受阅部队。中秋时节北京的清晨还是挺冷的，我们在白衬衣里面穿上毛衣、蓝裤子里穿着棉毛裤。

大伙儿坐在地上打扑克、下棋，也有人和旁边女校认识的女生聊天。



1961年初中毕业。

8点发早餐，一个面包两个鸡蛋，饮料是临时接上的自来水管里不曾被污染的水。（小中大学，三六一十八年，我在校园中一直喝自来水，身体异常健康。后来、现在，饮瓶装水，身体反而差了！）地面撬起一些铁地砖，四周围上帆布就是厕所，我们想要“方便”，还真是方便。

9点集合排队，每人发一束花，不能随便走动了。南北方向一队二三十个人。我个子小首次具有优越性，排在第二个，看阅兵和游行挺清楚。东西向是男女间隔，左右都是女生，说是不许说话，谁管得了？前后谈话不方便，左右聊天可就太自如了。我立刻就和旁边的小女生假装认识了，10点以前我们吹牛侃大山，以后评论阅兵和游行，三个多小时与女生说的话，比前十年

还多。到工厂后才听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但当时我就亲身体会到“男女聊天、站着不累”。散会后，我们没有各奔东西（只许西行），而是共向西方，但是彼此立即翻脸不认人，开始遵循祖训“男女授受不亲”了，男生一帮、女生一伙西行漫游去了。我们的“半日情”就此结束，我现在怎么也想不起左右漂亮女孩子的模样了。

10时，北京市长彭真宣布，国庆典礼开始。9月才取代彭德怀的新任国防部长林彪元帅在北京军区司令杨勇上将陪同下，乘红旗牌阅兵车检阅了广场和东长安街的部队。小时候在东北，老听父亲用崇敬的口气说，“又听了老首长（其实是他首长的首长）的报告，东野（四野的前身，当时全称是东北野战军）的林总如何英明。”上学后，又知道林总真能打仗，东野从黑龙江打到海南岛，解放了大半个中国。东北的干部子弟，都爱说“我们东野”，都崇拜“我们林总”。今天真见到了心目中的大英雄，真是兴奋无比。平日，二中的“北京土着”老讥笑我口音中有“苞米茬子”味。现在，我骄傲地大声告诉周围的男女同学：“这就是我们东野的林总！”还神气地补充：“我从小就被他抱过！”捎带着、假装不经意地告诉他们：“那检阅车是我们东北长春汽车厂制造的！”——可给我们东北人提气了！

随后阅兵开始，老师说一共有35个方队。第一个是军事学院方队，因为全是军官所以我记得（小孩对官衔特感兴趣）。两位少将带队，学员们身穿海蓝色陆军校官礼服，佩带金黄色肩章。15个徒步方队中，海军身着白色水兵服，头戴黑色飘带水兵帽，手持半自动步枪，刺刀闪闪发光，让我羡慕，心想将来若参军就当海军，反正我会游泳淹不死。接着是14个车辆方队，我最感兴趣的是履带牵引车拖着的各种大炮和近百辆坦克，我兴奋地大喊，看大坦克！身后的“兵器通”小杨立刻纠正，不大！是国产五九式“中型”主战坦克。我顿时泄了气，再不敢乱议论。这时，东面天空上传来雷鸣般的轰隆声，像闪电一般，由东向西飞驰而来6个空中梯队的一百多架飞机，它们排

着整齐的5机编队，令人目不暇接。小杨指点我，这是轰炸机、那是国产“歼5型”歼击机。

后来才知道，这一个小时的阅兵创造了许多记录。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阅兵，是林彪唯一的一次担任阅兵首长。受阅官兵人数最多，达1万1千。准备时间最长，1958年11月中共中央就发文筹备。是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的最后一次——此前每年国庆都阅兵，1960年困难时期，中央决定改革国庆典礼制度，规定“五年一小庆、十年一大庆，逢大庆举行阅兵”。1969年20年大庆和1979年30年大庆，是在文革中间和文革刚结束，当然不能实施“大庆阅兵”的制度；1989年更不能干这事儿，大家都明白；直至1999年50周年才恢复“大庆阅兵”制度。我有幸现场亲眼观看这次空前规模、绝后40年的“十年一大庆”的大阅兵，终生难忘。

邓小平在1984年，破制度开先例，在建国45年的“小庆”时，空前绝后地举行阅兵。以前历次阅兵，军委主席毛泽东都在天安门上观看，坐车直接实地阅兵的首长是国防部长，如彭德怀和林彪。邓以军委主席身份空前不绝后地担任阅兵首长，为他以下各代“核心”创造了绝好的表现（表演？）机会。小平不愧为伟人，似乎有先见之明，料到1989年不能有庆典，抢先在他鼎盛的1984年搞个大庆典，得到北大学生的赞颂标语“小平你好”！5年后，同样在天安门广场，同样是北大学生，同样是标语，只是在后面加了一个字——“小平你好狠”！

书归正传：11时，阅兵式后，70万群众举行了空前盛大的游行。三面红旗是主题，“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和“人民公社万岁”的标语铺天盖地比比皆是，“10年超英、15年赶美”的口号此起彼伏震天价响。大小彩车上的各种模型格外引人注目，我最感兴趣的是大炼钢铁的高炉平炉（我们学校就有）和公共食堂的可口食品（中午饿了）。五彩缤纷的文艺大军中的美女和体魄健壮的体育大军里的俊男，特别吸引小孩的眼球，明星和健将

中有许多我们崇拜的偶像，小粉丝们兴高采烈指手画脚。我最同情站在汽车高台上的跳水健儿，只穿三角泳裤迎着秋风，似乎冻得直哆嗦。而我们穿着毛衣秋裤，在密集的人群中挥动花束大喊大叫，满身是汗，真想和他们中和一下。

其实，最最让我幸福激动的是：我亲眼看到了日思梦想渴望见到的、伟大领袖大救星毛主席。10点阅兵前，主席和中外众领袖刚走上天安门城楼时，我们第一次看见他老人家，都手舞足蹈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我过去写过这个口号，好像没喊过，这第一次确实是发自肺腑。老师事前嘱咐过，开始喊口号不要太玩儿命，否则几个小时下来，嗓子会坏的。我早忘得一干二净，激动地拼命大吼万岁，要不是彭真宣布开会，嗓子肯定没救了。1966年7月在人民大会堂里、1966年8月在天安门上，我更近距离地见到他，但是激动的程度与年龄成反比，年龄大激动小；与距离成正比，距离小激动小。“吼口号”先变成“喊口号”，再成为“叫口号”。文革中期就是“说口号”了，文革后期就成了“哑剧”表演，只张嘴不出声了。

阅兵结束后，主席有时进去休息，我们开始注意外国领袖了，尽管我们对这些社会主义的领袖也很尊敬，但是小孩还是很会发现特征，准确评价一一赫鲁晓夫手拿大边儿礼帽（我们叫卓别麟帽）向群众挥手时，大光头在阳光下格外明亮，好像都反光似的，真有老大哥的派。胡志明稀疏的头发、半尺长的山羊胡子和瘦弱的身躯令人肃然起敬、感到和蔼可亲，“胡伯伯”名不虚传，真像个好伯伯。与胡对比度极强的是非常富态的金日成，当时我国已困难了，听说朝鲜挺富，看他们领袖的样子，就知道人家不穷。

在上述元首们的两边，站着其他领袖。当时在西长安街全国总工会大楼的墙上，并排挂着毛刘周朱陈林邓七位中央常委的巨幅画像，这是北京、也可能是全国，唯一公开悬挂的七大常委像。我经常路过那里，每次都肃然起敬，心中感谢他们领导父辈们浴血奋战，带给我们幸福生活。现在除了养病

的陈云外，他们六位都站在天安门上，向我们挥手致意，我由衷地感到无比幸福。（虽然那次没能见到陈云，但是十年后，我却成为他们全家的朋友。）雍容华贵的宋庆龄和慈祥可亲的董必武两位国家副主席外形特征明显，特别容易辨认。十大元帅除彭德怀外，都身穿元帅大礼服，分外威武雄壮。后来得知，刚倒了大霉的彭接到请柬，觉得见到众帅无话可说，故请假。

13时许，当游行队伍全部通过天安门以后，一声号令，广场上十万人以我们少先队员为先导，一齐涌向金水桥前，向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和所有领袖欢呼致敬。毛主席在城楼上由东走向西，频频地向我们招手时，我近距离地看清楚了主席，兴奋异常无比幸福，使出吃奶的劲头，高声大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我忘记了疲劳和饥渴，不停地欢呼雀跃，热得满头大汗浑身湿透。

散会后，我到临时厕所脱下湿淋淋的毛衣和秋裤，系在腰间，顿时凉快轻松了。我们沿着长安街西行，南北路口都封闭了。一直走到西单才能向北拐，到西四才有公交车可坐。回家后，幸福感和兴奋劲还没散，急着想向弟妹们炫耀显摆自己的传奇经历。爸妈催着我先吃饭，我就吃了饭。俗话说，“饿了发呆、饱了发困”。谁知我饿时没发呆，吃饱后还真困，一觉睡到第二天清晨。

初中毕业时，音乐老师皇恩浩荡，让只有四个音的我，成绩首次从3分升为4分，我也就捞了个“优良奖章”。（北京市规定，中学生主科5分、副科4分，可得优良奖章。）北京二中很想让我升本校高中。原因是我虽不用功，但有点小聪明，加之学校“干部子弟”不多。父亲不理睬二中领导的暗示——即使中考不好，我也可升本校高中。他为了挽救浑沌的我，决定令我考入“深具革命传统，准军事化管理”的101中。让我重过干部子弟的住校生活，以期痛改初中三年平民子弟般的自由散漫之前非、重新做革命接班人。后来

妹、弟也步我后尘进入101中。

父亲对我人生轨迹干预不多，逆我意愿仅此一例。生育养育教育我的父亲已逝去多年。我以为，对子女的生育是偶然，养育是必然，教育则是使然。父亲对我教育的最得意之笔，就是让我享受了101的教育。

第三节 干部子弟云集的北京101中

2-11 革命传统与突出政治

北京101中学始建于1946年3月20日。

1945年日本投降后，共产党从日军手中解放（其实是和平接收）了唯一的省会城市——察哈尔省会张家口市，46年初建立了共党的第一所正式中学。后因国军进犯，该校随共军撤离，辗转于太行山区，建国后进京，是共产党在解放区创建并迁入北京的唯一的一所中学。经周恩来总理特殊批准在荒芜的圆明园南部建立校园，命名101，寓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并作为校训。1953年，周总理到校视察，告诫干部子弟不要做“八旗子弟”，成为校史佳话。1996年50周年校庆，江泽民特为题词：“继承发扬革命传统……”，更强调其革命传统。

郭沫若作词、李焕之作曲的校歌，自豪地唱道：“我们是革命的儿女，我们在风暴中诞生，酝酿着优越的本领，锻炼着不屈的精神。一零一，一零一，你是永不自满的象征，祖国需要我们，我们要排山倒海地前进！……”一所普通中学的不普通的校歌，充满着革命的激情和重大的责任，也显示其优越感和特殊性。校友中可称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有：曾庆红、李铁映、刘淇和廖晖等，还有“朝为领导人、暮成阶下囚”的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

学校离城里很远，但周末不允许家长用小汽车接送孩子。举行家长会时，也没有见到过车水马龙的盛况。中共早期领导人张太雷的遗孀王一知是

101的校长，她曾在全校大会上说：“我们这里不容许中将的孩子享受少将的待遇，你们都是士兵待遇，大家都是革命大家庭的普通一兵！”学校更教育干部子弟丝毫不能有特权思想——类似现在“我爸是李刚”的那种，而只能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

校门两侧用大字镌刻着党的教育方针：“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毫不夸张地讲，她确是全国学校中贯彻教育方针的典范。

101中以苏联苏沃洛夫少年军校为榜样（受苏联小说《红肩章》影响），实行准军事化的管理。起床熄灯吹军号（由学生军乐队负责），三餐吃饭时各班排队迈着整齐的步伐、唱着雄壮的革命歌曲进入饭厅，和在军营里一样。特制的校服是没有肩章的苏联军校校服。男剃光头、女留短发，毕业生以进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为荣。101的政治氛围在全国的中学里首屈一指，与教务处并列设置思想教育处，专门对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同学们都以思想进步和学习优秀的“又红又专”为努力方向。每年校庆的校史展览和校史联唱，都是充满激情的革命传统教育，每年圆明园毁坏日在其“西洋景”遗址的团课，都是深刻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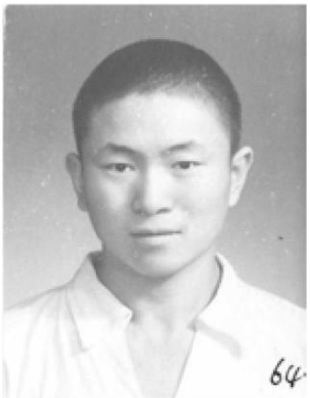
如前所述：小学时，老师和家长的要求就是：“努力学习、遵守纪律。”我是学习不够努力，成绩还算可以；不如听话女生规矩，但也不敢学“坏男孩”太调皮；混个功课好的乖乖孩，对得起老师家长、交差了事。初中时，喜逢“困难时期、劳逸结合”，只是半天上课，班主任一星期见不了几面。我学习可以、不“大违反”纪律，更没人管我。家长平日不在身边，我吃喝玩乐、真是太“自由化”啦！刚到101中，就像社会上的“二流子”“小混混”进了军营、甚至监狱，似乎时时被管制、处处受约束，浑身不自在，太不自由啦！整天盼着快到周末，回家舒服去。

而101的一切，都潜移默化，不！是“明移强化”着我的世界观和人生目

标。我在政治上“启蒙”了，开始严格要求自己，将来接革命的班，使父兄前辈打下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色。身为干部子弟，我首次有了做可靠的革命接班人的意识。

2-12 生产劳动与艰苦朴素

学校有正式编制的生产劳动办公室和劳动课老师，班干部有劳动委员一职，每周的课程表有半天的劳动课。校园里有师兄师姐们发扬南泥湾精神，开荒自建的20多亩农田菜地和果园猪圈等，供我们劳动磨炼。常言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101则是“前人栽树，后人吃苦”。但我们都以苦为乐，以苦为荣。我们手上都有茧子，否则被人看不起。这些101特色也都是全国之唯一。



1964年高中毕业

我印象最深的艰苦劳动是清理厕所。101没有抽水马桶，全是“旱茅房”。夏天臭气冲天，进去“方便”一会儿都熏得难受。我们要打开粪池的盖子，掏屎尿、推粪车，溅得满身污秽，不觉其臭，引此为荣。冬日屎尿结冰，我们用铁锹铲、铁镐凿，三九寒天都累得满头大汗，溅起的冰碴曾划破手脸，疼得要命。看到国家主席刘少奇接见掏粪工，我当时就觉得：真应该！

101的一天是这样度过的——早晨6时起床，夏日晨曦微露，冬季漆黑一片。起床号一吹，我们像听到冲锋号一样从床上一跃而起，把被子迭成“豆腐块”，冲到自流井洗漱。夏天冰凉的井水立刻驱散睡意，冬天觉得水挺暖和，但被寒风一吹就冻得直哆嗦。随后是集体早操和个人晨练，风雪无阻。7时，按班排队唱歌进入饭厅早餐。三餐都是值日生分好的固定饭菜，餐前没得挑选，饭后不能剩余，当然是站着吃。饭后是必须参加的早自习。上午四节课后是午餐，和所有的学校相同。不同的是饭后一个小时的午觉雷打不动不睡不行，室外有生活老师巡视，室内有生活委员管束。劳动、运动、午睡，101中培养的三大习惯，我是国内国外“两国一制、50年不变”。过去老外批中国人午睡，懒惰！现在科学发现午睡好，都赞华人，聪明！

下午两节课后是体育锻炼时间，教室清空，操场人满。101的教室宿舍大都是平房，生活设施简陋。但是体育设施“奢侈”，老校友们修建了当时中学少见的有足球场和400米跑道的标准运动场，挖了大学都少有的游泳池。校园北面辽阔的圆明园遗址更是我们中长跑的运动基地，我是每天一小圈，到福海边两千米，三天一大圈，绕着福海跑五千多米。晚饭前后各一小时的自由活动时间，共青团员找非团员作思想工作，我入团前被找、入团后找别人谈政治。有时，大喇叭广播麦田需拔草或蔬菜要收割，我们就跑去自愿劳动。这自由时间也体现了101贯彻为政治服务和与劳动结合的“教育方针”的自觉和主动。随后的两节晚自习才是我们认真学习的时间，我作为学习委员，也经常帮助同学，小声解答他们的疑难。冬天两位值日生不上第二节自习，回宿舍生火，若煤球炉烧不好，半夜被冻醒是常事儿，但是不会挨骂，谁不走麦城？下次将是你！晚10时熄灯号吹过，各屋灯灭声歇结束我们“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一天。

101中，特殊的普通中学，她是战争年代革命集体主义的延伸，是王蒙《青春万岁》时代理想主义的继续，是党的教育方针的绝唱。

初中三年，自由散漫无拘无束的走读生活惯坏了我。进入“四严”的101中（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对这种准军事化的集体生活，我由反感到适应，再到认同和喜欢。整个大学时代我都剃光头，就是其外在表现。101艰苦朴素的作风、自强不息的精神、坚韧不拔的意志、坚定不移的信念以及极艰苦的集体生活和高强度的劳动锻炼，这一切彻底改变了我。培养和锻炼了我的顽强意志和强健体魄，这种磨炼终生受益，为日后艰巨繁重的工作和艰难困苦的生活的挑战作了充足的身心准备。

2-13 回忆与反思、感恩与忏悔

2011年，是我们进入高中50年，又恰逢101中建校65周年。同班同学拟编写回忆文集。约稿推辞不掉，草此一文：《回忆与反思、感恩与忏悔》，节录于下——

（一）回忆与感恩

高中三年，15一18岁，人生重要的里程碑。101中的养育让我在体智德诸方面良好发展，不仅使我在步入成年时三方面都有较高的起点，也赋予我终生受用不尽的精神财富。

（1）体育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昔日革命和工作，是我最重要的资本；如今不革命不工作只生活享乐，更是重要的老本。故先论体育。

北京二中的初中三年，困难时期劳逸结合，停止了体育锻炼。体弱易病的我，经过101中的千日锤炼（体育锻练与劳动磨练），不能百炼成钢，也千锤成铁。大学盛传“清华一条虫，出去一条龙”之说，我不敢苟同，君不见社会上的清华之虫比比皆是。在体育方面，我只能算是101的一条虫，但毕业后在大学和社会上，我却是香港最著名的演员——“成龙”了。

大学——首节体育课，老师指导双杠上的双臂屈伸。很多同学歪歪扭扭

才能作几个。轮到我时，却轻松标准地展现。此时有人找老师谈事，过了很长时间，他猛回头惊讶地发现我还在不停表演。老师叫停我，注视我的光头，“你是101的吧？肯定会骑自行车，我是自行车队的教练，你来吧！”我就这样被“请进”拥有运动健将的清华自行车校队。

工厂——大学毕业当工人，我可以两臂各夹百斤水泥，轻松运送。“工人三班倒，班班见领导”，原意是三个班都应有车间副主任跟班。我任主任时，每个班都跟四五小时，长期每天工作十几小时。高中的锻炼传统、大学的继承光大，是我五年中，从工人爬到县团级厂长的物质基础。

近期——2007年在西藏五千米高原，活动量比年轻的导游还大，无高原反应；2008年更新驾照，从西四环到通州车管局，往返150里，半天骑自行车轻松来回；2009年美国首发猪流感，不回国是爱国，假装爱国一次；2010年与同学自如攀登北京最险要的、曾摔死数人的箭扣野长城；现在65岁的我，每天两三小时的乒乓球，然后游泳近千米。



1964年夏，高中毕业合影。前排正中为张太雷烈士的遗孀王一知校长。本书作者正巧就在王校长右后。

（2）智育

初中时，无知少年只知玩。101使我“认真”完成了高中三年学业。此前我从来未认真学习过，是母校的师长和同学的言传身教改变了我、提高了

我。当年清华考分最高的工程物理系（当时中国还无原子弹）150人中，就有我班三人、咱年级五人。这个奇迹，完全归功母校的智育教育。

101的图书馆，学校东北角孤立的小平房，室内与屋外同样人流稀少，人文期刊与科学杂志同样丰富繁杂。体育锻练后至晚饭前，我经常在此流连忘返，广泛浏览各种报刊，如每期《新华文摘》都是从首页的社论看到末页的漫画。此处是我社会学科和人文知识的启蒙处，阅读多元化和爱好广泛性的发祥地。日后我能大跨度转变专业和职业，由“专家”轻松自如地沦为“杂家”，也得益于此。

101的课外兴趣小组是母校素质教育的一大特色，它丝毫没有当今应试教育的功利性和教育商业化的铜臭味。我是数学小组组长和物理小组组员，受惠有三：1、指导老师的开导点拨。（他们太辛苦太可敬了！）2、同学组员的切磋启发。（他们太刻苦太可爱了！）3、周末和假期讲座，聆听大师教诲。三年中几乎听遍了华罗庚等所有著名数学家、周培源等所有著名物理学家，为中学生所作的深入浅出的学术讲座。母校兴趣小组赐我的有形收获是北京中学生数学竞赛和物理竞赛的两个小奖，无形收获则是我终身遵循的科学态度和求是精神。

（3）德育

对于非常重视德育的母校，所有同学在毕业时，无论身体强弱学业优劣（二者皆受先天影响、必有差异），革命觉悟和道德质量都有很大提高。从毫无革命传统的初中进入具有深厚革命传统高中的我，无疑是政治起点低，思想改造难。幸好我的家庭还算有点革命传统，我还是可以教育好的。在母校革命风气和政治氛围的严重熏陶下，在老师和同学的热情帮助下，我进步了，我入团了。

101中使我树立了做革命接班人的使命感（早已放弃）和为弱势群体服务的信念（现更坚定）。母校教会了我真诚，真诚的使命感和信念及其外在表

现，使我中学毕业一年后就入了党。

（二）反思与忏悔

人，真诚的人，应具有感恩精神、忏悔意识和反思能力。对于上述母校赐予我的一切，几十年来，我一直深怀着虔诚的感恩之情。同时同样，一、母校对于某类同学的不公正对待，我也一直深感不平、耿耿于怀。二、我主观上自觉地帮助非干部子弟，划清界线和改造思想，客观上不自觉地压抑了他们；我也一直忏悔不已尽力弥补，尽管没有任何同学当时和日后，对我流露些许指责和丝毫不满。

（1）出国留学

毕业前夕，国家选派首届外语留学生，学校只指定几个干部子女。我向校长反映：我英语差不适合，班上其他“一般子女”更胜任。答复：“你们最可靠，要服从组织。”我相信了，我服从了，我心不甘、情却愿地进入出国集训团。在那里我发现“两个大部分”：一、各地的准留学生，大部分是一般子弟；二、他们都是团员，但大部分人远远不如101的团外群众。对于前者，我已尽力而无效。对于后者，我写信给班团支部，建议吸收所有申请者入团。起了点小作用，发展了几个，但还有一些好同学未能如愿，并非巧合，他们都非干部子弟！看到清华的芸芸众团员，我更后悔自己觉悟晚、行动迟，对不起中学未入团的同学。

（2）毕业高考

1964年，极左思潮“激情燃烧的年代”，在较左的101中，毕业生们由于自己的学习成绩，更由于父母的“阶级成份”，自愿或被迫地踏上了迥然不同的人生道路。——我们被分流了！

由于在上述“两个由于”中，我都占了便宜，便得以混迹于清华。在清华，也许是在全国，最机密的研发原子弹的工程物理系，也有“黑五类子弟”！这个“惊我”的发现，不得不让我反思——具有悠久深厚革命传统的

101，太对得起同样具有革命背景的干部子弟。但母校和我，对得起没有革命家庭背景的可爱的同学吗？母校太革命了！她对“出身不好”的孩子太不宽容了！她的政治审查太认真、太严厉了！得了便宜的我，不能卖乖，我愧对吃了亏的同学。于是——

才华横溢的王某，父亲是民国县长，他只能“主动”放弃高考，“自愿”奔赴北大荒。我们劝阻未果，当时我的心情五味杂陈、至为惋惜。他离京前，我从清华，好不容易找到他在和平里简易楼内昏暗的家，向他告别，为他送行。他年迈、体弱、寡居的老母亲问我上哪所大学时，我第一次心虚声弱地吐出“清华”二字。

聪慧过人的徐某，爱国父亲徐璋本，弃美回国，清华任教，不幸系狱；“不识相”的他高分落榜实属必然。我到他家中，看望问候安慰，希望送给他一丝温暖，减轻我半毫负疚。第一个暑假，顶着烈日，我从靠近西三环的家，骑车穿过整个北京城到东三环外，徐当瓦工的房管所。平时我从不戴校徽，那天破例戴了，就要让工人们知道徐有清华的好朋友。我对师傅们说：“徐比我聪明智慧，比我勤奋好学，就是随着倒霉老爹也倒霉了。”工友们够哥们：“明白你的意思。小徐人不错，放心！我们会对他好的。”几年后徐父出狱，我第一时间带着礼品，去他家拜访致意。——毕竟是我们的父辈错整了人家！

当年鉴于男女有别的潜规则，我对一些女生的遭遇不甚了解。事后得知，也只能深表迟到的同情和愧歉之意。她们都赞同我的认定，知青所谓的“青春无悔”，其实是青春无奈！我只能对她们说，对任何个体的不平等处理，都是我们全体的耻辱和悲哀，都是对全社会公平正义的践踏！

（3）思想改造

社会上有多少个阶级阶层，学校中就有多少种“子弟”。在众多子弟中，被经常自称和他称的只有“干部子弟”——这个肩负特殊重大使命的群

体。

革命干部要打击阶级敌人，干部子弟就要帮助出身不好者，与家庭划清界线。革命干部要改造知识分子，干部子弟就要帮助高知子弟改造思想。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愚昧荒唐时代，这是天经地义的铁律，这是“年年、月月、天天”重复的残酷悲惨的现实。

国家极左，领袖负责；学校左倾，领导有责；班级之左，责在我们干部子弟。因为，我们的三任班主任都不是党员，班内的政治思想工作基本由干部子弟为主体的学生干部负责。我最近得知，当年的语文老师曾说：“别的班左，左得可爱；你们班左，左得可怕！”更令我汗颜。

我主动热情地帮助出身不好的同学，让他们与倒霉的家庭划清界线。——“养儿方知父母恩”，我为人父后才知：“天大地大不如父母恩情大，爹亲娘亲比神马主席和党都亲！”父母的养育之恩，血浓于水、血缘浓于一切的亲情怎么割得断、划得清？对人的感情和精神最残酷地压迫、摧残和扭曲莫过于与倒霉的亲人“划清界线”了！

我积极诚恳地帮助中间出身者，提高其政治觉悟和改造资产阶级思想。——人种存在近百万年，人类文明近万年，趋利避害和善恶并存的人性，没有也不会改变。政治觉悟和阶级思想等所谓“大节”都是臆造虚构的精神桎梏和政治凶器。君不见政治觉悟最高的副帅摔死异乡，无产阶级思想最纯的旗手吊死狱中。客观存在并应该重视的道德质量，即所谓的“小节”却被极端忽视。

生产力、生产品和思想觉悟“三个极大提高”的共产主义太好了。但是，觉悟不会提高的丑陋的人类，不配进入那个“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高尚的天堂。——无论什么党在前面用胡萝卜领导，在后面用大棒鞭策。

当年喊得震天价响的“做革命接班人”，似乎是干部子弟的专利，对其他人只能是有形或无形的压力。上述一切，在客观上不自觉地压抑、压迫了

其他同学，使101中的他们比在其它一般学校，更不自在、不自如、不自由。

（4）忏悔与补救

文革初，我被推选为清华红卫兵校总部委员。某同学的父亲，建国后首批海归爱国教授，其所在系的红卫兵，抄其家、抓其人。我得知后，立即施以援手。清华红卫兵干了不少坏事，我只能制止九牛一毛，错责难卸。

文革后，我班同学第一次聚会。我说，尽管没有被授权，我愿意代表干部子弟向其他同学诚恳深切道歉。尔后又屡次多边双边、公开私下表达歉意。

到中组部后，我更愿意帮助“非干子弟”升迁，因为他们的仕途更不易。例如1983年参与调配北京局级领导时，借机到公用局，建议提拔李某为副局长。

一贯追求进步的汪某，文革初在批斗被四个伟大点名为坏人的冶金部长时，推搡此人。文革后要把造反派头头“记录在案”，控制其入党和提干、读研和出国。钢铁学院把汪报上。我找他们说，“首恶必办、胁从不问，领袖点名、小将奈何。汪父只是矿院副院长，要是高院（最高法院）正院长，你们还敢记录吗？（当时，主席元帅子女当头头都不记录）”汪得以幸免漏网，后顺利国内读硕、赴美读博，发明两项专利。

没有背景的赵某，在深圳因离婚等“生活问题”出国被卡。我到广州出差时绕道深圳帮助疏通，使其顺利赴美。

88年在康华公司，王某让我把他的学生先调进康华，待联系好，再放行去美。平民子弟出国难，我照办。

（三）沧桑半世纪，风雨五十年

令我欣慰的是，当年，无论大小政治气候如何风云变幻，我们班同学的关系总体是融洽和友好的。现在，其友谊恰似美酒，越陈越香浓；其友情正如香港的一国两制，50年不变。

更令我欣慰的是，目前，尽管还差强人意，但时代毕竟前进了：我们的子弟、子弟的子弟，再也不会被人为地划分为某某子弟，并因此被无端地剥夺某些政治权利和教育权益。政治民主尚待时日，政治平等初见曙光。

让我们共同祈祷和期待，祖国母亲的、所有像“早晨八九点钟太阳”一样天真可爱的孩子们，“一个也不能少”地，早日真正沐浴到八九点钟太阳的和煦温暖的政治光芒！

（四）后记：我的旗帜上写的是“常识与良知”

有几位同学看了此文初稿，不解：“你一帆风顺，何以有如此反思与感受？”答曰：真正的人应该超越自我境遇。

“公共知识分子”一度成为热门话题，定义众多，无一定论。我则认为他们应是关注与自己无关之事的人，即管闲事的人。管闲事的利器就是常识与良知。每年回国前我都问亲友：需要什么？答曰：外国有的中国都有！我以为，现在中国似乎什么都不缺，惟缺良知与常识。让我们共同唤醒良知、普及常识！

“拨乱返正”是文革后最响亮的口号，它似乎只针对十年文革。我以为，对所有的乱都要拨过去、对所有的歪都要正过来，对文革前17年更要如此。因为，17年是毒因，文革是苦果。在智慧才学方面，自高而低的胆识、见识、才识、学识、知识、常识，对领袖到草民，有不同的要求。但在社会生活的基本和基础层面上拨乱反正，最初级的常识足够。分辨阶级论与人性论、政治觉悟与道德伦理的是非真伪，无需高深理论和渊博知识。正常人的常识都可以分辨出——所谓无产阶级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生活观、苦乐观、恋爱观等等的荒谬可笑，基于人性论的心理学、行为科学以及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理论的真实性和科学性。常识是理性的基础，现在应该是恢复常识，用常识判断一切的时代了。

孔子的立体塑像，竟然竖立在当年狠批他的领袖平面画像的斜对面。时

下，孔丘语录《论语》比主席语录“小红本”更时尚。让我们也时髦一下，用儒家话语讨论道德问题。我以为道德的顶线是“己欲达，而达人”，这是我等凡夫俗子向往而达不到的圣贤境界，是特蕾莎修女、比尔•盖茨和慈济等大善人的处事原则。道德不可逾越的底线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越位了就可能吃法律的红牌。这应该是我们每一个平民百姓思维和行为的模式，即公民的良知。“路不平有人铲，事不平有人管”，不平则鸣不需要赴汤蹈火的勇气和两肋插刀的气概，只要我们秉承人的良知足矣。如果说，人性、人道、人权是真善美的试金石；那么，良知就是真善美的基础。良知是博爱的核心，让中国也充满爱吧！

（本文提到的几位同学，当年在公开发表前征得他们同意使用全名，本回忆录只用其姓。——笔者注）

以上这篇回忆文章在同学中引起强烈反响。有联系的30多位同学中，20多人发电邮和短信赞赏此文。如干部子女尚某说：“我非常喜欢你的文章，你用自己的成长经历和步入社会后的感悟，用质朴的语言，对人生、对社会、对传统、对道德、对未来进行了深刻的阐述，给我启迪，令我深思和感动，甚至几次泪花闪烁。经历即财富，你的财富会伴随你一生。”平民子女李某电邮群发全班：“真的让我感动。有勇气，敢于揭开人人都回避的问题，敢于触及事情的本质。中国的政治害了多少人！应该道歉的人还没有站出来！你不必歉疚，那不是你的错。”

但是，此书编委会中的四位局级编委却有不同意见，在自费印刷的《不逝的青春——北京一零一中学1964届高三一班同学成长记事》中，对我的文章，和谐了敏感词语，磨圆了某些棱角，砍掉了整个“后记”。

为此，很多同学不平，我向全班群发《为什么我的文章和当初大家看到的不同？》。我解释说，“我在回忆录中写了，101中使我树立了做革命接班人的使命感（早已放弃）和为弱势群体服务的信念（现更坚定）。对大多数

弱势同学拍手称快的文章，某些已经接了班的接班人，即局级既得利益者有意见实属正常。”我感慨：“一个中国小民，在母国母校母班的回忆小集上，企图刊登一篇发自肺腑的人生体悟、感激于恩惠者、忏悔于屈辱者的小文。它既不反对四项原则，又不违背三个代表；既无精神污染之嫌，更无自由化之虞。竟然掀起轩然小波。这是为什么？呜呼！哀哉！”

我的朋友、明镜出版社总裁何频，在美国我家的计算机上见到此文，认为不错，刊于美国《明镜月刊》2011年9月号。

第四节 清华大学极左的学生干部

2-14 弃军工、上清华、入党了

101中以苏联军校为榜样，当然全部学习俄语。1961年高中新生六个班300人中，只有我们十几个外校来的英语生，全在第一班。外语课时，我们在另外小教室学英语，其余30多人在原教室学俄语。我的英语极差，英语老师曾公开挖苦我，“你数理化全校第一，英语可是全国第一，但是倒数的！”（后来我认为，我“五音不全”是听力有问题，因此发音不准，“十聋九哑”嘛。）就这“倒数第一”的水平，高中毕业居然派我出国学外语，只因为我是干部子弟（学英语的几个“子弟”都去了），足见当时的政治明规则。我深爱数理化，厌恶美国话，但却义无反顾地“弃明投暗”，足见我的政治高觉悟。

父母为我放弃理工科而惋惜，劝我慎重考虑；他们甚至表示，“你若不好意思，我去找校长拒绝。”我的好“意识”就是，“我是螺丝钉，任党到处钉；我是一块砖，让党随便搬。”我毅然地告别了几年来省吃俭用买下的几百本数理化书籍，像革命时期的战士，我自豪地义无反顾地奔赴党指引的艰苦战场——出国培训团。

1964年8月，苏共执意召开批判中共的国际会议，东欧诸社会主义小国奉

命参加，我国当然不能再向东欧派留学生。准留学生太多了，组织决定，不愿出国学外语者可自由填报志愿，高考B卷上国内大学。我立刻继承101中传统，报了哈尔滨军工等几所军事院校。关键时刻，党又来为我端正航向："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是研发我国还没有的原子弹的最重要系，宁缺勿滥还未招满。你数理化基础好，可先报此系，第二志愿再报军工。"党的儿子当然要听党母亲的话，于是我以培训团最高分，考入清华录取分数线最高的工物系。

1956年建立的清华最年轻的工物系，系主任一直由校党委副书记何东昌兼任（1980年代何任教育部长），可见工物系的重要。清华当时的学制是六年，我们1964年入学，是64级；1970年毕业，称70届，叫0字班，一共150人，分5个班，我在物04班。为表示中国女性也可以搞原子能，招了12个女生，都在第5班。

清华大学的迎新大会上，两个数字对我触动很大。蒋南翔校长说："今年清华大一新生1634名。"清华学生每人有一个学号，就像现在身份证号码一样，学生证和各种登记表上都印有这个号码，我的学号是641634。啊，我是64级最后一名！但我暗下决心：我的表现一定要名列前茅！

高教部长蒋南翔继续说："全国六亿人，同龄人一千多万，大学只招生十几万（忘了确切数字），你们是1%（再傻也忘不了）。你一个人上大学，99个同龄的工人农民干活供养你。"过去我是为抽像的人民学习，现在我是为那99个哥们姐们学习。我再下决心：作又红又专的大学生，一定要"对得起"没上大学的同龄人！四年后，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进校，同龄工人们可真"对不起"大学生们了。当然那是在"战无不胜"的思想指导下，也怨不得膨胀了的青年工人。

我这个"候补学生"入校时，学生干部早已经选拔分配完毕，我当了一学期的白丁。是金子总要发光，是臭豆腐总要散味。在白丁期，我像毛遂一

样“锥入囊、脱颖出”。理想主义加上热心肠，我得到老师和同学的普遍认同。第二学期，不用自荐，我就当选为班长兼团支部委员。第三学期我顺利入党。

“清华，工程师的摇篮”和“健康地为祖国工作50年”两个口号，决定了文革前的清华学生的两个共同特点，刻苦学习知识和坚持体育锻炼。作为学生干部的我，当然更为突出，不必赘述。下午课后，万人空室齐奔操场；晚饭后，众人到图书馆和自习室抢占座位。这种场面在许多名人校友的回忆文章中不乏详述，我不再重复。在上述共性之外，我的个性——大公小私的人生观和极左教条的世界观，则可稍费笔墨。

2-15 大公小私的人生观

小学语文有篇课文，苏联卫国战争堵枪眼的英雄马特洛索夫的名言，“让人们因我的存在，而感到幸福”对我教育极大。这也成了我终生的座右铭。高中时学雷锋的“对同志要像春天一样的温暖”，更是我的行动指南。例如——

大学生粮食定量30斤中，一半的大米白面细粮，一半的玉米面粗粮，同宿舍的南方同学对早餐的玉米面粥还能勉强下肚，对正餐的玉米面窝头则难以下咽。我把自己的细粮票和他们的粗粮票对换，让他们慢慢适应窝头。手表和自行车当时是奢侈品，我的则是全班的公用品。你去火车站接亲戚，手表戴上；他到八大学院看老乡，自行车骑走。最近，高我一级的张同学说，当年还用过我的自行车。看样子，我的傻大方在系里还小有名气。我的逻辑：爹妈的一切都是人民给的，我的一切都是爹妈给的、当然更是人民给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理所当然。我的想法：我比雷锋差远啦！

下午课后的体育锻炼，竞争性的球类活动比枯燥的田径运动更富有趣味性，同学们当然都爱玩。作为班长的我，分配同学排队去借篮排足球，僧多粥少，有时很不幸，球借光了；有时更不幸，借到最后的几个球，场地已被

占满。看到哥们儿们失望的表情，我决定自力更生。父母每月从他们的工资中发我20元“学资”，交完伙食费还剩5元零花钱。我每月省2元买个球，3个月下来，我们班阔了，我私人出资、集体所有制的篮排足三大新球都凑齐了。我们再也不用排队去抢借全民所有制的旧货。有球斯有地，各种球场任我们优先挑选，别的班未借到球、也不能空占场地。但是好景不长，大约又是3个月下来，足球从水沟中捞出，没晒干发霉破了，寿终歪寝；由于和外系同学合玩，我班同学撤出后没带回球，篮球不知所终；排球更倒霉，原因不明地失踪了。

我找哥们老师贾春旺诉苦。他开导我，“轻易得到的不会珍惜，付出了才会有责任。”于是，我强行摊派全班每人交一角钱班费，我出三元多，又买了三个球。我命令爱玩每种球类的同学选出一名“球长”，看管该球，丢了你就赔！球长们还真负责，也不知从哪里找了红油漆，在每个球上都写了“物04”三个醒目大字。此后，球不再丢失损坏，直到文革还八成新。文革中，学生都没人管了，谁还管球呢？它们理所当然地被革命的洪流冲进历史的垃圾堆。

2-16 极左教条的世界观

1964年暑假，伟大领袖毛主席与其侄子、在读哈军工的毛远新（1954一60年在101中、1960一61年在清华，我的两度校友）谈话，批评了教育工作、特别是高等教育。我的大小两位偶像之间的谈话很快在干部子弟中传开，这与我的极左观念不谋而合。尽管清华也挺左的，但是比101中右多了。我怀念101、向往哈军工、不满清华，大学期间一直剃光头就是明证。

上清华第一年，我的极左言行与校方发生了两件不大不小的冲突，它对我们双方都影响深远。

其一，大一上学期，《北京日报》发表了一篇表扬清华的文章，校广播

站在用餐时间反复广播，系党总支还组织我们入党积极分子学习讨论。我对此举极为反感，心想：“毛主席都批评高教工作了，你们还沾沾自喜！”但是小道消息登不得大雅之堂。在学习会上，我对系领导和校党委宣传部干部说：“这就像有人夸奖我几句，我写在日记上，在班会和系会上反复高声朗诵一样。请向学校领导反映，应该停止广播，寻找差距改进工作。”会后，我的“念日记”之说被上达下传了，校领导记我一笔黑账，同学们再听领导总结成绩时，就说“又念日记了”！

其二，大一下学期，系里发到班上许多宣传材料，说是校教务处让大一同学送回中学母校，动员高三优秀同学报考清华。我作为班长扣押宣传材料没有下发给同学，把一大包印制精美的宣传品原封不动地送回教务处。我对教务处领导说：“中学毕业生应该‘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升学或就业），即使要升学也应该加强思想改造、认真复习功课，你们不应该干扰他们，更不能干扰中学的正常工作。”我又干了一件让同学赞赏、令领导反感的傻事。

大二上学期1965年底，工物系学生党支部书记通知我，12月25日星期六下午，开会讨论我入党。他还玩笑地说：“西方圣诞节入中国共产党，还挺有意思呢！”我郑重严肃地正式要求会期延迟一天，在中国的圣诞节、毛主席的生日那天举行。当时七天才休息一日，谁愿放弃回城回家？我的有情有理要求当然被无情无理拒绝。一个高班的党员还说，“星期日开会？异想天开！表决你入党时，我肯定投反对票！”吓得我够呛，提心吊胆好几天。25日的支部大会上，按照潜规则我还是被全票通过入党。那位高班党员说：“入党日期，你以后就填写12月26日吧，没人追究你。”随后按照党章规定的流程进行：上一级党组织、系总支领导找我，例行公事地考察谈话，系总支批准我为预备党员，并报校党委备案。

文革前我们工物系二年级一共发展了7名党员，女生较听话或曰政治早

熟，12人中就发展2位，138个男生中只有5名党员，不到4%。我能挤进这1/25，足见我之左之革命，但是也因为我太左，又差一点被校领导甩出党门之外。

文革初，校党委某秘书写大字报揭发党委负责学生工作的副书记艾知生："破坏党的阶级路线，反对干部子弟阎准入党。"这时我才了解，艾知生得知我入党后，对我系领导大发雷霆："念日记、反对动员中学生的阎准？这种简单化的小教条也能入党？一年的预备期要加强教育严格要求，不改正就不能转正！"当时我总结，战国时期秦国是"远交近攻"统一中国，我则是"远攻近交"挤进党内。我极左教条的世界观得罪了远远在上的校领导，但他们鞭长莫及、只能放马后炮；好善乐施的人生观却取悦了近在咫尺的同学和系里的师长，他们决定了我的政治生命。80年代的广播电视部长艾知生多么左，可是当年他还嫌我左，可见我当时真是太左了！这么左的人当然要欢欣鼓舞地迎接极左的文革了。

第三章 老红卫兵头头的反思

——清华文革风浪四年（1966～1970年）

第一节 反校党委，保工作组

1966年5月16日的《中共中央通知》，宣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开始，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天然接班人一一我们干部子弟都兴高采烈、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准备全身心投入这场兴无灭资和防修反修的伟大战斗。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伯达和康老（当时我们这样亲切地称呼陈伯达和康生）是我崇敬的马列主义理论家，江青阿姨更是伟大领袖的亲密夫人。我决心在他们的间接领导下，把文革进行到底。文革的疾风暴雨来临了，身为中干子弟的党员，我既不可能是群众领袖，又不甘于“混同于普通的老百姓”（毛泽东语）。不甘寂寞的性格决定我成为一个小弄潮儿。

革命时期，“一天等于二十年”些许夸张，但形势瞬息万变确是事实。因此，前三个月我用“大事日志”的形式，重点回忆当时的思想和言行，即我的想法、看法、说法和作法，有关的背景尽量简要。部分数据参考邱心伟和原蜀育主编的《清华文革亲历》（五七学社出版公司，香港，2009年。）感谢邱、原二校友！

3-1 当了三天造反派

5月，蒋南翔校长在全校报告中，一再把教育领域的阶级斗争说成是学术批判和教育改革，并强调学生要在斗争中改造自己。蒋的提法与毛主席同毛远新的谈话精神不符，我很有看法。在讨论会上，我说：“这是抹杀阶级斗争，是矛头向下，转移斗争的大方向。”

6月1日，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批判北大党委的大字报。蒋南翔

当天表态：“清华与北大不同，北大是反动思想的集中堡垒，清华是工科大学，教育改革成果巨大。”我私下议论：“清华是更高级的打着红旗反红旗。”

2日，清华出现一些批评蒋5月报告的大字报。同学说：“这和你的看法一样，还不冲出去？”我答：“我这个预备党员类似中农，上不如正式党员，地主般的财大气粗；下不如群众，贫农般的无所顾忌；我这一亩三分地的预备资格，说没收就玩儿完。”——为了政治生命，谁没个人考虑？我按兵不动，以静观动。

3日，校党委组织反击，一大批“保卫校党委、保卫蒋南翔”的大字报贴出。据校方统计，支持党委与反对校党委的大字报是一万对七百。艾知生在党员会上说：“57年反右用了两个月，这次反击只用了一个下午。”我暗自庆幸：未轻举妄动、躲过一劫。

4日，一些盲动的同学被迫检讨，说自己“第一炮没放准”。我同情安慰他们：“和1957年不同了，一张大字报打不成右派。”

5日清晨，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女刘涛和贺龙元帅之子贺鹏飞等人贴出《党委应采取积极态度领导文革》的大字报，震惊全校。蒋南翔反应真及时，上午立即召开全校大会，认真检讨并表示要积极主动领导运动。下午党委乘胜追击，组织“你这几年的成长说明了什么？”的讨论，以证明其一贯正确。还让实习工厂的师傅写拥护党委的大字报，用“工人阶级说话了”压制反党委的师生。对这些做法我极为反感，但是还想“补台”，就向系领导反映：“这哪是‘主动领导运动’？完全是积极压制运动，赶快改弦易辙吧！”

6日，在一片歌功颂德声中，党委又布置“小批评、大拥护”的大字报，以求“反蒋”和“保蒋”的大字报基本平衡，制造“革命”气氛。如前所述，文革前我一直对清华很有看法，最近一系列文过饰非的小动作更让我不耻，我忍无可忍，于是——

7日，我和阎承志、顾逸东、王国力等工程物理系二年级的四名干部子弟党团员，贴出我在文革中的第一张大字报《这是为什么？》，内容是揭露批判党委为压制运动而采取的各种阳奉阴违的卑鄙做法。“反党委”同学贴出大标语：“清华的聂元梓站出来了！”，广而告之。

8—9日，反对我们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迎面而来。由于我们四个“中干子弟”的家庭背景不硬，故被反击力道极强，有骂叛徒的，有指责“你由极左沦为极右”的，还有警告“你预备党员别想转正了！”但是，坏景不长——

3-2 被工作组重用并整了人

6月10日，以国家经委副主任叶林为组长的工作组进校，接管权力。蒋南翔停职，校党委瘫痪。清华进入了近两个月的“工作组时期”。

11—13日，全校范围内，掀起上揪大小“黑帮”、下批众多“保皇派”的大规模自发性群众运动。（黑帮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保皇派指保黑帮的群众，这是当时《人民日报》定义的正式用语。）系里同学抢不到校级大黑帮，就把系领导和支部书记等小黑帮，以及一些辅导员和学生干部等保皇派，戴高帽子游街示众，甚至出现谩骂推搡等野蛮行为。我本性心慈手软，又和这些“小黑小保”们关系不错，当然义不容辞，便挺身而出制止诸不文明行动。我也算“革命造反派”，说点不太革命的话，还管了点用。

14日，工作组为了结束基层的无组织状态，各班选举文革小组，系里选拔文革委员会。我文革前较左、6月初反蒋、近日挺文明，是三个重要历史时期皆表现优异的“三好学生”，加之本人成份党员、家庭出身干部，可以说是“五好青年”。工作组舍我其谁？我于是成为班和年级核心组长，工物系文革领导成员兼系纠察队长。伟大领袖毛主席派来的工作组，领导我们进行毛主席发动的伟大的文化革命，我当然完全拥护、充分信任。加之，工作组的领导都是中央部委的部长局长，和我们的家长一样，有种天然的亲切感。

我由旧清华的班干部升为工作组的系级学生领导，官大了，错误也将大了。

15日，在工作组和我们各级文革领导的共同努力下，揪斗乱象迅速得到制止，谩骂和人身攻击的漫画和杂文被禁止。清华园恢复了平静，运动正在纳入正轨。但“树欲静而风不止”——

16日，工程化学系三年级的蒯大富贴出大字报《工作组往哪里去？》，批评工作组：“我们要开斗争会，你们不准；我们抓黑帮戴高帽子游街，你们阻拦；我们画漫画写对联，你们不许。你们举起先立后破的大棒子压制群众！”

17—18日，支持和反对蒯大富的大字报都不少。我当然反对蒯的观点，运动就要在党的领导下有组织有步骤地进行，工作组就是党。但是工作组没有组织反击，我也按兵不动。

19日，薄一波副总理来清华看大字报，在大礼堂前与蒯大富辩论半小时。蒯重复他大字报的观点，薄最后说：“难道你连毛主席派来的工作组都不相信？”不管蒯信不信，副总理的话，我信！我更加无条件地服从工作组。

21日，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正式参加清华工作组。此前，19日，政治局委员李井泉之子、我系文革主任李黎风就告诉我此事并让我保密。哇，毛主席把她都派来了！我更积极了。

6月24日，工作组在大礼堂召开与蒯大富的辩论会。蒯仍然坚持他的观点：“工作组掌权了，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叶林说：“蒯大富是牛鬼蛇神，是向无产阶级专政夺权。”主席台旁发生的一个小插曲，使我平生唯一的一次整了人。大会主席是贺鹏飞和李黎风，工物系“出身好”的多，可靠！李让我带领系纠察队在主席台维持秩序。工人出身的同班同学王克斌，被我分配到台口负责安排发言者上台。下面是他在《华夏文摘博客》的回忆：

“辩论会上蒯大富历数工作组的错误，叶林不能以理服人，只是以势压人，激起了我的义愤，于是我自作主张阻止左派上台发言。辩论会后，我连夜写了一篇小字报，批评工作组粗暴蛮横，打压革命群众。第二天，我找了班上的同学，争取他们签名。左派阎淮怒目圆睁，恶狠狠地说，‘你放毒！’他平日与我关系不错，这张小字报，把我俩从此摆到了对立面。”

——我现在记不清“怒目圆睁、恶狠狠”的细节，但是被整者对挨整的情节，肯定比整人者的记忆深刻清晰。以我当时的心态，这应该是事实。

随后的一个月，工作组力图把文革纳入历来的政治运动的模式：开始整人了，清华开展了“反蒯运动”。王克斌的回忆可见一斑：“围剿蒯派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对蒯派分子隔离审查。班上同学关系不错，没人对我落井下石，整的手段相对轻些，我还有人身自由。班里开了批判会，要求我彻底检查。”批判会当然是我主持，“手段轻”也是整人呀！我当时的想法是，一定要把这个阶级兄弟从蒯大富的反革命营垒中挽救出来，即所谓的“治病救人”，其实是无病整人。后来工作组检讨时，说是“整错了人”，我认识到不是“整错了人”而是“整人就错”，我也犯了大错误！

7月6日，蒯大富写出检查《向党向人民低头认罪、彻底坦白交待》，“反蒯运动”取得巨大胜利。

7月22日，中央文革的王力和关锋接见蒯大富，谈话3小时，表示支持，清华形势急转。

3-3 分别见到江青和毛泽东

7月25、26日两天晚上，中央文革领导到北大参加群众大会。我事先得到消息，占据有利位置。陈伯达和康生都斩钉截铁地说：“毛主席没有派一个工作组！”让我大吃一惊。接着江青讲话，她首先说：“毛主席向你们问好！”我激动地像见到毛主席一样地使劲地鼓掌，我们高呼“毛主席万岁”。接下来令我“巨吃一惊”的一幕发生了。江青带着哭腔“痛说家

史”：“北大的张少华，看毛岸青精神不正常，就强迫他和自己结婚。我和毛主席从来就不承认她是毛主席的儿媳妇！……”陈伯达走到江青背后，和她说了什么，被她一把推开。江青又开始数落主席长子毛岸英烈士的妻子刘松林。越讲越激动，嗷地一声就哭开了。我们都傻了，不知是否应该鼓掌或者呼喊口号。顷刻之间，我对江青的印象逆转：由伟大夫人变为家庭怨妇。她把家庭琐事家丑外扬，太有损伟大领袖的伟大形象了。我对毛主席有多热爱，对他老婆就有多讨厌。

7月27日，中央决定撤走工作组，反工作组的大字报激增，我们保工作组的也不甘示弱。继6月初写反校党委的大字报后，我贴出文革中的第二张大字报《工作组的成绩是主要的！》。

7月29日，在人大会堂召开“文革积极分子大会”，要求有各种观点的人参加，我作为“保工作组”的代表与会。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总书记先简短讲话，刘少奇的长篇讲话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前后两头。开始他说：“刚才恩来和小平都讲了，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中央同意的。”其实周、邓轻描淡写，一笔带过派工作组的事，没引人注意。现在刘一再强调“中央决定”，并拉出周和邓见证，与四天前我亲耳聆听陈伯达说“毛主席没派一个工作组”，形成鲜明对照和巨大反差。清华同学在大会堂一楼前排，我看得清清楚楚，与四天前毛夫人絮絮叨叨、令人不解的惊人之举一样，毛本人也有沉默不言、更令人费解、更惊人之举：

在刘少奇讲话结束的语音未消，还没来得及收起讲稿走开时，毛泽东突然从后台闪现。毛疾步行走带出的风，把刘的讲稿搧到地上，毛没有理睬刘，径直走到舞台前沿把刘撇在一边。刘十分尴尬，弯腰捡起讲稿，摘下眼镜退到舞台后面，和周邓等人站成一排。毛泽东向学生们挥手，我们边热烈鼓掌、边齐声高呼“毛主席万岁！”真是万众欢腾群情激昂，雷鸣般的掌声和此起彼伏的欢呼声经久不息。盛夏时节，首长们都是短打扮，白色短袖衬

衫和灰色长裤；只有毛仍穿着一身深灰色中山装，脸色发青、神情严肃、没有一丝微笑。这与我七年前，国庆十年游行时，看到天安门上和蔼可亲的他判若两人。毛始终一言未发，任凭欢声雷动，竟自转身走回后台。行文至此，不禁想起徐志摩的《再别康桥》的首尾八句："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少奇与恩来（徐诗：'作别西天的云彩'）。…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发一言即拜拜（原诗：'不带走一片云彩'）。"

此情此景，毛的肃然与刘的茫然，半个世纪后，我仍然记忆犹新历历在目。我与七年前也判若两人，从戴红领巾的傻小子初中生成长为能思考（不敢说"会"思考）的党员大学生。在感到幸福的同时，我也在思索：这不像预先安排的接见群众，也不是大会议程的一个节目，就这么突然露一面、绕一圈，老人家意欲何求？让我们"且听下文分解"吗？20天后的"八一八"，下文分解了一一我在天安门上，看到刘少奇的再次尴尬。从城楼下来，看到新的领袖排行榜，恍然大悟：真是"那时无声胜有声"！这就是给刘少奇的下马威！

第二节 红卫兵总部委员上了天安门

3-4 清华红卫兵成立

"8月4日上午，工物系工、贫、干子弟会上，我们低年级的干部子弟不同意成立贫协，决定不管高年级，自己成立红卫兵。高班干部子弟听说后同意了，下午开大会成立工物系红卫兵。晚上总理来清华作报告后，很多人又觉得不该成立红卫兵，思想不统一，红卫兵名存实亡。后来我系徐沙（二轻部长徐运北之子）和林梅梅（人大副委员长林枫之女）向我们骨干传达：总理秘书对他们说，总理不同意成立贫协，对红卫兵还是支持的。于是我们决定还是要红卫兵，但是人数精减了，其中干部子弟占很高比例，领导全是干

部子弟，我们觉得这样可靠。

8月中旬，自动控制系的刘菊芬（人大副委员长刘宁一之女）在附中开了各系红卫兵领导会，我系去了五个，会上讨论了形势，决定联合行动。最后决定各系派一人组成联络组，统一步调。工物系就派汪致远（其父是文革后任上海市长的汪道涵），回系后，低班红卫兵不干，他们力量强，就换成了我。8月19日全校红卫兵大会，宣布总部成立，联络组就成了总部，清华红卫兵正式公开成立了。”

1967年初，因炮打中央文革成为“反革命”，我在3月15日的小字报检查中的第5页交待如上。检查贴出后，除遭遇众多大字报批判外，在其上还有许多批语，典型者如：“坦白为上，总是要人打屁股是不行的！拒不交待死路一条。”等等。为保存众批语，某夜晚，天黑风高无人之际，我把小字报揭下留存。日前清理资料，偶然发现50年前的真迹史料，摘录于上，引为旁证。

需要补充的是：8月4日成立的工物系红卫兵，各年级选一人，组成六人联络组，实际是我负责。中旬自控系刘菊芬通知我，开全校红卫兵联席会，每系只能去五人。我说服关系较好的一年级的联络员不去，二至六年级的五名联络员与会。会议决定各系选一人，组成“红卫兵全校联络组”，将来公开时再称“总部委员”。汪致远推我，我不干，说汪比我年高望重、见多识广。刘菊芬最后决定，由她熟悉的、同是高年级的高干子弟汪担任。我假谦虚是冠冕堂皇的理由，真实的活思想却是：“工物系高干子弟云集，有彭真、李井泉、林枫、安子文、叶飞、耿飙、邱会作、徐运北等高干的子女，以及其他更多的副部长和少将的孩子；我这个中干子弟在高干子弟主持的组织中，难展手脚。”下午，回到系里传达会议决定，红卫兵们、特别是没有联络员与会的一年级同学，认为汪太稳重温和保守，坚持要我任总部委员。他们去刘菊芬处聚众闹事反映民意，我就如此这般、勉为其难地当了清华红

卫兵总部委员。当时有校文革临时筹备委员会，简称“临筹”，由各系文革主任组成，他们都参加了清华红卫兵。负责人是贺鹏飞和刘涛等，我系是李黎风、数力系是后任外交部长乔冠华之子乔宗淮，我与他们接触较多。临筹占了原清华书记办公的“甲所”，我们红卫兵总部占了隔壁校长办公的“乙所”，经常一起商量研究，真是“哥俩儿好、一家亲”！

8月4日晚，清华万人大会，叶林代表工作组检讨错误。周总理讲话强调:“要把主要矛头指向黑帮。”很多同学听出总理与中央文革的调子不一样，有一些人写条子给总理，要求播放陈伯达和江青在北大的讲话录音未果。会后贺鹏飞对我说，总理那天告诉他“今后由中南局书记、中央文革副组长王任重指导清华的运动”。

5—6日，少数同学要继续批判工作组，多数人认为工作组的检讨可以通过，要求转入批判校领导。

7日，王任重指示“临筹”根据总理讲话精神，提出“八七建议”：“根据多数人意见，不再辩论工作组问题，尽快批判校领导。”

8日，反对工作组的同学发起“八八串联会”，反对“八七建议”，要彻底批判工作组。从此他们自称为“八八派”，其重要成员（1967年成立的“清华四一四”的一把手）沈如槐说：“显然，‘八八派’的宗旨与总理讲话精神背道而驰。”（沈如槐《清华大学文革纪事》，21页，时代艺术出版社，香港，2004年。）

9日，我们保工作组者，成立“八九串联会”，与前一天成立的“八八派”对着干。我们自称“八九派”，赞同“八七建议”，不再批工作组，尽快批黑帮。在周总理与中央文革之间，我当然倾向总理。

10—15日，清华两派各行其事，各批其人，各有“皆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八八派”开会批斗了工作组的叶林等三位组长，大字报猛烈批判自称“普通组员”实为工作组顾问的王光美。我当时和现在都认为：于公，他们

少数派是真正的“造反派”，期望通过批判上述四人，直捣最高层的“走资派”。于私，他们大都被工作组整过，越批工作组，越显其正确。我们“八九派”批斗了几个校党委副书记。我们以干部子弟主导、以工农子弟为主体的多数派，希望批判只局限在校内局处级的党内中下层。王任重告诉我们，叶林的检查稿是总理秘书和叶共同起草、总理过目的。于公，我们当然害怕深批工作组，批到派工作组的少奇、总理和小平，动摇中央领导层。于私，工农子弟是工作组“反蒯”的主力军，否定工作组就否定了他们。干部子弟不会因工作组的垮台，而失去其政治地位。因为批工作组，批不到我们的爹妈，父母不倒子弟不垮。我们可自命大公无私。

3-5 周恩来与我们亲切座谈

8月16日晚，周总理召集“临筹”、“红卫兵”和“八八”三方负责人座谈。因为前两方基本是红卫兵的干部子弟哥们，利益和观点完全一致，名义是三方，其实是两派。工作组时期，我们“代表党”整对方。近期，虽然“中央文革”暗地支持他们，但我们人多势众，还是压迫他们。双方势不两立，很难坐在一起，现在坐在一辆大轿车里，自然要争个我是你非，文明说是辩论，俗话就是吵架。我方的两个组织的头头都是各系一名代表组成，当晚能找到的也有十四、五人；“八八”总部一共才四、五人，都来了；3：1的比例，我们依然是人多声高、以势压人。双方一路从清华园吵到人民大会堂，在等待时也不罢休，直到21时总理进来。

总理与我们一一握手，让每个人介绍自己和家长的职业。轮到我时，总理问：“哪个怀？”我套近乎：“淮安的淮，我生在那儿。”周亲切地说：“我们算是同乡！”当我说父亲在物资部时，总理又问：“是阎韫吧？”我没有惊讶，因为听父亲讲过一一他在国家计委时向总理汇报过工作，几年后到物资部又汇报时，总理还能叫出他的姓名。我当时对总理真是敬佩得五体投地。

随后我们让总理先指示，总理说：“先请你们谈谈对清华运动的看法和建议。”半个世纪后，我不可能一字不差地复述总理的原话，但是“请”字肯定有。在总理雍容大度、温文尔雅的伟人风度感召影响下，同学们都和刚才判若两人，我们用最冠冕堂皇、最绅士文明的语言阐述自己的观点。但是不乏绵里藏针地（毛泽东批评邓小平时的用词）打击对方抬高自己。总理讲话时以高超的政治艺术和了稀泥，让我们双方都高兴地认为他支持了自己。让我们不高兴的是总理最后批评我们不该吵架，“我在走廊里就听见你们吵了，应该求同存异，你们是组织的领导，要给下面的群众作团结的好榜样。”我印象较深的还有，亲耳听到总理在其它场合一再讲的他的出身问题。“我出身是官僚地主，父辈败落了。我出生于剥削家庭，但背叛了这个家庭，是‘不肖子孙’，我走上了革命道路。因此，党是讲出身成分，但重在现实表现。”我感觉他是对我们干部子弟讲的，是对“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血统论对联的婉转批评。在大会堂吃完夜宵，晨4时总理又单独见了临筹成员。回清华的路上我们不再争吵，可能是总理教育的成效，也可能是“饱了发困”，大家都昏昏欲睡。

3-6 “八一八”上天安门

8月17日凌晨，周总理在座谈会结束时，通知我们次日召开“庆祝文化革命大会”。当天夜晚清华的几千学生集合出发。

8月18日凌晨，我们来到天安门广场东边。

6时，贺鹏飞突然通知我：“你们系可有5个人上天安门。”我拉上顾逸东、王国力和物九的金东锡（第五人忘了），与清华“临筹”及红卫兵的骨干共50人，和各校的1500名学生一起，在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的带领下，走上天安门城楼，我们在东面。

7时，毛主席走过来接见我们，大家都热血澎湃，幸福激动地大喊：“毛主席好！”

7时半，大会开始，陈伯达主持，林彪、周恩来和学生代表讲话。

8时，游行开始，百万学生通过天安门。

9点半，建国后首次身穿军装的毛泽东，带着众领袖由东向西，又由西向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走动，他不断地挥动军帽，向我们致意。经贺鹏飞的点拨，我注意到刘少奇离毛泽东远远地站着，面色阴郁不言不语。当红卫兵要给他戴袖章时，他什么也没说就用右手把袖章往下拉扯。



1966年8月18日，天安门上，周恩来后面第二排半张脸是作者。

11时，游行队伍全部通过天安门广场后，已经戴上红卫兵袖章的主席，又走过来和我们一起合影留念。我也幸福地和老人家握了手，确切地说是触碰到他那宽大温暖柔软的左手。

年轻的我在天安门上站了5个多小时，已稍感疲惫。但是主席老人家在城楼上整整6个小时，仍然意气风发毫无倦意。这无疑是对红卫兵运动的动员令，从这天起，学生变成了红卫兵，开始冲出校园走向社会，大破“四旧”。

次日关于这个集会的报导中，刘少奇的排名果然由二降为八。徐沙历来语言幽默刻薄，他对我说：“刘涛过去进中南海，对卫兵伸出食指和中指，表示二号家的。今后可要伸出食指和拇指，同样是两个指头，但只能表示是八号的家属了。”我觉得刘涛挺可怜，经常私下安慰她；在“临筹”和红卫兵的联席会上，我照样尊重她，请她发表意见。毕业前听说她和土建系的才子、我的朋友万润南恋爱了，我为她高兴并祝福她。

19日，“清华大学红卫兵”正式成立，我也就摇身一变、成了红卫兵的总部委员。我们还宣布次日要把蒋南翔揪回清华批斗。

3-7 结识陈元和宋克荒

8月20日，上午清华红卫兵召开批判工作组大会，搞形式走过场，下午立即转入打黑帮，准备批斗蒋南翔。我和“临筹”负责人带队去高教部，凭介绍信领出蒋，带上大轿车准备带回清华。汽车刚开动，我们的大轿车就被一辆小轿车拦截。车上走出两人，说中央不让揪斗蒋南翔。我不客气地说：“哪个中央，刘少奇的吗？”前面英俊的大鼻子气势汹汹地喊：“周总理的中央不行吗！”我顿时软了。“临筹”的人还坚持要带蒋回校批斗。后面的文弱书生慢条斯理地说：“周总理来电话不让批斗，总理的话都不听，你们还听谁的？”众人无言以对。我顺势说服大家，交出蒋，让他们二人送回高教部。我们回到学校，只好把“斗蒋大会”加上两个字，变成“斗蒋誓师大会”收场了事。

这两人便是宋克荒和陈元。当晚，他俩感谢我协助他们完成了周总理交办的保护蒋南翔的任务，我则回谢他们在最后一分钟力挽狂澜，免于我们违背总理意图犯个大错误。宋克荒说；“昨天我得知你们红卫兵今天要揪斗蒋南翔，立刻给王任重打电话。我认为蒋校长虽有错误，不反党。今天中午王任重找到我，说周总理指示蒋南翔不能揪斗，他派车给我，让我去保护蒋。我赶紧拉上陈元，去高教部，从你们手里抢回蒋南翔。”

不打不相识，我就这样结识了自动控制系一年级的大鼻子宋克荒（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之子）和二年级的文弱书生陈元（党中央副主席陈云之子）。文革开始三个月了，刘涛和贺鹏飞等隔三差五地联名写大字报，积极介入并影响运动，联合署名少则七八个人，多则十几条枪，都是各系的高干子弟，但是从未见陈元和宋克荒之名。“临筹”和红卫兵共二三十个头头，象鄙人这种等闲之辈都混进去了，也没有陈宋二位的身影，以至于交友甚广的我似乎都不知道清华有此两人。初交时，总见仪表堂堂、豪爽大气的宋，站在衣着朴素、彬彬寡言的陈前面，我还以为陈元是宋克荒的跟屁虫。深交了，才发现仗义执言、出头露面者宋，深思熟虑、关键决策者陈。至交后，他们影响了我后20年的生活轨迹。

3-8 清华“八二四”事件

“八一八”后，毛泽东炮打刘少奇的大字报已私下流传，学生们思想大解放。清华出现大量批评领袖的大字报，主要是针对刘少奇的，少量其他人的，可以说除毛泽东外，中央领导几乎一网打尽、无一幸免。校外群众大批涌进清华，把这些反动的大字报传抄到全北京乃至全中国，我忧心忡忡。

8月22日，清华反工作组的“八八派”成立“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他们贴领袖的大字报较多，我们保守派中，也有人贴了。

22日晚，周总理冒雨参加清华万人大会，针对批评领袖的大字报说：“中央的问题，在中央全会上已经基本解决了。贴大字报，必须是增强团结，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总理讲话的精神我特认同！他淋雨不让我们打伞的平易风范更令我敬仰。

23日，校内批评领袖的大字报和校外观看传抄者都急剧增加，最让我愤慨的是《周总理8.22讲话是个大阴谋》等攻击周的大字报。我们红卫兵总部通过王任重，向中央紧急反映事态的严重。

黑暗的8月24日降临了！

晨5时，陈伯达在北大说，给刘少奇提意见可以写小字报，大字报要贴到室内的“内部馆”。我们如获至宝！

上午，“临筹”和红卫兵在清华“甲所”召开联席会议，讨论形势商议对策。贺鹏飞拿出高91班孙某，被制止未贴出的给毛主席写的大字报底稿，我们义愤填膺。会议决定采取强制行动，处理“反中央领导的大字报”。此决定通过常驻清华的王任重的秘书，征得王的同意。有回忆文章说，是王指使我们干的，我没有确切证据。

中午，“临筹”广播，要求把大字报贴到内部馆。有人问：“内部馆在哪里？”我答：“不知道，管它呢！”

下午，清华附中红卫兵要求外校人员离校，封锁校门。

14时，按计划，我们总部委员分别秘密通知本系红卫兵分散到附中集合。我私下让我系的红卫兵先用大标语，覆盖住他们自己写的批评领袖的大字报。

15时，十个中学的红卫兵被清华的汽车拉到清华北面的附中。同时广播，让对立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退出附中，否则责任自负！

16时，清华和附中及外校共12校红卫兵，在附中召开誓师大会。贺鹏飞动员：“清华有一股妖风，我们要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我首次感受贺的鼓动才能。

17时，12校红卫兵两千余人从附中跑步进入清华（我带领工物系近百人），封锁大礼堂前的大字报区。同时广播《最后通牒》，勒令作者一小时内撕去自己有关领袖的大字报，移入内部馆。否则后果自负。我们还广播了《安民告示》，它除了语气强硬外，还提到“我们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破四旧”的风暴中，此时此地“纪律和注意”能起作用吗？

18时，对批评首长的大字报拍照；同时在我派头头指挥下推倒“二校门”。

19时，几乎所有的大字报被撕得精光，贴上“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的大标语。清华园笼罩在（红色？白色？黑色？）恐怖中，史称“清华八二四事件”。

3-9 我犯了严重错误

8月24日下午5点半，12校红卫兵控制形势后，清华派出所所长到大礼堂前的“指挥部”。他说，家属院中旧社会的残渣余孽很多，应该顺势彻底清理。贺鹏飞和刘菊芬让我去了解详情。到了照澜院派出所，我才知道：清华园里大中小学的师生2万人，家属3万人；其中戴“地富反坏”帽子的百余人，派出所可随时管教；右派归单位管理；还有几百个“残渣余孽”，派出所平时不宜轻举妄动，请我们帮助重点清理。我回去汇报讨论后，决定晚饭后行动。

晚8时，在派出所设立“破四旧指挥部”，我和所长共同负责。各系红卫兵陆续到来，由民警和居委会的大妈指引，到“重点户”去抄家。我们强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由于都是大学生，当时可能有、但指挥部未发现打人和“贪污”行为。有同学提出要抄“走资派”和“学术权威”的家，所长对我说；“他们今天倒了，明天可能又起来，咱惹不起，还是整死老虎保险。”我对共产党的大小官员和理工科的各种权威，还是有点感情的；对国民党的社会基础就不留情了。我赞同所长意见。

据《清华文革亲历》48页记载，查抄出“子弹、刚开刃的刀、北洋军阀中将军服等”。我记得还有大量解放前出版的反动书籍和印有国民党国旗的各种证书，好像金银财宝不多。查抄的物品堆满了派出所的两三间屋子。我们主要是带回“罪证”“赃物”，“坏人”让居委会记录在案，以后严加管束。一个例外是，我高中同学郭某的母亲曾在国军医院任职，在她家发现一些子弹壳，人赃并获被带到指挥部。她说是儿子在工厂实习时的劳动纪念品，我见是熟人让放了。多年后我已忘却此事，郭见面还感谢我，令我羞愧

不已无地自容。

午夜前抄家结束。

当时我认为抄家和批斗是文革题中应有之义的革命行动。文革后认识到，这是侵犯人权，是犯错、也是犯法。最近为写此书，看了一些清华师长的回忆，得知他们当时被毒打的情节。我更感到清华红卫兵罪孽深重，我作为总部委员，应该向所有被我们虐待的师生和家属真诚地再说一声——对不起！

刻有“清华园”三个字、古典优雅的二校门是1911年清华建校时的校门。1933年，清华扩建，修了西校门，原校门便成为了“二校门”，是清华标志性的文物建筑。在世界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二校门，就在那晚被我们清华红卫兵彻底毁掉了！我绞尽脑汁也回忆不出拉倒二校门的具体情景，以为自己已经老年痴呆。日前听同班王克斌说那天他在现场，想找我劝阻，没找到，还挺奇怪。现在确认，其实当时我正在干另一件坏事——抄家，一个人不能同时在不同之处干两件坏事，尽管当时我很想参加这个革命行动。克斌还说，你没参加毁二校门，这段的“我们”应改为“他们”。我不改！尽管“毁门”没有事前讨论、是临时起意（否则爱凑热闹的我不会缺席），但事后我也赞成，同样有责任！文革中杀人与毁门都是对公民和文物最彻底的消灭，人死不能复生，文物不可复制，同样罪不可赦，都应受到法律严惩。在清华，杀人者坐牢，毁门者无恙！若现在谁再毁掉颐和园的重要文物，不杀也得判个无期。我们可以上推领袖下卸群众，现在谁也不可能再追诉惩罚我们。但是我的灵魂还在被煎熬被惩处。现在的二校门是文革后复制的。根据《文物法》，我们不但犯了错，而且犯了法，是清华的罪人，历史的罪人！

现已查实，北京在“红八月”打死数千人，抄家近10万户，逐出京城12万户。主要具体施暴者就是以我们干部子弟为主体的老红卫兵，我不愿区分

中学生或大学生。我在2011年曾写道：“（文革前）社会上有多少个阶级阶层，学校中就有多少种‘子弟’。在众多子弟中，被经常自称和他称的只有‘干部子弟’——这个肩负特殊重大使命的群体。革命干部要打击阶级敌人，干部子弟就要帮助出身不好者，与家庭划清界线。革命干部要改造知识分子，干部子弟就要帮助高知子弟改造思想。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愚昧荒唐时代，这是天经地义的铁律，这是‘年年、月月、天天’重复的残酷悲惨的现实。”（参见前文《回忆与反思、感恩与忏悔》节录）17年的毒树，结出文革的苦果。文革伊始，干部子弟又充当“扫四旧”的打手，重现28年前，前辈纳粹党卫军“水晶之夜”的悲惨世界。应该彻底否定老红卫兵了，不能以当时的“真诚”自我辩护。坐牢的“文革犯”谁不真诚呀，下至“五大学生领袖”，上至“黄吴李邱”。在中国的“水晶之月”，近百万皇城“贱民”，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背井离乡无家可归之时，我还沉浸和陶醉在上天安门、毁二校门，抄家破“四旧”的神圣感和幸福感中——可耻可悲！



自命为“布尔什维克”（多数派）的“四人帮”加上“孟什维克”（少数派）的徐沙。从前至后：陈元，宋克荒，徐沙，本书作者阎淮，刘泽彭。摄于1967年初。

曾参加党卫军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葛拉斯说，“我曾被纳入一个策划、

组织、实施了对千百万人屠杀的体制。即使能以没动手干坏事为自己辩白，但还是留下一点世人习惯称为‘共同负责’的东西，至今挥之不去，在我有生之年肯定是难脱干系了。”这就是我现在的心情，何况我还是干过坏事！

8月26日，《人民日报》及时地发表了清华红卫兵（刘菊芬执笔）的文章《清华园必须大乱》，文中说：“我们就是唯恐旧清华天下不乱，我们就是要打倒一切黑帮、右派分子，打破一切旧框框、旧意识、旧势力、旧习惯！”这被公认是中央对我们制造的“八二四事件”的肯定。2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说“红卫兵把旧世界震动了，斗争锋芒所向披靡。一切老寄生虫都被红卫兵揪出来，他们隐藏的金银财宝和杀人武器被红卫兵拿出示众。这是我们红卫兵的功勋。”

有了中央党报连篇累牍地支持和鼓励，我更认为抄家和毁二校门的正确。上有中央支持、下有恐怖支撑，清华成了我们清华红卫兵的一统天下。当然，还有沈如槐讲的因素：“清华红卫兵斗黑帮是符合总理指示精神的，也得到清华大多数师生的认同。八八派没有听总理的话，仍然揪住工作组不放，是中央文革的讲话起了巨大的作用。”（《清华大学文革纪事》，30页。）当时，要在总理和中央文革二者之间选边站，群众大多选总理而弃中央文革。几天内就有万余名师生员工报名参加清华红卫兵（当时在校学生一万、教工六千），我们精选八千，号称“八千子弟兵”。《清华文革亲历》第53页记载：“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要和清华红卫兵联合斗黑帮，清华红卫兵不答应，说他们必须承认大方向错了，并要服从清华红卫兵的领导。”我们自认为正义和正确，所表现的蛮横和霸道可见一斑。

8月28日，总理办公室让我们清华红卫兵去城里制止中学生打人。如上所述，我对撕大字报、毁二校门和抄家扫四旧，非常支持并积极参与。但是对打人深恶痛绝，便自告奋勇带了十几辆大轿车的600人到打人最凶的崇文区。“红卫兵战士进城发传单，宣传十六条，受到群众欢迎。（《清华文革亲

历》50页）实际效果却是车水杯薪。

8月底至9月初，清华红卫兵和“临筹”组织多场阶级教育会（如请全国劳模、掏粪工时传祥等工农忆苦思甜）和批斗黑帮会，双方各出一个头头主持，我曾分别与贺鹏飞和乔宗淮同台主持，文革后我们仍有私人情谊和工作交往。

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后，开始了大串联，中央文革支持北京造反派到各地去炮轰省市委。为建立红色中国流血牺牲之革命先烈的那些只流血没牺牲之革命战友，即几乎所有的革命领导干部都要“摊上大事了”、要倒霉了！我们老红卫兵——红色的革命接班人，革命烈士和革命干部子弟应该义不容辞地保护革命老干部，也就是保卫红色政权。你说是保爹保妈，我一不在乎、二不服气，反正中国基层不能乱。八月，我们“老兵”以保工作组的名义在北京保了众多派工作组的中央部委领导。九月，我们要主动出击，造反派可以到外地串联“造反”，我们当然应该去串联“保皇”，能保一个省算一个。我向总部告假：“咱们红卫兵已掌控清华，我要到外地去保皇。”贺鹏飞和刘菊芬都非常支持。

第三节 云贵保省委回京反文革

3-10 “敢死纵队”大战云贵

1966年9月初，我们工物系9位干部子女，打着“清华大学红卫兵南下敢死纵队”的旗号，赴云贵保卫其省委，因为哥们徐沙的父亲（原二野干部）建国初曾在那里担任省领导。

我们到达云南后，立即与省委书记阎红彦上将、昆明军区司令秦基伟中将取得联系。云南支持省委的群众拟成立全省的红卫兵总司令部，反击北京和当地造反派的反动行径,阎和秦请我们协助筹备。9月中旬，在昆明人民广场召开数万红卫兵参加的“红总司”成立暨保卫省委誓师大会，党政军要员讲

话支持。宣读红总司宣言的是省公安厅长之女王海燕。我在大会上介绍了“八一八”在天安门上毛主席接见我们清华红卫兵50人的盛况，以及《人民日报》支持我们“八二四”壮举等清华红卫兵过五关斩六将的战绩。会后保守势力大振，省委和军区在保守派红卫兵的支持下，基本控制了形势。我们“敢死队”首战告捷，随即转战省委告急的贵州。

1967年1月8日，阎红彦与陈伯达在电话里争吵后被逼自杀，被定为叛徒。阎留下纸条：“我是陈伯达、江青逼死的。”周总理闻讯后说：“阎红彦是个好同志，他不该死呀！”我闻讯后，对刚刚全力保卫过的阎“叛徒”之死无比悲痛，对曾经无比崇敬过的陈江“首长”之举格外不满。

离开昆明，其他几人直抵贵州，我与四川籍同学先去成都，与周总理派的“首都一司西南挺进纵队”联系。我们分工：“一司”在成都保卫西南局和四川省委，“敢死队”在贵阳保贵州省委，一方失利、对方支持。

贵州有两个特殊情况。一是，省委书记贾启允1965年上任刚一年多。陶铸指示：“贵州省委是‘四清’后的新省委，大方向是正确的。”中央信任，我们当然要保！二是，省军区副政委李再含9月起连发数信，反对省委、支持造反派，被中央文革重视。李是1955年的上校，1960年升大校。我认为，级别高低标志着对革命贡献的大小。区区一个校级军官竟敢反对中央四号人物陶铸肯定的省级党委，我们跟你死磕啦！

66年9月下旬，在贵州省委大楼的两侧，出现北京南下红卫兵的两个据点——北京“三司”几百人炮轰省委的指挥部，我们“敢死队”九人保卫省委的办公室。当地百姓诧异：北京到各地的红卫兵都是造反的，怎么你们是“老保”？起初我们人少势大，在各高校联络，并使广大工农群众和基层干部团结在敢死队周围，使贵阳成为保守派的天下。但是随着中央文革明确支持李再含，我们很快失去优势，贵州两派呈胶着形势。9月底我向成都的“一司”求救。

10月1日，贵阳国庆大会。省委给外地来黔造反和保守两派红卫兵各30张上主席台的票，宣称“不偏不倚、一碗水端平”。省委知道“敢死队”加上北京来的中学“老红卫兵”一共才20多人，全都上了主席台。而“造反派”几乎要百里挑一，才能上台。我们得意地坐在主席台上，听转播北京天安门大会实况，传来林彪的讲话“要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就是宣判保守派的死刑，我如五雷轰顶浑身“拔凉”，痛苦知晓大势已去，我们不待散会就溜回住处。下午造反派召开庆祝大会，殷勤地邀请我们讲话，我只能高悬免战牌。

当晚，广播《红旗》杂志13期社论，更详细具体地批判了“保守派”和“走资派”，明确支持“少数派”，我预感广大干部和干部子弟要倒大霉了。我规定的禁止抽烟喝酒的纪律顷刻瓦解，几个中学生喝得烂醉，大哭大闹、大叫大骂：“他妈的，中央把我们出卖了！”第二天，“一司”大队人马抵达，我对他们说：“你们是总理官派的队伍，还可以抵挡一阵子；我们民间的不行了，要撤了。”用“一司”的名义，我们订了火车票，打着“一司”的旗号，灰溜溜地逃回北京。

一篇社论就这么厉害吗？请看总理联络员刘西尧的回忆。周总理当天忧心忡忡地对他说：“陈伯达不经中央讨论就发表这样一篇社论，干部思想毫无准备，又要有一大批干部下台。”他对这篇社论一直耿耿于怀，到了1967年2月，周恩来总理再次提出这件旧事，质问康生、陈伯达：“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叫我们看看？”（《周恩来传》下册，1915页）由此说明：这篇社论的重要，总理和我这个草民一样“忧心忡忡和耿耿于怀”。

新华社记者肖健卿在《贵州文史》2010年第二期《贵州文革初期琐记》中写道：“据说，大约在9月间，一位副省长的儿子，从北京一大学组成一个小分队，在贵阳各高校串连，大肆宣扬省委的业绩，特别说明贵州山地居多，少数民族比例较大，能取得目前的成就十分不易。为了活动方便，省委

领导还向小分队，优厚地提供了活动经费和场所，提供了宣传车辆。北京小分队不负父辈的希望，活动也很有成绩。不久，‘省委会，没问题！大方向，正确的！’口号，就呼喊出来，在全市大街小巷贴出了醒目的标语。随后，贵阳的造反组织奋起反抗，用大字报揭露这个北京小分队的内幕，并针锋相对地呼喊出‘省委会，有问题！大方向，错误的！’口号。”

此文基本属实，只是肖记者暗指的副省长陈璞如（文革后任铁道部长）之子，中国科大的陈金城与“敢死队”活动无关，陈只在我们回京后，表示感谢；在我们倒霉时，表示慰问而已。

1967年初，中央文革和公安部镇压了中学老红卫兵组织“联动”后，在北京八一学校举办了《联动罪行展览》。贵阳敢死纵队被列为“高校联动”，图文并茂地被展览示众，并注明“革命干部的杰出代表”李再含向中央汇报时，点了敢死队的名。清华造反派说，“你们被永远地、无情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文革后整党时，自认为此举应上光荣榜；1986年我抨击时弊鼓吹政治改革时，认识到保省委也是无意义的闹剧。

我们反对的李再含却留下一段佳话：他任贵州革委会主任后，让群众在“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和“敬祝林副统帅永远健康！”的口号之后，加上“敬祝贵州的小月亮李再含比较健康！”周总理曾让纪登奎副总理从贵州调来录音审查，证明此事属实。姚监复是《赵阳最后的岁月》和《陈希同亲述》的作者，他在网络上说，此事是纪登奎亲口对他所言。

10月中旬我回到北京，清华已是蒯大富的天下，我们红卫兵名存实亡。在云贵和北京惨遭滑铁卢后，我对中央文革极度不满，对文化革命彻底失望。原来认为运动是对着少数有问题的干部，现在感觉不对了。当时听到消息，毛泽东说：“要打倒一切。”林彪说：“文革就是革原来革过命的人的命。”啊，文革是要整垮全部干部队伍，我们是螳臂挡车无力回天！

脱离城市无聊的造反与保守，深入农村了解农民，才能真正理解中国。

此想法在清华无人响应，我找了三位天真的北京101中的同学。我们计划从南向北、从富向穷走遍中国农村。11月初，坐火车到广州后，背着一二十斤生活用品、步行七八十里，来到番禺县乡村。我们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了一个月，两个党员、两个转业军官（65年哈军工划归地方），四个干部子弟吃了大苦、耐了大劳、受了大罪、长了大进。当我们回到广州，准备转战湖南时，听说清华红卫兵在北京炮打中央文革。消沉的革命意识顿时被激发，我不能缺席，应该立即返回北京、投入新的战斗！

3-11 与陈元和宋克荒反中央文革

12月中旬我回到清华，反对中央文革的浪潮，史称的“十二月黑风”已被压制。留在学校的老兵头头，大多卷入后被整肃，清华红卫兵遭遇灭顶之灾。

前文提到的我当年的《检查》中，写道：“12月下旬，我和没有卷入‘黑风’的红卫兵总部委员及我系低班的干部子弟接触，想重新把清华红卫兵拉起来，与蒯大富继续斗，好好干一场。”我用主席诗词安慰“黑风”后被江青点名的贺鹏飞、李黎风、乔宗淮等朋友：“花落自有花开日，蓄芳待来年！”

清华造反派头头如今这样认识：“所谓‘十二月黑风’是青年学生对中央文革的第一次大规模的、自发的抵制与抗争。也是经历了半年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之后，对文化革命的第一次反思。”（沈如槐：《清华大学文革纪事》，47页。）

我要补充，清华红卫兵刮起的“十二月黑风”，“这是最后的斗争”，“英特那雄耐尔”没有实现，干部子弟主导的“老兵”却从此退出政治舞台和历史舞台。

12月26日晚，应中学老兵朋友的邀请，我到北京展览馆剧场参加“首都

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成立大会。在“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和“拥护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等口号声中，压在我心里三个月的阴霾一扫而空。其后他们的标语“忠于1960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正确不正确，十年以后见”，我极为认同。

1967年，我们蓄芳的来年到了！

“1月6日下午，我和没赶上‘黑风’的朋友，陈元、宋克荒到了徐沙家，商量何去何从，四人谈起形势，感情相投又有许多看法，不吐不快，就商量写张大字报。

晚饭后四个人分别起草，写完后讨论，认为陈元和我的较好。宋和徐睡觉，我和陈把两人的草稿合并理顺。清晨徐沙睡醒了，说他清醒了，不能写这张大字报。要闯祸的要倒霉的。我们三人坚持写，并决定署名‘布尔什维克’（俄语，多数之义、又指共产党。）有三重含义：一、我们三人是多数，徐是少数；二、当时我们保守派统称多数派，造反派是少数派；三、我和宋是党员，并以此为荣。我们拿底稿到学校，请人抄好，陈、宋和我三人当众贴到大礼堂前。当时可能是7日中午。”（引自1967年3月我的《检查》）当时在《检查》中被隐瞒没敢讲的事实还有：1、在我们四人议论中，批判指责最多的是江青，在原稿中也婉转地小批评了她一下。最后定稿时冷静了，删掉江青，加重对关锋和戚本禹的批判。2、是宋克荒提议署名“布尔什维克”，我们一致同意；认为江青反对我们保守的多数派，我们就是要打出多数派的旗号，和她对着干。3、我们三人骑车回清华，我们的毛笔大字都写得不好，宋克荒找他们班某同学抄成大字报；怕连累他，只有我们三人去张贴。

在大字报中，我们从运动形势冷冷清清、公安部不该抓联动、中央不应压制多数派、整十二月黑风错了、全面批判中央文革等五个方面，论述了对当时运动全面否定的看法。最“反动”的是：“中央文革有许多不符合毛泽

东思想的言行，应该批评。中央文革只是中央文革，毛主席才是毛主席！”我们还点名批判了锋头正旺的中央文革重要成员关锋和戚本禹的几个讲话。

清华井冈山红卫兵的小报，以阶级斗争新动向，报导陈宋阎三人于7日贴出反动大字报。说“阶级斗争就在我们身边:‘布尔什维克’贴大字报，攻击中央文革，为十二月黑风翻案。”（《清华文革亲历》9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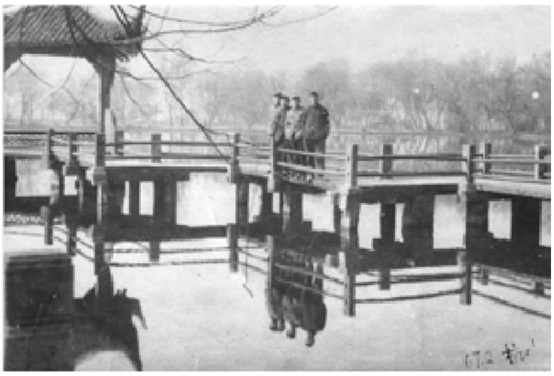
我们的大字报贴出后，有几篇支持的，但更多的是反击和批判的大字报。当时造反派内斗激烈，没有精力过多地关注我们，几天后“布尔什维克”引起的波澜，风平浪静了。

1967年1月中旬，我们在清华没戏演、没戏看了，于是搞了去昆明的火车票，开始了两个月的滇浙苏三省、逍遥派的不革命的游山玩水“大串联”。在昆明附近玩够后，因得不到东进的车票，曾滞留在春城。通过关系我们进驻“停业”的九三学社“省党部”赋闲。友党欢迎我们——有北京的老红卫兵看门护院，当地的小红卫兵不便骚扰。其间我对三个朋友更加了解。陈元整天在图书室阅读马恩和列宁选集，闲暇时向我们宣讲心得。宋克荒用自己的相机钻研摄影技术和艺术，并拿我们开练。徐沙充分利用资产阶级的唱机和唱片尽情欣赏古典音乐，还教导我们如何听懂交响乐。既无艺术细胞、动手能力又差，宋和徐无法让我开窍，我就只能陪太子读书、和陈元寒窗苦读马列了。陈对我启蒙，让我学习原来一窍不通的、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来源——德国古典哲学，这是我当时最大的收获。

我们研读了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其《开讲辞》说：“时代的艰辛使人对于日常生活中平凡的琐屑兴趣予以太大的重视，现实上很高的利益和为了这些利益而作的斗争，曾经大大地占据了精神上一切的能力和力量以及外在的手段，因而使得人们没有自由的心情去理会那较高的内心生活和较纯洁的精神活动，以致许多较优秀的人才都为这种艰苦环境所束缚，并且部分地被牺牲在里面。”老黑一逗（号）到底的长句令人震撼，涤荡我的灵

魂。我和陈元不断背诵给宋和徐听，尽管经常遭到嘲笑。半个世纪后重温最伟大的哲学家黑格尔的长句，仍倍感亲切。聊以自慰的是：我未“牺牲在现实上很高的利益里”。下半年，我和陈又研读了黑格尔的《小逻辑》，使我的精神再次升华。

2月底，中央宣布停止大串联，学生必须回校闹革命。我们3月初从苏州回到清华，噩运等待着我。



右起：陈元，徐沙，作者阎淮，宋克荒。1967年初摄于杭州西湖。

3-12 被造反派专政和抄家

“3月16日，清华井冈山总部发表政策声明，说当前的中心任务是教育八九派，打击反革命逆流。号召造反派杀回各班去，展开楼道战、宿舍战，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八九反动思潮。造反派在许多班级组织了对铁杆八九同学的批判和斗争，强迫他们做检查。”（沈如槐：《清华大学文革纪事》，86页。）

在清华的“三月镇反”中，我这个工物系“八九红卫兵”的一把手，又写过“炮打中央文革”的大字报，理所当然地成了系里第一号反革命，被专政了。具体待遇是：

一、行动受限制，不得擅自离校，校内不许与“八九派”接触。

二、全校批斗反毛主席的反革命的万人大会，我被押解到台上陪斗。

三、系里开了若干次我的批斗会。校系批斗会和单独逼供信，我只被按头、并未挨打，即只触及灵魂、不触及皮肉。否则肉体受不了，灵魂就出窍——我肯定胡说八道乱供乱咬，早节不保。真心感谢文明的造反派同学！

四、两个同学到我家抄了我的房间，搜走我的日记和笔记等物品。当时父母还未倒霉，子弟先于干部被抄家，这是为干部子弟中的特例。

五、被迫书写数份、共二万余字的检查大小字报，张贴于系里。这是我文革中仅存的宝贵资料，上文曾引述，也要更诚挚地感谢造反派。

六、禁止参加批斗王光美的大会。

4月10日，清华召开30万人的批斗王光美大会，大黑帮彭真、陆定一、罗瑞卿、薄一波陪斗。我这个小反革命不够陪斗的资格，但又怕我这个保皇派破坏，当然不能让我去现场，可是谁也不愿意留在宿舍看守我，失去千载难逢看热闹的大好机会。于是，4月9日，两人押送我到校门递解出境，勒令我11日晨8时不早不晚准时回校报到。

俗话说“请神容易送神难”，殊不知“放鬼容易、收鬼更难”。我才不回校呢！裴多菲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我是：“生命没危险，爱情未来到，只为自由故，二者无可抛！”失去自由了一个月，我要在家里自由自在地享受自由主义的生活。当时的三里河、现在的中央行政区，十几个部委所在地，老红卫兵的天下，看谁敢来物资部大院抓我？

4月14日，巨大喜讯传来，不是伟大领袖又发表“最新最高指示”，而是清华“四一四”成立，井冈山分裂为“蒯大富的团派”和“四派”。当权造反派的分裂，无疑是被压保守派的福音。“镇反”无疾而终，反革命的我、自我平反自动解放了！如果说，对文明“专我政”的造反派的感谢是事后认识的“马后炮”；那么，对“四一四”的感恩戴德则是彼时的“当头炮”，

当时真想放炮竹庆祝。



左起：陈元，本书作者阎淮，徐沙，宋克荒。1967年初摄于杭州虎跑。

第四节 社会底层调查与博览内部群书

3-13 四省会调查结交刘泽彭

1967年5月6日，四川成都造反派和保守派大规模武斗，死数十人、伤数千人，全国震惊。随后，两派众多人马来到中央公关，关于此次武斗的经过和责任众说纷纭。陈元、宋克荒和我决定去实地调查武斗真相。多才多艺的孙巨（无线电系、李井泉三子过继给三机部长孙志远）为我们用圆萝卜刻制了井冈山红卫兵的“印章”（我称是公刻私章）、用长条肥皂印制了井冈山的介绍信。大串联已结束，无“红卫兵接待站”提供免费食宿，我们通过来京的保守派得到火车票，与自控系雷同学去成都，住在他家。

在成都详细调查“五六事件”的来龙去脉后，我认识到：在伟大领袖宠信的中央文革支持造反派、对文革不满的军队支持保守派的地区，战斗（不只武斗）和死伤不可避免，保守派必将惨败。我们忧心忡忡，又无力回天，只能攀峨眉以散心。在山中各寺庙留下的食宿借条，宋克荒分别署名清华“蒯老富”或“蒯少富”。

游览之事不值一提，值得一提的是，在山上我们遇到自动控制系的老友

刘菊芬和刘泽彭。下山后，刘泽彭加入我们的队伍，他文笔上乘，中干子弟，父亲早亡。于是布尔什维克的“三家村”变成“四人帮”，我们四人的友谊持续数十年至今（并未因我反对“风波”出走而中止）。在校期间几乎天天见面，毕业后年年春节回京探亲都要聚会。文革后，刘先任克荒之父、中央组织部长宋任穷秘书，后官至中组部副部长，外界戏称是主管党务的陈云义子。我被陈元劝到中组部后，是宋父的部属，刘的同事。我们四人的生活轨迹就这样交错缠绕。



1967年6月，本书作者（右三）与同学陈元（右二）、宋克荒（右五），在四川峨嵋山上邂逅刘泽彭（右一）。

6月，在成都郊县调查完毕。我认为再次免费外出机会渺茫，应该充分利用现在的地理势能优势，沿回京铁路线继续调查。我们四人皆为长子，他们三人担心“走资派”父母和“狗崽子”弟妹的处境，要直接回京。于是我孤身一人在西安、郑州、保定（河北省会1966年5月由天津迁到保定，1968年2月迁至石家庄）三个省会考察文革、了解社会。陕豫冀三省激进造反派和温和造反派的对立都很严重，零星武斗不断，但是还没有爆发大规模的激烈战斗。凭借信用度较高的清华学生证（孤家寡人不敢再用“井冈山”印信），我在两派的驻地和阵地穿梭。为了取得信任便于了解情况，我不时违心地分

别表示同情和支持双方对立的观点。实地调查后，我为他们的真诚而悲哀，更为他们的安危而担忧！文革半年后，因为广大干部和我们保守派的境遇而怀疑文革；一年后，因为我们同代青年、他们造反派的伤亡而否定文革。

陕豫冀，既无中学同学在读高校，又无大学同学在此居家，父母战友也都自身难保。我无处投靠，只能住店。前面已交代：大学期间家长每月发我20元“学资”，交饭费15元，还剩零花5元，算是“富农”。文革后经常在家蹭吃蹭喝，小有积蓄，升级“小地主”。但是正如葛优所言：“地主家也没余粮啊！”我小地主进大城也不能住酒店呀。在三省会，我住过大车店、睡过大通铺，在候车室半坐半躺熬过几宿。在那里结识了三教九流，接触了社会底层，尽管没有看过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民怎样水深火热，但我见识了中国三分之二的百姓“水火”如何。我第一次听说因家境贫寒，小学毕业当学徒、初中毕业上技校的情况比比皆是（我原以为那是些学习差的笨孩子）。老舍的《四世同堂》在这里是四世同“室”，我走进贫民窟、懂得了“平方米”的概念。干群官民天壤之别，我们兄妹四人住校，平时家中只有父母和保姆，住四室一厅一百多平的局长单元；更别提北京哥们家的部长四合院，云贵朋友家的省长小洋楼！

在郑州火车站附近浴室的“一夜情”至今难忘。请勿翩翩联想，当时没有平民的“性服务”，只有“平民性”的服务——浴室晚上结束洗浴业务后，花两毛钱可在温热混浊的浴池中舒舒服服泡个澡，再在2尺乘5尺的小床上香香美美睡个觉。在车站半坐半躺几晚后，浴室就是天堂。那天正在天堂的琼浆中尽情享受，身旁的两青年搭讪。赤裸着赤诚地亲切交谈后，首都

大学生和河南游民有了点情——感情和交情。次日，白天我随新朋友整天行乞、偶尔行窃。他们高超的顺手牵羊，我毫无察觉。事后他们向我炫耀战利品，我劝诫：勿因小失大，砸饭碗进局子。他们答：警察忙于大革命，无暇小治安。晚上，按约定我管饭（打卤面），他们管睡。“晚宴”后，我

把随身的辎重（换洗衣物及雨衣）和细软（十几元巨款及手表）花5分钱放在车站“物品寄存处”，跟他们登高而睡。是年五一，蒯大富请来全国第一个林副主席的“四个伟大”题词，在被我们推倒的二校门处，敬立了全国第一座领袖看门塑像。郑州也学清华、赶时髦，在火车站前搭了十几米高的脚手架，白天忙活、黑夜安静。攀上约20米长乘10米宽的平台，我把塑料凉鞋枕在头下，平躺在比浴室的小床宽阔无比的高大木床上，空气也格外清新。在初夏习习凉风中，“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笑声，我们躺在高高的统帅旁边，听朋友讲那过去的事情。”丐友们的经历让我大开眼界。

当晚经引荐，我结识了几位“老大”，第三日我随不同的老大到不同的地盘实习。晚饭，老大们非要宴请清华“状元”，我受之有愧地吃了。宴后，同样夜宿高台，别样的是，他们坚持要“听我讲现在的事情”。无奈，吃人家嘴“长”！我神侃京城内外文革有意思和没意思的故事。——不好意思：这伙乞丐，比列位看官早半个世纪先听到上文诸事！

两天三夜情之后，浴室邂逅的二位，执意赠送我5分钱的站台票，依依不舍送我上北去的列车。当互道再见时，我们都知晓：再见——不到了！清华大学只教了我两年有限的理论基础课，社会大学却教了我无限的人生专业课，在众多的导师中，这些丐友在时间序列上无疑位列前茅。这些课程使我增强了平民意识，在干部子弟中更显异类。

3-14 博览众书，文体并举

1967年6月，中央紧急指示：所有人员立即回本单位参加文革。而当时清华的文革就是造反派的内斗，我不感兴趣、也不敢兴趣。7月至12月，我在清华园里度过半年逍遥自在的逍遥派生活。

文革初，四川某气矿炸爆，一片火海。32111钻井队殊死搏斗，6人牺牲21人烧伤，扑灭大火保住了气井，名噪一时，被誉为“英雄的32111”。回答

外地朋友询问，我说正享受清华“32111”的幸福生活：三饱二倒一书一泳一棋牌，即是：三餐吃饱吃好，午觉夜觉不少；晨读书暮游泳，晚上围棋桥牌学会了！

吃一一无产阶级的中坚力量即许多产业工人只抓革命不促生产、甚至抓革命促武斗破坏生产时，清华的大师傅一天，不！是一顿也没停饭，让我们这些既不革命又不学习的“小资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顿顿有饭吃。不敢说吃饱一一粮票限制；不能讲吃好一一钞票限制。我真想说、但不敢说大师傅们“伟光正”，然而他们确实敬业！



1967年初，本书作者阎淮（右一）与同窗宋克荒、陈元、徐沙（自左至右）在苏州寒山寺。

睡一一幼儿园和中小学基本住校坚持午睡，清华也提倡午睡。当时“毛选”没人天天读，午睡倒是“雷打不动”，“工管”后则大翻个颠倒乾坤，只读“毛选”不许午睡了。前些年冬季回国，北京规定供暖16度即达标，冻得够呛。遥想当年清华温暖的冬夜，真感谢只拿三四十元的锅炉工。

玩一一夏秋季，“布尔什维克”的“四人帮”陈元、宋克荒、刘泽彭和我，偶尔捎上“孟什维克”的徐沙，每天午睡后到不要钱、没人管的颐和园去游泳。而后，在风景宜人的万寿山下昆明湖畔，交换读书心得、探讨时局形势，肆意褒贬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以及所有文革升迁者。我还篡改了

毛诗《和柳亚子先生》：牢骚太盛“利健康”，风物“不”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湖水“深”，观鱼胜过“大会堂”！ 一一见识高过南书房！

文革前喝过一勺心灵鸡汤：“吃和睡是猪的生活，难道加上玩就是人的生活吗？”清华学子当然不甘于“吃睡玩”的低级人生活，于是我们还读书。班上同学说：“我现在不要‘四大自由’（毛文革恩赐、后被邓没收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只要四大名著。”他钻研的还真有成效，列出《红楼梦》主要人物错综复杂的关系图表，让初读者一目了然。又有后继者为《三国》诸将领和《水浒》108人列出小传，作为辅导资料油印分发。

1967年7月16日中央文革接见学生领袖，蒯大富说：“清华有90%是逍遥派，没事干、大字报也不贴，从空想主义跌到悲观主义。”（《清华文革亲历》224页）文革仅一年，我们“吃睡玩读派”是绝大多数，紧跟老人家“继续革命”的蒯式造反派才是“一小撮”。

我文革中真正的读书生涯始于清华图书馆。管理员们不像半个世纪前，那位在北大只干了四个月的润之同行，那样具有雄心壮志远大理想，他们和清华所有的职工（不包括教师）一样兢兢业业地坚持在“最平凡”（其实是“最低下”的别称）的岗位上，为“吃喝玩读们”服务。

1967年夏，我首先通读了建国以后全部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以及《人民手册》年鉴中政治方面的文章，约数千万字，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和历次政治运动有了全面了解。

秋天，我阅读了内部书籍中全部政治类的“灰皮书”和文献类的“白皮书”。书籍来源除了父亲收存的，主要是上文提到的高干子弟好友，还开辟了胡乔木侄子和胡绳之子等清华同学的新书源。对我影响较深的有：

托洛茨基的《斯大林评传》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使我对残暴的斯大林和专制的苏联有了感性的认识，并与毛及中国对照。

南斯拉夫副总统德热拉斯（现译吉拉斯）的《新阶级》，指出“共产主

义革命是以取消阶级为号召开始，但最后竟造成一个握有空前绝对权威的新阶级。它将留下人类历史上最可耻的篇章。”让我对社会主义开始理性的批判。

《第三帝国的兴亡》简直就是文革前传，共和国人民与帝国臣民何其相似乃尔，党卫军就像红卫兵的前辈！《兴亡》是徐沙带我去北大历史系，向他四中学长胡德平借的。胡讲：“父亲胡耀邦嘱咐，什么书没了，《兴亡》也不能丢！”我答：“会像对和氏璧一样爱护。”阅后当然完璧归胡。

公开发行的《九三年》理所当然地让人对比“六六年”，此二书使我从历史和世界的全新视角审视文革。“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有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阶级革命和文化革命是否正确，我不知晓；人道主义“绝对正确”我认同！雨果老先生的教诲铭记在心，并成为我的绝对价值观。

1968年1月4日凌晨，清华发生武斗，双方伤百人，三十多位入院治疗。33年前，清华地下党支部书记蒋南翔首创名句：“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现在，失去蒋校长的清华也“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不愿干武斗的部分造反派和不愿被武斗的全部保守派纷纷卷铺盖离校，北京学生回家、北漂则投靠文斗学校的老乡。



1967年秋，本书作者在家攻读胡耀邦、胡德平父子都非常珍爱的《第三帝国的兴亡》。

2月4日除夕半夜，宋克荒突闯我家。他说：回沈阳探亲，父母被关，我被追捕，逃回北京。到七机部投奔大姐，姐被管制，无处可去，只好找哥们你了！宋在我家住月余，后投奔没倒霉的某将军。因文革中来家避难的朋友较多，此事我已忘却。40年后宋故事重提，戏说当年救他一命。我答："举手之劳，言重啦！林彪之亡和小平之殁，你都冒险在第一时间通知外地和外国的我，才是义气千秋！"

1968年春，我读完所有能淘到的"内部书籍"中以苏联文学为主的"黄皮书"，主要来自系友之父袁水拍（曾任文化部副部长）的书库。印象较深的有：《苦果》是"苏联右派"作品集，好似中国右派反官僚和特权的俄文版；爱伦堡的《解冻》，"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我渴望中国的解冻；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劳改营让我震撼！我认为它是后来获诺奖的《古拉格群岛》的缩本。



1968年初，顾准夫人自杀。我和徐沙陪顾的儿子们到京郊散心。右一为顾次子，右二为作者，右三为顾长子；左一为徐沙，左二为顾幼子。

而后，我精读了翻译家周煦良受教育部委托主编的高校文科教材《外国文学作品选》，上下两卷精选了从古希腊到当代的几十部精品的精彩章节。阅后按图索骥，我千方百计找寻国内出版的完整译作，在知识和精神上接受双重洗礼，完成工科生的人文涅盘。

1968年初，我挚友顾逸东之母（顾准之妻）自杀，我和徐沙住进顾家数天，帮助料理后事。然后我们陪顾家兄弟与文革初父亲自杀的李海文姐妹等，骑车游遍北京远近郊区的名胜古迹、风餐露宿寻古探幽。这也算是这个春天我生活的又一亮色吧。

3-15 河北农村深入考察

1968年4月23日，清华武斗升级为战斗，由冷兵器进化为热兵器，由零星械斗发展成持续战争，史称“百日武斗”。文革前，清华实行“真刀真枪的毕业设计”，如水利系参加密云水库的施工，我们工物系参与核反应堆和粒子加速器的运行。我无奈地调侃：“列宁说，忘记过去就意味背叛。造反派好样的，不忘记清华传统，武斗都真刀真枪地干！”文革初期的红卫兵战歌，唱道：“拿起笔来作刀枪，批判反党大黑帮！”我说造反派是：“拿起刀枪来作笔，砍向同学好兄弟！”

近期返校已无可能，夏天我和徐沙、顾逸东三人到河北安新县同年级党员何建坤（文革后任清华副校长）家乡，继续我1966年的农村考察计划。这里恰巧既是八路军的冀中抗日根据地，又是大跃进的模范县。

尽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农民的贫困还是让我震惊，我们穿的最破旧衣服还像是农村的华服。第二天我们藏起手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小收音机没敢露头（该知之事有大喇叭整天喊）。与当年去广东大相径庭。那次公社干部对社员说：“这是毛主席派来的首都红卫兵，到农村劳动锻炼和传经送宝。”我考察了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现状，参加过“忆苦思甜会”，但对17年历史的阴影一无所知。在红太阳照耀的红海洋中，向阳花般的公社社员哪敢向红太阳的红卫兵讲“困难时期”的负面故事。这次，我们不是红卫兵洋学生，而是邻家二小子的同学哥们，随着同学叫二爷爷、三大娘、四哥、五嫂。“人家城里大官的娃娃，跟咱土农民挤一个土炕、啃一屉菜窝头、喝一锅稀糊糊，白给队上和咱自留地干活，还要给钱和粮票。这仨娃子不

赖！”有这样的赞美，你什么心里话听不见、什么真实情况了解不到？



1968年夏，作者（右）与同学顾逸东（中）和徐沙在河北农村。

文革中我没有朝圣井冈山和延安，但听说“老根据地”的贫困，现在亲眼看到“中根据地”和“大跃进模范县”现实的穷苦。“昨日入城去，归来泪满襟。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似乎是中国农村的咏叹调和主旋律。农民讲述在并无大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自己亲人饿死的悲惨情景，令人触目惊心惨不忍听。我这才知道：遍野饿死者，皆是种粮人！

之前在城里，我们曾讨论过共产党最对不起谁：“镇反”的地富反坏？“反右”的“右派”？“思想改造”的知识分子？“文革”冲击的干部？贫穷的工人？现在在乡下，我终于有了答案：农民！是根据地节衣缩食养活了红军八路的老区农民！我们的父母已成“食有鱼、出有车”、锦衣玉食的高级干部，他们还是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土农民；是分到土地踊跃参军牺牲、“解放”全中国的新区农民！百万战死内战沙场的农民是烈士的主体，纪念馆和烈士公墓可有其名？是忍受巨大“剪刀差”盘剥、为工业化作出巨大牺牲的全国公有化农民！是至今没有解决温饱、仍在贫困在线挣扎的二等公民——农民！

第五节 工宣队的统治与我的反抗

3-16 与工宣队的摩擦

1968年7月27日，毛泽东派遣61个工厂3万工人，在8341部队（中央警备团）配合下，突然开进清华园。工人被不明真相的蒯大富派攻击，死5人伤731人。8月，工人宣传队宣布长期进驻清华，要求师生立即返校。9月我们从河北农村回清华，经历了一年半暗无天日的被管制生涯。

毛泽东亲自培养的典型是“六厂二校”，即六家工厂和清华北大，印刷“毛选”和“毛像”的新华印刷厂是最革命的第一厂。工物系的工宣队就来自该厂，“工军宣队”的系领导是8341领袖卫队的一位连长。在极左“激情燃烧的岁月”，最左的尖刀插入清华最机要的系，是顺理成章之势。我与他们左派的做派格格不入、摩擦不断的原因有三：一、经过两年的学习与实践，已初步形成“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愚昧很强大，能禁锢人一世；又很脆弱，一旦挣脱，任何力量绝不会使你再度愚昧。聪慧整天被蠢笨教诲，无比难受！二、我们反动大字报点名批判的关锋和戚本禹已被毛抛弃，而口头讥嘲江青无纸无字，从不承认，我的反革命帽子不翼而飞。三、工宣队对伤害工人的“团派”恨之，对武斗的“四派”恶之，对我们“逍遥派”好之。摩擦具体事例如下：

“新抗大”事件。8341那位连长异想天开，让实验室工人用有机玻璃做两米见方的“新抗大”三个字，放在系馆楼顶。我说：“剩余的下脚料不要扔，我要做‘活雷锋’三个字别在胸前。”“新抗大”在楼顶立足未稳，被迟群发现，勒令取下。我说：“多亏我的‘活雷锋’还没做，否则和你们一样瞎忙活了！”连长想整我，还没来得及，我们就化敌为友了，因为次日，陈元来找我，连长与陈握手问候，原来他曾是陈云的警卫员。陈元指着我对连长说：“你要早听他的，就不会被迟群训了。”农民出身的连长对首长及其子弟有极朴素和极浓厚的阶级感情，因此对我也不计前嫌，格外照顾。“翻身学生得解放，幸福日子几天长。”很快军人撤出，系里只留下工人师

傅。我又“吃二茬苦、受二茬罪”了。



1968年秋考察归来。右起：徐沙、顾逸东和本书作者阎淮。

工人把社会上流行的、学生们生疏的对“毛像”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毛选”的仪式强加给我们。对此我是心中有怨，但既不敢怒更不敢言。1968年冬“清理阶级队伍”，派出“可靠学生”外出调查“不可靠教师”的历史。我系干部子弟关某“外调”回来作报告说：“旅馆房间只一面墙有毛像，便自费买三幅贴上，使任何方向都能看到伟大形象。我们坚持天天读，回来已后半夜，旅馆没有桌子，还躺在床上读毛选后才睡觉。”我对这种宗教仪式的不满顿时有了发泄点。讨论中我说：“既然躺着学习，就应该再贴一张主席像在房顶。后半夜已是第二天，你们当日还是没读毛选，还不如我们在学校、在工宣队的直接领导下，真正天天读了。”同学们跟着挑毛病，学习榜样成了批判对象。

学习解放军，我们学生编为一个连。连长是新华厂的青工，高考落榜当了工人，文革造反成了左派，在厂里技术不行还挺“刺儿头”，有了工宣队这差事，领导顺水推舟卸了包袱。新华厂轻松了，工物系倒霉了。你从长沙的中专生掌权后如何整大知识分子，就能推测出中学生怎么整大学生。例如他规定，宿舍不许插门（怕看四旧书籍），听收音机不许用耳机（怕听外国广播）等。饭前在食堂前排队唱红歌，无论数九寒天还是三伏烈日，他认为

歌声不嘹亮或音律不整齐就不让吃饭，直到他满意为止。我不由得想到奥斯威辛集中营。我们当面叫他王连一长（弱读），背后称他“王连举”（《红灯记》中的叛徒）。过去我对领导提意见，是人民内部的干群矛盾；现在对工宣队有看法，就是反对主席的“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可能是敌我矛盾。我私下牢骚：“我没当过亡国奴，不知道一个民族被另一个民族压迫之苦；但我亲身体验到一个阶层被另一个阶层管制之难（四声）。我不是基督徒，没有原罪；考上大学的知识分子在落榜的工人面前，也无原罪！”

1969年春进行“整党”，由党员“讲用学习毛选体会”，群众评议通过，方可恢复组织生活。第一批安排“讲用”的是工宣队和学生都满意的，顺利通过；第二批是工宣队满意而学生不满的“积极分子”，如上述的关某，当然没有我。工宣队按照毛泽东“抓三分之一”的工作方法，在关等“讲用”后召集部分同学开会，布置让这批“积极分子”通过。随后的全体群众大会上，我的哥们提出我比关某好，许多“三分之二”呼应，最后我和“积极分子”们一揽子被通过，我是唯一没有“讲用”就恢复组织生活的党员。

我1965年入党，遵照当时中共八大党章规定，需要一年的预备期。现在历时四年，中共九大新党章为了使造反派突击入党后，立马担任党内要职，取消了预备期。我恢复组织生活即为正式党员，原本就不软的腰杆挺得更直更硬。“王连举”开口闭口“你们知识分子要接受我们工人阶级再教育”。在学习毛的“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的“50字建党方针”最新指示时，我虚心地向不是党员的王连长请教我的困惑：“根据毛主席一分为二的观点，无产阶级由党员的先进分子和党外的落后分子两部分组成。知识分子党员的先进分子如何接受党外落后群众的再教育？”他当然无言以对，只能在毕业分配时惩罚我。

我上述的“阶层管制论”和“落后再教育论”在朋友圈中流传。北大国

政系的李海文多年后还记忆犹新，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发表经过及影响》提到此事。（《炎黄春秋》2011年第3期）

老人家75岁生日那天突然想起了我们，发出“即使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子女，也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最新指示。工宣队召开全校“可教子女”的千人大会，自然也忘不了我，还想让我典型发言。我说：“家父虽然已被定为走资派，但至今还未死亡、仍然健在，尚不属于死不改悔。而根据二分法，参会者是可教子女，不与会者就是不可教子女吗？”胳膊拧不过大腿，我与会了，但不发言。是日发言者，有我熟悉的肖华之子和刘瑞龙之女。我对人对己的要求是“两个不损害”，即：不损害自己之尊严，不损害他人之利益。因之，我不耻于发言者。出社会，方知世事之艰辛，对别人不再苛求“不损自己之尊严”。对人及事，皆取“了解、理解、谅解”的“三LJ”态度，文革后与刘等仍为好友。

3-17 “家破人未亡，子散妻未离”

这小标题，是我安慰父母的话，它概括了我们六人家庭在1968年以后的状况。

1967年，我被清华同学抄家时，父亲还平安无事。他能平安地躲过1966年至67年文革初期的冲击波。我认为原因有二：

其一、当时行政10级的父亲是物资部机电局副局长。而11级的正局长徐良图（文革后任国家计委副主任）资历比父亲浅，被认为是物资部长袁宝华的红人，文革伊始第一个冲击波就随着袁部长一起被打倒。第一副局长的父亲就负责了全局的业务，担负起全国机电产品调配的重任。工作需要，他不能垮台。

其二、父亲还兼任机电局的党委书记，他又是热心肠，在政治和生活上都关心下属。例如，使劲发展青年党员，逢年过节带外地单身大学生来家里

一起吃饭。人缘好也使他占了便宜。

1968年，全国生产瘫痪，父亲不重要了。“保阎反徐”年轻人为主体的群众组织失势了。运动更深入了！一个局级干部不打倒，留着干嘛？父亲成了“走资派”，并逐步升级：先是停职反省、然后劳动改造、最后关进“牛棚”停发工资。三个中学生的妹妹弟弟，运动初期积极投入革命热潮，分别属于北京中学生的“老兵”、“四三”和“四四”三个派别。热潮降温，伟大领袖在城里“运动”完了他们之后，又运动他们到广阔的农村去刨食。他们三个小孩或自觉响应号召、或被迫迁出户口，分别到黑龙江、内蒙和山西务农。北京只剩下三个较年长的：父亲在机关被造反派隔离关押；母亲是北京市卫生局干部，集中到昌平县的劳动大学；我在工宣队管制的清华大学；只有周末我和母亲才能回家相聚，并给父亲送点衣物。

物资部成立于1964年，同年物资部大院在甘家口东南角修建完成。它西边隔着三里河路与钓鱼台国宾馆相邻，东面是解放军报社；南面是月坛北街，北面临阜外大街。大院南边是高层的部机关办公大楼，北面是宿舍区。宿舍区层级分明：最西面、与钓鱼台相望的是一排五栋、部长和局长的“一梯两户”的三层小楼，中间的是两排十余栋、处长的四层中楼，东面是三排几十栋、一般干部的“一梯三户”的五层高楼。院内幼儿园和小学、副食店和大食堂、医务室和大浴池、经常演电影的大礼堂，应有尽有一应俱全。宿舍区与办公楼无隔离墙，平时我们骑车穿行方便，文革时办公区干部的大字报就自然而然地对家属们公开了。

从《阎辐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的大字报中，我才知道父亲被隔离的重要原因。父亲在物资部的档案副本（正本在中央组织部）被公开了：解放初期老家土改爷爷被斗，父亲给河南省委写信申诉，“痛说家史”：爷爷在红军时期曾支援徐海东（开国大将）十万大洋，抗日时支持几个孩子参加中共抗日，应属开明士绅。孰料河南省委党性极强，将此信转回黑龙江省委。

又哪知黑龙江省委书记对省委工业部长的父亲不好处置，干脆把信放入父亲档案了事，于是乎便埋下隐患。长春第一汽车厂厂长饶斌（原黑龙江副省长）劝父亲去任副厂长，把任命材料报到中央分管工业交通战线的薄一波副总理处。薄调来父亲档案，发现那关键要命的书信；提笔批下八个大字："严格控制、不得重用"。从此父亲自己也莫名其妙地在仕途上开始走下坡路。饶斌只得改任父亲为安装公司经理，推说安装工作更重要，需要他独当一面云云。1956年父亲调到北京，一机部说东北的高岗（当时已自杀）为笼络干部，级别定得太高，父亲应由九级降为十级，任副局长（后听说大部分东北进京的司局长都降一级）。父亲不计较得失，仍勤勤恳恳工作。此后他到计委机械局给十级的马仪（后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当副手，现在又作了11级的副职。父亲和我如今才明白十几年前的一段公案。



1968年，京郊合影。右一为作者，右二为徐沙，右四是顾准次子，左一为李海文，左三为顾准长子。

父亲平时教导我"兴无灭资"学习雷锋，作好革命接班人。什么"走资派"？哪个"孝子贤孙"？我才不信这一套！我才不划清界线呢！每周日学校放假，我去机关，在看守监视下，给父亲送去经过检查的换洗衣服和香烟、饼干（父亲肠胃不好）。他平时只抽较高级的"大前门"，现在造反派只许送最差的，我用母亲没有被扣的工资买最贵的"大中华"香烟，放在最

差的烟盒中蒙混过关。父亲与我相约，在本楼层最近的厕所、左边第二个蹲坑的纸篓里，我们交换纸条“情报”。如此这般，近一年从未败露。

1969年春节，最难忘、最痛苦的春节！弟妹们刚下乡几个月，不批准回京探亲。除夕傍晚，母亲亲手做了父亲爱吃的丰盛菜肴，一分为二，一半用毛巾被包裹严实。我顶着刺骨寒风，送到机关大楼，在关押父亲楼层的楼梯上，我竟被拦下。看守说：“你爸爸最近态度不好、不老实交代问题，项目组决定不许家属再送食物。”我故意大喊大叫，让父亲听见，知道我来看过他，妈妈在想念他。气愤的我只好到大院中的清华同学家，把菜肴送给她。我不能拿回去，让妈妈更伤心。流着眼泪我无力蹒跚缓慢地向家走去，进门前我擦干泪水，进门后强装笑颜。我对母亲说：“爸爸尝了饭菜很高兴，他身体也不错，还让妈妈多保重！”我们娘俩吃了丰盛菜肴的另一半，我毫无胃口，但强迫自己尽量多吃。饭后我说有点累，就回到自己房间，蒙头低声痛哭。

1969年春天，中共九大前，不知谁发了个什么鸟指示，物资部的“走资派”全部要被押解到河南干校。行前倒是让父亲回家收拾行装，我和母亲都划不清界线，以我俩对方有病为由请假回家，与父亲团聚几天，然后就是生离死别各奔东西。

这一年北京就只有我和母亲，孤儿寡母两个亲人相依为命。一个24岁的不学习的学生，先后到北京特殊钢厂和北京重型电机厂干重体力劳动，美其名曰“按领袖指示：学工”。同学发牢骚：“现在是猛吃、猛睡、猛干，三猛！”工宣队说首先应该是学习毛泽东思想，让我们批判“三猛”。我说：“三猛非常错误，根本不可能！猛吃没粮票（学生定量30斤）、没钞票（20多岁了白干活还没工资），猛睡没时间，猛干没力气（吃不饱、睡不好）。”工宣队哭笑不得。

母亲，一个患冠心病的老干部，集中在远郊区，住集体宿舍。每周末挤

公交车回家，随身带着纸条，上写："我是某某，患心脏病、若休克，请通知在清华工物系的孩子阎淮。"我们两个"住校生"都盼望每星期六下午回家母子团聚的一天，也期盼回家能看到天南海北在乡下务农的其他四位亲人的来信。我经常安慰母亲："文革中多少个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我们家是：子散妻未离、家破人未亡。知足吧！"星期天晚上，是可恶工宣队规定我们回校的时间。我从家里迎着昏暗的月亮、顶着呼啸的北风，骑车北上清华的20里路，是我心理情绪的变压器；在这30分钟里，我要深埋温柔脆弱的亲情，穿上精神的盔甲、带上坚强的面具，面对以知识分子为敌的工宣队，迎接新一周生理和心理上新的磨难。



1968年冬，工宣队进校。首次戴上毛泽东像章，心情忧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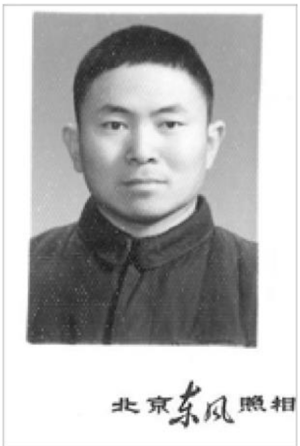
3-18 毕业离校远赴西北

1969年9月3日，广播传出《烈士魂》哀乐，越南领袖胡志明逝世。陈元、宋克荒、刘泽彭和我讨论形势，一致认为：中国的《烈士魂》播出前，文革混乱的局面不会结束，我们应养精蓄锐充实自我，静待天子归西，届时再展身手。他们也劝诫我锋芒"避"露，少惹是非。

回顾工宣队在清华的历史，工宣队的最大功能就是管制和整治知识分子。使我们从整体意义上成为"再教育"、"给出路"、"可改造"的革命

对象。一工宣队头目说："什么时候知识分子的心情舒畅了，就说明我们的工作有了问题。"赤裸裸地道出了工宣队以知识分子为敌的心态。（唐少杰：《一叶知秋》，285页，中文大学出版社，香港，2003年。）不是我喜欢招惹是非，只是我不情愿被别人"心情舒畅"地管制和整治而已！

1970年初，在工厂无偿劳动十个月后，突然被召回学校毕业分配。原因是清华和北大准备招收工农兵学员，要为他们腾出校舍。工宣队实行毛泽东的法家路线：论功行赏、有仇必报、奖惩分明。具体方案是："连级干部云集大连，落后学生发配新（疆）西（藏）兰（州）。"我则连兰州都不如，是火车过兰州再开一天的甘肃武威县，古称"凉州"，其荒凉可想而知。"布尔什维克"们也都没好果子吃：陈元分在湖南新邵县，刘泽彭分在吉林梨树县；宋克荒听造反派赞美林彪江青，气不顺说了不恭之话，被定为反动学生留校审查。我们离校后书信不断、互通情况。1971年春节，北京探亲再聚会，四人交流了通信不便谈的思想。最重要的是陈元通报了九届二中全会的内幕，特别是毛在庐山会议结束时说的"事情没有完"。我们分析了毛泽东与林彪的性格特质和处事方略，都预感还有大事将发生。1971年9月下旬，我在甘肃接到宋克荒北京来信，告知"老虎和爹娘摔死在内蒙外"，在正式传达前得知"九一三事件"。1972年春节，我们四人在北京重点研习林立果的《五七一工程纪要》，认为公布它是毛乱了方寸，有利于民众的觉醒和文革的破产。这是我们70年代初的交往，友谊持续着，政治上的再次交往是80年代初，而80年代末的一场"风波"使我与他们在政治上分道扬镳，只保留着私人情谊。



1970年春大学毕业。

1970年3月，登上西行列车，经过两天两夜只坐不卧的艰苦旅程，奔赴遥远的西北陌生小城。24岁的我，确实想到57年前，一个同样24岁的青年，在同样的春天，同样背井离乡远赴西北。我们同样“一事无成、一文不名、一无所有，但是拥有不可抑止的自信心和深刻炽热的使命感”。（引自《第三帝国的兴亡》）他就是我深恶痛绝的阿道夫。第二感觉有点革命性了：我像冲出牢笼、将在广阔天地自由翱翔的海燕，“在乌云和大海之间，高傲地飞翔，充满着对暴风雨的渴望、愤怒的力量、热情的火焰和胜利的信心。”（俄国高尔基《海燕》）

此后五年，通过艰苦卓绝的“我的奋斗”，在工人、技术员、车间主任、厂长的路线图上，爬到县团级的武威煤矿机械厂的顶层。在全面整顿和回潮的1975年，对口调到北京煤矿机械厂。对着清华园大喊：“我胡汉三又回来了！”

清华文革的四年，我犯过严重错误，也有丰硕收获。文革前，我是一个狂热的极左毛粉；文革初，看到基层的诸多问题，以为是歪嘴小和尚把马列毛的正经念歪；中期，对高层残酷和底层贫困的了解，知道大和尚嘴也歪了；后期，认为马列当年可能是真经，斯大林和毛泽东“跑偏了”，好经也要与时俱进。我们的使命就是拨歪返真、修正旧经，净化党的领导、完善社

会主义，作补天救党派。

文革中，通过深入城乡社会底层和研读先贤哲人经典，树立了平民意识，我成为干部子弟中的异类。维克多•雨果的“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有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成为我的绝对价值观。1986年，中组部的我，到许多省委组织部和党校抨击时弊鼓吹政改。有人指责：“你天天吃党的，日日骂共产党！”我笑答：“你们天天夸党，是日日害党，我是在救党！”1989年，“动乱一暴乱一风波”后，人道主义的我不认同镇“暴”，出走了。9月20日我在《欧洲日报》上写出我的理想社会是：民主政治、自由经济、独立司法、保障人权。一一好像与某党现在的要求雷同，是吗？

这一章的主要内容曾以《一个老红卫兵的回忆与反思》为题，收录在《历史拒绝遗忘一一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孙怒涛主编，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香港，2015年2月。）和以《一个老红卫兵在清华的四年》为题，发表在美国《新史记》杂志，2015年8月的总第26期。两篇皆无稿费，故不算一稿多投，网上疯传则与我无关。

第四章 自我奋斗小有斩获

——煤炭系统十二年（1970～1982年）

第一节 甘肃五年从工人干到厂长

4-1 甘肃武威煤矿机械厂

1970年3月，为“上、管、改大学”的工农兵学员腾地方，领先于全国高校，提前半年分配的清华和北大最后两届（64年和65年入校）的八个毕业生，来到甘肃省武威地区报到。

地区首府——武威县，位于兰州西北600里，黄河的河西走廊南端，古称凉州，是中国旅游标志“铜奔马-马踏飞燕”的出土地。武威是县大城小，当时人口80万（是全国县平均人口的二倍），拥有近百个人民公社，甘肃省最大的农业县。

武威城关镇，城中心称“大十字”，是仅有的两条垂直“大街”的交叉点，四周分布东西南北四个“城关小十字”。全城无红绿灯，大都是土坯平房，亦称“干打垒”，少数“一砖到顶”的砖瓦房就算豪宅了。唯一的大厦是刚落成的二层楼的地区招待所，我们有幸在报到时免费“消受”了一夜。凉州春寒料峭的早春三月，真够凉的！暖气？别想！当地连蜂窝煤都没见过，半夜烧煤坯的炉子熄火了，让服务员加床被子，迷糊到天亮。

次日，在地区革命委员会政治部的人事组，我充满激情、满怀希望地要求到农村插队——反正拿工资吃商品粮，国家既发饭票又送粮票，白给农民干活，可以自由深入地了解中国西北贫困的农村和贫苦的农民——多美的事儿呀！“你一个人去农村，怎么管理？”满怀热情的无理要求，被冷酷无情地合理拒绝。“男生到工厂，女生去学校！”面对组织，我毫无脾气、乖乖地去了县城西北郊的甘肃省武威煤矿机械厂，工厂将我分配到机械加工车间

当工人。煤机厂业务由省煤炭局领导、组织人事关系在地区、厂址在县里。我戏称：与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一样，煤机厂是三级所有、地区为基础。

夏天，厂里开展“深挖五一六分子”和“清理阶级队伍”二合一运动，其实就是整治现行的“造反派”和历史有“问题”的人。“外来的和尚会念经”，我们都是“双无人员”——外地人没有当地的“派性”、年轻人没有历史问题。于是，近几年分来当工人的外地大学生，都上调到厂专案组；我是其中唯一的党员，荣任副组长。其间两件事曾在厂内外引起轰动。

其一，某“摘帽右派”因对文革被批斗不满，历史问题加现行问题，被项目组关押。一个周末的深夜，他在地上打滚，高喊肚子疼。看管的工人说：“假装的，不管他！”住集体宿舍的我得知后，让立即送医院。我说：“真的，快治病救人！假的，回来狠批斗！”因司机都不住在厂里，我和另一个大学生拉“架子车”（一种人力车）送他到十里外的县医院。诊断是胃穿孔，当即手术，免于一死。“北京的大学生救人一命！”顷刻传开。

其二，运动到了秋后算账——“定性结论”阶段。我们北京上海的大学生，都是在被毛泽东骂过的“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的名牌大学，“经腥风血雨、见残酷世面”的主儿。认为这几个“小不拉子”“老运动员”的审查对象都是“人民内部矛盾”。厂党委书记兼项目组长，针对问题最严重的人，说：“他一贯讲落后话，对历次运动不满；‘量变到质变’，已是敌我矛盾。”我反驳：“一万句落后话，还是落后群众。他没说一句反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话，就不能算敌人!”——按文革时的恶法《公安六条》，反毛、林是反革命。

次日，厂部决定：落实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充实车间技术力量，项目组的大学生全部回车间任技术员。清除了大学生“臭老九”——文革中的敌人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和叛徒、特务、走

资派，共八类人员，知识分子被戏列为第九类。项目组只剩下纯粹工人阶级，最后一致意见，确定了三个人是属于“敌我矛盾”的敌人。两年后，此三人都理所当然地被“改正”了。

武威地区及所属七个县，只有我们煤机厂的大学生因祸得福，全都由工人升级为干部，令其他单位还在干苦力的“老九”们羡慕嫉妒但没有恨。

回到工人中间，我如鱼得水。阿基米得名言：“给我一个支点，就可以撬起地球。”我的支点就是“自由民”。工人宣传队统治的清华只有奴隶主和奴隶，无品投靠的奴才也是奴隶。现在我这个自由民，外在有利条件：正式党员；不利因素：父亲仍是走资派。二者抵消归零，就靠我内在综合实力：苦干加巧干，与工人打成一片。苦干，加班加点不叫苦，脏活累活抢着干；仗着年轻力壮，百斤水泥袋，左右臂各夹一个行走自如。巧干，搞点“技术革新”，减轻工人劳动强度。工人知恩图报，他们真心感谢、对我特好。文革以来，我从未有过这样的的轻松自如和心情舒畅。

1971年车间党支部改选，在厂项目组的历史善行和近期的优异表演，令我顺理成章地被选为支部委员，参与车间管理。这是首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未被官方提名，被普通党员群众经由真正的党内民主选举而上位的。厂党委书记大人大量、不计前嫌，也不敢违背民意（还要靠工人干活完成计划），顺水推舟顺利批准了机加工党支部成员。入党六年后，首次有了党的职务，此后党内18年，一直保有党职，直到难忘的1989。

1972年，更上一层楼，升任车间副主任，算是中层科级领导，在全厂中层干部会上有了发言权，对“厂务活动”可以指手画脚、品头论足啦。中学有篇英语课文：西方记者到某岛国采访，国王召集大会，宣布一项决定，让同意者吹金喇叭显示民主，谁买得起金喇叭？我终于拥有金喇叭啦！我的金喇叭当然吹出了独特的旋律。

1973年，在全国各地大力发展五小工业（小钢铁、小机械、小化肥、小

煤矿、小水泥）的形势下，甘肃省的地级和县级小煤矿遍地开花、蓬勃发展。省煤炭局直属、地区直管的武威煤机厂，更被重视。为加强领导，文革前的地区计委主任王化成调来任书记兼厂长。王1980年代中期任张掖地委书记，80年代后期拟提任副省长，突患心脏病，未能晋升。他欣赏我，“转正”我为车间主任。机械工厂的工种分为三六九等，工人编顺口溜：“车钳铣（机加工车间），没法比；冲铆焊（铆焊和锻造车间），凑合干，要翻砂（铸造车间）。就回家。”机加工是技术含量最高、最重要的车间。由于我厂主要生产中小型机械，不单独设立装配车间，只在机加工车间设立装配工段，因此机加工也是最后保证成品质量的最关键的车间。



作者1970～1975年在这甘肃武威煤矿机械厂工作。

74年初，王厂长向省煤炭局和地区党委推荐我任副厂长，几经周折，他挟持民意、不屈不挠。74年秋，不满29周岁的我当了副厂长，据说是全省最年轻的知识分子县团级干部。

4-2 我的血汗奋斗史

我轻描淡写一路晋升。其实在厂矿混过的人都清楚：即使在文革中，在“上层建筑”的教育院校，靠耍嘴皮子的“讲用毛选”和“大批判”吃香；

在“经济基础”的生产厂矿，是绝对吃不开的。要吃大苦耐大劳，流汗甚至流血；才能解决“生存”和“发展”，这对于任何个人、团体乃至国家，何时何地都要面临的两个重大的普世难题。

我任车间副主任时，吊车工下降“吊物”时操作失误，将我扶着的铁柱砸在我双脚上。顿时流血不止，我疼晕过去。工人们开车送我去专治外伤的野战医院，在山沟里迷路，看得见医院就是开不过去。（可能为了战时迷惑敌人，平时把友人也转晕了！）工人们轮流背我，在羊肠小路上攀爬。军医听说是领导阶级的工人背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大学生，不敢相信、感慨万千。我也对得起工人，后来拄着双拐指挥生产。工人更对得起我，周末要开厂长小车送我去未婚妻处，我不愿特殊化、不答应；他们就早晨用自行车驮我去，晚上再接回。这算鱼水情吗？

吃苦耐劳对我是小菜一碟，重大难题是机械技术。对六年制清华来说，只学习了两年的我，既不是毕业、也不算肄业，只能按辍学论处。清华是两年基础课、两年专业基础课、两年专业课。我只学了核物理的基础课：高等数学、普通物理、几大力学等。对机械工厂有用的只有机械制图。技术科室分为设计科和工艺科，闻所未闻；机械零件还有公差与配合，根本不懂。

挑战首先来自技术员和工程师们。文革前的老大学生，初次给你个下马威，看我虚心好学不耻上问，三四十岁的中年人，也不太欺负青年后生。

最难缠的是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66届的胡某，上海“洋阿拉”历来看不起貌似北方乡村的北京佬，交大老二更不服气清华老大——工科大学排行榜上，据说第三是哈尔滨工业大学。这种地域和门第的“高见”，我可以不理睬。但是机械专业的毕业生，时时处处刁难二年级就辍学的核物理学徒，就要严阵以待了。我到处收集机械书籍：向老技术员借，请在北京的留校不分配的“反动学生”宋克荒买了寄来。每晚看书到半夜，周末节日全天学习。遵循林彪副统帅对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要求：“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急用

先学，立竿见影。”

自然科学的“机械”一词，在社会领域和生活领域常有简单教条之意。其实，机械学也真“机械”，看了就知、学了就会，没有抽象思维、绝无难以理解。进厂一年，我就是称职的机械技术员，两年就胜任机加工车间的领导了。胡交大（工人称我们都是姓氏加学校，如有个小个子四川人张北大，就常被叫“长不大”。）对我“阎清大”也另眼相看，背后说：“清华的就是与众不同！”其实我是花拳绣腿、临时抱佛脚，“胡交大”才是真才实学、功底深厚，只是有点沪人的小通病。我任副厂长后，不计前嫌力排众议，提他为车间副主任。“同是天涯沦落人，穷不帮穷谁照应！”谁让俺们都是背井离乡、流落它乡的外地大学生呢！？

我的另一弱项是机床操作。1966年5月在清华按计划三个月的金工实习，只进行了一个月，就被文革腰斩。技术员只懂理论还可以，车间主任就不灵光了。七八级老工人，认真干活，父辈的年龄，从不欺负儿辈的领导。“五八小二”就不同了，1958年进厂，十年前定为二级工，年富力强技术精湛，是生产的主力。当时30岁出头，上有老下有小，40元的工资，负担沉重、牢骚满腹。我当工人时，“小二们”“哼哼”教导：“不打勤的、不打懒的，专打不长眼的！”又进一步启发我：“某人闯红灯。警察：没看见红灯吗？司机：没看见您！”告诫我：不怕偷懒，就怕领导发现。他们还说：“南京到北京，慢走也算工。到库房或其它车间，不用像你平时那样快步如飞。”（其间必然性学知识和有色段子充斥不断，少儿不宜，故以下省略若干字。）那些年我在京城内外工厂八年，没有看到马列主义标准定义的：大公无私和铁的纪律、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工人阶级；只见识“爱家如厂”的工人，电工家里电工用具齐全，钳工宿舍五金工具完备。

我当领导了，“小二们”不刁难我；但经常说，某个零件给的工时不够，要求增加时间，才好多休息；或者机床有毛病、干不快，因而磨洋工。

机床主要是“车、磨、铣、刨、镗、钻”六大类。我当副主任后，向各种机床的老师傅虚心学习、认真操练。不久，除几个精密机床只许专人操作外，其他十八般兵器，样样能摆弄，不敢说精通，至少能稀松应对了。谁再说工时太少，我干给你看；谁藉口机床有病，我摆弄运转了。没人敢“炸刺儿”了，否则扣工资。

当时没有奖金，又是计时工资，当头儿的除了吃苦在前的模范作用外，还必须恩威并施。前面讲了扣工资的“大棒”，下面说“胡萝卜”。扣了一人工资，大家都老实乖巧了，他也好好干活了。所扣之钱已入国库无法退还，下月生活困难补助，多给点，扯平！不忙时，主动对“听话和出活”的勤奋工人说：“你爱人（或孩子）身体不好，请两天带薪事假，回家照顾一下吧！”（头儿就这点特权）我不吸烟，但总备有好烟；有的活儿紧，下道工序急等着；递上一包：“师傅加个班，我给您打下手；困了吸支烟，明天休半天。”搞定！生产骨干家里的婚丧嫁娶、红白喜事，我是：人必到、礼必重。工人议论：“人心都是肉长的，阎头儿这么看重咱，月底年底，突击完成计划时，不给他卖命，是孙子！”

于是我就众望所归地、一步一个脚印、一年一个台阶地向上爬：1970年半年工人、半年技术员，1971年当选支部委员，1972年升任车间副主任，1973年转正成车间主任，1974年提拔为副厂长。提副厂长时，阻力在上面，当时选拔干部的三项标准是德、才、资。地委常委会嫌我资历太浅；但是厂内一片拥护声。王厂长挟持下意、力排上意，使我终成正果。

我性格外向、热情好客，在武威城关镇的家，早就是整个地区各县青年“臭老九”的“驻地区首府办事处”。我爬到县团级、成为正式的“领导干部”后，我温馨的家又成了“老九上访站”。当时领导干部会议特多，传达中央文件和集体政治学习等等，会议期间我经常对某县太爷说，某某是我同学或同学的朋友（大学生总能扯上真假关系），看我面子，别整他啦！我的

理念——大的政治气候咱不能左右，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一定要营造和谐宜人的小气候。

4-3 欲调离进京江泽民协助

1970年我分配到甘肃，此后每年春节回京。1971年探亲假，全家团聚。1972年携未婚妻回京结婚后，没了探亲假。1973年以加急电报“母病重速归”为由，请了无薪事假。1974年“走资派”父亲，在毛主席倡导的“五七干校”，经过几年林彪之子准确定义的“变相劳改”（《五七一工程纪要》用语）；在邓小平复出后，变为“已经改悔的走资派”。四十年代，父亲的共产党“解放”了人民群众；七十年代，人民群众又“解放”了共产党的父亲。真是：风水轮回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他回首都等待分配工作，我以“三年未见父亲”为由，又请事假回京。

1974年冬，父亲得知北京煤矿机械厂有进京指标。传统采煤是“四块石头夹一块肉”，矿工很危险。中国决定引进国际先进的“液压支架”，使工人能在“钢架子”里安全作业。煤炭部唯一直属的北京煤机厂担此重任，需从全国抽调一批技术骨干和管理干部。父亲通过关系疏通（就是“走后门”），此厂同意商调我这个既懂技术又会管理的“清华牌”，让我尽快去参加象征性的面试。连续两年，我已用完以“母亲和父亲”的理由，请事假回京。“事不到三”，我也再无“长辈资源”可利用；身为新科副厂长，当然不敢以调动面试的真实理由请假——那不是找骂嘛！

关键时刻见真情，江泽民立即施以援手。1954¯1956年父亲与江在长春汽车厂共事时，结下相当的友情。

1975年初，一机部外事局长江泽民帮我搞了一台稀缺的精密机床，全厂大喜。我以办手续提货为由，出差北京。江说，“这五年你在甘肃靠自己，干的很好。我不为你批设备，那是帮倒忙。现在给你台大机床，目前你可来京面试，将来真离开时可减少阻力。”我在北京公私兼顾，办好了机床的无

价调拨手续，当然也通过了北京煤机厂的调动面试。

春节后，精密机床和人事商调函几乎与我同时到达武威。当年美国在东北亚小国投下两颗原子弹，现在北京向这座西北小城也投了两颗“原子弹”。其一，这种机床在武威地区和甘肃省煤炭系统都没有，许多外厂工程技术人员来厂见识；其二，刚提拔半年的最年轻的县团级干部要调走，还是“夫妻双双把京归”。

我首先说服了顶头上司王化成厂长。极聪明的他说：“我在厂里待不长，原想让你接班。你这么多年没为厂搞设备，提了副厂长反而弄来了，我就预料大事不好。你不是靠设备升官的主儿，肯定是想用机床为回京开道，但没料到这么快。我不卡你！”我感谢他过去的栽培和现在的放行，并希望他帮助说服疏通地区领导。

周末，王厂长陪我去地委书记、军分区陈司令家。我放下从北京友谊商店托人买的稀缺食品，先感谢司令的培养提拔，又痛说家史：“父母同您一样，早年革命、浑身是病；弟妹都在农村插队，只有我是国家职工又有城镇户口，能调北京回照顾二老。”王厂长婉转地讲了两层意思：“一、武威是小阎的第二故乡，现在搞来大设备、送个大礼，将来地区有困难，他不会袖手旁观。二、他爹能把小两口一下子调进北京，能量不小。但他们直接找我们，是重视咱。若将来再通过省上压下来，更被动。”能在军队当司令员、在地方“支左”到文革后期还不垮台的，都不傻！陈司令豪爽地同意放我，说等地委常委会讨论后，就可办理调动手续。我诚挚地感谢他，陈司令说：“你最应该感谢他王化成！但礼品带回！”这辈子唯一的送礼，被拒绝。

1975年6月，离开奋斗五年的甘肃武威，这是结束18年学校生涯，登上社会生涯的第一个戏台。都说人生如戏，就是在这里开始了我的“游戏人生”。奉献了五年青春，我取得了有形和无形双重的巨大收获，用时髦的话说：捞到事业上“第一桶金”。为了永久的纪念，我把从未到过此地的独生

子命名为“威”。

能调回北京，有个人的成就，但主要还是靠老爸的关系。2010年，毕业40年清华同班同学聚会，看到有江苏同学仍在当年分配的西南小城生活，愧疚之情油然而生。他们能考进清华，没有输在起跑在线；但在人生马拉松的许多拐点处，因为没有“官系”，处处受阻、时时落后。

第二节 北京煤机厂的杰出表现

4-4 大工厂大车间的副主任

1975年7月，我们到北京煤机厂报到。三四千人的现代化大型机械厂，厂区加上家属一两万人，拥有从幼儿园到职工大学的全套教育体系，具备厂医院、招待所和厂卫队、从服务到专政的各种设施。它坐落在北京西南50公里的房山县城边，许多职工的“生活基地”在北京城里，工厂每两周休息两天，由火车专列从厂内直达北京。当时该厂是县处级，改革后升格为地局级。

我到五六百人的机械加工车间任副主任，妻子去厂办大学教书。厂长：“委屈你了。”我答：“五六百人的大车间，许多大型精密机床都没见过，还不胜任呢。况且车间主任是文革前煤炭部的老科长，我要珍惜向老同志学习的好机会。”上任机加工车间，我像五年前刚到甘肃工厂一样：一切归零，从头干起。很快熟悉情况、胜任工作，建立威信。

1976年3月，为了一季度“开门红”，加班加点大干苦干，吊车忙不过来，急需加工的零件就手搬肩扛。临近半夜连续上两个班、疲惫不堪的我、弯腰拿起百斤零件，送到机床旁。（事后得知：应蹲下拿重物，不能弯腰。）当时只觉得腰部响了一下，没在意。次日晨，腰疼起不了床，会武术的师傅说是“筋出槽”了，按摩一会，舒服多了。我坚持上班，但第三天又不行了，厂医院也毫无办法。厂长让我休长假，到城里遍访名医。合同的友

谊医院诊断为腰骨筋膜炎，医嘱静养。骨科权威的积水潭医院照相后，说是第四腰椎向右偏移，须复位固定。我自费到东郊找著名的民间高手“双桥老太”，双手推拿复位；也只能解一时之痛，稍微用力就又错位。综合结论是：腰肌严重损伤，需要长期养护。

4月清明前后，我利用休工伤假天天到天安门添乱，4日星期天还遇到许多同事。5日见到整个广场的祭奠物品一扫而光，甚是气愤，顿时添乱变成捣乱。傍晚听到市委书记吴德的威胁广播，吓得立刻溜之大吉。当时躲过一劫，事后失去“四五英雄”光环。得失综合算计，还是值得，若腰再被“首都工人民兵”的“棒子队”重伤，可能落下终身残疾，后半生只能到邓太子的残联效力，七彩人生顿时褪色成黑白默片。

5月，我穿着特制的钢条背心上班。清查“天安门事件”在工厂完全是走过场，清明节大家都去广场，不是事儿；要害的次日没遇到熟人，傻瓜才坦白呢！“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后，大家本来就不顺；“四五事件”后，工人更是“出勤不出力、出力不出工、出工不出活”；我们干部更是“做一天和尚、乱撞一天钟”。

7月6日，朱德辞世。1976年先后三位领袖去世，我的感受分别是周恩来中性、朱德悲痛、毛泽东窃喜。我介入“四五事件”，只是对“文革五人组”（毛加四人帮）压低周恩来后事的规格，发泄不满而已。“红军之父”朱德建国后27年受到种种不公平待遇，终于走完传奇跌宕的一生。悲伤之余，也为他不再屈辱而释然。不该走的都走了，我心灰意冷。5月厂长曾劝我去疗养，怕被说“娇气”，我婉拒。现在心绪欠佳、情绪低沉，更觉腰痛，遂同意疗养、和尚还俗不敲钟了。7月28日唐山地震波及北京，工厂停产，我更心安理得、弃厂而走。

1976年8至10月，在京北小汤山疗养院享受三个月一期的治疗休养，通过各种物理仪器对腰部的治疗和温热矿泉对腰部的保养；以及在医生指导下，

平躺向前的仰卧起坐及平卧四肢向上的“燕儿飞”锻炼；腰病基本痊愈。9月9日毛泽东去世，12日星期天我从疗养院请假与陈元、宋克荒聚会庆祝，研讨形势。一致认为“好消息、坏消息，都比没消息强”，停滞的时代已结束，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即将展现。一个月后，“双十节”恰逢周日，陈元电话召我回城，在西城北长街陈府里，通报了逮捕“四人帮”消息。我们真是“漫卷诗书喜欲狂”！——尽管“文革五人组”是合法干坏事，诱捕“四人帮”的“政治变故”（简称政变）却是非法干好事。当时不懂“程序正义重于实质正义”，现在认同了，但还是“双重标准”——对暴政只能暴力！诱捕四人帮和未来任何形式推翻朝鲜金氏王朝都是历史的进步。“青春作伴好还乡”，我立即放弃剩余的20天疗养，还厂销假，要求工作。

4-5 优秀的专职机关书记

1976年10月，我回到北京煤机厂，被任命为生产党支部书记。工厂的机关分两部分，政治处下的党办、组织科、宣传科、干部科和保卫科约50名政工干部组成政工党支部，由政治处主任兼支部书记。其它所有的十几个行政业务科室的二百多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基本都是知识分子）组成生产党支部，原书记是老中专生，他技术可以、人头又熟，前几年文革高压下，还镇得住。近两年，从全国调进诸多技术精英，政治又松动了，大学生更不服中专生，生产支部问题不断、成了“老大难”。现在四人帮被抓，厂领导就想到我这个曾反对过中央文革、又当过厂长的“清华牌”。按当时作官的“德、才、资（格）”三标准，我算全凑合。党委书记兼厂长说：“这既是委以政治重任，又是照顾你的身体，调离车间不致腰病复发。”

领导即统治，其方式不外乎霸道与王道，其工具分别为大棒与胡萝卜。我的人道主义价值观，决定了我的领导方式只能是运用胡萝卜的王道，其关键是领导和群众的双重信任。对我的任命已证明了上司的偏爱，以真诚取得下属的信服是我的当务之急。

就职演说中，我对200多“属员”宣称：“由于组织纪律，我不可能说出全部真话；但是可以保证：我说出的，绝对全部是真话！我的历史是一本打开的书，任人翻阅；我的现实是不设防的城池，自由进出。——我办公室的房门随时向你们敞开，任何困难都可向我诉苦，我决不量力而行，而是尽力而为，帮你排忧解难。党委大书记对全厂是全面领导，我这个小书记对大家的领导就是全面服务。‘为您服务’（当时电视台的热门节目）是我唯一的工作栏目。”此后一个月中，几十人向我倾诉了各式各样、五花八门的具体困难。针对一些普遍性的问题，我采取“双管齐下”：讲党课的务虚和解决困难的务实。例如——

针对“知识分子入党难”，我讲了“阶级路线”的党课。我说：“党的阶级路线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指的是成分，不是出身，但执行中却是只看出身。我们的成分都一样，过去是学生，现在是干部。我们出身可能不同，但解放快30年了，出身的影响很小了，没有意义。要刨祖坟，就到西边十里的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我们的祖先都埋在那里！我的阶级路线就是重在现实表现，只要不犯法、不拥护‘四人帮’，就是没有政治问题；努力工作就是‘表现好’，就能入党！”我还说：“人们常说‘共产党是门小院子大，太难进。’就是有些党员像挤公交车，自己上去了，把着门不让别人上。”扫清了思想障碍，一年半我就发展了八九个技术员入党，一半是“出身不好”者。

针对“个人考虑私心重”，我讲了“公私兼顾”的党课。我说：“过去常说‘公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不对，恰恰相反！大到夫妻两地分居，放你走，厂里少个技术骨干、可以再找，小事！你们家没了丈夫和父亲，不能乱找，大事！我想方设法调你们老婆进京，若本事不够，就放你们回家乡。小到爱人生病，你一天不上班，小事，工厂垮不了。你不陪爱人看病，耽误了、病情加重，大事，你家就会垮。”在我的

疏通下，通过干部科和劳资科，解决了好几个家庭团聚。

我是64级的文革前“末代大学生”，65级的大学生全厂很少、也调不到机关科室，因此我几乎是生产支部200多人中最年轻的干部，但却是最大的“官”。由阎主任变成阎书记，在车间管理工人靠恩威并施，阎“主任”当之无愧。但对知识分子只恩不威，我以小卖老，只许他们叫“老阎”，禁止称“书记”，否则扣刚刚恢复的奖金。靠讲大实话、办实在事，迅速建立威信，扭转局面；上任三个月后，我们被评为1976年度全厂优秀党支部。

1977年10月，依据国务院89号文件，全国普调工资，40%的职工根据“贡献”可提升一级工资。这是1958年普调工资后，近20年首次大范围调资，下次调资还不知是猴年马月。几元钱的一级工资让人们争得从面红耳赤到死去活来，全国出现几位数的自杀和他杀事件。我支部有百名升级指标，经过群众评议和科室推荐，得出全员50%的120人初选名单。我和二十几位科长主任都属“贡献较大”应调资之列。“党领导一切”，党支部要决定最后人选。其他六个支委都是重要的科长兼任，他们只为自己的科室争名额、当好人，（我若是科长也必如此！）艰巨的协调工作、砍下最后20个“冤死鬼”的坏人，非书记我莫属。犹豫再三，我决定自己放弃升级。以求近期尽快结束调资，远期图个无私名声。果然求仁得仁，我支部的调资工作有惊无险，圆满顺利提前完成，年底又评为优秀支部。我并不高尚，名利不可兼得时，常弃实利而求虚名；科长们评价：“老阎太爱惜自己的羽毛啦！”。

调工资还有一段小插曲。机加工车间一位工人出身的车间副主任，原来对大学生技术员极不尊重。我任副主任后替技术员撑腰，他不得不有所收敛。但他对我很不满，背后说我坏话。他妻子是设计科描图员，这次调工资归我管，她诚惶诚恐。我不计前嫌，认为她符合条件，照调不误，就像在甘肃提升整过我的上海人为车间副主任一样。设计科长不解，我说我是：“任劳不任怨、记恩不记仇、图名不图利。”前些年明镜网的朋友为我开设博客

让我写个告白，我即提到这三句话，他们起哄说“图名不图利”“太俗”！抹去。其实，我就是这么一个大俗人！

1978年1月，北京煤机厂的顶头上级煤炭工业部机械制造局，由汪长泽局长带领十余人的工作组进驻我厂。汪局文革前是张霖之部长的秘书，以雷厉风行和独断专行著称。进厂首天的大会上，汪讲两点：“一、去年你们抓革命取得很大成绩，今年我来不抓革命只促生产。全国煤矿安全事故频发，急需液压支架。为了矿工的安全，我求你们啦！二、煤炭部在京只有你们一个直属厂矿，各司局都想从贵厂挖人。我宣布，今后部里再不许调走一人。”过去只闻汪大名，今日一见，果然不凡。一周后，汪局在工厂的百余位中层干部中选出五人，参加工作组，我这个清华牌的“双肩挑”干部（既懂政治、又有技术）名列其中，理所当然。我一如既往认真工作，哪知汪另有“阴谋”。

两个月后，汪局对我说：“抽你们来工作组，也是为了考察。现在认为你适合到部里工作。”我惊讶：“不是不许调人到部里吗？”汪：“那是不许别的司局调，他们挖煤机厂的墙角；你到制造局，对局里和厂里都有利。”我提条件：“一、同时调妻子进部，二、我与她关系不太好，把她调到其它局。”汪局痛快：“没问题！”

第三节 大煤炭部不安分的小干部

4-6 机械制造局不让我考研

1978年4月，我到煤炭部机械制造局（简称制造局）报到，妻子被照顾安置在生产司搞统计。每个工业部都有制造局，它不是最重要的。在计划经济和产量挂帅时，重要的是计划司和生产司。但制造局最牛，对外：生产靠设备保障；对内：局里技术力量强、工程师多。如我局，局长横，局员强，“清华牌”好几位。制造局直接具体管理煤炭部在全国各地直属的33个煤机

厂的计划、生产和技术，宏观领导指导100多个非直属煤机厂的工作。因此局内除办公室，还设计划、生产和技术三个处。我所在的技术处，年初不压计划指标，年底不催生产进度，平时组织厂际技术合作，每年发放许多技术改造费用，因此格外受工厂欢迎。

在国务院的部委，部长配专车，局长公私事务可叫小车，处以下自行车的干活；部局长吃小灶，处以下大食堂。在北京没人把我当回事儿，到外地厂矿，就成了钦差大臣。他们不说北京来人，称“中央（煤炭部）来人啦！”

我第一次下厂是到郑州煤机厂，人生地不熟，局办公室通知该厂接站，技术副厂长亲自带小车来接。工作任务完成，我发现距煤机厂不远就有直达火车站的公交车，随即要求不送站，厂长执意要送。我生气：“我只不过是偶然侥幸在部里当差了。像我这样的大学生，在贵厂因为各种‘问题’，还有许多当工人呢。您省点时间，给他们落实政策吧！”次日晨，我提着旅行包走出厂招待所，发现厂长坐在小车里等我。我视而不见，径直走出厂门走向公车站，小车紧随我后。我上公交车前，向小车中的厂长作揖告别。很快，部属各厂都传开“阎工拒车事件”。汪局不置褒贬地来一句：“小阎，真有你的！”我只能报以“嘿嘿”的傻笑。

继1977年恢复高考，1978年招收研究生。“布尔什维克”各有考虑：宋克荒甩掉“反动学生”帽子调到科学院自动化所，稳定压倒一切；刘泽彭从吉林山沟调到北京七机部，任宋任穷部长秘书，不能忘恩负义；只有陈元和我蠢蠢欲动。陈准备考清华研究生，我拟学技术经济，我们相互鼓励支持、交换复习数据。我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准备。午休时，别人午睡或打球打牌，我看书。晚上和节假日我学习，就像八年前，刚进工厂刻苦学习机械知识那样。我首先复习丢下了12年的英语，一个月通过电视大学单科结业考试。然后复习大学数学和物理课程，最后学习经济学新知识。

78年夏天，我正式报名社科院技术经济研究所，报名表的最后一栏是“单位意见”，即单位领导的同意意见。我对汪局好话说尽（对下级讲道理，对上司讲利害）：“我考前几个月，认真努力工作，还可连续出差，绝不休国家规定的‘复习假’；三年学成，保证回煤炭部报效制造局。”汪局：“我现在正需要用你，谁管三年后，不行！”我得喜讯：干部司宋司长曾是父亲在东北的老部下。我总结：“高干子弟靠权力，中干子弟靠关系，平民子弟靠送礼。”我在煤炭部已是小有名气的青年才俊，不用再麻烦老爹，自己径直去干部司。宋司：“考研是好事，我找汪局谈。”数日后，宋司回话：“你是制造局重点培养对象，汪局为调你来部，失信于北京煤机厂；为安排你爱人，到各司局求人。他坚决不放你，说再有出国考察先考虑你。代问令尊好，这事帮不了！”我答：“感谢宋叔叔，我静候汪局画的出国大饼！”我彻底死心了，八小时内好好干，业余时间好好玩。中午恢复午睡，下班就打乒乓球，晚上假日文体演出尽情欣赏。

读书人当然不能忘了读书，机关业务需要熟悉，不必钻研，我看了许多闲书。部图书馆的许多社科期刊我是唯一忠实的读者。后来精简办公经费，图书管理员找我，我才知道：有几本杂志只有我一人借阅，不订了。1979年《辞海》正式公开出版，我立刻预订、翘首以待。1965年内部出版两卷本《辞海》，我在清华图书馆看到后爱不释手，是我文革中浏览群书的重要助手。1972年见到揭发林彪：《辞海》不离手，在许多词条旁留下批语，书中夹了许多小字条。当时就想：“英雄和草民所见略同！”新华书店电话到办公室让我去取书时，接电话的同事惊奇：“你竟用小半个月工资买一本书？”取书时，店员问：“发票开哪里？”答“不要发票！”店员吃惊：周围煤炭部、化工部、林业部、劳动部等七八个部委，机关买了不少，还没有私人买的！

4-7 赴瑞典德国考察

1979年秋，早已忘却的馅饼真砸在我头上，让我出国考察啦！汪局宁可失信几千人的大厂（调走我夫妻），不失信于我一个小跟班。够意思！瑞典的岩石掘进机世界第一，我国拟购置几台，“山寨克隆”。德国建井技术世界领先，我们也顺道参观。考察组由煤炭科学院建井所所长和该所的工程师，以及将来生产这种掘进机的浙江衢州煤机厂的技术科长组成，我的身份是煤炭部负责采购的供应局工程师，没有具体任务。后来得知：是汪局为我抢来的名额，说是便于领导衢州厂。掘进机一点不懂，我能领导老工程师科长？我是考察组中最年轻的，也是此前煤炭部出国考察者最年轻的。我领汪局的情！


Kina satsar på sin kolindustri
Hägglunds gruvmaskiner med i bilden

Svampkurserna populära i år

1979年9月，瑞典报纸整版报道中国煤炭部代表团考察瑞典，右上照片中右二系本书作者，左下照片左二为作者。

行前在部外事局进行外事纪律教育，教材是外交部统一编写的，前言称“尽管国内的主要任务已由阶级斗争转为经济建设，但是国际间的阶级斗争仍然非常激烈，应保持高度警惕。”其中诸多禁令：不许这个、注意那个。自由散漫的我，印象最深的是：外事局长特别强调“不许一个人外出的二人同行制”，他说：“你一人出去，没发生任何事情；将来有人反映或怀疑你，你说得清楚吗？”除了国家级的“国际清规”，煤炭部的“外事戒律”

只有一条："百万吨死亡率"绝对保密，即我国每生产一百万吨煤炭平均死亡的工人数字，千万不能泄露。制造局不管煤炭生产，我只知道煤矿经常事故死人，但对"死亡率"毫无印象。外事局长一语中的："西方所有国家的'死亡率'加起来也没有我国多！"——可悲！30多年过去了，我们的GDP世界第二，但"死亡率"仍居全球之冠。可见，金钱和设备不能解决一切，以人为本才是重中之重！

九月在瑞典和德国一个月，一周考察工作5天，旅游观光2天，真羡慕嫉妒"双休日制度"。我感慨："中国猴年马月才能享受？"组长断言："下下世纪吧！"（没想到六年后就实行了！据说与申请加入世贸有关。）第一个周末没留神，所有的大小商店都关门，想买点水果和日用品都无处可去，有点招人恨。像改革开放初期、首次出国的所有国人一样，现代化国家所有的先进事物都使我大开眼界。回国后，对好奇的亲友喋喋不休地进行"反动"宣传。上世纪许多名人的回忆录，对初次出国的深刻震撼有详尽描述，我不再絮叨，只讲对几件小物件的感受。可口可乐，世界上竟有这等美妙的呛鼻甜水！（现在倒贴钱，也不喝。）信用卡，一张小纸片可抵千万现金，真神奇！我这个考察组的出纳，怀揣几万现金，提心吊胆万里行，真可怜！回国写考察报告时，为了避免"崇洋媚外"，我们绞尽脑汁找寻资本主义的黑暗。终于在两国各想出一条：瑞典社民党已执政40年，全国每年有薪休假4周，他们争取连任，许诺今后休假5周。——把人养懒了，工人阶级贵族化了。德国人到银行办事，不锁自行车，车上根本没有锁；没人偷车，但有人抢银行。——无小偷有大盗，还是中国好，只偷自行车不抢银行，个人倒点霉、但国家没损失。

在中国，机关越高级，干部权力越大、责任越小、工作越轻松。机关工作一年生、两年熟、三年成专家。我不需要像在基层工厂、担任基层领导那样：刻苦钻研技术、辛苦拼命工作。到煤炭部一年，完成一个周期循环，所

有程序实践一遍，业务就熟悉了。能在文革前混进清华、能在基层混个小头头，这智商和情商在国务院机关绰绰有余。研究生没希望了，局长也履约派你出洋考察了，就该干点成绩、出点彩了。文革后，企业全面整顿。我建议制造局编制《企业整顿验收细则》，并亲自撰写“技术管理部分”，推动了全国煤机厂的企业整顿工作，得到煤炭部的表彰。根据地方煤机厂希望加强技术情报的交流，我重点抓起这项工作。“使全国近二百家工厂的煤机情报体系，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建立系统、壮大队伍，活跃工作、出版刊物；把情报工作与科研攻关、技术交流、学术活动融为一体。”获得上下一致好评，被选为1980年煤炭系统情报工作优秀单位。上面的套话就是我代表制造局在颁奖大会的“获奖感言”。

第四节 煤炭部副部长的刺头秘书

4-8 我是机要秘书，不管部长生活

1981年初，基建局长刘辉升任煤炭工业部副部长，分管煤矿基建和机械制造。刘不熟悉机械，需要懂制造的秘书，通过调查相中我——制造局唯一的年轻处级工程师。汪局希望有制造局的人在部长身边潜伏卧底，也极力推荐我、怂恿我（部长秘书、考研究生，二者皆为放人离局，利害迥然，不言而喻。）毕业十年，我从未在任何岗位超过两年。现在制造局两年，工作驾轻就熟得心应手，已无挑战性，也想挪挪窝。部局处、你我他，三级的企图一致，刘约我面谈，我说：“只干机要秘书分内之事。”他同意，成交！中国官场（军队除外），副职在称呼上，不带副字。我下文也随俗。

文革后，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都官复原职，文革前历次运动被搞掉的中共部级以下官员全部平反归位，当时称为“接长板凳”。被一二代核心亲手干掉的超高级领袖例外，如高岗、粟裕等。因此，煤炭部部长多达18位，秘书也数目相同。1982年“机构改革”后部长一正四副，60岁以上副部长只

留刘辉一人过渡一段。秘书们每周六下午政治学习，处级秘书把“省军级”的文件都看过了，“县团级”的文件还有啥学头？就剩下侃大山啦。部长秘书个个“笔杆子”、人人“演说家”，都是“人尖子”，谁服谁呀？进入“秘书帮”不久，我就以既敢说又能说而“显山露水”了。参加学习的秘书都愿意听我侃，随部长出差的人，回来就问：“老阎上次又有什么奇谈怪论？”我说：“你们假大空、低水平的套话听多了，我讲点稍具水平、真实新鲜的就稀罕珍贵了，话也是物以稀为贵嘛！”林军在我离开后，继任“秘书帮”首席发言人，新世纪当选为中国侨联主席。



1982年4月，随煤炭部刘辉副部长（左三）访问澳大利亚，在悉尼合影，左一作者。

从此我的称呼，由我喜欢的“阎工”变为讨厌的“阎秘书”，但是秘书在部里却是个人物。同级的处长对我客气了，局长过去训我像训孙子，现在我面前他像孙子了。都说“官大一级压死人”，殊不知大官的秘书也能压死人呀！一般的秘书在部里人五人六神气十足，到首长家里就像个长工，换煤气罐、买粮食等粗重话都由司机和你包了。但也有好处，部长不用车时，就是你的了，除了郊区远游，也可就近自家换煤气罐和买粮食。

由于“只干机要秘书”之约法一章，我免去所有“长工”的差事，几乎没去过部长家。我也从不用部长专车，即使部里隔三差五地分东西，我也不

搭部长的顺风车，而用自行车驮回家。一次随部长出差下矿，同行的基建局长火急火燎地跑到我房间告诉我，“部长自己洗衣服哪！”“我又不是生活秘书，我的衣服还让爱人洗呢（吹牛）！你愿意劳动锻炼，去帮部长洗，顺便把我的也洗了。”局长与我烂熟：“去你他妈的！”部长爱月季花，每次离开煤矿前都到花房挑几盆。标价一元，对方只收成本5角。我管钱，坚持交一元，要收据。部长不管钱、不算钱，得了好花就高兴。同样废矿井里产的黑白木耳，我和部长都用职工价购买，价格不便宜、但质量有保证。80年代中期时兴审计，部里矿上都流传刘辉在煤矿买便宜货，继任秘书拿出我移交的收据，摆平搞定。刘部长感慨：“小阎当初给我费了钱，现在为我省了事！”

部长召开会议，我只管记录，从不端茶倒水，已成惯例。我到中组部后，煤炭部干部司长来开会，说：“刘部长开会水喝完了，他对着新秘书用笔使劲敲着水杯示意加水。会后大家都说小阎在时，刘不敢。”

我的上述劣迹不但在部内疯传，还被煤炭部的清华校友和干部子弟流传到社会上这两个圈子中。我多次听到自己变形的故事，已是宋任穷秘书的刘泽彭警告我：“听说你整部长，收敛点，没好处！”我哭笑不得：“我学你，拍首长还来不及呢，哪敢整他？”

我与部长的真正冲突只有一次。某日晨，我按惯例把机要室转来的文件和信件整理分类后呈送部长。片刻，刘辉拿着一封信，气冲冲地冲进我的办公室。“为什么擅自私拆我的个人信件？”我知道是那封托他走关系的亲戚来信，我看了两行就打住。这种事高干中司空见惯，我也这么进京的；只不过我道貌岸然假正经，部长不视我为亲信，从不交办私密事宜，他在我面前也就正人君子了，现在穿帮了。其实有什么大不了的？“无理搅三分”我不敢，“得理不饶人”我不能惯出毛病！我不解释只看此信两行，而是立刻拿出《机要秘书工作守则》，高声朗诵：“除了中央领导署名和注明首长亲启

的两种信件，其余都由秘书拆封处理。”我说：“若您明确指示，我今后不再处理信件，省大事了。”刘无语，退出。

这般顽劣的秘书，首长还能容忍？容我慢慢道来。清华对干部的要求是：听话和出活。我不太听话，但真出活。例如，下情上达，报告、总结和讲话，由下面专业司局撰写的草稿，部长总不满意，经我修改整理画龙点睛，就及格了。上情下达，传达部长指示时，我不但下任务，还出点子，使指示迅速落实、任务圆满完成。“听话”是面子，“出活”是里子。能爬到部长高位的，都明戏：宁用刺头的人才，不用听话的奴才。

1982年春，刘辉去澳洲，拟带我。高扬文部长有异议：“其他部长出国不带秘书，应多去个局长。”刘力争：“小阎不是秀才秘书，是当过厂长的机械工程师；他英语很好（替我吹），可当我们八人团的二翻译。”可见刘对这个刺头秘书的赏识态度，当然，后来我也以优异的考察报告报答老板的知遇之恩。

4-9 赴澳大利亚和香港考察

1982年5月，我随刘辉去澳大利亚参加国际煤炭大会，并参观澳洲的煤矿和景点。往返经香港换机，乘机逗留多日。

因是部长团，全程尽量住使领馆和新华社。驻外机构大官见多了，一个工业部的副部长只能算芝麻官，没人当回事。但碰巧这两地的驻外机构都有父亲的亲密战友，有两对夫妻我还熟悉，他们格外照顾，比同住的正部长待遇都好。如在保密室里，互通国内外“情报”并恣意议论朝政；除例行的接风和饯行宴会外，使节的家宴更亲切温馨；坐馆长挂国旗的专车在旅游景点横冲直撞。外交车的罚单，不用交罚款；馆长的车，罚单都不敢开。行前，煤炭部干部司曾传出，有单位要调我。旅途中部长住套间，局处长住二人标间，同住的司局长曾问我调动之事，我否认。他说：“我看也没人敢调部长秘书！”经过在领使馆这么一折腾，他改口：“小阎，你还真有来头，我们

都跟着享福，调动之事不像空穴来风。”我笑答：“澳洲和香港是碰巧了，到非洲，我家连使馆的门房和厨子都不认识。”

当时出国算是大事，“布尔什维克”聚会总要一提看有谁托办什么事。刘泽彭无事要办。宋克荒给香港的朋友、已故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方方之女，带些礼物，送到我家。香港见到方女，她问我何事要办？我把所存外汇交她，让买彩电。她说只够买18吋，她要给我加些钱买个时髦的20吋大彩电。我坚决不允，非18吋不要。回京把方的礼物和信带给宋，宋说：“方夸你是好人，就是太呆板，这样的共产党不多了！”宋把方给他儿子的礼物和食品分一半给我儿子。我说：“哥们给的，照拿不误！姐们的不敢要。再说我呆板，我就全抢了，看我像共党还是土匪？”

陈元让我去他家取东西，我开玩笑：“宋大鼻子架子小，把东西都送来了；你陈小鼻子还挺大架子的！”陈执意让我去取。

1989年之前，陈元一直和父母住在一起。文革前和文革初，住在中南海东面的北长街81号，一个警卫排三班倒守卫。文革后住进中南海乙区，我每次去他家一般都是骑车进西大门。我家和后来工作的中组部，都在中南海西边。在大门口下车，站岗士兵示意我前行十步到左面的警卫室窗口，内坐的军官让我出示工作证。因为陈家警卫班事先已通知大门，我立即被放行。（不像到某些机关那样，要填写烦杂的登记表。不知此军官是否自己记录进门时间、携带物品等。出去时则没人管了，只要礼貌性下车一下即可。）进西门后，向东南骑行、沿南海北“海边”到乙区的中门，下车通报姓名后进门，再行百余米，在一堵南北走向的高墙的西向小门前下车。门卫向我敬礼，为我开门，同时按电铃——首次陈元迎出带路，以后我就自便了，但门卫仍按门铃，通知有客人到。我推车进院门，门廊旁已停放若干陈家兄妹的旧自行车。像北京普通四合院大小的院子，地上种些花草和几棵树。北边是一排封闭的房子。从西门进屋内，是狭长的走廊，走廊南面，下边是半身高

砖墙，上边是玻璃窗：北面是一排房间，陈家五兄妹一家一间“半明”的约二十平方米的套间，像低价旅馆的标准间。房间南面是门和唯一的窗户，北边是卫生间、无窗，屋内是简陋的木质公租家具。陈家五兄妹与我都熟，在家的，听见电铃声，从自己的房间窗户看见是我，也出来打招呼。走廊的东头是饭厅，一张大圆桌，碗橱里放着陈家兄妹的碗筷和客人公用餐具。炊事兵从更东面的厨房端出一荤一素一汤三大盆，以及米饭和馒头。饭后，自己刷洗餐具，在墙上的小黑板，写上自己家就餐人数，月底算账交钱。1986年以后，我与陈家幼女同事，每次用餐就不算陈元，而算在她头上了。陈云夫妻在隔壁另外单独吃住，节假日才与子女团聚。陈家另外的大客厅，只放着一台大电视，80年代前与各领袖家一样，在这里放过电影，胡耀邦建议不要在各家放电影之后，只在周末餐厅的小黑板上，写着中南海大礼堂放映的电影名称。

“风波”前，我数十次进出陈家，故这里简介一下，以飨看官。书归正传，我走进陈元房间，只见床上摆满衣物。陈元：“去年出国，在国内外购置的行头，你穿着合适就拿去，我不能全扛你家去！”我挑了国内没有的带活里的夹风衣和一身三件套西装。回国后把九成新的衣物穿成八成新还他。陈元妻子、清华同学孙云黎，已癌症晚期；此前我去解放军305医院看望数次。陈托我把孙的病例带给他家的朋友、香港某名医，并让我讲述孙近期病情发展和体貌表征，征求高见。我照办，但谋事在人、败事在天，几个月后孙还是不幸去世了。

1982年7月，中共中央组织部调令到煤炭部，让我一个月内去报到。干部司紧急物色新秘书，我们交接完毕已8月中。我同好友何女士等人到北戴河旅游放松一周，准备最后一刻赴中组部青年干部局履新。

第五章 大要害部门的小异类

——中组部青干局四年（1982～1986年）

第一节 被陈元劝进但拒当李锐与陈云的联络员

5-1 陈元力劝我去中组部青干局

1981年5月8日，陈云在杭州撰写《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简称陈文），在中共历史上首次提出：“中央组织部要成立青年干部局”。

20日陈云回到北京，将“陈文”送邓小平和胡耀邦。邓批示：“老干部方面的问题还没有处理好。”不搭理陈。胡见邓与陈意见相左，故未表态。

6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应陈云要求印发“陈文”，仍未引起足够重视。

7月初，全国省委书记座谈会。陈云锲而不舍，终于说服邓小平，座谈会主要讨论“陈文”。陈云又进一步，作主题讲话《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得寸进尺地提出：“中央、省地县都要有中青年干部机构。”邓小平紧接着说：“陈云提得非常好，我双手拥护。”

7月中，陈云对中共中央组织部（简称中组部）部长宋任穷说：“青年干部局是太庙，个个菩萨都要好的。”

（以上均选自《陈云年谱 下卷》273-278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2000年）

当年夏天，陈元及时到我家通报了上述情况，并说邓小平在省委书记座谈会的原话是，“我举双手拥护，我举双脚拥护！”陈元说：“父亲决心很大，老邓也支持了。明年青年干部局（简称青干局）一定要成立，你要去。”我不想去，他让我认真考虑。

1982年春节，陈元约我到中南海他家里。我预料是去青干局之事，暗下决心："坚决不干！"落座后，他开门见山："父亲已经决定，春节后青干局正式成立，由曾任他秘书和毛泽东秘书的李锐担任局长。父亲很了解你的情况，推荐你为第一号局员。"我面露难色，说确有难处。随后从上午到夜晚，我们进行文革后，最推心置腹、隐私密谋、漫长艰难的交流，历经中餐和晚餐，省略了午觉。

我首先披露自己的婚姻状况——

文革中接触诸多政治活跃的女性，她们顺利时意气风发，或曰张牙舞爪；逆境则彻底悔过，捎带揭发男友。吾惧之，欲找生活型女友。日后闹事（如当年反中央文革），我一呼百应，不缺太太一人；如若事败，我一人挨整，老婆不知者无罪免罚，她可扶老携幼、照顾父母和子女，将来确保后院平安。（陈元：我当时也认同、并践行。）

1969年，我发现同系同年级的黄某符合上述条件，追求她并确立恋爱关系。70年同去甘肃，72年回京结婚，你和宋克荒都参加了婚礼。密切接触后发现彼此性格差异巨大，绝对是"人轴"（相似于数轴）的正负两极端。我外向开放、打抱不平、寻衅滋事，她内向传统、与世无争、安分守己；我是社会化、她是家庭型。此乃客观公允之事实判断，不含优劣褒贬之价值判断。（陈元：同意！）除遗传因素，成长经历迥异也是性格成因：我是长子，幼儿园到大学基本住校；她是幺女，大学前只在师大女附中住校几天，不适应就打道回府。

毛泽东讲："差异就是矛盾！"原来理解不深，现在感同身受。如春节回京探亲，时间短暂宝贵。她想我陪她旅游购物，我欲同你们探讨时局。（陈元：我当时有感觉。）我说："不能好了你一个，坏了我一群。"（《智取威虎山》杨子荣打死老虎后，来了许多土匪，杨说，刚打死一个，又来了一群。）我宣称："你是我全体亲友、甚至全世界几十亿人中最重要

的一个，但你不比亲友的全体更重要！”（陈元：我亦如此！）

黄是因我才去遥远荒凉的西北，她父亲囚禁秦城，我不能一人回京，因此拖到1975年才有机会共同进京。行前约定：首都户口拿下即离婚！我强迫的城下之约，入城之后理所当然地被她毁约。离婚尚未成功，本人仍须努力。

重返北京，首要任务是与失联同学恢复密切联系。我与中学女生何某当年关系甚佳，现在“历尽劫波朋友在，相逢一笑情更深。”她也婚姻不幸，“同是天涯沦落人，重逢更惜曾相知。”1978年我从京郊调进煤炭部，来往更加方便频繁。我与何女约定，分别离婚后，再续良缘。

最后我诚恳地对陈元说：“我这种生活作风问题，到最机要最保守的中共中央要害机关，于公于私、于我于你、以及令尊都极为不利。”

陈元惊讶：“何某？不就是那个记者吗！真没想到：你在西北，小城故事多；到北京，大城故事更多。立即悬崖勒马！”

我坚决：“驷马难追！”陈：“收敛和隐秘。”

我：“妻已知我有何女。”

陈：“我请你们夫妻吃饭，双方以大局为重，都别闹事！中组部方面没有问题。”（陈调解、妻平安，后被邓颖超干预实属偶然，容后细表。）

我随后介绍自己的仕途前景：1982年初，煤炭部领导调整结束。十八位60岁以上的老正副部长，除我的老板刘辉再过渡一段外，其余全部退下。资深的工程师秘书根据专业和爱好，分别担任各业务司局副局长，其他只会动笔的文人到办公厅当副主任，只会动腿的粗人去行政局干副局长。前有车后有辙，我八年的处级，在仕途上再进步指日可待！

陈元义正言辞：“青干局是我们‘布尔什维克四人帮’为实现理想，大展手脚的绝好舞台和重要基地。我父亲主管组织人事，宋克荒父亲是中组部长，刘泽彭是宋部长秘书，青干局这块前沿阵地只能你去占领。这样，高、

中、基层都掌握在真正的马列主义者手里。父亲说：‘建这个局就如同建太庙，每个菩萨都要最好的，要有文革中优秀的、德才兼备的文革中后期逍遥派红卫兵，他们最了解文革时青年的情况。’这指的就是你！当年你念念不忘的‘不可抑止的自信心和深刻炽热的使命感’哪里去了？你会为区区的煤炭部副局长折腰？算了吧！你不就是为何女士吗？我还不了解你！回去认真仔细考虑，我们共同协调，争取革命和爱情两不误。”

夜深人静，促膝长谈中我们回顾过去、预测未来、盘算现实，都动了感情。我们想起：1966年在“斗黑帮扫四旧”狂潮中不合时宜的稳重；1967年被打成反革命挨整的悲壮；1968年扛着大包小裹到火车站送陈小妹远去西藏的惨景；1969年他父亲突然被疏散江西的狼狈；1972年他参加我的婚礼，得知我在干校的走资派父亲不让回京时的气愤。结论：十年困难时期已经远去，昔日悲惨世界已成历史，我们应该放手一搏，这是最后的斗争，我们的理想一定会实现！陈元每次只送我到他家小院门口，今夜一直送到几里外的中南海西大门。握手告别时，我不但动情、动心，也动摇了。

一个月后的1982年3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中组部正式成立了青干局。我不愿放弃去澳大利亚和香港考察的机会，让陈元推迟调动作业。

5-2 拒当李锐与陈云的联络员

1982年8月18日早8时，我向持枪的解放军战士展示，盖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组织部”大印的“中组部（82）干调字某某号调令”，走进西单商场北边那座不挂牌子的灰色神秘大楼。历史的巧合：1966年的此时此刻，我在天安门城楼上，曾距权力中心的毛主席零距离。用16年时间，几乎“走遍中国”（央视节目）才进入天安门东北仅两公里的中国组织人事权力中心。50年代，父母带我去西单商场，我看见这无牌子、有警卫的大洋楼很好奇。父亲说：“这是管我的地方。”现在，我进来了！不安分守己的我，不

是那种“既来之、则安之”的人，而是“既来之、则折腾”的主儿——尽管当初我不愿来，尽管这里是党中央最重要的部！共产党在此继承了中华历史的“优秀”传统，因为吏部历来是“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之首，号称“天官第一部”。

组织部的工作笔记和文件、名单，在离开时必须全部交回，以下的回忆只能参考我的日记和近期收集的资料。

我被引荐给青干局李锐局长，在部长们办公的四楼的办公室。

李很热情，自我介绍：“我65岁，从水电部副部长职位上离休了。陈云说让我当青干局长委屈了。这是陈对我的重视和信任。‘陈办’介绍了你的情况，我等着你出国回来呢。中组部情况挺复杂，你来了就好好干吧！”他还介绍了青干局现有四人的情况：“水电部长刘澜波的秘书李志民、你清华和101中双重校友，我带进青干局唯一的人。文革后从东北调到中组部‘清查办’的两位县级干部刘广祥和彭守范，他们在清查中得罪了部里一些人，不便到其它局，人不错我要了。电子部的徐功廷，文革后期反‘批邓’，和你一样也是陈办推荐的，干部管理需要他这样懂计算器的。”

我小学时，看过李锐的《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一书；中学时，得知他任毛秘书前后的故事和“事故”；大学时，听陈元揭秘他与毛的恩怨；近期，更向陈了解了他的长短处和特点。今天我终于认识了李锐！当时我没预料到：他将深刻地影响我在中组部的境遇，他对我从提防、到信任，最后保护我免于邓颖超的驱离。

第一周，李锐秘书周保志带我到中组部各局室认门、认人、认业务。我也例行公事地拜见早已熟悉的宋任穷部长，私下与宋秘书刘泽彭等几位干部子弟熟人聊天。他们说，中组部历来是“内升制”，对突然冒出的青干局，对外面“空降”的局长和局员很不感冒，议论纷纷。我才理解李锐的“情况复杂论”。

一周后，在青干局三楼的办公室，召开第一次“局务会议”。李锐主讲，一、陈云的指示及如何执行，二、今年后几个月的工作，三、青干局自身建设，四、下文件要求各省市立刻成立青干处、科。李锐秘书记录。随后，我们五个局员热烈讨论、各抒己见。会议最后，李锐说：“周秘书整理好会议纪要，阎淮送到陈云办公室，以后你就负责联系陈办。”此刻我才明白刚见面时，李讲“我等着你呢”的含义。我当即表态：“李锐局长（平时我们都称李部长），我现在是您下属的青干局的局员，不是陈元的哥们，更不是陈云联络员。这次我服从，今后您还是通过部办公厅走‘机要交通’吧！”

我不用办公时间、不坐机关小车，到中南海陈办送文件；以免使“特殊”的青干局和我，更加特殊。——这种事情在保密单位也保不了密！下班后违反保密规定，我骑单车携机密文件去陈办。交接签收后，我按李锐没有明说的意图，汇报了组织部的“复杂”和李锐及青干局的“难处”。得知我来，刚任北京市西城区委副书记、繁忙的陈元下班后准时回家，共进晚饭后我们畅聊交流。陈讲从国家计委“下降”到基层的感受，我谈从国务院部门“上升”到党中央机关的体会。最后我严肃地重申：我是青干局局员，不是你父亲和李锐的联络员。陈元同意，答应通过陈办正式向李锐转达。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首次写入“干部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明确提出新时期的干部标准。“干部四化”的关键是年轻化和知识化，胡耀邦要求中组部，对领导干部提出当前、三年、五年和八年要达到的年龄和教育程度的要求。这项开拓性工作，自然落到新成立的青干局。李锐说：“小阎思想解放，就负责这事吧！”

当时全国县处以上干部，统称各级“领导干部”（军队干部由解放军总政治部管理，中组部不管理、不统计），共计81万人；大学教育程度只占6%，高中22%，初中以下72%；领导干部绝大多数50岁以上。我经过调研提

出：目前省部级50岁以下和大学程度应占三分之一，三年后达到二分之一，五年后新提者都应50岁以下和大学程度。这个现在显得很保守的建议，当时却非常激进。局内讨论小有异议，我力争后顺利“出局”。到其它局室征求意见，争论很大。例如在与研究室讨论时，和彭吉龙（新世纪任中纪委副部级的副秘书长）争论激烈，我可能出口不逊，一年后已成局长的李志民与我谈心时，重提我早已忘却的此事，说我“言辞太尖锐，使彭下不来台”。我日记里记下李的此话。

向部领导汇报时，我说：“当年干部以出身好、资历老、大老粗为荣。谁能想像以工农为主体的中共会要求自己的领导干部年龄低、文化高呢？干部四化是一场革命，许多组织干部已是阻力！”最后一句话被刘泽彭抓住，警告我到中组部要谨言慎行，不能像在清华时那样畅所欲言，胡说八道。李锐当然支持我，他以锐不可挡的气势为此方案力排众议、保驾护航，使其终于通过。上述“两个三分之一”成为随后调整省委和省政府的硬指标。（《李锐口述往事》，470页，大山文化出版社，香港，2013年）

我们都认为：“李锐很强势，思路开阔雷厉风行，提出一个想法，能把组织部上下裹挟着走。这很少见！”我的挚友、继任中组部长陈野萍的秘书任小彬在2014年第33期《中国新闻周刊》上如是说。

小插曲——国庆前夕下午，部里通知：下班后到东华门旁的中组部翠明庄招待所，领取机关发放的过节食品。在煤炭部时，隔三差五就分东西。原以为到了中共中央机关，享受不到那等福利。中组部老同志说：“组织部有权无钱，你那副处级的百八十块，够干啥的？咱们一年几大节也经常分些时令食品。”我问：“干嘛跑那么远去取？”他指点迷津：“原来都在部里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占了咱一层楼，总不能在‘纪律’眼皮底下干这‘犯纪律’的事儿吧。听说中纪委也在外面分，彼此心照不宣嘛！”不久，中纪委搬到平安里西面官园的独立办公大楼，我们分东西就再不必舍近

求远了。

第二节 调整湖南省级领导一显身手

5-3 先行考察省委书记毛致用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后，中央成立省市自治区机构改革指导小组，准备调整全国各省的领导。组长是政治局委员宋任穷，已荣任中央委员、高升组织部常务副部长、仍兼任青干局长的李锐是小组最重要成员。他是湖南人，建国初在湖南工作，对湖南特别关心。

9月7日，我刚到中组部20天李锐就派我去湖南10天，了解省委领导情况重点是书记毛致用，李锐想把毛撤下来。

10月回来后我向部领导汇报：毛致用的五大特点，一、52岁，年龄轻；二、初中文化，文化低；三、文革前地委副书记兼县委书记，资历浅；四、1968年至73年从县委、地委到省委书记，升迁快：五、现已任职近十年，任期长。从上述简历我总结出,毛“青低浅快长”的“五项全能”全国之最。因此，老干部怨声载道，告状者络绎不绝。负面批评：文革受益者，能力低“没得用”（湖南话毛致用的谐音）。正面评价：为人本分、办事正派，故能经久不衰。我的看法：“毛是大德中才，15年的政治风浪中无大功、亦无大过，华国锋式的干部。结论：毛致用可留任书记、也可平调到人大政协，全凭政治需要。”

此次湖南行还有二事可提。其一、听说我没朝圣过韶山，周末送我去瞻仰，在滴水洞住了一夜。白天看到毛的故居完全是富农或小地主的架势，夜晚则享受富丽堂皇的行宫待遇。一一1966年7月毛泽东在致江青的著名假信中写道：“离开杭州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住了十几天。”即指滴水洞，网上说它是毛泽东心中永远的“圣地”。其二、离湘时，组织部长非要送到百里外的机场，飞机常晚点，他往返要大半天。我的毛病又犯了，拒绝送机、发

下狠话："不要把社会上庸俗的作风带到党内！"此话传到中组部，李锐赞赏性地批评了我。湖南不计前嫌，后来还要我去任组织部副部长。

我还就湖南不重视青年干部向李锐告了一状。

11月，李在给中央的汇报提纲中说："湖南新提拔的中青年干部只占31%，99个县没有新增一个中青年干部，是春风不度的死角。"

12月，调整湖南省级班子工作组（以下简称工作组）是全国各省中首先成立的。调整省级班子，历来是由中组部地方局负责。但这次对全国有指导意义，李锐不想让地方局照常规按部就班地去办。经过我在青干局四个月的工作，李锐感到我与他的思想比较合拍，就只让我一个人代表中组部参加。李锐行前向我交底："胡耀邦说，华国锋等中央的文革派都已撤了，湖南第一个调整，毛致用若再撤掉，上行下效，全国各省地县不知要撤多少，不利于安定团结，你不必讲胡的意思，但要掌握这个精神。"李锐还说："在讨论十二大中委时，你们煤炭原部长肖寒，在文革中欠了点帐，人事小组同胡耀邦争论了三次，最后耀邦服从了大家的意见，肖寒没有保留中委。我还要继续做耀邦的工作，争取拿掉毛，这次还有希望。"在考察干部的方法上，我建议："是否可以扩大民主，让所有的地厅级干部投票选举新省级领导。"李："选举？"我："实际是民意调查。"李："可以，但调查结果要保密，若泄露很被动。"

调换省级班子在北京有两项功课必做。一是由主管副部长签字，到中组部档案室查阅该省领导的个人档案。空手进去、空手出来，不许抄录、只准记忆。二是拜访大佬。组织工作的潜规则：每个重要省市的人事都要请示有关的老中央首长。如北京——彭真和万里（二人意见相左），上海——陈云，广东——叶剑英，湖北——李先念，山西——薄一波。湖南应该是黄克诚，但他不愿管闲事。按李锐指示，我到中组部顾问、德高望重的帅孟奇家。她年长我近半百，我都不好意思按惯例叫她"帅大姐"。她特别平易近

人，招待我喝茶吃水果。我拿出笔、打开本，征求对湖南班子的意见。她只让我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我一字未记，空载而归，但是却留下对她深深的敬意。我非常敬重的另一位女领导是陶铸的遗孀曾志，70多岁的副部长，不在局长都去的小食堂就餐，每天和我们一起拿着碗勺排队买饭。某天曾志排我后面，我让比我父母还老的她到我前面，她不干。我只好假装有事离开队伍，到较远的另一队去。

湖南工作组组长是刘雪初（带秘书），化工部原副部长。组员有经贸部办公厅原主任谭伟等十余位中央部委离休的司局长，都是湖南人或曾在湖南工作。我说咱们都是“还乡（湘）团”。“老湘”们（这是我对他们的戏称）说：“你不算！”我答：“我也在那干过。”什么年代？多长时间？“上季度，十天！”众大笑，这些父辈与我顿时缩短距离。他们说：“我们这批65岁以上的老家伙、李锐同乡或同事，在你这个30多的毛头小伙、李锐亲信的领导下，发挥余热站好最后一班岗。”我答：“领袖有大秘小秘，一人多位秘书，刘部长一人一位秘书；你们比领袖部长差点，多位领导就我一个秘书，我是大家的秘书，简称大秘。”

5-4 调整省级班子的详细过程

1982年12月17日至次年2月5日，我们在湖南工作50天，调整省级领导。钦差大臣又是决定他们仕途的吏部要员，我们的住食行，省里当然是最高规格接待。

工作组居住和工作在“九所”四号楼。网站介绍：九所建于1959年，系领袖来湘接待基地，被誉为湖南的“钓鱼台”。毛泽东多次下榻，1974年入住长达114天。曾接待胡志明、西哈努克以及一至四代核心。

膳食是三天小宴、五天大宴，燕窝甲鱼等山珍海味不绝于口，名烟好酒不离手，可惜我烟酒不沾。平时省委领导从不陪席，接风饯行、节日庆宴他们参加，则简约朴素。不知往日如何，这两个月他们确是艰苦朴素的模范。

毛致用是真朴素，每次来都是骑辆破单车，穿身旧军棉大衣，对服务员也平易近人。工作组有人断定：装的！我看是本色表现，不像作秀表演。2003年，毛致用从全国政协副主席职位退休回到老家，是唯一居住在农村的前国家领导人。

我们周末游遍附近的革命圣地和不革命的风景区，吃遍火宫殿等著名风味饭店，看遍当时演出的花鼓戏和芭蕾舞等土洋戏剧。腊月二十三小年离湘时，软卧包厢中装满柑桔腊肉等土特产和年货。



1983年初，中央调整湖南省班子工作组，在长沙九所留影。左一为作者，右四是组长刘雪初部长。

我历来厌恶奢华和应酬，九月来湘，只住5元一天的组织部招待所，吃其大食堂，坚决不让组织部长亲自送遥远的机场，差点吵起来。现在面对站最后一班岗、享最后一次福，尽情享受从未享受过的、比部长待遇还高的老局长们，我无计可施，唯一能捣乱的就是撤去出游时，开道的警车和景点的便衣。

业余时间吃喝玩乐，工作还是相当认真的。我当年日记的如下记载，可看出一个省级领导班子调整的全过程（读者若不感兴趣，可略过下几页）——

12月18日，一昼夜的火车，上午工作组抵长沙。

当天下午，立即与省委组织部的十几位部长和处长见面，他们是工作组的外围助手，我们部署他们应配合的工作。次日，立即开始与在职和离任的的百余位省级首长、千多名现任地局级领导开会，每个级别一般包括正副职，省里俗称地局级以上为高干，介绍我们调整省委、顾委和纪委，政府、人大和政协，党政六套省级班子的任务，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是：

19日，会见省党委常委十余人，他们是全省的领导核心。

20日，会见省政府、人大、政协的几十位在职省级官员。

21日上午，会见离休的健康的历任省级老干部百余人。

21日下午，会见省部委办首长38人，他们名义上与政府的厅局长同级，实际上更重要。

以上四次会议，我们都详细记录与会者对六套新班子成员的推荐意见。此后数百人的会议，我们只是通报情况，不再当面征求意见。会上发放无候选人的“海选选票”，让与会者回去署名或不署名地填写，次日交回。

22日，会见省政府厅局长300余人。

23日，人大政协和各企事业单位的局级领导300余人。

24日，上述共600余位局长，不记名投票（以下均为不记名）“意向性选举”他们中意的新省级领导。

25日，会见地、州、市长官600余人。

26日星期天，工作组老干部参观游览，我与省组织部统计局长们的“选票”。

27日，600州官投票。

28日，统计州官选票。

29-30日，工作组综合分析1200位局级干部的意见。

31日，约二百余位在职和不在职的省级领导和部委办领导投票。

1983年元旦，休息一天。

1月2日星期天，工作组局长们游览，刘雪初组长和我召开民主人士座谈会，一则拜年，二则征求意见（民主人士就不用投票了）。

3日，工作组自己统计分析二百余位省级“总督巡抚”们的选票，事关高级首长“隐私”，不能让省委组织部参与。我还抽空去查阅了重点“候选人”在省里的档案。

4、5日，刘雪初和我，上下午分别各约一人，与现任省委书记毛致用、人大主任万达、政协主席周里、省长孙治国等四人，一对一谈话，详细了解他们对现在各班子所有成员的看法以及新班子成员的建议。

6日，工作组开始研究湖南省六套新领导班子的组成方案，以后的工作都不让省委组织部参加了。首先讨论上述毛万周孙四人的去留方案。

7日，工作组研究新省委书记人选，大部分人反对毛致用留任，我说自己“人微言轻”未表态。“老湘们”知道中组部要员对关键人选不能轻易表态，但也不放过攻击我的良机：“你平日心直口快，关键时刻耍滑头，不脱组织干部本色。”

8日上午，工作组研究省委常委方案，下午听取省统战部介绍党外干部情况。

9日星期天上午和10日一整天，工作组讨论确定省级六套班子的最后调整方案。“老湘们”坚持毛致用“下课”，我说：“俺就彻底滑头了，上报毛去留两方案吧！”。

11日，刘雪初及秘书回京向中央汇报。

13-19日，工作组在我的代理下，与湖南现任常委们讨论厅局地市主要领导的配备。

20日中午刘返回，下午工作组会议。刘传达中央基本同意工作组建议，但毛致用还是留任省委书记。刘正任省长，他大学文化54岁，比前任年轻12岁。原省长孙治国任人大主任，原人大主任万达任顾委主任，政协主席由原

右派、大学文化的党外人士程星龄担任，纪委书记石新；以及这六套班子的其他成员。其中提拔人士，原长沙市长熊清泉为省委副书记，他1985年任省长，88年升任省委书记。

李锐事后一直耿耿于怀："我到中组部后，湖南是最棘手的省之一。我们一直想把毛致用换下来，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李锐口述往事》402页，大山文化出版社，香港，2013年）

刘组长带回中央新精神，工作组要继续把长沙市领导配备好。

1月21、22日，工作组召集长沙市500余位县处级干部会议，如法炮制，投票"选举"市领导。

23-31日，象调整省级班子一样，确定了长沙党政六套班子。

2月1、2日，我与刘组长的秘书起草工作总结。

2月3日，工作组与湖南省新常委座谈，交换意见。

2月4日，刚成立的省青干处，请我去指导工作。我说："不敢！算是认门、认人，联络感情。"

1983年2月5日返京。7日，工作组在京西宾馆向中央机构改革小组汇报，主要发言人的苦差事，我是推不掉的。领导对我们的总结表示满意，随后转发文件、指导各省市的班子调整。

在长沙，我结识了两位青年才俊，他们日后扬名国际。

其一杨小凯。李锐嘱咐我务必拜会省政协副主席杨第甫，认真听取其意见和建议，他是李锐挚友，在前文提到的《李锐口述往事》中，多次提及杨。在杨家多次见到从外地回湘探亲的公子杨小凯。小凯1968年因撰写《中国向何处去》的大字报获狱十年，其观点我不尽认同，但智慧和胆识令我钦佩，我们一见如故。90年代，他更成熟睿智，我们同为美国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亦多有接触。杨在2002年和2003年两度被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被誉为"距诺经奖最近的华人"。不幸2004年英年早逝。

其二吴子牛。北京某小朋友被介绍给潇湘电影厂吴导演。女方家长因吴在外地，又出身平民，不甚中意。朋友家两代人，都托我代为考察。1983年2月2日，我到吴单身宿舍拜访，促膝畅谈，深感人才也！回京汇报，郎才女貌、郎貌女才，乃珠联璧合。果然，强强结合后，产生诸多上乘影视作品。至于吴执导的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则另当别论、见仁见智吧！

第三节 独撑记录在案和选调生的前期工作

5-5 配北京局长考察吴仪和薄熙成

中共中央准备在省级班子调整后，再全面调整各省的地市厅局领导，于是决定在北京试点，成立北京考察组。组长郗占元，最高检察院原副检察长（正部级），1929年入党的老革命。组员：高检的几位离休局长和北京组织部副部长。中央组织部的代表，李锐当然不愿保守的中组部的其它局染指，身为李的亲信，非我莫属了。

1983年3月26日，考察组上午到京西宾馆，由中央机构小组面授机宜。下午进驻北京第四招待所（现更名新大都酒店）。工作70天，6月6日考察组讨论通过我撰写的工作总结，结束工作，撤离四招。

北京，只有万余平方公里，当时不到千万人口，地寡人少。全国最小但最重要的省级行政区，因为是首都，却拥有二百多个局级单位（还不算百所大学）。如商贸系统就设有第一、二商业局，第一、二服务局，第一、二轻工局。因此在市与局之间还设置部委一级协调领导，如市委除传统的党务部委外，还有统管经济的商贸部、建工部、农村部以及大学部，市府的计委、经委、建委也“高局一等”，它们各自管辖若干局级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构成某个“系统”（如管辖各郊区县的农村系统），简称“口”（如领导各工业局和总公司的经委口）。工作组首先听取各部委领导对所属局级班子的调整意见，然后到局里了解全部处长和部分群众对局长们的意见、以及局长们

对部委领导的看法，最后我们一并拿出对部委和局级两层领导班子的调整方案。

两个月中，除了对各部委领导的“面试”，我还先后直接参与考察：矿务局、建设银行、市委党校、中级法院等和以下三个有故事的单位共14个局级班子。

其一，自来水公司经理李某，是我中学同班同学。他出身一般（非干部子弟）、学习一般（只考上大专）、因此与我关系一般（当年我多势利）。他毕业分到自来水厂，当工人十几年吃苦耐劳，改革后才股级、科级突飞猛进到处级；但在较保守的公用局不被重视。文革后我的平民意识更愿意帮助平民子弟。我假公济私带队到公用局，要求与所有大学文化的处级干部座谈。会前李想与我搭讪，我不搭理（会后他对同学说我架子大）。会中我故意问起北京自来水的现状、问题和前景，让李充分表演，给考察组留下深刻印象。会后我们表示自来水对北京极其重要，李符合干部“四化”标准。随后李被提为公用局副局长。这算是我唯一的以权谋私吗？

当时煤气罐紧缺，亲友请我找李解决，我拒绝。

其二，5月25至26日，到京西的燕山石油化工总公司。行前市经委介绍，公司下属的东方红炼油厂副厂长、45岁的老姑娘泼辣干练，优点和缺点都突出，争议较大。“唯恐天下不乱”的我对争议颇感兴趣，坚持亲自前往，离开市区在远郊区住了唯一的一夜。当面考察，此人果然不凡，我当然支持。不久，她任公司副总经理。这是我半年内，继考察毛致用后的另一位，将来同样担任国家领导人的干部。不同的是，前者是正部级，后者当时仅屈居副处级。如您所猜，她就是后任副总理的铁娘子吴仪！

其三，工艺品公司经理薄熙成，勇于改革敢于创新，我们一致同意提拔薄为旅游局副局长。5月底，考察组与市委讨论重要局长人选。北京书记段君毅说：“我看小薄可以当旅游局正局长。”我说：“我和熙成算朋友，他才

三十出头，副局长锻炼几年再转正，对他和薄老都有益无害、对改善老干部和干部子弟的形象也有利。”再次开会时，段书记说：“小阎，我问一波同志了，他说熙成当正局长好。”我哑口莫言——不得诺贝尔奖也可莫言！会后我哥们、市青干处赵龙飞副处长满怀同情又幸灾乐祸：“你马屁拍到马蹄上啦！”1985年赵升任西城区副书记，我祝贺时回敬：“你马屁总能拍正！”报了一箭之仇。

此后几年德才兼备的薄局长工作很好，年少肚量大的熙成与我公私关系更好，我们还一起在旅游局进行干部制度改革试点。

由于在北京考察干部，近水楼台，其间李锐又交给我两项全国性的重要任务。

5-6 红卫兵头头“记录在案”

1983年4月23日，中央组织部下发“中组发[1983]6号文件”《关于“文化大革命”期间高等院校学生造反组织重要头头记录在案工作的意见》（简称“记录在案”）。“记录在案”由青干局负责，当时青干局中的文革在校大学生，表现“特别优异”的只有两人。另一位两个月前的春节，不与全体局员一起集体空手去为李锐拜年，次日独自带重礼去李家，被李锐看轻。“记录在案”的重担只能压给我，我向北京考察组请假一周。急性子的我，23日星期六（当时每星期只休一天）在中组部文件发出的同日，即起草青干局下星期三召开“北京高校记录在案会议”的通知。25日（星期一）各校同时接到中组部文件和青干局会议通知，他们感慨青干局的效率。

4月27-29日，我代表中组部在北京大学留学生宾馆，主持北京各高校党委副书记和组织部长参加的“记录在案座谈会”。开场白中我说：“我理解‘记录在案’就是去年社会上清理文革中有问题的三种人（即：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在大学的翻版。不同的是，‘清理’是面对面，定性后严肃处理；‘记录’是背对背，青年学生就不处分

了，记下来以后留神就行了。”三天会议中，就贯彻“6号文件”的主要精神——“对造反组织的重要头头和有严重问题的人，应由大学认真负责地将经过调查核实的材料，通知其现在单位和有关省委组织部，记录在案。今后，凡从文革的大学生中选拔领导和选派出国，必须与他们原大学联系，取得其当时的表现材料。”（以上是文件原文）——进行认真学习领会。对“记录”工作的宽严尺度、政策掌握、进度要求进行了详尽讨论，基本按我们的要求达到共识。

但会上不乏“杂音”，北大书记提出：“高干子弟当老红卫兵的头头，是否记录？”北工大跟着“敲边鼓”：“鼓吹血统论的谭立夫呢？”清华组织部长与我熟悉，也将一军：“老阎，你们清华红卫兵推倒二校门，你朋友贺鹏飞记不记？”我公开保证：如实向上级反映，一周内明确答复。私下向清华领导交底：“老人家们此举专为整治批斗他们的造反派，岂能拿自己子弟开刀！成立青干局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对付造反派红卫兵。”

会议结束次日，我回中组部向李锐汇报会议情况，并请示“老红卫兵头头”的问题。李锐：“你对清华领导说得好，就是那么回事！”随后，李锐向秘书口述一份电话稿，让部办公厅立即通知北京组织部，并转发全国各大学——“文革初期保守的老红卫兵不是造反派，其头头不属于记录在案范围。”这与日后陈云对“北京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的头头孔丹来信的批示是一致的——“这些红卫兵不属于‘三种人’，其中好的还应是第三梯队的选拔对象。”不是李锐与我有先见之明，我们当时都是陈云嫡系嘛！

几个月后青干局机构确定，分成三个处，我在地方处，先后到东北和华北考察后备干部。当年底，各大学陆续报来“记录在案”的工作总结，其统计汇总工作已经移交综合处，我无暇过问，只索取了清华的资料。当时并未翻阅，现在发现还保存着。

清华“记录在案”原始数据如下：蒯大富的“团派”纪录50人，其中有

严重问题的核心成员14人，刑讯逼供、残酷迫害干部群众者17人，反军乱军问题严重者13人，武斗骨干6人。此外1970年代逮捕判刑“团派”12人，除蒯大富外，其余11人皆因武斗杀人。“四一四派”记录8人，其中核心成员6人，反军乱军者2人。值得注意的是：被记录的48人都有“主要问题”，唯独陈楚三和孙怒涛，只注明“四一四总部核心成员，未发现什么问题”。

我直接干预基层“记录在案”的“非组织活动”：知识分子出身的中学同学汪某，思想简单的书呆子，批斗被毛泽东点名为坏人的冶金部长时，推搡此人。钢铁学院要把汪“记录”。我找他们说，“首恶必办、胁从不问，领袖点名、小将奈何。汪父只是矿院副院长，要是高院（最高法院）正院长，你们还敢记录吗？”汪得以幸免漏网，后顺利国内读硕、赴美读博；发明两项专利，无偿捐赠给差点把他“记录在案”的祖国。

“六四”辞国后，我对中共成立后70年的历史全面重新审视，特别是亲身经历和直接参与的事件深刻反思，“记录在案”是最大的心病。1983年底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使我认识到新专制的危害。1984年初整党检查时。我说：“整党要求重点要清理三种人，但是真正的危险不是三种人，而是缺少民主！”我认为：三种人只要不牵涉刑事犯罪，就不应该重新处理；记录在案人员更不必长期纠缠。由于对记录在案者背对背、不处分，因此当时没有立即显现出对其不良影响。但是，文件要求对“没有严重问题的造反派头头”也要记录在案，这些人多年来一直顶着“玻璃天花板”，神不知鬼不觉地被限制使用、无法进取。——我有愧于他们！尤其我的学长孙怒涛和陈楚三，当时经过十几年反复审查“未发现什么问题”，就是没有任何问题！还要“记录”！全国类似情况肯定不在少数，我更有愧对他们！

我对“记录在案”的最新认识。中共建政初期，为巩固新生政权，对“地富反坏”，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坚决严厉镇压、实行“杀关管”，即枪毙杀头、判刑关押、监外管制。尤其对中华民国和国民党（甚

至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党政军骨干，即使没有反抗新政权、不构成现行反革命者，也定为历史反革命实施“杀关管”。文革结束，邓小平和陈云等重新掌权的老干部，“向后看”——对上至林彪和“四人帮”、下至社会上的“三种人”等毛派文革积极分子和勇敢分子深恶痛绝，必欲判刑和处分；“向前看”——唯恐造反派掌权翻案，而文革在校大学生造反派，具有与“第三梯队”同样的年轻化和知识化优势，要格外提防（王洪文因年轻在监狱受到特殊“照顾”过早离世）。这就是为什么对“没有问题”的“非老红卫兵”的群众组织领导也要记录在案的原因。我以为：这与建国初期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同一思维模式和政治考虑。前者有许多老冤死鬼，后者有众多小冤活人！历史应当还他们一个清白和公道！

5-7 有关干部子弟的几件大事

干部子弟们躲过了初一、没躲过十五，“记录在案”刚结束，又开始了整党，许多人又想起文革初期的他们。1984年2月23日，国家经委主任张劲夫的秘书孔丹（后任中信集团董事长）和冶金部副处长董志雄（后任中钢集团副总裁）联名给陈云写信，主要内容是——

“我们是文革初期的老红卫兵，1966年夏季一些出身于干部、工农家庭的中学生和大学生，受左的影响而自发组织起来参加文化大革命，又于10月中央会议提出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陆续退出运动，在文革的中、后期一直受压抑的红卫兵。

在整党中，有的单位竟把老红卫兵的问题当作三种人问题来清查，而影响到对他们的使用和提拔。这同中央文件、中央领导指示的精神相违反的，不利于整党和建立第三梯队。

老红卫兵和三种人是同一代人。正如陈云指出的：谁对聂元梓、蒯大富手下的第二、三、四把手清楚？老同志不清楚。只有那个时候也是红卫兵、后来成为保守派、逍遥派的人才清楚，他们知道是谁整老干部的（大意）。

我们认为在整党中，对他们的一般性错误，绝不应当追究。应当依靠他们和三种人进行斗争。”

陈云四天后批示后，随即以“中央政治局会议文件[1984]2号”在高层传阅。“2号文件”全文——

陈云84.2.27：

耀邦、（剑英暂不送）、小平、紫阳、先念同志：我建议将此信和陈楚三的材料均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并加发整党指导委员会和中组部。孔丹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有关部门应当研究。这些红卫兵不属于“三种人”，其中好的还应是第三梯队的选拔对象。清理“三种人”是一场政治斗争，要防止有人将水搅浑。像陈楚三这样的人要特别警惕，绝不能让他们混进第三梯队，但也要给出路。

胡耀邦2.28：

按陈云同志的意见办。先送小平、紫阳、先念同志阅批。然后请乔石同志将所有批语及材料印成政治局文件，发各同志。

李先念3.1：完全同意。

（小平、紫阳、乔石同志已阅）

1984年年初在陈云办公室，成立“学哲学小组”，陈云秘书许永跃和朱佳木、中组部两任部长秘书刘泽彭和任小彬、孔丹和陈元参加，一周讨论一次。我无证据认定孔丹的信是陈云授意，但是孔丹信与陈批示的政治理念和组织措施高度一致，孔信四天后即被陈批、五天后成为中央重要文件，随即扭转“整党偏向”、指导“选优汰劣”。中共对“老红卫兵”的正式定义，在2000年中国文献出版社出版的《陈云年谱下卷》第349页，几乎与孔丹信上的说法一字不差。

上述陈云批示中提到，“像陈楚三这样的人要特别警惕”，这又牵涉到青干局的另一段公案。1983年，为了记录在案工作，青干局局长李锐向我们十来个局员了解大学生造反派的情况。李志民1963年即大学毕业，只能找老朋友陈楚三（革命先烈陈潭秋之子、清华“四一四派”的头头）了解情况。陈写了万言信交李，李志民即呈李锐；李锐转给我们清华的几个人看，因为工作重心已转移至第三梯队，此事不了了之。我对陈信的印象是：强调“四一四”反对中央文革支持的蒯大富派，是温和的造反派；他推荐了“四一四派”的沈如槐、罗征启和任彦申三位骨干。届时青干局内的局处领导已确定：李锐专职副部长，李志民任局长，宋任穷秘书刘泽彭任副局长。刘政治敏锐，把陈楚三的信交到陈云处。不久，陈元告诉我，陈云内部讲话：“温和的造反派也是造反派，我们既不能用蒯大富，也不能用陈楚三！”1984年初，就有了陈云“要特别警惕陈楚三”的批示。

尽管干部子弟在文革初期的“历史劣迹”不被记录在案，也不被整党“整理”；但在1983年严厉打击刑事犯罪运动中，一些子弟的“现实罪行”引起民众的强烈不满。体谅民情的胡耀邦在12月8日中央书记处第101次会议提出，中央应该下发《关于对干部子女管理教育问题的通知》，让全社会共同监督“子弟们”。在讨论是否应下发此文件时，青干局意见分歧，干部子弟反对发文件：“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都摘帽平反了，这不又搞出一个干部子弟分子！”平民子弟赞成：“有些干部子弟太不象话了，该好好管理！”一向观点分明的我，有些“二乎”了，痛恨“子弟”中的害群之马，又怕发文件伤及无辜。李锐一时无招，遂决定：“开个子弟座谈会，听听大家意见。”

1984年3月3日，李锐主持的干部子女座谈会在中组部召开，主要讨论干部子女文件发不发，若发写什么？先后发言的有：陈云之子陈元、崔月犁之子张晓彬、于光远之女于小虹、孔原之子孔丹、耿飙之子耿志远、邓拓之子

邓壮、秦邦宪之子秦钢、王其梅之子王昌为、史立德之子史元旦、陈毅之子陈昊苏和李大钊外孙女李虹。陈元多次对我说过“统治阶级要有统治意识”，这次他又率先发言，高屋建瓴地提出问题：“如果一个阶级对自己的子女都没有把握，他就不配称为统治阶级。对干部子女政策的出发点应是阶级利益，它是阶级政策的一部分。”孔丹的发言有代表性：“中央精神可以理解，想发文件用心良苦，但左右为难。现在这么多大事，发这个文件是添乱！”最后李锐总结：“你们一致不同意发，确实不好发。我们对干部子女是关心的，大家要争气。”崔武年在回忆录《我的83个月》中，对每个人的发言都有详细记载。此文件胎死腹中，李锐与大家皆欣慰。十年后，我与李锐又谈起此事，共同反思：“当时真应该有个管束干部子弟的文件！”

1984年初开始的全国整党，重点是清理文革表现，流行的做法是严格审查文革初期如何造反，后期则一笔带过。我认为这就像“记录在案”一样，会伤害当年响应党的号召，积极造反的天真青年。我们向中央反映，应该“重后期、轻前期”。但是，不起作用！青干局同事崔武年写道：“为什么呢？我不理解。阎淮说，有什么不理解的，文革初期老干部都是走资派被冲击，都很干净；后期被解放，很多人参加批林、批孔、批周公，参加批邓，就不干净了——这有个立场和角色问题。听了阎淮这番话，我颇有所悟。政策是人制定的，一定会打上制定者的烙印。”（崔武年：《我的83个月》，32页）我和崔都是干部子弟、文革的保守派，但我们要保护曾经对立的造反派学生，批评父辈的老干部和中央决策者。

5-8 “选调大学生”遇李克强

1983年5月，中央组织部下发《关于选调应届优秀大学毕业生到基层培养锻炼的通知》（中组发[1983]10号）。这是青干局的又一项重要任务，简称“选调生”工作。李锐说：“你是热心肠，就管起来吧！”我们经过周密紧张筹备，在我的北京考察工作接近尾声时，于5月27和28日，在中组部招待所

召开由各省组织部长和青干处长参加的“中组部选调生工作会议”。李锐副部长兼青干局长传达中央常务书记习仲勋2月17日的指示：“从今年开始，各省每年要从大学毕业生中挑选一批，到公社去，到大队去，到工厂去，锻炼几年，然后择优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这是一项战略措施。”习言简意赅地说明了选调生工作的内容和意义。

会后，各省按会议的要求，闻风而动，开始积极紧张地选拔毕业生。我代表中组部和青干局负责督促协调和统筹指导，并以北京作试点。6月10日我在北大召集北大、清华、师大、人大等六所重点院校的组织部长和团委书记会议，了解学校方面“选调”的进度和问题，学生方面的反映和态度。东道主北大团委书记李克强的稳重成熟与谦虚谨慎，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清华团委书记玩笑地向我介绍：这是下世纪的国家领袖。李满脸通红、急声喝止。一年后，在天津考察前北大学生会主席张炜，则是豪放外向与深刻睿智，与李鲜明对照。6月25日，我在北京市委召开北京各高校党委书记会，交流一个月来选拔工作的经验，解决具体困难，协调安排选调生锻炼的岗位。随后，中组部把北京经验向全国推广。在各省的努力下，7月毕业分配前，全国共选拔了两千余名优秀毕业生到城乡工农业最基层锻炼。

我对各省青干处说：“耀邦任中组部长时，要求组织部是干部之家。青干机构就应是青干之家，我们与青年干部是同代人像兄弟。我们更应该是‘选调生’之家，他们基本是60年代生人，与我们40年代的差一代，又是我们催生的，像我们亲生的孩子，我们要当好家长！一直负责到底，直到他们走上领导岗位。”当年秋天我到东北三省和华北三省区考察省级后备干部时，都看望当地的首批选调生；此后几年我到各地去调整领导班子和考察第三梯队时，都尽可能看望当地历届选调生，送去温情、解决困难。此举对我是举手之劳，损失也就是少逛个旅游景点吧，对这些在最基层吃苦的孩子们，则是“中央来人看望我们啦”！

截止1985年，全国选调生共达1.27万，此项工作健康顺利进行。但是由于组织工作的不透明，社会各界意见纷纷。

1986年3月初，传来中央首长反对选调生的消息。青干局立即反应，我们以退为守，紧急提出底线意见：“一、人数大量减少，每省每年不超过50名；二、只去农村乡镇，不到城市工厂：三、跟踪培养，负责到底。”但是无济于事！3月下旬，中组部正式传达中央书记处3月12日关于终止选调大学生基层锻炼的决定：“一、当时出发点好，方法对，有成绩，为党培养了可观的队伍。（虚晃一枪！一一这是我当时的评论，下同。）二、新形势下不要搞了，这要与社会上不同意见分开。（此地无银！）三、对已选调的要安排好，负责到底。（极不负责！）”

我强烈反对、欲哭无泪，认为对已经选调的同学极端不负责任。我与崔武年反应激烈，我们认为：政策的多变性与决策的随意性，不是一个负责任的执政党，应有的领导方式。我们对现领袖的领导水平颇感失望，一叶知秋，今后没有太平日子啦！25日崔武年提议并执笔、我们二人联名，给胡耀邦总书记上书：陈述对他和中央此决定的反对意见，直言“职责所在，所以陈言”。信件通过中组部上报中央。刘泽彭和李志民都说此信“没有作用、毫无必要”。果然，此举没能挽救“选调生”的命运，但对我们却大有作用。当时部内只是议论纷纭而已，“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半年后我调离中组部时，“时机已到，一切都报”了。（“上书反对总书记”之事被崔武年记在《我的83个月》224页）

2000年，中组部发布《进一步做好选调生的通知》（组通字[2000]3号）。《人民日报》2005年3月20日文章称：“截止04年底，在20个省的选调生中，6800名担任县处级，420名任地厅级，7名任省部级。”在父亲习仲勋首次提出“选调生”整整25年之后的同一天，2008年2月17日儿子习近平也在全国组工会议上发话了：“要坚持和完善选调生制度，精心挑选优秀大学生

到基层艰苦岗位和复杂环境去锻炼。”真是“25年河东、25年河西”，此一时彼一时呀！

5-9 李锐提防我，重用不重任

1983年6月7日上午，李锐秘书周保志电话跟我通气："李部长下午约见李志民，谈你的职务问题。”当晚志民到我家，对我说："李锐说，昨天部务会议否定了你的副处长提名。部长们认为青干局现在每个处只有三个人，只要一个处长足矣。他也没办法，让我做你的工作。我对李锐说，小阎的轻重顺序是先做人、再做事、最后做官，他不会计较。”我答："谢你抬举我，转告李锐——我失望是有点，总不能漫卷诗书喜欲狂吧。谢他过去的信任，我将来还会一如既往地、圆满完成他交的重任。”次日，青干局全局大会，李锐说，他作为中组部常务副部长不宜再兼任青干局长，但仍然主管青干局工作。接着宣布青干局的机构设置和干部配备：局长李志民（101中和清华大学、高我七级的双重校友，政治观点与个人操守彼此高度认同，经常互相家访，商谈公私诸事，是挚友。）副局长刘泽彭（清华同学、17年老友，刚卸任宋任穷秘书；中组部同事后近距离接触，关系似乎渐行渐远。）综合处（即办公室）处长张洁渝（原清华教师、彭真妻子张洁清之幼妹），副处级调研员彭守范（原吉林领导秘书），处员朱雅芝（后任政协副主席的王刚之妻）。一处（联系部委）副处长霍银海（原钢铁学院系总支书记），处调徐功廷（原电子部系统），处员蒋延东（清华原校长蒋南翔之子）。二处（联系省市）处长刘广祥（原黑龙江县委书记），处调阎淮，处员韩学林（轻工部原部长孔祥祯之婿）。共计11人，正副局长二人，三个处每处处长、处调、处员各一人。我当时笑谈：短小精悍整齐划一！青干局编制20人，在其存活的八年中，从未满员过。

青干局建立健全了。但是非议随之产生，中组部盛传青干局是干部子弟、秘书和清华牌这“三种人”成堆。确实上述十余人中，干部子弟三分之

二，秘书一半多，清华牌约半数。其中最惹人注目的李志民、刘泽彭和我，则是“三料货”。

组织系统曾多次内部传达陈云1981年7月关于组建青干局的三条具体要求：“一、建‘庙’要十分慎重，这个局从领导到每个成员、‘菩萨’个个都要好的。二、这个局的干部，第一，要有一个正派的、水平比较高的老干部带头；第二、要有‘文化大革命’的‘逍遥派’中优秀的、德才兼备的；第三、‘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也要有，但也要优秀的，不是乱七八糟的，因为他们了解‘文化大革命’中青年的情况。三、这件工作是关系重大的，现在不要忙着去提拔干部，首先要花三个月至五个月的时间，把‘庙’建好，这是‘太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一直到县委都要按这个方针来办。”

青干局太特殊了：一、全国局级单位超千上万，由中央二号领袖亲自提议成立，局长和首批局员由他指定的绝无仅有，并且此前一直由中组部唯一的中央委员、常务副部长（正部级）兼局长。上行下效，如北京青干处长由组织部副部长金鉴兼任；陕西由副部长习正宁、又名习富平兼任。二、组织系统历来是“内升制”，青干局全部是“空降兵”的“外来户”，我们思想“异端”、如“鸡”立鹤群。三、青干局所进人员必须上报陈云办公室批准，各省市青干处长需中组部批准、处员报中组部备案（省委副部长已不用报备中组部）。当时正局级干部，中组部都不管了。而“青干局对人员要求太高，每个进来的人都要经过严格考察，就跟考察省部级干部一样。”（《李锐期颐集》天地图书有限公司，香港，2016年）因此，青干局被人诟病为“第二中组部”和“小中组部”。类似毛泽东当年对国家计委不满，在计委内另组“小计委”，由毛亲自领导。江泽民就对我这么说过。

与陈云关系密切的特殊机构中、身份更特殊的我，要为“干部的年轻化和知识化”大干一场，我行我素特立独行、思想激进言辞犀利。历来不善低

调行事，自然不招部长们“待见”。小小的副处长我不在乎，更为在乎的是：我引以为榜样，愿意为其“卖命”的李锐，却不愿为我“卖力”——呜呼，他不在乎我！

当时我不解：为何李锐对我重用而不重任。其后，李锐通过对我的逐步深入了解，对我的态度由提防到信任、再到偏袒，最后顶住邓颖超驱除我出中组部的命令，保护我顺利留在青干局。

李锐离休后，曾分别对我和几位“民主派局员”说：“当初组建青干局时，陈云的小秘书朱佳木交我十多人的长名单，口气强硬地说：“尽量从这里面考察选人，首长认为第一名阎淮不用考察必须要！”我心里有气，除阎淮之外，我只要了电子部的小徐，因为将来需要计算器管理干部数据。其他人谁知是不是朱佳木塞的私货呢？我一个也没要！”

第四节 参与考察习近平与建立第三梯队

5-10 赴东北三省考察了张德江、李铁映、李长春

1983年5月胡耀邦在六届人大座谈会上，创造性地提出了“第三梯队”的概念。他说：“老同志是第一梯队，运筹帷幄。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的同志是第二梯队，也不年轻了。所以，下决心搞第三梯队，进入各级领导班子。”

6月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肯定了“第三梯队”的提法，要求“趁我们还在的时候建立起来，只要有了第三梯队，跟随‘四人帮’的三种人就翻不了天，这是党和国家的大计。”

我认为：陈云念念不忘造反派，设立青干局、建立第三梯队，皆为防止“三种人”翻天，这代表了绝大多数老干部根深蒂固的观念。正如文革前十几年，第一代领袖们念念不忘“地富反坏”，唯恐那些“旧社会的残余势力”复辟，务必“以阶级斗争为纲”。文革后十几年，第二代领袖时刻牢记

“造反派”，生怕这些“文革的残余势力”翻天，这是变相的以阶级斗争为纲！

10月中组部颁发《关于建立省级后备干部制度的意见》。文件称：“中央最近提出，必须从现在开始抓紧第三梯队的建设。省部级后备干部，是指省委正副书记和常委，省政府的正副省长和中央国家机关正副部长的后备对象。每个省20名，共600名；每个部委5名，共400名；全国共1000名。他们必须是文革中表现好，政治上坚定可靠。具有大专文化程度，一般为45岁左右和40岁左右。今后提拔领导干部，除特殊情况外，都应从后备名单中挑选。后备干部由组织掌握，要注意保密。各级党委也应参照上述精神，选拔各自的后备干部。”

这个重要的指导性文件，成为第三梯队（后备干部的形象说法）制度正式确立的标志。通过我节选的上述关键内容，可以了解80年代喊得震天价响而又无比神秘的第三梯队的概貌。选拔和管理这千名省部级第三梯队，指导全国建立各级第三梯队就是青干局的中心工作。当时，除了埋头经济的总理赵紫阳外，总书记胡耀邦、“实际上说了算”的邓小平、“二老太爷”陈云都非常重视第三梯队。因此作为中央的一项重要决策，它成为中组部及各级组织部门的中心工作和头等大事。

青干局地方处三个人每人负责两个大区，李锐把他认为最重要的华北和东北交给了我。

1983年8月，李锐派我到东北三省，了解第三梯队工作进展情况和存在问题，为中央制定上述文件作准备，并顺路考察优秀的后备干部。青干局办公室的彭守范随行协助。

我们在辽吉黑三省的工作程序是：先由省委组织部长介绍工作情况，我们再面谈几个重点后备干部，最后向省委书记谈我们的“指导”意见。

官场的共识是：国务院近百个部委，最重要的是计委；党中央几十个机

构，最重要的是组织部。好几个省的青干处长都对我说过："我们省委书记说了，中央部委来人，司局长一般接待即可；中组部和国家计委来个处长、甚至干事，都要象亲娘老子般伺候。"官场顺口溜："跟着组织部，年年有进步；跟着宣传部，常常犯错误；跟着统战部，吃喝有补助。""组织部登门，双喜临门；（上级提拔一位，出现空位我们再升官一人。）纪委登门，大祸临门。"组织部的主要职责是选拔提升干部，所谓"见官大一级"，我们戏称"萝卜虽小，长在背（辈）上了。"

被视为"凌空出世"、"不可一世"的青干局，首次正式派员"出巡"，东三省都严阵以待。前几次去湖南和北京，我是代表中组部,干"中央机构调整小组"的差事。这次才是真正代表青干局考察干部和指导工作，干自己的业务。各省在中组部都有"代理人"（下文会提到山西想让我代理），他们又是干人事的，轻而易举就把"钦差大臣"的老底摸得一清二楚。辽宁书记郭峰曾任东北局组织部长，吉林书记强晓初曾任黑龙江书记，二人当年都是父亲的直接上级，彼此比较熟悉；黑龙江有父母亲的许多战友和部下仍任高官。因此三省的接待格外隆重并且热情，都住在接待领袖的最高级宾馆，如大连棒棰岛邓小平下榻的临海房间；哈尔滨花园村宾馆，是文革前各地为中央领袖去开会修建的一批"行宫"中较豪华的一处，共八个小洋楼，一至七号是供七大常委使用，八号是会议厅、舞厅和餐厅，可惜领袖们未曾享用。省委书记李力安安排我们住一号楼，我哪敢呀！坚持去六号，戏称纪念父母亲上级的上级、我们"东北野战军"的林总吧。

在东三省面谈考察的后备干部，后来升官较快、职务较高的有：

李铁映，沈阳市委书记处书记。省委对他印象不好，尽管李已是十二大候补中委，在他们推荐的16名后备中，竟名列倒数第3位，书面正式评价是："1961年留学归来，一直从事技术工作。有一定的思想水平和领导能力，工作方法简单。"省委书记处书记徐少甫说："金日成儿子金正日来沈，中央

通知李铁映接待。李不及早准备，前一天还在大连玩耍，连夜开车赶回。要是深夜路上出点事，怎么办？国际影响多大！”我与李面谈时，高我九届的中学校友侃侃而谈，思路清晰条理分明，对官场弊端厌恶，改革意识很强。加上1980年其父利瓦伊汉对邓小平抨击党内封建主义，促成邓著名的“八零政治改革”讲话，我对“李父亲”崇敬。爱屋及乌，当时我对“李儿子”印象很好。回中组部向李锐汇报时，我笑谈“接待金正日事件”，评论是：“不是没出事吗？小题大做！”正式的书面汇报，我理所当然省略了这段负面故事。

辽宁除了李铁映，当时的后备干部还有两人后来成为国家领导人。沈阳副市长李长春，后官至中央常委，我还特意找到曾与李长春同在沈阳机电系统的清华同学，进行“私访”，他们对李反映都不错。营口市长白立忱，后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薄熙来当时还在北京工作，次年才到金县任职，故无缘相见。

吉林省小，后备干部年龄也小，但后劲大。37岁的延吉市长张德江，我一看他的学历，是学朝鲜语、从金日成大学毕业，特别感兴趣，跟他聊了一上午，问了很多朝鲜的情况。他才貌双全，我在回京汇报中说了很多好话。1995年，我为新加坡总统访问延边打前站，还又来到这里全面考察了他，后来他仕途顺畅，现任中央常委。39岁的农牧厅副厅长回良玉，后任副总理。例外的是与38岁刚提为副省长的王金山的谈话，我印象深刻，与我同龄的王，在公社、县、地区都担任过领导，非常熟悉农村了解农民，经历完整，是当时全国最年轻的副省长。但他1964年只考上四平师专，智商和学识稍显逊色，我劝他百忙中多读书。2003年王才提为省长，半级爬了20年，成为全国最老的省长之一。

黑龙江两位41岁的市长，专业背景都与食品有关（农药和发酵）。齐齐哈尔市长陈云林，文革时在北京农大七年，见多识广、谈吐不凡、一表人才

——我眼高手低，难得对人这般评价。与他面谈无形中超时了，让后面的丛福奎久等了。陈后任国务院台办主任，访台会见马英九时，才貌皆不输阵。绥芬河市长丛福奎，沈阳轻工学院毕业后，在鸡东县15年，刚提到市里，他与陈云林完全是两种典型。我是去了解、而不是正式考察后备干部，因此最后见省委书记李力安时，只夸了陈，而对丛未置一词。（丛福奎任河北副省长时，因贪污被判死缓是后话。）我回局里，对黑龙江人小韩说："贵省人才济济，连后备干部都挑两个极端的。"

出差总要吃喝玩乐，我不爱吃喝，只爱玩乐。我酒量极小，外出谎称不会喝酒，而滴酒不沾，否则在豪放热情的东北，后果不堪设想。周末休息就公费旅游腐败了。子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我不智，但"水、动、乐"都喜好。辽宁的大海，吉林的松花湖，哈尔滨的松花江都让我尽情游弋。

9月回到中组部，李锐根据我们在东北调研的第一手资料，以及各地对后备干部工作的建议，领导青干局对"后备干部文件"进行最后的修改和定稿，于10月5日正式下发上述《关于建立省级后备干部制度的意见》。

5-11 赴华北三省区考察了习近平

1983年10月中旬，为了掌握各地对上述"后备干部文件"的执行情况，李锐派李志民和我，去河北、山西和内蒙出差。李志民主要是调研和指导各省的青干工作，我则侧重了解考察我的"华北辖区"的优秀后备干部。

在河北面谈的后备干部中，我对42岁的邯郸市委副书记陈玉杰印象最好，认为她是比较全面的女干部。（两年后她升为省领导，新世纪任国务院侨办主任，成为少有的没有家庭背景的女性正部长。）

10月20日，完成河北的正式工作后，我们在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陪同下，来到石家庄北几十里的正定县进行"三特殊"的考察了解习近平的工作。

一、李锐的特殊交待：李锐多次派我考察各地后备干部，都是地方提供人选，李从未指名道姓。二、考察对象的特殊经历：我们历来考察长期政绩突出者，而习去年才下派，今年刚升为正书记。三、非后备干部的特殊人物，青干局只考察作为省级后备的优秀干部，习当时并未被省里推荐。

因为不是正规的全面考察，我们就简单地完成了考察的三个程序。一、找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和习任副书记时分管的部门首长，共十余人开座谈会。请他们说习的政绩和失误、优点和缺点。座谈会的最后，我们说有意见还可以会下向我们反映，我们住招待所某房间。二、单独谈话，省委组织部长回避。不愿公开批评习者，就私下找我们来；我们看到某人在会上欲言又止或话中有话，就主动找他去。我们共向有负面意见的四人了解情况。三、约习近平面谈。让他谈过去的工作体会和未来的施政考虑，及对自己长处和短处的认识。我们还请他对一些负面意见（不提供反映者），作出解释。



1983年，在河北考察完习近平之后，在山西五台山与其兄习正宁（习富平，左二）合影，左一是刚接任的中组部青干局长李志民，右二是作者。

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是：习当过知青和农村小干部，体会“集体化”的弊端；他在农村实行了“大包干”责任制。习说，石（家庄）－太（原）铁路原来叫正（定）－太路（我刚知道），后因改线、而落后于石家庄；现在要

发展依托大城市的“城郊型经济”，不能只在地里刨食了。习说北京搞个“大观园”，参观拍戏都要排大队；他在正定建了个《红楼梦的》“荣国府”，既可游览又能拍戏，让穷正定着实赚了一笔；三国的赵云生在这儿，将来还要搞个“赵子龙公园”。当时人民公社还残存、“以粮为纲、重视农业”的观念根深蒂固，因此对以上三项争议较大，有人认为习不务正业。县级领导都坐汽车视察基层，习却经常骑自行车下乡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几乎走遍全县的乡镇。几十万人的县太爷不是寻常百姓和一般干部能随便见到的，习每天端个大饭碗到大食堂排队买大锅饭，往机关大院向阳墙角一蹲，谁都能凑上去聊几句；住在办公室里，干部群众有事推门就进。对习这样没有高干子弟架子、作风踏实平易近人，正面评价较多，但是也有负面议论：高干子弟下来镀金的还能不好好表现？我们“土改”入党时还没他呢，老同志辛辛苦苦革命半辈子，才当个科级的乡镇长，他呢？毕业没两年就是副县级、才一年就正书记啦！嘴上没毛办事不牢，净出“么蛾子”（鬼点子、馊主意之意）。更难听的还有：他在清华当“工农兵学员”时，我们还是“走资派”挨斗呢，毕业就来领导我们“老家伙”了。（文革后“工农兵学员”不是尊称，我们后来在《人民日报》发表《谈正确对待“工农兵学员”》为其“正名平反”。）

李志民和我，对这个与我们外在条件（干部子弟、清华校友、青年干部、秘书出身）和内在作风（朝气蓬勃、特立独行、平易近人、锐意改革）都很相似的特殊人才有点特殊情感。我们议论：胡耀邦说，要往每个县都派几个大学生，改变封建落后意识。从习近平的经历看，“选调大学生”下乡真有必要。耿飙之子又是我清华同系好哥们、文革中我的老红卫兵“部下”，同甘共苦同荣共辱，现在还一直继续交往，对他父亲的秘书小习，自然有亲近感。并且高干子弟外派都提升两级、首长秘书都担任局级领导（本书提到若干人），习平级调动、只担任副县处级实属少见。我们回中组部必

然是“上天言好事”，负面意见不能隐瞒，但我们有评价：那是年纪大、文化低的人，对干部年轻化和知识化的不满和对改革开放的不太理解所致。我们只是初步了解，1984年习近平与栗战书（时任团省委书记）经过组织部第三梯队考察组正式全面地考察，被确定为河北的省级第三梯队，进入千人省部级后备干部名单。

习仲勋确实很伟大——我不轻易用“伟大”，只因他一人敢为“胡耀邦被整”拍案而起，就够资格！但是，亲子之情、人之常情。现网上已披露——老习为小习，对河北省委书记高扬似乎有所拜托（也可能是希望高严格要求小习），高把此事，负面抖出。当时我为习老“托人不当”而惋惜。1985年中组部调习任厦门旅游局长，基本是平调。结果当地安排为副市长。之前先安排安子文的女儿安黎和叶飞的女儿叶小楠（她们都是我清华同系朋友），去厦门担任市委常委、副市长。但安黎还不是党员呢，于是常委就算了，只当副市长。她待了一段后，身体不好回北京了，空出一个位置来，就安排了习近平。

十七大习近平被选为“王储”之后，《华盛顿邮报》请我写考察习的文章，我拒绝。该报说：“你朋友、明镜出版社的何频请你帮助我们。”我说：“已经封笔，但老朋友抬举，我就口述一些往事吧。”《华盛顿邮报》2010年10月24日刊登了我的回忆。

在山西，因省里对后备干部准备不充分，我们没有面谈。李志民主持召开“陕晋两省青干机构座谈会”。陕西组织部副部长兼青干处长习正宁带队赴会。正宁又名习富平，是习仲勋的长子，我北京101中校友；电话中彼此早相识，现在一见更亲切。我们畅谈良久，当然提到刚考察的习弟。他说：“我们家几个孩子，近平小时候最调皮最聪明，父亲最喜欢他。他从小受苦了，知青下乡经受锻炼，比我能干、鬼点子也多；不像咱们老大学生清规戒律框框多，我们不如他们更能适应新形势。”

内蒙面谈的三位后备都很优秀。记者出身的区委秘书长田聪明，真“聪明”，后任广电部长和新华社社长等重要职务。工程师出身的内蒙大学书记云布龙，确是条“龙”，后任内蒙主席。41岁的乌云其其格，包头组织部长，“真格”的干练的蒙族女干部。后任内蒙主席独当一面，可见她不是无党派、知识分子、少数民族、女性的“无知少女”型的照顾类干部。最后官至人大副委员长。

5-12 建立北京第三梯队

1983年12月初，总书记胡耀邦催问分管组织工作的政治局委员宋任穷，“千人第三梯队名单什么时候拿出来？”

10日，宋任穷到中组部听取汇报。青干局长李志民汇报：13个省年底可报名单，10个省年底报部分名单，其它省明年初才能报。宋急了：“这不行！选好的名单，一部分也要，一个也要！1985年要开党代表会议，新中央委员就要从第三梯队名单上找人。1984年工作重点是建立省部级第三梯队。”

16日，中组部召开电话会议。部长陈野苹主持，中央各部委的部长带干部司长参加，各省省委书记和组织部长电话参加。会议传达耀邦和任穷指示，决定即刻成立第一批中央（试点）考察组，赴京黑苏三省市。

19日，李锐决定：刘泽彭副局长和韩学林赴黑龙江、刘广祥处长和霍银海副处长赴江苏、我一个副处级调研员去北京，积极准备，过新年后立即出发。

1984年1月3日，我进驻北京第四招待所。配合我工作的北京青干处赵龙飞和陈伟兰（陈云幼女）两位副处长及十余名处员（包括市委组织部其它处借调的）已在等候。北京组织部副部长兼青干处长金鉴留守市委。下面我较详细地介绍这一个月的考察工作，使您了解一个省级第三梯队建立的全过

程，也为历史留下第一手资料。

1983年，北京市委根据第三梯队文件要求，在几千名地局级干部中海选近百人；再由市组织部精选，淘汰半数；最后市委常委会确定37位“后备的后备干部”报中组部。

1984年1月4日，考察组正式成立，分为三个小组，我与赵陈二处长，各带三、四人考察十几名备选干部。各小组制定本月的工作日程。他们说：“你是清华的，能镇住那些工程师，就主要考察工业口。”

5日，赵、陈介绍37名备选的详细情况。

6日，市委组织部华淑芳副部长来酒店，我通报考察计划，请她安排各单位的接待工作。

7日，我们五人“工业小组”去京西门头沟区，考察市矿务局郗局长。了解了30多位局处长对郗的看法，具体做法是：对党委书记、常务副局长等“高级人物”和对郗意见较大的“重要人物”考察组二对一征求意见，我们一人主谈、一人记录；也有人不信任市委干部，要求与我“单挑”，我根据其意愿，决定是否记录。对其他“一般人物”则开几个小型座谈会，有人会上言犹未尽，会后再单独“补课”。8日与郗面谈考察。郗发展潜力不大，没有列为正式的后备干部。

我直接考察的13人，我们北京考察组考察的37人，都是按照上述程序和方法进行的。

9日，赴房山县的燕山石化总公司考察公司副书记田成平。白天与在矿务局一样，外围谈话和座谈会，晚上田来宾馆与我见面，面谈考察。我与考察对象谈话，一般情况尽量“一对一”聊天，不做记录，以减少隔阂拉近距离。对年纪较长者，我像是学生请教老师，引导他尽情发挥；基本同龄的，套近乎拉家常侃大山。象习近平小我近十岁，绝无仅有为特例。田成平与我同龄，父亲曾任副省长，清华同学，在校不熟悉但彼此知道。相似的经历拉

近我们的距离，谈话异常顺利。我早晨坐车百里，又连续紧张谈话，田也忙碌工作一整天，双方都很累但谈意甚浓。我提议索性从沙发转移到床上，在两张单人床上，背靠床背，双腿平放，他在这种舒服放松的姿势中，畅谈对改进工作的设想和全国改革的建议。我们把田列为前十名的后备干部，其中他最年轻，建议增加地方工作锻炼。（次年他提任西城区委书记，4年后任青海省委副书记，9年后任省长，不到十年连升三级；后任青海、山西书记和劳动部长，是比较全面的干部。）

次日，在燕化侧面了解曾在此工作过的市委工业部长袁立本和市经贸委副主任张明。文革中新建的燕化，有进京指标，许多干部子弟得以“三级跳”：从外省到京郊，再进城。袁、张与我一样，文革前的工科院校党员，凭借家庭背景和个人努力，在厂矿如鱼得水迅速进步。日后我分别与他们面谈。北航研究生毕业的袁被列为第六名后备。（袁3年后升任市委常委，1989年风波时与学生对话时态度暧昧，使他90年被调离党政主线，到航空总公司，最终停留在副部级。）张明清华大学毕业后与对象分到青海工厂，近30岁与未婚妻发生婚前性行为，受党纪处分。我力排众议，列张为后备。

1月11-16日，考察化工局长陆宇澄、机械局长汪统、水利局长颜昌远，他们是文革前毕业的工程师，都很优秀，皆被列为近期可提拔的前十名后备。（陆半年后任市委常委、1988年任副市长，汪1991年任市委常委，96年人大副主任。）其间考察的周某和龚某，被淘汰。

17-21日，考察经委副主任李润五，出身农民、作风朴实，真是公仆型领导，上下一致好评，当然列为后备。（李两年后任东城区长，1993年任副市长，1995年劳累成疾英年早逝。）二轻局37岁的副局长衣锡群，干部子弟作风泼辣、锐意改革，与李润五相反典型，老干部意见较大。青干机构的考察组，当然支持这种人，列为后备。（衣后任市长助理。）其间淘汰杨某。

1月下旬，我除了面谈几人外，其他两个小组考察的重点对象，要听取市

领导的看法，北京的组员不便参与，也由我代劳。先后与市委书记段君毅、顾委主任焦若愚、市长陈希同、副书记徐惟诚、常务副市长白介夫等人交谈。其中市委副书记贾春旺是我20年前的良师益友，1982年他曾说；“正派的你，到青干局选干部，太合适啦！”1985年他任安全部长，我回敬：“最不懂阴谋诡计的你，去搞阴谋诡计，太不合适啦！”1月23日，贾介绍平谷县委书记李其炎：“去年在平谷开现场会，各区县干部在大食堂十人一桌四菜一汤。李把我引到小食堂，八碗八碟水果茅台，我生气回到大食堂。怎么能这样搞呢？不过他能力还是很强的！”我们还是把李列为后备。李其炎下半年即提为市委常委，93年升市长。96年市委书记陈希同倒霉，殃及鱼池，李改任劳动部正部级副部长。

考察对象中，两个朋友是我的难题。

张伯光，我直接考察的最后一位，37名候选人中唯一的处级干部，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金鉴刚把兼任的青干处长让给他。青干处赵和陈两位副处长都不便直接考察顶头上司，就推给我。我对张太熟悉了，1982年北京青干处刚成立，只有金鉴处长和张伯光、赵龙飞两位处员，李锐交办我处理北京的一些案件，我都依靠他们协助，他们真是我的好哥们。当然我还是公事公办地找张的上下左右征求意见，金鉴当然是好话说尽。例行的面谈不能免，彼此都挺忙，我让他下班路过宾馆，共进工作晚餐交差。考察组最后讨论时，我谈出对张的一贯看法；在原则性和品德上，他是优秀的模范干部，但任省部级领导毫无可能！赵陈二位副处长私下对我说：“淘汰正处长，我们两位副处长都要背黑锅。”反正也不是立即提拔，我屈服了，把张排在后备名单靠后面。（86年张升任石景山区委副书记，最后停留在局级。）

陈元，已是西城区委正书记，我近20年的铁哥们，市委把他列为候选第一名。我和其妹陈伟兰当然回避，由赵龙飞小组直接考察。考察组全体最后讨论名单时，都认为陈元仍应列为头号后备。我是私心极重的组长，特爱惜

羽毛，拍板陈元在第四名，其妹陈伟兰非常支持。2月7日考察组与市委交换意见时，市委书记段君毅、市长陈希同等诸常委悉数参加。当我谈到37名候选人确定25名正式后备时，段君毅（去年调整北京局级领导时我与段多次交道）半真半假：“小阎够狠的，砍掉三分之一！”当我依次介绍后备干部的建议培养方向时，段书记对高干子弟素有好感，1982年就把国家计委陈元工程师、市委组织部刘延东干事和陈昊苏等三人越级提拔为北京三个重要区的副书记，1984年又想把副处级的孔丹弄到海淀区当副区长，这时他又发话：“我们最优秀的陈元，年内就要提到市里，还是排在头里吧！”我只能同意。2月9日我向中组部领导汇报北京考察结果时，李锐对我“坏笑”：“你朋友排第一呀！”我立即洗清自己：“我就怕你们说闲话，把陈元放在状元、榜眼和探花之后的第四名。老段坚持，我没办法！”陈元下半年升任市委常委，1998年任开发银行行长，由副部到正部爬了14年，2013年在邓朴方卸任后，陈任政协副主席达副国级，一大级即两小级，用了近30年，终于修成正果。

我们确定为第三梯队，而后升任省部级的还有：丰台区委副书记陈昊苏，下半年升任副市长，2000年正部级的对外友协会长；畜牧局长刘江，1986年调任农业部副部长，1993年转正；北京日报社副总编李志坚，1987年进市委常委，2001年任正部级体育总局党委书记；海淀区委副书记张福森，1990年入市委常委，2000年任司法部长；团市委书记林炎志，1994年升到副部级，我认为林因太左没再进步；市建委副主任万嗣铨，唯一非党人士，91年升任市长助理，后为市政协副主席。

2月1日春节前，三个“第三梯队考察组”回到中组部。刘局长真是好人哪，在黑龙江考察25名，只淘汰3人，淘汰率12%；刘处长在江苏考察40名，确定32名，淘汰率20%；阎处调在北京考察37名，砍掉12人，淘汰率高达

32%，等于上述二刘之和。段君毅说得对，我“最狠”！但是我们选定的25名省部级后备中，14人（即56%）后成为正式的省部级领导（其中8人达正省部级），使用率成倍地高于各省。

我们为这79位后备干部，每人写了500字的、描述其特点的小传，送邓小平、陈云、胡耀邦、赵紫阳四常委和主管人事的习仲勋、宋任穷两政治局委员。

5-13 建立天津第三梯队

1984年3月，在总结试点考察组的经验和不足后，由青干局制定了第三梯队考察程序。4月由青干局长李志民和部研究室主任刘俊林等率领的第二批考察组，赴四川和广东等七省。七省共报来272人，中组部考察后确定195人，淘汰率28%，接近我的劣迹。

6月，第三批余下的20省区考察组全面出动，中组部还借调一些离休老干部参加。我私心杂念，要去西藏公费旅游，体检合格，整装待发。突然，李锐觉得天津重要，让青干局副局长刘泽彭替换某离休老干。刘认为我分管华北，与天津干部熟悉，又有在北京考察大城市后备干部的经验，非拉我陪绑：“就算帮哥们忙！”我只能忍痛放弃西藏，23年后才自费还愿。

1984年6月，我们在天津干了一个多月。淘汰7人，确定18名第三梯队，其中7人日后成为省部级领导：

冶金局长张立昌，1985年升副市长，1993年市长，1997年市委书记，2002年政治局委员，2008年病逝善终；

检察长梁国庆，1986年最高检副检察长；

电子局女局长李慧芬，1988年副市长；

半导体公司总工叶迪生，1993年副市长；

开发区副主任王述祖，1998年副市长；

化工局长闫家铭，1999年副部级化工部纪检组长；

河西区副区长叶厚荣，2002年市政协副主席。

此外，农林局长陈钟槐，后任市副秘书长，94年患癌症，坚持工作，2001年病逝，被誉为“焦裕禄式的好干部”。若不得病肯定提拔。

我直接考察并面谈9人，淘汰3人。

考察对象中的两人，我们与市领导分歧很大。

市委秘书长郑万通，现在公开资料显示：“1970-78年天津市河北区委宣传部干部、副部长”，把文革结束前与后，写在一起。76年前能任宣传部领导，其文革表现可想而知。郑曾任市委书记陈伟达秘书，更深得市长李瑞环赏识，在候选人中名列前茅。我们认为郑不符合条件，刘泽彭让我出面说服陈伟达和李瑞环。陈伟达已内定调京，3个月后离津，顺水推舟不再坚持。李瑞环不干：“我大老粗，还要靠这个大秀才。”刘泽彭亲自与李密谈，晓以利害，宋任穷前秘书的话果然奏效。郑未列后备，因此在天津不能升迁。1993年李瑞环任全国政协主席后，提郑为副秘书长，1998年秘书长，2008年郑万通升任政协副主席，步入国家领导人行列。

团市委书记张炜，1980年在北大任学生会主席时，参加竞选区人大代表，被认为有自由化倾向。我认为不到30岁的他，思想深刻、锐意改革，是天津最优秀的后备干部。我们力排众议，把张炜列为后备第二名（状元太招风）。7月中旬李锐来天津开优秀后备座谈会，我推荐张重点发言，李锐印像极佳。16日，我们专门约张进行考察之外的一上午私人聊天，成为朋友。次年我到天津参加第二届中青年经济讨论会，又与他深谈。1986年6月张捧我们的场，参加青干局在河南召开的“第三梯队研讨会”，是中组部副部长和河南省委副书记外的最高级干部。19日晚张炜、吴稼祥、杨东平、唐若昕四老友和我们，古今中外海阔天空神聊至半夜。张炜次年任天津开发区主任，

1989年5月19日辞职："我抗议动用军队对付手无寸铁的和平示威的群众。""六四镇暴"后致信党中央,表示抗议。张立即被贬为社科院资料员，1993年赴哈佛读硕士，后读牛津获经济学博士。中国百万"领导干部"、"千名省部级后备"如此壮举者，我知仅他。自叹不如，我敬佩！

2006年原天津青干处已任市级首长的朋友，退休前邀我故地重游，聚会时青干处众朋友说："你选的第三梯队，没有一个腐败的，还出了位张大英雄！"我假谦虚："你们配合得好！那批后备干部都已退出政治舞台，也快退出生活舞台：但愿他们都能在家里、不要在监狱，安度晚年！"

1984年8月，全国各省的第三梯队都已选定。共计632人。其中——

平均年龄43.5岁，女性占14%，少数民族占10%。

教育程度：大学（含研究生）91%，高中7%，初中2%。

家庭出身：劳动人民84%，剥削阶级11%，革命干部5%。省部级以上高干子女，不及剥削阶级子女的一半，可见当时我们的开明。（"六四"后提拔的情况，则另当别论！）

文革表现：受冲击39%，未受冲击46%，有抵制14%，有错误1%。

现任职务：省部级1%，正地厅级26%，副地厅级57%，县处级16%。

我们为每人撰写500字的小传，以每省一册，报送政治局。我在初稿中只敢披露曾任辽宁和湖北省长，2004年因受贿判刑11年的张国光的小传如下——

张国光，男，汉族，1945年4月生，辽宁绥中人。1966年入党。1968年北京航空学院毕业。曾任沈阳松陵机械公司技术员、副科长、组织部副部长、党委副书记、书记，1985年4月任沈阳市委副书记。工程师。

文革初，参加群众组织，是一般成员。后期在车间劳动，忙于业务，很少参加运动。1976年"四五"运动时，对"四人帮"的作法反感。

好学上进，读书时曾被评为三好学生，五次被评为松陵机械公司先进生

产者。事业心强，有政治责任感，工作中肯学肯钻肯干，技术工作有成绩，撰写《歼教六座轮温度控制》论文，获省航空协会科技二等奖。82年担任组织部领导后，提拔一百多名知识分子干部进各级领导班子。组织领导和活动能力较强，思想开阔。在抓组织、宣传、工会、共青团、武装部工作中，成绩显著，曾受到市的好评和奖励。作风深入，注意调查研究，要求自己严格，待人宽厚。思想坦荡，为人正直，尊重和关心老同志，虚心听取各方面意见。看问题全面，客观，处理问题慎重、稳健，文字、口头表达能力较强，群众中有威信。

马列主义理论知识掌握的不够系统。

培养方向：工业工作。

看过初稿的朋友，建议我再披露“没倒霉”的小传。下文将提到1985年补充第三梯队时，我考察的宁夏干部马启智。下面是我为他写的小传（必备：自然状况、文革表现、优点、不足、培养方向，五个部分）——

马启智，男，回族，1943年11月生（42岁），宁夏泾源人。1972年入党，1968年中央民族学院毕业。曾任中学教师，自治区团委副书记，现任固原地委副书记。

文革初参加群众组织，一般成员。“批林批孔”期间，参加一般性学习和批判。“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对批判“唯生产力论”有看法，拒绝为“批邓专栏”写稿，被指责“政治上不成熟”。

事业心强，有组织领导能力，工作一贯认真负责。在区团委时，经常深入基层帮助青年解决实际问题，并针对不同时期青年工作的特点，组织青年开展有益的社会活动。任地委副书记后，熟悉工作快，掌握政策稳。在负责“打击刑事犯罪”工作中，指挥果断、工作扎实、效果较好。有改变固原落后面貌、实现经济翻番的决心。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提出了切合实际的经济发展意见。工作大胆有魄力，坚持原则敢于批评和纠正不正之风。善于团

结同志，联系群众广泛，对自己要求严格，在群众中威信较高。

不足之处：遇到委屈和挫折时，情绪波动较大。

培养方向：政法工作。

胡耀邦非常重视小传。青干局常常收到他的批示。如小传中写“文革未发现问题”，胡认为是“推卸责任，要说清楚，有问题还是没问题”。此后我们在文革表现一栏里，完全写事实，并由调查人签字负责。“有骄傲情绪”，耀邦就批：“没本事能骄傲？不听老同志的就是骄傲？说清楚哪方面有骄傲情绪。”对“急躁情绪”，胡也不满意：“事情这么多，不着急行吗？”

截至1985年5月，北京、浙江等15个省市的领导做了调整。年龄过线的59名领导退了44人，新进65人多数出自第三梯队。调整后，15位书记平均年龄59.2岁，比原来下降5.5岁；15位省长平均年龄56.4岁，比原来下降1.8岁。

1985年至1987年，在1984年“第三梯队”名单的基础上，分别推出了三个更新后的版本。

5-14 1985年补充第三梯队

1985年，根据中组部部署，各省都又报了一些候选人，青干局派人去考察，符合条件者，补充进第三梯队。

8月，我们去了西北，在宁夏补充三人，其中我直接考察了两位回族干部。我从塞外江南的银川坐吉普车颠簸800里，到中国最贫穷地区之一的固原，实地考察地委副书记马启智；他91年任区常委，98年升为区主席。还有38岁的区团委书记马文学，93年任区副主席。甘肃补充5人，日后获提升者：兰州市委副书记柯茂盛，94年任省人大副主任。甘南州长藏族干部李德奎，93年任省检察长，2003年任省人大副主任。粮食局女副局长杜颖，98年省政协副主席。

我们从兰州驱车沿河西走廊北上，第一站武威。我政治第一桶金的挖掘地，离别十年旧地重游，我轻车简从避免衣锦还乡之嫌。但中央大员在省委部长陪同下驾到，难免惊动地方。武威没有考察任务，我让同行其他人睡一觉后即刻启程。我一人重访工作过的煤机厂和生活过的小平房。往日的朋友几位已成地级要员，午晚两宴不可免，我说：“此地无公干。”旧友：“哥们自掏腰包！”当夜，我乘火车赶赴张掖，会合考察组。

在张掖见到市委书记王化成，当年我在武威的厂长，提拔我、又放我回京的恩人。十年间他几次进京，我热情接待不在话下。现在我公差到他地盘，最高规格的隆重款待不言而喻。在张掖还遇到在此调研的省委常务副书记刘冰，我清华大学20年前的老领导。我对师长反对“四人帮”的壮举，一直很钦佩；他对学生当年反对中央文革、现在要害部门，也很欣赏。刘冰秘书陆浩，我们年龄相近观念相同，一见如故畅谈甚欢。3个月后陆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1987年他邀请我到甘肃鼓吹政治改革。陆浩1993年进省委常委，2001年任省长，2006年任省委书记。

1985年10月我们去了西南，在贵州补充第三梯队六人，其中毕节地委副书记杨序顺，侗族，98年任省人大副主任。在贵阳必然见了省委书记胡锦涛，我们在北京就熟悉，现在校友兼朋友异地相见分外亲切，他送我两瓶茅台酒。

在云南补充四人，都很有特色。两位民族干部日后都成为省级领导：大理州副书记杨健强，白族，1993年升副省长。牟定县委书记和占钧，纳西族，1993年任省检察长。两位汉族，志不在仕途：省府副秘书长郭正秉，后任省社科院长，著书立说，不幸1992年49岁逝世。昆明市委常委李师程出自普洱茶世家，日后任思茅地委书记时，于1993年和1995年举办了两届普洱茶叶节暨国际研讨会，成为中国普洱茶文化的倡导人。

同期，在青干局机关处主导下，党中央和国务院的63个直属机关的第三

梯队也建立了。

截止1985年底，全国省部级后备干部共1009名（85年省市增补118名），其中大学文化93%，有专业职称77%，地厅级81%，女性1%，少数民族1%。省部交叉28人，已提省部级74人，调整出去2人。1984年，中央办公厅干部薄熙来要求下基层锻炼，任辽宁省金县副书记，未进入第三梯队。1986年省市拟补充60人，部委拟补充50人。第三梯队建立后，每年常规考核、滚动调整、有进有出，保持在千人规模。中共十五大至十八大，政治局委员半数以上，十七届和十八届常委除两位，皆在当年第三梯队中。

各省委组织部、各部委干部司管理的地厅级后备干部一万八千人，地市州委组织部负责的县处级后备干部九万六千人。后备干部名单上的干部，本人并不知道自己在这份名单上。

现在看来，第三梯队还只是党内有限民主，但当时已是很大进步。此前的1982年中组部编印的《1980年以来各省推荐的优秀中青年干部名册》中，思想最解放的北京推荐21人，平均年龄51岁，中学以下文化占1/4。而较落后的西北四省区，推荐的45人中，初中文化竟占42%。《中央负责同志推荐的中青年干部资料》中，14位领袖推荐34人。平均50岁，60岁以上4人，最高竟达69岁；中学以下文化20%。其中多是秘书、参谋等身边工作人员和女婿、养子、儿女亲家等亲属，高干子弟比例很高。

第三梯队建立后，胡耀邦提出，分期分批把他们借调到中央工作，每省一名，每次一年，参加中央的调查工作和日常会议，以了解中央是如何工作和决策的，开阔眼界，提高知识和理论水平。青干局经常对他们考察和谈话，帮助他们建立起相称的履历。长期在机关的，调到下面市委任职；没进过党校的，安排进党校培训。我们与外交部协商，派了十余位干部到国外当参赞，还派出干部到杜润生的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

名单建立后，提拔干部原则上都要出自名单。否则要有一个说法，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并非尽然。

第五节 整党唱反调与莫干山会议出风头

5-15 为李锐分析“老五届”

1984年春节后，李锐找我去。

李锐：“耀邦和紫阳最近都提出选拔干部要向下看，特别要注意40岁左右的知识分子。主要是你们这些红卫兵大学生，我准备写篇文章，谈这个问题。”

我说：“红卫兵大学生不好听，有专门名称叫‘老五届’。”

李问：“什么‘老五届’？你们清华不是六年制吗？”

我答：“一般大学五年，少数是四年或六年；三年以下就是大专了，现在工农兵大学生就是大专待遇。文革开始时大部分大学在校学生是五届，所以统称‘老五届’。高中和初中各有三届，我称‘老六届’。”

李锐：“好！陈云讲青干局要有红卫兵大学生，还是你们了解中青年的情况。你首先帮我查找全国中年知识分子的统计数据，其次重点分析老五届的特点。你回到局里和了解情况的同志议论一下，尽快交稿。”

中组部的档案室和数据室，全国高级干部的各种数据和信息齐全，可是知识分子的数据却奇缺。但是组织部牌子硬，一个电话打到人事部，各种数据及时报来。谁说中国办事效率低，那是官对民、上对下、以及平级之间，下对上总是高效率。我与李志民、刘泽彭、崔武年讨论两次，由崔执笔形成一个分析材料。我则根据自己的经历和感受，形成李锐文章中的一些段落，其精髓是——

“这一代人是50年代的红领巾，60年代的共青团员，学习过雷锋。其世界观的形成时期，正是我们党威望最高、社会风气最好的时期。文革中多数

人由盲从而逍遥，到冷静思考，自觉把个人命运同祖国连在一起。现在，他们与现代化紧密连在一起，政治上逐渐成熟。他们是认真思考、勤于学习和奋发向上的。其接受教育时是建国后教学质量最高的时期。十年动乱中，许多人学习了社会科学知识，具有求实精神，增强了实际本领。老五届‘四个面向’（基层、厂矿、边疆、农村）的分配，使他们来到边远的小单位，‘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独当一面亲自解决繁杂问题，走上‘管理技术型’。精力旺盛，思想开阔，勇于探索，敢于创新，处于事业上出成绩的年代。40岁左右，是一生中记忆力、理解力、探索力综合指数最高的阶段。他们年轻人的锐气和热情没有消失，又略具中年人的审慎和经验。总之，这是承先启后、要在中国的下一章起决定作用的一代人。”——这不就是我美化后的简历和自我吹嘘吗？

毛泽东欣赏的大才子李锐，真是大手笔，在我们提供的数据和对老五届分析的基础上，穿靴带帽、高屋建瓴，迅速形成一篇佳作。尽管准备以李锐个人的名义发表，并且不附署中组部副部长的头衔，李的身份还是要求使此文在部内高层反复讨论和慎重研究。修改比写作的时间还长，磨平了一些棱角，在文章最后加上“强调起用40岁左右的干部，决不是不重视50多岁的人，也不是轻视老同志的作用。”这篇《尽快启用一代新人》的著名雄文终于发表在1984年3月23日的《人民日报》。李锐对此文甚为得意，在他所著的《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北京）之中，收录59篇文章，有关组织工作的仅此一篇。

文章发表后反响巨大、好评如潮。认识我的老五届朋友，都看得出文中对老五届的溢美分析是我的思想，表示祝贺。全国许多老五届们，致信报社和组织部，感谢有人终于为他们说话了，也反映一些问题。4月20日应北大老五届留校教师李中华等五人的要求，邀请他们到青干局座谈。受“北大座谈会”的启示，我们在25日召开中央部委“老五届”，26日召开北京市“老五

届”两个座谈会。会后把与会者反映的困难和希望以及我的建议，写成报告送李锐参考。

5-16 整党中说真正的危险是缺少民主

1983年底，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关于整党的决定》。

1984年初，中组部开始整党，陈野萍部长作个人的“对照检查”。全局讨论部长检查时，一片赞誉之声，唯独我唱了反调，引发议论。同事崔武年感慨：“阎淮发言挺有新意，他说，陈野萍讲自己的不足是‘稳重有余，创新不足’，但是，试想一下，如果反过来，‘创新有余，稳重不足’，他还能当组织部长吗？真是一语中的！”针对陈部长说他曾受左的影响，我调侃“在中组部左还是比右安全！”我对自己的剖析，也令崔反思：“阎淮说他思想里右的东西比左的多。我很惭愧，曾经是左的比右的多——虽然现在对左深恶痛绝。”（崔武年：《我的83个月》，34页）此事我早已忘记，看崔的回忆录才想起。

崔武年，1983年11月至1990年9月在青干局。每会认真记录，每晚详细日记；《我的83个月》50万字的资料全部来自他当时的笔记和日记。北师大历史系文革后毕业生，在文学刊物《收获》上发表过剧本；学历史的文学家潜伏在机要部门，“太恐怖了！”此书留存许多珍贵史料，填补我准老年痴呆的记忆空白，我在后文中将继续引用。上述第三梯队的统计资料也是他做的，在此郑重感谢！



1985年，作者与青干局同事崔武年（左），这是我们两位挚友少有的二人合影。

3月22日，我做“对照检查”，崔武年在《我的83个月》中有700字的记录，扼要如下：“文革前，我是正统纯真的人生观和肤浅教条的世界观。文革十年，行动是斗争、挫折、锻炼，思想是盲从、思考、成熟。”我对政治问题与当局相异的看法，引起非议，崔当时记录：“阎淮认为过去的错误，并不是个别人的疏忽，而是普遍性社会思潮。文革这样的总体性错误，在中国这样的环境里，还可能在局部发生。尽管整党要清理三种人，但是，真正的危险不是三种人，而是缺少民主！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最终是使每个社会成员都能充分发挥和发展自己的聪明才智，但实践证明靠现在的这套人事干部制度不行，所以要改革。而制度上的改革，要从组织路线上的拨乱反正入手。青干局任务繁重、道路漫长，切不可盲目乐观！”（《我的83个月》40页）局内正统的老同志不满：“小阎，对照个人检查，你怎么对照党的政策、制度和路线？”我当然不示弱：“整党，就是要整‘党组织’和‘党员’两方面，而党组织比党员更重要。”

这说明当年身居要津的“红二代”中，还有立党为公、不能与“党保持一致”者。我对“清理三种人”和“造反派记录在案”已不再认同。我在

1984年整党的“个人检查”中，对中国共产党发出振聋发聩的警告——“真正的危险不是三种人，而是缺少民主！”不幸而言中，三、五年后胡耀邦和赵紫两位总书记非正常下台，因此，在1989年“镇暴”后，我就更不能“与党一致”了。

5-17 莫干山会议表现了一番

“1984年秋，在浙江莫干山召开的‘中青年经济科学讨论会’，是经济改革史的开创性事件，使一批青年经济学家脱颖而出，为80年代的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引起中央高层的重视。”（引自网络介绍）

1984年8月，时称“改革四君子”之一的黄江南（另三位：王岐山、翁永曦、朱嘉明）来中组部青干局鼓吹此会。（军人站岗不挂牌子、戒备森严神秘莫测的中共中央组织部，来访者一般只能到隔壁胡同的“上访室”递材料、谈要求。组织部系统以外，被同意接待者也只能在传达室旁边的平房“接待室”被谈话。而求见青干局的青年名人与非名人，经常被请进组织部大楼，直奔青干局办公室。）黄介绍：“我们在全国征集到一千多篇经济论文，以文选人，一百多位中青年与会，恳请你们参加。”尽管无官场级别的与会者，不属于青干局管理范围，中组部也无参加此类会议的先例，青干局还是力主参会。请示李锐，他指示：“只去一人，别太张扬。”临行李又告诫我：“你要夹着尾巴开会！”

9月2日经杭州上莫干山，我被拉进“会议领导小组”。我牢记部长的谆谆教诲，宣称：“只参与幕后策划，决不抛头露面。”



1984年9月，莫干山会议合影局部，前排右三王岐山、右四作者、右五黄江南。

9月3日开幕式，薛驹省长等领导致辞后，主持人介绍许多代表是冲破阻力与会。提到江苏泰州28岁的闫卡林，工厂不准请假赴会，离厂即除名，逼他辞职而来。我气愤不已按捺不住，递上纸条。主持宣读："工厂无理，中组部要干预！一一青干局干部"。全场鼓掌，要求我讲话。几番推辞未果，我上台慷慨激昂，痛斥基层的封建专制和官僚主义，允诺此事定要一管到底。全场再次爆发热烈掌声。三天后，江苏组织部派人上莫干山，带来许多闫卡林在工厂的一大包"劣迹"资料。我说："整人的材料，我不看！若他表现坏，何不早处分？你们回去整整这个厂长吧！"我认为：即便泰州厂在我们的压力下，勉强让闫卡林复职，但他今后也只有"穿小鞋"的份儿。于是我就和与会的《经济日报》总编安岗协商。安考察后，决定聘用闫卡林。纪念莫干山会议30周年，财政部科研所所长贾康在《南方周末》提及此事。闫卡林也"够意思"，1994年荣获全国首届"百佳记者"称号。

这个突发事件，使我从幕后走出曝光，许多代表找我反映自己的困难和要求。责任心和使命感令我旧习难改、又翘起尾巴，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我以中组部青干局的名义设计一张《代表调查表》，其中除了基本情况外，专设了"困难阻力"、"要求希望"和"今后计划"三项。向代表分发后，收回75份。根据对调查表的分析，利用晚上时间，我写了近万字的《一代新人

在崛起》的调查报告。

开幕式后，会议进入分组小会。我先后参加了宏观、理论、开放、金融等小组讨论。5日，结合自己12年工业领域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思考，我在工业组重点发言；还参与有关《企业法》和《破产法》的研讨和建议中央对此二法立法的建议稿的起草。这些都得到组长杨沐硕士和众组员的好评。回京后，我邀请刚升任社科院工经所副所长的杨沐参与了北京青年企业家协会的定期活动，我们长期合作。

9月5日下午，我与刚上山的赵紫阳总理的秘书李湘鲁、张劲夫国务委员的秘书孔丹，在山间竹林中漫步畅聊。李、孔过去与我相识，在各种会议上见过多次，但无深谈深交。自此之后，价值观使然，李湘鲁至今仍是友人，孔丹则为路人。9日会议闭幕全体合影，大会安排“贵宾”在第一排随便就坐，我左右分别是当时的好友王岐山和黄江南，我们尽量靠边坐。此照片，广流传。柳红的《影响改革进程的莫干山会议》及她的诸多著作中皆有此照片和说明，对王岐山、中组部阎淮和黄江南的座位有特别说明。

会议期间，我结识的各路经济才俊，以后大多成为政府高官或经济学家。与带病参会陈一咨的长谈，确认了彼此全面的共识。在此后三十年的国内经济改革、政治改革和海外政治、学术活动中，我和陈长期保持着合作与朋友的关系，直至在美国洛杉矶为他送终。中宣部理论局的副局长贾春峰和吴稼祥与我政治理念高度相同，此后多次共会；政治改革中，我们相互呼应、摇旗呐喊。

9月11日，农历八月十六，省委安排观钱塘江大潮，眼看壮观的自然大潮，心想社会的改革大潮，心潮澎湃。12日，参加省组织部的考察第三梯队大会，被迫作“指导性发言”。下午听说朱嘉明接“母病危速归”电报，但只有次日晚班飞机。13日，我要一小汽车，陪朱游览名胜以解忧伤，黄江南同行。朱回京后，母不幸已去世，我去他家吊唁慰问。

9月中旬回到中组部，向李锐汇报。李见面就说：“你又折腾了！还散发什么调查表？”我递交《一代新人在崛起——“中青年经济科学讨论会”代表情况简析》，其目录如下：

一、代表的特点

1、年轻有为、朝气蓬勃——年龄低（平均34岁）

2、有理论、有实践、有真才实学——知识高（大学和研究生85%）

3、信仰坚定、事业心强——素质好（党员55%，高于全国干部的40%）

4、一代新人在崛起——“老六届”中学生的特色（待开垦的处女地，文革大学生已被重视）

二、困难与希望

1、青年不被重视（82%的与会者认为）——领导和社会双重原因

2、知识分子政策不落实（55%）——不能只落实到“知识分子代表”身上

3、入党难（23%）——知识分子卡知识分子

4、要求实践机会（16%）——可喜的萌芽、必然的趋势

三、建议

1、重视三四十岁“新人才群”的崛起

2、热忱关心、尽快解决其困难

3、抓紧培养各界“青年领袖”

4、培养“青年经济人才”三措施

（1）中年学者到地方任职

（2）到地方或企业咨询指导

（3）促进学者与厂长的联系与结合



1984年9月，杭州莫干山会议之后，朱嘉明（右）母亲病危，作者（中）和黄江南陪着他。

我在结束语中说：“过去我们对党政干部很重视，最近对企事业领导如厂长经理也注意了，但对中青年经济学者却有所忽视。”

李锐看后说：“你提出很重要的问题，我们确实应该重视‘老六届’文革中学生，特别是其中的经济学者。”（一年后的1985年10月，崔武年与我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时，才正式使用“老三届”一词。）10月，李锐在新华社的《半月谈》发表文章，介绍我的上文。内蒙古供“领导参阅”的《决策参考》，1985年5月8日全文刊登我的此文，并在“编者按”中称“望能引起各级领导和有关部门的注意和重视”。

5-18 “三所一会”及“作协四大”

1984年12月，百余位中青年经济学者在政协礼堂，召开一整天会议。首先，讨论了当前的形势。其次，莫干山会议领导小组汇报了莫干山会议所形成的、提交中央的七份专题报告，以及赵紫阳等领导的批示。最后，我用一小时，宣读了上述《一代新人在崛起》的调查报告，其间多次被掌声打断。会后许多人赞扬我，说出他们的心声。会上，我又结识一些“各方神圣”，其后接触较多的是周小川和何维凌。会议的另一亮点是河南省长何竹康来招

聘学者到河南任职或顾问。我从中协助考察推荐，最后促成朱嘉明任河南体改委副主任，黄江南任河南外经贸委副主任。

莫干山会议后，赵紫阳重视青年经济学者，随后成立了体改所与青年经济学会。

1984年底，体改委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成立，陈一咨任所长，许多骨干都是近半年结识的新朋友。陈一咨邀请我参与体改所的组建和此后五年的诸多内部研讨和公开活动。最近20多年，在海外与其正副所长、多位室主任、及许多骨干更是接触频繁。

1985年4月，北京青年经济学会成立。原拟称“中国”，后为慎重，改称“北京”。会长是赵紫阳的大秘书鲍彤，副会长陈一咨、陈元、王岐山，我被推荐任理事。只要在北京，我就参加学会每月一次在陶然亭公园的研讨沙龙。对此沙龙，作家柯云路在改革小说中有生动的描写。同期成立的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所长王岐山）、中信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李湘鲁）与体改所和此青年经济学会并称“三所一会”，其骨干大都是“莫干山好汉”，许多人是我此后30年的哥们。

1985年秋，北京“市”青年经济研究会成立，市领导陈元任会长、马凯任副会长，也拉我担任常务理事。外界认为：陈元有与陈一咨打擂台的意味，但实际影响仅限在北京市。引人瞩目的是，86年陈元主持的“中国经济紧运行”研究，列入国家重点课题，动员百名研究者（我亦参加），举办多次大中小型的研讨会，首次引进“社会主义短缺经济”学说。

1984年10月，团中央召开青年改革积极分子座谈会，团中央第二书记胡锦涛主持，经委副主任袁宝华等出席，我代表中组部青干局与会。先是全国15位青年发言，随后领导讲话，最后表示对中组部的尊重，胡锦涛：“青干局那位同志也讲讲吧。”我推托。身边的清华朋友、团中央第三书记刘延东：“老阎，捧捧场嘛！”我只好上台侃了五分钟。全场都认为组织干部肯

定是“真大空”的官话和套话，孰料是耳目一新的人人心中皆有、口中皆无的尖锐实话。说掌声雷动并不过分。会后，刘延东向胡锦涛和李源潮介绍我。胡：“我说中组部的人怎么这么敢说、这么能说呢？原来是清华小学弟呀！”次日，我们把这15人请到青干局又开了一个小型内部座谈会，让他们畅所欲言，讲讲困难、吐吐苦水。

由于我在莫干山及其随后的表现，在首都经济界小有名气。他们的各种会议也经常邀请我去“指导”。推辞不掉、又获青干局或中组部批准我去“学习”的有以下会议——

1984年12月7日，经济日报社请我参加国家机构经济职能讨论会，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中宣部、社科院都派人与会，先到的人看着桌上牌子，惊奇中组部怎么参加这种会？熟人严家祺（严家祺是其原名，一度改为严家其，后来改回原名。本书一律用其原名）、金观涛、吴稼祥、周其仁见是我到了，就转惊为喜：“你来了就不奇怪了！”

17日，我又应邀参加上午在西苑饭店的《中国城市年鉴》成立大会、下午在友谊宾馆的“年鉴”内部骨干小会和晚上在北京饭店的宴会。一天三个饭店，一事三会，被介绍给上至国家领导人、中至各级官员、下至研究人员的众多经济学者。但是，印象最深、聊得最多、长期接触的却是社科院经济所的“四硕士”，我戏称他们为“四进士”（著名京剧）：俞敏声（俞正声二兄、后为康华同事）、吴太昌（1970年甘肃的朋友、后任社科院经济所书记）、厉以平（经济学家厉以宁之弟）和李志宁（后发表200万字著作），我们五人都是老五届大学生，基本是同龄人，此后他们在经济学上对我教益匪浅。

1985年1月7—8日，国家计委和经委借解放军政治学院之地，召开了第三产业理论与实践讨论会。我觉得第三产业确实很重要，应该大力发展，故参加此会，但完全是抱着被启蒙的学习态度。首日像听专家讲课似的，讨论中

提了几个问题，似乎点到要害。主持人非让我第二天重点发言，我连夜恶补，认真钻研会议资料。次日壮着胆子侃了一通，还好没出丑，得到好评。

在莫干山会议影响下，1985年4月，在天津宾馆召开第二届中青年经济研讨会，我应邀全程参加。开幕式，天津市委书记倪志福、市长李瑞环及人大和政协领导悉数到齐。17日的企业家与学者对话会上，作为一个专题，我谈论“第三梯队”，并回答各方的责问（大家对神秘的第三梯队意见颇多）。18日我组织了一个“理想座谈会”，听取青年学者的希望、困难和要求。在莫干山认识的“天津四条汉子”，杜厦、李罗力、金岩石和郝一生，是此会的组织者，这次更熟了，金、郝和我“六四”后还分别是美国、日本和法国的民运组织“民主中国阵线”头头。

1984年底至1985年初，中组部派我参加了在京西宾馆召开的、当时具有重大意义、事后引起巨大争议的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1984年12月28日预备会议。29日开幕式，胡耀邦、习仲勋等出席。胡启立代表中共中央致耀邦审定的祝词，首次明确提出“创作自由”，“祝词赢得了全场极其热烈的掌声”（《人民日报》语）。大会宣读胡乔木、邓力群祝词时，寥寥掌声知趣而止；大会主持代读的、重病缠身周扬的一句话祝词，获得数分钟的雷鸣掌声。对于去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整人者与被整者的不同待遇，表达了人心和民意。作家们对“清污”运动的反感和声讨，是此会的主旋律。30日我回中组部，听了胡耀邦“开放作协领导选举，我们不干预”的传达。31日，我参加大会组织处和秘书处的两个小会，研讨具体落实耀邦指示的措施。1985年元旦，参加《诗刊》组织的诗人、作家聚会，会后与傅天琳、祖慰分别长聊。节日后元月3日四大复会，在我的建议下，晚上青干局（就是我）与团中央共同举办青年作家座谈会，二十余位作家与会。我慷慨激昂声讨“清污”，满怀深情表示：“青干局是青年干部之家，当然也是青年作家之家。有困难，找我们！”（当年夏，张抗抗请我到

工运学院的家中，反映其夫吕嘉民、即《狼图腾》作者姜戎因参加1979年的西单民主墙，被“无关方面”政治歧视。我即请“有关方面”收敛。）1月4日按耀邦“秘密投票、党不干涉”的指示，大会真正民主选举了要求建立“文革博物馆”而遭拒绝的巴金为作协主席，具有独立思想的王蒙和反叛精神的刘宾雁等为副主席。

对作协四大当时反映两极，夏衍赞誉：“中共文学史上的遵义会议。”王震指责：“反党的会！”两年后耀邦下台时，这当然是罪状。中共中央1987年八号文件，定性四大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会议”。

第六节 李锐离中组部与调整山西领导

5-19 陈云令李锐离开中组部

1984年，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水电部前副部长李伯宁、李锐前妻和青干局某人的母亲等，陆续向陈云递交“声讨”李锐的告状信。9月陈云批示：“既然这么多人对李锐有意见，看来他继续待在组织部不合适。”中组部便安排李锐去国家经委任顾问。李锐认为自己没有犯错误，坚决不离开中组部、不去经委。中组部新部长乔石做正式结论：“李锐在组织部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年龄过线，自己要求退下来。”既执行了陈云批示，又给了李锐台阶。国庆后，李锐正式离休，之后进入中央顾问委员会。习仲勋事后才知道此事，很替李不平，但已无可挽回。

11月中组部召开部务会议，讨论青干局起草的《建立第三梯队的报告》。上季度在李锐主持的会议上，对“报告草稿”基本赞成的诸公，态度骤变。曹志副部长首先发难：“这个报告不成熟，几条经验很乱，话说得太满。”几位部、局长立即附合，副部长王照华也180度急转弯。会后，起草报告的崔武年说：“我算被好好地上了一课，今天部务会情绪不对，好像有很

多对李锐的积怨。”李志民局长说：“今后我们只能尽人事而听天命吧！”（《我的83个月》，99页）

我想起一件往事。某次我向李锐汇报工作，他让我到隔壁王照华处核实一事。回来谈完公事，李笑问我对两个办公室的观感。我说：“王摆满纪念品的办公室像旅游展馆，你的是‘中国足球队打比赛一一全是输（书）’！”李不屑地说：“他就知道游山玩水吃喝玩乐，中组部净这种人！”我听说李锐对许多部领导不务正业不满，尤其看不起王。当初被陈云“请进来”的李锐，现在又被陈“轰出去”，有仇报仇有冤申冤，墙倒众人推，推不着墙就踩墙下的小草吧！青干局即是李锐之墙下的小草。

1984年国庆和1985年元旦期间，我走冷门，一个人两次特意到离休的李锐家看望，带些薄礼已无拍马之嫌。这是继1983年春节，青干局成立后第一个春节，全局集体去李锐家拜年之后，我再次到李家。短短两年风云突变，我们两代人都由意气风发转为心灰意冷。

再次去李锐家则是十年后。1994年底，“风波”后首次返国，第一时间拜访老长官。李锐说：“胡耀邦跟我说，原以为我是陈云的人，一直与我保持距离，后来发现我是一个按自己的思想做事的人，不是一个‘跟线’的人。”（《李锐口述往事》，424页。）他诚恳地对我说：“我像耀邦看我那样看你。当年陈云处交来十余人名单，说‘阎准不必考察必须要！’我心里有气，认为你是陈云和陈元的人。后来才逐渐认识了你，但我很快被陈云赶走，没能重任你。”他还签字赠送我在香港新出版的《庐山会议实录》和《早年毛泽东》两本书。

1984年底，青干局继83年确定每人的职务后，再次调整。副局长刘泽彭升为中组部副秘书长，成为正局级的部领导，分管青干局。任小彬（陈野苹前部长的秘书）任青干局副局长。局里上报中组部，把已十年“县处级”的我由副处级调研员平级“升”为地方处副处长，结果部里不批准。李锐离

开，部领导里更无人为我说话了。不是我说葡萄酸，副处长那葡萄真不够甜；李锐都遭受如此不公正对待，我算啥？对职务我早看开了，做人、做事、做官是我的一贯顺序；但既当和尚，就要认真创新地敲钟！

5-20 考察调整复杂的山西省级领导

1985年初，中央书记处决定："山西省今年召开七年未开过的党代会，省委正式换届，其余五套班子也相应调整。"中组部派地方干部局负责山西的马副处长（后任国家民委干部司长）和青干局分管华北的我，去山西考察省级领导，提出调整意见。第三梯队已建立，中央规定"提升干部必须从后备名单中选拔"；因此调整省级班子的任务就由原来是地方局单独执行，变成有青干局插手了。

行前除了查阅山西主要领导的档案数据外，分管地方局的中组部副部长和地方局分管华北的副局长还向我们介绍了山西六个省级领导班子的情况、矛盾和问题。

山西是彭真和薄一波两位山西籍元老的地盘，文革前彭真得势，近年薄一波吃香。每年薄的生日，山西省级几套班子都带寿礼到北京，薄家乡的县市领导也不缺席。我与马处长商议："薄的幼子是我朋友，彭的长子是我系友，二老意见肯定相异，我不好处理。咱们薄和彭哪家都不去，只把考察意见报部里，让中组部和书记处找二老协调。"马同意。

1985年1月我们到达山西，首先召开省委扩大的常委会。当时各省的常委必然包括省委正副书记、纪委书记、组织部长，省长、常务副省长，省军区政委。扩大的参会人员是人大主任、顾委主任、政协主席和几位副省长。省委书记李立功宣读中央调整山西班子的决定，介绍中组部"二要员"。我们说明任务：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只带耳朵、未带嘴巴。随后众人表态：坚决拥护中央决定，积极配合中组部考察工作。

不同于两年前调整湖南省级领导：当时我们十几人的工作组在长沙大干

50天，口头和书面征求千余人的意见，兴师动众地“民主”了一番。这次是按组织部传统的“神秘”考察方式。我们分别与省级六套班子（常委、顾委、纪委，政府、人大、政协）的全部几十位省级官员和重要的厅局部长、地市领导，共百余人一对一、面对面地，征求他们个人意见。我们住在太原迎泽宾馆的两个套房，里间睡觉、外面办公；一个月里，除了参加省委会议，工作和生活都在这几十平米中。本应为我们二人共同开伙，但马是回民，于是我们就分别吃了独食。省委组织部的一位处长在隔壁为我们服务，安排调度约谈人员。



1985年1月，调整山西班子，在太原迎泽宾馆工作生活一个月。

其间我们参加了常委和政府的两次“生活会”。人们熟知的著名生活会是1987年批判胡耀邦、导致其下台的中央生活会。其实一般生活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都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山西的生活会也不例外，是团结和谐的会议；同样不例外的是我们个别谈话时，相互尖锐的负面评价比比皆是。这种场景领教多次，我已见惯不怪；领导也是人嘛，人之常情！许多省，书记和省长都接近离休年龄，中央决定留一人过渡一届时，彼此攻讦的情况比比皆是。

以下是我们考察情况和有关建议——

省委书记李立功60岁，曾任团省委书记和组织部长，兼有团干部的热情朝气和组织干部的宽厚严谨，各方反映较好，我们建议留任。他任省委书记

至1991年，转任省顾委主任。李是上世纪唯一干满两届、善始善终的山西书记。

省长王森浩52岁，1983年由煤炭部总工程师升任。我任煤炭部副部长秘书时与他很熟，在考察班子中遇到老朋友是幸事，王向我提供了许多省委内幕。中国最大煤炭省的年富力强的煤炭干部当然要留任。王干完两届省长后，1993年回煤炭部任部长。

常务副书记李修仁、副书记王克文、人大主任阮泊生，这三位“老资格”都超龄了，必须退出一线。在二线的三个正职中，人大主任有点实权，最热门；顾委主任名声好，无所事事；政协主席完全闲职，都不愿干。他们三人分别与我们谈话时，讲自己的长处，介绍他人的不足，明争暗斗竞争激烈。我们征求其他领导对此三人任职的建议，他们大都只关心自己的仕途，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无明确态度。我们考察调整的重点是省常委和正副省长，对这三个“闲差”也无定见，只能向中组部如实汇报这三人自己的意见。全省第二把手的李修仁自认比阮泊生年轻5岁，现在又协助正书记抓全面工作，理应去人大；结果因为中央无人，只任最不重要的政协主席。年近70的阮，晋察冀的老人，又有薄一波撑腰，留任人大主任。68岁的王克文，解放后在湖北工作30年，有李先念照顾，升任正省级的顾委主任。

这些战争年代出生入死的老革命，和平时期为个人待遇斤斤计较，我已见多不怪了。副部长65岁以上，加发一个保姆的费用；就出现说过去因为娶年轻妻子、而压缩年龄，要求提高岁数的。规定离休年龄后又有人说，当初为参军提高了年龄，现在要求恢复真实的较小年岁；某开国上将即如此。

太原市委书记由省委副书记王建功兼任、市长由副省长王茂林兼任。两位五十岁左右的省级干部专职一个省会城市的党、政首长，空前绝后！这是为了培养锻炼他们，将来一人可能成为省委书记。两位都锐意改革、热情坦率无城府不官僚，尽管他们似乎不和，但相处一月都与我成为朋友。（此后

他们进京都来看我）在新省委中，王建功升为常务副书记；王茂林升任常委兼太原市委书记、91年任省委书记。

1983年王建功由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转业安排为阳泉市委书记，已挫折一次。王1986年底给中央写信，反映王茂林等“拥护华国锋反对邓小平”；中央权衡之后，1987年把王建功贬为山东省泰安市长，我们还有来往。王建功逆境奋进，1991年又升任副省长；1998年再进步为省人大主任，可惜当年去世，年仅62岁。应该与他仕途不顺有关。

我们建议留任的三位中年副省长，日后都又进步了。白清才1990年升任陕西省长，郭裕怀1995年任省政协主席，张维庆1998年升任国家计生委主任。

在北京就听说，省顾委主任霍士廉对省委和省政府的日常工作干预过多。到山西后，多位书记和省长更强烈地反映霍已经不是“干预”而是“干扰”他们的工作了。75岁的霍士廉，文革前后曾任陕西、宁夏和国家农业部长的第一把手，资格老、能力强。1983年从山西省委书记转任顾委主任后，对几乎是儿子辈的书记和省长们，指手划脚呵斥教训。我们对书记省长们说：“霍老肯定要全退离休！”他们说：“霍只要在山西，肯定就闲不着，最好去北京。”我们立刻向中组部汇报。几天后中组部让我们向霍转达中央领导的意见：“请他离休后到北京休息，中央办公厅正在为他准备住房。”霍表示：“叶落归根，山西人走南闯北半世纪，想在家乡颐养天年，绝不再过问省里工作。”我们下情上达。中央也有绝招：“任命霍士廉同志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专职委员。”霍只能乖乖离晋、进京履职。现在能查到的“中顾委专职委员”只有霍一人。

在山西期间，还有一件关于我的趣事。到山西不久，省委组织部某“不开眼”的副部长，对我思想开放、言语直率很不满意，认为我不像中组部机关的干部。他让省委组织部某处长，通过中组部的私人关系，了解我若是外

省借调来的，告我一状，把我打回原省。结果可想而知，他大失所望偃旗息鼓，留下笑柄。

1985年夏，山西第五次党代会召开省委换届，我再次赴山西，除了参加此会外还要考察吴达才。51岁的化工专家吴达才，1983年由省化工厅处级干部直接提拔为省委常委兼科委主任。连升三大级和科委主任进常委，二者皆罕见！此次调整，吴仍任原职。不知胡耀邦如何得知吴达才是特殊人才，让中组部重点考察是否可以再加重用，我就奉命再次入晋。我约谈吴本人和他上下左右十余人，我的结论是：吴只是科技管理人才、不是科学家和政治家，目前职位还可以，若将来改任副省长更适宜。3年后省政府换届，吴任一届副省长，59岁即退居二线任省人大副主任。

胡耀邦非常爱惜人才、特别愿意破格提拔较年轻的干部。我亲身经历的还有：天津半导体专家叶迪生，耀邦说："美国有个爱迪生，天津有个叶迪生，要重用！"我建立天津第三梯队时列叶为后备，9年后提为副市长。导弹专家、高干子弟华棣写了篇国际问题的文章，耀邦看后大加赞赏，建议华棣任外交部要职，加强外交部的国际问题研究。我们青干局考察后认为华不称职，并且外交部坚拒。最后，安排华棣到中信国际所，与李湘鲁并列为双所长。以上三例说明，耀邦虽然喜欢推荐人才，但是却从善如流不坚持己见，尊重中组部的专业意见。

再次来太原期间，省委书记李立功突然对我说："年初一个月的接触，对你印象很好。现在中央决定我留任，我提议你来太原任市委副书记，常委们都同意。"我虽然对中组部已不留恋，但是知道中组部不会善待我，就不置可否地说："听中组部意见吧！"其间，与我个人关系不错的副书记王建功、常委王茂林、组织部长卢功勋也都表示欢迎我，而省长王森浩老熟人更没得说。我以为："是金子总要发光，臭豆腐一定发味！"纯正的马列主义首长、忠诚的共产党领导视我为离经叛道的异端；思想解放开放、不因循守

旧扬弃传统的开拓者欣赏我。1983年我在湖南调整省级班子后，湖南省委也要让我去任组织部副部长或长沙市委副书记。如果认为当时青干局炙手可热、李锐如日中天，要我是有利可图的外部因素；那么现在李锐已黯然离去、青干局强弩之末、中组部又在压制我，要我就应该只因为我内在气质与他们“气味相投”了。

回到中组部，已升任部领导的刘泽彭告诉我：“山西正式来函要你。但是因为邓颖超曾要把你驱离中组部，李锐保你免走。现在李锐离休，没人帮你，部领导还有人坚决反对提拔你。”此事无果而终。

关于调整省级领导的内部作业，有关陈元和刘源的运作可见一斑。

1987年底北京市召开第六次党代会，市委领导换届，中组部事先考察。尽管市委书记李锡铭与市长陈希同不和，但异口同声：“常委陈元德才兼备、政绩突出，可胜任副书记。”结果党代会正式选举时，陈元连市委委员都没选上，原任的常委、拟升的副书记皆泡汤！我找市委组织部朋友了解到：陈希同看望他曾任县委书记的昌平代表团，回答关于陈元的评价时，说了陈元许多好话；最后加一句：“要是再锻炼一段，就更好了！”——废话！谁再锻炼一段，会更坏？关键时刻的废话，不废！能当党代表的都不傻，心领神会。差额选举，差几票就倒霉；陈元不落选才怪！当然李锡铭也没说好话。中组部在陈元硕士遭受滑铁卢后，任命他担任不需要选举的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陈元公开宣称“统治阶级要有统治意识”，在青干局“高干子弟座谈会”上还说：“一个阶级对自己的子女都没有把握，他就不配称为统治阶级。对干部子女政策的出发点应是阶级利益，它是阶级政策的一部分。”清华学长杨继绳对此评价是：“陈元的高度阶级自觉性令人震撼！”陈元确实是共产党和统治阶级最优秀的接班人。但同样是优秀的党的领导陈希同、江泽民（“六四”的表现可证明他们的优秀），为什么容不得陈元？下文我还

将介绍江不愿与陈元共事，这只能说明最高层，在党性之上还有个性！

刘少奇幼子刘源1988年任河南省副省长，1992年换届前中组部考察，发现政绩不彰可能落选，必须调出。刘源系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本科毕业，党中央和国务院部委没有合适岗位，于是请解放军总政治部协助安排到武警部队水电指挥部任少将第二政委。

5-21 那几年公开发表的文章

除了上述在莫干山会议后发表、为李锐推崇的《一代新人在崛起》外，根据干部工作的需要，青干局同事和我，联名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中的一个问题——谈正确对待“工农兵学员”》（1985.3.19）和《屡经磨难趋于成熟的一批人——论“老三届”》（85.10.15）。继在李锐的《尽快启用一代新人》中，我全面肯定了我们这些“老五届红卫兵大学生”后，我们又为弟弟妹妹们的“工农兵大学生”和“老三届中学生”仗义执言。这样，就把文革时期的大中学生、各类中青年知识分子一网打尽，全部网罗到党的青年干部队伍中。

百万人的“老五届”四十多岁了，可用的已经被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千万之众的“老三届”年华正茂，还没有被普遍认可，必须大声疾呼。于是，崔武年和我又着万言论文《谈谈“老三届”》（中国社科院《青年研究》86年第四期）。此文在国内外引起长期重大反响。如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邱新睦2003年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研究综述》的论文中写道——

“崔武年和阎淮的《谈谈‘老三届’》，是国内出现的知青及老三届研究领域的第一篇专题论文。作者运用大量的事实和资料，论述和分析了知青和老三届一代人的教育基础、特殊经历和现实状况，认为老三届是自觉对社会负起责任，经过磨难、经过反思的一层人，并且呼吁研究老三届是当代人的一种责任。这篇文章虽然带有官方色彩，但是有理有据，平实可信，有很强的说服力。”

崔阎论文和邱的评论，30年来被不断引用。我们似乎仍感觉言犹未尽，次年又联名发表《“老三届”经历特殊的一代》（上海社科院出版社87年10月）。

1983年以后，我们在全国青干机构，对干部的选拔和考核的方法，作了积极的探索和改进。其中之一是对干部进行“德才测评”。得到普遍好评，但也有反对声音。《人民日报》1984年10月19日发表文章《群众路线？》，批评“德才测评是形式主义和繁琐哲学”。崔武年和我于5天后，在《人民日报》第一版发表《“德才测评”应肯定》。说明“德才测评”的要点是：把考察的标准分解为若干要素，每个要素又分解成不同的数量等级，请考察对象上下左右几十名干部为其打分评定，对他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考核。此方法运用概率论和系统论的原理，吸取统计学和心理学的知识。注意了领导与群众的结合、组织与个人的结合、传统经验与现代科学的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结合。这无疑是选拔干部在民主化方面的进步，也是群众路线的科学化。我们文章在《人民日报》首版发表，让人们知道：党中央对干部工作新方法的探索是肯定和支持的。其后几年，全国组织和人事部门都普遍采用了“德才测评”等初具民主化和科学化的新型考核方法。

第七节 重逢清华的高干子弟朋友

5-22 乔宗淮出使香港

1983年初，美籍物理学家杨振宁向万里副总理反映：香港高层华人说新华社不听取他们的意见，希望中央直接听到他们的声音。万里问怎么办？杨说他上次回国访问，国防科委的乔宗淮（乔冠华之子）不错，可到香港中文大学挂名，联系香港高层人士，直接向中央反映其意见。万里指示中组部落实此事，李锐：“小阎，你朋友的事你办！”

3月3日，我到乔宗淮家，传达万里的指示，征求他的意见，乔欣然同

意。文革中我们相识相知，我认为乔是“老红卫兵”头头中最有思想、最正派的，我们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毕业后各奔东西，偶尔见面无暇长谈，这次公私兼顾尽情畅聊，也算当面考察。在乔家我受到曾有几面之交的宗淮漂亮妻子彭燕燕的热情款待。燕燕父亲彭加伦抗日时期曾任中央军委政治部秘书长，兄长彭宁是被邓小平点名批判的由《苦恋》改编电影的导演。

3月17日，我到乔工作的国防科委507所，“背对背”考察他。随后参照乔的档案、根据考察情况，整理出《乔宗淮适合赴香港工作》的报告，上报中组部领导，并建议将乔的工作关系先转到国务院办公厅。

4月8日，我再次到乔家，正式通知他准备远行。

83年夏天，乔到香港中文大学“进修”。1984年，许家屯任香港新华社长，乔任副秘书长，公开任职联系香港上层工作。1987年乔升任副社长。1989年7月我赴香港开会，拟辞职不归，赴法国参加民主运动。乔执意宴请，我坚拒未果，只好让他个人自费买单。

5-23 徐沙外派连云港副市长

徐沙，清华同系同年级同学，1966年一起去云贵保省委，1968年共同到河北农村考察，1970年分配到边远小厂。1973年其父徐运北（原二轻部长）被“解放”，任北京市委常委后，徐沙随即调回北京，到科学院自动化所。徐运北抗日时期在冀鲁豫根据地与赵紫阳很熟悉。文革中期赵紫阳“解放”后，任内蒙末位领导，想让徐沙任其秘书。徐沙不愿离开北京，未答允。

80年代初徐沙入党，83年提为副处级的室副主任后，刚够外派资格。

青干局当时四项具体工作：第三梯队、记录在案、选调大学生和从中央机关选派优秀年轻干部到地方任职锻炼。第四项“选派任职”，是最不为外界知晓的神秘工作。先后有：习近平（唯一县级平调者）、薄熙来、我系友叶小楠（叶飞之女）和安黎（安子文之女），残联的俞正声和刘京（曾是我

101中朋友）等等高干子弟，皆是走此“提级外派”的仕途。

1984年春节徐沙来我家，我们共同运筹他的当官路线图。以下回忆，可以了解一个中央机关的高干子弟选派到地方任职的全过程——

一、令徐沙到赵紫阳家，解释十年前不当他秘书的原委，表示歉意，恢复关系。请赵推荐徐。

二、紫阳秘书李湘鲁电话青干局，传达紫阳意见：徐沙是好青年，可到地市任职。

三、我们把“首长电话记录”，上报部领导，部领导批示“同意”。

四、青干局机关处去自动化所考察徐沙。

五、根据满意的考察结果，向部领导写出《建议徐沙到沿海开放城市任副职》的报告。

六、部领导同意，批转报告到干部调配局办理。我疏通调配局，转达徐沙想去距北京最近的秦皇岛的意愿。他们答允。

6月全部程序走完、大功告成，我放心地去天津建立第三梯队。7月回京，风云突变。徐沙说：“我被发配到连云港，你离开一个多月，我距北京远了一千多公里！”原来是调配局自己的关系，加了秦皇岛的塞。

5-24 再遇刘延东、贺鹏飞

刘延东

1982年9月，李锐派我去清华大学，了解知识分子问题。刘达校长谈完正题后，不满地说，北京市委组织部的刘延东，曾来清华反映：“其同学刘胡（胡耀邦次子），文革前夕被党支部通过入党，后党总支瘫痪，未及批准。清华党委应出具证明刘胡是1966年入党的正式党员。”刘达逼问我：“我不同意这么办！你是中央组织部的，表个态！”我只好明确态度：“文革前的党籍应按当时中共八大党章的规定处理：上级未批准就不是党员。文革是特殊情况，我回去汇报，请中组部统一办理。此二刘都是我朋友，但单独处理

刘胡一人党籍，对胡氏父子影响都不好。”事后，我劝刘延东在高干子弟问题上谨言慎行。（稍早，对高干子女情有独钟的北京市委书记段君毅，已将陈元、陈昊苏和刘延东分别提拔为西城、丰台和朝阳三区的副书记。）

1983年刘延东任共青团中央第三书记后，约我到她家去玩。因双方都忙、我又兴趣不大，一直未成行。在清华老红卫兵中，我们都是愿意思考的温和派，因此接触较多。我骑总部配我的摩托摔伤时，她用手绢为我包扎。1967年刘参加北大何维凌组织的共产青年学会，后学会被中央文革批判，我安慰她并为她保密。

1984年10月，在青年改革积极分子座谈会上我与刘延东再次相见，在此会我的发言小出风头，她介绍我与胡锦涛认识，并再次约我去她家。

两周后的11月，我应邀去她家，她和丈夫做了丰盛的晚餐，饭后海阔天空畅聊了过去现在和未来，具体内容已忘记，日记上只写着：“到刘延东家吃饭并聊天，晚7至11时。”

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正副部长都归中组部党政干部局和经济干部局管理，青干局只管后备干部。只有团中央的书记们例外地由青干局管。80年代初，我们考察团中央时，认为胡锦涛比王兆国优秀。党政局说：“你们清华的就认胡校友，看不起哈工大的兆国。”我们举例：“清除精神污染”时，王兆国向胡耀邦汇报：“团中央有人裙子太短，我看不惯！”耀邦笑答：“看不惯，你别看！”

1985年团中央第一书记胡锦涛升任贵州省委书记，青干局当然提出第二书记刘延东接任。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继任人选时，万里突然发难：“1976年‘四五事件’时，刘延东是工厂宣传科干部，带领棒子队到天安门镇压悼念周总理的革命群众。”一时众书记无语。余秋里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见缝插针：“我们总政组织部青年处副处长宋德福也是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他可以当第一书记！”于是，无异议通过。这个典型个案说明：最高层

中央领导决定省部长的决策会议和最基层提拔科股长一样，一人反对就否定，一人力挺就通过。人情社会，一般不会为不相干的下属当面与同级意见相左。宋德福1953年至1962年读书九年，后做工当兵。初中文化的第N书记宋，就这样顶下了清华机要系的高材生、第二书记刘延东，荣任团中央第一书记。

我们为刘延东煮熟的鸭子，竟意外地飞走。其实，1976年天安门事件时，刘只是奉命随行。

青干局征求刘的意见，她在团中央是分管外事，想去外交部。但是，历来“内升制”的外交部容不得外来的“空降兵”。刘只能在团中央又委屈了几年。九十年代初，王兆国任中央统战部长，刘任副部长。与团中央第一书记失之交臂13年后的1998年，刘延东终于在统战部副部长任上升为正部级（比宋德福晚了7年）。我以为，人才成功“三天”要素：先天资质、后天努力、上天眷顾（时运机会与贵人相助）。刘延东前两项都具备，在北京市时有段君毅相助，但在团中央时运不佳。新世纪新机遇：胡锦涛任总书记后，刘任政协副主席。习近平任总书记后，刘任副总理。（我只列出时间先后顺序、未必说有因果关系。）

贺鹏飞

1983年12月，贺龙侄孙贺兴洲欲调来青干局。16日，我到他任副处长的全国人大秘书局了解考察他。20日，我又到总参谋部下属的装备部，找综合处副处长贺鹏飞了解贺兴州文革表现。鹏飞说：“兴洲正统稳重，老实勤奮。文革中被抓进监狱，我们都不服气、大吵大闹，兴洲组织我们学习‘毛选’，安抚大家情绪。”贺鹏飞是我文革中的好朋友，1972年共同参加某朋友婚礼后，十几年未见。这次又是公私兼顾，分外亲切。上下午畅谈海聊，中午到招待所为我开小灶胡吃猛塞。我们共同反思文革初期，一起在清华园干下的荒唐事，都觉得现在要把浪费的时间抢回来，在大好形势下大干一

场。此后虽然同在北京，彼此都忙，中组部又不管军队干部，而未再见。不料2001年，他竟英年早逝。

21日，约贺兴洲到青干局面谈。12月底，我写出《贺兴洲适合调入青干局》的报告，上报部里。1984年3月，贺调进，随后从处级调研员一路晋升，小步快跑，1988年任青干局副局长。

5-25 与其他名人的接触

秦晓

1983年春节，宋克荒又约我去他家玩，在花园村副国级“中院”的宋家小楼，见到刘泽彭和秦晓。宋任穷说：“我将不兼任中组部长、专职中央书记，小刘跟我这几年很辛苦，关键时刻表现很好，准备去你们青干局当副局长。由煤炭部的小秦跟我，小阎你是那出来的，抽空去考察一下他。”

（1982年春节宋克荒告诉我，宋任穷所说的刘泽彭关键时刻的优异表现——不久前某晚，宋任穷回家后在书房写东西，写了撕、撕了写，很苦恼。克荒劝他睡觉。他说，下午耀邦找他：“宋大哥，现在提倡年轻化，您都七十多了，写个辞呈，我明天就批准。”宋对克荒说：“我非常为难！陈云让我坚守组织阵地，怎么办？”克荒不知如何是好，到隔壁秘书家属楼找来刘泽彭。刘当机立断：“宋部长，辞呈不能写！我去找陈元。”刘和克荒叫醒司机，连夜驱车中南海，从被窝中拉出陈元，共商大计。次日，陈云给邓小平、耀邦等写信，大意是：“中组部很重要，是否还需要经验丰富的任穷同志过渡一段为好？”邓只能批示“同意”，胡哑了。）

秦晓说：“当时老干部找干部子女做秘书很普遍，认为可靠，经过文化革命，好多老干部都有怕秘书造反的心结。”确是如此！本书所提到的干部子弟担任老干部秘书者达两位数。

83年3月我到煤炭部考察秦晓，先在管理秦的干部司机关处、后去秦工作

过的外事局，找处局领导了解其人。其实在煤炭部时，我就认识秦，并知道他挺优秀。这次例行公事果然听到一致好评，朋友间的面谈考察就免了。有些表现欠佳的高干子弟要当高干秘书，就不敢让去原单位考察。回中组部，调来秦晓档案，写出《秦适合作宋秘书》的报告。年中秦晓上任，日后有些工作接触，深谈不多。新世纪，我对他的“现代性”观点极为认同。

赵启正

1985年4月中组部召开第三梯队工作会议。在组织部系统六年，参加的全国性会议有两位数，对这次会议，现遗留下的印象只剩下：中央领导宋任穷和乔石到会讲话，他们来时，周围街道戒严，会场内外便衣散布，可见会议规格之高。而与赵启正相识则印象深刻。早听说上海组织部赵副部长思想深刻开放、语言尖锐幽默。当年考察赵时，老干部反映他对党不满：某次座谈会，赵因故迟到被责怪。赵不解释道歉，反而说：“你们耽误了我20年，我耽误你们20分钟，算什么？”我不便当面表态，回部向李锐汇报后，我们俩异口同声笑道：“这算什么！”10日晚，大会放电影，我和赵启正这两个组织系统的异数都想放弃电影、好好聊聊。在他房间里，两个核物理专业的组织部新人，竟海阔天空长谈整整一夜。真是一见如故、相见恨晚。次日上午分组讨论，我躲在赵房间补觉，赵部长是小组召集人，可苦了他。事后赵说值得！那夜畅聊的具体内容不记得了，日记上只记得印象较深的“赵三点”：现在官场流行“通过病”，凡事要长官通过；组织部要“鼓励异端”，百花齐放；我不管“小事”，放手下面干。

86年1月，我和青干局同事崔武年到上海。崔在《我的83个月》207页写道：“我们拜会了组织部正副部长曾庆红和赵启正，说要召开‘第三梯队研讨会’。曾庆红的反应是宽和地笑一笑，只说一句‘这倒是好事，组织工作应该加强理论建设，你们算是首开记录’。而后就说其它的了。赵启正则是，展开了一番议论，既有对现状的批评，又有对建立理论体系的展望，等

等。”从中可看出，两位部长的性格和作风形成鲜明对照。加上出身背景的差异，日后曾庆红官至政治局常委，而赵启正任副部级12年后的1998年才转正。而80年代初，曾是企业正处时，赵已是政府副局。在中共体制内，什么样的人、如何才能顺风顺水一路走好？

金观涛、刘青峰与《走向未来》丛书

国内外的网站，大都这样介绍：“《走向未来》丛书的作者，集中了80年代中国最优秀的一批知识分子，代表了当时中国思想解放最前沿的思考。”我在莫干山会议后与其编委会开始了长达五年的密切接触。首任主编包遵信，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忠厚中年，众编委大多小他一二十岁，都尊称他“老包”，六四后曾系狱。我获准回国后，到他陋室拜访，以喜其书法为名，索一墨宝，留下较多润笔。

金观涛是遵信“退居二线”的继任主编，一直是丛书的灵魂人物。金与妻刘青峰，当时被誉为“青年精神领袖”、一对“金童玉女”。我们同属“老五届”的同龄人，共同语言颇多，故交往频繁。他们组织的活动，我只要在京必去无疑。印象较深的是1985年5月在政协礼堂的茶话会。金主持，在金和来宾发言时，台下的刘不断递小纸条，以掌握时间、控制走向。可能由于先天遗传和后天出身，知识家庭的金内向沉稳，干部家庭的刘外向热情。我与他们关系密切，除价值观相同，还有外因：一、青干局同事王军衔，是丛书的编委和义务大总管。我开玩笑，丛书的公章就挂在他腰带上。我和妻子分别住在父母家，我们在安定门的房子就成了丛书的仓库，钥匙当然归了他。二、刘青峰的妹妹是我中组部的同事，在干部制度改革中联系频繁。

1989年初，金刘到香港中文大学访问，“六四”被陈希同点名为黑手，真是在境外“躺着都中枪”。7月我赴港开会前夕，去刘妹家，索要金刘香港电话和地址。到港后，他们帮我联系港支联，提供协助以赴法国参加民主运动。

第八节 因婚变邓颖超欲赶我出中组部

5-26 一儒舌战二部四局长

本章第一节“陈元力劝我去青干局”中，已交待了我的婚姻状况。这一节专门叙述此后几年在中组部，我婚姻问题的演变与影响。

在煤炭部工作时，煤炭部宿舍距机关二里多，尽管与妻子提出离婚，我仍住在安定门的一室一厅小家中。到中组部后，我就正式与妻子分居，住到距中组部不远的父母家，混吃混住。妻子则带儿子住回她父母家，共同吃喝、共享保姆，费用当然全免。岳父母那一层楼三个单元，分别住着岳父母、我妻儿和大舅哥全家。我每周三晚上去为十岁的儿子补习功课，节假日独自带儿子出去玩或回爷爷奶奶家。（我真对不起儿子！）

1983年春节前，陈元约我下班去他家，晚饭后宋任穷部长的秘书刘泽彭也到。刘说：“你来中组部半年，部领导对你与妻子分居，已有不好反映。”陈元：“快回家去吧，别因小失大。”我答：“仕途事小，幸福事大。”当天日记：“陈家，陈刘与我恳谈，请求要求我归家，未允。”

5月，陈元又约我到家：“刘泽彭说，中组部和煤炭部都愿意把你现有的一居室换成两居室，你非要中组部单独分你一间。这样不好，事态闹大不可收拾。”我答:“来中组部前，我就决心离婚，我总不能老住在父母家。”陈：“我不就住父母家，你单独要了房子，就没回旋余地。”分房牵扯个人利益，各单位都是一场大战役，组织部不例外，但只是小战斗。我在李锐部长和李志民局长的暗中帮助下，分到一间房子。9月，搬进与别人合住的单元房。

10月初，已任青干局副局长的刘泽彭约我去他家：“你妻子给部领导写信，希望组织说服你改邪归正。部领导让机关党委认真处理你的婚姻问题。

我和陈元商量了，我们俩都局级了，你还副处，我们之间的差距不应该这么大。你回家，一了百了、升官发财；否则，从中组部滚蛋走人！”

11日，中组部和煤炭部的机关党委书记、青干局和煤炭部生产司领导一行四人约我谈谈话。中组部的周书记开场：“小阎，你和老婆，都是党员、高干子女、清华毕业生，都在中央机关工作，条件多般配！部里对你很重视，回家去吧，前途光明！”其他三位局长也顺势劝我回家和好。最后我表态：“周大姐，你说的四个条件：一、我们在校时清华一万学生，前后毕业生十几万；二、现在党和国家的中央机关，几十万人；三、全国党员几千万；四、高干子女成千上万。像我和妻子，符合这四条件的，有万儿八千。都适合作夫妻？请组织先搞清我是否有政治问题，若无、只是婚姻生活问题，小事！西方谚语‘婚姻像鞋子，只有脚知舒服否’；中国好像‘别人看着顺眼，脚就应该舒坦’。我们性格极度不合，她又写信告我，绝不回去！”我一口气侃侃而谈了两个小时。会谈一下午，无绩而终。组织部保密一流，会后风平浪静。煤炭部截然不同，迅速传开：“阎淮真不好惹，在煤炭部就横，到中组部更厉害，一儒舌战四局长。”

李锐身受不幸婚姻之苦，对我是了解、理解和谅解。他表面对我的婚姻问题不闻不问，不逼我回家，但也不急着处理这事，照旧信任重用我。我说：“谢谢部长的善意中立！”李笑答：“你怪词还不少！”我就这样安度了1983年。

1984年元旦和春节，陈元又两次找我谈婚姻问题，说陈云办公室也感到压力。我在日记中写道：“春节前后消息频，满城风雨议论纷。”

2月李锐常务副部长，青干局李志民、刘泽彭正副局长，集体召见我。李锐训示：“阎淮，你的事情闹得太大了！都说我包庇纵容你。听说你挺能讲，上次与两个部的四个局长，一口气就讲了两个多小时，全是你的理。你写个书面材料，阐明你的理由，表明你的态度。报给机关党委、我和陈野萍

部长。我们再酌情处理。”

随后我按李锐用心良苦的命令，向部领导交上《申诉报告》，详细汇报：我婚姻问题的前因后果，与妻子性格的巨大差异，表明我义无反顾的坚定态度。听说李锐作了中性的批示。此事遂告一段落，暂时风平浪静。

5-27 为爱情放弃局级官位

1984年3月关系我仕途的关键月份。中共中央决定抽调离休老干部和优秀青年干部组成整党指导小组，派往各省市和部委，指导整党。事毕，青年干部可酌情留在当地工作。

湖南省委鉴于我在调整其班子的表现，此前正式向中组部提出：要我去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或长沙市委副书记。中组部（主要是李锐对家乡重视、对我信任）也有意派我参加湖南整党指导小组，事毕留在湖南任职。电子部长江泽民通过与他关系密切的李锐，也向中组部要我去任电子部干部司领导。

李锐当着青干局领导的面，对我说：“你回家和老婆睡一个礼拜觉，去湖南或电子部任职，随你挑！考虑一下。”我当即回答：“我是三不：不考虑、不睡觉、不当官！”同事得知后，篡改裴多菲诗句褒贬我：“名利诚可贵，官位价更高，若为爱情故，二者皆可抛。”大家都说：“你太不值啦！”官场仕途大都以升迁为第一目标。世界各国事务官皆如此，中国尤甚，谁愿意退休在科员的级别？

部领导（主要是李锐）在我拒绝后，决定由赵杰兵顶替我赴湖南。赵杰兵，开国大将、李锐挚友黄克诚的女婿，前农垦总局局长赵凡之子。

3月底，我奉李锐之命，向赵介绍湖南情况。随后赵赴湖南，整党结束后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

1986年初，我和崔武年在武汉开会后去湖南。崔在《我的83个月》记载：“我们在子时到长沙，站台上空寂无人，不想赵杰兵却亲自来接！”令

我们惊讶是因为：我们在湖南无工作任务，只通知省青干处接待，仅停一天，次日即转机杭州，不愿惊动省委组织部领导。赵部长送我们到宾馆休息，中午又接我们到他家赴午宴加晚宴。酒足饭饱，胡侃海聊。赵杰兵发牢骚：“老阎，你在京城吃香喝辣养尊处优，让兄弟我替你填坑到这鬼地方，受苦受累日夜煎熬。”我只能傻笑无言以对。崔武年不客气：“你别得了便宜卖乖，部里多少人削尖脑袋来不了，羡慕得直流口水。要不是阎淮见色忘官，好事哪轮到你？”1993年，赵调回中组部任部领导。

我为了爱情不顾一切，确实如英国作家狄更斯所言：“我的爱情是违背常理、是妨碍前程，是失去自制、是破灭希望；是断送幸福，是注定要尝尽一切的沮丧和失望的。可是，一旦爱上了，我就再也不能自拔。”我以为：不做大官，照样可以做大事。孰料，我的“悲惨世界”刚刚开始。

5-28 邓颖超在政治局批判我

岳父黄玠然夫妇与周恩来夫妇有半世纪的公干与私交的渊源。黄大革命时任中共总书记陈独秀的秘书，筹办并参加了“八七会议”和中共五大。1927年后在上海任中央秘书处长，29年接替邓小平任党中央秘书长。（毛毛着《我的父亲邓小平》和文献片《邓小平》均有记载。）30年代黄夫妇曾协助周夫妇紧急处理因顾顺章、向忠发叛变造成的危急局面。黄文革前任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长，时任全国工商联秘书长。岳母杨庆兰，南昌起义女兵，曾是陈赓大将的救命恩人，1927年8月24日16时，部队撤退时，杨在草丛中发现腿中两弹昏迷的陈，背他下山，天黑追上部队。

周恩来逝世后，邓颖超孤独且恋旧，与黄夫妻这对半世纪的老友过往密切。例如1984年11月，《周恩来选集(下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首发式，次日《人民日报》头版大照片，黄玠然与邓颖超握手，杨在身旁。

1984年五一节，邓颖超又邀请岳父母和我们去中南海她家去玩。落座后，邓惊讶：“小阎怎么没来？”当时正是我闹离婚的高潮。我妻子被问到

痛处，黯然泪下。邓追问，妻痛说家史，如实反映我的劣迹。

次日，恰巧政治局开会。会后邓颖超拉住列席的中组部长陈野萍，复述并放大我的劣迹，最后气愤地说：“这样的思想腐化分子，要清除出中组部！”

次次日，中组部处以上干部大会。陈部长传达完政治局会议精神后，顺便传达邓颖超指示：“你们中组部的年轻干部要抛弃老革命女儿的妻子，与什么记者搞婚外恋。还说什么，八小时努力工作，业余时间不犯法就行，谁也管不着。我就要管！他不能留在中组部！”虽然部长没点名，周围的同事偷偷看我。

会后，我主动找李锐：“我准备写报告，要求调离中组部。不能再给您添麻烦啦！”李：“不能因为一个胡涂老太太随便的一句气话，就断送一个优秀青年干部的一生！”

随后，在部长办公会议上，李锐说了上述同样的“四个一”的名言，并且强调邓颖超不分管组织工作，她的气话不是上级指示。根据潜规则，某位上级力保你，同级官员不会为事不关己的你，反驳得罪同僚。“邓老太太指示”就这样被降温“和谐”了。又过了几天，乔石代替陈野萍出任中组部长，这烫手山芋陈脱了手，乔石也不捡。李锐在我危难的关键时刻，再次保护了我。

5-29 因我太左与女友分手

在中组部的两年中，因坚持离婚所受到的高层压力和仕途挫折，并没有告诉何女友。我独自一人默默承受，并且在继续努力。我分别咨询了律师和法院的朋友，得知分居三年就可以起诉离婚，想咬牙坚持三年，离开中组部，就可以彻底解决问题。现在北京的离婚率超过50%，当年就这么难！那时最著名的女演员离婚，闹得“天翻地覆慨而慷”；事后双方出版巨著，“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我与何的关系在持续发展，晚上经常观看各种文艺演出和体育比赛，周末时常在双方父母或弟妹家里聚餐。我们的家长和兄弟姐妹，都已接纳对方为家庭成员；我弟弟还代表阎家，正式和我妻子谈判离婚事宜，但无功而返。我们一起参加中学的纪念活动和同学会，以及一些朋友的聚会，在同学和朋友圈中，我们的关系已不是秘密。在相亲相爱、亲密无间的氛围中，我们共同走过幸福的六年。第一次矛盾发生在那次鸿宾楼的“鸿门宴”，随后裂痕逐步扩大。

1984年10月，何来电话：“我在西单附近采访，下班后就近到鸿宾楼吃晚饭。”饭馆门口，迎上来的服务员问清姓字名谁，领我到二楼小间。进屋后，何介绍一位西服：“这是餐厅的马经理，全国人大代表。”“马人大”满面春光：“阎先生，您喜欢什么菜？”我一看这仗势：高级餐厅、单间雅座、经理接待，平日上班囊中羞涩（当时党务干部哪有信用卡？），想尽快脱身，忙不迭说：“家常便菜一荤一素简单点。不好意思请快点，饭后我们还有点事。”片刻，一扎啤、两冷盘、一浓汤、两荤两素和米饭花卷陆续上来。好家伙，吓我一跳。惊魂未定，经理回来：“阎先生可以吗，还加点什么？”我连连摆手：“太丰富了，谢谢，谢谢！”当时没有打包的规矩，我怕浪费，狼吞虎咽。何女：“中午没吃饭？饿死鬼似的！”酒汤喝光、菜扫九成；我把身上的钱全掏出，打着饱嗝：“就这些了，你补齐吧！”何：“走吧，我已经交了。”我因公见过各种豪华奢侈，因私首次受宠若惊，埋怨何铺张。她埋怨：“交什么钱，别现眼了！我报导一下，他们就多赚个万儿八千，还差这一顿？”我莫言无语呆若木鸡夜不能寐。

次日午休，几分钟就骑车又到了鸿宾楼，先看了菜单精算了昨晚的餐费，找到马经理：“不好意思！昨晚有事，走时匆忙，忘了付账。小何让我专程补上。”推让几个回合，见我坚决，经理只好收下。下班前，何来电：“晚饭后到我妈妈家，有事谈！”一般去双方父母家，都是管饭的，听她口

气对我不满。在人烟稀少的机关食堂，我这个半单身汉与几个纯单身汉的晚饭常客共进晚餐，平时和这些年轻硕士相互调侃。今天心事重重、匆匆吃完，骑车奔向20里外的和平里。我满怀疑惑、满头大汗步入何母家。

何怒气冲冲："你给我把人得罪到家了！谁让你去送钱？马经理来电话诚惶诚恐，一再追问怎么没招待好，什么地方得罪你们了？我急中生智，说是让你还妹妹钱，你听差了。误会误会，搪塞过去。马还说，那个男同志态度僵硬、没有一点回旋余地。你朋友怎么这么棒槌！"

我解释："你知道：当煤炭部的部老爷和部长的大秘书，帮人办事，我拿过一点好处吗？中组部这两年，人说我背后插两面大旗：'替天行道'和'有求必应'。我帮多少人，解决冤案、正当升官、调进北京，收过一份礼、吃过一顿饭吗？有人把重礼送到家里，说是托他在外地买的紧缺土特产，钱已付过。保姆不明就里收下。我估价后，买双倍价值的烟酒赠回。（礼物退回伤感情，给钱显俗气，烟酒大路货易处理。）昨天又没干啥公事，干嘛白吃公家的？"

何生气："就你革命！就你极左！"我："上面说我精神污染自由化，是极右！你是第一个说我极左的，在公私分明方面，我就是有点左。没办法！"

当晚小吵，不欢而散。数天过后，彼此气消，继续吃喝玩乐。表面和好如初，爱情深处裂痕已在。文体演出，举办单位历来赠"采访票"两张，我受之坦然。白吃公家的，她不再请我，避免尴尬。

1985年春节，"并联"逛庙会。何女突然出手阔绰地要给我买贵重礼物。

我劝阻："别花那冤枉钱！"

何得意："我报导的个体万元户送我千元红包。"

我生气："赶紧退回去！"

她解释："人家说是年底奖金，他发徒弟也是一千。"

我讲理："工程师月薪才97，一年不过千余元。你怎么能一下子就……！"

她攀比："报社别人拿的更多！"

我不讲理："别人我管不着，我的女朋友就不行！"

她委屈："你父母双全、部局待遇，兄弟姐妹都是小官，当然吃喝不愁。我孤女寡母、家无男孩，大姐病休，清高不起！你的女友就该清贫倒霉？"何女的高干父亲，文革被迫害致死，母亲级别不高。

我不管："不退？跟你没完！"

她发怒："你就是一贯老左，中学中左、要当什么接班人，大学大左、迅速入党，文革极左、当红卫兵头头。现在在烂组织部左得出奇、左得可怕。谁愿当你女友，我还不稀罕你呢！"

话抬话、气顶气，年轻气盛的两人，势不两立当即分手，"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事后双方都觉得，对此问题，分歧巨大、水火不容，皆不退让。我们双方的妹妹们，先后多次劝和，都无功而返。最后，结束七年恋情，我们友好分手。

日后反思：我确实较左太"轴"，当时有偿新闻比比皆是，稍后更加过分的事情层出不穷。何确是比较清廉的好记者，我少见多怪，太道学了，太爱惜羽毛。分手责任完全在我，后来何也不甚幸福，我确实对不起她！

1989年自我放逐，出走海外。何第一时间，通过我妹妹在越洋电话中转告："我家在海外有些阔亲戚，你若有难，我让他们资助你。"钱，没要；情，一直温暖着我！五年后首次回国，立即拜会感谢昔日女友，此后多年友谊延续。

第九节 与江泽民的密切关系和频繁接触

5-30 江泽民与我家的渊源

1954年至56年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父亲任经理的机电安装公司与江泽民任副处长的动力处，业务工作联系频繁。中知识分子的局级干部父亲，与大知识分子的处级干部江泽民，相互尊重相辅相成，配合默契工作融洽。双方又都算是新四军四师一个小山头的，因此无论工作关系还是个人关系都相当密切，两家也成为好朋友。此后近半个世纪，他们未再共事，但是江始终是我们家庭最好的朋友——没有“之一”，只是“唯一”！

文革前，江在上海和武汉，每次进京必带南方特产来家作客。我们馋嘴孩子特喜欢他的美食，因此也更喜欢带美食来的江叔叔。在极左思潮泛滥、学习雷锋高潮的年代，他反对我高中毕业“扬短避长”出国学外语，力主我考清华；使我受益匪浅，令我感激其高见、佩服其见识。

文革初期，江在一机部斗批改办公室工作，住在汽车局“筒子楼”的一间小屋，常约我去畅谈国是。我们一边吃他煤油炉烧出的美食，一边声讨文化革命和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批判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他对我写反对中央文革的大字报，极为认同。江从援助罗马尼亚工作团归来，对原教旨的马列主义和毛思想诸多批判，对我颇有启发。

文革中期，我家父母兄妹六人流落六个省市，只有身为北京市干部的体弱多病的老母亲一人留在首都，江对“姜大姐”多有照顾；我们全家一直感激不尽。1972初年江升为一机部外事局副局长，由筒子楼搬到计委大院的三室单元楼，不愿麻烦下属，是我和小弟担任搬运工、卖的苦力。夫人王冶坪不适应北方气候，因此江一直是单身在京城。1975年江为我搞了一台精密设备，协助我顺利从甘肃调回北京。

文革结束，我家又恢复了六人皆在北京的局面，江也恢复了我家的常来食客身份，每来必带重礼。逢节假日王冶坪阿姨来京探亲，父母家就有吃不完的上海精美食品，因此阎家第三代都特欢迎王奶奶。

80年代，不断进步的江，帮助我之后，又为弟妹们排忧解难。妹妹纺织工学院毕业，一机部江局长安排她到该部最好的单位：一机部自动化所；弟弟获兵器部学士，电子部江部长亲自领他到部长办公室，叫来最热门的计算器局领导、王震之子王之：“我战友的儿子，带回去安排！”

如上所述，我和弟妹三人，在工作安排上，都被江叔叔利用领导特权，“合法”地走了后门、帮了大忙。尽管我们还算比较优秀，但是比我们更杰出的平民子弟，又有谁人去管！

家父出身北方地主，仁义礼智信的传统观念浓厚，颇有家长风度；江泽民长期生活在江浙上海，自由平等博爱的民主意识较强，更平易近人。我曾对他们玩笑：“从你们两位长辈身上就能看出，资本家优于老地主、资本主义取代封建社会的合理性。”江泽民当局长时，他的接人待物处事皆高人一筹；根据他的智商和情商，我们阎家人都预料他前途无量，认为部长对他绝不是极限，当然没想到他能当上核心。

九十年代，江总书记亲自交待办理我“六四出走”后的回国事宜，使我在不尽忠后，仍能尽孝，此乃后话。

5-31 中央委员江泽民

江泽民升任副部长后，只身搬进北京三里河南沙沟的部长高干大院；距中组部当差的我、居住的物资部大院，只隔一条月坛北街，百余米距离。少时每季、多则每月必招我去妄议时政：但从不管饭（我忌泡面）、零食管够；遇有公私大事，立马相见。

1992年中共十二大，江泽民当选中央委员，经过内幕如下：

时任青干局长的李锐参加十二大筹备组，胡耀邦要求需要补充一批中青年知识化的中委。机械部长周建南（周小川之父）向老友李锐，推荐了老下属江泽民。李锐派自己从水电部带到青干局的李志民，到电子部考察江泽民。李锐重视周建南的推荐，又因江是烈士子弟、上海交大毕业，加之李志

民考察结果挺好，遂决定江进中委。顺便提一句，李锐的中委是十二大筹备组的章蕴和组织部的顾问、德高望重的帅孟奇推荐的。江和李荣任中委二例，说明重要熟人的推荐，在官运仕途上多么重要！

1983年3月21日，江泽民来我父母家晚餐，饭后讯问我。

江好奇：“我当中央委员都半年了，怎么没有任何政治待遇，你们中组部也没人理我？”

我内行：“中央委员只管一年开一次中央全会，到时拍手和举手就行了；不是级别、没有待遇。过去还有工人和农民的中委呢，照样干他们的力气活儿。电子部长张挺不是中委，你副部长是中委，转正指日可待。”

1983年10月十二届二中全会召开。

江中委又不解：“全会上听邓力群‘白话’了一下午‘反异化’。什么意思？”

我从哲学上和政治上详细地解释了异化的原意和引申的意涵。又指出：“周扬讲异化问题，是防止党的专制和干部的官僚化。而左王胡乔木和邓力群借机整周扬，压制思想解放。”我最后点题：“力群反异化，意在清污染！”

已经成为正部长的江明白了：“我们还是搞四化，不理他的反异化！清除精神污染在我们工业部门搞不起来，我电子部就决不清污！”江当时确实不左，此举得到胡耀邦和赵紫阳的认同，为日后的晋升蹴实基础。

5-32 电子工业部长江泽民

1983年6月，江泽民顺利转正成为电子部长，就想调我去电子部干部司任领导。我因婚姻问题没答应。

1984年春节，两家互访拜年，我与江部长闲聊。

江牢骚：“国务院部长就是西方的内阁成员，直接听命于总统或总理。可是在紫阳总理之下，我还有八个婆婆，计委、建委、经委、科委、财政部

等等。最可笑的是，国家设立了电子部，去年又搞了个什么国务院振兴计算器领导小组。组长是万里，副组长是方毅、吕东、张震寰，一个个都比我官大，小组管大部，让我们怎么干？中国的部长真难当啊！”

我安慰：“八个婆婆算什么？毕竟真正懂电子的领导不多，还不是你们说了算！组织人事谁人不懂、哪个不晓？中组部长陈野萍只是个中顾委委员，二、三十个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不都是他的婆婆？再加上所谓的‘八位老’，更够他呛。您知足吧！”

“1984年3月3日，陈云约请江泽民前来住所，汇报电子计算器生产情况。”（摘自《陈云年谱》349页，新闻报导和照片也载次日《人民日报》头版。）

次日星期天，江也紧急约请我。

江不安：“昨天向陈云汇报时，他指着一直在旁边、不言不语的陈元，两次说：‘他是学计算器的，挺想归队呢。’小阎你说，陈云是想让他儿子当电子部长吗？还是其它什么意思？”

我解惑：“陈元现在是北京市委常委兼商贸部长，与陈希同市长合不来，有点施展不开，可能想撤。他最多也就是想去当个副部长，不会争你的部长宝座。”

江着急：“陈太子来了，我可不好伺候。你来当我的干部副司长，没有正司长，你主持工作，协调我和陈元的关系。我去找李锐要你！”

日后，江泽民果然到与他关系密切的李锐家拜访，提出调我的要求：“你可以把与阎淮同级的人，送给建设部任干部司副司长，就可把他给我。”

如前所述，李锐对我说：“小阎，回家和你分居的老婆睡一个礼拜觉，去哪儿都行！”我拒绝。

6月16日，我到江家，详细谈了因我不愿与妻子和好，中组部不同意湖南

让我去任职的要求，更不会外派去电子部。也讲了最近邓颖超要赶我出中组部，李锐保我的事。江同情我，赞赏李锐“义气”。

7月29日星期日，我在天津考察第三梯队40天，返回北京的第二天，应江泽民的要求，我下午到中南海陈元家。

我问陈元：“江泽民让我问你，想什么时候来电子部？”

陈元解释：“工作是不太顺利，但还想在北京拼搏一番，电子部是将来的退路。”

晚上我到江泽民家，告知陈元的想法。

江释然：“他暂时不来就好。李锐说你现在也不便来，将来陈元要来，你就一定必须来！”此事暂时告一段落。

1984年国庆我告知江泽民，李锐离开中组部之事。江非常为李惋惜：“李锐对我很好，我的中委和部长也算是他给的。他改革的车开得太快了，难免翻车。李锐进出中组部，成也陈云、败也陈云。抽时间我应该去看望他。”

1985年5月28日，江赴任上海市长行前，幸灾乐祸地说：“陈元来电子部的事，我交给继任的李铁映啦，他们都是高干子弟，一起共事吧！”

5-33 谋任上海市长的江泽民

1985年初，上海市长汪道涵将离休卸任，拟推荐江泽民继任。

汪是文革前的一机部副部长，与家父和江泽民都很熟悉；文革倒霉后更无架子，与江接触更多。汪和江，两个大知识分子、多才多艺官员，结为好友。汪阎江，三位部局处长经常开“三级干部会议”，议论文革乱象、非议中央文革；偶尔召我“列席”，提供清华等学校的“下情”和陈云等高干的“上情”。

1月12日，为任上海市长之事，江泽民首次约我商讨。

江询问：“在中组部眼里，部长和市长哪个重要？哪个有前途？”

我回答："中国只有二十几个省市，加上拟增加的三峡、海南两个省，再升格一两个直辖市，也就三十出头。即使翻一番，不过五、六十多个。党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构一百多。尽管都是省部级，省市长可能不如你那八个婆婆的计委等几个部委重要，显然比你一个工业部显要。直辖市长更难得，市长与市委书记是同级、只半步之遥，将来当了市委书记，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政治局委员就不远了。"

江频频点头、连连称是。

1985年春天，江泽民经过慎重考虑，征求各方意见后，毅然决定南下上海，杀回第二故乡。

他找我："你说过，中央领导分管不同省市的人事安排，众所周知上海是陈云的地盘。你帮我再疏通一下！"我照办。

5月28日江对我说："我的上海市长已确定，你替我感谢陈家。另外，我已看望过李锐，聊起你。我说小阎特别感谢李部长对他的保护。"31日晚，我受江泽民之托，去陈元家，正式转达江的谢意。

1985年夏，江泽民赴上海任市长，我们接触减少。

1987年中共十三大，江升任政治局委员兼上海市委书记。他每次来京公干，必到家中探望家父。新四军老人都感慨："江都是国家领导人了，还念旧情，不忘看望'过了气'的离休老友。好人哪！"

江与父亲的首次电话联系，则是1989年他任总书记当天，新闻联播结束时。

第十节 为改革吏治创建北京人事科研所

5-34 李锐走后青干局的尴尬

中组部地方局的彭清华（2012年任广西自治区书记）说："部里的很多人对你们青干局都有看法，但是年轻人都羡慕你们青干局，不是别的，光是

你们局里的空气，就是部里各局都没有的！谁不想呼吸些新鲜空气呢！”（《我的83个月》，139页）一一足以说明：年轻人对青干局“新鲜空气的羡慕”与组织部当局对我们的反感。

1986年初，我们都感慨：“李锐免职后，青干局的处境一直比较困难，不管如何努力、谦虚谨慎，如何赔着笑脸、夹着尾巴做人！”（《我的83个月》，214页）在这种形势下，青干局和我，与四年前我来时大不一样，我们都很难再展手脚；于是我决定离开中组部，正式提出调离要求。我在工厂、国务院部委和党中央机关都干过，特想转换跑道，到新型的大公司新鲜一下。青干局动用我们的公私关系，联系各大公司。最后，康华总公司和海洋石油总公司较合适。“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走前还要撞好钟、敲响钟，孰料这一锤子敲向了总书记。即前面所述，上书胡耀邦总书记反对终止“选调生”工作。



1986年冬，在北京市委党校，与陈伟兰交谈。

4月北京青干处长、陈云幼女陈伟兰听说我要调离，特意来中组部找我长谈一下午。她对我在中组部的境遇不满与同情，建议由我主持成立一个组织人事科研所，专门研究干部制度的改革。当天日记我写下：“伟兰来，言：

中组部扼杀人才、打击勤奋、不得人心；天教你才必有用、要自信；坚持、时间和实践会使你战胜危机。人事科研所令人神往！”崔武年当时对陈的评价：“说起来，作为一个女同志，陈伟兰想的的确很远，确有乃父之风。”（《我的83个月》，219页）

5月根据与陈伟兰讨论的精神，我以个人名义向中组部领导提交《关于中组部成立研究所的建议》。我写道：“国务院近百部委都设有科研院所，党中央许多单位有研究任务或研究机构（如工青妇、党校、编译局等）宣传、统战、组织三大部中，宣传部有理论局、统战部刚成立研究所，唯独‘天官第一部、六部之首的吏部’，只有‘政策’研究室没有相应的理论科学研究机构，非常不适应新时期新形势下干部制度改革的需要。”尉健行部长雷厉风行及时批示：“中组部除日常业务外，只处理中央交办事宜。”我向陈伟兰通报了尉健行的否定意见，对她说：“四年前，我被令兄邀请、令尊推荐到中组部，为的是选拔优秀干部、淘汰劣质人员。现在发现制度更重要，‘选优汰劣’不如改制！”

5-35 调查研究政治体制改革

1986年6月，邓小平在听取汇报时说：“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1980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但没有具体化，现在应该提到日程上来。”邓继1980年8月18日《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谈话沉寂六年后，突然又想起了政治改革，终于重新吹响政治改革的进军号！中组部消息灵通、闻风而动，尉健行又想起了我：“小阎，你对改革挺感兴趣，就着重了解研究一下政治改革吧！”

遵照部长指示，我正式代表中组部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杂志、青年社科工作者协会、社科院政治学所、北京青年政治学会、《走向未来》丛书等单位，组织的一天会期的，五花八门、思想解放、言辞激烈的政治体制改革讨论会。此外，规格最高、规模较大、影响深远的是，7月在中央党校举办

的官方色彩浓厚的政治体制改革研讨会，党中央和国务院各重要部委均派员赴会。8月在辽宁兴城召开的全国政治体制改革理论讨论会。鉴于盛夏、海滨、理论的“天时、地利、人和”，中央各大媒体、社科研究院所、人文综合高校，都千方百计削尖脑袋挤进这个大型会议。我会后的汇报是：知识精英云集，思想理论活跃、抨击时弊尖锐、设计方案大胆。用半年后的官方语言说：“完全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典型！”其中，《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的发言，我印象最深；参加此会，后来成为名人的还有孙立平、迟福林和罗立为等。这两个月我还调阅大量有关机密文件，查阅各种公开资料，形成对政治体制改革较成型的看法。

8月，中组部召开“通气会”议论政治体制改革。崔武年记载：“发言的次序是：阎淮、崔武年、尉健行部长、正副秘书长、几个局长和彭清华等。主要是阎淮讲，他综合介绍已经召开的一些政治体制改革研讨会的情况。整个会议气氛很热烈，没有冷场的时候。当时我觉得挺兴奋，后来又觉得挺有意思。”（《我的83个月》，266页）

5-36 陈伟兰力劝我去北京市

1986年下半年，除了中组部和青干局的日常工作外，围绕我的调动，各派势力互相较力、各方朋友鼎力相助，其中最热心者非陈伟兰莫属。

因为与陈元的交情，我与陈云的三千金二公子皆熟悉。其中除长子陈元外，幼女伟兰最熟。此兄妹二人，最得其父真传，皆从政走仕途。1968年夏，我和陈元扛着大包小裹满身臭汗、挤公交车送她到北京站，泪洒站台的她，坐上去成都的火车，再转往距北京最遥远的省区：西藏。70年代我们重返北京，恢复来往。1982年8月，我们同时分别进入中央组织部青干局和北京组织部青干处。我分管华北和东北，与她联系频繁。用组织部“德才”的术语评价：我们在原来“德”的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四年来在“才”的方面，

也彼此佩服，关系更加密切。尽管她已从处员、副处长升至处长，我还原地踏步在12年前的副处级。1985年我与女友分手，1986年春在各方劝导下，搬回美术馆附近、岳父在同层隔壁为我们提供的单元房中，与妻儿同住、与岳父母同餐，两位老人特别高兴我的回归。如果说过去20年，我经常去折腾陈元、顺便到伟兰房间看望；那么，此后两年则是多次应邀去伟兰房间谈工作，只是顺便看望陈元了。在力劝我去北京组织人事科学研究所期间，伟兰频繁来我家。前节提到30年代在上海党中央，岳父与周恩来的关系，他同样与陈云工作联系密切，如陈和黄都分别护送瞿秋白到鲁迅家避难。而岳母文革前又是中南海隔壁、伟兰等中南海子女就读的南长街小学校长。伟兰每次来我家，都代她父母问候："黄伯伯和杨校长好！"正如我经常在陈家吃饭，她也间或在我家就餐，席间，她经常与"杨校长"共同回忆天真浪漫的童年时光和众领袖的"孩子同学"的儿时糗事。

日记中，记载这半年有关调动的"事件"如下：

1986年6月，陈伟兰来家，鉴于中组部不愿成立科研所，她已正式向北京市委建议组建"组织科研所"。

7月5日，伟兰再来家说：在政治改革重新启动形势下，北京市委"书记办公会议"同意成立组织科研所。

18日，伟兰来中组部，对我说："北京市要你！"我答："容慎重考虑。"

23日，刘泽彭副秘书长告诉我："昨天同尉部长谈通，同意青干局意见，你按惯例，以副局级调出。"

24日，伟兰消息灵通，立即来中组部，力劝我去"北京所"。

29日，青干局机关处为我联系康华公司。

8月6日，李志民局长带机关处处长去见康华的上级"残疾人基金会"头头，谈我的职务的安排。

8日，伟兰约我去市委，见金鉴副书记。金是老朋友，极热情欢迎去北京市搞干部制度改革。

9日，周六晚伟兰来长时间电话，问与金鉴会谈结果，再三劝我去北京市。我答：“周末最后考虑，下周答复。”

11日，周一上午伟兰一上班即来中组部，逼问考虑结果。我答：“去北京！给我两天时间，与局长们协调。”

12日，与任小彬副局长谈，拟去北京。

13日，与李志民局长谈，宣布去“北京所”，希望谅解，停止与康华的联系。14日上午，雷厉风行的伟兰来中组部，开始北京所的筹建工作。北京编制委只同意给15人编制。我要求加倍！

15日下午，我去北京市委，与伟兰等人起草《科研所章程》。我提议正式名称为：“北京”组织人事科学研究所。不叫“北京市”，编制在北京，业务受中组部领导，研究课题是全国性的。

17至23日，我赴辽宁兴城参加政治改革会一周。

26日，崔武年休年假完毕，我告诉他我要去北京所，他不以为然。崔在《我的83个月》，269页记载：“北京组织所批下来了，阎淮去当所长。我不置可否，主要是这个研究所，和陈一咨那个体改所不可同日而语。很难做多少事情。”后来的事实证明，我们还是做了非常重要的事情！

8月30，日伟兰又来中组部，我们研究《科研所科研经费使用条例》。

5-37 跌宕起伏的调离过程

1986年开始实行“干部休年假制度”，按我的资历应是十天，加上周末基本就是两周，9月上半月，我在家闭门苦读各种心理学方面的书籍，前两年业余已经攻读许多政治学和社会学的专著，为去研究所作理论准备。

9月下旬，中组部刚由秘书长转任顾问的何载（曾兼任机关党委书记），

得知我将提拔调出，在部领导会议上历数我的作风问题，并重提邓颖超驱除我的“重要指示”；说我还上书总书记，反对耀邦停止“选调生”的决定。要求把我按现在的副处，平级调出。我局领导为我力争：一、十二年副处，资历老；二、四年来工作优异；三、我局我部，历来都是提两级调出；四、北京市已安排副局级所长。何载联络几位思想传统的老部长联合向尉健行施压。（我们私下评价尉健行是：“无为而官、未建树就行”）尉部长，当然舍我而迁就何载等老人的意见：副处级平调我出部。青干局明白：“老同志们”是在报李锐之仇，拿李锐包庇的“红人和坏人”开铡。

10月上旬，北京市提出“以退为进”的对策：由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科技干部局长华漱芳兼任组织科研所所长，我任正处级的专职副所长，青干处长陈伟兰兼任副所长。我的职位虽然低了，但由正局级的市委组织部领导任所长，抬高研究所的地位，便于我的“开荒”工作。（中国官场就如此斗法！）中组部不甘示弱：“坚持阎淮副处调出，不许北京提级。”青干局的哥们和姐们们愤愤不平，有人说：别走了，留下跟部里死磕！

10月7-10日，我按原计划，参加政法大学在总参三部举办的行政学师资进修班。夏书章讲授他的《行政学新论》，唐代望讲授其着《行政管理学概论》。我貌似“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与那些大学青年教师们，一起专心致志学习社科新知识。

10月13日19-22时，伟兰约我到她家，告诉我，北京市委副书记金鉴说了：“不理中组部，我们已经退了一步，正处级副所长，不能再退了！一个新机构新领域，副处级怎么开拓工作？阎淮1982年就配合协调咱们，好同志！先调来，将来再提拔！”她最后说：“不要听青干局朋友不负责任的气话，快来吧，咱们一起为干部制度改革大干一场！”又是在陈云中南海的家中，当初陈兄劝我来青干局，现在陈妹劝我去北京所。时间相隔四年、空间相隔几米，同样的促膝长谈、同样的晓以大义、同样的动以深情。人生难得

几知己，我何德何能？没有退路，只有一种选择——干呗！

24日，伟兰又来中组部，讨论“北京所科研计划”。

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中组部研究讨论中共十三大中央委员名单，主管的局室征求青干局“第三梯队”中，已进班子的优秀干部情况。这是我在中共中央组织部青年干部局进行的最后一项工作。

11月8日，市委组织部正式任命发出，我为正处级副所长。随后，青干局为我作“十全九美”的鉴定。

21日，办理离开中组部的各种手续。

22日，周六上午，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向陈一咨所长取经，如何从无到有、兴办一个研究所。下午，与伟兰等“北京科研所”骨干召开首次“所务会议”，晚上他们设欢迎宴会。

23日，周日，白天清华20年的姐们、青干局同事高晓虹在家里，举办欢送聚会，十余位同事参加；晚上李志民局长设家宴，日记载：“惜别畅谈至深夜”。

11月25日，青干局开欢送会。崔武年在《我的83个月》299页，较详细记载：“因各种原因所致，阎淮调北京组织所，不管别人如何看法，我是颇动感情！我不加掩饰地说了我的看法：到青干局来的，名义上都是志愿兵的话，阎淮这个志愿兵更名副其实些。阎淮有信念、有思想、有热情。阎淮敢从正面提出问题，并且敢从正面解决问题。阎淮有很强的责任感，有很浓的理想主义色彩。我觉得，阎淮离开青干局所留下的缺陷，可能在座的很难弥补。我稳定了一下情绪，带了点玩笑的口吻说，阎淮还有一个过人的长处，就是能设计一个很规范的迷宫，而这个迷宫又显出他的短处，就是他自己可能也找不到迷宫的出口。阎淮走了，以后谁还再来设计这些迷宫呢？哦，那一阵子，我好像心绪烦乱，不大想干活。”上述评价与他执笔的“官方鉴定”意思雷同。

崔武年《我的83个月》，用他在中组部青干局83个月的工作笔记和日记中的有关原始记载，形成50万字的巨著，其中提到近千人。看过的人都说：“对阎淮评价最高！”我们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他书中提到几十人到他家大盘吃肉、大碗喝酒，但是我们这对挚友却彼此几乎未到对方家中去过。当年中组部流传：部里最有思想、最敢直言的两个年轻能人，就是青干局的卷毛（我生来卷发）和白毛（崔少白头）。崔作了大量开拓性创新工作，但到1988年初，还是来部前的副处长；因“六四”的表现，挨整后正处平级调离要害部门。

2006年春节，青干局老同事在北京隆福寺的娃哈哈酒店为我接风。酒过三巡，雅座单间外，突然闯进一个陌生人。他说；“从门外看见阎淮和崔武年两位中组部前名人在里面，我这个当年没有声音的人就进来了。我现任民航总局副局长，刚在隔壁给退休老部、局长们敬完酒，还要回单位赶个材料。”喝两口我们敬的酒他就急着走了。我们十几个人苦思冥想，才想起他是经济局的，姓啥名谁没人知晓。

而当时不显山露水的年轻人，像前面提到的彭清华那样，后来当到正部级的有十余人。有人说，这就是“选劣汰优”的“劣币驱除良币”机制。不能一概而论，至少当年羡慕青干局的彭是例外。

四年前，怀着选优汰劣、净化干部队伍的良好愿望，进入中组部青干局；

四年来，我们作出艰苦卓绝的努力，各级领导干部的年轻化和知识化，有了长足的进展；在探索干部工作的民主化和科学化领域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四年中，看到高层吏治和全国吏制的诸多弊端，干部管理的问题源于干部制度的落后与不合理；

四年后，认识到“选优汰劣”只是扬汤止沸，“改章建制”才能釜底抽

薪，要害是制度、制度、制度！

我离开了曾创造个人辉煌、又备受打击的全国全党最高级别的组织人事部门，要到另一个期望创造更加辉煌的级别较低、但自由度较高的崭新舞台。

第六章 为十三大政治改革效力

——组织人事研究所两年（1986～1988年）

第一节 组建北京组织人事科学研究所

6-1 北京市委对我信任

1986年11月24日，我到北京市委报到。

上午首先拜会市委副书记金鉴，我们算老朋友了。

1982年北京市青年干部处成立，按中组部副部长李锐兼任青干局长的先例，上行下效，北京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金鉴兼青干处长。李锐在青干局首次“局务会议”上，明确当前的各项工作，并让我分管他认为最重要的华北和东北地区。次日我就去北京青干处，找金鉴处长，布置任务。其后，李锐交办的几个北京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干部落实政策的“老大难”个案，都是金鉴派北京青干处副处长协助我圆满处理的。此后四年，共青团出身的他由副部长逐步升为部长、市委常委、市委副书记，期间我带队到北京调整局级班子、考察第三梯队、指导各项青干工作，与金鉴配合密切、关系融洽。我与“团派”干部都是朝气蓬勃、热情洋溢，因此与他们配合心情舒畅、工作顺利。

金鉴热情地接待我，语重心长地说；“我了解你，陈伟兰又全力推荐你。在精简机构的当下，我顶住北京市和中组部的压力，为你凭空设立一个新机构。忘掉中组部的不愉快，干出点成就，别让我难堪！你建议叫‘北京所’不带‘市’字，好！出成果，全国享用；出问题，算我的！我信任你！”

下午拜会市委组织部长李其炎，当时他兼市委常委，后升任北京市长。

1984年初我考察时任县委书记的他，确定其为市级第三梯队。李任组织部长后，我们工作联系更频繁，我们都是外向性格、快人快语，故个人关系不错。

北京科研所隶属市委组织部系统，我拱手作揖说：“来拜老大！”山东大汉李其炎热烈欢迎我，拍着我的肩膀：“小阎，我不懂理论，你就大胆地干吧！我不是你婆婆，组织部是科研所的娘家。有困难，来找我！”此后在北京市的两年，我们一直相处得很好。

次日我到北京科技干部局，向顶头上司华漱芳报到。

华原是首都钢铁公司出来的知识分子女干部，李锐1982年在《人民日报》的文章中，曾提到应该重用华这样的优秀干部。华漱芳是李锐及青干工作的受益者，对很熟悉的我，自有好感。

华坦诚相告：“我是组织部副部长，部里的事要管；科技干部局的专职局长，要全力以赴。要不是中组部为难你，我还不挂研究所所长的名呢！你就当你是正所长，放手干吧！”

我初到北京市委就感到无比温暖，与中组部领导对我真是天壤之别、冰火两重天。我暗下决心：古有“士为知己者死”，我应该“士为知己者活——干活”，绝不能辜负他们！

北京青干处长、好姐们陈伟兰，更是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帮助我筹建新所的工作。科研所暂无所址，陈就在她处长办公室里加一套桌椅，我们共享一个房间。我开玩笑：“门口挂上‘科研所副所长办公室’的牌子，反正咱们都是副所长。”于是，我就在王府井南面的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大楼的组织部楼层上任了。

6-2 为人财物房而奔波

1986年12月，我跑遍北京市各有关单位办理一个新的独立机构所需要的各种必办手续。四年前，陈云的一句话，在中组部内一个崭新的局级机构

（青干局）立马生成一一中组部腾出几间房，（五层大楼几百人、宽绰！）给20人的编制，（中组部无编制和经费限制、青干局一直没用到20人。）调令发出、所需人员立即报到（谁敢卡住不放？）。而现在，这个横空出世的独立的科研所，为了它的人、财、物、房，我可就要费“老鼻子”的劲儿啦！

首先，到北京编制委申诉：“15人太少，办公室主任、会计、出纳、司机、资料员等，辅助人员至少5人；科研人员加领导才10人，还要承担中组部的全国科研任务呢。”编委主任反应真快；“那你向中组部要编制呀！”我“软磨”：好话说尽；开始“硬泡”：拿出“市委书记办公会议成立科研所的纪要”。最后编制增加到20人。

其次，有人就要吃饭，该“要饭”了，到市财政局去“抢钱”。有编制就好办，每年按人头划拨行政事业款项，我“拿着令箭（市委书记会议纪要）骗鸡毛”争取到“上限标准”。关键是开办费，讨价还价、最后争取到100万，同时申请到银行户头。

私人阔绰、尽情消费，公家有钱、要嘛没嘛，计划经济、全靠指标。编制办和财政局是大单位，都有市领导分管，比较买市委组织部的帐；物资局与市里隔着经委的中间层，又是管紧俏商品的，六亲不认，穷横？富横！最后通过市组织部里、从物资局调来的熟人斡旋疏通，终于拿到小轿车、计算器、复印机、摄像机、照相机等等“限制集团购买”的全部计划指标。



1987年夏，北京饭店，作者（左）、陈伟兰（左二）与联合国人事专家

（右）体会心理实验。

过去常听说：“管人、财、物的最牛！”在中央组织部，我们见官大一级，不觉得谁牛，现在到市里，可有切身体会了。但是还有比“人财物”更难搞的，那就是房子！时价上百万元的四合院和小洋楼，买不起：租房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在北京市委大楼挤几间屋子，也不难。但是一个科研机构长期在解放军站岗的警卫森严的市委里，不利于与学术界的交流和召开学术研讨会。最后，还是华漱芳所长把她担任局长的北京科技干部局的几进大四合院中的一个小院给了我们科研所。我对华说：“正好！我们在一个大院里，便于你这个所长对我们的直接领导。”华漱芳：“我说中组部怎么不待见你哪，得了便宜还卖乖。找到合适的房子，立马走人！”于是，在1987年春节后，科研所在东四北六条正式挂牌开张。

1987年1月，新华社发通稿，报导中国第一个专门研究干部问题的北京组织人事科学研究所成立的消息，《人民日报》等中央报刊和《北京日报》等全国各地方报纸都在显著重要的位置刊登。

“北京组织人事科学研究所”11字的名称，冗长绕嘴吧？这是我和陈伟兰“字斟词酌”用心良苦的成果。如若：

1、多一个“市”字，则局限在北京一市，丧失了对全国的指导意义；

2、少了“组织”、只剩“人事”，会被贬低为“人事部系统”（不言而喻“组织部”高于“人事部”）；

3、缺了“人事”只留“组织”，就疑为只研究“党组织”，学术界谁理你？

4、“科学”是我们标榜的招牌，更不能丢。

中组部系统简称我们为“北京所”，北京市系统简称“科研所”。下文即分别如是简称。

我们在前几届“大学选调生”中挑选了几个社科专业的研究人员。陈伟兰又把青干处的业务骨干支持给科研所任办公室主任、把几位心理学和政治学的处员充实科研所的研究力量。有了人员编制，在市里调人易如反掌，辅助人员很快配齐，但到北京市系统以外调人太难啦！过去与中组部青干局合作过的符国栋和刘苏里，硕士毕业的中国政法大学讲师，我们非常满意、特别希望调来。我到北京市后的第五天，就请来傅、刘二位，征求他们是否愿意来科研所一起从事干部制度改革，他们欣然同意。市委组织部立即向政法大学发出商调函。政法大学复函：“教学骨干、坚决不给！”我没辙啦！在解决科研所的“人财物”遇到困难时，经常是“北京通”陈伟兰出手相助。这次在北京势力范围之外，我只好请伟兰以陈云大小姐身份出面了。我们商定，以朴素的、晚辈的面貌，低调出场。

1987年2月13日上午，我和陈伟兰不坐科研所新买的小车、骑着自己的破旧自行车，顶着北京正月的呼啸北风，来到事先已约好的、67岁的司法部长兼政法大学校长邹瑜家。我们拿出广东茶叶，伟兰说：“邹叔叔，前两天广东朋友带来您家乡的土特产，您尝尝!”几番交谈，我们诚恳谦逊的态度，让老人家不好硬推婉拒。邹校长最后表示：“我再做系里工作，先放一人吧，要哪位？”我们答复：“资深稳重的符国栋。”邹部长兼校长爽快地答应了。离开邹瑜家，中午我和伟兰在路边小饭馆吃了极简单的便餐。1986年底，伟兰帮我跑研究所的“人财物”时，有关“局办”经常留我们“便餐”，伟兰告诫我：“说是‘便餐’，不定怎么豪华呢？即使简单，传出去，说咱们求人家，还大吃二喝，讲不清！”于是我们经常吃路边摊，陈大公主没的说，真可以！

那天下午我们又到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所长徐联仓家拜访请教。徐所长强调“管理的三重性，即阶段性、科学性和民族性”，我没听清，问：“什么阶级性？”徐详细解释“三性”，对我挺有启发。我们聘请徐教授为

我所“特邀顾问”，他在此后的研究工作中，对我们帮助极大。次日伟兰与我商议：“我们还应该去政法大学，找具体负责学校工作的校领导谈谈。这样有利于邹校长与在校领导的团结，也有利于北京所与政法大学的长期合作。”我佩服伟兰着眼大局、考虑长远，进一步建议：“我约上青干局领导，显得更重视政法大学的‘现管’们。”

17日，青干局任小彬副局长“带领”伟兰和我，到政法大学拜会杨克和甘绩华副校长。任局说：“北京所是为中组部工作，是为全国干部改革作研究的。”杨和甘说：“邹部长和我们谈了，今天你们俩又搬来中组部领导，我们会尽快给符国栋办手续；刘苏里也少安排社会工作，课余可去所里。”符很快到研究所，成为“首席研究员”；在此后的研究中，作出非凡的成绩。刘苏里作为我所“首席客座研究员”，也为我们的研究贡献了他特殊杰出的学识。随后“科研所”把符太太从甘肃调进北京，解决了户口和住房。这一切都源于北京市对我的信任和支持。期间，我们还几次商调北大国政系青年教师王福春硕士，但是北大一直不放；此后，王经常与我们合作；在十三大的“干部制度改革方案”中，也有他的贡献。

感谢陈伟兰！在研究所的初创时期，伟兰经常与我在一起。尽管我们认识20年了，在青干系统彼此配合四年了；但是最近两个月，我对她的了解胜过了以往。熟悉陈氏五兄妹的人，都认为陈元和伟兰最得乃父真传，政治敏锐和思想深度在干部子弟中属佼佼者。但二人性格差异极大。陈元内向、外冷内热，不苟言笑、经常沉思，酷似其父，不熟悉者，以为他架子大；伟兰外向、热情洋溢，感情丰富、善于表达，极像其母。

鲁迅的《一件小事》让鲁迅反思，伟兰的“一件小事”令我深思。某日办事后，我回到北京市委与伟兰共享的办公室，推门不开，里面隐约有哭啼声。我到隔壁青干处副处长屋，他们说：“刚才处里刘某的同学从县里来看刘，大家聊起形势。这位‘乡巴佬’褒贬了陈云，伟兰黑着脸出去了，我们

都比她年轻，谁也不敢去劝她。”我用钥匙打开伟兰的门，对她说：“委屈了，就痛快地哭吧！”伟兰像被欺负的小妹，见到撑腰的大哥，真的大声痛哭起来，边哭边大声地说：“我招谁惹谁啦？还好心给他沏我爸的好茶呢，他竟当面说我爸的坏话。我爸容易吗？”20年来，还真没见过她如此失态。我安慰她：“设身处地为你想，父母挨骂是谁也受不了！我可能比你反应还强烈。”伟兰：“就是嘛！”她逐渐平静下来。我可以讲理了：“领袖有特权，就要被人议论，更难听的还有呢。当面听到了，感情上受不了，理智上正常事。俗话说‘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再说，咱们不也常议论老邓（小平）吗？”伟兰擦干眼泪，拉着我，“走，给处里人布置工作去！”她还真讲理，拿得起、放得下！

6-3 在中组部打响第一炮

1987年1月，我首次以“北京所”的身份，参加中组部在山东济南召开的干部工作新方法协调会，中组部副秘书长刘泽彭和青干局长李志民主持会议，山东省委副书记姜春云、常委贺国强和张全景（三位后来都进入党中央）与会。各省参会的加上山东各地市，共计约百余人。我虽然离开了中组部，但是他们从未把我当外人，照样狠用。年前，在我紧张地筹建“北京所”时，还经常到中组部去参与“协调会”的筹划准备活动。会议进行中，我在会下参加领导小组的组织协调工作，在会上介绍北京所的业务、大打广告。我们撰写的《加强干部工作的理论研究、为发展组织人事科学而努力》的万字长文，作为此会的唯一文件，印发与会者学习。会后，此文在全国组织系统引起重大反响，许多省委组织部的《组工通讯》转载。与会的各省青干处的人大都很熟悉，非常高兴组织系统有了自己的科研机构。他们说：“你干这个科研所，人尽其才、众望所归。比到外系统当个烂局长，有意义多了！”大会根据各省意见，决定成立由中组部领导的、北京所负责的全国组织人事科研信息网，要我们定期出版内部刊物《网讯》。中组部还从由国

家科委申请的40万元课题费中，象征性地拨5万给北京所。我不客气：“还不够塞牙缝的！”刘泽彭：“给你点精神鼓励，塞你的臭嘴。”当即向北京所赠诗：“万花开处松千尺，众鸟鸣时鹤一声。”引为大会的佳谈。

一周前离京时，关于胡耀邦的不利讯息纷沓而至；现在山东开会和旅游时，“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我不断向山东省委的知心朋友打探京城传来的小道消息，与各地“青干哥们”议论纷纷、忧心忡忡。15日上午离鲁、下午抵京，不回家直奔北京市委“上班”。在与陈伟兰共享的办公室里，我得知预料之中、而又最怕证实的消息。1980年党的最高领袖更迭后，果真像毛泽东期望的那样：“七八年再来一次！”



1980年和1987年1月，作者两次登泰山攀险境玩命。

6-4 胡耀邦被迫辞职

全国人民都不会忘记的1987年1月16日，经过半个多月跨年度的、“庙堂”的暗箱运作、“江湖”的窃窃私议，底牌终于亮开了！上午，党的机器高效精密运转——不经过任何传统的和现代的新闻媒体，假装不让外国人知道，自中央最高层、经过省市县乡各层（机关则是：部局处科），口耳相传至平头百姓，全国“各级”人民都先后被传达：“今晚七时重要新闻，必须组织收听收看，看后讨论明日汇报。”

下午，北京市委的大会议室里，李锡铭书记向市委机关处级以上领导干

部，传达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总书记胡耀邦引咎辞职、赵紫阳总理代理总书记，当然还有耀邦的几大罪状。最后李书记代表北京市委，要求在座的市、局、处三级干部，在此关键时刻，务必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大会结束后，组织部的三十几个部长和处长小会讨论。李其炎部长主持，他说“我上午在市委常委会上已表态，现在再次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决定。”随后依职位高低顺序发言，基本就是同一句话，播放录音似的：“拥护中央决定”。李最后说：“没有不同意见，散会！”整个讨论不到十分钟。我当时就联想起七年前，在煤炭部讨论胡耀邦取代华国锋时，大家畅所欲言，多数人真心拥护、“拥胡”；少数人如山西籍同事李某，执着地倾心华国锋，我讥讽他：“你真像李大钊之子、央行行长李葆（保）华呀！”李同事学着我的东北音，反唇相讥：“没有华主席抓‘四人帮’，你和你老爹还不知在哪嘎达憋屈着呢？”一句话噎得伶牙俐齿的我哑口无言，众局长处长哄堂大笑。可见当时的政治空气的宽松，今非昔比啦！

当晚七时的新闻联播，播音员一改往日的西服为中山装。大家都知道胡耀邦提倡并身体力行穿西服，因此议论纷纷，有好事者投书报社质询。数日后，报纸不能自圆其说地“此地无银”忽悠一番。恰巧那天我去中组部，崔武年记录了我们的对话——“我拿报纸，问阎准：作何理解？阎准一笑，置之一边，说：怎么理解都可以，但从理论上讲，你要跟党报上的解释‘保持一致’。”（《我的83个月》，319页）这说明当时我们对中央不满，但作为高级党务部门的党员，又被要求与中央保持一致，只能无奈地调侃“保持一致”了。

第二节 薄一波王震召集七高干子弟座谈会

6-5 大年初二的中南海座谈会

1987年1月30日（春节初二），陈元和陈伟兰约请我去他们家共进午餐，

并说下午有几个好朋友聚一下。午饭时与陈家兄弟姐妹及其爱人孩子，十几个人有说有笑、边吃边聊。他们说：“文革时，你和元儿一起反革命，现在又和伟兰一起干革命；你和陈家有缘啊，来，干一杯！”陈元挡驾：“下午我们还有个小会，就和孩子们一个档次，喝饮料吧！”

饭后我和伟兰到陈元房间。陈元递给我一个名单，说：“薄一波和王震（邓小平任主任的中顾委的二位副主任）让我找几个人，今天下午座谈一下，了解我们年轻人对当前形势的看法和建议。你挺有想法的，一块去谈谈。还有这几个，你都熟悉。”我看名单是呈报两位老人的，上面有：陈元、刘泽彭、秦晓、薄熙成、王岐山、张延忠和我共七人，姓名后面有年龄和职务。（除宋克荒在广东，我们在京的“布尔什维克四人帮”陈刘阎都齐了；秦晓是宋任穷秘书，也是陈元系的；我和陈伟兰在北京旅游局搞干部制度改革试点，与薄熙成局长烂熟；王岐山在莫干山会议后，我们接触频繁；中共元老张鼎丞长女张延忠，是我清华朋友张泰山之姐，认识20年了。）我问伟兰：“怎么没你？”伟兰：“陈家不能出两个，你算代表我。”我赶紧说：“咱俩看法不尽相同，我可代表不了你，你哥能代表你。”两点半，刘泽彭来了，聊了几句后，陈元、泽彭和我，向北走到中海附近的中顾委常委的小会议室。其他四人也先后到齐了，我们留出正面的沙发，散坐在周围三面的沙发上；茶几上水果、零食、茶水和毛巾，当然齐备。

约三时，薄、王二老在秘书陪同下来到了。薄一波主持座谈会：“最近我们更换了总书记，制止了继续向自由化下滑的危险，其中王老（薄指指王震）起了很大作用。我们想了解你们有什么想法，小平也让我们找孩子们聊聊。王老你说说。”王震颤颤悠悠地说；“这主要是一波的功劳，当然还是小平掌的舵。今天来，就是要听你们说。”我们几个互相推让，最后照例还是陈元先说，陈当然讲了与党中央高度一致的看法。陈元对耀邦不稳重的作风、干预经济改革的做法历来不满，主要源于1983年的一段公案。

6-6 陈元对耀邦不满

1983年1月，胡耀邦在全国职工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了《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的长篇报告，提出：“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要把农村改革的经验借鉴到城市改革中，以承包为重点的企业经营责任制。改革必须触动中央各经济部门和省市，各级领导都要进行领导方法的改革。”

2月16日，胡乔木反对发表和下发胡的讲话，对《人民日报》负责人说：“耀邦的讲话，与十二大精神不相符。把承包推广到一切部门，就是很大的问题。”

2月18日，政治局和书记处开联席会，陈云批评耀邦的“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说耀邦不懂经济。胡乔木建议召开中央会议解决胡耀邦的问题，他对耀邦说：“这一次你就是下去了，也不要消极。”邓小平没有讲什么，只是说：“到此为止，胡赵格局不能变。”

1983年春节前后，陈元几次与我聊天时，都批评耀邦的讲话。与重视合法程序、谨慎稳重的父亲陈云一样。陈元此前告诉过我：陈云对抓捕“四人帮”，讲“下不为例”，并坚持要公审，说这样才能合法关押。陈元认为：“十二大闭幕刚四个月，未经任何党的会议，耀邦作出突破十二大精神的城市改革的决定。并且当时负责经济的赵紫阳总理出国访问，胡不与赵商量就草率讲话。”陈元还抱怨：“耀邦的‘承包进城’和‘一包就灵’，使我们基层搞经济的非常被动；农村承包效果非常显著，城市承包条件还不成熟。如我们的西单商场能承包给谁？”中组部传达胡耀邦的“八三年是全面改革之年”时，令激进的我激动。在政治和社会问题上，我与陈元有的一拼；但经济是我的短板，在经济硕士又有一年基层实际工作经验的他面前，我只有恭听的份，并认为有些道理。

说回到薄一波王震的座谈会。陈元发言后，“孩子们”你一言我一语、七嘴八舌随便聊。我琢磨：“在这屋里，我家庭背景最弱、职位较低，开始时只听别说；但是陈元不会白让我来听会的，要暗打腹稿。”果然，陈元没放过我，指着我：“阎淮你说说！”众人都知道我与正统陈家的20年渊源以及和异端李锐的密切关系，也都让我讲。

我先“穿靴戴帽”讲了几句冠冕堂皇的套话。然后话锋一转：“我到了北京市发现一些问题。（我在耍滑头，在中央大员前褒贬北京风险小。）批胡耀邦、反自由化，千万别搞成运动。北京当年批判邓小平的右倾翻案多大阵势；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不许披肩发和高跟鞋进市委大楼，天怒人怨；现在又有苗头，基层搞运动轻车熟路、得心应手。另外也别扩大化，北京的共青团派干部有点灰溜溜；整过头了，将来再纠偏，太被动。”在北京市不受李锡铭书记和陈希同市长重视的陈元和薄熙成，也附和我，批评北京市领导。

6-7 议论中组部长等人的去留

在一般性议论后，薄一波把话题转到中央关键岗位上的具体人事方面，主要由薄老表示不满，王老偶尔插话表示同意和补充事例。若被二老批评的某人某事，撞到与会某年轻人的枪口上，这“孩子”就锦上添花一番。薄一波首先拿王兆国开刀：“中央办公厅主任坐直升飞机上来的，没有地方党政工作经历，怎么能当好全党的大管家？应该下放到地方锻炼锻炼！”刘泽彭跟话：“当年耀邦推荐王兆国当中组部长，被陈云和宋任穷拦下了。”我已听说王在“帮助耀邦”的生活会上揭发胡之事，对王心怀不满。也跟着敲锣边：“胡提倡穿西服，王说不穿西服不许进团中央大楼；‘清污’时又嫌女士的西服裙太短。他忽左忽右，政治上不成熟稳重。”会后，王从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列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办主任位置，调到福建省任二把手、省长。

薄一波接着狠批朱厚泽："中央宣传部长，什么'宽松、宽厚、宽容'？完全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三宽'，朱就是自由化的急先锋！一定要拿下来，意识形态宣传领域务必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王震："我1953年进北京，半年还没认清各机关的门、没搞清各部门的人；朱厚泽来中央三天，就敢到处指手画脚、指责批评，就仗着耀邦撑腰，立刻把他撤掉！"没过两天，朱就变成农村发展中心副主任。

最后议论最重要的中组部长，用了较长的时间。薄一波："中组部长尉健行没什么问题、也没什么本事，这么重要的位置还行吗？你们怎么看？"我们七人中，四人与中组部关系密切。陈元父亲一直"关心"中组部，刘泽彭和秦晓，是忠厚稳重的老中组部长、宋任穷的前后两任秘书。他们表态容易被误解是首长的看法，所以都说："阎淮在尉健行领导下工作很长时间，对中组部中下层干部的意见很了解。"我只好勉为其难："尉部长工作勤奋，忠实执行中央指示。历任部长中资历最浅，没有深厚的人事背景；所以没有创造性的突出政绩，但是也不独出心裁另搞一套。负面评价是：尉健行，未见得行、无为而治、无为而官。"其他人也都同意我的看法。王震："尉健行确实比较弱，平调一下；换个强的，你们看谁合适？"心直口快、毫无城府的张延忠张口就来："李东冶挺好！"这么重大的议题，除她之外谁敢先说，众人无语。陈元不客气："九九（张延忠小名，我们圈子中都这么叫她。）你就只认识你们原来的冶金部长呀？"刘泽彭第一次正式郑重发言："我给宋任穷部长当秘书时，接触宋平较多，他挺合适！"我看见陈元在微笑，心想肯定是陈云的意见，陈元会前向刘交代过。薄一波直接问："陈元，你看呢？"陈元慢条斯理、娓娓道来："宋平作过周总理秘书，懂政治；当过省委书记，有领导地方的经验。现在是计委主任，懂经济；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懂经济的当中组部长挺好。他还是副总理级的国务委员，任中组部长，表示现阶段中央更重视干部工作；调走低一级的尉健

行，也顺理成章。”陈元说得面面俱到、滴水不漏，你不佩服他都不行！其他人也都附和着说，宋平是最合适的人选。不久尉健行调任监察部部长。宋平任中组部长，秋天十三大进入政治局，两年后为政治局常委。

我在座谈会上认为在冶金部工作的张九九对其老首长情有独钟，后来得知刘泽彭事前曾让青干局某处长向中央写信推荐宋平和李东冶。原来李东冶是陈云为宋平准备的“备胎”，孰料被九九当作“首发”，差点坏了大事！

座谈会结束天已黑。我回陈元家取出自行车，谢绝他们的晚饭，径直回家。次日，崔武年来家，我简述了前日的座谈会。崔在《我的83个月》319页，记录了此事。

第三节 组织撰写干部制度改革思路

6-8 在薄熙成的旅游局试点

1987年2月，北京组织所在东四六条的小院里，召开第一次全所大会。我宣读并讲解了《1987年工作要点》，这是我外跑鲍彤的中央政改办、曹志的中组部研究室和陈一咨的体改所“取经”，内部征求我所各位骨干的高见；精心起草的被陈伟兰评价为“纲领性和指导性文件”。当年科研工作主要是两个方面：其一理论研究、推出“中国干部制度改革的总体设想”，由符国栋负责；其二改革试点、在北京旅游局推行干部制度全面改革，由王申负责。王申，1983年北京大学心理学系毕业后，进入北京青干处；他与中组部长期合作，是把现代科学知识引入干部工作第一人。陈伟兰高屋建瓴地谈了：“干部制度建设比干部人头管理更重要，而科学的理论研究则是制度建设的基础，我们所是中国唯一的干部研究所，应该成为中央干部问题决策的智囊，中国干部制度改革的急先锋。”北京所内外的知情人都说：“阎淮是所长，伟兰是政委。”

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们两个正处级的副所长，还要尊重大两级的正局级

的华漱芳正所长。会前，我和伟兰请在隔壁科技局办公的华局长参加首次全所大会，她说：“你们自己开吧，我全力支持！”会后，我们汇报，她说：“去向其炎部长谈吧，他分管你们所。”

是日下午，我和伟兰到市委大楼，向李部长汇报并提交一份《工作要点》。其炎还是一贯的豪爽作风，把几页纸的《要点》瞟了一眼，往抽屉里一放；粗声大气地说：“甭详细谈了，这几千字我也没时间看。你们俩的事，我都支持；年度计划算是汇报了，我也同意了，你们回去，放手大胆干吧！”寥寥几句话、短短几分钟，我们就被心情舒畅地打发了。

此外，我们所还要承担中组部的“干部选拔、考核、培养方式和方法的民主化和科学化的研究工作”。他们不敢公开说“民主化和科学化”，只好称“新方法”。正如崔武年在《我的83个月》322页记载：“87年2月，我和任小彬找阎淮和王申等一起讨论了好几次，‘干部工作新方法研究’的指导和协调问题，很多事件就委托阎淮那个‘北京组织所’代理了。”

北京市旅游局长薄熙成，薄一波幼子，年轻有为，是北京最年轻的36岁局长，锐意改革，是我和伟兰的好朋友。薄想改革用人制度，我们想找个局级单位试点，双方不谋而合、一拍即合。副局长卢兵，原外贸部副部长卢绪章之女，兼任华都饭店总经理，她愿拿华都“开刀”（干部子女都想改革又不怕失败）。于是我们就有了一个大型处级企业“练手”。这个《经济系统领导干部考试任用》的课题，作为1987年中组部直接管理的课题，被中国社科院列为“七五计划”重点课题。从2月起，我们在旅游局与薄局、卢副局及局干部处长等，制定改革试点方案，到6月的改革成果汇报会；四个月中，除在旅游局机关和华都饭店进行了大量的改革试点工作外，我们还先后在民族、北京、京伦、前门等几个饭店，国旅、中旅、青旅三个旅行社的北京分社，首都汽车公司等北京旅游局直属企业，召开了11个座谈会，发放了300多份问卷，取得一万多个资料。对192名领导干部，进行了23个方面的测验和考

试。

6月我们在北京旅游局召开改革试点成果汇报会。与会人员是：中组部任小彬副局长及几位处长，北京组织部华潄芳副部长带几位处长，旅游局薄熙成、卢兵和各处长，北京所陈伟兰、王申、符国栋和我。崔武年在《我的83个月》362页亦有记载。随后，我们对这类企业的人事管理，提出一整套整顿改造方案，包括考试录取、成长培训和考绩晋升等内容。年底提交中组部，在其1988年5月的昆明会议上，通过鉴定，获得好评。

6-9 《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思路》

1987年初新华社发出《北京组织所成立》的通稿，人民日报和全国各地的报纸，按规定都全文刊载之后，有一些读者来信议论："组织人事不就是干部工作吗，管好干部不就得了，哪需要什么科学研究？"根据报社回馈的意见，由我主笔起草了题为《加强干部工作的理论研究，为发展组织人事科学而努力！》的理论阐述性万言长篇文章，为干部工作正名、为组织人事科学研究造势、为我所做广告。此文先后在中国科学院的《学术动态》（第十期、87.3.6）和《理论信息报》（87.3.23）等报刊发表。

2月开始，我们集中主要精力进行"干部制度改革"的研究。研究团队有：我所研究骨干符国栋和王申、客座研究员、政法大学的刘苏里和北京大学的王福春两位青年教师，这四位"老三届"具备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和法学的学术背景，又有工厂农村的实践经历；再加上陈伟兰和我，两个"年轻的老组织部"；可谓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老中青三结合（四十至六十年代出生）的"六人小组"。我们收集了古今中外各种公开出版和内部机密的人事制度的资料，主要参考现代欧美资本主义和苏东社会主义的人事制度，特别查阅了中共建党以来各个历史时期干部制度的秘密档案。由几位硕士分段撰写，我们"六人小组"集中讨论十余次，最后在4月中旬由符国栋执

笔整合完成初稿。



1987年8月，在中国浙江奉化溪口镇蒋介石故居，与青干局挚友合影，右：任小彬，中：崔武年。只有他俩知道，六四后我欲辞国。

4月21日，我和陈伟兰应邀到中央政治改革办公室谈干部制度改革。我讲了三个多小时，伟兰插话补充。由于“政改办”们缺乏干部工作的实务，他们事前又没有研究我们的方案，故会谈结果不甚理想。当天的日记，我记载：“很多问题看法有分歧”。

4月28日我把“初稿”送交中组部刘泽彭和崔武年，请他们“修正”。我现在已无这个初稿，好在崔武年在《我的83个月》340¯342页，有详细记载——

“阎淮送来《中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思路》。对我来说，这是看到的第一份关于干部制度改革的整体构想。下面是我当时摘录的扼要部分（崔引用1500字之多，我只录标题；感兴趣者，可查崔书。）——

一、现行干部制度特征：1、党掌握全部人事决策权；2、国家干部体系庞杂，缺少分类；3、人事管理单一化、行政化，缺少监督；4、缺少现代的、科学的理念。

二、产生现行制度的原因：1、革命战争；2、计划经济；3、苏联模式；4、中国传统文化和官本位；5、列宁的国家学说。

三、改革的主要原则：1、改变重道德性的自我约束、轻制度性的外在规范；2、保证政府效率；3、社会精英发展多元化；4、扩大民主与政治稳定；5、人民当家做主；6、改善与加强党的领导。

四、改革的目标模式——抛弃国家干部范畴，建立现代国家公务员制度。其主要特征是：1、科学分类为政务类和事务类公务员，事务类实行职位分类；2、政务类选举产生、在任期内实行人大信任投票和民意评价的广义考核，事务类由社会公开考试竞争进入、实行严格考绩的常任制；3、党务干部分别参照政务类和事务类公务员管理：4、分类管理的公务员制度，体现了民主与效率的统一、稳定与发展的统一。

五、主要工作：1、对现有干部分解为党、政、企、事、群五大系统，党政系统如前所述；2、企业人事管理应灵活性和多样性、以利于资产增值，事业以聘任制为主；3、社会群众团体要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团，正当地影响政府决策，负责人应选举产生，要消除目前严重的国家化现象；4、对人事决策权进行科学分解和合理配置：个人的择业权应充分尊重，用人单位的选人权应合理界定，人事部门的管理权应有效保证和监督。”

崔紧接着说：“这个改革思路对我影响很大，我的接受，有个渐进的过程。开始觉得它离现实非常遥远，后来又觉得是贴近实际、基本可行。后来，我也参加了修改，最后形成了报到中央、为《十三大政治报告》所吸纳的《关于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设想》。”

崔武年这位改革的激进派，初始都认为我们的思路非常脱离中国现实，可见这个改革方案的大胆激进。

1987年5至7月，北京所“六人小组”对《改革思路》进行了多次讨论，仔细推敲、字斟句酌、反复修改，最后完成题为《关于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设想》约六千字的定稿。后期的讨论吸收刘泽彭和崔武年二人参加，他们在此方案上报中央的“可通过性”、下发地方的“可操作性”方面，贡献

了许多有益的意见。文件最后的说明是：参加本文写作和讨论的有上述八人。

6-10 抨击时弊鼓吹改革

中央书记处5月决定：中组部新领导是：部长宋平、副部长吕枫、孟连昆、刘泽彭，原部长尉健行调任监察部长，原副部长何勇调任监察部副部长、曹志调任书记处研究室副主任。

6月中组部干部教育局召开“东北和华北干部教育会议”。我在中组部时，与干教局联系不多；到北京所后名声外扬。我应邀与会作了《发展干部培训刻不容缓》的重点报告。明确提出：“培训不同于教育，教育是增长知识、看几本书就对付了，培训是提高能力、需要专门技巧；通过培训可以学会管理、增强领导水平。在干部管理上，培训是薄弱环节，亟待改革与完善；你们干部教育局应该更名为干部培训局，把工作重心由教育转移到培训。”同时，我还提出一系列的改革建议和实施方案。会后，北京组织所又在我讲稿的基础上，进行了系统研究，于年底发表论文《发展我国干部培训刻不容缓》（北京所《科研动态》第七期，87.12）。此文被中组部列为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必读文件。中央政改研究室在其《政改动态》1988年第一期转刊此文，供政治局参阅。

8月，中组部在浙江省椒江市进行县级党政领导“民主测评”考核试点。“考核试点工作组”由中组部的三个局和北京、上海、浙江等十省市组织部的几十位干部组成，我代表北京市。首先由椒江市委常委和正副市长在大会“述职”；其次由市委全体委员、市人大常委、各部委办局和各乡镇主要领导，共计178人分组评议；最后178位评议人分别匿名填写我们设计的“评议表”。评议项目是把“德能勤绩”四大项，分解成几十小项，每小项分为“优良中差”四个等级。地委组织部把“评议表”数量化统计后，向市委和市政府回馈“考核结果”。中组部“试点工作组”在所有程序完成后，向与

会的二百多人，发放了现场问卷调查表，其中包括这次考核的合法性、可行性、有效性等20多个项目。1988年以后，中组部总结椒江经验，在全国对县处级干部、部分省市和中央部委对地局级干部，实行年度“测评”考核；在干部管理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方面，在现有体制下取得质的进步。



1987年8月，浙江会后游绍兴，组织部同事唯我敢化身孔乙己。

中组部和我，彼此双方在“干活”上，从没当外人；尤其在制度改革方面，例如此会、更是如此！会前筹备、会中指导和大会总结，都不让我清闲偷懒；在闭幕式上，我又作了长篇发言，简要介绍了“北京所”的研究成果“干部制度改革思路”，大篇幅地抨击现行干部制度的弊病。感谢崔武年又在《我的83个月》的377页，有600字记载，扼要如下——

“阎淮说：北京所正进行干部制度改革的思路和框架的研究。我们的研究是从对现行管理体制的分析入手，它具备三个负面缺陷：第一、管理主体，理论的高度集中，而实际是高度混乱；第二、管理客体，干部概念的非常混沌，而实际是高度官本位；第三、管理机制，体制的极端僵死，而实施时是普遍的随意性。所以，改革的必要性是非常明显和急迫的。对现在正在举行的一些改革措施，我的认识是：一、德才测评，理论上不科学，但在实际工作上极具启蒙意义，要进一步科学化；二、民主评议、设计思想上没有突破，但对干部工作的民主化进程，却有意义；三、民意调查、从社会学角度为干部工作的单一方法提供补充，但因为缺少法理的规定，局限性很大；

四、领导素质的提法有虚假性，任何人经过培训和锻炼，都可成为领导，所以说什么素质是领导素质、什么不是，缺乏科学依据。”

飞回北京时，陈伟兰乘所里小车来接机。回城路上，伟兰递我火车票，说：“市委组织部让你去北戴河疗养休假十天，明天早晨的火车。”我不好意思：“刚到北京，还没干出什么；指标让给所里的老北京们吧，我也假装立个牌坊！”伟兰：“是处长的指标，不能便宜其它处长！再说，我也跟家里去北戴河，咱们在那还可以好好聊聊。”下午我回所里，处理离开一周积压的公务。次日赴北戴河，期间看望了中组部疗养的朋友们，更多是与陈伟兰互访、讨论研究所工作和畅聊胡侃。

甘肃省委八月下旬召开甘肃干部理论研究会首届年会，以及甘肃、江苏等八省干部研究协调会，两个会议重点都是讨论改革议题，月中电话邀请我去作专题报告。我在北戴河得知后，请所里回复甘肃，我近日太忙，可否另派研究员赴会。我回所上班时，办公室主任说甘肃还是希望我与会指导。我即电话甘肃组织部，对方把电话转给陆浩。1985年我去甘肃考察第三梯队时，与省委副书记、清华老领导刘冰，故人劫后再见，格外亲切；与其秘书陆浩，基本同龄、政见相似，一见如故。现为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的陆浩，热情洋溢：“听说你们搞的改革思路很有深意，我们的两个会议都与你们有关。沿海的浙江你能去，闭塞的甘肃就不愿来了。上次在张掖，你还说甘肃是第二故乡呢！”我还能推辞吗？

8月下旬飞抵兰州，我在两个会议合开的大会上，宣讲我们定稿的《改革设想》，并回答有关和无关的各种问题。会后的反应是：“三个真”——你们真胆大、真敢想呀、真能这么改就好了！”随后我在干部理论研究年会宣读《加强干部工作理论研究，为发展组织人事科学而努力！》的论文，这符合“研究会”的宗旨，是正面的“正能量”。次日是年会的自由发言，陆浩会前对我说：“听说你在浙江讲现行制度的弊端很尖锐，大会留一小时，你

放开侃！”我就在会上大放厥词了：把干部管理机构的极端混乱，干部队伍的非常混沌和高度官本位，管理体制的异常僵死和执行的随机任意性；三个方面的弊端淋漓尽致地揭露抨击。最后我说：“斯大林讲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而中组部的党员就更加特殊了。中组部的会计和出纳若合二为一，既节约了工资开支，又提高了我们报销差旅费的效率。但是财务制度不容许，它的深层精髓是——每个人都可能变为贼，不管你是什么员！不要信主席说的‘六亿神州尽舜尧’，要建立制度。香港警察不许在自己辖区买东西的制度，既避免了商家行贿、又防止警察受贿。”我放开地胡侃神聊，引来不断的笑声和掌声。20多年后，甘肃朋友见面，还笑谈那次“反动宣传”。会后去了甘南藏族自治州和刘家峡水库参观游览。

第四节 赵紫阳批示“设想”纳入十三大报告

6-11 紫阳批示、鲍彤座谈

干部制度改革的研究报告，七月底定稿，八月初在北京所《科研动态》的创刊号上正式刊出。

因为研究报告被总书记赵紫阳批示，所以我详细介绍一下该刊物。其首页自上而下，有这样的文字内容——

内部刊物科研动态第1期

北京组织人事科学研究所编1987年8月6日

关于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设想（讨论稿）

北京组织人事科学研究所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研究组

后面是六千字的研究报告。五个部分的题目是：

一、实现科学的分类，是人事制度改革的主要任务

二、人事制度改革的重点，是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

三、其他各类组织人事制度改革的构想

四、实施步骤

五、若干理论性和政策性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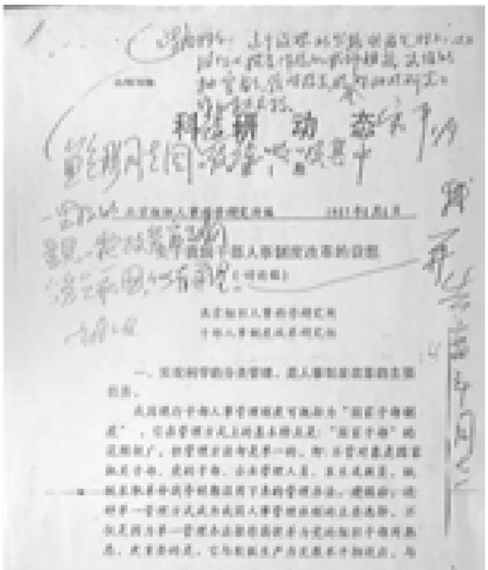
刊物发送中共中央有关单位和各省市委组织部。

8月下旬，我和陈伟兰从北戴河回京后，我们的心血《设想》送出半个月，上层没有任何反应，我有点着急。伟兰说：“你安心去甘肃开会，我去找找中组部长宋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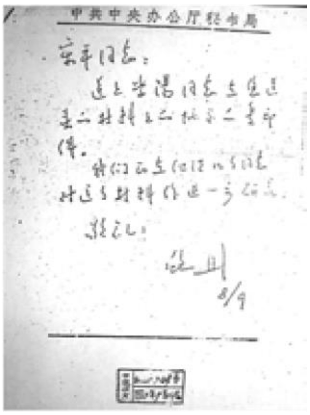
9月初，我从兰州回京，形势急转直上。我看到在北京所的《科研动态》首页有两段批示的复印件。

中组部长宋平，在首页最上方的空白处批示：“紫阳同志：这个设想的思路我看是对的，大体同十三大报告（草稿）的精神相符。如你能抽空看看，给些指示，将是对此项研究工作的有力支持。宋平1/9”

在首页的右下角，有“中办秘书局1987年9月2日”的收文印章。


科研动态

赵紫阳对我们研究所“改革设想”的批示。


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

宋平同志：

送上紫阳同志在您送来的材料上的批示的复印件。

我们正在组织几个同志对这个材料作进一步研究。

敬礼！

鲍彤

8/9

1987年9月，鲍彤写短信将赵紫阳的批示送给宋平。

总书记赵紫阳，在宋平批示的“紫阳”二字处划一个圈，一条直线划向首页中间偏左处批示：“鲍彤同志阅。请考虑吸收其中一些好的意见。把政务官列入公务员范围，似有道理。并告宋平同志。九月三日”

赵紫阳秘书鲍彤，在有赵紫阳批示的《科研动态》刊物前，附了一张印有“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的便笺，上写：“宋平同志：送上紫阳同志在您送来的材料上的批示的复印件。我们正在组织几个同志对这个材料作进一步研究。敬礼！鲍彤8/9”

总书记批示了！各有关的党务机器迅速运转。

1987年9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办公室正式约请北京所的陈伟兰、符国栋、王申和我，中组部刘泽彭和崔武年，讨论我们的《改革设想》，鲍彤让我先去聊聊。下午二时，一见到鲍彤，我就交给他一张八开的《现有国家干部队伍分类管理图表》，因为太大、又太专业化，故没有附在《科研动态》刊物的《设想》文章后面。图表纵向把现有国家干部分为政务类公务员、事务类公务员、党务、企业、事业、社团，六大类共15小类；横向分别是：分类方式、适用法律、产生方式、任职期限、考核方式、管理机构、责任性质、价值取向、人员类型，一共是九个项目。《图表》的15乘9、一共135项内容，把我们理想的人事管理模式，形象地描述得一目了然、清清

楚楚。鲍彤边看边点头，连连称赞；看完后说：“你们把庞杂混乱的干部队伍，梳理得脉络清晰，像大禹治水一样条理清楚。我们搞了一年也没搞出这样一张表。照这样改革和管理，我国的人事工作很快就会走上正轨了。”鲍对秘书说：“太好了，快去复印一百份，咱们‘政改办’人手一份，再给中央和有关单位送点。”

在会前和会后的聊天中，鲍彤谈了紫阳和他对时局和体制的一系列既真实、又深刻的看法，赵、鲍二人这些观点近年已先后在海外出版的书刊上分别发表，我不再重复，只举一例。鲍彤说紫阳对“党的领导”是这样设想的：党中央通过在全国人大过半数的党员代表制定的法律，领导全国事务；地方党委只有“保证和监督”的职责；企事业党委就是“服务性行业”，党委书记一周从事党务一天，其它五天干你本行；你是工程师干管理，是工人到车间干活去。党务人员工资和党务活动经费，由党员所交党费负担。我当时总的印象是；赵和鲍的思想真超前、真激进呀！和我这个“愤青”太合拍啦！我喜忧参半：喜：在他们领导下的中共和中国有希望了！忧：幕后掌权的邓小平和陈云、前台掌刀的薄一波和王震，能容忍他们进一步的“表现和暴露”吗？

三点钟，座谈会正式开始。我先介绍了我们的指导思想和《设想》的精髓，以及上不了台面的“反动”意图——既然在党中央军委外成立了国家军委，尽管是同一套人马，“党军”名义上变成“国军”了。公务员制度就应该使党的干部变为国家的干部，在人事管理上釜底抽薪、让党少管官员，真正做到全面的、彻底的“党政分开”，政务类官员的选举使其具有民意基础。接着，符国栋谈了《设想》的学理依据和技术性问题。由于近几个月经常和“政改办”的朋友们议论时局和干部改革，思想已经比较接近；而中组部的刘泽彭和崔武年参加了撰写；因此随后的讨论中，大家对《设想》基本是肯定的意见；更多的是对现实干部管理的制度和实务的抨击和讥笑。

鲍彤最后总结：“既然宋平慎重全力地推荐你们的《设想》，紫阳就认真仔细地看了，他也觉得不错，可以写进十三大报告。你们在中国引进政务类公务员是创举，过去没人提出过，也不敢写进党的文件，这为真正的民主选举闯开道路。紫阳只有一点意见：‘事务类公务员’不好听，有我们常说的事务主义的嫌疑，是个贬义词，给人以官僚主义和目光短浅的印象。改成业务类行不行？机关干部就是从事具体业务工作的嘛！业务类是中性的，党内容易接受。你们北京所回去把《设想》压缩到一两千字，作为十三大报告政治改革的第四部分、干部人事改革方面的草稿。”

6-12 我们的《设想》被纳入十三大报告

9月16日，我们把压缩成1400字的《（四）改革干部人事制度》交给鲍彤。它最终成为赵紫阳的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中，政治体制改革的第四部分的1400字，其内容只有个别技术性修饰和措辞的润色性小改动。当然是把“事务类”改为不伦不类的“业务类”。国外的副部长，分为与政党和部长共进退的“政务次长”，以及由司局长升任的常任的“事务次长”；我们建议的公务员制度仅仅在这方面，不能与国际的通用名称接轨而已。

座谈会后的情况，崔武年在《我的83个月》383页有记载和感想——“北京所的《设想》后来成为十三大报告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特别是关于对干部实行分类管理、建立公务员制度、公务员分政务类和业务类、建立广义的社会保障制度等，《设想》都有积极的、明确的建议。中国有幸，十三大有幸。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靠‘陈仓’小路得以解决，靠有现代观念的赵紫阳的不甚明确的批示得以解决！”

有了领袖批示，新华社闻风而动——1987年9月16日，供“正副国级”参阅的《国内动态清样》，（若某期内容牵涉到某省，则注明“本期增发至某省委书记”。）以《北京组织人事研究所提出在我国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的构想》为题目，多达两千余字的长篇报导。

10月5日，供“地师级”阅读的《内部参考》转载。

10月6日，“县团级”可以看的（省委组织部干部都能看）《内参选编》39期，摘要六百字再转载。

11月1日十三大闭幕，政治报告公开，广大中层党政干部要求看到北京所《设想》的更多内容。《内参选编》42期不得不又全文刊登了两千多字的详细报导。

我的朋友、新华社北京分社的肖家宝是上述各报导的作者，我感谢他的助力。肖说：“没有紫阳的批示，你们能上县团级的《内参选编》就不错了。有关你们的一篇两千多字的长篇报导，在新华社三级内参上，反复刊登四次；空前未有、恐怕也要绝后了！”

《领导科学》月刊1988年第一期，首次公开刊登了我们提交中央，被赵紫阳批示的《关于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设想》的六千字全文和具有135项内容的《干部分类管理图表》。文章前面的编者按写明：“此文系北京组织人事研究所的一份研究报告。起草十三大报告有关部分时曾作为重要参考材料。现在本刊全文刊登，供广大干部学习十三大文件时参考。”文章附了我们几位起草者姓名。就是这个编者按公开了：北京所的研究报告是十三大关于干部制度改革的的蓝图，使我们研究所名声大震。

我和陈伟兰两个处级小吏，协同四个青年学者，搞了个研究报告；靠伟兰走后门，让中组部长“批请”总书记“给些指示”。结果我们几人的《设想》，成为领导中国十亿人民的、中国共产党的最高权力机构——党代会的、指导全国今后五年工作的最重要的文件——政治报告的一部分。我们靠“领导批示”得逞，但对它却多有微词。崔武年在《我的83个月》385页说：“私下里，我和阎淮议论过中国‘领导批示’，说句实话，恭维的少、不敬的话多。领导批示中国随处可见，得益者和得害者，都不计其数；大到重要政治问题，小到个人生活待遇，最后都要依据领导批示取得合法性；才能行

得通、办得好。领导批示大于法律、大于政策，许多法律因领导批示而无法执行，许多政策因领导批示才能落实。这就是中国特色的领导机制和政治体制！”——我们是否“得了便宜还卖乖”？

1987年11月，中组部吕枫副部长传达十三大精神。主要是：“十三大的主要任务是加快政治改革，就是要从党的一元化领导转变为党政分开；十三大报告是完善的、成熟的、光辉的马列主义文献，十三大的意义可能超过1945年的七大。”

但是，十四大以后历次党代会在政治改革上，没有进步，反而逐步倒退。邓小平在决定撤掉赵紫阳的1989年5月31日，在《同李鹏、姚依林的谈话》中斩钉截铁地说：“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事实呢？现在若说得绝对点，就是：“一个字也没执行！”在公务员制度方面，1992年3月人事部长说：“我国的公务员制度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政务类’与‘事务类’的划分。副部长以上为高级公务员；正司长以下、副处长以上为中级公务员、科长以下为初级公务员。”1993年公布的《公务员条例》，即是按高、中、初三等级分类法。这完全倒退复辟到建国后一直执行的，部长以上、局处长、科长以下，分别是高级、中级和初级干部的的“等级管理”制度。官员的选拔完全恢复了“任命制”，干部的人身依附、只唯上命罔顾民意的弊端显露无遗。这哪有一点现代人事制度中分类管理的影子？我们的心血付之东流、前功尽弃！但这与整个政治局面的大倒退相比，又算得了什么！政治制度是皮、人事制度是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政治制度不作根本的变革、不民主化，干部人事制度不可能优化；即使侥幸选一些优秀人才，也迅速腐化堕落。现在实例比比皆是，无怪乎鲍彤说：“我若还在体制内，肯定也是贪官！”制度害人呀！

十三大后，我和北京所的同事，又陆续联名发表了几篇研究报告。主要有：《发展我国干部培训刻不容缓》（北京所《科研动态》第七期），《从

现行国家干部制度走向现代国家公务员制度》（《北京组工通讯》88年第一期），《关于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中国行政管理》88年第一期）等。

同时期，我还应邀到各地讲课，宣讲我们起草的“十三大精神”、针砭时弊，大力鼓吹政治体制和干部制度的全面彻底改革。计有：1987年11月24日在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中国行政管理》杂志88年第一期有报导），12月5日去广东组织部、6日在深圳组织部、8日到深圳的全国公共关系协会年会，24日去河南周口的中组部课题协调会、28日在河南组织部。1988年3月去北京机械局党校、30日在北京组织部干部教育会议。4月初去河北省委党校组织部长培训班讲课，他们全程录像，在省内党政机关播放。河北党校不但负责这一周的食宿交通费用，还给我二百元讲课费。我婉拒：“在组织系统还没拿过讲课费，我正处级的月工资才一百二，怎么这么多？”校长说：“付讲课费是我们的规矩，这是按正教授付的，钱已经支出来，退不回去了。”我回研究所后，交到“小金库”，款待外地同行来京使用。

4月中去北京市委的领导管理学习班，下旬在北京党校读书研讨会，5月又到北京机械局党校，6月去北京党校领导干部培训班。不是我能讲，这源于广大领导干部对现行干部制度的严重不满与对其改革的迫切渴望。

组织系统比较僵化的老同志半开玩笑地指责我：“阎所长，你是天天吃党饭，日日骂党娘！”我笑答：“你们是天天夸党，时时害党。我是在救党！”

6-13 离北京所、进康华公司

消灭了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存在着等级森严、壁垒分明的阶层；封建社会悠久漫长、封建观念根深蒂固的中国，官本位的主观意识和客观现实更异常严重。官场内外、出世入世的个人和单位，都有一个明确的级别；

它决定人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单位的作为巨细、影响远近。妾身不明的北京所，实际上是由两个处级小吏操盘运作；所内外一直企图改变这个尴尬现状。我日记中有如下记载：

1987年5月，北京所的《改革设想》初稿完成，交中组部征求意见。陈伟兰对我说："现在政治改革的形势大好，根据我们承担的改革研究的重任，正处级二十人的研究所显然不能适应需要；我们应该扩充编制、升格为原来计划的副局级。陈元也说了，他早就是副部级了，你们之间的差距不应该这么大。现在宋平当部长，中组部不会再限制你的副局级了。"我回答："我们刚出点成绩，好像我就以此要官似的。人员少，可以多聘请客座研究员，升格提级稍后再议。"

5月底，已经荣升中组部副部长的刘泽彭约我去中组部。刘说："我想把北京所收编到中组部，由我直接领导，咱们几个朋友一起搞干部制度改革多好呀！"我表示北京所可以归中组部，我个人不愿"回锅"了。崔武年在《我的83个月》356页记载了此事。

6月，刘泽彭和李志民局长又约我去中组部。他们谈了初步构想：中组部以北京所为基础成立局级的科研所，他们中的一位兼任挂名的所长；我和陈伟兰任副所长，具体领导这个所。我仍坚持不回中组部的想法。当天下午，因在所里谈不方便，陈伟兰到我家，我们讨论了中组部两位朋友的建议，伟兰认为归中组部的方案可以考虑。我也同意这样对北京所的前途、对研究工作确实有利；但是崇尚民主、自由散漫的我，确实不想再回组织性纪律性极强的中组部了。

9月，陈伟兰再次劝我考虑北京所归中组部的方案，她表示愿意去中组部，殷切期望我也一起去。我说："你们可以开始运作合并方案了，我是坚决不回中组部的。我在组织系统六个年头了，也该转换跑道了。"当天日记中我写了："与陈最后一次谈北京所和个人的去向"。

1988年3月，北京所的研究和宣传工作暂告一个段落；我和伟兰召开全所大会，公开了归中组部方案和我们二人分道扬镳的考虑。群众讨论中，研究人员大都愿意去中组部，认为学术研究条件优越；行政人员则希望留在北京市，考虑个人福利待遇优厚。

4月，我在不影响外出讲课的情况下开始自谋出路，于一个月后调入康华公司，成为局级干部。随后陈伟兰兼任北京科级干部局副局长，次年她和几位研究人员集体进入中组部的局级事业单位——培训中心，陈先后任副主任和主任。伟兰在培训方面，在工作中钻研成长，确有建树；新世纪任国家行政学院副部级的副院长。

北京市仍保留研究所的建制，又充实一些研究人员，所的办公室主任升任所长，继续组织人事的研究工作。

第五节 在康华公司大展手脚的一年

6-14 康华公司与龙升公司

1984年3月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成立，理事长是邓小平长子邓朴方——文革中的北大学生因不堪凌辱迫害而跳楼，伤致高位截瘫。5月申报成立公司，9月获得批准成立中国康华公司；董事长邓朴方、总经理俞正声，后改名为中国康华实业有限公司（俗称小康华）。

1986年邓朴方拜访赵紫阳总理，欲成立国务院直属的康华集团公司。赵不同意，对他说："先不要成立大的了，你就把那个小的搞好就行了。"次年邓又找赵谈，说小康华搞的不错了，应该成立大康华为残疾人筹集资金，可以减轻国家负担。紫阳同意了。（权延赤：《邓朴方下海始末》，162页，光明日报出版社，北京，2004年）

1987年国务院下发文件，筹备成立中国康华发展总公司（俗称大康华）。邓朴方立即出台五人筹备小组：殷子烈，继任小康华总经理，其父为

开国少将；贾虹生，残疾人基金会国内部主任，其父为计委原副主任；俞敏声，社科院经济所研究人员，其父为一机部原部长；谭斌，大校军官退役干部，其父为高检原副检察长；谭唯实，国家经委副处长，其父为经贸部原办公厅主任。五人当年皆被称“太子党”，现在叫做“红二代”。

1988年3月筹备小组拿到营业执照，中国康华发展总公司正式成立。董事长：石油部原部长唐克，副董事长：煤炭部原部长高扬文，总裁：北京原常务副市长韩伯平，副总裁：冶金部原副部长周传典、殷子烈和贾虹生等。筹备小组的俞敏声任财务部总经理、谭斌任人事部总经理、谭唯实任办公厅主任。上述诸位组成董事会，是公司的领导核心。

康华注册资金2亿元，财政部拨款1亿。康华计划自筹资金：1988年2亿元人民币和1亿美元，1989年3亿元人民币和1.5亿美元。计划利润：1988年5千万元，1989年2亿元。这个宏伟的财务计划1988年基本完成，1989年随康华夭折而泡汤。

正部级的康华成立时筹建了八个正局级的二级子公司，它们是：唐克从石油部、高扬文从煤炭部、周传典从冶金部——三位原部长分别从原单位拉出的三个对口的专业公司；筹备小组跑银行，软磨硬泡出来的信托和租赁两个金融方面的公司；从残疾人基金会分出来的小康华和康辉旅行社两个绩效很好的老公司；以及为总公司全面服务的综合性的龙升公司。康华所得到的几亿元，大部分发给这些子公司，作为注册资金和自有资本金。

“总公司的领导值得骄傲，部门领导和各二级公司的领导也都不同凡响，都是有背景、有经历、有成就的人物。哪个拿出来都能讲几段故事，都曾独当一面挑过大梁。这样的优势，其他任何公司都少有。”（权延赤：《邓朴方下海始末》，176页）

我于1988年5月入主龙升，下面就着重介绍该公司。

国家给康华优惠政策，公司免税五年；各分公司免税后的全部利润交给

残疾人基金会，发展残疾人的福利事业。康华总公司尽管是正部级，但国家不发行政费用；于是专门成立一个二级公司，它的利润不给残疾人基金会，供总公司几百人的工资奖金和办公费用。该二级公司没有特定的专业领域，在龙年诞生，就命名为“中国康华龙升公司”。由总公司办公厅主任谭唯实兼任总经理，谭拉来哈军工同学、未担任过领导职务的王某任副总经理，替谭守摊。

龙升公司在北二、三环之间的总参谋部二部招待所租了一层楼，距离位于北三环中路的康华总公司近在咫尺，非常便于互相联系。龙升公司作为冠以“中国”名称的国家大型一类企业，公司内部的职能管理处室，与康华总公司的部门对口设置，相当齐全。另外还有直接进行业务（即赚钱）活动的：商品贸易部、产品开发部、设备调剂部、古董特艺部、实业部等。在我上任前后，还陆续设立了十余个分公司（即康华的三级“孙子”公司）。它们包括：在北京三个康华领导干部的亲友创办的；在上海、天津、广州、沈阳、呼和浩特、无锡、漳州等重要的大中城市也各设立一个，分公司的领导基本都是与我们熟悉的“红二代”和离休的“红一代”；唯一设立在县城的，是与缅甸毗邻的云南盈江，它则是与县委书记的亲属合办的宝石公司。

因为要“养活”总公司，康华对“嫡子”龙升公司格外宠爱照顾。他们除了把利润高的实业和商贸项目批给龙升外，还把总公司业务部的对台业务处成建制地划归龙升，成为我们的业务二部；把与当时还未建交的韩国的贸易活动，交由龙升处理。

1988年4月，残疾人基金会办公厅主任唐若昕来我家商谈去康华事宜。80年代初，我因与《走向未来》丛书的渊源，与副主编唐若昕成为朋友。1986年春，我去蛇口考察选举任用干部的改革，唐作为蛇口研究室主任全程陪同、家宴招待。1986年夏，中组部曾为我联系去康华，后因创办前一章所写的北京组织所而作罢。现在得知我自由了，唐若昕又为我积极活动。我过去

在基层工厂、国务院和党中央高层机关工作过，现在又经历了研究所。在以经济为中心、公司遍地开花的当下，我的阅历一定要补上经商的空白。唐对我说：“邓朴方非常欢迎你来，到一个二级公司当头头。”

康华总公司办公厅主任谭唯实，其父是50年代的一机部外事局长，当时我们两家都住在本文第二章介绍过的、北京东城的“一机部司局长中院”，我们可称为“世交的发小”；高中他又是高我一年级的校友；文革前中后我们一直是好友，相互帮衬。谭得知我欲去康华，也多次动员我去龙升公司帮他的忙。谭说：“总公司办公厅主任忙得我四脚朝天，无暇顾及龙升公司。你来当常务副总经理，公司你全权管理。我办公厅主任挂名龙升公司老总，不管事；但是内外都知道龙升是办公厅的公司，你好办事。”

4月下旬我决定去康华龙升，5月办理完毕全部手续，正式调入康华。

6-15 我在康华龙升公司的作为

入主龙升公司后，经过调查研究，我发现问题多多——机构设置不尽合理，好合并！人员关系太复杂，难处理！正是：“买卖好做，伙计难搭”！康华总公司初始的八个二级公司，其它七个都是专业公司，又有部长级领导主管把关，非专业的“关系人员”很难进入。于是，大批“皇亲国戚”涌向综合性（即无专业）的龙升公司。谭唯实和王副总都是面慈心善的主儿，各级领导、各种关系的推荐，来者难拒。结果不足百人的公司，绝大多数人都是“关系户”，干部子弟过半。我决定壮士断腕、大刀阔斧地进行全面整顿。在题为《进行企业整顿、推行利润承包、实行优化组合工作纪实》的1988年8月13日的《龙升简报》中有如下记载——

“龙升由于机构设置欠合理，责任制度没落实；职工积极性未发挥，精神状态不振作；截止6月底尚有4万赤字，7月继续恶化。阎总7月28日向总公司贾虹生副总裁汇报企业整顿的设想。随后召开公司本部大会宣布整改措施：一、撤销所有行政处室，合并为经理部，精简机关人员充实业务一线。

二、重新任命各业务部经理，官兵互挑、双向选择，实行优化组合。三、明确业务部经理的责、权、利。责：完成部内平均每人月利润2万元的责任；权：拥有对计划内资金的使用权和属下的任免聘用和辞退权、奖金分配权；利：完成承包利润后，可得平均奖金的2至3倍。四、8月起，取消每人30元的月奖、即5个月少发150元。年底完成利润者发300元，超额部分提奖10%；未完成者奖金递减：完成任务不足60%者，调至人才公司待业。五、经理部管理人员，在保证为一线服务好的前提下，年底拿业务人员平均奖的90%（包括总经理）。8月初，龙升召开各分公司会议，通报公司本部整顿精神，各分公司都分别主动承担几十万元的利润任务。预计今年龙升将大幅度超额完成总利润指针。”

我这个改革开放后的企业老总，与15年前文革中的厂长，今非昔比、鸟枪换炮了。同样是恩威并施，手中挥舞的胡萝卜与大棒都现代化了。公司制度合理、员工利益驱使，使龙升公司上下齐心；经过80天的努力，立竿见影、初见成效，转亏为盈、纯利润近50万元。1988年10月我向分管龙升的高扬文副董事长——因高是我在煤炭部的老部长，故被我“请来”分管我们——以及总公司的总裁们和各部门总经理汇报。龙升的成绩得到高扬文等领导的一致赞扬，并把龙升经验在康华的各二级公司推广。

1988年10月中旬，我到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县，考察当地的中台合资企业。

东山岛是福建第二大岛（海坛为第一大岛），是大陆去台湾人员最多的一个县。1950年国军撤退时，一次就带走五千壮丁；加上过去赴台者，东山籍的在台乡亲有20多万人。现在东山县有台商及其眷属5万人，而30年前，台商仅有寥寥数家。其中最大的是台湾的台煜家具公司。

台煜公司以当时先进的中密度纤维板和PVC版生产各种家具，年销售额超过一千万美元，是台湾三大家具厂之一。中方合作对象是福建吉昌公司，这

是福建省二轻系统的大公司，董事长是福建二轻总公司（二轻厅的翻牌）总经理，副董事长是漳州市和东山县的二轻公司经理。台煜以40%的资金，吉昌以60%的资金，合资在东山成立东正公司，生产各种家具。东正的一期工程已经完成，产品开始在国内销售。因中方吉昌后续资金紧张，急需外来投资，完成二期工程，形成规模生产，取得丰厚利润。龙升的漳州分公司发现了该项目，认为前景极佳；向我汇报后，请我实地考察，最后拍板。

我在北京对资料研究后，已看好它。在东山，经过几天认真仔细的调研和艰苦卓绝的谈判，我趁人之危“出小钱办大事”。最后形成《东正公司董事会纪要》：中国康华龙升公司出资30%，我任东正董事长，龙升漳州分公司经理任分管财务的副总经理。这都是吉昌让出的，“吉昌”股份30%，任副董事长和分管生产的副总经理；代表台煜的香港人仍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台湾工程师仍任分管技术的副总经理。董事会每季度一次，分别在北京、香港、漳州和东山召开。这是我在龙升最大的投资、收益最好的项目。1989年夏季，在香港的董事会也改变了我后半生的生命轨迹。

10月下旬离开东山抵达到漳州，下午和晚上分别到姚前市长家和市委张书记家拜访。次日视察龙升漳州分公司，告别晚宴韩市长等领导参加。我中组部的前背景和康华的现背景，去“五品州官”家和请他们吃饭不是难事，县里对带“中国”字头的龙升公司与台湾的合资企业，天然支持、不在话下。省里“天高巡抚远”管不着，“现管”的市里父母官，一定要招呼到。我从北京带给他们的进口见面礼，若是现在根本拿不出手，而在当时就可观了。这就是“中国特色”，我也只能入乡随俗了！

1988年冬，国家审计署对康华总公司和部分二级公司进行审计。嫡系的龙升公司当然首当其冲，审计署丁处长带领七人小组进驻我公司半个月，找人谈话、清查账目，最终以“无问题企业”的结论而结案。半年后我辞国，对我个人严厉的财务审查，仍无任何经济问题。两次审计和审查的清白，使

我心安理得地在海内外安度后半生。

1988年底，康华总公司进行技术职称评定，我在煤炭部由技术员晋升为管理工程师，已超过可以晋升高级职称的五年期限。由于在干部管理方面的论著与实务，加之在龙升公司的企业管理业绩，我被晋升评定为高级管理工程师。这个虚名是康华在我人生轨迹上，留下的唯一的有形痕迹。

而在无形的认知领域，康华的一年则填补了我对经济腐败的无知。例如我们为了贷款，必须向银行请客送礼；进口英国凤头自行车，当时需要上牌照，公安局要进贡；销售紧俏的大彩电，报税时税务局“雁过拔毛”；等等。当时让我震惊，但与现在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故不详述。

第七章 刻骨铭心的春夏之交

——六四凌晨在天安门（1989年）

第一节 6月4日凌晨身边伤亡数十人

7-1 “动乱”50天

1989年4月15日巨星陨落，前总书记胡耀邦病逝。两年前，胡突然“被辞职”下台，我气愤！现在他突然“被气死”辞世，我悲愤！今后中国的希望只能寄托在赵紫阳身上了。

广大学生对改革停滞、腐败蔓延的不满，借悼念耀邦迸发出来，迅速形成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恰似13年前，民众对文革和“五人帮”的不满，借悼念周恩来，爆发的“四五运动”。

4月26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表明中共中央对学生运动的强硬态度；康华传达到局级的、25日邓小平更强硬露骨的讲话，让我感到寒气和杀气。中国政治不幸又要步入春寒料峭的严峻季节。

公司老总的时间自由度很大，在这个春夏交接之季，我基本上是：上午在公司主持革命的工作，下午在天安门广场和北大清华看“反革命”的热闹，晚上和可靠的气味相投的政界和学界的朋友妄议庙堂与江湖的动态，支些“臭招”。康华老总的空间自由度很小，中国第一官倒的小头头不便公开活动和声援；这倒因祸得福，7月我得以顺利公开飞出国境、去香港，进而转赴法国投身海外民主运动。崔武年在《我的83个月》记载：“5月9日阎淮来青干局，聊聊形势说说看法。5月11日又见到阎淮，他很不乐观。”当时崔对中央还抱有希望，对形势较乐观。而我对幕后掌握实权、决定国家命运的“老人帮”接触较多，对中国政治已经失望；因此崔说我“很不乐观”，确

是我彼时的心态。“镇暴”后，崔说：“你还真有点先见之明！”



1987年五一节，作者登上了内部开放的天安门城楼。谁能想到，两年之后，这里血雨腥风！

5月13日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后，谁还有心思上班？我藉口交通堵塞，让公司属下“各自跑业务”，不必到公司点卯。我也全日制、全天候“关心国家大事”，但是仍然只关心、不过问，即只有想法和看法，没有说法和做法。

5月19日，中午在广场看到体改所、农发所、中信国际所和北京青年经济学会，三所一会发出的《关于时局的六点声明》。《声明》关键要害的第四点：“目前事态还在恶化。坚持已有的失误而继续失误，以致采取极端举动（如军管）将会导致真正的动乱，甚至造成民族分裂。”一看就知道这是陈一咨搞的，我感到“事态真正恶化了”！下午，我到中组部找到崔武年，我们都认为体改所那“是非之地”不能去。于是就一起到政改研究室，找鲍彤聊了一会儿。老鲍并不知道《六点声明》，也没透露什么内幕信息。三个既处庙堂之高、又接江湖地气的忧国忧民之士，在极度悲观中只能抒发些忧国忧民的哀思而已！而两年前，也是在这里，我们三人还在为中共十三大报告、为中国的人事制度改革，踌躇满志，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孰料“六四”惨案之后，在小时代大悲剧终场之时，三位党龄加起来近百年、既有党性、又富人性的高中级干部，“同途殊归”了——鲍：秦城监狱最高级的政

治犯，崔：中组部最严重错误的待处理干部，阎：海外民运最特殊的未被整肃自我放逐者。三个人，三种命运！

5月19日晚，中共中央召开在京部军级干部参加的党政军动员大会。乔石宣布“赵紫阳因病请假”，李鹏公布了北京即将戒严。5月20日，李鹏签发“北京部分地区戒严命令”。点燃了此后半个月的军队与民众的北京市区攻防“冷战”。

《李鹏日记》记载：“5月25日姚依林给国务院各部门传达中央精神。出席会议的有35个部委、19个直属机构、5个办事机构和4个大公司的主要负责同志。”

5月26日，“4个大公司”之一的康华总公司，唐克董事长向我们一一总公司各部门和各二级公司的总经理传达前一天姚依林的讲话。邓家的康华，天然拥邓反赵，对紫阳的垮台格外兴奋。传达完毕即散会，没有表态任务，省了我在耀邦下台时那样的违心说辞。

我依然每天流连在广场。高中二年级的17岁独子，也是不安分守己的主儿，校长锁上校门，他们翻墙去声援大学生。戒严后，我俩每晚去广场。6月3日晚上6时，戒严指挥部发出紧急通告：“凡在天安门广场的公民和学生，应立即离开，凡不听劝告的，将无法保证其安全，一切后果完全自己负责。”我预料当晚要出事，劝儿子留在家，一个人骑单车独自出行，在天安门广场的东南西北、四面乱窜。

7-2 “镇暴”那不眠之夜

快30年啦！那子弹横飞、鲜血淋漓的一夜，仍历历在目、永世难忘。但是，具体的时间地点和事件细节，难免模糊；事后许多史实披露，现在回忆难免有抄袭编纂之嫌。庆幸当年的9月，我在巴黎的《欧洲日报》的第一、二版发表的依据日记和记忆的三千字的《天安门实录》，再现仅仅三个月前的

六四亲历。以下是《实录》的主要情节简录——

6月3日19时，我骑自行车到达天安门，广场有几十万人。情势尚未紧张，保护学生的市民中亦有老少妇孺。

21时，纪念碑前学生宣誓，与广场共存亡。

22时，广场的民主女神像下，民主大学开学群情激昂。突然，东面约一团未带武器的军队抡着皮带，以四五路纵队从东单向天安门冲来，在王府井被群众挡住，冲散队伍。部队向北撤退，我与几个学生救出被愤怒的市民围打的掉队士兵，用自行车驮着与我儿子同龄的满脸泪水的农村娃娃兵，在东安市场追上部队。我骂一少校，怒斥他不管这些掉队的孩子。

23时，传来西郊开枪的消息。我遂西行，新华门前出现防暴警察，与学生和平对峙。西单几百个左手持盾牌、右手拿警棍的防暴警察，投射催泪弹，企图驱散民众。成千上万群众以砖头和木棍，把警察向西赶到民族饭店附近。

6月4日0时，两辆装甲车自北向南冲过西单街口，冲散群众，撞坏阻挡军车的公交车。装甲车向南行至宣武门、向东拐往前门方向前进。群众待装甲车开过，又阻挡尾随的步兵。军民展开“空手道”，双方各有挂彩。我和几个大学生，劝阻双方不要再打对方伤员，并将伤员送到附近的北京急救中心包扎。

0时30分，广场南面的前门西侧尾随装甲车的几千士兵被群众包围。一军官站在军用卡车上，说保证不打学生；说枪内并无子弹，朝天开空枪。气氛顿时缓和，双方互唱拥军和爱民的“革命歌曲”，彷佛是八一建军节的联欢晚会。

1时，广场天空上，突然出现类似烟火的信号弹数百发。官方广播：“北京发生反革命暴乱，军队可以采取一切措施，民众立刻撤离广场。”人民大会堂冲出上千名荷枪实弹上刺刀的士兵，在大会堂东门外、面向广场站列几

排。他们不理睬学生的沟通，也不许学生靠近，态度严肃强硬。

同时，一辆装甲车被劳动人民文化宫前、快慢车道之间的水泥墩子卡住熄火。民众烧车，车中跑出两名军人，被群众扭打。我和几个学生把军人保护到纪念碑下的指挥部。

1时15分，广场上灯光暗了一下，官方又广播“通令”，西边传来枪声。学生南向纪念碑收缩，我和市民北向天安门撤离。突然，天安门城楼前的一辆公交车起火，我和刚刚“被变成暴徒”的市民，用城墙上挂着的灭火器将火熄灭。

1时40分，广场西边，南起大会堂北至中山公园，一大批黑乎乎的士兵压了过来。他们用枪扫射，我身旁倒下几十人（有伤有亡）。我顾不上自行车，随人群向东猛跑。

2时，军队将广场东北角封锁住，不再挺进。在南起历史博物馆北到劳动文化宫，军民相隔五六十米、东西对峙着。一女青年因亲人被打倒在天安门前，欲冲回去，被群众按住。她要了根烟稳定情绪，只见她猛吸几口，突然又向西冲去。四五个小伙子追上去、想把她拉回，结果都被罪恶无情的子弹打倒。群众大骂法西斯，士兵向我们上方开枪回敬。

3时，一白大褂男医生非要前去救人，大家劝阻不住，只好退后几米坐下，停止口号。医生左手举红十字旗，右手拉着担架西行，至军队二十米前，军队中一官一兵迎出。医生被赶回来，说军人讲：广场无人受伤，不需急救。一小时前，我们被军队的枪弹驱赶东撤时，身后倒下几十人！群情激奋，向士兵大骂：“法西斯！刽子手！打倒邓小平！”你有嗓子，我有武器，军队开枪缓慢压上来。子弹大部分飞向头上，也有丧尽天良平射的，我们拖着惨叫倒下的无辜百姓向东猛跑。军队挺进到南池子停下，民众退在百米外。在我们拖拉的伤亡者身上，脑浆、肚肠、残肢、鲜血，惨不忍睹！先是平板三轮，稍后来了救护车，拉着难友东行。

3时30分，我随南面的民众，将对峙线慢慢向前推进到公安部的门前，对面的士兵不便向公安部方向开枪。公安部门内排列着几百个荷枪实弹的武警守卫部机关，门口有几十位空手的干部模样的制服警察冷眼旁观。民众向警察哭喊："人民警察爱人民！人民警察救人民！"有些警察也落泪，但无能为力。

4时，广场方向及长安街突然灯灭，一片漆黑。民众害怕、出现骚动，军人又乱枪扫射，我周围又有人倒下，被救走。半小时后，枪声稀疏。

5时枪声完全停止。6时天亮了。7时我蹒跚迷糊地走回在美术馆旁的家。

以上是我"六四"三个月后，在法国发表的回忆文章节录。

天上直升机轰响，地下急救车长鸣，北京人度过这漫长难熬的不眠之夜。忐忑不安等候我一夜的妻儿，见我身沾血迹但毫发未损，放下担心、问我在哪待了一夜。我无语，突然抱着他们痛哭不已。事后我奇怪，那一夜，我见到那么多惨剧，滴泪未掉，只是嗓子喊哑了。在广场我两次喊哑嗓子：国庆十周年，喊第一代"核心"万岁；30年后，喊打倒第二代"核心"。马克思引述和引申黑格尔的名言：历史会重复，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喜剧。中国却相反！五年前北京大学生游行时，打出标语"小平你好！"，现在同样的标语只加一字"小平你好狠！"我24小时未眠，应该睡个好觉，但是一连数夜，恶梦连连；白天则情绪激动、难以平复。

6月5日，骑儿子的自行车西巡。天安门广场仍被部队的坦克戒严，我尽可能近地环绕广场一圈，看到士兵在清理和"装修"。继续西行，到复兴医院；尸体摆满太平间，自行车棚中也停放许多，我数了共有43具。随后去了儿童医院和海军总院，尸体少于复兴，但也有几十具。为了便于家属认领，尸体没有覆盖。白天近距离、清晰地看到这些无辜被杀害的冤死同胞的惨状，我倍加悲痛和气愤。

以"反腐败争民主"为主要要求的、以学生为主体的民主运动，以惊天

地泣鬼神的悲壮结局震撼了北京、中国和全世界！它间接地导致了苏联和东欧极权主义政权的全面崩溃，结束了持续近半个世纪的全球冷战；它改写了20世纪的世界历史，却逆向扭转了中国发展的轨迹。

这是我入党的第25年，四分之一世纪以来，即使在文革猖狂的“浩劫”时期、在耀邦下台的寒冬季节，我对这个党都未绝望。现在却，此刻却……我不愿在屠杀人民的领导人或领导组织的领导之下继续效劳，决定离去！

第二节 欲与屠杀“被暴民”的体制决裂

7-3 刚上台的江总书记电话家父

“六四”之后，党龄都超过半个世纪的父母，心情悲伤、情绪低落。“三八式”（1938年入党、抗日时期的干部）的父亲，因为1935年“一二九”游行后，在北京参加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被中组部认定为“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的干部，即所谓的“老红军”。我曾调侃：“人家真红军，爬雪山过草地、枪林弹雨九死一生；你们洋学生，参加‘一二九’游行，被水龙头一浇、吃了几警棍，就也算老红军啦？”父母都是为抗日，组织和参加过学生运动的，国民党时期只挨过棍子、没挨过枪子。现在年迈的他们，为之奋斗一生的党、他们曾跻身其中的军队，向学生、向百姓开了枪，在共和国的首都杀死几百、杀伤几千手无寸铁的无辜民众。他们情何以堪？文革中，他们被批斗、蹲“牛棚”，意志坚强、对党的信念不动摇。现在精神支柱坍塌、身体迅速衰老。因此，我经常回去陪伴父母。妻子则陪伴20年代入党的、更苍老的岳父和岳母。

6月23至24日，十三届四中全会召开，江泽民取代赵紫阳，成为新科总书记。24日晚7点30分，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刚结束，父母家中的电话铃声响起。

我在家里，当然应该去接听：“请问，哪位？”

电话中传出熟悉的上海话："小阎，请你爸听电话！"

我把听筒递给父亲，小声说："江叔叔。"

江泽民："老阎啊，真对不起！这次来京没能去看望你，身不由己啦！身体还好吧？问老姜好！"

父亲："谢谢你的问候，我身体马马虎虎。祝贺你担任更重要的职务。代我和树德问冶坪好！"

挂上电话，我大发议论——简单及时的电话，体现了江的智商和情商：待人周到、办事圆满；早一刻，泄露机密之错；晚一时，官升架大之嫌。江现在的地位，每个电话都应该录音。他不给老友电话，情义上说不过去；电话通知升官，又有炫耀意味。来电道歉告罪，高，实在是高！耀邦下辈子也学不会，紫阳一辈子也不干这种事！李鹏要有江一半的本事，与学生对话，也不至于丑态百出了！现在的总书记只能他当、真该他干！

爸爸训我："你吃亏，就在这张烂嘴上。心情不好，到外面可不敢胡说八道！"还是妈妈厚道："你情绪不好，也不能这么说江叔叔，他来电话还是好意。过去他帮助过你们兄弟姐妹，今后更会照顾你们。"我嘴上不能反驳爹娘，心里想："哼！党我都不要了，总书记算个啥！"

总书记下一次致电家父，则是9月我在法国报纸上发表《天安门实录》和《我为什么离开中国》后的兴师问罪了。

7-4 无耻谎言与无情整肃

毛泽东历来重视"二杆子"，即枪杆子和笔杆子；亦即马克思所谓的"武器的批判"与"批判的武器"。40年前，靠它们夺取政权；40年后，又靠它们巩固政权。"六四"之夜，枪杆子对"暴徒"实施了无情的"武器的批判"；六四之后，笔杆子对民众开始了无耻的"批判的武器"。

依时间顺序，六月份先后公开和秘密出台的有：

6月5日，中央电视台播出《暴乱真相》，颠倒时间顺序、欺骗全世界。

在北京的人都知道：真相是“先镇后暴”，解放军开枪打死打伤数千民众前，“暴徒”未杀害一名战士。

9日，邓小平接见戒严军官时说，“4月事情一爆发，他们就是要打倒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一派胡言！被逮捕和通缉的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官员及学生（我大都认识），企图“打倒”和“推翻”的证据何在？无论4月还是（6月）4日！

16日，邓小平与他钦定的六位新常委谈话，提出“三代核心”的崭新概念。“核心论”明显违反党章“五年一次党代会，选举新领导”的规定！

19-21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全面清算赵紫阳，众元老口出恶言、墙倒众人推。政态炎凉党情冷暖，尽显无遗！

23-24日，十三届四中全会，李鹏报告《赵紫阳在反党反社会主义动乱中的错误》，是非颠倒、诬陷赵紫阳。六十年来唯一不认错检讨的被黜总书记，伟哉紫阳！

6月30日，陈希同在全国人大作《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报告》。竭尽造谣诬陷之能事！日后陈说，作报告前未见过报告。

康华，邓记公司；康华领导，邓家亲信。上述机密讲话，唐克和高扬文每次都是及时传达到我们局级干部；甚至有些省军级的绝密文件，也让我们知道。这些都加深了我对党的失望和绝望。

在笔杆子忙碌之余，枪杆子也没闲着，专政工具紧张运作。我的下述朋友被专政了。

5月28日，鲍彤被诱骗到中南海逮捕。

5月30日，何维凌失踪，秘密逮捕。

6月3日，曹思源被绑架，秘密被捕。“六四”后，一批在义愤下做出冲动行为的倒霉市民，被逮捕并迅速判刑，其中8人被判死刑。

6月24日，公安部发出对严家祺、包遵信、陈一咨、万润南等七人的通缉

令。“和蔼老包”被捕，严、陈、万三位友人亡命海外。

6月，一同进行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挚友吴稼祥、刘苏里等先后被捕。

截止6月30日，内部通报：北京公安局在北京抓获“暴徒和动乱分子”1103名；公安部在全国逮捕4386人。

龙升与台湾合资的东正公司，第三季度的董事会，年初即定于7月份在香港举行。董事长的我，“动乱”前就得到康华总公司领导的批准，并办好了政治审查和身体检查等出境事宜。50天的“风波”中，如前所述，我既不敢参加声援游行、又没胆上书逼党表态、更怕死而未阻军车挡坦克；似乎不像是动乱骨干和暴乱分子。良民的我，顺利通过“镇暴”后更加严厉的再次政审，只待7月下旬赴港。6月底我就决定赴香港后，不再返回。

7月初康华向局级干部传达了发至省军级的绝密“中央三号文件”，这是“彻底清查和坚决镇压暴乱分子的工作部署”。文件列举了：要严厉镇压的十类反革命分子，和要彻底清查的九种有严重问题者；中央要求：各地各单位务必“除恶务尽、不留后患”。

80年代，共同从事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众多朋友和熟人，大都属于被镇压和清查的19种人。如此这般，敢作敢为、富有良知的忠贞党员，能剩几何？

同时还传达了一系列“首长讲话”，其中王震的最杀气腾腾，大意是：三所一会一室（体改所、农发所、中信所、青年经济学会、政改研究室）就是赵紫阳搞反革命政变的小舰队，对这些坏人，就要杀一批、关一批、管一批。罪行不够杀和关的，我让新疆修些劳改农场，流放管制一大批。

三所一会一室几乎囊括了当时在京畿的中国政治和经济精英，其领导和骨干都是我哥们，我还是经济学会的理事。他们都是“君子动口不动手”，其中没有“暴徒”，因此没有街头被杀的；但是当时却是关了一批、藏匿一批、流亡海外一批；更多的朋友是在“现在进行时”和“将来完成时”的过

程中被清查整肃。中国进入黑暗期，我不愿“同流合清”，决定赴海外参加民主运动。

我们在天津选拔的第三梯队中名列前茅的张炜，时任天津开发区主任，戒严令下达即主动辞职，开枪后上书中央抗议，后被整肃。除赵紫阳外，张是唯一公开反对戒严主动辞职、六四后留在国内的高级干部。真英雄！近年回国，青干系统有朋友夸我毅然出走是英雄义举。我说：“我是狗熊，是胆小鬼的逃兵，没有那气魄和胆量在国内公开斗争。”当时真实的想法是：在国内抗争无用，到海外以亲身经历揭露六四真相，投身民主运动，促进和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六四后，为平息民众对腐败和邓家的不满，中央决定整顿“邓记”康华。康华总公司的领导认为，我们主要的错误是：“计划生育没搞好，二级儿子公司六十多，三级孙子公司上千，重孙子多得搞不清！”因此总公司考虑：合并二级公司、裁减三级公司、脱钩四级公司；以退为进、保住康华。因为龙升的效益不错，也因为总公司需要这块“自留地”；因此内定：把三个业务相近的综合性二级公司合并到龙升，当然还是我当头头。我当时决心已下，“猪八戒摆手，不伺猴（伺候）！”但是表面还得应付，商讨合并事宜。

康华最终没有逃脱覆灭的宿命，1989年10月，国务院正式决定撤销康华公司，龙升名列撤销二级公司的首位。我认为这是中共的一步高棋，尽管1987年初国务院批准成立大康华时，邓朴方已与康华在法律上和组织上脱钩，但是在实质和舆论上，能摆脱干系吗？成千上万的大小康华们永远是邓家的定时炸弹！

7-5 与青干局知己道别

中共中央组织部青年干部局，具有良知与血性的中年共产党员们，那些为干部工作民主化与科学化共同奋斗的朋友们，在国家的关键时刻，是不会

缺席的。让我倒叙回顾——

5月18日，学生绝食进入第六天。

上午，青干局全体13位干部，在主持工作的任小彬副局长（当时无正局长）带领下，签名致信中共中央五位常委，其主要内容是："我们痛切感到，现在已经到了危及我们党命运的时候，广场上的情景使我们焦虑万分、潸然泪下。我们恳切希望：立即采取措施解决好绝食事件。青干局是青干之家。我们不能眼看着国家未来的栋梁之才的生命受到威胁、越来越多的青年知识分子就此与党离心离德、几代共产党人用鲜血和生命铸造的党的形象毁于一旦。"

下午，打着"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署名"中组部青干局一群共产党员"的横幅；青干局8名干部以及部里其它单位闻讯参加的、一共35人，在崔武年处长带领下上街游行了。他们走向天安门广场，一路上得到学生和市民的鼓掌欢迎。对群众询问的各种问题，他们一律手指横幅上的"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于是，得到更热烈的掌声和欢呼——被整肃时，他们被质问："身在党的领导部门，你们把党的利益置于何处？"

在准备上述两个行动时，任小彬曾问崔武年；"你考虑后果了吗？"崔回答："解散！"不幸言中！1990月8月青年干部局撤销。同时，任、崔二人，在分别经过140余次与"清查、清理和重新登记"有关的大小会议，书写近50份"说清楚材料"和"认识材料"后，被"调离要害部门和关键岗位"。

上述内容参考崔武年所著《我的83个月》第619和637页。顺便插一句——我出国后的清查年月，中央某"无关单位"，曾到青干局清查我在动乱至暴乱期间的劣行，以及在青干局时的反动迹象。被以"他已调出三年，谁能三年早知道"而顶回。

7月9日我去任小彬家。我："下旬去香港开会，开溜了不回来了。过去

我们同甘，今后不能共苦了。1985年到贵州，胡锦涛送两瓶茅台酒，我给家父留一瓶，这瓶赠你。苦闷时解解愁，彷佛我们在对饮。”任：“茅台我替你存着，六四平反时，你回来一起喝！”

7月10日带了酒和菜去崔武年家，他更是丰盛晚宴招待。崔：“我照了许多相片，是历史的见证。党说我犯大错误了，可能抄家。你帮助藏一下。”我：“抱歉爱莫能助！香港开完会，准备去法国。严家祺和陈一咨等过去搞改革的一群朋友，现在在那里搞民主，我想去掺和！”崔：“慎重再慎重，开弓没有回头箭，不归路呀！”阎：“这些天，白天死伤者总在眼前晃，夜里常被噩梦惊醒。现在既造谣又镇压，我这口气出不来，要憋死！”我们在悲愤中吃喝聊骂。我平时只喝少许红酒，那天白酒喝多了，有点头晕。崔更是性情中人，喝得微醉。最后我们都流泪了，从暗泣到痛哭，后半夜分手时，真像是生离死别。

7月12日阴天漆黑的夜晚我摸到西单附近，敲开刘苏里那熟悉的小屋。看望刘的年轻妻子，还有可怜的两岁幼儿，她原来非常漂亮，现在十分憔悴。我安慰她：“苏里不会被关太久，你和孩子千万保重。我要出长差，不能再来看望你们。”临走留下些许钱财。

7月16日到经济所书记吴太昌家，1970年一起分去甘肃的北大朋友，没有任何背景考上研究生，最后一个回到北京，我为数不多的平民挚交。我托付他照顾太太和儿子。

7-6 国内最后两天

7月19日，到刘青峰当时在中组部工作的妹妹刘进家，索要其姐在香港的电话，说开完董事会去看望她，并帮她家给刘青峰带了些生活物品。挚友金观涛和刘青峰夫妇当时在香港中文大学作访问研究，学运期间支持学生，“六四”后被陈希同公开点名批判，已有国不能回、有家不能归。我即将步

其后尘，兔死狐悲、感慨良多。

7月20日上午到龙升公司，以中国信用卡和支票在香港不能用为理由，把它们交财务保管，并与同事告别。

下午妻子上班、儿子上学校，我约妹妹到家里。我告诉她，拟赴法国参加民主运动的决定，请她保管我珍存的文件资料和日记。我还托她代我尽孝、照顾年迈的爹妈。她劝阻无效后，我们抱头痛哭、情似诀别。

晚上回父母家，与古稀之年的父母做“出差”前的告别。看到父亲的谢顶和母亲的白发，不知什么时候还能再见，或者不能送终而遗憾终身。我强忍悲痛心中默念，孩儿不孝忠孝不能两全了。走出家门，在深夜的阜外大街上，我推着自行车，痛哭流涕不能自已。

7月21日晨，公司的小车来家里接我。我平时上下班和在市内办事，只骑自行车，从不坐小车。妻子和独子第一次坐我的小车，到机场送行。她们说，香港湿热，注意身体，半个月后，再来机场接我。这些天，与亲友的类似诀别，已上演数次；我还是强作微笑，心说“太对不起你们啦！”出关后泪流满面。

中国民航飞机上午9时起飞，中午12时抵达香港启德机场。

第三节 法国驻香港总领事批准我去巴黎

7-7 合资公司董事会活动的一周

1989年7月21日，中午到达香港，东正的香港籍总经理接机，送酒店，晚上宴请。

22日，到中文大学一整天，探访金观涛和刘青峰，格外亲切，他们家宴招待，陪同参观大学。我们只叙旧，我未谈“反动企图”。

23日，港方招待香港一日游。

24日，上午电话香港新华社的清华哥们、副社长乔宗淮和处长王国力

（后任教育科技部副部长），他们请我去新华社贵宾室聊天，我推脱太忙，说已在贵社门口的茶餐厅恭候。他们立即出来，见面坐定后——

我：拟去法国参加民运，咱们聊聊天就当没见过，一拍两散就此告别了。

乔：二十多年的哥们了，几年未见必尽地主之谊，一定宴请。

我：不方便吧？

乔：你来开会，我私款请客，谁知道你散会后去哪？

王：乔老爷仗义之人，你就恭敬不如从命吧！

我们接着畅聊了近几年和近几个月的大事小情，王国力午餐买单。下午乔社长去忙公务，王处长带我去他的新华社公寓式宿舍，又聊了半天。晚上乔在特高级的淮扬菜酒店宴请，王作陪。乔说："你不回国了，这是接风兼饯行，还替我省一顿呢！咱们都是'淮'，苏北人吃老家菜，到法国就难吃到了。"酒足饭饱，互道珍重，依依惜别。

25、26日，东正公司董事会。

27、28日，东正各董事在港方陪同下，拜会参观有关的银行、律师楼、会计所和关系企业。至此，董事会活动全部结束，接下一周自由活动，我也该琢磨如何投奔自由了。

7-8 港支联运作、总领事批准赴法

7月29日，再次去中文大学在金观涛和刘青峰家，我谈了拟去法国参加民主运动的打算。我在日记中记载了他们的忠告："海外没有职业革命家，生存是第一位的；长期远离故土、不能回国是非常孤独的；劝我仔细考虑利弊得失，慎重决策。"他们还帮我分析：中国80年代是邓小平和陈云的"双峰政治"，你身在康华、是邓的嫡系，与陈家关系非比寻常，新的第三代核心又是忘年之交。你留在体制内更有利。我说：主意已定、义无反顾！于是，他们通过政论家林保华（笔名凌锋）请来中文大学教授、"全港市民支持爱

国民主运动联合会”（在香港简称支联会、香港之外简称港支联）骨干郭少棠博士。郭了解情况后，立即联系法国驻香港总领事馆。



1989年8月3日晚，离开香港赴法国前夕。相片背面题词，表达了当时我的心情：让我微笑，让我招手，——再见了，我的祖国，我的亲人；我一定要回来，一定！但愿那天早日到来。

30日，郭少棠陪同我去法国总领事馆。出乎意料，孟飞龙副总领事带领方文森领事亲自出面接待，二位法国白人汉语极其流利。

孟飞龙开门见山：“你的情况我们已经充分了解，请你只讲一下你去法国的意图和打算。”

我说明：“在国内得知，法国接纳众多中国民运人士；到香港后，又看到、在内地听说的朋友严家祺和万润南等五人的《成立民主中国阵线倡议书》；想去一起干！”

方文森：“郭少棠和金观涛介绍的朋友，去法国没有问题。你留下护照，明天见。”

“六四”后，诸多异议人士被迫踏上了流亡的不归路，首先张开臂膀欢迎他们的，是伟大的法兰西。而具体把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兰西精神化为实际行动的，则是当时法国外交部著名的“三剑客”：驻中国大使马腾、香

港副总领事孟飞龙和外交部办公厅的燕保罗。马腾无缘结识，孟飞龙则受惠于香港、深交于巴黎，本文下部将介绍燕保罗对所有“流法”人士的大恩大惠。

同时，我也佩服法国外交系统的高效率。事后得知：法国总领事馆接到郭少棠介绍我的电话后，立即在数据库中查到我发表过的文章，对我“验明正身”；并向在海外的陈一咨等人了解我的政治态度。随后当机立断，决定接纳我；并与法国社科院联系我的工作安排。

31日，中午在金钟太古广场的法国餐馆，孟飞龙和方文森请我午餐，送还我已经有了“法国签证”的中国“因公护照”。他们说，法国决定接受全部在港的中国民运人士，给以人道的政治庇护。但是法国法律规定，法航每架班机运送庇护人员最多三位；现在法航每机安排一般人士两人，已排到一个月后；特殊人士每机一人，也排满了一周。他们说想办法争取尽早安排我赴法，让我随时待命启程。

8月1日，郭少棠陪我购置一些简单的生活用品，还送我一台录音机和一千法郎。我不要，他说，在海外录音机是必备工作用品，法郎是支联会送的。事后金观涛说，支联会根本没有这笔开支，是郭个人赠送。九十年代“保卫钓鱼台运动”再度兴起时，我查资料发现郭是香港著名的“保钓人士”，我以新加坡《海峡时报》专栏作家身份采访他，再续旧情。网上查到：郭少棠师从新儒家牟宗三，是著名历史学家，曾任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院长。

2日，中午法国总领馆又请吃饭，通知我：“明天晚上乘法航，离香港赴巴黎。法国已决定给你长期居留，法国社科院可发一年的研究经费，期满还可延长。”下午去金观涛家告别，刘青峰家宴为我饯行。晚回到酒店，电话打给妻子，抱歉地通报最新情况，我们在电话的两边都哭了。

3日，我邮寄出“致康华总公司的辞职信”。晚上，郭少棠为我最后饯

行，20时40分送我到香港启德机场大厅，把我移交给一位法国军人。他递我的名片上写着："法国驻港武官 空军少校杜于溪（DURIEUX）"。在杜的陪同下，我们走贵宾通道，他一直把送我上飞机的商务舱。21时30分起飞，离开中国香港，奔赴法国巴黎。

下部 从民运骨干到政治学人

——二十八载在海外（1989～2017年）

第八章 民阵法国分部主席

——在巴黎的民运活动（1989～1990年）

第一节 开记者会，发表文章，谴责镇暴

8-1 法国艾丽丝协会的接待

1989年8月4日凌晨，我从香港抵达法国巴黎戴高乐机场，顺利通关入境。港支联在法国的代表郭女士如约接机。她送我到巴黎市中心第二区她朋友闲置的一间三居室公寓，这就是我近期的住所。

郭女士1950年代出生在香港，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后赴巴黎攻读美术，被法国律师追求成婚，成为法籍华裔美术家。她在纽约求学时，每天课余与香港同学徐克到唐人街义务帮助贫穷华人。1989年春，名导演徐克成为港支联的骨干；郭便是港支联在法国的全权代表，不定期地向住在难民中心的中国流亡人士发放港支联募捐来的钱款。“六四”天安门惨案之后，由法国总统密特朗夫人提议、几位汉学家发起组织了“中国流亡知识分子联系协会”（简称“艾丽丝”ALICE），郭是其中唯一的华人，对我和其他中国异议人士帮助极大。此后近30年，我与她的家庭一直是挚友。



1989年8月甫抵法国，在巴黎科学城，法国人复制的天安门民主女神前。

随后一周，我在巴黎逐渐平复“惨案”情绪、休整疲惫的身心，走出屠杀和整肃的阴影。除游览参观向往已久的世界著名的名胜古迹外，还特意去了我心中的新旧两圣地：巴黎北郊的科学城，法国人为纪念在天安门广场被镇暴部队销毁的民主女神像，在这里重新树立；巴黎市中心的先贤祠，为反对暴政流亡19年、法兰西曾举行隆重国葬的伟大的人道主义者雨果的安葬地。

8月中旬，因为民主中国阵线（简称民阵）筹备组的骨干、我在国内时的改革派朋友陈一咨、严家祺和万润南到美洲宣传造势未归，我只能接触法国朋友。他们是——

燕保罗，法国外交部办公厅官员。法国政府著名的“援华三剑客”中，驻华大使马腾负责向中国政府施压及发放赴法签证，我直接飞抵香港因此无缘结识；驻香港副总领事孟飞龙在香港居中接应，上章介绍了孟飞龙在香港对我的特殊照顾，他回巴黎叙职，我都宴请感谢；燕保罗则在巴黎具体安置中国流亡人士，代表法国政府解决我们的政治、法律、居留、工作、学习和生活等各方面的事宜。8月14日晚保罗为我接风，他一见面就说：“我和你一样都属鸡，小你一轮。在北京是你们清华的邻居、1980至82年在北京大学学习中文，毕业也晚你一轮。1983至88年我是北京使馆的新闻秘书，咱俩儿又一样，都是政府的官儿。”——简单几句话立刻缩短法国政府高官与中国流亡者之间的距离，我们聊了整整一个晚上。分手前保罗说：“法国社科院决定聘请你为研究员，巴黎市政府将分配住房。你没有后顾之忧了，希望你多关心流亡的学生和市民，作法国政府及艾丽丝与他们之间的联系纽带。”当晚作陪的是他漂亮的瑞士女友、艾丽丝协会的玛丽亚娜、中文名吕敏，法国高等学院研究董仲舒的研究生。晚餐不算丰富没有红酒，保罗说法国政府宴请客人的标准不高。吕敏付了三分之一的饭钱，更让我吃惊。在法国期间，我们一直保持着密切的朋友关系。90年代我三次重返法国，我们都聚会。

2012年保罗任法国总统外交顾问，2014年不幸病逝。法国顿失外交英才，我们丧失一位恩友！

8月19日晚，艾丽丝的两位核心人物请我晚餐。他们自我介绍：白夏，政治学博士、文革时在黑龙江大学留学；潘鸣啸，文革时到香港学习中文、回法后学成历史学博士。他们都是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中国研究中心的研究员、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晚餐相当豪华，他们为我点了：前菜的牡蛎和鹅肝、主菜的奶油蜗牛。这都是我在法国小说中早闻其名、但从未尝过的名菜，著名的法国红酒当然不能少。他们则分别要了自己喜欢的保留节目。付账的A-A制方式又让我大开眼界：他们分别付自己点菜的钱，红酒、小费和我的菜钱则二一添作五；两个文科博士着实算了好一会儿。在法国期间，我们经常一起研讨中国政局、外出旅游和聚餐。熟悉后，我们称蓄大胡子的白夏为马克思，叫留小胡子的潘鸣啸为恩格斯。新世纪，他们都曾在北京从事学术研究。

其间我还结识了艾丽丝两位青年才俊：酷似电影明星阿兰•德龙的帅哥皮埃尔和自称“段大侠”的文弱书生段三山。他们流利的汉语和豪放的性格，使我们很快成为朋友和玩伴。上世纪末大侠任驻华使馆外交官，我能回国后经常与他见面。

8月27日，香港港支联发起人之一的李伟杰，营救民运人士的“黄雀行动”参与人来到法国。郭女士和我陪同李到巴黎郊区“1945年5月8日街”（攻克柏林的纪念日）的难民中心，看望六四后来自中国各地的几十位流亡学生、知识分子和工人，分发港支联的慰问金并听取意见。他们最多的要求是，希望港支联尽快营救他们在中国各地的六四战友。此后李伟杰又匆忙来法国几次，把几十万法郎交给我；由我一人去难民中心发给每人几千法郎，然后以他们签字的名册，传真到香港报账。从此我成了巴黎流亡人士的朋友和代言人。1990年后，港支联常委刘千石接手法国联络工作，刘与我成为好

朋友，1992-1997年我在新加坡工作期间，我们在香港和新加坡经常互相接待。

9月3日下午，法国外交部官员保罗和艾丽丝的白夏、潘鸣啸、吕敏，开车接上我，再次赴难民中心看望中国难民。保罗代表法国政府和艾丽丝协会，把流亡人士已经熟悉的我，作为他们的联络员，正式介绍给大家（此后调皮的流亡学生就戏称我为“联络官”）。晚上我们在保罗家附近的餐馆聚餐，互相介绍两国的风土人情和官场趣闻，穿插调侃中法领袖的笑话，直到半夜。我坚持AA制付账后，各自乘末班地铁回家。

8-2 筹备民阵及我的记者会

1989年8月下旬，民阵筹备组人士从北美回到法国。

8月25日，在法国设计大师圣罗兰（YSL）为中国民运人士捐献的、巴黎市中心第六区的二层小楼“民主之家”，我与严家祺和万润南见面。劫后重逢悲喜交加，他们介绍了成立民阵的设想和在北美工作的成果，并邀请我参加筹备工作。他们还说：7月20日发表的《成立民阵倡议书》，虽然公开是以严家祺、吾尔开希、万润南、苏绍智、刘宾雁等五人的名义，但是实际暗中操作的是秘密的筹备组，组长是足智多谋的陈一咨。这次在美国和加拿大，公开演讲的是严和万；陈一咨则秘密召集了在北美的“三所一会”旧部，将来作为民阵的骨干。

次日，我如约到巴黎城西北的17区一座独立的二层小楼、现民阵筹备组、将来的民阵总部，会见筹备组组长陈一咨。老陈一见我，就是热情的长时间拥抱，他说：“终于见到你啦！我在美国接到法国驻香港总领事的长途电话，说中组部出来人了。我说，那肯定是阎淮！你们尽快安排他去法国。我当时就考虑了，根据你的特长：人缘好，负责接待流亡人士；懂组织，参加《民阵章程》起草组。”我顺便问他：“你为什么保密不公开露面？”陈

答：“许多在欧美学习的旧部不想参加民阵而与中共决裂，我只能秘密与他们见面。另外，我抓紧时间录制了十几盘有关中共领导人私密的录音带，将来我公开露面时，警告中共若暗杀或绑架我，朋友会公开这些录音带。”我认为不至于，我们一直聊到共进晚餐。

8月29日，民阵文件起草组十余人进驻巴黎雨果街的国际旅馆，开始一周的起草工作。《民阵章程》起草小组由曹务奇和我负责。曹务奇，社科院马列所硕士、四通公司副总裁；思路清晰文笔流畅、堪称“务”实的“奇”才，名实相符。我们密切配合，顺利完成任务；并排除激进派的干扰，坚持在《章程》的“总则”中写上“民阵的行动原则是：和平、理性、非暴力。”《民阵宣言》起草小组由吴国光和阮铭负责。吴国光，人称“人民日报第一支笔”、中共十三大报告主要执笔者；阮铭，曾任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据称是胡耀邦的智囊。讨论中，因意见相左，情绪化的阮铭与人争论、争吵，气愤地要退出起草组，打道回美。经老好人严家祺等人安抚劝阻后留下，但是最终阮铭未参加民阵。这是起草工作的一个小插曲。

9月4日，陈一咨在巴黎会见记者，首次在海外公开露面。民阵内部主要的两股势力：陈一咨的体改所和万润南的四通公司，都浮出水面。为此后的万陈之争埋下伏笔。

完成民阵文件起草后，我们投入9月12日“六四百日祭”的准备工作。为了配合百日祭，我决定公布我“六四”凌晨在天安门广场及其附近的亲身经历和现场目击。9月10日我在中文《欧洲日报》编辑部内，口述了第七章提到的《天安门广场实录》。该报总编吴玉伦接待我，并记录整理成文字。9月12日“百日祭”当天，该报在第一、二版发表了这篇数千字的文章。当晚，在巴黎人权广场举行悼念“六四”死难同胞的百日祭活动，邓丽君参加并献歌。此后每年“六四”纪念活动，只要小邓在法国都会来声讨老邓。

9月18日我在巴黎共和广场的假日大酒店举行记者会，以下是《欧洲日

报》9月20日第一版的报道摘要：

“阎淮由理性的批判、感性的震撼、人性的召唤、韧性的圣战，四方面说明为什么抛弃国内‘有形的地位和无形的背景’，割舍骨肉亲情，到国外来做一个流亡者。他在回答问题时说，目前为民主中国阵线的成立做筹备工作，负责起草文件及联系大陆来法人士。阎淮表示，他不赞成以暴力推翻共产党，否则冤冤相报何时了。他把中国的民主化，划分成四个时期（反动期、反复期、松动期和变动期）。在回答大陆何时成立反对党时，他说，时间会很长，成果也许不是现在的民阵成员享受得到，但我们若放弃努力，中国将再度失去一次走向民主的百年难逢的机会。到现场采访的有《欧洲日报》、法国《解放报》、《新观察家》周刊、美国《华盛顿邮报》、台湾的中华电视台、中央通讯社及《青年日报》等中外新闻媒体的记者。”

当晚，欧洲日报社长、法国人杜怡之，以“庆祝记者会的成功和感谢对欧洲日报的垂青”为理由，在该饭店宴请我。前一天，我曾以“你已宴请我两次，记者会后欲休息”为由，婉拒此宴未果。我进了餐厅包厢发现，还有一位白人，杜怡之介绍是法国总统的外交顾问。至此，我才明白此宴会的真正目的。尽管与顾问初次见面，但相谈甚欢；从中国局势到中法关系、从民运现状到世界趋势，有交流有争论；从7点边吃边聊到11点多。此后，中国一有风吹草动，总统顾问就请我吃饭，请我“顾问”。



1990年3月，法国，作者与远志明（右）在自由女神船会场外。

8-3 发表《我为什么离开中国》

9月19日和20日，《欧洲日报》分两天发表了我的题为《我的旗帜上写的是理性和良知——我为什么离开中国》的万字长文。以下是其摘要——

我赴法后，康华领导对太太讲：组织还信任我，仍考虑由我担任合并后大公司的领导；目前只是逾期未归，希望我尽快回去。我是既无远虑、又无近忧，共产党待我不薄、对得起我。我为什么放弃政治特权和高官厚禄、舒适工作和优渥生活？抛弃骨肉情深的亲人、离别生我养我的故土和人民？为什么毅然决然、义无反顾地做了漂泊不定的流亡者呢？这一切确使得中共同志、大陆亲人、国内朋友、海外人士疑惑不解。

一、理性的批判

1、中共的历次运动，都是泯灭人性、导致社会毒化。我分析批判了土改、镇反、三改一化、反右、大跃进、反右倾、四清、文革、清污、反自由化。运动就是小人整君子、平庸斗精英。近十年是经济改革乱动、政治改革不动。

2、斯大林现象（领袖独裁、残酷镇压、剥夺人权）是现代最大的悲剧。德意日法西斯和共产党极权专制是二十世纪两大悲剧，而后者地域更广、死伤更众、时间更久、为害至今。共产专制的封建性，朝鲜的金日成、金圣爱和金正日家族，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埃列娜•齐奥塞斯娃和其儿子家族，是明证。其残酷性，柏林墙和红色高棉，是反人性的标志。

3、一党专制产生严重的政治腐败和经济腐败。中国提倡“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我说，不够！应该有第三个“法制文明”即法律与制度的文明，它更重要。中国人在等级森严的官本位的金字塔中生存，“权和利”的需求

产生“向上爬”的动机，导致“向上看”的行为；政治腐败不可避免。经济改革的不彻底，特权阶层三代人腐败发财。离休老干部利用余权余威、获取剩余价值；中年在职官员以权谋私；公子衙内是老子片子加儿子骗子满天飞，利用不等价交换，大发横财。

二、感性的震撼

简要叙述6月4日凌晨，我在天安门广场附近的亲身经历和亲眼所见。身为广场的幸存者，负有为身边倒下去的数百人站出来说话，并完成其未竟事业的不可推卸之使命。

三、人性的召唤

1、我的社会观：我理想的社会应是经济自由、政治民主、法制健全、人权保障的社会。自由、民主、法制，最终都是为了保障人权，维护人的基本权利。马克思认为社会有五种形态：原始、奴隶、封建、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我认为，从本质讲，只有专制和民主两种社会；我们要建设民主人性的社会，反对专制兽性的社会。

2、我的人生观：我是人道主义者、人性论者、人权至上者，我的旗帜上写着：“一切为了人”。毛泽东说，民主是手段，集中是目的。现在中共修正：民主是达到现代化的手段：我说：民主不只是手段，也应该是目的。但在“人”的面前，在有血有肉，有思想有灵魂的人的面前，民主也应该争取人一切权利的手段。我所争取的民主社会，最终目的还是为了人，为了人的解放，人的幸福，人的全面的自由发展。

3、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和归宿，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是人道主义者。学潮中，众多的党政干部冲破禁令，上街游行支援学生；说明中共4800万党员绝大多数是有人性和良知的。人性有善良的一面，关键在制度。因此，我不主张打倒共产党，不赞成用暴力推翻一个政权。冤仇相报几时了，让我们开始一个理性的新纪元吧！

我走了，抛弃了一切，除了理性和人性！没有任何外界的压力和诱惑，我只听从心中神的召唤一一人性之神！

四、韧性的圣战

韧性是指民主运动之长期性与艰巨性，圣战是指民主运动之神圣性与世界性。

我对历史与未来的判断

1、文革前是“17年不动”。尽管许多人对50年代留着美好的记忆，但对社会发展和历史前进而言，17年没有明显的进步。

2、文革是“十年动乱”。这在全国、全世界已有共识。

3、改革是“十年乱动”一一胡平在引述时，误为“动乱”，许多媒体因此而错引。

4、十年反动。今后五年为“反动期”，保守派趁“六四大捷”继续镇压民主派，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全面倒退。随后五年为“反复期”，元老派陆续退出了政治舞台和人生舞台。第三代领导人将在政治态度、既得利益、权力再分配诸方面发生分歧和矛盾。

5、十年变动。21世纪的前五年为“松动期”，第四代领袖登台，政治将出现松动。其后的五年是“变动期”，民主运动的关键时期。

21世纪是人类的新纪元，也是中国民主运动的新纪元。那时，即使我们中的一些人可能享受不到胜利的喜悦，但我们将前仆后继地奋斗下去，进行韧性的斗争。我个人只能是奥林匹克精神：“不求胜利、重在参与”。我们的民主运动是一种没有硝烟的圣战(和平、理性、非暴力)，是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为全世界十二亿华人的幸福而奋斗。

这就是我为什么离开中国！

《我为什么离开中国》发表后，在国际上引起小小的反响。美国：《世

界日报》分五天连载。“失联（失去联络）断交（中断交往）”几十年的小学女同学季逑，通过报社挖出我，电话中要对我“扶贫”；她的物质援助被我婉拒，精神援助支持我继续前行。刚读完博士的中学哥们汪宁，通过民阵联系到我；他说平时只看免费的《人民日报》海外版，这次花好几美元连买五天台湾报纸；精神上声援我，金钱上要我“报销”报费。台湾：《中央日报》转载，胡志强和明居正二位台湾教授看后印象深刻，来巴黎参加民阵成立大会时，特意分别约我深谈，成为好友。英国《呐喊》杂志和各国的报刊也摘录了，几天后参加民阵大会的各国代表，许多人都当面称赞我。严家祺专门找到我，当着众人的面极其诚恳地说：“六四出来人写的文章，我大都看过，你的最好！”搞得我特不好意思。当然也有激进派认为我说民运成功至少20年太悲观。



1990年6月，巴黎，作者带赵紫阳的孙女、赵二军的女儿（左二）游览圣心教堂，与非裔儿童嬉戏。

中国国内发至地师级的《参考资料》刊登了我的消息。在我每周打往北京的电话中，父亲告诉我，江叔叔又来电话——

总书记：“老阎啊，小阎不够意思呀！在法国报纸上胡说八道。”

父亲：“第一，儿大不由人。你们接触很多，你了解，他是很有主意的

人。第二，你放心，他知深浅，绝不会作对不起你的事。”

总书记：“转告他：共产党和我，对得起他！”

我请父亲请转告江：共产党真对得起我，但太对不起“六四”冤死的几百人了。从我发表的几篇长文，可以看到：我只批判制度，不涉及任何熟人，更不会对不起“对得起我的人”。今后还将一如既往，请他放心我这个小人物，干好利国利民的大事业！

太太告诉我，朋友们反映不一。我说，预料之中。

第二节 主动干难民工作，被动当分部主席

8-4 民主中国阵线成立

9月中旬，民阵筹备组宣布：民阵成立大会将于22日在巴黎举行。经过多时的准备，全球五大洲几十个国家选举产生出150名“民阵一大”代表。考虑到大会在法国举行，法国的留学生和华人代表名额最多，为20名。两个月前到法国的流亡人士还不多，只给10名。随着港支联营救异议人士的“黄雀行动”的全面展开，和一些个人成功偷渡到港澳，这时流亡到法国的大陆人士已近百人。他们大部分强烈要求参加民阵大会，我是他们与民阵筹备组的联系人，频繁穿梭于巴黎市内的民阵总部与郊区的难民中心，两面不讨好地费力斡旋，当然内心是倾向于草根流亡人士（用中性词简称：“难民”）。

9月19日，我带着十余名难民谈判代表到民阵总部，与民阵一大筹备总负责人万润南和负责组织联络的曹务奇会谈。万、曹说，因经费紧张，会议代表的旅馆床位没订太多。难民们说，九死一生到法国，就是要参加民主运动。经过四个多小时的讨价还价，最后商定：难民代表增加到30名，他们回去选举，我提议：优先考虑女士和年长体弱者，其他人都可参加大会，自行解决食宿交通。开会那几天，我忙于会务住在旅馆，我的三室公寓住进十余流亡者。

21日我们会务组进驻Novetel酒店，与会代表和媒体记者也陆续报到。在晚上的招待会上，香港名记者陆铿找到我，他介绍同来的优雅中年女士是崔蓉芝。陆铿说：“我看到您的文章，非常佩服。开完成立大会，我们一起吃个饭，很想向您请教中组部的内幕。”我回答：“主要情况，我在记者会和文章中都谈了，再没什么有意思的了。”陆说：“您这西服里外五个兜，全是秘密。”我看台湾作家江南的遗孀崔蓉芝被别人拉走，就开玩笑说：“既然是秘密，就不能讲，否则我太太就和崔女士一样啦！间谍叛逃只能说机构和做法，不能出卖同事。”陆：“不愧是组织部的，口风真紧！”（海外数十载，我只批判制度，不牵涉熟人，此书才首次开戒。）直至陆铿逝世，我们又在各种场合相见多次，始终保持着朋友关系。

9月22日上午十时，民主中国阵线成立大会在巴黎大学“圆形民主自由讲坛”礼堂举行。陈一咨担任执行主席，吾尔开希致欢迎辞，万润南作筹备工作报告。来自世界各地的167名代表（3人因签证受阻未到）出席会议。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欧洲议会，法国社会党等五个政党（当年的国会议员、日后的总统萨科齐端坐在前排，安琪有摄影。），西德社民党等三个政党，英国和荷兰的工党、西班牙社会党，中国国民党和民进党，波兰团结工会和达赖的代表，香港支联会的代表刘千石等，一共近200名观察员出席开幕式。150家媒体到会采访。

22日下午，会议移至Novetel旅馆继续举行。与会代表经过认真和激烈地讨论和修改，通过了我们筹备组草拟的民阵《宣言》和《章程》。原则认同这两个文件的153人登记入会，23日深夜，民阵正式成立。

24日上午，大会分为中国大陆、亚太、美洲和欧洲四个组，选举民阵理事会的15名成员。我所在的大陆组分得5个名额，选出严家祺、万润南、吾尔开希、苏晓康和陈一咨。随后由各组提出5名监事会候选人，再由全体大会选出11名正式监事。大陆组的名人只看重决策的理事、轻视监督的监事，所以

都不报名监事；只有大陆流亡人士事前推举的我和几名流亡学生参选监事。我急了，说：“我们将来要搞三权分立的民主，现在不能只重视立法的理事，忽视司法的监事。假如大陆组只有我和几位名不见经传的学生参选监事，到全体大会上20选11，可能只有我一人有戏，大陆组在监事会就没什么发言权和监督权了！”在我的动员下，《河殇》撰稿人远志明、天安门宣传部长老木、工自联领袖岳武报名。

下午的全体大会上，严家祺和吾尔开希当选为民阵理事会（即民阵的）主席和副主席。严家祺提名万润南为民阵秘书长。11名监事会监事，大陆组只有远、岳和木等三人当选。我因为对民运“太悲观”而落选。流亡人士为我不平，埋怨我不该动员名人参选，丢了稳拿到手的有名有利的监事；而大陆组的严、万、陈、苏和开希等五位重量级理事，则赞赏我是顾全大局、高风亮节。24日晚，大会圆满结束。

在民阵成立大会团结和谐的表象下，一股不和谐的暗流也随即涌现，即所谓四通派与体改所派的万陈人事之争。如果说，此前的7月和8月，民阵诞生的纲领性务虚工作，主要由陈一咨为代表的“体改所派”完成；那么，9月的民阵成立大会的事务性务实工作，则完全由万润南的四通公司的三位副总裁及其部下承担。正式选举前一天的23日晚，民阵上述领导构架的雏形已经展现，筹备组长陈一咨将只是15名理事中的普通一员。在大会旅馆陈一咨的房间，原“三所一会”的成员们聚会，感到危机严重，体改所将全军覆没，应该最后一搏。因为我在康华公司时与四通有业务来往，与清华校友万润南关系不错；更由于我与严家祺在国内一起搞政治改革、观点相同，最近又因联系大陆难民和发表佳文得到严对我人品的高度认同；“三所一会们”，请我代表他们，与严会谈。

其实我很矛盾；论组织，政治组织民阵就应该像我在国内参与工作的、陈一咨具体领导的政治改革办公室和经济体改所那样广罗人才的政治机构，

而不能像四通公司这样只重用副总裁类的能人的商业企业。论领导，企业家万润南确实身段柔软、平易近人，而政治家陈一咨则高深莫测、架子较大，群众性组织还真需要老万这样的大管家。

“受朋之托、忠友之事。”我把严家祺从人头攒动的小会议室，请到我空无一人房间，我首先申明无个人倾向性意见，不是说客、只是信使。然后转达陈一咨方面的建议：“由陈担任严的副主席。”严家祺：“六四是学生运动，民阵只能由学生领袖任副主席。”我随即转达第二建议：“陈担任秘书长。”严：“万润南务实能力强、有亲和力，更适合！”我铩羽而归，在陈的房间，十几个人争论不休。激动的朱嘉明说，万润南的商人习气一定会毁了民阵，不如分道扬镳。直到凌晨三点，最后的意见是：尽量在秘书处中多安插“自己人”。



1989年11月，民阵法国分部成立，本书作者被推选为分部主席后发表感言。

9月26日晚，在民阵总部召开秘书处首次会议。“三所一会”的程晓农（原体改所室主任）任政策秘书、兰东（原国际所研究员）任信息秘书，陈小平（女、原政改办研究员。“陈小平”这个名字比较常见，本书中提到的陈小平，如无特别注明，都是这位女士）任联络秘书，分别成为全新的全职秘书。我（原北京青年学会理事）是兼职不兼薪的联系大陆难民的公共事务秘书。民阵1990年9月印刷发行的《民阵一年》一书第46页：秘书处聘用12名

秘书，某某、某某……，阎淮：大陆联络秘书，义务。）朱嘉明列席会议，会后我们两人在附近的咖啡馆回顾过去、审视现实、展望未来；聊到清晨，我送他去机场返回美国。我对朱嘉明观点印象最深刻的有两点：一、万润南的民阵没希望，朱劝我不要陷得太深；二、明年民阵二大，理想主义的朱一定要取代市侩奸商万。（1990年朱与万竞争民阵主席败北，只任无实权的理事会主席；1993年民阵与民联合并大会，陈一咨、朱嘉明与万润南两股势力公开决裂，两个组织非但未合并，还蹦出第三个组织“民联阵”。）

台湾方面有立法委员李胜峰等五人出席民阵大会，我除和民阵骨干一同与他们座谈外，其中胡志强、明居正两位欧美政治学博士、台湾的大学教授，对我最近发表的《为什么离开中国》印象深刻、极为赞赏，分别约我单独讨论时局，成为朋友。此后，我参加与台湾有关的活动，大多和他们的举荐和邀请有关。（后文详述）

8-5 当选民阵法国分部主席

1989年10月，艾丽丝为我们十余位流亡知识分子解决了工作（社科院每月八千法郎薪水的研究员）、学习（注册为巴黎大学的法语学生）和住房（夫妻或伴侣入住两室单元房、我们单身者一室单元房，是巴黎市政府的平价公租房）。

10月中旬我应邀到法国东部的蒙贝利亚市访问，当地报纸作了长篇报道，登载了我演讲会和记者会的两幅大照片。11月初严家祺和我应邀到南部的法国第二大城市马赛访问，我们分别与当地法国人的“AIX团结协会”、中国留学生及华侨座谈。

我主要精力还是放在为法国艾丽丝和香港港支联，联系大陆流亡人士。每周去郊区的难民中心，迎接安顿新来者、送流亡学生到外省的语言学校学习法语、为有法语基础者安排工作等等，还要调解其内部矛盾。难民中心曾发生中国人之间的肢体冲突，因使用催泪喷雾器和微型电击棍，而招致警察

干预，我也因此被召去。

作为民阵的公共事务秘书，我参加每周的秘书处例会。同时协助民阵法国分部筹备组的工作，因为大陆难民参加民阵的，将来都要归属法国分部。



1989年11月，应法国友人邀请访问马赛，在一家中餐馆晚宴。右三严家祺、右四作者。

11月25日民阵法国分部在巴黎召开成立大会，一百多人与会，严家祺、万润南和陈一咨到会祝贺。通过分部章程后选举分部领导，报名执委的有十几个人，而参选主席的只有民阵总部新闻秘书许某。万润南介绍了许在总部工作两个月的优秀表现，秘书处和四通的人也说，许若当选有利于总部与分部的协调。法国分部成员是大陆难民和留学生及少数华侨。难民对民阵总部注重名人、而忽视草根意见较大，由总部秘书控制法国分部，他们不甘心，都让有好感的我出马。我以社科院的工作和巴黎大学的学习，两项任务繁重推辞。留学生对原是留学生的许某评价较低，对我有些了解和认同，也一致推举我。陈一咨等“体改所们”，也力劝我出山。我本打算：难民工作已大致结束，法国分部成立后，难民扫尾工作由分部和总部接手；加之对民运的内斗反感，我要专心社科院的研究和学习法语。然而现在众望所系，只得仓促上阵。结果正如《欧洲日报》11月28日的报道：“阎淮以高票击败他的对手——民阵总部新闻秘书许某某（略其名），当选为民阵法国分部主席。大

会情况堪称热烈，在目前中国民运处于低潮时期，大陆人士能表现这么踊跃，殊不容易。”我随即辞去兼任的总部公共事务秘书职务，表示以后只对分部成员负责，只以法国分部主席身份参加总部和秘书处的会议。此举比当选主席获得更热烈的掌声。我还宣布我在巴黎13区的住宅即是分部办公室，公布了我家的地址和电话。（《民阵一年》第七部分，各分部联络地址中，法国分部即是我家地址，电话号码后面注明是“家庭电话”。此后半年，我的下述民运活动，《民阵一年》多有记载。）



1990年初，在巴黎庆祝世界自由日大会上讲演。

12月初在巴黎蓬皮杜中心召开“六四”半周年中国形势研讨会。9日的《欧洲日报》报道：“依次演讲的是：诗人徐刚、作家祖慰、法国汉学家白夏和潘鸣啸、新上任的民阵法国分部主席阎淮、民阵理事陈一咨和苏晓康。”当时苏联和东欧出现一系列民主化方面的急剧变革，众人皆认为中国形势将随之有巨大的变化。我的发言，则分析中国与苏欧在政治、经济、领袖、政党；历史、地理、文化、军事；民族、宗教、民众、教育，共12方面的巨大差异；我的结论：“中国不会随着苏欧的变迁，而在民主化上有丝毫松动。中国不是‘苏东波’的下一波！”我的发言在会上引起较大反响和反对，《欧洲日报》对我们七人的发言，共报道约千字；而对名气最低的我，一人竟用了近一半。只因为我的观点不合群，当时堪称奇谈怪论！此后，福建同乡会邀请我在庆祝世界自由日大会作专题报告《中国民主化问题》

（《巴黎龙报》1990.2.2全文刊登）。法国92区政府1990年3月邀请我在市政大厅作《中国民主道路曲折前途光明》的演讲。

法国分部成立后，在我家每周召开一次分部执委会会议，每月召开一次分部执委会和监事会的联席会议，研究布置分部工作。我对到中国大使馆抗议和街头游行示威不感兴趣，提出12月主要是让难民们过好流亡的第一个节日。圣诞平安夜，我们在“民主之家”组织了分部联欢会；新年除夕，从下午到凌晨我联系巴黎“红宝石餐厅”的华侨老板，半价招待几十位流亡人士的迎新年夜饭和联欢抽奖活动。



1990年6月，巴黎，陪同来访的张钢（中）到徐刚（左）家做客。

1989年冬开始，我在巴黎与流亡的知识分子一起工作和学习。他们是原政治学所所长严家祺和夫人、文革史专家高皋，《河殇》作者苏晓康和远志明，作家徐刚和祖慰，青年学者蔡崇国、于硕（女）和安琪（女）。我们大都是法国社科院的研究员，每周一次例会，交流研究心得；平时或在社科院中文书刊异常丰富的图书馆查阅数据，或在家中撰写论文。由于我们这些中年人跟不上巴黎大学法语班纯法语的教学进度，艾丽丝为我们十人专门聘请了懂中文的法语老师雅克琳娜（Jacqueline）。每天上午我们到她家学习法语，使我们很快能用法语应付日常生活的需要。1990年春末，这个家庭法语班结束，我一直怀念和感激她。

我们还每月一次参加“中法人文科学沙龙”在法国国家政治科学院国际

问题研究中心的学术交流活动。祖慰以程鹰的笔名，在香港《动向》杂志1991年3月号上，发表《一个自由家园的灵魂一一“中法人文科学沙龙”纪事》，详细介绍了有关活动。在沙龙作过“引言演讲”的中国学者，除上述我们法国社科院研究员外，还有诗人北岛、流亡学者王润生和程晓农，夏威夷东西方中心文化所所长杜维明。沙龙的主持人是该中心的研究员程映湘，其父是中共早期领导人彭述之。

1990年第一次法国分部领导会议，我提议：把办好春节联欢会，让流亡人士过好离开祖国的第一个年关，作为我们一月份的重点工作。会后，留学生执委联系酒店，排除使馆干扰三易其地；华侨执委售出200法郎的餐券百余张，我们说明：联欢会来宾吃去100法郎，另外100是赞助法国分部办公费用。我则到处化缘，找到旧知：支持民运的清华校友和国内认识的在法成功人士，新雨：在法国新结识的各社团负责人。小钉子难免碰到，大部分则慷慨解囊。还有朋友给分部和我个人各开一张支票，我婉拒；说个人暂不需要，若愿意可合开一张支票，都给民阵。其间某华人律师找到我，表示想与我合作政治庇护，为一个温州偷渡客证明是“六四人士”，我个人可得二万法郎，被我坚拒。我们发现有民阵成员假公济私捞取外快，被严厉批评退回钱款。最后我筹得几万法郎，推销近百张餐券。

1月26日除夕，我们在基督教牧爱堂组织难民联欢晚餐会；27日春节，在民主之家组织留学生联欢会。

1月29日大年初三晚6时至凌晨2时，我们在巴黎许永发大酒楼举行300余人参加的长达八小时的大型春节联谊餐会。我首先代表民阵法国分部致欢迎辞，随后严家祺和万润南代表民阵总部祝贺。严感谢我们的招待，万说明年争取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联欢会，还请阎淮主持一一我小声说下世纪能回去就不错了。仍然滞留在难民中心的50余人免费参加晚会，他们都真诚地感谢我又为他们办了件好事，说没有白选我当分部主席。会后结算共得善款近十

万法郎，我年底卸任分部主席时全数移交下任。

尽管已经卸任民阵总部的大陆难民联络秘书，我仍然是艾丽丝和港支联的代表。民阵法国分部的一百多名成员中大部分是大陆流亡人士，我依然把主要精力放在照顾难民上，还经常去难民中心看望并听取意见。90年1月，港支联的重要领导刘千石和朱耀明牧师来到法国，当晚我宴请他们，次日陪同他们去难民中心，分发香港市民为流亡人士捐助的春节慰问金。“六四”过去七八个月了，前期来法人员，大部分已经安排去处、离开难民中心，但是还有新流亡人士陆续入住。随着时间的推移、来法人员的增多，由于主观和客观的因素，法国方面对难民的安排日益困难；滞留在难民营的三四十人，情绪烦躁意见增多。春节过后我紧急联系法国官员，2月19日终于找到刚回到巴黎的、艾丽丝中唯一的官方代表、外交部官员燕保罗，希望难民局官员与中国难民见面。22日下午，法国难民局局长和秘书长如约到难民营看望并听取中国难民的意见，我约上严家祺和万润南同行。《民阵一年》131页有记载。随后，中国难民在难民营的处境改善，如增加了中国人喜欢的乒乓球台和中文报刊等，对他们的安置速度也加快。

8-6 自由女神船与柏林三个会议

1990年3月9日，我与万润南等人飞抵法国拉荷榭港，参加“自由女神号船”的命名典礼。民阵购买一艘旧船，改装成广播船，起名“自由女神”，准备到中国附近的公海对国内广播。后因诸多困难，计划流产。《民阵一年》记载：“包括新华社和中新社在内的世界各地的一百多名记者出席了记者招待会，吾尔开希主持了典礼。”

在记者会上，开希指着两名中国记者公开批评指责，引起部分中外民运人士对他们的起哄和推搡。我和远志明批评开希的错误做法，推开围攻的人群，护送二记者退出会场。在休息室里，我和远表示欢迎新华社和中新社记者参加并客观报道民阵的活动，也谈了些许对海外民运问题的看法。



1990年3月9日，法国拉荷谢港，“自由女神号”拟启程到中国近海广播。



在“自由女神号”船播音室，模拟向中国广播。

3月12日，《纽约新闻报》发表《苏晓康坦承民阵内部矛盾》的文章，说：“巴黎民阵笼罩一派悲观绝望气氛。民阵内部矛盾严重，主要是万润南的四通派与陈一咨的体改所派水火不容。严家祺对组织运作的兴趣和能力都不足，导致不少批评。此外，处理经费的方式遇到很大非议，成为巨大压力。”（国内《参考消息》3月18日转载此文）我与苏晓康和远志明接触较多，看法相近。9日在与国内记者交谈中，远和我也流露出类似的情绪。对此，新华社的《国际内参》11日有所报道。

4月初，我邀请巴黎侨界二十多位知名的律师、医生、作家和会计师，在巴黎红宝石餐厅举行座谈会，拉近民阵与华人知识界的距离。随后又与商界座谈，了解到温州合法和非法移民的疾苦，并向移民局反映。

4月13日，港支联的岑建勋、刘千石和朱耀明抵达巴黎。我陪三人去难民

中心看望仍滞留流亡难民。14日至16日有关各方面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准备为刚逃离大陆、经香港抵法的柴玲夫妻召开记者会。17日我陪刘千石和岑建勋到民阵总部，最后敲定次日记者会的具体事项。晚上我陪刘和岑到即将赴美的陈一咨住宅，便餐后与陈一咨、程晓农、陈小平商议在美国筹建“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事宜。4月18日，柴玲和封从德首次在海外公开露面的记者会，在巴黎召开。

1990年4月20至27日，我赴柏林参加三个民阵组织的会议。

20日，飞抵西柏林，穿过勃兰登堡门进入东柏林。从繁华、生机勃勃的资本主义，进入萧条、死气沉沉的社会主义，鲜明的对照、巨大的反差。聊以自慰的是彷佛回到惜别九个月的祖国，东柏林的一切与北京极其相似：人车稀少的宽阔马路，灯光昏暗的标准楼房。东德主人的欢迎酒会则是这个灰色城市唯一的亮色，而主菜一一德国著名的红烧猪蹄，让我们流亡人士彷佛品尝的是故乡的佳肴。

21至23日，民阵与东德“新论坛”等三组织联合举办民主与人权国际研讨会。《民阵一年》记载：“波兰团结工会和苏联社会民主党等，全世界18个组织的200名专家参加会议，中国海外民运人士聚集一堂。采访会议的各国记者八十余人。捷克总统哈维尔等政要发来贺电。”我于21日下午在政治组作重点发言，内容与五个月前在巴黎的演讲基本相同，只是最后加了一句：“昨天晚宴人们举杯庆祝柏林墙的倒塌，今天我不幸地预测中国的长城将纹丝不动。”同组发言的学者还有：中国科技大学前校长管惟炎、经济学家郑竹园和丁学良以及老朋友吴国光、朱嘉明和华生。

24日，民阵召开理事会，作为“首国”（类似首都）分部主席的我列席会议。陈一咨对万润南把持民阵的财权、人权和事权提出严厉批评。万润南温和辩解，吾尔开希激烈反击陈；民阵内部矛盾激化并公开。

25日，民阵和海外最早的民运组织“中国民主联盟”（简称民联），参

加柏林会议的双方领导层共35人召开联席会议，讨论两组织联合问题。民阵担心“同床异梦”，民联不愿“做小老婆”，双方面和心不合。争论一天，毫无实质结果，联合无疾而终。

26日，与几位参加研讨会的国内改革派的老朋友游览东西柏林，我顺手捡了几块柏林墙的碎片。当晚飞回法国，“柏林墙片”放在巴黎家里，也就是民阵法国分部办公室中，其后便被民运朋友或顺手牵

羊、或明火执仗扫荡一空。



1990年4月，在东柏林民主与人权国际研讨会上。

8-7 最后的民运活动

1990年春季，我对海外民运已经失望：民运队伍中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层出不穷，桃色绯闻、财务丑闻不绝于耳。我曾私下说：共产党40年严重腐败了，民阵40天就开始腐败了！加之难民已基本安排妥当，都拿到永久居留，我开始萌发离开法国民运，到美国去学术发展的念头。从柏林回巴黎，我用一周时间安排交代了法国分部的工作，应邀飞赴美国。

1990年5月初，我首次去美国工作旅行，在纽约和夏威夷各半个月。

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已得到美国民主基金会的资金赞助，在纽约组成筹备

班子，负责人是陈一咨和张钢（原体改所联络室主任、六四后偷渡台湾、当时定居美国）两位老朋友，他们殷切希望我来美参加中心的研究工作。我觉得该研究中心的民运色彩仍然较浓，有悖我彻底脱离民运、真正从事纯学术研究的愿望，因此婉言拒绝。

5月10日，陈一咨约请张钢、吴国光、李少民、程晓农、陈小平和我到他家中。陈说：“现在民阵问题很多，我们在其中已经不能发挥作用，研究中心只是我们的理论阵地；在海外生存和发展的事业中，咱们七个好朋友应该团结一致、起到核心作用。我们成立一个组织，今后相互支持、相互依靠。”我们讨论后决定成立名为“九零学社”的不公开组织，每人手写“入会保证书”存在我处，内容主要是“互相协助、保守秘密”。次日李少民说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电话他，“美国政府不容许任何人在美国成立秘密组织。”我们感到陈一咨已被监听。日后陈一咨与张钢闹翻，九零学社无疾而终，我销毁保证书了事。

这次在纽约意外的收获是遇到滞留在美国的国内好友黄江南和李湘鲁，劫后重逢分外亲切，他们分别盛情款待我，陪游和宴请。特别是李湘鲁，九零学社和纽约其他朋友都说他的电话永远是留话，从不回话。我尝试留话，李立即回话，接我到曼哈顿。他欲请我大餐，我却馋北京炸酱面。他带我在曼哈顿下城找遍唐人街，终于如愿以偿。我们也畅聊了整个下午和晚上。我们的友谊延续至今，无论国内外，年年相见畅谈。

夏威夷东西方中心下属“文化与传播研究所”的华裔所长杜维明，到巴黎与我们交流时，对我印象较佳。我应邀于5月16日在东西方中心、17日在马路对面的夏威夷大学中国中心，作了两场时局演讲。东西方中心欢迎我在方便的时候，去任访问学者，我当然同意。

5月31日“六四”周年前夕，我参加在法国参议院由法国国际政治论坛与民阵联合举办的中国现代化和民主化展望研讨会。这是我赴美前定下的，为

此前一天我匆忙从美国赶回巴黎。中方主要讲演者是阮铭、万润南和我，《民阵一年》有记载。在提问环节，法国记者问我："您作为法国分部主席和民阵总部的万先生对中国未来的展望似乎不同？"我回答；"依照中国传统，小分部应该与大总部一致，因此我同意万先生的论断：'中共只有一口气可喘。'但是，万先生说那口气只有一年半载，而我说那口气，中共可能还要喘上几十年！"引起全场哄堂大笑。这是我最后一次以民运身份参加的学术活动，二十多年后遇到当时的听众，他们对我"那口长气"还印象深刻。

6月3日晚，民阵法国分部在巴黎人权广场冒雨举行的"六四周年祭"烛光集会。我主持聚会，吾尔开希致辞，圣罗兰公司总裁讲话。中法音乐家演奏了《天安门广场》等曲目，邓丽君照例参加并献歌。尽管阴雨不断，群众热情不减，集会从晚8点一直延续到六四凌晨。这是我以民阵骨干身份，参加和主持的最后的群众活动。

"六四"一周年，大陆难民的安置工作基本结束，我也准备移居美国。6月，突然又有七位大陆流亡人士辗转陆续来到法国，我紧急联系艾丽丝和法国难民局解决他们的居留问题，并从分部得到的捐款中提供经济补助。另外有一位难民意外身亡，分部也给予困难补助，并发动募捐，解决其家属的燃眉之急。上述二事，我已忘记，现查《分部一年总结》才发现。



1990年4月，参加在东柏林举行的民主与人权国际研讨会，在拆毁一半的柏林墙前。

7月，我赴美国加州参加一个月的“浩然研习营”；8至10月，在夏威夷东西方中心工作三个月并签订了两年的工作合同。11月，回巴黎处理法国未尽事宜，正式辞去法国社科院的工作，退掉巴黎市政府的房子。

1990年11月11日，民阵法国分部召开二大，我作《一年工作总结》。尽管我实际在法国工作只有半年，但还是得到肯定和赞许。随后改选新领导，民阵总部领导和秘书处人员都是法国分部成员，也都与会并参加选举。近百人经过热烈的辩论，几位候选人经过激烈的竞争，最后草根战胜精英，流亡工人岳武战胜流亡学者蔡崇国，任民阵法国分部第二届主席。（蔡为第三届主席）

1990年底我访问台湾20天。1991年初赴美国学术研究。

从此我离开了法国，脱离了民阵和民运，在美国的学术机构完成了由民运骨干到政治学者的蜕变。

第三节 我为什么离开民运

8-8 海外民运内斗实录

“民运活动”这一章，原本到此结束。国内朋友希望更详细了解民阵兴衰内幕。看过初稿者一针见血：“你宁可得罪国内体制，不愿伤害海外朋友！”我极其矛盾，几经斟酌决定：不利用自己或少数人所知事实、不牵涉朋友隐私缺陷，全部引用媒体公开发表的数据，应付这“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以下未注明出处者，皆摘自安琪：《痛苦的民主——中国海外民运亲历与思考》，艺苑出版社、香港，1994年。感谢安琪日前应我请求赐书！

民阵一大上，学生领袖吾尔开希激动地说：“我不希望民阵成为体改所或四通。”民阵刚成立，体改所与四通的矛盾就公开化了！

1990年春，柏林理事会更使民阵内部矛盾公开激化。经过半年多的内

耗，民阵内部分歧日趋尖锐，理事会上达到了“拍案而起”的地步。副主席吾尔开希说：“如把理事会的讨论公开，人们会骂娘的。诽谤、人身攻击、无理搅三分，民阵的灾难！”民阵理事苏晓康说：“民阵的分歧不是派别，是万润南和陈一咨之间的矛盾，是恩恩怨怨、权力斗争。外界说万润南是四通的官倒，陈一咨是体制内的官僚，民阵是官僚加官倒。”

1990年夏，四通某副总裁给万润南写一纸条，戏称“民阵和四通皆被吾等玩于股掌之中”。民阵许秘书将此私信交报社发表，被认为陈一咨主使，引发万陈间公开指责，酿成轩然大波。事后万对我说：“老阎，多亏当初你战胜我支持的许某，当了法国分部主席！”

1990年9月，香港《开放》杂志刊登“陈万隔空之战”，其中陈一咨文章的标题为《万陈之争》，批评万润南：打小算盘、独裁作风、理事会形同虚设。对万又提三条意见：貌似宽厚，心实嫉刻；政治小动作太多；秘书处是独裁模式。陈最后说：“我对民阵失望！”万润南以《回答朋友的批评》一文，全面反驳说他独裁的观点，阐述民主政治不应该：把己见凌驾在程序之上、把自己凌驾在众人之上、搞小圈子不尊重独立人格、搞阴谋整人的流氓政治，婉转批评陈的上述做法。此事被认为是民阵二大公开的前哨战。

同月，民阵二大在美国旧金山召开，异于中共会议，全程开放。二大激烈内斗当时就被各种媒体广泛详细报道，我摘其些许。吾尔开希会前放话：“陈一咨第一恨万润南，第二才恨共产党。”会上陈一咨与吾尔开希对质无果。此悬案乃前菜，正餐大菜是“倒万派与保万派大战”。参选民阵主席的是万润南与朱嘉明两位谦谦君子。但双方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众“派人”，或按民主程序拉票，或施放流言暗箭中伤对方。我以美国东西方中心学者身份，公派出差考察此会。我在美国联邦下属的研究机构工作，已退出民阵无投票权，但烂好人有好人缘；若施加影响，非一票之效。万朱皆为多年好友，我对双方“说客”皆表示爱莫能助、绝对中立，故友谊至今。“保万

派”略占上风时，巴黎21名流亡人士写公开信传真至会场，对万润南激烈批评。万低调妥善处理、化险为夷险胜朱嘉明，任第二届主席。安琪的评论是：“筹备半年之久，耗资13万美金的大会偏离了民主的目标。”11月法国民阵二大，流亡人士扳回一城，以53:19草根完胜精英，报了一箭之仇。（香港《前哨》1992年4月号）

1993年初，民阵与民联两个海外最大的民运组织，在华盛顿召开盛大隆重的合并大会。结果是两个组织“合并”成三个组织，海外民运公开彻底大分裂。这合并很快变成“火并”。为争夺领导权，民联和民阵各自内部、民联和民阵之间打得不可开交。最后选举时，有慷慨陈辞、有愤而退场、有伏案痛哭，会场上一片混乱以致无法收场。美国民主基金会（NED，海外民运主要金主）的与会者说：“我对中国人内斗花样百出，真是服了，中国人是用计谋来整对方。”独立学者曹长青说：“会场谣言横飞。一位美国记者对我说，‘三天会场上听到的谣言比我一年中听到的还多。’原来我对大会抱很大希望，但看到有一半人哭了、三分之二退场了，我很痛心。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不计后果，不计名声。如不反省，民运将很难深入开展。”民阵两届监事会主席，领导层中唯一的台湾人钱达说：“华盛顿会议是民运史上最黑暗也最惨烈的斗争，会后我辞去所有民运组织的职务回到侨界关心台湾前途。”（钱后来回台湾任立法委员，让我找新加坡公民陪他到美国驻新大使馆见证他放弃美国国籍。）我当时在新加坡政府最高智库，身不由己不能亲临观战，但许多朋友为我“实况直播”。会议惨烈过程我不详述，国内外网站亦可查询。从此我曾跻身其中的民运江河日下逐渐势衰。

华盛顿会后，民运杂志《中国之春》的争夺战对簿美国公堂。获得杂志的民联阵的徐邦泰，此后贪污传闻不断。查账后发现徐将家里各种开销在杂志报销，几年贪污30万美元。各方遂停止赞助，杂志停刊。1980年复旦大学民选人大代表徐邦泰，就这样在海外民运中迅速堕落并消声匿迹。

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是中国流亡知识精英的大本营。普林斯顿大学1951级校友艾略特，在“六四”后捐出100万美元救助中国流亡学者。由普大余英时教授主持成立该学社，1989至93年共赞助26位著名学者，其中有方励之、刘宾雁、陈一咨、苏晓康、柴玲、阮铭等人。我本可进学社，但觉它不像真正的学术机构。

苏晓康在《离魂历劫自序》中说：“学社的精英名流，不懂英语又不是平常人，只好相濡以沫抱成一团，遂成一中国城，派对每周必有，还非唱文革歌曲不可。没有谁受过基本的学术训练，却常常要办学术讨论会，人人看上去大言不惭，预言中国，还都会侃几句文化；否则怎么叫访问学者？这班大名鼎鼎的中国知识分子，除了拥有一辆破车和不再拥有崇拜者之外，彷佛并没有生活在美国。”阮铭如是评价：“无论乐观的旧梦、悲观的新梦，都是不愿或不敢直面现实，丧失了民运前进的目标。而愈无目标，愈内斗；愈内斗，愈无目标。没有了理想的追求，斗争的都是权和钱。”

8-9 民主运动不太民主

中国是官本位社会，我侥幸接近金字塔上层，除了政治和经济特权外，更重要的是享有信息特权。加之我智商不太低，又愿意想点问题，因此对中共有较深刻的认识，而与其他民运人士对中国局势的看法相异。

蒋介石当年反攻大陆的口号：“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成功。”几乎所有的民运人士皆如此企望民主在中国近年成功，干部子弟苏晓康则“悲观”地认为可能五年。曾在赵紫阳领导的“政改办”担任要职的严家祺，问我：“我买了许多书，想买书架存放，又怕过两年回国浪费了。怎么办？”我答：“别说书架，房子都该买！”

上文提到一一刚出国的《我为什么离开中国》，认为争取中国的民主是至少20年的长期斗争，并说“我们中的一些人可能享受不到胜利的喜悦”。在上述六四半年研讨会、柏林会议、六四周年研讨会上，在苏联东欧剧变后

我仍坚持己见。我的观点屡屡遭攻击，轻者说我是极端悲观派、客观上削弱士气，重则诛心论、怀疑我动机不纯。

对最惠国问题，我不赞成对中国经济制裁和抵制中国产品。我说：“制裁中国，权贵仍吃香喝辣，倒霉的是普罗大众。”又有人攻击我帮中共讲话。此外我在内部会议上经常批评民运组织的某些错误，“爱之深、责之切”，则被指责居心不良。1991年中国华东严重水灾，我已任夏威夷东西方中心研究员。刚组织完“六四”两周年学术研讨会，又组织各界民众捐款（我收入较高理应多出），更被指责两面派。我只能苦口婆心地向反对者启蒙“领袖、政党、政权、国家、祖国、人民，六个渐进层次不同性质的概念之关系”，但效果甚微！

出国前后，几位知己都说：“你是理想主义者，只为理想放弃一切投身民运。若将来失望，将更加痛苦绝望！”1990年初我担任民阵分部主席不足两个月，就私下痛心疾首说：“中共40年腐败了，民阵40天就腐败了！”

独立媒体人何频说：“批评民运，就被认为是在破坏民运。民阵第一年花了一百甚至两百万美元，只有几千美元是用于援助大陆民运人士。一个既不能接受批评，又无道德感的组织，当然是没有希望的。民运组织最大的贡献就在于他们使自己成了牺牲品。他们虽然玷污了八九民运的名声，但同时也避免了一批流氓地痞式的政治家在政治舞台上嚣张。这种卑鄙与无耻，与共产党中的顽固派没有什么差别。”

独立记者安琪说：“开始是权力之争，后来饭碗之争则成了民运内乱的本质。海外民运中，争饭碗便成了一些人的基本要求。结果民运组织的经济支援受到了很大的损害。如‘中国人权民主基金会’内斗事件，几乎断绝了在美国民主基金会对整个海外民运的支持。对这种情况，谁批评他，谁就要冒‘反正义’的危险。我从一开始，就不断受到这种‘正义’的攻击和恐吓。”

学者宦国苍在香港《九十年代》1992年三月号上，发表《民阵问题一箩筐》，揭露了民阵的制度不健全，缺少财务和权力监督等问题，引起了轰动一时的“反宦氏风波”。宦说，被批评者不就披露的问题展开辩论，而是以“海外民运的对手是中共”来压制批评意见。

此外，我的性格非常不适宜做民运头领，也是我脱离民运的重要原因。官场历来有官、吏、僚三种角色。我在中国，任研究所和工厂的领导是官，组织部小干事是吏，部长秘书是僚，自认为官场全才。但在民运组织中，要自荐竞争、与政见相同的民主同志进行“贬低对手抬高自己”的竞选。做民主的政客，我力不从心，心非所愿！

我认为是海外民运首席理论家的胡平，有精彩论述：“有人说，革命是一个堕落的过程。这确是一个问题。争取一种位置时，存在着权力的争夺，人性中的恶被召唤出来，失去了原期求的理想。保持了纯洁性，在政治上你就是失败者。两难的问题！理想主义者，不能老拿‘我是正确的’来安慰自己吧，你必须要获得竞争的成功。在个性和职业衡突上，我习惯于踏实认真做事，对自己的成绩不愿自吹自擂。但政治就要有当仁不让的气概。你觉得自己比别人好，就得说比别人好，不能当老好人，让别人说你好。作为从事实际政治的人，你没有政敌，证明你没有出息（这个政敌不仅指共产党）。而没有权力的人，只能将自己的主张作为一种声音。”（1990年11月美国《新闻自由导报》）

我正如胡平所言——总想当老好人，是不愿有政敌的无出息者，只能将主张变为声音。在政治家与政治学家的岔路口，我只能、且只配选择政治学人。当初，众多的民运朋友被单方、双方或多方，相互攻讦的所谓“丑闻绯闻”缠身、轻伤重伤累累；如今，仍坚持民运的勇士们则更是“丑闻绯闻”不断、遍体鳞伤致残。过分爱惜羽毛、极其贪图虚荣、严重政治洁癖的我，窃喜当初全身而退，至今浪得虚名、无丝毫经济丑闻和生活绯闻，仍是无敌

人、遍朋友的烂好人！但我敬重仍然坚持海外民运的人士。

第九章 浩然研习营与两次台湾行

——与台湾各界的接触（1990，1991，1994年）

第一节 胡志强推荐我入浩然营

9-1 沈君山考察批准我进浩然营

台湾企业家殷之浩中国意识极强，其公司的名称即为“大陆工程公司”，他计划1990年夏天在美国举办一个月的暑期研习营。他说，我要办“与中国未来发展”有关的研讨会，邀请各领域的学者专家，与有发展潜力的青壮之士，共同生活与研讨，交换观念拓展视野，培养对中国乃至全世界更广泛的观察角度与思考方式，进而能适切的为中国人有所贡献。（引自《浩然暑期研习营演讲讨论辑》第一册，台北，1990年。以下简称浩然营）

浩然营学员的甄选过程：台湾学员经过康宁祥（台湾民进党元老、前立法委员），美国学员经过许倬云（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欧亚学员经过沈君山（台湾行政院前政务委员、清华理学院院长）分别面试考察；最后上述三人集体研究审查确定。



1990年7月，美国加州浩然营，作者与创办人、台湾企业家殷之浩夫妇合影。

1990年3月，得知浩然营公开招录学员。当时对民阵和海外民运已经失望，法国流亡难民的安置工作也基本完满结束。我产生脱离民运、转向学术的意愿，认为浩然营是绝好机会应尽量争取。我请在巴黎的老朋友严家祺和在台北的新朋友胡志强推荐，报名参加浩然营。严家祺：国内社科院政治学所所长、海外民阵总部主席，份量够；国内一起推进政治改革、海外一同领导民主运动，交情足；家祺爽快答应。若再请陈一咨或万润南二位重量级朋友推荐，应会被欣然接受。但是台湾企业家办的研习营，一位台湾专家先面试、三位台湾大佬再审查；能有一位台湾人物推荐则把握更大。我立即想到胡志强教授，尽管我们在去年民阵成立大会期间只有几面之交；但是相见恨晚、相谈甚欢。我冒昧传真台北，附上有关资料，提出推荐请求。胡次日即覆：“阁兄所托、弟之荣幸，兄入浩营、实至所归，志强义不容辞、当仁不让。”不日他就写出热情洋溢高度评价的推荐信，让我修改。我隆重感谢只字未改。

4月12日，沈君山在巴黎Warweck酒店约见我。交谈中，他没有翻看放在茶几上我的申请材料，却对我的经历和发表的文章了如指掌。真不愧为国际围棋界和桥牌界的双重高手！令我钦佩的还不止他超强的记忆力，平易近人的谦和更让我惊讶。他可曾是中华民国“副总理”级的高官和著名高校的院长。我们漫谈似地聊了一上午，为此他还把上午另一位的面试，推迟到下午。交谈非常融洽，最后沈交底：“严家祺也为另外几人写了推荐信，基本上是一碗水端平。你除了个人的经历和数据过硬，胡志强的推荐信也是所有推荐信中最强力的，令我印象深刻。你们是老朋友吧？”我如实交待了与胡仅有去年的一周几面之交。此后在浩然营和台湾，沈君山对我格外照顾。到浩然营报到时我才发现，沈在法国只选中我一人。（因大陆学员受阻，法国后来又补充一位。）



1990年8月，美国加州浩然营，与执行委员沈君山合影。

7月初，我抵达美国加州圣塔克鲁斯市。许倬云负责前两周讲课的督导和讲评，沈君山负责后两周的学员演讲和专题讨论。全程参加的还有几下几类人员。

一、台湾人士：行政院研考会主任马英九、民进党元老康林祥、民进党立委卢修一、国民党立委刘兴善等四位博士官员和另外五位教授。

二、海外的大陆改革派：陈一咨、李湘鲁、王小强、华生、杨沐和我，张钢后补充进来，我们七人都是莫干山的朋友。

三、海外民运人士：胡平、丁楚、项小吉等五人。

四、美英德和香港的博士和博士生共11人：其中后来回国发展的有：崔之元、石浩海、陈嘉映、董明、史望澄、陈平。

五、中国海南三亚市市长助理江上舟。他是我清华校友和朋友，浩然营后我陪他旅游考察夏威夷。原定国内还有几位，但被当局阻止；江提前出发，成为唯一的漏网之鱼。

殷之浩和夫人大部分时间在营区，与我们一起认真听课；他们的女儿殷琪（我们通过巴黎郭女士而相识）也短期来营。

前两周的专题演讲：第一类是当今世界最严重而又持久的主题，包括环境保护、人口问题及文化价值的演变等宏观的大课题。讲员是这些领域最重要的大师级学者，包括1972年若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艾罗；第二类是具有当代及时意义者，例如大陆和台湾的政治经济改革、两岸关系，大陆的文化发展

和最近的政治变化，及东欧的巨大变化。讲员是对这些问题有专门研究的学者：余英时、刘遵义、许倬云、管惟炎、柏杨；以及台湾官员，行政院前院长孙运璇、行政院前政务委员沈君山、研考会主任马英九、经建会副主任叶万安、前立法委员康宁祥。



1990年夏，美国加州浩然营合影。前排坐轮椅者为台湾前行政院长孙运璇；立者左一为李湘鲁，身后为马英九。本书作者站在孙运璇身后那位女士的后边。

9-2 我的专题演讲和讨论发言

在经济学大师刘遵义（新世纪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演讲后的讨论中，我小声对旁边的陈一咨谈了不同意见。陈大声说：“阎淮有看法！”

我不得已发言了：“谈谈权力下放。首先，不同意企业真下放。中国全部社会资源和生产要素都被政府控制，即使政企分开、权力下放给企业，它也要找个政府婆婆。否则无处寻求人、财、物和其它保护，无法生存。不是市场经济的中国，仍由无处不在的看得见的政府之手控制。即使所属企业亏损，其干部的任免权、紧缺产品的分配权，对主管部门都是‘油水’；‘瘦水’也不流外人田，政府不会轻易下放。其次，不同意刘先生提到政府权力下放的所谓‘问题’。一、您说两千个县变成两千个国家了，这不是权力下

放的问题；40年一直存在地方保护主义，我能生产的产品就排斥外来商品。二、中央财政亏空问题，是中央和地方税收分成时地方太精明，几年不变中央就亏了。”（《浩然营演讲讨论辑》第二册记载了我发言近千字）

后两周是学员演讲报告和几个专题的挂牌讨论。

七位学员被选中作个人演讲，我在7月27日上午作了《中国大陆的政治结构与政治改革》的报告。提纲是：

第一章政治结构

第一节组织结构。中国政权是党、政、军三个系统；纵向分中央、省、市、县、乡五个层级；横向有党委、顾委、纪委，政府、人大政协，军区七套机构。党中央权力结构是领导核心、总书记、常委会、政治局、书记处、中央各部委。

第二节政权本质。一党专政、党管一切；中央集权、个人独裁；官阶本位、等级森严。

第三节统治特性。一党专政——纪律性，中央集权——有效性，官阶本位——稳定性，个人独裁——脆弱性，老人政治——软弱性。

第四节管理手段。全民的户口制度，职工的档案制度，干部的升迁制度。

第二章政治改革

第一节十年回顾；

第二节没有政改、只有松动；

第三节松动的原因。

赵紫阳的秘书李湘鲁谙熟中国政治，又是挚友，演讲前我说：“你可随时插话，纠错和补充。”我讲到户口时，李说：“这套东西是非常重要的，是共产党统治的关键。”我谈到装不装档案由人事部门决定，李说：“人事部门有独立性，但一把手如果跟人事干部关系好也可装。”我讲到配备地方

大员要征求某些元老和政治局的意见时，李说；“政治局分工某人联系某省工作，中组部作了决定，他可以干扰你的决定，中组部要先去拜他；不过赵紫阳在干部任命上，一向不大说话。”我最后说是中组部下去，见官大一级时，李说：“对地方来说，中组部和国家计委最重要，管官员升降和给钱。这两个部门下去个处长，招待得比其它部的部长还好。”我演讲后的讨论很热烈，谁都懂政治嘛！有十余人次提问，我都分别作了回答。最后快到午餐时，主持人、历史学家许倬云简单总结：“刚才讲的结构，和十五世纪的罗马教廷很像，有部分类似清朝乾隆以后到慈禧太后为止的结构。不过今天讨论时间已经到了，等有空的时间再说。”《浩然营演讲讨论辑》第四册刊登了我演讲的主要内容约万字和讨论问答。



与浩然营两位执行委员合影，左起：沈君山、许倬云、作者。

没想到，参加浩然营的《中国之春》社长胡平和主编丁楚把他们自行录音的我的演讲的一部分，以《中共极权金字塔的结构》为题，擅自发表在《中国之春》1990年11月号上。文后注明“本文系根据作者在浩然暑期研习营的录音整理，未经作者审阅。”中国之春杂志出版社1993年在纽约出版的《中国之春文选（1982-1992）》，又全文刊登了上文，并且删去了文后的注释，好像我投稿似的。

近30年，在海外非学术性出版物，经过或未经我同意，刊登我的作品，

均未要或未付稿酬。

我对中台关系比较感兴趣，在会下与马英九、沈君山和卢修一单独探讨较多。在他们三人主持的“两岸关系”专题挂牌自由讨论会上，他们希望我多评论。在《浩然营演讲讨论辑》第三册中有我的部分发言。

我的主要看法是：二战后世界上四个分裂国家，德国和越南已经统一，南北朝鲜也同时加入联合国，并且容许邦交国承认对方。唯有中国是敌对两党领导的敌对军队经过三年内战，最终都没能够彻底消灭对方，从未签订停战协议，法理上仍处战争状态，因此问题更复杂。中台现状是：双方在承认一个抽象中国的前提下，用两个国名、以两个政府、按两种制度、对两个地区、进行两种治理。即“一国五两”一国两名、两府、两制、两区、两治。近年大陆释出善意，李登辉坚持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使两岸和解失去十年机会。现在应该是：“台湾不独、大陆不武，降低敌意，增加接触。”而大陆的的民主化对两岸人民都是福祉，也是最终解决两岸关系的关键。我最后说：“台湾两千万人民并不需要为十亿大陆民众负责，而大陆人民应该多了解、理解、谅解台湾民众的处境，即他们的想法、看法、说法和做法，更加尊重我们情同手足的亲爱同胞。我们在座的大陆知识分子要把人性、人道、人权放在国家主权和民族主义之上。”



我在美国加州浩然营就台湾问题发言后，两位担任工作人员的台湾留学生要求与我合影。

我演讲后，为浩然营服务的叶素玲、林鹤玲两位台湾女留学生，从会议室后面跑向讲台前与我握手，哭着说；“从来没有听到大陆人说过这么同情和理解台湾人的话。”从此我们成为朋友，新世纪我绕地球一周后，重返加州，还访问过她们的家庭。

9-3 浩然营花絮

加州中部海滨胜地圣塔克鲁斯市郊的Chaminade五星酒店，依山临海与世隔绝，是真正的世外桃源；里根总统任加州州长时，经常来此度假和与幕僚密谋策划机要事宜。我们居住了一个月的这家五星级酒店豪华之极，住宿房间很大，办公桌椅、大小沙发、淋浴浴缸、阳台水吧齐全，免费洗衣；中晚餐皆是餐前酒、色拉水果、主餐酒、餐后甜品咖啡俱全的“正式西餐套餐”规格的豪华自助餐；上下午会议休息时的课间点心也相当奢侈；酒店拥有像中型健身俱乐部那样全套设施的体育馆。酒店距市中心和海滨几十英里，酒店小车可全天候免费接送我们往返。我们打听到暑期一天的住宿费要五六百美元，就要求换个便宜住处。殷之浩毅然拒绝：“你们研习有成，将来对中华民族稍有贡献，一切都值得！”

我们课余的体育活动非常丰富，马英九是篮球高手、沈君山的台球无人可敌、我的乒乓球略胜一筹，游泳则人人皆可。四个周末我们分别游览了圣塔克鲁斯、旧金山、圣荷西三城市和优胜美地、红木等国家公园。

马英九每次出游时都被不同的台湾游客围住、要求合影签名。老美总好奇地问：“他是啥人？”我答：“中国中年影视明星！”老外感叹华人中年明星的英俊。马英九当时是台湾现职部长，但是平易近人、毫无官架。外国专家演讲时，他经常为我们几个英语白痴翻译；周末旅游时，就是首次来美的欧洲老土们的义务导游。我调侃：“当年你刚毕业，就为蒋经国总统翻译；现在贵为部长，却是我们平头百姓的翻译兼地陪；真是马小二过年、一

年不如一年，江河日下呀！”7月13日是马英九40岁生日，我们为人缘特好的他，举办了浩然营中唯一的庆生晚会。

沈君山，曾任副总理级高官和高校院长，现在正式“官衔”是研习营的“执行委员”，我们戏称为“训导主任”（另一位“执行委员”许倬云则被戏称为“教务主任”）。58岁的沈，应该是我们的师长辈，但与二、三十岁年轻的博士生毫无代沟，经常与我们一起打球和跑步，偶尔在男学员中开些高雅或不高雅的玩笑，大陆学员当仁不让地回赠同等量级的“颜色玩笑”。沈君山回忆：“许倬云和我分任执行委员，许先生循循善诱、诲人不倦，教务主任当之无愧。我的训导主任则是既不训又不导，绝对的‘放羊吃草’，浩然营自始至终开放自由平等自然的营风，自认不无微功。结业之时学员们送了殷之浩和许倬云精致郑重的礼品，给我的却是一张三尺长半尺宽、有所有学员签名的大卡；其中有宇宙图书、但也有醇酒美人，有赞誉溢美的颂词、但也有谑而不虐的嘲讽。我十分得意，也认为十分恰当，至今挂在我的书房，作为珍贵的纪念。”（《浩然营演讲讨论辑》第一册）浩然营的告别晚会即结业典礼上，我们说是赠送殷和许两位先生礼品，而对沈君山却说“赏赐巨幅唐卡”。唐卡上的图画皆有所指：宇宙图书，因他是物理学家；美酒，他酒量大酒德佳；美女，他去年再婚；好像还有婴儿，因他刚得贵子；“颂词”和“嘲讽”，是对他德高才重和诙谐幽默的双重肯定。

8月5日浩然营结束，我飞抵夏威夷，开始在“东西方中心”两年的研究工作。浩然营的后续活动是殷之浩邀请学员中没有去过台湾者，寒假访问台湾。

从1990年至2001年，浩然营分别在美国、日本、台湾、澳门、日本、马来西亚、美国一共举办七届，参加的讲员有：新加坡前副总理吴庆瑞、香港大学校长王赓武、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高锟（诺贝尔奖获得者）、台湾考选部长王作荣。

中国发现浩然营不是“境外敌对势力”，后几届曾派著名学者和官员，如王沪宁、国台办副主任孙晓郁、作家张承志等参加。



1990年8月，我陪唯一参加浩然营的中国官员江上丹在会后考察夏威夷。

9-4 王沪宁与我分别撰文纪念浩然营

1994年4月27日殷之浩逝世，享年80岁。消息传至新加坡东亚所，我悲伤之余撰写下面的悼念文章，发到台湾载入《殷之浩纪念文集》。这篇千字文涉及当时对浩然营的评价及对我的影响，故节录于此。

悼念与纪念

四十多年，参加无数研讨会，举办单位有：台湾总统府国统会、中共中央、美国国务院、法国参议院、新加坡内阁；受益最多、印象最深者，首推殷之浩先生创办的浩然研习营。

1990年夏，有幸自巴黎赴美国加州参加首届浩然营。一个月中，大师级讲员的深邃讲演、两岸政要的深刻报告、杰出学员的深入讨论，四年后仍历历在目。

我们老中青三代精英荟萃，本身即是中国共和史和民主史的写照——长者是民国同代人，幼者是天安门孩子；尊者“贵”为前阁揆及政务委员、台湾最年轻的部长及大陆最高学历的市长，卑者“贱”为两岸囚徒及通缉要犯；勇者如台湾反对党领袖及大陆海外民运组织首要，智者如大学院长及驰

名中外的作家及亚洲第一女记者。

旧雨新知，这批脑有学识、心具见识、胸怀胆识的中国人，在“开放、自由、平等”的营风中，挑灯夜战、周末不休，激烈而理性地研讨中国与世界的过去、当今与未来。彼情彼景毕生难忘！

最令我钦佩的，是被尊称为“浩然营大家长”的殷之浩先生，为中国未来培养有用之才的独到见识，敢为天下先、冲破重重阻力创办浩然营的卓越胆识。在诺贝尔奖得主的讲堂上，他是大智若愚、虚怀若谷的学者；在与杰出专家教授的讨论中，他是平等待人、思想深邃的智者；在浩然营学员和他的公司员工面前，他是平易近人、慈祥亲切的长者。老先生身教言传、身体力行的名言——“我身为中国人，总想为中国人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则永远铭刻在众人心灵中！

浩然营结束，前往夏威夷东西方中心工作。凭借浩然营的充电，在那里研究中国政治两年；研究成果被新加坡东亚所认同，继而受聘于此。近四年的境遇，些许受惠于浩然营和殷老先生；而其精神遗产，则终身受益不尽。

惊闻殷之浩先生仙逝，中国顿失栋才、学生永失良师，不胜悲伤！欣闻浩然营第四届明年续办，先生遗志可继、浩然香火不灭，不胜欣慰。

谨以此千字拙文，沉重悼念殷之浩先生，并纪念浩然营创办四周年。

新加坡东亚所吴庆瑞老板、浩然营第三届讲员，知道身为首届学员的我准备撰文纪念，请我代为起草唁电。我以吴的名义和口吻，将上文要点精炼成数百字电报发出。

参加第三届浩然营的王沪宁，在其《政治的人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中，怀念殷之浩：“人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度过自己的生命，大概要结识成千上万的人。在这些人中，有的擦肩而过，有的朝夕相处。

有的人天天与你在一起，但是你对他没有什么印象。有的人偶尔与你见

面，但是你能念念不忘。之浩先生属于后一种人，我和他只有两次相遇，然而他却永远地留在了我的心里。中国在之浩先生的心灵中具有崇高的地位。我曾听到他十分激动地说：‘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历史、文化、感情都有凝聚力。’浩然营是短暂的，可是我们都得到了一定永恒的东西。之浩先生的名言是：‘人，必须活得自尊和骄傲。’我对之浩先生了解不多，但是仅据此有限的了解判断，我想他是做到了。”

我与王沪宁价值观相异，但是对殷之浩和浩然营的评价却雷同，这就是殷先生人格魅力之所在、浩然营的成功所在！

第二节 访问台湾马英九多留我一周

9-5 在台湾的考察与观光

1990年12月抵达台北，前十天是浩然营组织的参观考察和观光游览。

18日，浩然营在台湾的成员欢迎我们大陆在欧美的九位学者访台，宴会名曰“浩然同学台湾聚会”。随后的参观考察由相关的台湾“同学”引导到他们服务的单位，都是单位首长接待并宴请。（观光旅游则由殷家的“大陆公司”的职员陪同，由北向南游遍台湾主要的名胜古迹，不必赘述。殷之浩董事长和殷琪总经理，在台北最繁华的忠孝东路的大陆大楼内的大陆工程公司总部，接待并宴请我们，是必备节目。）

立法院。21日上午旁听立法院辩论，民进党与国民党争得面红耳赤，几乎肢体冲突。中午在隔壁的来来酒楼聚餐，刚才还差点打起来的两党议员，称兄道弟把酒言欢。对此我们不解，台湾朋友解释：“他们吵架打架经媒体报道后，就分别在两党的极端选民中威信提高，有利连任。”朋友让我们谈感想，我说：“中华的议场打人比广场杀人好，欧洲的议场点人头比亚洲的广场砍人头强。”下午，刘兴善委员先带我们去立法院国民党党团，执政党官气足，大家礼节性寒暄，没有实质性讨论。随后，卢修一委员请我们到他

的办公室，民进党三位重量级立法委员邱义仁（民进党秘书长）、洪奇昌和彭百显已等在那里。他们介绍了从老蒋（介石）时代的“党外”到小蒋（经国）时代的“建党”，台湾民主化的坎坷路程以及民进党的历史、现状和执政前景。我们深入讨论了大陆民主化的可能和路径，我又重弹了“从党内民主到社会民主”的老调。

土改训练所。24日农经教授彭作奎（后任行政院农委会主任）上午陪同我们到桃源县“土地改革训练所”参观。台湾在1950年代初实施的土地改革计划，包括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耕者有其田等一系列措施，显著提高农民从农意愿与社会地位，进而促使农业生产与农家收入大幅增加，繁荣农村经济，奠定了日后整个经济发展的基础。我对此早有了解，现在加深理解、印象深刻。下午访问台中县新社乡农会和几户农家，对台湾农村和农民作了零距离接触，有了直观的了解。次日访问台中县大甲镇公所，对台湾最基层的政权运作进行考察。

行政院研考会。26日访问马英九主持的这个部门。马介绍：“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主要工作是：在运用科学方法负责办理政策研究与规划工作，对于政府的施政计划的执行则负责追踪、管制与考核的工作，以期提高行政效率以及促进行政的现代化。”他还带着我们参观了各个处室。

清华大学。27日上午参观新竹清华大学，当然由曾任清华理学院院长的沈君山（后任清华校长）陪同，我这个参访人员中唯一的大陆清华大学校友，当然受到格外礼遇。下午参观交通大学和科学工业园区，其中的宏碁计算机令我印象较深。

此外，中央研究院的刘吉石、经济研究院的马凯、工业研究院的史钦泰、师范大学的羊忆蓉、《天下》杂志的殷允芃五位研究员和教授，也分别陪同我们考察访问他们任职的机构。

浩然营在台湾活动的十几天中，我还利用自由活动时间偿还了个人的欠

债。

胡志强与“爱盟”。甫到台北即与胡志强联系，欲面谢他推荐浩然营之情并赠送巴黎的小艺术品，胡约我20日晚餐见面。孰料当晚竟是“爱盟”负责人聚餐会，认识了立法委员郁慕明等人。他们与我相谈甚欢，并正式邀请我，后天在“爱盟”19周年庆典上作主题演讲。（1971年台湾留美学生不满美国把钓鱼岛移交日本，成立“爱国联盟”开展保钓运动，核心成员是马英九和郁慕明等，“爱盟”随着留学生返台也迁台，留欧博士胡志强等加入并成为骨干。在台湾他们主要是反台独，1993年郁慕明等退出李登辉把持的国民党，成立“新党”，郁现任主席。）22日我在数百人的“爱盟”盟庆大会上，作为唯一的主题演讲者作了《大陆民主化进程》的演讲。侃了一刻钟大山，吃了丰富的晚宴。散会时胡志强塞我一个信封，打开发现是一沓钞票。我说：“我是还你情、捧你场，怎么还能拿钱？”胡说：“这是惯例，你不能破！”（此后，我在台湾陆续得了不少“车马费”。）29日我到胡志强兼任副秘书长的中华战略学会与他告别。他说：“新年后我将出任总统府第一局副局长，辞掉大学教职和这里的兼职，正式从政了。”1991年秋胡任行政院新闻局长，后任外交部长、台中市长、国民党副主席。

《联合报》与王友兰。“联合报系”是当时台湾第一大报，老板王惕吾是国民党中常委；旗下在欧洲是《欧洲日报》，因发表过我的几篇文章，我与经常赴法的王效兰（王惕吾长女）认识。19日我到联合报社拜会王效兰。27日晚应邀到她家晚餐，与在美国相识的、回台湾过年的纽约《世界日报》总裁、王家次女王友兰重聚。随后几天晚上，王友兰开车带其友人和我去基隆夜市等地游玩。31日晚的年夜饭，我是在王家与王惕吾一家十几人一起热热闹闹吃的，使我孤独一人在台湾度过愉快欢乐的新年。世纪末我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时，与患肺癌的王友兰偶尔聚会，她不幸逝世后，2000年5月12日我参加了她的追悼会，送她最后一程。

12月28日，浩然营的活动结束，大陆学员返回欧美的居住地，回家过新年。马英九挽留我在台北多住一周，对外公开的理由是与台湾各智库再进行较深入的交流。真实的目的是：“给他们好好上上课，你也增加点演讲费收入！”

9-6 马英九请我分别为三方演讲

12月29日，民进党大佬康宁祥介绍我认识同为民进党创始人的朱高正和林正杰。朱高正以“暴力问政”而闻名，在立法院挥出了第一拳，并经常上演全武行，被封为“国会战神”。我表示对此不敢恭维。朱说：“在国民党独裁时期，反对党为有效监督，必须采取极端的手段；温和的问政方式，无法有效推动民主发展。”但是我赞赏他积极推动开放大陆探亲和反对台独，因此谈得比较投机。林正杰历来主张、并身体力行街头暴力抗争，有“街头小霸王”之称。任台北市议员时，与陈水扁、谢长廷被称为“党外三剑客”。交谈中，林表示不满民进党的台独，要退党组建“中华统一促进党”，致力于两岸交流。我说：“统一和独立，本世纪甚至我们有生之年都见不到。加强交流，促进两岸的了解、理解、谅解，才是当务之急。”他们三人都赞同。他们还陪我拜访了《自立报》。自立报系几十年来一直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是具有独立色彩的党外报纸。

31日，马英九介绍我到国民党智库、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中心，先演讲、后交流座谈，吴安家副主任主持。（前任国关中心主任邵玉铭即是相当于中共宣传部长的台湾时任新闻局长，足以说明其重要性。）通过座谈中研究员提出的问题，我发现国关中心对中国大陆的研究非常认真细致。我在法国看到他们编辑出版的《中国大陆研究》月刊，确实是海外水准最高的中国研究的学术杂志。当日我认识了该刊物副主编宋国诚，日后多次向我约稿，发表在此月刊上（我也得些稿酬不菲的外快）。还认识了国关中心兼职研究员、权威的《中共研究》月刊的总编辑方雪纯老先生，他是中国人事问题专

家，过去读过他的著作，他也向我约稿。

1991年1月1日，在民阵一大认识的明居正教授，陪同我到去年在柏林会议熟悉的马树礼家中拜访。马时任总统府资政兼三民主义大同盟理事长，明兼任大同盟副秘书长，他与我讨论了中国与世界形势，对我“挺感冒”。马对明说：“阎先生很有看法，今后开会多请他来指教。”这就有了下节提到的再次访台开会并作主题发言。

1月2日，马英九请我到行政院大陆委员会演讲，他向我介绍：“《陆委会组织条例》这个月将在立法院三读通过，你是陆委会第一位演讲贵宾。陆委会的主任是行政院副院长，我将辞去研考会主任、专任陆委会副主任，就如在美国时和你说的，专心从事两岸交流事务。陆委会委员包括：行政院秘书长和政务委员、内政部、外交部、国防部、法务部、经济部等行政院几乎所有的部会首长。因为陆委会还没正式成立，他们今天都只能派代表来，和我们陆委会全体同仁一起听你讲课。”随后在陆委会的礼堂，我向百余位中华民国将要从事大陆事务的官员“授课”两小时。而后的提问相当踊跃，不同于国关中心的学术性问题，官员们则更关心政策面的问题。随后在马英九的办公室里吃便当饭盒，马说：“不好意思，我们公家机关既不能像你们大陆那样豪华宴请，也不许像‘大陆公司’的企业那样盛情款待。”我笑答：“在大陆我们也吃工作盒饭，但绝不吃‘饭盒’！”（离台后我们长期保持互赠贺年卡和简信的联系。1998年他当选台北市长，我又经常回中国，为不给民进党口实，我终结了与他的联系。）

春节后，我在夏威夷接到陆委会詹志宏处长传真来的、根据我演讲录音整理的文字稿，请我审定。春天，我收到马英九邮寄来的、三万字56页的小册子——《中共政治结构与民主化论纲》，阎淮着，大陆工作参考数据，行政院大陆委员会编印，中华民国八十年四月。（现在网上仍可查到）简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政权结构（与浩然营演讲类似）

第二章干部结构。

1、干部状况：基本情况、十年变化、第三梯队；

2、干部态度：对经济改革、对政治改革。

第三章政治改革。

1、十年回顾：1980年，1984年、1986-1987年三次改革；

2、没有改革只有松动：政改与经改、十年松动、松动原因。

第四章民主前景。

1、中国与苏联东欧的差异（在法国和德国的两次讲演的提要）；

2、政局预测：不可能——全面内战、军事政变、宫廷政变、强人逼宫、地方割据、地方自治；只能——集体领导、和平过渡、和平演变；

3、民主进程：权力转移——强硬派、开明派、改革派、民主派；

4、民主化过程：党内民主到社会民主；

5、前提与思路。

1月3日上午，马英九介绍我到颇具台独倾向的张荣发基金会下属的国家政策研究中心演讲交流。马说："我们是政府的陆委会，不是国民党的陆委会，要一碗水端平；国民党智库去了，民进党的也要去。这样：政府、执政党、反对党，三方面你都去全了。""国策中心"执行长张瑞猛博士主持演讲会。我的演讲也是"一碗水端平"、与前两次基本是"一稿三用"，内容大同小异、只是多介绍些大陆的民主党派和体制外的民间势力。讨论交流中，台独学者的台独理论令我震惊："台湾本省人，不属于中华民族，我们有自己的历史、文化、语言、信仰和习俗；美国成立才二百多年，与英国也是同文同种，已经形成崭新的民族；我们的先民已来台三百多年，为什么还必须是中华民族？"对此，我感情上接受不了，但是理论上毫无研究，不敢贸然反驳，只能打哈哈："中华民族礼仪之邦，奉行'吃人家的嘴短'，据

说中午要请我吃丰盛的‘台餐’，又拿了你们丰厚的演讲费，我‘今天’（强调今天）对‘台族’理论就不反驳了。”

9-7 与殷琪、殷允芃的个人接触

1月2日晚，应摄影家郭英声先生和企业家殷琪夫妻邀请，到他们家晚餐。我与他们是在法国，通过郭女士结识的。郭英声七十年代自台湾赴法国学习摄影，与学习美术的郭女士成为挚友。郭英声海归台湾后，经常返法并数次在巴黎举行个人摄影展。来自香港的郭女士有我们两个分别来自大陆和台湾的好朋友，我与郭英声也就自然成为了朋友。在法国的最后接触是，1990年11月郭驾车载我去巴黎远郊的移民局，更新我的法国旅行证件，他说是我的车夫和翻译。那天他确实帮了我的大忙，随后我请他吃了印度大餐。在法国认识了郭英声，自然也就认识了殷琪，半年前在美国浩然营和最近在台湾她任总经理的大陆工程公司，我们又频繁接触。

2日殷琪让佣人放假休息，亲自下厨做中西餐大菜，配上郭英声从法国带回的葡萄美酒，愉快的夜晚。我们三个中年人边吃边聊，海阔天空，中台对比、美法轶事，直到半夜。如果说在王惕吾家新年前一天的晚宴是欢快热闹；那么新年后一天的晚餐则是温馨宁静。我和殷琪对当年共产国际扶植培育出来的两个革命政党都不满意，殷琪尤其对国民党在经济上偏袒公有企业和党营企业，压制民营企业深恶痛绝。这可能是她后来支持民进党的重要原因。

1993年李登辉台独面貌大暴露，在去世前一年、行动不便的殷之浩还坐着轮椅参加反对李登辉的游行；但是2000年台湾总统大选，殷琪却出任陈水扁助选团发言人，陈当选后聘任殷琪为国策顾问，还任台湾高铁董事长。我与这位政商领袖互赠贺年卡的联系就此终结。

1月3日下午，与《天下》杂志的董事长兼总编辑殷允芃再度闲聊漫谈“台湾、中国与世界”，并共进在台湾最后的晚餐。《天下》是台湾第一份

以财经为导向的综合性杂志，被誉为华文世界最优质的财经杂志，殷允芃曾被《亚洲周刊》评为“亚洲最有影响力的女性之一”。殷是浩然营的主办机构——浩然基金会的董事，一开始就参与了浩然营的策划与筹备工作，用沈君山的话说：“贡献了许多意见，也帮了许多忙。”由于她的特殊地位与贡献，在浩然营的名册上，在讲员和学员之后还专列了“观察员”一项，马英九先生和殷允芃小姐名列其中。

1991年1月4日，离开台湾飞回美国夏威夷，继续在东西方中心的研究工作，再次访台是三年后，从新加坡赴台北，参加在圆山饭店召开的中山思想国际研讨会。

第三节 在台北的孙中山思想研讨会引言

9-8 我论《民权与大陆政改》

1994年2月，我在新加坡收到台湾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的邀请函，请我参加3月底在台北圆山饭店召开的中山先生思想与中国未来研讨会，并且作为大会三个主题之二：“中山思想对促进大陆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意义”的“引言人”。随后我接到大同盟副秘书长、老朋友明居正教授的邀请电话。我如实招供：“我对孙中山思想没有研究，只知：民族、民权、民生和军政、训政、宪政六个词。我愿与会学习，引言免谈另请高明！”明居正坚持：“您在中国、夏威夷和新加坡都从事过研究，正好中山先生也在此三地从事过革命活动，您引言更有意义。马树礼理事长和鄙人都了解您的学识、佩服您的人品，马老特意嘱咐请您重点引言。”我只得退让：“您搬出马老，我只好恭敬不如从命！”

我立即恶补三民主义，特别是民权思想。于三月中旬草拟以下千字短文，传真台湾得到认可。我认为孙中山的民权思想确实对中国的民主化有借鉴意义，故摘要于下——

民权主义与大陆政治改革

中国当代思想渊源有三：有权的马列共产主义，有势的西方民主思潮，有根的儒家传统伦理。对大陆的政改而言，此三种理论可资利用价值极其有限。共产制度系改革对象，西方思潮官方抵制百姓抵触，儒家传统自由民主色彩浅淡。三民主义的民权主义，对大陆政改极富启发意义。

一、权能区分论。官与民的关系是政治的第一难题。长期是政府专制、人民无权。文革中某些地区政府无能、群众无政。此种暴民政治是保守势力拒绝改革、维持专制的遁词。中山把政治大权分为政权（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与治权（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权）。由人民行使政权，而管理政府；由政府行使治权，而为民服务。达到人民有权、政府有能，圆满解决官民关系，为大陆政改指明方向。

二、五权分立论。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奠基了西方政治制度。东方官场的腐败主要表现在官场“入门”的舞弊和“场内”的贪腐。中山在五权宪法中，把考试和监察二权与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并列，对解决官场顽症极具现实意义。新加坡等国，把公务员机构和廉政机构直接隶属最高领袖，即是重视考试和监察二权。五权宪法是具有东方特色的横向分权制衡体系。

三、地方自治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央集权独裁或地方割据分裂；既是困扰今日大陆的现实课题，又是笼罩未来中国的巨大阴影。中山指出：“地方自治是宪政的基础”，应以“官治为民治”，达成“均权主义”。纵向分权制衡的思路，应能拨开大陆政治的迷雾。

四、民主程序论。大陆改革是邓小平“猫论”和“摸论”的实用主义哲学。由于缺乏整体规划与程序设计，大陆政改明显呈现盲目性和反复性。中山关于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的民主程序论，既有明确目标，又有阶段设计。在方法论上，对大陆政改很有借鉴意义。

五、综上所述。民权主义对大陆政改的目标模式、横向分权、纵向制

衡、方法程序等皆有指导作用。此即学习中山思想，促进大陆政改的必要性。

国人爱挂领袖像，双方都挂己方称圣、对方骂匪的杰出人物画像；唯独中山之像双方皆在最重要位置供奉。台湾经验大陆排斥，但台湾经验的精髓“三民主义”，却在大陆受到尊重。80年代初，两岸关系尚未松动，大陆出版物即称“民权主义是完全意义的民主主义政纲，无愧为近代民主主义思想的高峰。”可见学习中山思想推动大陆政改的可行性。

毛泽东说过许多错话，但有一句却是千真万确的真理：“现代中国人，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让我们继承中山先生的民主事业，为在全中国实现宪政大业，而共同奋斗。民主尚未成功，朋友仍须努力！

9-9 赴台参加中山思想研讨会

1994年3月抵台北。27至29日，在台湾朋友（到新加坡交流访问新认识的）热情陪同下，乘火车三天二夜台东行。游玩了上次访台没有来得及欣赏的花莲、太鲁阁、东海岸、知本等风景区。

3月30日至4月1日，在台北圆山饭店举行中山思想与中国未来研讨会三天。首日上午开幕式，马树礼致开幕词，教育部长郭为藩、陆委会主任黄昆辉、中研院院士费景汉先后演讲。随后三个半天是分组研讨，最后一天，上午综合座谈，下午参观故宫博物院。

我的第二主题“引言”在第二天上午。会后，三民主义大同盟出版了《中山思想与中国未来研讨会实录》一书，360页详细实录了会议的所有“引言”和讨论发言。（以下直接引语皆来自该书）

当天的会议主席是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院长于宗先。三年前我曾访问经济研究院，与于深入交流。在我演讲后，于说：“非常感谢阎淮先生所做之言简意赅的引言报告，这就好比一道开胃菜，先让各位开开胃，然后引导各

位进行一般性的讨论。”随后台湾的历史学家戴国辉、黄以法牧师、我的朋友明居正、于宗先、何频等先后发言提问。根据《研讨会实录》记载，我做了约三千字的回答。主要谈了：儒家思想在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东亚四小龙”崛起中的作用及在中国的影响；政改与经改的关系；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四个华人社会的比较等问题。在回显请求评论新加坡政治及领袖时，我说：“个人在新加坡是客人，在当地批评新加坡并无不可，但在此批评则有所不宜。好比我现在台湾，可以批评台湾，但离台返新，我就不愿再对台湾有所批评，因为你们无法答辩。”得到研讨会中少有的掌声。

下午在阮铭的“引言”后，我就他主张台湾进入联合国，提出“完全不可行”的评论；我们进行五轮简短争论，最后我说：“我们的观点不同，可以先将问题撇开不谈，让时间和历史裁判！”友好收场。参加研讨会的还有陈一咨、苏绍智和陆铿等，我与这些来自美国的老朋友当然进行了会下充分交流。几个夜晚，则是在法国和夏威夷结识的台湾朋友宴请和享受台北的夜生活。

因为父母来新加坡看望我，会议结束后，立即返回新加坡，未及看望其他台湾朋友，现在一别20余年，已经事是人非矣。

台湾《中央日报》未与我沟通，在4月30日全文刊登我的《民权主义与大陆政治改革》。这在海外，特别是国民党的机关报，实属老常态，我也见多不怪啦！

第十章 一篇论文惊动美台新三方

——夏威夷东西方中心（1990～1992年）

第一节 三场重要的学术会议

10-1 杜维明所长提供的优厚待遇

1959年夏威夷成为美国第50个州，次年美国国会立即授权在夏威夷成立“东西方中心”（East-West Center，下文简称中心），作为东西方文化和思想的交汇地，通过研讨会和研究项目，与亚太地区的专家围绕有关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议题开展合作。它是独立的公共非营利机构，除联邦政府拨款外，资金来源还包括民间机构、基金会、以及亚太地区的政府。

中心的总裁：19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是李浩（Victor Hao Li）,美籍华裔著名法学专家。熟悉后，我戏称他“李得胜”，他说“太土”；我告诉他，这是毛泽东转战陕北时期化名，他挺高兴。1992年之后，总裁是奥森伯格（M.C.Oksenberg），美国政府重要的中国事务专家，曾主导对华建交谈判。我称他老奥，说这是尊称，正如我们称邓小平为老邓，他欣然接受。他与我的学术领域重合、学术兴趣相同，我们之间的专业对话多过同为华人的李浩。1993年3月，他访问新加坡，我们最后一次交流。

中心的机构：下设文化与传播研究所（简称文化所）、资源所、人口所和国际关系研究室共四个研究单位。哈佛大学东亚系主任、美籍台湾出生的华人杜维明于1990年到文化所任所长。

1990年8月，我结束在美国加州一个月的浩然营，应在法国结识的杜维明的邀请直飞夏威夷。在东西方中心文化所的“文化中国”项目组，开始以客座研究员的身份，进行关于中国政治的研究工作。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杜维明

向我介绍：“我提出的文化中国，包括三个意义世界，一是中港台和新加坡的华人世界，二是世界各地的华人社会，三是国际上所有从事中国研究及关切中国文化的人士。你所从事的中国政治研究也是文化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杜维明为我提供了优渥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丰厚的薪酬，配备翻译助手，给我每月一千美元的经费，我在应征者中选了每周可以工作20小时的中国留学生、夏威夷大学的政治系博士生蒋翔，她可以免费享受中心的单人宿舍房间和医疗保险。我有独立的办公室，可以不坐班、只是需要参加每周一的文化所的全所大会和周五的文化中国项目组的协调会，每天上午可以到州政府办的免费成人学校学习英语（碰巧任课老师是中心韩裔副总裁赵立极的太太），免费住在中心的贵宾招待所一室一厅的套房。

中心有潜规则，希望每位新来的学者能举行一次公开的讲座。我在8月28日作了《中国政治结构与政治改革》的讲座，反应很好，杜维明特满意。另外“国际关系研究室”发现了我，他们对中国问题非常关注，此后经常邀我去他们那里“请教交流”；知道我来自中组部，他们非常想让我再举办一次讲座，全面介绍中国的干部问题。于是10月23日，我再次讲座《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干部的结构和观念》。由于首次讲座的成功，也由于是双语讲座（助手翻译），这次讲座招来许多中心赞助的中国博士生的捧场——国外学术方面的研讨会和演讲，一般都是对内公开的。



1990年9月，美国旧金山。作为夏威夷东西方中心的学者，考察民阵二大。

杜维明对我太好了。

其一，民阵二大于1990年9月在旧金山举行。有些民阵朋友提供经费，希望我去站脚助威、帮助拉选票。我既已脱离民阵，不想去凑热闹。杜所长说：“你研究中国政治与民主化问题，作为旁观的学者，去客观地考察大会有益处。”于是我就在美国刚刚开始工作的第二个月，公费越洋旅行了。同行的还有民阵二大代表金某（夏大学自联主席）等三人。飞机起飞晚点，航空公司把头等舱空余的三个座位，作为补偿赠给我们四人。他们立即要抽签，我说你们去开会可能比较累，我今后还有机会。”他们三人坐了头等舱。会议经费紧张，加上许多自费参会者，许多人是四人一个房间，于是我让两个朋友挤进我的单人房。

其二，1990年底我回巴黎搬家。12月初在美国驻法国大使馆，我持中心文化所的工作合同，申请签证。签证官蛮不讲理：“你上次赴美是访问考察的B1签证，不能工作！为什么你擅自改为J1的工作签证？”我理直气壮：“中心系美国联邦机构，是他们的‘外事办’让移民局变更的签证！我个人哪有权力？”对方不示弱：“让文化所所长来函说明，你下次再来签证！”老天助我——几天后杜维明来巴黎讲学；贵人助我——12月中，杜维明携太太陪我到美国大使馆。第一世界的美国驻第二世界法国的签证处，完全是第三世界的设施：狭小拥挤的矮屋、热力不足的暖气、没有椅子的房间。站立排队了两个多小时，我一再向杜夫人致歉、致谢！终于熬到我了，杜维明故意只讲中文，让白人太太翻译：“我就是文化所所长，这是我的证件，你看上面的签名与阎先生工作合同的一样吧？！”我顺利取得签证。——请他们午饭是必须的，但杜维明的恩情，不是一顿丰盛午餐可以了结的，我暗下决心，一定以优异的工作成果来报答他是知遇之恩。（1999年我在北京的美国使馆再次被拒，则是另一位美国所长黎安友相助。）

其三：1991年参加普林斯顿会议后，杜让我用近一个月的时间，先后去纽约、华盛顿、克利夫兰和洛杉矶的各大图书馆查阅中文数据，顺路访亲拜友、了解中国最新动态并且报销全部交通和食宿费用。

其四、离开中国后，在北京的太太表示要等我回去，即使像台湾老兵在大陆的家属，等待几十年也要等，令我感动。到夏威夷后，开始运作把太太和儿子弄到美国。父亲通过江泽民，使中国方面放行。杜维明通过中心驻北京办事处转交我太太一封信，申明我研究的重要性，让她在美国使馆签证遇阻时，提交美国签证官。果然，签证官见我太太带19岁的儿子赴美探亲，肯定有移民倾向就想拒签；但是看到杜的信后，改变主意。他们于1991年秋顺利到达夏威夷。

10-2 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反思研讨会

1991年2月18日至24日，在中心召开“文化与社会：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反思”国际学术研讨会。出席者都是中港台美四地研究中国文化、哲学、历史的重量级的华人学者，使用语言也是汉语，这在美国举行的国际会议上是颇为少见的。

筹备工作一波三折，主要阻力来自中国方面。我们早在1990年11月就向国内的学者发出了邀请函，但得到的信息却是对于会议的质疑，中国政府反复要求我们保证不掺杂政治因素。对于被邀请的人也严加政治审查，看是否有“留美不归”的倾向，致使王元化、陈来、汤一介等人都是直到大年除夕（1991年2月14日）才拿到签证，匆匆赴美。社科院的李泽厚和庞朴、复旦大学的朱某，由于单位是“八九风波的重灾区”，个人“有些问题尚未查清”，最终未能成行。而身居海外的刘再复、金观涛、刘青峰、甘阳、李陀、陈奎德等则能幸运顺利参会。

杜维明是会议发起人和主席，另外六位召集人是余英时、李欧梵、刘再复、陈方正、韦政通和甘阳。讨论的专题分别是：批判与建设、知识分子、

科学与民主、政治文化、民间社会、文化反思。

2月21日我在大会作题为《中国的民间社会》的演讲，阐述了民间社会在中国发展的必要性、艰巨性和可能性。简要内容如下——

“必要性：民间社会是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独立团体组织的集合，上对政府是压力集团、下对民众是利益集团。它是由现在的一元威权社会，向将来的多元民主社会，和平渐变的必要条件和基础工程。

艰巨性：简述中国的政治结构、政权本质、统治特性和管理手段。因此，中国目前的政治统治和社会控制，使民间社会没有生存空间。

可能性：重复我一贯主张的中国民主化，从党内民主到社会民主的十余步骤的渐进路线图。”

现在关于“民间社会”，人们已经耳熟能详、成为显学，但是近30年前，即使civil society的汉译在“公民社会”、“市民社会”和“民间社会”三者中选哪一个，还是争论不休的议题，更不为学界普遍重视。我浅显的发言引起较大的关注和讨论，一些学者表示今后要更重视民间社会的研究。当晚我请与会的大陆学者在金环酒楼晚餐，旧雨新知欢聚一堂。近年联合国也开始重视民间社会，其官方网站称：“民间社会是除政府和企业之外的‘第三部门’，由民间社会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构成。联合国认可与民间社会合作的重要性，因为民间社会促进联合国宗旨的实现。”

这次在夏威夷召开的研讨会颇具夏威夷的休闲风格。从报到之日算起，整整开了八天，在同类会议中也是少有的。会议期间，时而舌枪唇剑时而妙语连珠，学术争论之余穿插聊天闲话，大家都不慌不忙，真有点神仙会的感觉。会上会下花絮迭出，我记得的有：

王元化与林毓生此前虽不认识，但曾有学术争论。在第一天会上，王元化刚宣读完论文，林毓生就迫不及待发言，提出不同看法。但是经过几天会下的交流，两位脾气耿直的对手成了好朋友，是此次会议的一大佳话。当年

五月在普林斯顿大学，94年在新加坡东亚研究所，我又两次与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林毓生交流，受益匪浅。

香港《九十年代》杂志总编李怡，谈起不久前《人民日报》刊登的何新《与日本S教授谈世界经济》的宏文。而这位S教授，即日本的矢吹晋是李怡的好朋友，他说根本没有与何新纵论过世界经济。



1991年2月，文化与社会研讨会合影，照片上我们见到余英时、王元化、汤一介、林毓生、金观涛、刘青峰、杜维明、刘再复、陈来……等众多重量级学者。四排左二为本书作者。

三联书店总经理沈昌文也是《读书》杂志主编，接着说，何新为了在该刊上发表文章，先把文章让胡乔木圈点后转送《读书》。从此后，何新每次送文章去，都要沈昌文立发；不然就打电话恐吓，“你不发的话，我要你尝尝厉害。”

八九风波之后，中国一些知识分子流亡海外，从政治的中心到了文化的边缘。于是在研讨会上，“边缘”之声不绝于耳。在会议结束的晚宴上，被誉为台湾“生死学之父”的傅伟勋幽默坦承他们五位边缘人物曾到夏威夷的边缘地带，在海滨遇上徘徊的边缘女郎，问他们要不要五百美元的姑娘。傅笑答“五人一起来”，边缘女郎答称可以！五教授落荒而逃。引得我们大笑

不止。



1991年5月，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举行的从五四到河殇研讨会主席台。

10-3 “文化中国：从五四到河殇”研讨会

1991年4月21日美国《世界日报》，以《纪念“五四”研讨会五月在普大举行》为题，报道：

“一个阵容鼎盛、主题为《文化中国：从五四到河殇》的大型学术研讨会，将于5月3日至5日在普林斯顿大学举行三天。研讨会由‘普林斯顿中国学社’和‘东西方中心文化所’联合举办。

被称为普林斯顿三大人才资源的方励之、刘宾雁和柴玲将发表演说。还有多位著名中国学者包括林毓生、宦国苍、丁学良、阎淮……等。这将是一个精英云集的盛会，目前正在积极筹备中。”

媒体对一个学术研讨会，半个月前就预报实属罕见。但是上述与会人物（除鄙人外）确实“阵容鼎盛、精英云集”，在北美的社会学科和人文领域的一流学者几乎悉数囊括。

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是研讨会的主办单位之一。学社的近20人都参加了研讨会（多数人发言），并承担了大会的全部筹备工作。

我们文化所，是另一个主办单位。杜维明从文化中国项目中拨款，负担研讨会全部费用。杜对我说：“他们出力、我们出钱，文化所我只带你一人去，你一定把演讲稿准备好！”我整个四月份主要是起草发言稿。我过去演

讲只有提纲、没有详细讲稿，好在去年在浩然营、今年初在台湾陆委会的演讲，他们都传真来根据录音整理的文字稿。台湾人办事周全没得说！我在这两个讲稿的基础上充实提高，完成了一篇三万字的《中国政治体制浅论》。

1991年5月初由夏威夷飞行十几小时抵达美国东海岸，3日至5日参加三天研讨会，并在最后一天发言。《世界日报》连续三天、每天对会议皆有详细报道，5月6日的报道称“前中共中央组织部组织人事研究所所长阎淮讲‘中国政治体制的特征’。”

会后出版了《从五四到河殇》一书。（苏晓康主编，风云时代出版有限公司，台北，1992年。）全书30多万字，收录了研讨会27位演讲者的全部发言和所有问答，并把27人的姓名作为作者全部印在此书的封面上。关于我的发言，部分内容简介如下——

1989年冬季，苏联和东欧巨变，朋友们预期和希望中国也迅速变化。我当年在法国预言，中国不会巨变。不幸而言中，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我这篇论文三万字，今天只讲主要内容。

一、政权结构，党政军三个系统，中央、省、市、县、乡五个层级。

二、体制特征：1、一党专政、党管一切，2、中央集权、领袖独裁，3、官本位制、等级森严。

三、统治特性：1、经济低效性与政治高效性，2、领袖脆弱性与政权稳定性，3、政局突变型与政体渐变性。

四、民主化进程：1、继续改革开放，2、扩大党内民主，3、社会团体自治，4、工会青年团妇联独立，5、民主党派改造，6、结社自由，7、新闻自由，8、结党自由。

中国政治体制的特殊性决定了民主化将是漫长而艰巨的历史进程。民主政治是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必在中华大地实现。



1991年5月，在从五四到河殇研讨会上发言。

讨论中，有三人向我提问，我都予以正面回答。

陈奎德在《从五四到河殇》一书的附录“普林斯顿会议评述”中，如此评述我的发言：“阎淮先生通过剖析中共的组织结构及其功能，探讨了中国政治体制的特征。他的讲演使人们对中共那一套等级森严的、官本位的、高度集权的党天下，有了更真切的具体而微的了解，并激发了部分与会者把这套系统与中国政治传统结构进行比较研究的兴趣。”

我印象深刻的场景：

在以汉语进行的会议中，仅有的两位白人发言者格外引人注目，欧拉夫大学包瑞车用“近乎油滑的北京腔”（苏晓康语）随口而出的“摸着石头过河”和“醉翁之意不在酒”等中国俚语，让台下的数百华人听众惊叹不已；普林斯顿林培瑞的发言就像单口相声，引来阵阵笑声。世纪末在纽约、新世纪在洛杉矶又多次欣赏林的京腔乡音。

5日上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变形”专题讨论中，阮铭褒胡耀邦是最后的自由民主派，贬赵紫阳没有“人的自由和解放”的思想。同在主席台上的吴国光不同意他的看法，两人争论，阮铭激动。坐在他们之间的我，打圆场说:“胡赵都非常优秀，但也都有历史的局限。”阮铭的脾气一发不可收拾，哭着站起要走，我拉不住，他径直离开会场。事后听冯胜平说，他那天路

过，看到阮铭坐在马路牙子上痛哭，说吴国光把他赶出会场。

柴玲第一天带条大狗到会场，引起众怒，后两天狗狗消失，影响犹在。

被边缘化的民联前主席王炳章在提问时，屡屡长时间发表个人政见，主席制止无效，台下听众多次嘘他。

陈奎德在评述本次会议的最后，总结道："虽然它有不少名重一时的教授学者参加，但应当说它却并非一个对某专题进行纯学术客观研究的会议。因为有些发言者并非某一学术领域的专门家。但是，重要的是，他们却可能是不少专门家研究的对象，一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历史，不会离开方励之、刘宾雁、柴玲、陈一咨、苏晓康……这样一些名字。而这些人，都是会议的发言者和积极参与者，这就赋予了它另一层的意义。这次会议不仅仅是有关研究历史的回忆，同时它本身就构成了历史。"我认为这次会议也是普林斯顿中国学社历史上的主要亮点。

会议期间，与中国学社的所有新老朋友多次聚会，与张郎郎等几位北京101中学的同学叙旧。会后蹭朋友汽车到纽约、坐火车去华盛顿、乘飞机游克利夫兰和洛杉矶。在美国东、中、西部几个城市的重要大学图书馆和国会图书馆查阅复印资料，理所当然地顺道访亲拜友，其中现在失去联系的有（按见面先后）：宦国苍、阎焱、曹长青、程抱全、陈嘉映、严力、黄江南、赵重光、金岩石、武克刚、贾浩、吴仁华、顾晓阳、李欧梵等；受到他们的款待，在此一并感谢！5月底回到夏威夷。

10-4 "六四"两周年学术研讨会

1991年3月，在中国历史反思会议圆满结束后，我向杜维明建议：在今年召开一个"六四"学术研讨会，纪念八九民运两周年。杜欣然同意，会议筹备组就是论文审查组，由杜和我分任正副组长、中心的几位汉学家和夏大学自联主席为组员；文化所办公室准备会议的行政后勤事务。4月底我们完成了论文审定，发出邀请函。5月我到美国本土参加普林斯顿会议和考察近一个

月，27日回到夏威夷就投入会前最后的紧张准备工作。5月31日和6月1日，在中心大礼堂召开了两整天八九民运两周年学术研讨会，通过论文审查参加会议的外地学者有：苏晓康、万润南、吴国光、朱嘉明、谢幼田、许思可、何频等人。25周岁的何频，最年轻，又是上述学者中我唯一的陌生人。他创办了加拿大《新闻自由导报》，看问题敏锐深刻，因论文有深度而被邀请，我们一见如故成为忘年之交。此后在新加坡、纽约、旧金山、洛杉矶，我们多次相聚成为挚友。与会学者评论：世界著名的美国官方学术机构召开纪念“六四”的学术研讨会，可谓绝无仅有空前绝后！



1991年6月，夏威夷“六四”研讨会后游览合影。前排坐者左二为苏晓康，右三为吴国光，右四为朱嘉明；后立者右一为曹长青，右五为作者。

第二节 与美国国务院有关的两次闭门会议

10-5 美国国务院请我“讲课”

我在普林斯顿研讨会发表的演讲，虽然如前所述被会议的重要组织者陈奎德，高度评价；但是由于会场上政治明星如云、学术大师密集，因此我并未被重视；散会后，也很快被数百与会者遗忘。但是，旁观的有心人却发现了，动手开矿挖宝。冲击波，一波强过一波地向我袭来。朋友说：“是金子总要发光！”我答：“臭豆腐必然散味！”

第一波：中国留美政治学会，邀请我作为演讲嘉宾出席1991年8月，在美国最西南的旅游胜地加州圣迭戈市召开的年会。这些博士后和博士前们，听完我的演讲，都说："老美的中国问题专家对中国的研究，在你的论文面前就是隔靴挠痒；你若去那些智库，他们就没饭吃了。"会上，遇到陈一咨等许多"三所一会"的朋友，大家欢聚一番。会后，吴国光、张阿妹和我租了一辆车，游览圣迭戈市郊和邻近的墨西哥蒂华纳市。

第二波：台湾《中国大陆研究》，1991年8月期全文刊登我的《中国大陆政治体制浅论》。此前6月，主办该杂志的台湾国际关系中心的宋国诚听说我的演讲，向我约了这篇稿。这个在台湾、乃至整个海外最权威的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学术期刊，发表我三万字没有一个注释、没有一篇参考文献的所谓"学术论文"，实属例外。在我的论文后面，该杂志以《中国大陆研究》月刊编辑委员会的名义，写出"编者按"："本文虽缺少详细的参考书目和注解，与本刊之论著体例略有不符，惟因本文具有相当之原创性，仍编入论著部分以飨读者。"此后，台湾学者研究中国大陆问题，经常引用本人此论文。



1991年8月，中国留美政治学会会议之后，作者（右二）与吴国光（左一）、张阿妹（右一）游览墨西哥。

第三波：《当代中国研究中心论文》，以我的论文作为其第十期（1991年8月）的唯一文章出版。1990年在美国成立的当代中国研究中心，陈一咨为执行主席，余英时任学术顾问委员会主任，董事会阵容更强，有费景汉（董事长）、黎安友、沈君山、许倬云、苏绍智、邱宏达、谷梅。以上董事会九人中六人与我很熟，主事的陈一咨又是哥们，该中心甫成立就把我拉为研究员。该中心出版的中文和英文的论文集后来又分别刊登我的几篇文章。1992年，台湾桂冠图书公司出版的、李少民主编的《中国大陆的社会、政治、经济》一书，又收录了我的这篇论文。一如既往，朋友们苦心经营的书刊，历来是他们不给、我也不要任何稿费。

第四波：美国国务院请我“讲课”。

5月普林斯顿会议后，我访问华盛顿时见到乔治•华盛顿大学的贾浩，他也听说我的演讲，索要全文，欲翻译成英文发表在他主编的英文不定期刊物《中国报告》（China Report）上。我欣然答允。贾浩寄来1991年8月出版的第二卷第四期，A4大小的刊物上只刊登我这一篇翻译成英文的论文。看不懂，不知道翻译得如何；几个留学生办的小杂志，我也没在意。孰料，小刊物竟能直达天庭！它改变了我今后几年的生活轨迹。据说世界上用中文者多达14亿，而用英文者仅仅4亿，但不幸的是：英文主宰世界！

1991年9月下旬，我突然接“SAIS与美国国务院联合会议”的邀请函。

SAIS（保罗•尼采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Paul Nitze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简称）在华盛顿的著名智库中独树一帜，其研究成果影响美国政府决策乃至经常被政府采用。SAIS拥有布热津斯基、福山等资深研究员，走出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财政部长盖特纳、世界银行行长埃因霍、冰岛总理哈尔德、荷兰外交部长柯恩德、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等杰出人才。

美国国务院中国科的隆先生电话我：“国务院看到您关于中国政治体制的论文，了解到您在欧洲时对中国不同于苏联东欧的看法。请您来华盛顿为我们讲课和解答疑问，我将是您翻译——耳朵和嘴巴，您是与会者中唯一不讲英文的。国务院提供您：每天一千美元的出席费、商务舱机票和五星酒店住宿，以及在华府的一切应酬和交通费用。”

1991年10月7日和8日，我出席在华盛顿SAIS大会议室的闭门会议。会议英文文件上注明（隆先生翻译成中文如下）——

会议名称：中国政治进程与苏联东欧的比较

会议目的：厘清已知与未知的中国政治体系，根据背景资料和会议讨论，比较中国与其它体系，以便对关键问题提出观点。

背景资料：陈一咨的《政治改革的流产》（未参会），两位美国学者的论文，阎淮的《中国政治体制浅论》。

与会名单：24人，每位的职务、简历及论著。

首日会议

9时，美中关系协会主席等三人对背景资料的开场评论

10时,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和哈佛费正清中心主任：中苏异同比较

11时，国务院亚太处长和《纽约时报》华盛顿站长：美中异同比较

13时，台湾国统会委员（后任外交部长）田弘茂和美国教授：中台异同比较

14时，李湘鲁和国务院亚太助理国务卿及情报事务副助理国务卿：首日会议的结论陈述

15时，圆桌讨论：研究中国的学者之任务

上述议程，说明“苏东波”后，美国官方对中国的关注和期望。上述六

个单元，都是主题发言40分钟，讨论20分钟。隆先生为我同声翻译，主持人征求我的意见时，我说明天一起讲。

次日半天会议，就只是我的戏了。

首先简单介绍我论文的构思，其次详细论述中国与苏联东欧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十余个方面的不同，随后是对中国前途的预测和展望、包括民主化的路线图，最后我说：“我可能见不到中国的民主化了。很抱歉！我对中国形势的悲观判断让诸位失望了！”主持人说：“去年您在德国见证了柏林墙倒塌，预见中国长城将纹丝不动。现在苏欧剧变快两年了，果然如此！”随后的讨论相当热烈，提问者都先介绍自己的身份，有两位未介绍，根据他们佩戴的名牌，在名单中我查不到他们。翻译小声告诉我：“他们是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的专家。”参加会议的还有：苏绍智、丁学良、贾浩和陈小平，他们都是我的朋友。

这两天的会余时间，我分别宴请在华盛顿的几个未参会议的老朋友，这些朋友中一直保持联系的是原空军首长的两个千金高艳艳、高丽丽姐妹，近20年来我们在北京经常聚会。第一天到汉宫中餐馆吃北京烤鸭，第二天到高级西餐馆吃牛排，出租车接送；尽情“挥霍享受”，狠挖了一下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墙角。

此外，1992年3月12日午前，夏威夷中国论坛邀请我作题为《中国的未来》专题讲座。中国论坛是夏威夷大学教授、著名华裔汉学家郭影颐在1978年创立，每月一次，坚持十几年从不间断，在夏威夷颇有声望。讲座在豪华的枫林阁酒店举行，讲座结束是丰盛午宴；几十美元的入场券，一售而空。我也小有财务斩获。

第五波：新加坡最高当局，邀请我去定居和工作。1992年春节刚过，就接到新加坡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邀请我去访问研究三个月，这也是我论文英译本的功效。4月我先顺道旅行观光日本十余天，5月至7月在新加坡访问学者

三个月，签定长期工作合同。8月回夏威夷，在东西方中心一个月，扫尾结束美国两年的研究工作，准备移居新加坡长期生活工作。

10-6 中国政治制度与权力机构研讨会

1992年6月，接到加州大学全球冲突与合作研究所（IGCC）所长谢淑丽（Susan Shirk）的邀请函。请我准备论文，参加8月的中国政治制度与权力机构研讨会。IGCC的最新动态是：2016年6月，与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共同在北京举办第26届东北亚合作对话闭门会议，包含北韩在内的“六方会谈”各国代表团团长出席此对话会，因此被称为“迷你六方会谈”——可见IGCC非等闲之辈。



在菲律宾前总统、独裁者马科斯的棺材前。摄于1991年6月，夏威夷。

1992年8月27日和28日，中国政治制度与权力机构研讨会在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召开。会议通知说明——

一、研讨会主题：中国权力组织的正式结构与非正式结构，及其关系的分析。

二、研讨会内容：

1、领袖们个人在权力机构和重大决策中的作用

2、各党政机构和咨询单位在权力结构和决策过程中的作用

3、领袖们如何使用党政机构或受其制约

4、领袖们如何得到和使用各种信息或受其限制

5、领袖们之间、党政机构之间，如何交换意见和平衡关系

6、领袖们如何建立和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

7、社会力量通过什么渠道或方式，影响高层权力关系和重大决策

三、研讨会人员：

1、在中国党政机关担任要职或者参与重大决策的前官员，根据自己对中国政治制度与组织结构，以及重大决策过程亲身经历或观察的具体事例描述，重点是事实细节。

2、受过西方政治学训练并对中国政治深入研究的学者，对前一部分人所描述事实的评论，重点是理论分析。

我详细罗列上述条目，是试图让感兴趣的读者知晓：“现代”政治学（我不用所谓的“西方”政治学——东西方是地理概念，不应该运用到学术领域。正如没有东方和西方的价值观，只有陈腐和普世的价值观。）是“如何通过”以及通过“哪些人物”和“哪些方面”的个案分析，对不透明的中国顶层政治状况尽可能得出比较全面和科学的论断；同时，对此研讨会有概括性的了解。

我与在中国共同从事高层经改和政改、在法国并肩筹备民阵、在德国和美国多次一起参加学术会议的老朋友、前中共官员：体改所所长陈一咨、政治学所所长严家祺、马列所所长苏绍智、中央党校室主任阮铭、中共十三大报告执笔者吴国光、体改所室主任程晓农六人又集聚一堂；但是我们在海外共同回忆和反思国内的高层运作，却是空前绝后、绝无仅有的唯一。我们七人论述了各自在中国高层的工作和亲身经历的典型事件，及其在政治学上的

普遍意义；彼此补充和评论，美国的政治学博士们偶尔提问和点评；回忆津津乐道、评论头头是道，讨论热烈、气氛融洽。我在中国领导的组织人事研究所首先提出了建立国家公务员的构想，得到赵紫阳的首肯，被吸收进中共十三大报告中，本书前面第六章已经详细叙述，会议组织者请我就这个专题发言。

“六四”后在海外新结识的父辈新朋友、香港《文汇报》前总编辑金尧如，是与会最长者，破例没提交论文；他讲的故事从建国前到文革后、从台湾香港到大陆海外，时间跨度大、空间地域广，事件繁多、趣味横生。我听得津津有味、意犹未尽，却被会议主持、圣大政治学博士生赵穗生屡屡打断，要求精炼内容和加强理论性；气得老爷子大发脾气，指责赵的无理。我支持金继续讲述，但性情中人的他，已怒火中烧扬长而去，退出会场。我劝阻无效，只能陪伴老人家在休息室喝咖啡。会后出版的论文集中亦无金尧如的文章。散会后我即远赴新加坡，永远失去向老前辈再次请教的机会。后得知是金尧如父子见义勇为铤而走险、协助许家屯离港赴美，更加敬佩。许家屯晚年孤居洛杉矶，我与金公子建一（金尧如为纪念“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为子命名，可见其爱国之深。）经常探望照顾许，成为朋友；并一起参与料理许家屯后事，在葬礼上共同为许扶棺移灵。

参加会议的理论评论员，有两位重量级的美国女学者。东道主谢淑丽是绝对有资格被称为“中国问题专家”之人，她是1971年第一批去到中国的美国人，见过中国历代领导人；曾经担任克林顿政府的国务卿助理，主管中国事务。会议首席评论员李可柔（Carol Lee Hamrin）博士，历任美国国务院专家25年，荣获“国务卿终生成就奖”。此外还有几位华裔政治学家。会议工作语言当然是中文。

28日闭幕晚宴后，李可柔约我到咖啡馆聊天。我们讨论了许多中美政治问题。最后她说：“你在这次会议的发言——中国建立公务员的决策过程非

常有意义，作为我们将来出版的《会议论文集》中重要的一篇。但是整个会议缺乏对中国政治体制的全面论述和海外非常关心的‘干部管理问题’。我对你去年10月在华盛顿为美国国务院的讲课印象深刻，可否请你把那个三万字的内容压缩到五六千字，正好补充这次会议的缺陷。”我当然义不容辞地答应。世纪末，我申请美国“第一优先”的杰出人才绿卡，通过律师得到她的推荐。1992年后，一直未见其面，在此一并感谢！

29日是星期天，下午阮铭的内侄女夫妻从洛杉矶开车来接姑姑和姑父，我们一起到圣迭戈大学西边的天体海滨浴场。在一片白茫茫赤裸裸的美国泳者中间，五个黄种人勇敢地投入其中，裸泳在太平洋西海岸。随后我蹭他们的车回到洛杉矶。

1992年9月，我回法国更新旅行证件，10月赴新加坡开始“新”的五年工作和生活。

1995年，李可柔主编的英文书籍《Decision Making In Deng’ China一Perspectives From Insiders》（《邓小平时代中国的决策过程一一内部人士的视角》，M.E.Sharpe, Inc.出版社，纽约，1995年。）在美国精装出版。因我不懂英文，该书寄我后，即被闲置。世纪末返美，在哥伦比亚大学清华校友会，某政治学博士说：“您就是这本我们必读的最重要参考书的最重要作者呀！”但这仍未引起我足够的重视。现在为写这本回忆录，才首次借助朋友翻译，阅读此书。

该书扉页上，在书名和编者下面，特意注明“作序者A.Doak Barnett”。我少见多怪：何方神圣，写个序言也值得上扉页？一查，不得了，原来是鲍大可！《百度百科》：“美国当代中国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毕生致力于中国研究。撰写大量的学术论著，为世人留下丰富而宝贵的学术遗产。尼克松改善美中关系的推手。”写此序言之后四年，他不幸逝世，终年仅78岁。鲍大可在序言首句，就开宗明义：“这本非同寻常和极其有价值的书由于以下

原因是非常特殊的：中国作者都是1989年天安门危机前，在党和政府内具有相当重要的职位；对中国的政治体系和政策制定有非常近距离的深刻了解；在80年代最初的改革中起过积极作用。这本书为我们从全新的视角了解中国，提供了非常可贵的、有价值的贡献。”最后，鲍大可断言：“本书讨论的重要问题，将成为很长时间内的核心问题；不但对中国领导人，对其他必须了解中国的各国决策者都很重要。它对理解中国政治体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极有价值的贡献。”

此书中，收集了出席研讨会的我们“中国前官员”七人共八篇“实务性论文”，其他六人每人一篇，只有我一人两篇。（还收录一些专家学者的“学术性评论文章”。）李可柔在“导论”中，高度评价了我的第一篇论文——《中国的体制结构和干部管理》，四次指名道姓地引用我的论述；“导论”中两次介绍我的第二篇论文——《中国公务员制度的建立》。

第三节 在夏威夷结识的人物

10-7 文化中国项目的同事

叶丹，中国科技部局长、1991年在中心任访问学者半年。我们都是80年代的干部子弟改革派，在国内彼此知晓；到美国更是亲如手足相见恨晚。政治观点雷同、性格脾气投合、处事方式类似。真是他乡遇故“知”、立马结为好友，经常畅谈彻夜、旅行结伴。半年同事、终生知己。1993年叶丹到新加坡访问，给不能回国的我，带了许多“参考资料”。1994年我初次返乡，送他当时在国内私人少有的传真机。此后阎叶两家结为“友好家庭”，往来频繁。1997年中组部培养近期升任省部级的后备干部，要求在45岁至50岁之间；别人因为超龄遗憾，叶丹却因太年轻而落选。这一年不幸罹患肺癌，我每次回国都到肿瘤医院看望一直保持乐观开朗的他。1999年仅45周岁的叶丹英年早逝，令我悲痛不已。



1992年8月，东西方中心同事为作者（左三）饯行，坐者左四为郝平，现任北大书记。

郝平，北京大学学生处副处长、一年的访问学者。优秀青年干部的典型，待别人热心、对自己委屈。例如：一老外“非常热情”地教中国女博士开车，郝善意提醒女生：“他有老婆。”立即遭致白眼：“我早知道！”又例如：文化中国的项目助理、台湾人建议我们都起个英文名字。郝平立刻响应：“我叫彼得。”我立即反对：“远至邓小平、近到杜维明，皆无英文名！”我早已放弃“不损害己之尊严和人之利益”两不损害的看人标准，只要不损害别人利益，只损害自己尊严无所谓。况且郝平经常损己利人，我们在夏威夷一直是好朋友。我与叶丹预测郝平将来前途有亮。1992年他访问学者结束后，经过不屈不挠的努力破例转读硕士。回国后逐步进步为北大副校长、教育部副部长，日前衣锦还校荣任北大书记。

曹长青，原《深圳青年报》副总编，发文“拥护邓小平退休”，邓未退而他被休！1988年赴美，1989年投身民运。1991年夏他到文化所任短期访问学者，我们因经历相似观点相近，而成为朋友。曹准备次年报考硕士，想延长在文化所的访问期，以保证具有较好的学习和生活条件。我向杜维明提出后，得到批准。（曹和太太康妮，1992年夏双双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硕士。）我太太和独子秋天来夏威夷后，阎曹两家自然是中心内关系最密切的

模范朋友加友好家庭。1998年，分别六年后我到纽约工作，与定居那里的曹、康互访连连。

10-8 东西方中心的朋友

刘宾雁，1984年在作家协会四大上认识，海外多次共同参加各种会议。1991年8月，我去机场接来刘和太太朱洪。此后三个月，工作上我们算是文化所的同事，生活上我略尽地主之谊，在衣食住行方面提供协助。世纪末我离开新加坡重返美国，第一时间到普林斯顿的老年小区拜访宾雁夫妻。

顾秀林，中心资助的博士生。前文提到，我与中学和大学的哥们顾逸东之父、思想家顾准全家极熟，夏威夷见到顾二小姐，确是他乡遇故知倍感亲切。通过她，我联系到顾准幼子顾重之，他在夏大硕士毕业后，在此地作会计师。重逢秀林的最大收获是看到《顾准文稿》的打印件。六十年代耳闻目睹顾准的片言只语和零星作为，确感不凡。现在拜读其遗作惊为天人，思想的深刻深邃、见解的超前超越，令我振聋发聩、顿悟震撼！2011年我重游夏威夷，9月11日邀请博士后的秀林，在中心的附近共进早餐。她告诉我，几小时前纽约世贸大厦被撞毁。饭后我们去中心，发现被全副武装荷枪实弹的军队封锁。原来布什总统命令美国所有的联邦机构立即军事戒严。我对秀林说：“恐怖分子攻击美国一千个目标，也轮不到东西方中心——这话别翻译，请告诉他们我是前雇员，想故地重游。”军人看过我的老工作证后，押着我一人进中心大楼。秀林回国工作后我们仍保持联系，尽管观点相左。



1991年8月，在夏威夷接待环保学者梁从诫（右）。

金秋，中心资助的硕士生，吴法宪幼女。她宿舍门上贴着剪切报纸的标题“北京的金秋”，引起我的注意。我们成为朋友后，她对我说：“我只是海外几万中国留学生、东西方中心赞助的几百中国学生之一，但却是林彪死党黄吴李邱的子女中，唯一出国者。我现在学习历史，将来一定要还林彪事件及其牵连者以历史真相；我的硕士和将来博士的论文题目就是《文革中的林彪事件》。”新世纪，历史学教授金秋说到做到了，在此领域确有建树。

汪丁丁，中心百余名研究人员中唯一的中国青年，过去共同的政治和文化背景、现在相同的研究员身份，使我们接触和交流较多。此后我们再无接触，但我一直关注他的学术成就。

10-9 夏威夷大学的师生

郭颖颐，历史系教授、在多种“海外著名汉学家名册”榜上有名。对我颇多照顾，如上述1992年请我在他的论坛上举办讲座，使我名利兼有小得。我到新加坡方知郭是新加坡大学的外国“博士考评委员”，因此每年我都能在新招待他，略尽地主之谊、聊报美国之助。

王策，本名王左峰，政治系博士生，虔诚的基督徒。温州人氏，移民西班牙，负笈美国。刻苦钻研民运理论，周末经常毕恭毕敬找我“请教中国政治问题”。我诚惶诚恐“不敢当”后，切磋良久。左峰博士毕业后返回欧洲，成为职业民运领袖兼民运理论家。1998年夏我重游欧洲，他在西班牙家中接待我，说他准备去中国，向当局面交“民主过渡建议书”，我劝他慎行。孰料秋天他竟冒险回国，被捕并判刑四年。次年，我在美国参加声援王策座谈会，略尽朋友之义，《世界日报》有报道。他出狱后继续从事民运理论研究，2014年他出版巨著《中国共和宪政之路》。

梁从诫，梁启超孙、梁思成子，环保专家。1991年8月梁从诫来夏威夷，

受朋友之托我接待数天并陪同他游览整个火奴鲁鲁全岛。与梁交谈，上了几天环保课程，对环保有了全新的认识，从此树立了全方位和全天候的环保意识。

第十一章 新加坡二号人物请我进他的智库

——新加坡东亚所（1992～1995年）

第一节 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概况

11-1 研究所的历史沿革及其领导

东亚哲学研究所

1983年，新加坡仅次于李光耀的第二号人物、兼任教育部长的副总理吴庆瑞，认为儒学重要，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在新加坡国内简称“国大”，为让新加坡之外的读者阅读方便，下文简称“新大”）校园内的一栋独立的小楼里，建立了研究儒学的东亚哲学研究所（IEAP），此所独立于新大。

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

1984年，吴庆瑞在兼任部长的教育部，与小他20岁的下属潘瑞良博士产生婚外恋情。李光耀壮士断腕，恭请吴在官场与情场中，二选其一。吴庆瑞毅然选择爱情，因而退出政坛。随后吴与前妻离婚、和潘结婚。我在新加坡期间，多次享受他们伉俪的公私宴请。1985年吴担任中国经济顾问六年。

1991年底，辞去中国顾问的吴庆瑞，认为研究现实的中国更现实。遂改哲学所为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IEAPE），亲自专任理事会执行主席。政经所斥巨资遣散哲学所聘请的国内外儒学专家，招聘旅居海外熟悉中国上层运作的学者型官员为研究员；把数十万册儒学书刊赠送新大图书馆，大量购置和订阅中国境内外的政治和经济类书籍和报刊。政经所是新加坡内阁对华政策的最高级内部智库，没有公开出版物，只为李光耀等人“打小报告”。我戏称其为“新加坡的书记处研究室”。1996年，香港大学原校长王庚武接替健康状况日益下降的吴庆瑞，担任政经所领导。研究范围逐步扩大、研究成果

部分公开。

新大东亚研究所

1997年吴庆瑞把政经所划归新大，全称改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它是完全公开的、纯粹学术性研究机构，研究人员全部换成欧美的博士。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历时五年半，完成其历史使命而寿终正寝。

1992年春，我应新加坡政治经济研究所（简称东亚所）邀请，由美国夏威夷东西方中心去作三个月的访问学者。5月抵新加坡，东亚所副所长等二人接机。令我惊讶的是：未接我去旅馆，而是直接把我送到研究所附近的一个家具齐全的三室两厅两浴的公寓房。她们说："这就是研究所为你在取得新加坡永久居民前租用的住宅，日常生活用品我们已经购置齐备。"我想：这是让我在新加坡安营扎寨呀！你们怎么知道我会喜欢这里？

5月5日，我开始上班。先拜会黄朝翰所长，首先感谢他近几个月，为我来新加坡所付出的辛劳。特别讲法治的新加坡，外国人入境、居留、工作，表格众多、手续繁琐；而我又是持法国政治庇护的旅行证件，徒增波折。黄说："吴庆瑞看了你的著作，说'这个人真懂中国政治，无论他在世界上什么地方，一定给我弄来！'他的一句话，我们跑断腿。我也只是履行职责而已，不必言谢！"

我久闻新加坡的廉洁，煞费苦心购买了精致的《夏威夷风景》图片册，赠送黄所长。他双手接过沉甸甸的画册，说："感谢您送'我们所'的精美画册！"我以为"老港"的他，没听清我的国语，便字正腔圆缓慢地重新强调："这是赠送您个人的礼物！"他"黄顾左右而言他"，不接我这话茬。中午所长赐宴。下午参观所里恢宏的图书馆时，在"新到图书"的书柜里，赫然陈列着《夏威夷风景》一书，已经贴了编目编号、盖着东亚所藏书印章。第一天，我就被上了深刻的廉政课和生动的效率课！这就是新加坡！暗下决心、告诫自己："在浪漫的法国和舒适的夏威夷混了三年、自由散漫

'大不吝'（北京话，什么都不怕、都不在乎之意）的你小子，今后在东亚所这儿，可得老实点！”

黄朝翰（JohnWong，1939—）香港中粤英三语人才、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博士，1971—1990年新大经济系教授。从其专业背景和教学经历，可以判断出他对中国政治问题的认知水准。黄待人热情，但难免有港人对陆客、英国洋博士对中国土学者、威权主义者对中国民主追求者的“正确偏见”。我们彼此的专业和经历毫无交集，经济学他是权威；在讨论中国政治时，我就像博士后启蒙他这个文盲。而我的长处正是新加坡内阁和东亚所的急需和极需。由于吴庆瑞的重视，黄对我表面尊重和客气，但是内在的矛盾不断；尤其我当选为“康乐会”（实质的工会）主席后，不断为中国学者争取正当权益和应得福利时，这种小事吴主席不屑过问，惟黄所长定夺，冲突难免表面化。黄在国家二号元首手下当所长，无权决定任何重大事务、名高实低的落差使他偶尔或经常情绪起伏波动。黄太太简丽中时任卫生部高级政务部长，内阁中仅有的女部长；众人说，这是黄能任东亚所所长的唯一因素。对此我无法判断，但是部长肯定不会将我所的机密数据外传，这对保密确有益处。

5月6日，按照事先安排，我被吴庆瑞主席约见。我问候：“吴主席好！”他立即纠正：“不许称主席、副总理或部长，只能叫博士！”（以后五年中，我和所有见过的新加坡人都称他“吴博士”。当然，中国来宾都尊称其前官衔。）吴拿着我那本成名作《中国政治体制浅论》、36页A4（中国叫16开）大小的英文小册子，翻了几页。我看见上面被用不同颜色的记号笔几乎涂满了，文章的上下左右还有许多批注。他针对我的文章提了几个疑问，我简捷作答。他接着与我讨论了中国当前的政治局势，最后说：“邓小平要中国学习新加坡，我们新加坡政府就需要更了解中国。每周三我和李光耀共进午餐，我们对你的论文和你本人，都非常感兴趣；认为你是最了解中国的官员型学者。我们想请你在这里长期工作，可以按常规先签两年的合

约。”我说：“感谢您和李资政对我的重视！（新加坡人正式场合都尊称李光耀为李资政，私下当然直称其名；我们中国人更是继承中华传统，叫老李。）不是三个月的访问期吗？容我再适应和考虑一下。”

吴庆瑞（1918-2010年）是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博士，1951年与李光耀等创建人民行动党，独立后任新加坡副总理；在国家不同时期最需要的领域，先后兼任财政、内政、国防、教育部长、金融管理局主席。被誉为“新加坡经济发展之父”和“解决困难问题专家”，维基百科称其为“新加坡国父之一”。1985年应邓小平邀请，担任中国政府经济顾问。吴担任东亚所主席期间，几乎每天上午都来上班，所里的人事、学术、出差、接访等重要业务性决定，事无巨细都要他批准。黄所长只是他的行政助理而已。我在所三年，撰写的二十几篇论文，皆是他出题目（有些他说是李光耀提出的题目），甚至还事先列出提纲；而对我的初稿逐句审查，每次都要提出详细的改进意见；我多次修改最后才能通过吴的审查。对某些重要的文章，他还写上“编者按”。曾在东亚所工作的赵紫阳公子赵二军说：“吴庆瑞对研究所学者所写的报告要求严格，不管是针对文体或格式而言，甚至是标点符号。”（新加坡《联合早报》2010年5月15日）

吴不懂中文，我们之间的所有的重要交流都是通过是余柱业翻译的。

余柱业（Eu Chooi Yip，1918-1995年），吴庆瑞在新加坡的大学同学、同龄人、政敌兼好友。1948年至1965年，余是地下的马来西亚共产党在新加坡的第一把手，1966年赴北京，任马共驻中国副代表。1969年毛泽东批准在湖南益阳四方山设立马来西亚革命之声电台，余担任领导。1981年电台停播，1991年他在吴庆瑞的帮助下（真够朋友！），取得李光耀的特赦，返回新加坡，任东亚所唯一的高级研究员。他是中英双语天才，我与吴庆瑞的所有重要交流都是通过他口译，我的重要论文都是经过他笔译。因为我的文章最多，所以我们接触最多、关系最好。他只比家父小一岁，早年革命经历和

晚年历史反思都很相似，也与我有类似的心路历程，因此我非常敬重他，一直尊称他“余老”。父亲1994年来新，与他长时间恳谈。一般人知道他的共党历史，经常好奇打问。他总是说：“这都是过去时的事情了，没有什么，不值一提。”但余对我谈了许多革命经历。1995年8月他病重住院，我多次探视看望。他去世当天，我虽已离开东亚所，仍去医院告别遗体，次日参加火化仪式，送他最后一程。他晚年口述历史《浪尖逐梦——余柱业口述历史档案》于2006年出版。

11-2 东亚所的中国研究员

李湘鲁，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上，赵紫阳的李秘书与中组部的阎代表初识，相谈甚欢。其后近十年接触不断，友谊日深；此时在东亚所再次相逢，他乡遇故知，格外亲切。他向我详细地介绍了东亚所内外各方面的有关情况。兴奋之余我了解到李个人在新加坡颇为不顺的波折经历。起初吴庆瑞许诺他任东亚所副所长（我在美国即有耳闻），1992年李来新后办公室门上挂着“副所长”牌子；孰料一周后，门牌突然由“副所长”变成“高级研究员”，没有任何解释。我事后听说，李光耀因怕中国政府不悦，欲改任他为理事；又有内阁部长反对，认为政府的研究所不应该有外籍人士担任理事。而东亚所本不拟设高级研究员，唯一的“高级”只授予吴庆瑞的同学好友、相当于我们父辈的余老。在各方为难的僵局相持半年后，李湘鲁激流勇退毅然离去。1993年1月他退掉租房搬来与我同住十天，离开新加坡赴香港发展。随后他在中国和香港经商，非常成功。1994年后我每次回中国，他只要在国内，我们必聚餐畅聊直至现在，当然大部分是他抢着破费。

邹子婴，父亲邹鲁风（1910-1959年），曾任辽宁副省长。在北大副校长任上，因右倾被整肃而愤然离世。子婴北大经济系毕业、厉以宁高足，原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干部，后任农业部长何康的秘书，文笔与见识皆属上

乘。对六四“镇暴”有看法，放弃既得利益、毅然离开体制。因为与吴庆瑞在中国任顾问时相识，故成为东亚所最早的研究员。在新加坡，共事三年，所内挚友；离所两年，（新加）坡上密友。后在美国旧金山、中国北京每年必聚，友谊至今。



结识28年的挚友赵二军夫妇，最近一次在北京家中宴请作者后合影。

杨沐，原社科院工业经济所副所长，中国和英国双料博士，自牛津来东亚所。我们1984年在莫干山会议相识，回北京后共同参与青年企业家联谊会活动，在美国加州浩然营又相处一个月。老朋友新加坡再共事，分外亲切；我们的专业互补，他在经济学上对我的指教，令我受益匪浅。我在新加坡五年期间，清华和交大两个名校“老五届”文革大学生的情谊不断。我们三十多年的友谊延续至今，尽管如今政治观点不尽雷同。

赵二军，1993年1月17至20日，我在法国结识的好友赵二军（因“六四”移居巴黎），到东南亚办事，途径新加坡旅游四天。我应义不容辞地担任陪吃、陪住、陪玩的“三陪”。恰巧那几天吴庆瑞要与我讨论修改他让我为新加坡高级官员讲课的教材。15日我请余柱业代我向吴请假，被拒。次日我拉上余老，不经预约直闯吴办公室。我说：“吴博士，我在法国落难时的穷朋友难得来新加坡，现在蒙您照顾我发达了，不能不管穷哥们！”吴庆瑞：“什么朋友这么重要？”我：“他不愿意张扬，为请假我就说吧，赵紫阳的

二小子。”吴：“怎么不早说！我作中国顾问时，赵紫阳对我很好；现在他落难了，我应该照顾他公子。你刚来还没买汽车，借给你一辆车，好好陪陪这孩子！”

我与二军除了游玩“名胜新迹”外，吴庆瑞还安排新加坡贸易发展局局长杨胜德，陪同我们参观东南亚最大的开发区裕廊工业区；让新加坡港务局阮国伦局长，带领我们访问名列世界前茅的港务局。19日晚，吴庆瑞夫妇隆重宴请二军，我作陪。席间，吴对赵紫阳及其亲属的境遇极其不满和非常同情。当了解到二军做些小生意，学法语的太太在巴黎箱包店打工时，吴说：“你们来新加坡吧，待遇和阎淮一样好！”1993年5月，二军夫妻和女儿举家移居新加坡。二军被聘请到东亚所与四家新加坡大公司合营的新中投资贸易公司任职。“六四”前，坊间盛传二军倒电视发大财。二军在法国的窘况自不待言，到新加坡后一家三口曾住我家，后租两室一厅的单元房，其中一室还被房主堆放货物。他们的女儿就读法国学校，费用较高，因此经济较紧张，一直没有汽车。而同期，另一位正国级的儿子，刚来新加坡，一次用现金就买下海滨高级私人别墅和高级轿车。多么鲜明的反差和对比！

另外还有两位学习法律和外贸专业、没有官场背景的研究员，以及几位作辅助工作的研究助理。从以上主要研究人员的阵容，可以看出新加坡领袖对研究中国的重视，以及从世界各地招募聘请我们的良苦用心。

郑永年，1995年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获政治学博士，随即在哈佛做博士后。同期新加坡东亚所转型，开始招收欧美博士。1996年夏，好友吴国光给我打来越洋电话：“学弟郑永年拟去东亚所。他去前请向他介绍情况；抵新后，拜托多多照顾！”秋天郑来到新加坡，我驾车载他寻找住房、购置生活用品；遵朋友之托，尽地主之谊。12月31日晚，单身的我在家里向饭店订菜送到家，宴请我已离开一年多的东亚所的全部中国学者及家属18人，共同辞旧迎新，郑是三位单身赴宴者之一。1997年春节郑太太来新，郑家宴请同

事，我春节后从中国返新，2月22日他特意补请我。我们共同在新加坡期间，学术和友情交流频繁。97年底我离开新加坡前，互相宴请则是最后的惜别。我一直关注郑进步，直至他任新大东亚所所长，经常对中共小批评大辩护。眼下，我们彼此观念的差距与地位的差距同样巨大。

第二节 1992至95年撰写的主要论文

11-3 《中国秘密文件研究》引起轰动

因为我没有允诺长期在新加坡工作，吴庆瑞一方面向我提出留在新加坡的优厚待遇，另一方面希望在三个月中交出更多论文。吴说李光耀最关心中共中央组织部的运作，他一口气提出三个有关论题。这些于我，都是轻车熟路信手拈来，在5月和6月先后完成新加坡最想了解的《中国如何选拔高级官员》（下节再介绍此文）。

《中国建立公务员制度的决策过程》：一、组织人事研究所的组建，二、公务员制度的研究，三、中央决策的过程；五千字，无注释，完全是我的亲身经历。

《历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简介》：主要介绍我在中组部期间的宋任穷、陈野苹、乔石、尉健行、宋平和吕枫六位部长的来龙去脉；五千字，23个注释。

7月1日上午吴庆瑞约谈我，开门见山：“你来东亚所两个月了，关于今后的工作考虑得怎样？”我回答：“这里的研究条件很好，东亚所的图书馆中文数据非常丰富，中国的中央和地方的报刊众多并且非常及时，对不懂英文的我特别有利；给我的待遇也非常优渥。我准备8月回美国结束东西方中心的工作，9月去法国更新旅行证件和完税，10月回到东亚所正式工作。”吴非常高兴：“你的三篇关于组织和干部方面的文章，内阁反应很好。最近世界各国媒体对中国的‘红头文件’议论纷纷，谁也搞不清来龙去脉和详细内

幕，李光耀很关心。请你在走前的这个月，完成关于中国秘密文件全面介绍的论文。”我全力以赴及时完成了任务。

《中国秘密文件研究》，提要如下：

作者研究了海内外公开发表的中国的三千多份文件，结合本人经历撰写此文。中国的秘密文件，分为正式文件、动态简报、参考数据三大类。

正式文件：党政军机关发出，对下级单位有约束力的规定通知和首长讲话，是共产党的方针政策的主要载体。论述中共中央文件、国务院文件、中央军委文件、联合文件、各部委省市文件的主要内容、重要程度、发放（级别）范围、年发数量。重点分析最具权威的红头文件——中共中央文件。

动态简报：党政军职能部门对上汇报情况、对下指导工作、平级互通信息的简报通讯。以中组部的《组工通讯》、中宣部的《宣传动态》、公安部的《敌情动态》为例，论述动态类文件的内容、功能、形式和密级。

参考数据：新闻机构向各级领导反映国内外信息的秘密刊物。主要介绍新华通讯社的发至中央首长的《国内动态清样》、地师级的《内部参考》、县团级的《内参选编》。

最后论述秘密文件的传递（同城的“文件交换”和异地的“机要通道”），传达与阅读（中央首长、省军级、地师级、县团级等四个级别、以及特殊部门的不同情况）；还有文件的保密与失密状况。

我用20天时间，完成这篇二万字、109个注释的论文。吴庆瑞特别满意，并转达李光耀等内阁首长的谢意。

《中国秘密文件研究》作为东亚所内部保密文件上报新加坡内阁，但是消息还是逐步外传，美国和台湾方面不断约稿。一年后，吴庆瑞批准解禁，可以公开发表。

台湾《中共研究》月刊，1993年8月以此为在“特载”专栏中的唯一论文，其编者按称：“作者据其经验，研阅几千种中共秘密文件，撰写此文。文体虽不类本刊论著体裁，然内容详实。引注广泛，甚具参考价值，特为刊载，以飨读者。”我问该刊编辑：“何为‘不类’？”彼答：“大陆文体不类台湾体裁。”台湾的大陆研究专家杨开煌在《台湾“中国大陆研究”之回顾与前瞻》中说：“台湾的中国大陆之出版品中，时间最早、持续最久、具有相当权威之杂志，是《中共研究》。”该杂志社每年的《中共年报》都收集百余份中国文件，我参考的秘密文件大部分来自它，注释中近半数也是它，因此我让它发表此文。尽管与我关系密切的台湾《中国大陆研究》（我访台时曾与之学术交流，也刊登过我的“成名作”《中国政治体制浅论》。）也约此文，我婉拒，答应以后送稿。当时的另一个私心考虑是：我的第二篇重头论文，不能与成名作发在同一刊物上，避免给人以“搭顺风车”之感。

美国《当代中国研究中心论文》1993年12月刊登此文，同时，其英文版也刊登该文英译本。此后这篇论文便被不断引用。

11-4 吴庆瑞因我在报纸刊文而动怒

7月进入了下半年，1992年秋天将举行的中共十四大世界关注，我奉命撰写《中共十四大系列文章》：

之一、举世瞩目的中共党代会；

之二、代表的产生与功能；

之三、中央委员的预测分析；共八千字，无注释。

我在中央组织部亲身经历和参与了中共十二大和十三大的一些准备工作，这方面的文章对我又是小菜一碟，在撰写重头的“秘密文件”的同时，顺手完成了对十四大的分析和预测。

既然我同意在东亚所长期工作，将来就是东亚所人了。于是吴庆瑞就在

我交出“秘密文件”修改稿的次日，安排我公开亮相。7月24日我在东亚所举行题为《中国政治体制浅论》的讲座。这就是我在美国撰写的成名作的主要内容，在美国国务院和中国学者政治学会、台湾陆委会、夏威夷东西方中心，早就被我讲烂了，但是对新加坡的学术界和新闻界却是刚出炉般的新鲜。次日新加坡最大的华文报纸《联合早报》在“新加坡要闻版”左上角的头条位置刊登题为《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访问学者阎淮：中国政治体制具特殊性、民主化进程漫长而艰巨》的没有记者署名的报道，全文约1500字，较详细地概括了我演讲的主要内容。标题旁边是我的大头照片。要闻版次条新闻是《武装部队推行健康生活运动》仅仅几百字的报道，右下角照片的说明是：“李显扬准将正在试用检查血液的仪器”。东亚所同事说：“你的大头是李光耀儿子的四倍！”

7月底我交出关于中共十四大的系列文章，东亚所为我订购8月5日返回夏威夷的机票，我准备打道回美。

8月4日到东亚所告别，走到余柱业的房间，他匆忙地说：“吴博士正找你哪！”我说：“只想与同事告别，没敢打扰他。”余把我拉到吴庆瑞的超大办公室，吴递给我当天的《联合早报》，对我大发脾气：“为什么不经过我批准，擅自在报纸上公开发布文章？”我一看，在该报周末“天下事版”一大整版刊登了我署名的《中共十四大举世瞩目》文章，它的的三个小标题分别是：一、历次党代会回顾；二、十四大的议程；三、十四大筹备工作。文章前面黑体大字的提示语是我文章的最后一句话——“邓小平希望1997年7月到回归后的香港巡视，我也希望那时他还能参加秋季的十五大。但十四大是他所能主导的最后一次党代会了，因此格外引人注目。”（果然邓小平在1997年2月寿终正寝，没能主导十五大）我看了报纸后释然了，对吴庆瑞说：“请息怒！我给您拿一样东西看。”

时间回到7月下旬。7月24日，我在东亚所的讲座，《联合早报》的总编

辑参加了。东亚所过去也为本所的研究员和来访问的中国学者举行过半公开的讲座，该报社派记者采访后，整理的稿件价值不大，不能采用，因此不再报道。这次黄朝翰所长向与他关系密切的《联合早报》总编辑林任君吹风：李光耀和吴庆瑞都对阎淮的文章非常感兴趣。于是林总编就亲自来听，果然有点意思，就照了张相片。讲座比较成功，黄所长一高兴，临时决定请我和几位贵宾吃饭。饭桌上林总编对我说："演讲很精彩，可否给我讲稿，我想详细报道。"这就是为什么，当天夜里总编辑带我讲稿回到报社，凌晨就能发出长篇报道，而且没有署名。席间，林总编还从黄所长处得知我正在撰写有关中共十四大的文章。7月31日周五，我上班最后一天的下午，秘书送来一封传真信——"黄朝翰所长：据闻贵所阎淮研究员正在撰写有关中共十四大的文章，可否将不敏感部分，赐我报公开发表，以飨读者。联合早报林任君拜托"。黄所长在信上批示："阎先生，我意您十四大系列文章的第一部分可以发表，我已传真至早报。黄"——我收拾好所有的文件数据，锁门，钥匙交到所办公室，回家收拾行装，准备打道回美；随后的三天各路旧雨新知为我饯行。离开新加坡的前一天，兴致盎然地回东亚所最后惜别，却被吴庆瑞当头一棒。

我回到办公室取了黄朝翰批示的传真信，呈送吴庆瑞。吴粗通中文，对我转怒为笑："误会你啦！今后对外事务，一律要经过我批准，其他任何人说了不算！祝你回美国、回法国旅行和办事顺利，尽快回到新加坡，我们还很需要你。"吴庆瑞对我的误会顷刻解除，黄朝翰却认为我给他上了眼药，与我结下了梁子。事后听说，吴庆瑞对黄朝翰雷霆震怒；并且为此在东亚所专门下达正式文件："全所雇员，一律禁止对外擅自接受采访、发表文章，除非得到吴博士的事先批准。"

1992年8月初，我回到夏威夷，结束在美国东西方中心的工作。8月底赴加州圣迭戈参加第十章提到的中国政治制度与权力机构研讨会。

9月中旬飞抵法国。我有效期两年的中国因公护照，因为中国驻法国和美国的大使馆不给更新，已过期作废。我只能持法国的“旅行证件”周游列国，赴新加坡前要再把它延期两年。在美国任访问学者，免联邦所得税，只交夏威夷州税；我希望在各国都有良好的完税记录，因此还需要缴纳法国的所得税。10月中旬，这一切在巴黎完美解决后。10月21日应民阵主席万润南邀请，到其总部作题为《论新加坡》的演讲。我详细论述了新加坡各方面的状况。在回答“中新比较”的问题时，我把民主与自由的有无，“二维四相”粗略地概括我都曾生活过的四个华人社会：香港（殖民地）无民主、有自由；新加坡（新权威主义）有民主、无（少）自由；台湾皆有民主与自由（初级阶段的）；中国皆无。我还谈了对刚结束的中共十四大的看法。巴黎《欧洲日报》10月24-26日的周末版，在“国际要闻版”以《中共十四大人事凸显三特色》为题，题目下面黑体字的提要是：“阎淮：避开六四敏感问题、枪杆子仍是中共的命根子、排除太子党进入高层”用了七八百字较详细地引述了我的“十四大三特色论”。

11-5 三年二十余篇论文创东亚所记录

1992年11月，我返回新加坡开始了在东亚所三年二十余篇论文的写作工作。此前5至7月，撰写的上述五篇论文分别成为黄色封面的《东亚所背景资料简介》（Background Brief）的40至43和45号文件，上报新加坡内阁。在东亚所各种不同密级文件的封面和正文的首页，都印有下列文字：“限阅文件，仅供内部使用。未取得本研究所批准，此文件的任何部分不得出版或引用。”

其它重要论文还有——

《中国最高领导层新格局》

1993年3月中国的人大和政协两会结束，完成了由1992年十四大开始的最

高层党政领袖新布局。李光耀迫切需要了解中国新领袖层的状况，我在4月写出论文，论述新领袖群的五大特点：

一、江泽民兼任党政军一把手，地位更加巩固；二、第三代领袖全面接班，集体领导形成；三、红色技术官僚领导国务院，专家内阁建立；四、实权人物掌管人大和政协，民主与法治企图加强；五、从两会新动向，看中国政局新走向。全文1.2万字，28个注释。6月刊登在只发到内阁核心成员的灰色封面的《东亚所讨论文件》（Discussion Paper）15号。同时期，《背景资料简介》已出到50号，可见《讨论文件》是少而精。由于密级高，作者不署名，只标明“我们特殊的通讯员”（Our Special Correspondent）。

《中共高层在“八九民运”中的幕后斗争——论天安门事件久拖不决终成惨案之原因》

1992年底，吴庆瑞说：“李光耀非常想了解天安门事件的内幕和真相，你要认真写好这篇文章！”我1993年春写出初稿，夏天经过与吴庆瑞多次讨论与修改，终于在1993年10月刊出。全文7500字，16个注释，7本参考书籍。文章刊登在只发给李光耀个人，李可以批送他认为应该看的人的棕色封面《东亚所评论》（Commentaries）第6号。此前两年多，《评论》只出五期，可见其稀有珍贵；此时，我才知道东亚所有此最高密级的文件。这篇论文当然还是署名“我们特殊的通讯员”。我在中文的前言中说明：“本文根据笔者当时的亲身经历和见闻，以及大量有关史料，按照时间顺序，将事件分为：悼念耀邦、学生罢课、广场绝食、戒严镇压四个阶段，依次论述分析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吴庆瑞让黄朝翰所长把我千余字的前言，以黄的署名和语气，作为“序”放在正文前。在我的二十篇余论文和见到的同事论文中，有序的非常少见。东亚所保密严格，每人只能得到自己撰写的英文论文刊物，但同事们都愿意与我交流，故我能看到别人的论文。离职时，刊物文件必须全部交回，我因被李光耀批准去《海峡时报》，破例带走刊有自己文

章的刊物，保存至今。

《赵紫阳在十三大前后政治改革的勇敢尝试》

这个议题也是新加坡领袖们关注的问题。我用3个月写出近2万字、50个注释的长文。1994年7月以《东亚所背景资料简介》67号发出。在前言中，我说明："本文根据笔者当年亲身参与的经历为主线，以有关史料为辅证，着重分析中共十三大政治改革的来龙去脉。"

《论中国的腐败》

按吴庆瑞的要求，我从腐败程度、当局对策、制度根源、改革建议四个方面论述。具体建议是深入改革：1、启动全面政治改革——不敢贪，建立隶属于人大的反贪机构，制定严厉可行的《反贪污法》，公检法垂直领导、相对独立，出台《新闻法》。2、彻底市场化的经济改革——不能贪。3、加速行政改革、"中薪养廉"——不必贪。4、改革道德建设——不想贪，摒弃陈腐的"大公无私"和"全心全意"的意识形态说教，加强伦理操守和职业道德教育。论文以"展望"结束："在人治的中国，道德性和运动性反腐不能节制贪腐，今后腐败仍将猖獗。但腐败不足以威胁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

这篇2万多字、百余注释的论文，吴庆瑞非常满意，让扩大阅读范围、发到各大企业；于1994年10月以密级最低的《东亚所背景资料简介》73和74号分两期刊出。吴在接待来东亚所的中国客人时，多次提到我的"四项改革建议"；他还告诉我，有关建议也向中国方面转达。但是，结果不得而知，结果可想而知！

《中国军事系列论文》

拥有300万解放军和100万武警的中国军队，是世界上最大、但并非最强的武装力量，新加坡政界和军方都很关心。我奉命撰写系列论文：之一、中国军队的组织结构；之二、江泽民掌握军权的过程；之三、中国的武警部队。共计2万字、63个注释。在1994年，分别以《东亚所背景资料简介》76、

79、88号刊出。

其它有特点的论文，下面结合有关内容再逐一介绍。

我在东亚所三年，共发出论文20余篇，比全所平均水平高出一倍多。特别是密级最高的《东亚所评论》，我到所后，只出8期，就有我的4期。只因在中国封闭的金字塔社会中，我侥幸接近塔尖，掌握较多信息而已。黄所长在1991年为装潢门面招聘的北大教授，满腹经纶无处发挥，半年发不出一篇论文，向我诉苦。我释疑：“若在饭馆，您风味厨师必有顾客。但这是‘御膳房’，皇上不好您那口。没辙！只能另寻高就。”他后来去与中国来往的大公司任法律顾问，凭借谙熟中国法律，人尽其才风生水起。

第三节 吴庆瑞对我的重视和优待

11-6 吴庆瑞破例为我写序

我在东亚所的第一篇论文、李光耀和吴庆瑞最关注的《中国如何选拔高级官员》。全文共六个部分：一、三千万干部的概况；二、党管干部和分级管理；三、中组部的职责和机构设置；四、青干局的建立和工作；五、第三梯队与后备干部；六、选拔省长部长的程序。六千字，20个注释。1992年8月5日以《东亚所背景资料简介》40号刊出。

极少为他人作序的吴庆瑞，破例为我写了署名“执行主席（Executive Chairman）吴庆瑞”的满满一页A4纸的长序。主要内容是：

“在20世纪的今天，如何统治一个拥有11亿人民的大国？中国三千多年有记载的历史，在传统的君主体制下，以严格的科举制度、严密的文官制度为基础，所提供的行政服务，为此提供了答案。中国过去是农业社会和君主体制，科举和文官制度为大多数的王朝年代，提供了统一、和平和稳定。

在科学和工业化的时代，老旧体制需要被新生体制所取代，中国选择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这篇论文详细地描述了政府内部机构的运作细节。核心

问题是如何管理控制11亿人民和三千万干部。

中国是依靠非常复杂的多层级的机构和功能来实现的。控制运作的权力掌握在党的五个层级的组织部手里——中央、省和部、市、县、乡镇的党委组织部。在控制机器的最上层是中央组织部——号称‘天下第一部’，那里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要概括这个论文是很难的，因为它已经非常浓缩精炼了。对我们来说，特殊的兴趣是青年干部局。青干局的任务是识别‘第三梯队’，也就是中国未来的领袖们。他们寻找有才干领袖的功能，同我们新加坡的目的是一样的。但是他们的努力更加系统化和更加持久化。有超过一千位雇员，全年在各层级的青干系统中工作。

在中央，青干局多数成员是高级干部的孩子。但是在中央组织部这个保守的堡垒中，青干局最终获得改革者和异端的荣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青干局是保守派首脑陈云提议，在1982年成立的。

作者阎淮，毕业于清华大学，1982年被调到中央组织部，成为青年干部局的处长。1986年，阎是组织人事研究所所长。1989年，他离开中国，从香港去了欧洲和美国。现在他是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读完上述序言，当时的感想是——我的这篇论文，使吴庆瑞对我另眼相看；吴的这篇序言，也使我对他刮目相视。吴虽不懂中文，但中国经济顾问的差事没白干。他真懂中国！不但谙熟中国经济，也精通中国政治。我以后写文章、发议论，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吴庆瑞的挚友余柱业，为我翻译吴的序言时说：“吴博士为你作序，是对你和你的论文都非常重视，他这是正式把你介绍给新加坡高层。他写序言，就相当于在中国，陈云为人作序；你应该珍惜，写出更多更杰出的论文！”

11-7 请《经济学人》采访报道我

1992年11月，我刚回到新加坡，吴庆瑞就让我接受《经济学人》杂志采访。他说："你在新加坡的学术地位已经确立，但是在世界上、尤其在英文世界，还很不够。《经济学人》是世界上最有影响的政治经济学术期刊，它的采访报道对东亚所和你个人都大有益处。我们东亚所虽然没有公开的出版物，但却是公开的研究所，需要让世界知道：我们拥有第一流的中国问题专家。《经济学人》赞扬了你，也让内阁那些不懂中文的部长们，了解你的价值，更好地学习你的论文报告。"11月5日，《经济学人》亚洲记者陆浩怀（Jim Rohwer）飞赴新加坡采访我。

1992年11月28日的《经济学人》，在"中国观察"栏目下，以《活着的死亡国家》（Land of the living dead）为题，对我进行两整页的报道。以下是简要内容：

第一部分：领袖来、领袖去、党仍在

首先介绍了我是前中共中央组织部官员、现任新加坡东亚所研究员。然后详细引述了我的成名作《中国政治体制浅论》中，政治结构、体制特征和统治特性三节的主要内容；对"统治特性"：经济的低效性与政治的高效性，领袖的脆弱性与政权的稳定性，政局的突变性与政体的渐变性，尤其是后两条特别重视，详加解释。

第一部分的最后，是他们采访我的新内容：中国与苏联、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的差异：1、中共经济改革成功——深得人心，苏共政治改革成功——人心不足。2、中国四分之三是农村，农村改革成效显著。3、中国不存在另一个权力中心，经过戈尔巴乔夫六年的政治改革，已形成叶利钦的第二中心。4、中共已失去理想、唯一关心的是保权；邓小平对苏联解体的反应是加速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以取得统治的合法性。我认为它初见成效，必将长期（并非永远）有效。

第二部分：共产党与资本主义社会这部分是我对中国当下的判断和未来的预测。改革开放14年，专制统治已经缓解；百姓在迁徙和择业方面自由度扩大，户口和档案制度松懈。中共在向市场化方向进展，现代的经济体系将削弱共产主义体系；但它不会立即发生，保守官僚还可以长期享受专制特权。与中共同样采用苏联方式“治党”的国民党，用15年开始党内民主并逐步社会民主；中国迟早要走这条路。中国将在政治的“共产主义统治”与经济的“资本主义发展”中抉择，在中国的投资，风险与回报共存。

《经济学人》关于我的这篇文章，对我日后申请美国“第一类杰出人才”绿卡（EB－1A）帮助很大。EB-1A要求在十条严格条件中中须符合三条，世界著名出版物的报道即是其一。

半年后，1993年6月22日陆浩怀又来到新加坡，在香格里拉饭店，我执意买单。我说：“上次您说杂志不许接受采访对象宴请和礼物，以免报道过溢不实之嫌。这次你没有采访任务，我尽地主之谊。”我们相互感谢上次的采访和报道。他说：“邓小平要中国学习新加坡，而新加坡领袖在学习东亚所、特别你的论文。我这次完全是个人讨教中国问题，不会报道。”我放肆地议论了中国与新加坡的优劣。

11-8 让我给新加坡高级官员讲课

1993年1月，吴庆瑞让我三月为新加坡高级官员讲授“中国政治运作”的课程。吴为我四次讲课出的题目是：中国的政治结构；共产党对全国的领导；中国的等级制度；邓小平后的中国。

2月我交出讲稿，吴庆瑞修改增删；在我保存的讲义底稿上，现在还能查到吴红笔的痕迹。例如，以下引号内是吴庆瑞的修改——

中国的乡镇“类似新加坡的单一选区”。

中国的部委设党组，“这与新加坡完全不一样，人民行动党对政府部委一点影响都没有”。

“中国不实行内阁制，人大常委不能当部长。中国宪法规定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使其成为中国唯一的、永恒的、法定的执政党。强调唯一、永恒、法定。”

中国领袖的脆弱性，“政治继承问题的不确定性”。

中国是官本位制，“中国无阶级有等级”。

中国给予领导干部优厚的待遇。“新加坡只有十几个部长有专用汽车和警卫员。在座的都有切身体会。”

从吴庆瑞以上的修改中，可以看出中国与新加坡的某些差异。

3月8日，在吴庆瑞监督下，我在东亚所彩排试讲。9日下午，在新加坡总理公署内管理公务员的公共服务署的小礼堂，我为几十位高级公务员开讲。吴庆瑞致开讲辞，他介绍了我和这个课程。我接着讲了一下午。公共服务署随后收集反映，周末前反馈给吴庆瑞，下周一吴指示我改进意见。周二下午，我再讲下一节课。我连续讲了四次，共一个月，反映很好。

我的讲义及所附图表，收录在1995年由新加坡时代出版集团出版的、丹尼斯•布拉德沃尔斯主编的英文版《在中国投资的风险与回报》一书中。

吴庆瑞还让我每个季度到安全情报局讲课一次，因此与他们的许国丰局长（新世纪先后任几个国家的大使）和陈金土处长（九十年代中期任驻华政务情报参赞）成为朋友；他们要每月发我一千元车马费，我拒绝；陈说许多中国学者都收了，我坚拒。我还不定期到外交部政策分析局答疑解惑，接触较多的是：三处（东亚澳洲处）处长谢德强（新世纪任驻上海总领事）、中国科科长方月光（新世纪成为反对党领袖）、日本科科长黄毅、泰国科科长谭永信等。

在新期间，他们都对我有不同程度的帮助。例如——

1993年8月9日新加坡国庆，在政府大厦大草场举行庆典活动。我和太太被邀请到贵宾观礼台上，观看声势浩大的游行和精彩纷呈的多元文化歌舞表

演。1994年又再次观礼。1995年我去中国出差，1996年回北京看望病重的岳父，没再观看。

1993年8月巨星迈克杰克逊的世界巡回演唱会到新加坡。二军的女儿是“迈粉”，非常想亲眼目睹偶像尊容、亲耳聆听偶像歌喉，但一票难求。我只好麻烦经常为他们答疑解惑的外交部朋友。他们千方百计弄到门票，已来不及三传到位，只好越过我和二军，由他们在体育场门口直接交给女孩。

1994年妹妹陪父母来新，恰逢英国艺术团来演出音乐剧《悲惨世界》，票极贵且难买。许国丰局长赠我四张贵宾票，父母不愿看，我与妹妹及二军夫妻享受了。

其实我心里明白：这一切都是看吴庆瑞的面子。

11-9 安排我公开讲座和发表论文

因为对中国官场熟悉，除了使我在回忆型论文上得心应手外，对现实局势的判断和未来走向的预测，也经常蒙对。

例如，1993年两位研究员去中国与体改所合作，工作半个月。回来汇报：朱镕基兼任央行行长，出台一系列强硬措施，得罪各方、天怒人怨，肯定下台。吴庆瑞问我。我说：“肯定不会！”

再如，1994年9月中共十四届四中全会“决定增补吴邦国、姜春云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十几个字谁人不识！什么意思？东亚所讨论时，有人说：“上海市委书记和山东省委书记工作优秀，予以提升奖励。”多数人不解。我分析：“二位已是政治局委员，地位高过书记处书记，过去未有此类任命。现总理李鹏无能，第一副总理朱镕基急需得力助手。吴与姜应是调到中央分管工业与农业，但政治局委员不能直接插手国务院工作，有了书记处书记的名义，便可施展身手。明年三月人大肯定任命二位为副总理！”事态的发展验证了我的预测。

三如，吴庆瑞经常让我们分析得到的中国绝密文件，因为中央组织部管

理省部级干部，所以我可以看到同级文件，而其他同事则机会不多，因此我的解释更被吴庆瑞欣赏。（题外话：我在国内看到的省军级文件中，有些重要数字被用XXX代替。但是我们在这里分析的文件不但非常及时、并且重要数字全部保留，只是把文件编号覆盖。我认为：这是新加坡高价买通了中国高级官员、或其子女或秘书所得到。我真恨这些吃里扒外的高级蛀虫。）

吴庆瑞还破例容许举行公开讲座和发表解密论文——

《论中国的价格改革》

1993年中国通货膨胀严重，将达到可怕的两位数。当年中国改革重点就有“加快价格改革”。新加坡非常关注此事，让我论述价格问题。这是我的弱项，趁机学习新知识，研究大量数据。写出一万五千字，54个注释的论文，10月发出。吴庆瑞说：“你每年应该在公开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以保持学者的身份和地位。去年写的《秘密文件》发表后，反应非常好；这篇《价格改革》也可发表。”于是两个月后，台湾《中国大陆研究》12期，刊登此文。94年春台湾寄来稿费，我上交所里，不收。4月18日，我请全所同仁大吃一顿。

《中国的公务员制度》

1994年中国开始实施《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这是我的专业，写出八千字20个注释的论文，6月发出。吴庆瑞认为，这更是可以公开的课题，论文稍后可以公开发表。于是《中国大陆研究》八月号刊登此文。论文在新加坡学界引起一点影响，吴庆瑞又让我于9月在东亚所举行半公开的学术讲座。

《从今年人代会看邓后政局》

1995年春人大召开，中国宣称，这是第三代领导全面接班后的首次人代会。吴庆瑞立即布置我写这个专题，我用半个月写出七千字、22个注释的论文。吴非常满意认为很重要，4月用密级最高的《东亚所评论》第13期，发送李光耀。李阅后，认为与新加坡高层观点相近，应该公开宣传。吴庆瑞立即

安排我于5月5日在东亚所举行公开的“中文讲座”（区别1994年的学术讲座），并通知媒体采访。当天东亚所的会议室坐满听众，室外的走廊也挤满站客。

次日《联合早报》“新加坡新闻版”的头条新闻，标题《江泽民地位巩固、在邓后能续掌权当政》，副标题《东亚所研究员阎淮：江人际关系好，已树立权威》。标题下面是我演讲的照片，新闻报道两千字记载了我的主要观点。

11-10 特许在英文媒体发文和接受采访

1995年4月，陈云逝世。我对吴庆瑞说：“过去你们要请陈元来，有人说我们熟，我不愿揽事，只说认识，其实我与陈家关系不错。现在陈云去世，我请求公开写文章悼念。”吴：“应该写！人死了不算吹捧，在英文报纸发表，影响更大。”于是，在新加坡华文报纸发表文章被吴误骂的三年后，又被他批准在媒体发文了；还是被翻译成英文，发表在具有150年历史的《海峡时报》上。4月21日该报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刊登我署名的《陈云：最后一位正统的共产党领袖》。摘要如下——

一、马克思原教旨主义卫道士

本世纪正数第五年降临、倒数第五年逝去，陈云与世纪整整同行了90周年。20世纪的历史就是一部社会主义的兴衰史。世纪上半叶分别由列宁、毛泽东创立的西方与东方两个社会主义制度，世纪下半叶被戈尔巴乔夫在政治上、邓小平在经济上瓦解；戈和邓作为改革家将名垂青史。而真诚维护共产党在政治上的纯洁性、经济上的计划性的陈云，则因其始终如一的正统和稳健的卫道士的角色定位，被视为保守派统帅。

在中共领袖中，真正精通、信仰、而又奉行马列主义的人，唯有陈云。世界上最后一位虔诚、纯粹、正直、温和的马克思原教旨主义领袖的逝世，标志着一个理想主义时代的终结。

二、冷静稳健的非主流派

中共建政四十多年，影响最大者，前27年是毛泽东，近20年是邓小平。而影响时间最长、40多年一直被当作对立面者，非陈云莫属。陈云反对主观盲目的大跃进，被毛斥为“老右倾”；陈云不支持特区政策和市场经济，被邓认为“保守派”。先右后左，变化的不是陈云，而是“领导核心”及其主张。

陈云40年一贯制，坚持计划经济，强调综合平衡。一向是冷静、稳健、温和、中庸的非主流派；是极端倾向的缓冲器、是中国经济、乃至中国政治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毛泽东的经济主张曾被两个人反对。元帅彭德怀以其热忱和鲁莽，企图毕其功于一役，客观上适得其反，加剧了经济和政治局势的恶化。经济学家陈云以冷静和科学的态度，多次反对毛，力挽狂澜，收拾残局，利国利民。

三、深谋远虑一身正气

毛泽东时代是个人独裁的极权时代，邓小平时代是元老寡头专制的威权时代。陈云的威望、水平都可以与邓分庭抗礼，他抑制了邓可能产生的独裁倾向。

密捕“四人帮”之义举，天下大快无人质疑。但是陈云却提出：此事是先作组织处理、后有政治结论，与党章不符；动用军事手段，后患无穷，下不为例。

天安门事件后，整肃改革派，中顾委不让李锐等四人“党员登记”，企图清除出党。陈云闻讯，保护此四人过关。尽管陈云与他们观点相左，但此举传为佳话。

对陈云的政治观点和经济主张，可以见仁见智；但其为人正派、淡泊名利、洁身自好，有口皆碑。（中国领袖仅娶一妻、“从一而终”，极为罕见。）腐败蔓延的今日中国，则更难能可贵。

行文至此，传来陈云遗愿：不举行追悼会和遗体告别。死后又为国库节省巨额民脂民膏；这对于先行者，如天安门广场的纪念堂，形成鲜明对照；对后来者，不无警示效益。正如中共讣告所言：“堪称楷模”。此举为陈云艰苦朴素的一生，为其高尚的精神人格，画下圆满的句号。

东亚所研究中国问题，讲座基本是中文；对其报道是华文《联合早报》的领地，此前它曾多次出现过我的名字。《海峡时报》发表此文后，这个英文媒体开始关注我了。总编冯元良1995年4月底宴请我，希望我多对该报发表时政看法。我说：“身不由己，吴庆瑞不容许！”冯持李光耀令箭找吴，吴最终批准我可以用化名接受采访。此后，《海峡时报》经常出现“中国政治分析者江安”（我生于江苏淮安）对政治局势的分析和预测。

11-11 我离开东亚所后吴的照顾

1996年我离开东亚所到《海峡时报》后，吴庆瑞还经常约我回东亚所咨询中国局势和“证实证伪”新加坡通过特殊渠道得到（买到？）的中国情报。其间较大型的公开动作有两次。

其一、分析1996年的人代会。4月人代会结束后，吴庆瑞让我为东亚所分析本年度人大的特点。我5月交出六千字、30个注释的论文。因为我已离开东亚所，不知他们以何种文件上报内阁。6月我去东亚所查阅数据，新任所领导王庚武转交我一千元支票，说是吴庆瑞让给我的稿酬。我领情、拒钱。

其二、吴庆瑞又安排我举行公开大型讲座——《江泽民在邓后的地位》。讲座的海报和通知上，我的职务是：“东亚所客座研究员、海峡时报高级分析员”。东亚所从未有过“客座”，我也是首次得知此殊荣。东亚所

说："吴庆瑞因你婉拒支票，特意赐客座。"此后，我名片上和"论文作者"前，从不敢注明这个兼职不兼薪的"无酬客座"。我的讲座共分五个部分：1、江的新问题；2、邓后非毛后；3、形势比人强；4、牢固掌军权；5、善终总书记。

1996年6又9日，《联合早报》"中港台新闻"版，以《江泽民牢固政治地位、将持续到下个世纪》为标题，用一千多字报道我的讲座。主要内容有——

"《海峡时报》高级分析员、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阎淮，昨天在东亚所举行的讲座上作如上判断。上个月，美国助理国务卿洛德和台湾总统李登辉都表示，邓小平去世后，中国政坛可能再次发生类似毛泽东之后的政治动荡。去年，美国五角大楼历时数月、耗资数百万美元分析邓后局势，其结论是，中国发生大乱的可能性为50%。

阎淮否定这种看法。他说，现在的中共领袖之间没有势不两立的冲突，在毛后非常时期采取特殊措施不会再次发生。

邓小平的接班人胡耀邦和赵紫阳都蒙羞下台。因此，外界一般认为，被指定的接班人没有好下场，江泽民也不例外。

阎淮说，在邓小平晚年的现在，江泽民已赢得了有利的形势，这已经使他的七年任期超过胡和赵两人任期的总和；他说，'邓后，江的形势更加有利。'

一、元老势力微弱，江的务实稳健路线受到多数元老支持；二、十四大后，江地位的正统性和合法性得以确立和巩固，政治对手失去挑战机会；三、形成以'上海帮'为基础的江派势力，牢固了'江核心'地位。

江泽民是否能控制军队，一直被外界质疑。上个月，李登辉对美国报界说，'江泽民身为军委主席，却无法控制军队。'

阎淮列举大量事实，认为'不是强人的江，正以强人的姿态牢固控制着

军队，并在邓后继续掌握党政军大权，顺利过渡到21世纪。’

座谈会上，来自新加坡、大陆和台湾的学者，对江泽民在邓后的地位发表各自的见解，有的学者还对阎淮的分析提出质疑。但阎淮坚持乐观地认为，江泽民将成为中共有史以来‘首位善终的总书记’。”

对于这场讲座和对它的报道，我有两点说明：

一、东亚所在新大校园内，听众主要是大学的中国教师、即欧美的博士，与我非友人即熟人，讨论中他们直率质疑——上述报道说“有的”学者质疑是客气，其实“大部分”是质疑。我最后回答：“我的预测和判断确实与各种美国和台湾的权威机构和权威人士、以及在座的诸位不同，但我的演讲没有主观愿望和价值判断，主要是事实判断和基于个人经验的常识和逻辑。我无法说服朋友们，让我们存疑，等待时间的检验。”

二、《联合早报》的报道是该报新进青年记者杜平（来自中国，也是朋友），下午听完讲座、当晚撰写。我的演讲只有提纲没有讲稿，杜只用一千多字就把我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都报道出来，确实水平可以。我离开新加坡后，一直未再见面。杜现在香港凤凰电视台担任评论员、主持“总编辑时间”。尽管我与被誉为“中国央视分台”的凤凰政见不同，但是仍为杜平的成就而欣喜。

第四节 江泽民发护照，吴庆瑞给绿卡

11-12 险些丧命的摩托车祸

新加坡汽车奇贵，动辄十万美元以上！亚洲人尤其华人，消费攀比、面子金贵；你有车我无车，怎么活？新加坡地寡人众比较富裕，很多人可买车。吴庆瑞解释：“若不限制，新加坡国土上，就只有汽车，而无车路了！”限制一、150%的汽车进口税，加上其它合理的“苛捐杂税”，车价升为三倍；限制二、公开拍卖十年拥车证，证到期，或车报废、或重新拍证，

通常拥车证高于车费。

都说需求是刚性的，享受只能升不易降；即“由简升奢易，由奢降简难。”在美国舒适的夏威夷开惯私家车，到北纬一度炎热潮湿的新加坡挤无空调的公车确实不适。1992年底刚到新加坡没有绿卡，不敢轻易斥重金买豪车。马来西亚工人骑着摩托车越境打工，日出而来日落而归，风驰电掣好不潇洒！国内骑单车，海外开汽车，也该过过“电驴子”的瘾啦！于是1993年初，几千美元一部高级摩托车到手，笔试路考顺利通过，上下班加周末游，轻松上路分外得意。在研究所和大学的中外学者教授中，“蝎子的巴巴——毒（独）一份”，格外亮眼！

90年代初期，新加坡的中国人较少，只是两种人：白领专家和蓝领劳工。周末穿T恤短裤凉鞋、说着普通话去加油，衣帽取人的加油工爱理不理，还赠送几句褒贬中国劳工的咸淡话。付款时看见白金信用卡，顿时表演川剧“变脸”。我笑言：“捡的卡！”

补充交待家庭状况：儿子留在美国读夏威夷大学，妻子不喜欢新加坡，常年仍是中国煤炭部的高级工程师，偶尔来此探亲。因此，摩托车足够了！家庭不用朋友用——东亚所宴请中国访客的餐会，陪吃的同事，宁愿放弃所长的“大奔驰”而抢着坐摩托二等。节假日朋友聚会，我更是义务司机。1993和1994两年，来新的私人朋友，从中国的局长到民阵主席，从天安门总指挥到朋友的中学生孩子，都乘过此座骑。最经常的乘客是赵二军不满十岁的女儿，新加坡朋友请我们时，她绝不坐高级轿车，非摩托不可。许多大男人坐摩托很紧张，牢牢抱住我；而赵小姐可以双手高举，吓得她妈妈哇哇叫，而她却哈哈大笑。

1993年11月4日下班后回家，骑着一年新的摩托座骑，奔驰在三车道的公路上。换线时，我超过旁边的一辆较慢的大卡车，刚进入卡车那条车道时，一声巨响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醒来时，天已黑，我躺在病床上；全身上下

除了头脚两端，都缠满绷带，疼痛难忍。护士小姐给我打了止痛针，应我的要求，人们为我填充了五小时的记忆真空——

送我来的警察说：“您超车时，被超卡车的另一边，一辆小轿车也同时超越卡车；高大的卡车挡住两辆小车的视线，您们接吻在卡车前面。幸运的是，两辆小车距离卡车较远，而卡车又及时刹住车，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护士告诉我：“您戴着法律规定的全封闭帽盔、穿着皮鞋，头脚没事儿。在柏油路上打滚儿，长裤和衬衣已破烂不堪，四肢皮肉损伤严重，虽然露出骨头，但是四肢骨头并未折损。疼痛主要是因为胸腔第八、九、十，三根肋骨断裂。这里是新加坡大学附属医院，我们不知道您的保险等级，只能先放在这十几人的大病房。明天您公司来人后，再换病房。”

次日上午，东亚所黄所长和会计来看望。我的保险可以让我住双人病房，类似中国的局级待遇。但是，美国已经惯出我不习惯与同性同住的毛病，并且来探视者肯定众多，也影响同房病人。我决定自费补上差额，搬进单人病房——类似部级待遇。下午所里的十几位同僚分批来探视；第三天，轮到大学的教授朋友们了；不到两天，各种水果和点心摆满房间。随后的周末，就是新加坡籍朋友和中国朋友的举家来访了，食品由冷变热、由简升精，鸡汤生鱼汤、鸡精生鱼精、人参西洋参，推却不了，就让换走易坏的水果。第二周，就轮到我讲过课的公共服务署、安全情报局和外交部的官员们来慰问了，他们除了水果鲜花，令我意外的是，还有红包，彷佛我为国光荣挂彩似的，真不好意思！

伤势说重不重，皮肉损伤；消炎换药、打针吃药。说不重还挺重，断了三根肋骨，大声说话、小声欢笑、深深呼吸，上半身都剧痛。住院一周后，主治医生说：“皮肉伤恢复不错，肋骨断裂不用治疗，周围的软组织包裹很紧，自然修复。下周可出院，回家静养。”第二个周末即为住院十天后，二军宴请访新的法国朋友，他们看我身体恢复挺好，就叫了出租车，带了件风

衣让我穿着外面，“劫持”我乔装到酒店。我日记写着“吃喝5—10点”。11月15日出院，吴庆瑞派司机送我回家，并送一部无绳电话，便于我休养时与他联络，此后三天载我去换一次药。我一人在家休息时，不断有朋友来家探望，送来饭菜和熟食，二军也多有照顾。特别是新大的中国教授的黄崇道和左小蕾，还分别来为我做饭和打扫卫生，令我终生难忘！

新加坡同事议论：“阎大胆该老实了，摩托车不敢再骑啦！”中国朋友反驳：“阎淮说过‘一朝被蛇咬、十年不怕蟒’，肯定照骑不误！”交管局判定：“摩托车与小轿车责任对半，各修自车。”我修理好损坏严重的摩托车，又疯了一年，获绿卡后才换成汽车。

11-13 父亲请江泽民让我回国

东亚所只研究中国不考虑东亚，其实就是挂东亚之名的中国研究所，研究员能经常去中国实地考察对研究极为有利。而我和几个研究员因对“六四”的态度，不能更换到期的中国护照，我们希望吴庆瑞帮忙。1993年中，吴庆瑞发话：“你们自己去中国大使馆，想办法拿到新护照，特别是阎淮！”（东亚所与中国大使馆关系密切：使馆领导经常陪同中国政要来所，东亚所的公开讲座他们必到，使馆重大活动请我们助威；特别是中国一些省部级官员想拜见吴庆瑞，使馆托我进言。）于是，我就去大使馆找了研究室的周一秘和领事处的田一秘两位熟人。我表态：“‘六四’的学生都错了，应该抓起来，判死刑缓期执行；他们若像江青自杀，世人无话可说。我现在对政府唯一的意见是，不该‘斩立决’。还是毛主席说得好，人不像韭菜，割了一茬，再长一茬。”他们劝我写份严肃的认识，他们再美言，否则没戏！我回东亚所向吴庆瑞汇报交差，吴：“我不便出面。你不愿低头检讨，就每年去一周香港调查研究查询资料吧。”于是，在1993年10月中旬，94年9月下旬，我两次到香港考察访问。中文大学的中文数据可以说是全世界数量

仅次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第二家，但境外资料更齐全。我流连忘返，复印了大量资料。除了拜会香港的老朋友，还与当时在香港的国内一起参与改革的故旧和中组部的同事讨论时局，加深了对现实中国的了解。

我不能回中国，就考虑请父母来新加坡。1993年他们去美国的小儿子家住了半年、游遍大半美国，不想再奔波，决定次年来新。94年春，父母在妹妹陪伴下，来新加坡探亲。我们分别近五年，尽管经常通电话，见面还是悲喜交加，彷佛有说不完的话。父母参观东亚所，拜会吴庆瑞；与余柱业见面——中国与新加坡两个具有反思精神的老共产党员、抗日老战士，促膝长谈。我陪父母游遍新加坡城、新加坡岛、新加坡河、“新加山坡”、新加坡全国，它太小啦！回北京后妹妹来电话说，父亲正在为我回国，找江叔叔帮忙。我没在意，秋天照例访问香港。

1994年10月2日，我在香港考察一周后回到新加坡，在信箱中发现已经到了几天的家信。妹妹说：“姜阿姨已为你办好护照，你到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找张参赞领取，然后就可以回国了。”我立即电话北京，妹妹说：“你在新加坡小有名气，在大使馆也有或好或恶的名声，若在新加坡办新护照太招摇。”

3日，我向吴庆瑞报告：“父亲托老部下已经为我疏通关系，因为我老护照的最后签证是到法国的，需要我到巴黎领取新护照。”我当然不会提到江泽民。吴大喜：“好！立刻去拿来新护照，早日回中国实地考察。”我为难：“我有效期两年的法国旅行证件，上月底刚到期。若要延长需要一些时间。”吴：“新加坡护照去法国免签证，我想办法！”

4日，我每个季度去讲课的安全情报局的许国丰局长说吴庆瑞让他约我晚餐。席间，他给我一个大信封，内装：有我相片和真实姓名等资料的新加坡护照，6日赴巴黎、20日返回的双程飞机票，两万法郎现金。我退回法郎，说自己可以兑换。许局长：“吴博士说，这次是出差，但不要到东亚所报销

了，多不退、少不补。”我只能心存感激，领情了。这就是新加坡效率！5日我收拾行装。

10月6日晚，我只身去机场，在去巴黎航班的候机厅里，遇到赵二军的太太。我们两个好朋友的聊天使时间过得飞快，起身准备登机时，警察临检，英语流利的赵太顺利通过。持新加坡护照的我不懂英语，又操大陆口音，引起怀疑。新加坡人不懂英语者少见，当时大陆人拥有新加坡公民权的更罕见。我让赵太先上飞机，自己与警察周旋。警察问我护照号码，我当然答不出。新加坡护照号码就是身份证号码，他们一出生就拥有这个号码，不能不知。以后的问题我就更傻了：“护照啥时领的？绿卡哪年得的？绿卡几年获公民？”对于这些，我一概不知、拒不回答；但对于护照，我很有把握；于是反问：“护照是假的吗？立刻抓我！是真的？立马让我上飞机！”见我不配合，警察们从飞机上取下我托运的行李，让飞机起飞。我见走不了，就让警察打电话给许国丰，许局长立即派秘书来救出我，送我到家已后半夜。

7日白天补觉，傍晚许局长秘书来家，送我新机票，说次日再飞法国。

10月8日晚，许局长亲自来家接我去机场。在机场贵宾休息室稍事休息，经免检通道直接送我进入机舱。

在巴黎的中国大使馆顺利拿到中国护照，然后旧地重游、旧友重聚。赵太询问新加坡护照，我解释并请保密。与分别两年的中法各路哥们姐们聚会叙旧、家宴郊游，痛痛快快地吃喝玩乐了十几天。

10月下旬返回新加坡。吴庆瑞说：“你有中国护照了，两件事抓紧办。

一、你准备材料，让办公室开证明给移民局，申请永久居民（绿卡）。二、把正在写的‘中国军队系列’论文尽快结束，11月回中国考察，新年后春节前回来。”11月中旬我得到新加坡绿卡，下旬回中国。

11-14 重返中国实地考察一个月

1994年11月23日抵达北京。离开祖国五年，回到生活了30年的北京应该感到亲切，但是入境前的检疫却当头一棒。他们要求、并且只要求，所有的中国人抽血检查艾滋病。我不服气：“为什么歧视国人？老外艾滋机率更大！”回答是：“上级规定！都好几年了，你才老外呢！”挨了一针、丢失一管血液后，在入境处武警中尉检查我的护照时说：“请稍等。”招来一位中校带我入境，把我介绍给中央办公厅的伊处长和小许副处长。他们开车送我回家，一路寡言分手时说：“领导让我们接待你，你与家人团聚休息几天，下周一接你参观北京新气象。”

24日，我还在睡懒觉，就被敲门声吵醒。“我是管理这一片的警察，听说你从国外回来，要报临时户口。”“片警呀！我是北京正式户口，还报嘛临时的？”“上级规定，国外来的，就得报！”“好，我现在就跟你去派出所。”“今天管户籍的不在，明天吧！”

25日早八点，派出所一上班我就去报到，想先报完户口，一整天还能干许多正经事。迎接我的却是闭门羹：“户籍警不在。”“我等会儿。”“他今天外出，你明天再来。”“内勤也外出，怪事！”牢骚归牢骚，我只能今天乖乖滚蛋、明天老老实实再来！

11月26日，我又准时去派出所“上班”。两位中年便衣把我迎接到一个小房间。“我们是市公安局的王处长，来这检查工作，碰巧遇到您。我们对外国挺好奇，咱们聊聊行吗？”“这么巧哇？能不行吗？！”公安问起新加坡东亚所的事。我心说：“蒙谁呢？我是中国问题专家，你们是‘国安’非‘公安’！”但不便说破。我就如数家珍地“谦虚”一番：开过几个讲座，媒体都有报道；写过几篇文章，报纸和杂志都登了。他们不满足：“听说你们还写了许多秘密报告？其实东亚所的事，我们都知道！”公安说出东亚所几个同事的名字和他们的一些事迹。我答：“东亚所每人只能看自己的论文，别人的事我不清楚。我签了保密合同，自己的论文也不能乱说。”最

后，年长的说，“你好好想想，咱们下周再聊。这是我的名片，你有困难可以电话找我。”

11月28日周一，中办小许接我，在新开通的三环路绕行一周，参观1990年亚运会的场馆，游览西郊世界各地著名景观微缩模型的“世界公园”。北京这些“新几大建筑”确实比1959年的老“十大建筑”，对平民百姓更实用。但对奔驰过欧美壮观的高速公路、参观过数国奥运场馆、游览过世界诸多真实的著名景观的我来说，它们都不足为奇。但是，我还是为祖国首都的巨大变化欣慰，为中央办公厅的热情接待而感谢。分手时，我拿出“公安局”王处长的名片，小许说：“不要管他！”此后在中国的一个月中，再也没有人“管我”。返回新加坡前，我谢绝了中央办公厅的送机。

回到父母家，父亲说：“江叔叔已知道你要回国，我已感谢他，你也应有所表示。”我答：“我真心感激他！”于是写了封真挚的感谢信，汇报现在新加坡从事中新友好工作，但仍会秉持独立学者的态度发表论文和看法；也期望他能继续我们在文革时对党和国家专制倾向的批判，把中国引向民主自由的社会。按父亲告诉的联络方式，在信封上写着“中共中央办公厅贾廷安同志亲收”，内装稍小的信封，上写“江泽民亲启、阎托”小信封里面是我的感谢信。父亲说：“还有电话联络方式，没有急事不要用。”我：“我不需要电话联络。”再次去看父母时，父亲说：“江来电话，收到你的信，要你对得起国家。”

（在半年后我第二次回国时，父亲说：“江送来一本海外出版的《乔石传》，其中有许多有关江的负面内容，发行人是阎某。江说你忘恩负义，化名爆料内幕攻击他。”我如法炮制、按老方式给江又写了一封信：“一、海外出版书籍的版权页，注明的出版人或发行人，都是该出版社的老板。我附件中两本书版权页的发行人何频、金钟都是我的熟人、分别是明镜出版社和开放出版社老板。我不可能是发行人。二、除当年中组部有关人员，没人知

道我们的关系。我也不会乱说，给彼此徒增麻烦。我感激您当年和最近为我帮的大忙，绝不会做不利于叔叔的事。敬请放心！”）

除了与亲人团聚外，我还拜会了三对老人。

12月6日，看望万润南父母。五个月前他们借去新马泰旅游的机会，在新加坡与万润南见面，我与他们相识。此后每次回国，我都去看望宴请他们；新世纪他们迁居上海，我又去过几次，老人身体衰老，我就到餐馆打包到他们家。

12月8日，去万润南的岳父母、李昌和冯兰瑞家。家父离休后曾同李昌等人到老区扶贫。1987年1月16日晚在招待所饭厅看完胡耀邦下台的电视，李昌沉着脸走回住房，家父跟进去，两人互诉衷肠悲观之至。我这天带去父亲的问候和礼物，与两位老人互通了国内外情况和议论时政，冯阿姨还赠我新作。两个月前刚在巴黎与万润南和李玉相聚，娇小的李玉在法国买不到合身的成人衣服；我也把她父母在中国为她买的合身服装带回新加坡，万润南不久会到新加坡来取。以后每年我都去看望李冯二老，或吃他们的家宴、或吃我请的餐馆。

12月12日9时，到李锐家，劫后相见格外亲切，聊到中午谈兴未尽，张阿姨非留我午餐。我们回忆过去、审视当前、展望未来，都比较悲观。必然要谈到江泽民，李锐说：“当初你若去了电子部，再跟到上海，1989年未必有机会出走。”李锐去过美国和澳洲访问讲学，还愿去新加坡，我答应帮助。（回新后，我向吴庆瑞推荐，几天后吴答复“不适宜”。我估计是李光耀不同意。我有愧于李老！）分别时李锐题字赠我、在香港新出版的《庐山会议实录》和《毛泽东的早年和晚年》两书。此后十多年经常看望李老，他90岁后怕影响其健康，我就只与青干局朋友聚会宴请李锐。2014年他托人带话，很想见我，我才重进李宅。

在北京的35天中，我还分别与煤炭部、组织部和康华公司的同事，中学

和大学的同学，以及各路朋友（还有人特意从上海天津等地赶来）共接触200余人。他们的接风、饯行，我的答谢，经常是一天两席；多时达二十余位的多边座谈，少则一对一的双边会晤；吃不完的饭、说不完的话，离京前，我的嗓子都哑了。值得一提的是清华老红卫兵，一起反对中央文革小组而患难的高干子弟们，六四前后都任部、局级高官的朋友。我们多次见面叙旧，陈元的评价在“体制内”颇具代表性：“你大节不好，小节不错！”此话后来在干部子弟和清华同学的两个圈子中流传。陈元的解释是：“你大节离国退党、叛国叛党，小节哥们义气、不伤害朋友。”我答：“我退党可算叛党，但是绝无叛国！”当年从“反中央文革”中激流勇退、被朋友们称为“老机（机会主义）”的徐沙的疑问较具普遍性，他对我出走最为不解：“中国六四前是邓小平和陈云的天下，你与陈家渊源极深，又身在邓家的康华；六四后的核心江泽民与你更密切。你啥事没犯，为嘛非跑？图个啥？”理想主义对现实主义哑口无言，我只能回答一个字：“傻！”

12月27日，返回新加坡。次日上班向吴庆瑞汇报中国行，吴让我写详细的考察报告。我在1995年1月和2月，分别写出《中国领袖状况》和《中国社会情况》，共计一万二千字，没有一个注释。在与吴庆瑞讨论修改后，在2月和3月分别以最高密级的《东亚所评论》11号和12号刊出，送李光耀。

《中国领袖状况》一文的小标题是：一、邓小平和陈云等元老的作用式微；二、江泽民已主导政局，江（泽民）李（鹏）体制变为江（泽民）朱（镕基）体制；三、乔石的人大和李瑞环的政协，经常发出民主法治的空喊。

《中国社会情况》的小标题是：一、通膨腐败严重，社会基本稳定；二、邓后的不稳定因素：1、贪腐蔓延，2、地方与中央关系紧张，3、民主派异议人士的异动。

报销小插曲：我在向黄所长报销旅差费时，他对我长达35天的伙食补助

提出异议，说没有出差超过半个月的。我特别和蔼地回答："第一、我可以住高级酒店，但住在家里，下次一定住酒店。（其实是为了与家人多团聚，以后回中国都住酒店了。）第二、吴庆瑞让我新年后回来，我还提前了呢。（我没说，中国春节重要，新年只有一天假，没意思！）我这报销单是否请吴博士批？"黄心不甘情不愿地默默为我签字。

新加坡的永久居民可以购买具有补贴性质的"政府组屋"；而东亚所则规定，在三个月后取消外国专家的住房补助款。我赶紧买了大蓄水池旁三室二厅的高层住宅，同时把摩托换成福特轿车。

11-15 为新加坡三领袖访华打前站

1995年新加坡与中国的关系更加密切友好。8月李光耀资政访问河北，王鼎昌总统访问吉林省延边州，10月初李显龙副总理访问苏州市；他们三人都由当地的党政首长接待。新加坡非常希望了解这些地方首长的特点好恶、最近政绩和干部口碑等公开数据以外的"新鲜好情况"，以便与他们接触时知己知彼、投其所好。既然我可以自由进出中国了，又对中国政界比较了解，吴庆瑞便派我去打前站。吴只说派我考察中国政情，东亚所其他人并不知道我打前站的具体任务。

7月，我飞赴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首府延吉市，住在当地最高级的长白大厦三星酒店。通过中组部朋友的介绍，我找到徐州长助理。我让徐请了几位县处级干部，傍晚到长白大厦；我说明为王鼎昌总统打前站，希望重点了解张德江的特点和政绩；我们边吃喝、边聊天，直到半夜，基本情况全部了解到了。张德江一个月前才由省委副书记身份的州委书记升任省委书记调离延边，下个月回来接待王鼎昌。赴宴的干部都说张的好话，他五年的州委书记确实政绩显著，才能由吉林省重要性比不上长春市和吉林市的地级州主管，直接升为全省第一把手。12年前我曾考察过列为省级后备干部的延吉市长张德江，现在他更成熟了。次日到《延边日报》开了个座谈会，进一步了

解延边全州的情况以及与朝鲜国的关系。随后“中新合资”公费旅游了长白山天池。那几天我还“微服私访”了国营商店、利伯维尔商场、加州牛肉面、鲜族狗肉馆。总的印象是：民族和谐、治安良好、商品丰富、安居乐业。与我当初判断吻合，否则也不会让王总统来访，中国是无论如何不能让贵宾去多事之夏的新疆和西藏。

7月中，北京朋友开车陪我去石家庄，下榻国际大厦。我请河北清华校友会的哥们，约请十余位清华同学。中餐川菜、晚餐淮扬菜，一下午加一晚上，校友们尽情妄议省政、恣意褒贬领导。大学流传“清华一条虫、出去一条龙”，这些同学在省会都混得不错：政界厅局长、商场总经理、学校大教授。他们了解上层情况，大都对省委书记程维高意见较大，不外乎后来程倒台的那些烂事。我一再申明：我不是中组部来考察干部，而是新加坡的李光耀想了解程的长处。他们教我：你就说程在江苏干的还可以。次日我在石家庄乱逛，了解风土人情、市面状况；下午驱车回京。在入住的北京华侨大厦写出对吉林和河北的考察报告，在大厦的商务中心传真到新加坡交差。

7月底前往苏州。行前我电话时任市委副书记的老朋友冯瑞渡，只说要去苏州，请他简单接待。1984年春，时任苏州组织部副部长的冯，借调青干局考察第三梯队，我们成为朋友；秋天我开完莫干山会议，回程顺访苏州，承蒙冯盛情接待；此后他升任市委常委兼组织部长，我们仍有来往，友谊更深。我抵达苏州时，冯瑞渡派市委组织部办公室刘主任接我。我要去预定的酒店，刘不由分说地用冯书记的“苏州003号豪华汽车”把我拉到有武警站岗的检察院招待所。冯瑞渡在院内迎接，把我送到总统套房，退下左右后，他说：“六年前，疯传你叛党叛国逃亡海外，进行反华勾当。我压根儿不信！我太了解你啦，你绝不会干不利于中国、有害于人民的事情！这次你来苏州，我虽然升官了、还只是副书记，不便惊动市委办公厅，就让你熟悉的老朋友刘主任接待，陪你游玩。市检察长是我铁哥们，他的内部招待所非常安

全，没人敢来这里抓你！”

我特感动冯瑞渡的哥们情义！如实相告：我是新加坡“特使”，为10月初李显龙和李岚清二位副总理共同主持的“苏州新加坡工业园区”第二次理事会做准备。冯如释重负，“释放”我入住原先预定的苏州最豪华的南园宾馆。

随后苏州组织部邱副部长陪我去“新加坡园区”，苏州市“借鉴新加坡经验办公室”周主任接待。周介绍了苏州方面的巨大贡献和新加坡方面的种种不足，他陪同我考察了整个园区和已经入驻的日本西德等国的几个企业。最后我召集中方、新方和外企三方座谈会，听取他们对中方的意见和对新方的希望。

7月26日上午，章新胜市长到南园宾馆接见我。章新胜80年代就是省部级第三梯队，与我有过接触；我们又都是四十年代出生，都在美国学习过；因此共同语言较多，交谈顺利融洽。最后他希望我“上新（加坡）言好事，（让李显龙）来苏（州）降吉祥”，请新加坡增加投资。随后当然是丰盛午宴。苏州工作结束后，冯瑞渡送我至江苏与浙江边界，时任浙江湖州副市长的崔武年派车接我到他的“领地”，盛情款待我数日。

回北京后，整理好苏州工业区材料，传真新加坡，完成公干。随后就是家庭团聚访亲拜友、远近郊区游山玩水，尽情享乐半个多月。8月返回新加坡，与吴庆瑞、新加坡总理公署及外交部，对我从中国发回的数据，进行解释和答疑。新加坡领袖们访问中国归来，对我的前期准备工作非常满意。

第五节 在新加坡接待的中国来访者

11-16 时任与后来的副国级客人

马凯。1993年7月中国体改委主任李铁映、副主任马凯等人拜访东亚所，吴庆瑞率几位研究员与他们座谈。中方马凯是体改专家，新方只有我直接参

与中国改革，因此马和我是双方“主谈”。晚宴后，马凯约我到酒店房间畅聊。80年代初，马凯由北京市西城区委书记陈元，任命为西城区计委副主任，初步相识；80年代中，马是陈元任会长的北京市青年经济学会副会长、我是常务理事，共同研究“中国的短缺经济”，成为相知；最重要的是：我们都是陈元的密友，故为好友。分别四年，海外巧遇；我打探国内故旧、他询问海外老友，我们共同忆旧、议今、展望，直至后半夜。现在他是副总理，我只能写下我当时的忠告：“我们都是陈元密友，恕我直言。陈元的家庭背景现在是负资产，他副部级十年了，短期难进步。你的学识见识不在其下，但你的陈元色彩太浓，不利！”马2008年任国务委员，2012年进政治局。

周小川。1993年9月中国银行副行长周小川访问新加坡，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助理局长陈光炎宴请，我是主客双方的好朋友，应邀作陪。次日下午周到东亚所交流，我们共进晚餐后，到我家聊到深夜12点半。1984年我们在莫干山会议认识，他兼任体改所副所长后更熟悉。周博士毕业后被赵紫阳任命为经贸部部长助理，大刀阔斧外贸改革，被讥讽为“改革狂人”；我和朋友们极力支持声援。因小川后来未像马凯官至政治局，只是政协副主席，故可以披露部分牢骚。周说：“1989年下半年，我被免去全部职务，只保留挂名的体改委委员。问他们，我有什么问题？不予回答！朋友说我是待业高干。挂了我两年多，看不少书，好像读了个博士后。”我说：“我本人没本事，但识‘有本事的人’。江泽民亦如此，他肯定会用你！”周2002年任人民银行行长，2013年任政协副主席。

陈元。1995年9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元访问新加坡，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副局长高铭胜迎接。高问陈：“想见什么人？”陈答：“阎淮！”高：“阎也是我的好朋友！晚上一起吃饭。”高铭胜是吴庆瑞兼任金融管理局局长时，一手提拔的高足，东亚所的讨论会，吴经常叫高来参与。我与高

多次共同参加吴的小型内部研讨和私人宴会，因此成为朋友。（高铭胜高度近视，考驾照通不过，每次活动都是吴庆瑞让他的司机去接高。说明“央行副行长”无专车，廉洁！如此高官也无法被“照顾”驾照，法治！）晚餐由吴庆瑞在陈元下榻的酒店宴请陈元，高和我作陪。吴喜欢边吃边聊，两个小时的谈话，大都被我随着精美食物排出。我只记得吴说：“陈先生，过去我们想请你来，有人说阎淮是你朋友可帮忙，阎却说只是一般同学。以后不再请你，只要把阎抓起来，你肯定第一时间来新加坡救他！”

餐后，回到陈元房间，一股特殊的香臭味扑鼻而来，几个剥开的榴莲摆在茶几上，地上还放了几个真空密封的榴莲，让陈元乘飞机带回中国。（我都不知陈好这口，真佩服新加坡的情报！）新国不允许榴莲进酒店，高铭胜没打破规定的权力，肯定是吴庆瑞的安排。陈云已去世五个月，吴还如此礼遇仅为副部级的陈元，遥想三年前吴对赵二军的照顾；对比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世态炎凉人情冷暖，资产阶级领袖的人性，让我怎么说呢？陈元谈到：现任太太不甘心本科学历，想读硕士又怕说是走后门，让我帮助了解能否来新加坡读硕士。后因情况变化未成行。我则小声说：“有些让我鉴定的、中国吃里扒外的高官提供给新方的情报数据，我不爱国、但恨贪官，请你用免检的‘红色护照’带回中国，交给有关方面，但不要说是来源于我。”

次日，陈元忙于公务访问考察。我上午到不懂中文的印度人开的复印店，复印有关资料。下午到名品商店，按陈元提供的尺寸，为他女儿购买小孩的名牌服装和日用品。与陈元共进晚餐后，在他房间的卫生间里，我交给陈全部资料。16日，陈元带着新方直接赠送的榴莲和间接赠送的情报资料，顺利回到中国北京。陈元1998年任正部级开发银行行长，2013年任政协副主席。

东亚所接待过的时任“党和国家领导人”还有——

李铁映，政治局委员兼体改委主任，1993年7月来访。我们是北京101中

校友，十年前又到辽宁当面考察过他，算是熟人；但我对他进京后印象不佳，只是点头握手寒暄而已，主要精力放在照顾上文提到的同龄哥们、副主任马凯身上。

谢非，政治局委员兼任广东省委书记，1993年10月来访。谢的广式国语着实让我费解，加之我对广东又不感兴趣，就拉着那位老摸香烟的最后一名随员，到楼外吸烟闲聊。李铁映和谢非的共同特点是随行人员中都有一位五大三粗的壮汉，不爱听讨论，还经常出去吸烟。东亚所的新加坡职员莫名其妙：“他是谁？”我答疑：“政治局委员必带的警卫员。”她们更惊奇：“新加坡二号人物吴庆瑞都无警卫，中国二十号人物还有？”我说：“你庆幸吧，要在中国肯定还要戒严呢！”

谷牧，全国政协副主席，1993年2月来所演讲。

费孝通，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兼北京大学社会学所所长，1993年4月来所。当时中国的乡镇企业被国际关注，东亚所将它研究列为研究课题。我们认为社科院社会学所比较左，就选择北大为合作伙伴，具体工作是由随行的马戎博士负责。晚宴上，民盟主席费老酒后牢骚：“朱镕基说，‘共产党再腐败，就不如民主党派了。’我们民主党派怎么不如共产党了？”我对民主党派印象较差，趁吴庆瑞不在，就放肆了：“我这个前共产党员替它说句好话：共产党，在宪法上写明要永远执政，挂狗头卖狗肉，表里如一。民主党派，自称智力集团不争取民主，不配称民主；没有执政意识、被另一个政党领导不是党派；民主和党派，皆名不符实、挂羊头卖狗肉，就是不如共产党！”举座皆笑，唯费尴尬。我急忙打圆场：“不过我对费老的社会学造诣和‘反右’表现特别钦佩！”

后来成为副国级的官员还有——

经叔平，全国工商联主席，1993年8月来访。过去我岳父任工商联秘书长时，经叔平是副秘书长，我们又在一个院里住过，我称他经叔叔，因此对他

的服务格外热情周到。经1998年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薄熙来，大连市市长，1993年9月来访。因为是我朋友薄熙成的哥哥，我也应该另眼相待；但他随行部属鞍前马后分外周到，也就轮不到我忙乎啦。薄2007年进入政治局。

11-17 在新加坡招待的中国朋友

陈小鲁，陈毅幼子，1993年11月来新加坡，95年5月再访东亚所。尽管陈是以私人身份来访，吴庆瑞还是热情接待。80年代中期，我们一起参与政治改革而相识。“六四”后，我们都放弃局级即得利益而脱离公有体制；我在海外以激进方式，他在国内以温和方式。个人奋斗小有所成的两个朋友，四年后，在南洋再次相遇，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陈是我到新加坡继马凯和周小川之后，接待的第三位当年国内改革派局级朋友，与马和周继续仕途不同，小鲁下海办公司。我们的价值观念相同、脾气秉性相似，几十年来，我们一直是志同道合的好朋友，每年回国我们都聚会。1999年2月午餐后，他聊性未尽，邀请我去他家继续侃大山。针砭时政的谈话内容早已忘却，但分手时他让我带走年货的盛情确历历在目。当时陈已无“单位”，只能住在什刹海北面已故岳父粟裕的“大将府”，其内兄粟戎生是北京军区副司令。小鲁说：“戎生当军长时没人送东西，现在升司令了，人家整卡车送年货。这春节过完了，还满院子食品，你拿点去！”我很快要回美国，婉拒了。上世纪送的是食物，粟中将若不退休，新世纪就要经受黄金美钞的轮番轰炸了！

王雁南，赵紫阳女儿，1995年4月来新。王原是北京长城饭店副总经理，在欧洲考察实习时，到了二军和我的法国地盘，周末假日一起吃喝游玩、苦中作乐。93年雁南被陈东升说服合伙成立“中国嘉德国际有限公司”。1995年4月，陈、王二位正副总经理率各部门主管以及众多古董，到新加坡举行大型拍卖会。吴庆瑞真义气，全力支持！20日晚参加嘉德招待新加坡各界的酒

会，21日参观嘉德预展，23日拍卖顺利结束，吴庆瑞携太太举行私人晚宴为王雁南饯行，二军和我作陪，席间吴一再请唯一能在中国家中自由陪伴父母的雁南，代向赵紫阳问候和致意。紫阳在世时，我不能进“软禁公馆”。2005年11月2日赵去世后的首个寒食节，二军带领刚回国的我，经过保卫“故赵公馆”便衣的审查，进入赵紫阳灵堂吊唁致敬，看到赵氏兄妹为父亲撰写的挽联：“能做你的儿女是我们今生的荣幸；支持你的决定是我们不变的选择。”我对紫阳一向崇敬，今见挽联，对其子女也肃然起敬，能做他们的朋友也是我的荣幸！那日也首次在富强胡同六号见到雁南，此后每年回国，我必到赵灵堂三鞠躬，大都由留守北京的雁南接待。在新期间，还结识了路过新加坡的赵大军等其他几位兄弟。

李勇，李富春之孙，天津开发区主任，1995年8月来访东亚所。李勇84年接替李湘鲁任赵紫阳秘书，在北京认识。1989年赵倒霉，李“理应”被审查，当然无问题。组织征求他新工作意向，无知无畏天真义气的李勇说：“回紫阳办公室！”组织：“小李你没问题，老赵他有问题，已无办公室！”李勇不想在北京官场感受世态炎凉，遂到天津开发区去干实事，由副主任而主任。我对李勇的义气由衷佩服，热情地招待了他。

刘京，云南副省长，1994年6月率云南代表团访新，通过在我所的熟人邹子婴穿针引线，到东亚所座谈。邓小平提倡学习新加坡，中国官员蜂拥而来；欲访东亚所、见识吴庆瑞的非学者经常走我们的后门。刘京是我北京101中学校友和三十多年的朋友，我住三里河，他住百万庄，周日下午返校时，我曾骑车先到他家小坐，再一起回校。我在组织部和康华时，还时有来往。1992年他由残疾人基金会空降云南省任外贸厅长，一年后即升副省长。座谈中，刘彷佛不认识我，我以为他在云南根底不深，怕与“异议人士”牵连，想会后私下款待他。孰知会后邹子婴对我说：“刘京很惊讶你也能在东亚所，他劝我与你保持距离；并让我转告吴庆瑞，阎是危险人物。我告诉刘，

你比我还吃香！”我于是省下了一笔款待刘的开销。“六四”快30年了，中国大小官员见多了，刘京是唯一如此决绝的！难怪他日后掌管对付法轮功的“610办公室”，打击法轮功坚决彻底，很快官升正部级。

11-18 东亚所接待的中国学者

新加坡东亚所接待最多的还是中国学者，每月都有二三位（批），印象较深的有：

1992年底，《法学研究》杂志李主编和中国犯罪学研究会周秘书长两位六七十岁老教授分别率团来访。吴庆瑞认为中国法治较差（他对中国民主很少批评），加之对老学者尊重，都亲自接见座谈，并让我们陪同他们到监狱参观鞭刑和游览红灯区。

吴庆瑞对来访的中国专家多次解释新加坡“性交易合法”的益处。我根据吴的谈话，以及我与性工作者在内的有关各界人士的认真讨论，总结提炼出来八大好处——

一、解决众多单身青壮年外籍男劳工的性需求；

二、增加性变态者等各种“潜在罪犯”的宣泄渠道，减少以上两大类群体的性犯罪率；

三、解决绝经女性“中年丈夫”的需求，他们不会与性工作者结婚，因而保障原婚姻的安全；

四、满足性旺盛者的“性趣”，减少非法的“婚外性”，增强社会和谐；

五、杜绝黑社会控制性交易，有利社会治安；

六、警察不能索取保护费，减少警界腐败，“黑白两道”都规矩了；

七、性工作者定期体检，减少艾滋病及其它性病对性服务对象的伤害；

八、最后、但是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性工作者的生命安全、身心健康和经济收益等各项人权得以保障。

直接对上述八种人的益处，间接最终促进整个社会健康与和谐的发展。我多次陪同公、私客人参访红灯区，用上述理论答疑解惑；被中国朋友戏称为“卖淫合法的阎八条”。毋庸讳言，我赞成“性交易除罪化”。

顺便介绍当时新加坡对性交易的管理。性交易在指定地点室内（市中心以南、新加坡河以东的芽笼街区的几条巷子），不允许站街女郎；性工作者必须18岁以上，注册登记领取执照、并且一个月一次定期体检。吴庆瑞坚称：“新加坡决不收她们的税，不能让西方人说我们赚性交易的钱！”

吴敬琏，1993年4月和1994年12月两次在东亚所举办讲座，我和同事杨沐在国内就与吴较熟，因此每次都到酒店与吴长时间单独私下交流，观点高度吻合，并共同进餐。

刘国光，中国社科院副院长，1994年2月来访。1993年9月受朋友（日记未记姓名、忘了谁人）之托，我写给吴庆瑞一封信，讲刘国光如何重要，应该邀请来所。1994年2月刘来访一周，讲座、参观和宴请，我大部分时间陪同，日记上写“对刘失望”。推荐刘来访、首战告捷，受到鼓舞；1994年回国归来，推荐邀请李锐，再战折戟；从此金盆洗手，不再推荐。

厉以宁，1996年9月，携夫人访新。连续三天在东亚所，两次内部座谈，一次公开讲座。因在国内就认识厉弟厉以平，就请厉夫妇到家中小餐。同事邹子婴是其高徒，我开车与邹一起陪伴老师夫妻游尽新加坡“全国”。至此，中国经济界三位顶尖老学者及其见解，我在新加坡都近距离当面领教了。

汤敏，1995年1月在东亚所讲座。汤时任亚洲开发银行经济学家，汤妻左小蕾是新加坡大学讲师、乒乓球高手，我们每天下班后都在新大乒乓球厅切磋，其子可爱的小汤雷经常伴其左右。节假日汤敏自菲律宾来新加坡家庭团聚，我们肯定借机聚会大吃二喝。97年2月左离开新加坡，我们十余中国朋友为其饯行。世纪末，汤左联名上书建议高校扩招一倍，名噪一时。

胡鞍钢，1995年5月来东亚所讲座。1993年美国耶鲁大学王绍光与中科院胡鞍钢合着《中国国家能力报告》（史称“王胡报告”）推动了中国分税制改革。当时是“内部报告”，东亚所急需研究。我与王绍光在美国就相识，便求助于他。王真够朋友，立即传来报告全文；其间我与胡也有联络，算是未谋面的朋友。因此讲座次日，我单独宴请胡鞍钢，并交流请教一下午；当时双方观点并不像现在这样南辕北辙。2013年，在北大举行“王胡报告”发表20周年纪念会，可见其重要性。

在东亚所还接待了两位从台湾投奔大陆的学者：林毅夫（1993年8月和94年4月）黄顺兴（1994年7月）。因为我们中国研究员都是从一党领导的国度到相对民主的地域，而此二位却相反。所以我们对他们的台湾背景、迁移动机、目前感受，比其学术见解更关注，讨论时这方面的问题更频繁。这种研讨会吴庆瑞一般不参加，由黄所长主持；黄一见“跑题”，经常提前结束座谈会。

11-19 在新加坡款待的民运人士

万润南，清华同届校友。在国内，他四通我康华，两大公司时有交集；到法国共同参与民运。1993年12月万润南首次访新一周，1994年7月万再次来新，熟人熟路径直住在我家。当时赵二军租住的老房已到期，新屋未找到，也暂住我家。巴黎的三个老朋友在新加坡重聚并欢住一宅，促膝长谈其乐融融。数日后，万润南年迈的父亲和母亲假借参加“新马泰一周游”的机会，来到新加坡见儿子。他们三人在“六四”离国五年后，首次相见，其情感人至深。94年底我首次回国，到万家及万夫人李玉家，看望双方老人。一个月后万润南第三次来新，我陪他参观东亚所，对新加坡人只说是我的一个中国朋友，请中国研究员则不要声张。中午我宴请万，中国研究员作陪，他们不让我破费、几个人非要AA制合请“民阵万主席”。此后万又在1996年访新加

坡。

吾尔开希，1989年在法国认识，1993年底他从美国去澳洲开完民运会议，想回程游玩从没来过的新加坡。听说我在新加坡，就来我家住了一周。开希希望我在这里为他组织几场演讲会，我断然拒绝：“中国是新加坡最友好的国家，新决不允许任何不利于中国的民运活动！刚离开的万润南就没有公开活动，你就隐名埋姓地好好玩吧！”我请假陪他游遍新加坡。在我家附近的购物中心，开希被我的新加坡朋友认出。我否认，他承认。新朋友约了几位密友，请开希饱餐一顿，并聊了一晚上，稍微满足了开希这孩子的“实荣心”。临别时，开希提到法国往事——美国哈佛大学曾提供他学习名额，我在巴黎时劝他：“民运日久天长，是持久战。哈佛机会难得，千万珍惜！”但是身为民阵副主席的开希却热衷于明星般的民运造势活动。——现在他后悔当初未听从我的忠告，表示准备到旧金山附近的大学深造。此后二十多年我们常互通电话或在网络上联系，2017年7月，我们在纽约的刘晓波追思会上又见面了。

沈彤，“六四”学生领袖，在美国有一面之交。他要到亚洲想顺路访问新加坡，从开希处得知我在此地并好客。1994年1月初我从机场接沈彤到我家住两天，他找到此地的美国朋友后，去那里住了几天。朋友要出差，沈又来我家住到他月中返美。沈彤不愧是美国名校博士生，不太爱游玩；我上班时，他几乎看遍我的存书。请假陪他时，与我讨论法国、美国和新加坡，欧美亚洲三个不同民主国家的异同，以及各种时政问题。

王鸿宾，原四川大学团委书记，1989年流亡法国，民阵骨干。1994年春节王来新加坡，我和已在新加坡定居的赵二军，盛情招待了这位在法时的好朋友。王对我说：“你弃政从学、学有所成，我要向你学习、准备弃政从商。民运勾心斗角，确实没有搞头。”半年后，鸿宾在亚洲考察商机后，再次来到新加坡，他说想到泰国发展。此后二十多年再未谋面，在媒体上看到

王鸿宾已是泰国政商名流、事业斐然的著名企业家。

1995年10月，李光耀让新加坡《海峡时报》总编辑请我去那里工作，此后的两年则是下一章的故事了。

第十二章 李光耀让我到英文媒体

——新加坡《海峡时报》(1995～1997年)

第一节 特殊优待与首战告捷

12-1 此前被特批化名接受采访

1995年4月，吴庆瑞让新加坡英文的《海峡时报》（简称时报）发表署名阎淮的“对陈云盖棺论定”的文章后，这个英文媒体开始关注我。时报总编冯元良1995年4月底宴请我，希望该报多发表我对时局的分析评论。我答：“身不由己，吴庆瑞说了算！”吴被冯总编多次纠缠，最终批准我可以用化名接受采访，但不许提东亚所。我遂使用“Jiang An”的化名，对外解释，出生在江苏淮安，即“江安”。真实含义是：阎淮是父姓加“淮安”的首字，“姜安”是母姓加“淮安”的尾字。以此，向50年前我满月时从老乡家要回已送出的我，又带我千辛万苦、万里北上与父亲团聚的伟大母亲致谢和致敬！海外母姓是保密的，公私机构（警察局、移民局和银行、保险公司）核实身份时，都询问母姓。因此对外我不提“姜安”，这个我心中的秘密。于是1995年5月之后，英文的时报就经常出现对“中国政治分析者Jiang An”的采访，刊登我对中国时局长篇大论的分析和预测；仅在8月底至我签约该报之间的40天，就有8.24，9.2，9.8，9.19，10.4五次采访报道。（有些不订时报的朋友听说有我的评论，向我要报纸看，我才在8月底开始向时报要有关我的报纸，再传真给朋友们。因此仅存有上述报纸的复印件。）

8月21日晚，我为新加坡三领袖访华打前站、去中国一个月刚回来，时报冯元良总编辑携中国部主任再次宴请我。酒过三巡，冯总编突然提出：“阎兄，请到时报来工作吧！”我吃惊：“新加坡人皆知：吴庆瑞的雇员，无人

敢挖墙脚；吴开除的，没单位敢要！您喝多了吧？”冯：“吴是二号，还有一号呢！”我叉开话题，闲聊去中国吉冀苏三省的观感。冯则大谈时报的悠久历史、辉煌现实、美好未来。我当天日记记载“聊到夜12时”。

9月27日，吴庆瑞召见我：“我身体不好，明年要退休。我不再给你签订固定合约，你愿意干可继续干，不愿干可随时离开。”我答：“感谢您对我的优待，我会认真考虑。”按新加坡的规矩：1992年10月开始履行首次两年的合约，两年后每年续约，若雇佣双方谁解约，需要提前半年通知。94年9月东亚所书面通知我续约，现在到了我下一年度的续约时间。我这才明白冯元良上月邀请的涵义，随即与冯联系。冯说：“没有李光耀的圣旨，别说吃酒了，就是吃了豹子胆，也不敢挖吴庆瑞的红人。”

28日，东亚所黄朝翰所长得知我“自由”了，极力挽留我。看来，黄完全在状况之外。我诚恳感谢他，暗示已萌生去意。

10月6日冯元良宴请我，详细向我解释时报与我的合同。7日我禀告吴庆瑞：正式辞职。9日周一我与冯正式签约，因为在东亚所还有没用完的假期，合同下月正式生效。

10日中午，我叫外卖到东亚所，宴请全所几十人。下午东亚所开我的欢送会，以研究所的名义赠送我一个刻有我名字的纪念大铜牌，许多朋友送了礼物和众多的祝福。我将日前苏州市长赠我的精致的双面苏绣送黄所长，颇动感情地讲述刚来所时，送他礼物被充公的往事。最后说：“我谙熟新加坡反贪法，只有一种情况、下属可送礼上司，即一方离职。今天我报了三年前的‘仇’！”尽管几年中与所长小摩擦不断，那天我们两个性情中人却含泪相拥而别。我随后回到刚离开两个月的中国度假。

12-2 在英文媒体的特殊待遇

1995年11月1日，我进入具有150年历史、新加坡股票指数以其命名、东

南亚最具影响的英文媒体：《海峡时报》。它隶属于新加坡报业控股有限公司，报业控股还拥有中文的《联合早报》（简称早报）、马来文和印度文报纸。在透明的玻璃围墙中间的总编辑室里，与冯元良总编辑（以下简称冯总）进行第一次部属与老板的正式谈话。主要内容如下——

我的三项职责：

一、每半月，参加一次社论委员会会议，提供有关“大中国”社论的意见——即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大陆、国民党执政的台湾和英国统治的香港。

二、每周，由冯总出题目，有时冯说是李光耀出的题目。偶尔我自报，撰写一篇与中国有关的专栏文章。随着文章影响力的扩大，广告也愿意登在此版；通常一两千字的中文翻译成英文就是大半个版，加上或广告、或漫画、或照片，就是一个整版。两年约百篇文章，下一节，我将介绍重点文章。因为JiangAn（江安）已为读者熟悉，故专栏文章仍用此名。我的文章“经常偶尔”被香港、台湾和马来西亚的中文报纸翻译转载，这时冯总特别高兴就宴请我；后来冯接纳我建议，买点心糖果犒劳为我翻译的中国部。

三、每日，浏览中国部转我的、世界各大媒体的百余条有关中、台、港的新闻报道篇目（这些标题，有些原本是中文，有些则由中国部译成了中文），精选三分之一，让中国部全文翻译成中文；我详细看其内容再留下约十篇，缩写到适当篇幅，根据重要性建议放在头版或中国版；最后交中国部翻译成英文刊登在次日的报纸上。若有重要消息遗漏未登，冯总就会接到李光耀的指责电话。我来后，此报再未受过李批评，还偶尔得李夸奖；冯总还经常幸灾乐祸地告诉我，中文的早报又挨骂了。

不懂英文、又特殊的我，在英文报社花絮多多。

报社每个雇员都隶属一个部门，冯总说：“你只受我领导，只对我负责，但不能放你在总编室。你与中国部联系较多，就算中国部的人吧。”于是，就了有某部门的部员不归该部门领导的怪事儿。雇员的考核鉴定、奖金

发放、升级长薪，都是部门主任提议、分管副总初定、最后总编辑拍板定案。我的一切，则都由冯总一人干纲独断。

到报社人事部报到、办理相关手续，要我在计算机上学习有关规定和数据的培训，然后通过计算机测试，及格后方能开始工作。对着计算机上的英文我一筹莫展，人事部黄经理电话请示，冯总说：“算了吧，我教他！”黄说：“我们这么正规的公司，你不培训就工作，史无前例！”

我撰写文章需要软件“中文之星”，我想自己私人下载。中国部主任反对：“这算盗版，我们正规公司不能用你个人的，我申请购买。”财务部经理惊讶：“我们英文报纸，花几百元买中文软件干嘛？”冯总生气：“我月付万元请来专家，几百元算什么？以后阎先生需要什么，就买！”

半月一次的社论会议，同这个英文机构的所有活动一样，使用英文，我首次参加会议“两耳一抹黑”。冯总立刻叫来中国部主任为我同声传译，并规定以后此会改为中文。个别不懂汉语的马来人和印度人自认倒霉，自带本部门的双语人才充当翻译——新加坡的欧裔白人大都不懂汉语，但时报的却精通。

我到报社后，对冯元良说：“你小我几岁，过去总尊称我阎兄和您；现在你是老板、我是下属，还称‘阎兄’影响不好。就直呼我阎淮，或者叫老阎吧！”冯总劣习不改，仍公开大呼阎兄。报社的老外还以为我姓阎名兄。更糟糕的是，大姑娘小伙子也开口闭口阎兄。我说：“我儿子都比你们大，该叫阎叔阎伯！”没办法，无论长幼异口同声仍是阎兄，只有从台湾读政治学硕士毕业的小李尊称我“阎教授”，因为我的成名著是他们的教材。

在人事和奖励的优待——

报社雇员共分10级：1-5级为普通级，见习期一年；以上为执行级，见习期半年。我被定为5级，职称是“分析员”，工资比东亚所高一半。1996年1月底，冯总说：“三个月了，您（他对我一贯称“您”，屡教不改。）完全

可以适应英文媒体工作，下月转正，定为7级。我才9级。”于是，我更新名片，职称加上“高级”二字，工资是东亚所的两倍。1995年只在时报干了两个月，年底冯总说：“给您多发两个月工资吧，正式奖励明年再说！”——英文机构也有华人公司的陋习，年底双薪。

1996年底，我填写了《考核表》前面的《自我鉴定》部分，交冯总。冯看过后，按规定程序约我“交换意见”。他解释倒数第二页他签署的《部门主管意见》：“我对您的评价非常高，等级是少有的‘异常优秀’，年终奖也是全报社最高的6个月——董事会才给我3个月。至于您的不足，我只能写‘不懂英文’了，您这辈子也学不会了！”我说了非常感谢后，在“个人意见栏”写下“Agree（同意）”。冯总又在最后的《报社领导意见》页，再次签字。

收入高，也是世纪末，我在美国申请第一类特殊人才绿卡的一个条件。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办公场所，正如在影视中常见的，体育馆大小的办公大厅里，塞进了上百个记者、编辑和部主任，彼此用一米五高的薄板间隔；只有总编辑一人在角落的玻璃屋里。我被隔离在墙角，算是相当照顾了，也是我的一种崭新的人生体验。在美国和新加坡东亚所，我都是独门独户的私人办公室。小中大学皆睡午觉，养成劣习；在中国机关工作，午休睡沙发；美国不坐班，在家午觉。在新加坡东亚所时午饭后，门一插，铺开凉席美睡一觉。在报社若困，只能开车回家午睡，下午在家写专栏文章，好在只要上午选完次日见报的中国新闻即可。

九十年代中期，通信设备开始移动化和小型化。报社要配我手机，便于随时联系、证实证伪那些突发疑难新闻。我不愿全天候卖给报社，像某些“7-24广告”那样，每周7天每天24小时服务。藉口经常丢失物品，拒手机而选传呼机；冯总何等智商当然明白，也不强求。周末节日，我偶尔推诿在外岛或山上，不方便回传呼；心想，我没来时你们不也运转不错吗。

报社的台港二同事高蓁，台湾中年端庄淑女，美国化学硕士，原是美国企业高管，待遇优渥。1995年初，随新加坡籍美国科学博士的丈夫海归新加坡。丈夫高薪返新、子女长大成人，她功成名就衣食无忧、极欲圆当年“文学少女”的记者梦，拒企业诱惑、投身时报。我钦佩淡泊物质享受、追求精神自由，只听从心中“神”的召唤者。（到海外，做并只做自己愿意的事情，我感到愉悦无比！）我被吴庆瑞“解禁”后，对我的采访大部分是她完成的；经过多次深入交谈，我也成为她们家庭的朋友。

程翔，原任香港中资媒体《文汇报》副总编，“六四”时在北京采访学运，惨案后愤然辞职；遂创办《当代》杂志，传播民主自由思想。1996年底为躲避“九七大限”，移居新加坡，进入时报。我们原本彼此知晓、价值观相同，一见如故立成好友。程翔新世纪任驻中国记者，2005年被捕，中国以间谍罪判刑5年。出狱后著书《千日不悔》辩白自己。我们至今仍有联系。

至此，报社海峡时报仅有的三位非新加坡籍的华裔“外国人”，形成了中港台“铁三角”。我们三人分别负责本人家乡的内部评论，而三地相互关系的选题，则互相切磋、谁更熟悉即由谁操刀。大陆大于台湾、香港两小岛，我的文章自然多点。对于港台知识，二位朋友对我教导颇多、使我受益匪浅；他们皆精通英文，经常帮我处理私人信函。

12-3 解读五中全会首炮轰鸣

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于1995年9月28日闭幕。我已决定离开东亚所去时报，10月上旬我匆忙赶写出近万字的长篇分析评论文章，中下旬回中国度假。时报于10月中下旬分四天刊登，它在多次采访江安的分析评论后，首次出现江安的大块文章。其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篇：《中共重视军队的专业化》

全会公报说：“全会决定增补张万年、迟浩田为中央军委副主席，王

克、王瑞林为中央军委委员。”小学生都认得的几十个字，其中奥秘几人懂？

原来军委委员的次序是迟浩田、张万年，现在副主席的次序颠倒。各国媒体大都没注意到这个颠倒，只认为是正常晋升，甚至有“惯性地”写成“提升迟、张为军委副主席”。我分析：迟浩田政委出身，一直做政治工作，1987年才由济南军区政委转任总参谋长，93年任国防部长。张万年行伍出身，一直是军事首长，1993年接任迟的总参谋长。此次颠倒，说明中国军队的一号首长不再是玩嘴的、而是恢复成玩枪的了！

邓小平的警卫秘书出身的“邓办”主任王瑞林，升任军委委员，给“平民”邓小平足够的面子，也为以后“核心”的马弁晋升铺平道路。

沈阳军区司令王克升任军委委员，外界议论纷纷。有说：“中国军委民主了，也像政治局，吸收地方诸侯参与决策。”我分析：军委不似政治局，个把月开一次会、讨论上一半天，来点象征性民主；它是突发事件的决策指挥中枢，委员不可能在外地！我断言：“张万年是军委第一副主席，不可能兼任迟浩田防长手下的总参谋长，原后勤部长傅全有必将改任总参谋长，王克肯定升为后勤部长！”

我这篇文章发表几天后，上述预判全部落实。我在时报首炮打响开门红！朋友们说：“看你文章时为你捏把汗，真敢说呀！好像你参加了政治局常委和军委的联席会议似的。”

我从中国返新后报社说，俄国和日本驻新武官分别要宴请我。冯总说：“报社与保密的东亚所不同，要广泛接触各国各界人士，照吃不误！”我吃人家的嘴“短”，如实相告：“我离开中国政治中枢已多年，无秘闻来源，只靠吃老本瞎分析。”略通汉语的俄国武官也坦承：“我只是驻小国的上校，期望将来能升任驻华武官，当上将军，就靠您帮忙啦！”此后他经常找我“请教”。日本武官我沾惹不起，只吃一饭，随后就总是借故推辞。新加

坡国防部安全情报局许国丰局长也宴请我，希望我到报社后继续保持每季度去讲课的传统。

第二篇：《陈希同案与中共高层反腐》

五中全会对陈希同定性为“严重错误”，因此“撤销党内一切职务”，但仍称“同志”。我认为：陈案党内程序已走完，下一步必定诉诸法律，起诉、逮捕（同时开除党籍取消同志称谓）、审判、定罪、判刑、收监。此举既可表明中共反腐打虎的决心，又更加巩固江泽民的核心地位。何乐而不为？！

第三篇：《中央集权是近期发展的总趋势》

经济问题是五中全会最重要的议题，公报90%的篇幅介绍“经济的中长期规划”。会后公布了江泽民和李鹏各自的万言讲话及两万字的“九五计划和15年远景建议”。我研究上述文件后得出四点看法：1、继续加强经济的中央集权；2、“建议”突出国力不足的困难；3、要求维护中央权威；4、严厉批判分散主义。

第四篇：《政治改革遥遥无期》

1、中共十三大开始的政治改革，在1989年后全面倒退。2、五中全会仍然搁置政治改革。3、全会突出精神文明建设。4、自中共80年代提出两个文明以来，笔者一贯认为存在三种文明。物质文明：人与自然的关系；精神文明：人的自我修炼，如“四有”（有理想、道德、文化、纪律）；制度文明：人与人的关系，如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制度等。江泽民指出的“治安不好、腐败和丑恶现象蔓延”，靠精神文明的思想教育无济于事，只能依靠我强调的“制度文明”！

七年后，2002年中共十六大终于提出了第三个文明，与我提出的制度文明同样涵义异曲同工的政治文明；但是比我晚了20年！孙中山说，人有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中共不知不觉了20年，终于后知后觉了；但

是不搞政治改革，即忽视政治文明，腐败蔓延社会溃败势在必然。

第二节 两年撰写百余篇专栏文章

12-4 邓小平未盖棺已定论

保密的东亚所明令文章不许外传，公开的时报希望文章被转载，只要注明来源。但是，时报不允许雇员接受其它媒体采访和投稿其它媒体。这是冯总代替“培训计算机”对我的当面教育。我立即禀告：“今年四月陈云逝世，你们时报刊登我的纪念文章，早报林任君总编辑不甘示弱，就约我写了评论邓小平的文章，准备老邓去世时立即发表。”冯总：“这篇已在它们手里，就由早报随时发表吧。尽管我们同属报业控股一个集团公司，但毕竟还是竞争对手，以后不要再理他们！”

年底老邓仍然健在，早报急不可待了。1995年12月30日，《联合早报》周末“言论版”，用半个版刊登我的长文：

《邓小平——本世纪最具争议的政治家》

该报此文的大字提要（即编者按）说：“1995年即将结束，这一年，中国在国际事务上，扮演了举足轻重、富有建设性的角色，对世界、特别是亚洲的未来发展，起着极大的影响力。而在这崛起的背后，是一位令人瞩目的伟人——邓小平。本文作者乘此新旧年交替的时刻，描述他的功绩与贡献，肯定有特别的意义与参考价值。”

早报无愧人称“人民日报新加坡版”：拙作未见“伟人”之称，描述的不是“功绩与贡献”、而是“功绩与过失”。我定位“邓小平时代是开明专政时代”……好在他们一字未改地刊登了我三千字的文章。主要内容摘要如下——

世纪初降临、必将在世纪末逝去的邓小平，已与世纪同行了90多年。本世纪是一部完整的社会主义兴衰史。世纪前半叶，由列宁、毛泽东创立的

欧、亚社会主义制度；在世纪末，由戈尔巴乔夫在政治上、邓小平在经济上瓦解。为此，卓越的改革家戈尔巴乔夫和邓小平将名垂青史。

邓小平被誉为“改革的总设计师”，其功绩是推行市场经济使中国经济现代化——已被举世公认，无论其臣民抑或敌人。但是，对邓在政治改革方面的评价则有天壤之别，且在海内外皆贬多褒寡。非但目前难盖棺定论，且可能长期争议，并将影响下世纪中国政治走向。

一、改革保守双重角色

我用500字评述邓小平直至80年代末的简单经历，最后一句是：80年代末期，爆发学运僵持50天，武力镇压惨死数百人，酿成巨大悲剧；邓以江泽民取代赵紫阳，政治经济全面紧缩；辞去军委主席，成为退而不休的“普通党员”。

二、政治特色与最终定位

90年代初期，邓小平“南巡讲话”倡导市场经济，推崇新加坡经验；十四大经改加速、政改停滞。邓在毛死后，“忽左忽右”地左右中国政局20年。

作为“打江山坐江山”的第一代，邓小平具有强烈正统的政治信念，即他总结的“四个坚持”，核心是坚持一党专政的统治。异于毛，邓出过国、喝过洋墨水，较具现代思维；全家深受文革迫害，对中共弊端深恶痛绝；因此对政治改革有强烈自觉意愿。一党专政的强烈信念与政治改革的强烈意愿之间的强烈矛盾，铸成邓20年的矛盾心态和矛盾举措。邓倾向专制派的元老时，被斥为保守派；转向民主派的胡耀邦和赵紫阳时，被誉为改革派。中国政局也相应地周期性震荡，“逢单年左、逢双年右”。邓的思想深层，专政是目的，改革是手段；如他所言：“政治改革是为了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二者不能平起平坐，更不能本末倒置。此即邓与胡赵的本质分歧，最

终导致胡赵被遗弃。

若言“林彪反叛”是对毛泽东“文革理想”的最大打击，“天安门事件”则是对邓“政改理念”的致命一击。但85岁的邓未像78岁的毛一蹶不振，而以务实精神反思探索；近90高龄时，振聋发聩倡导市场经济、推崇新加坡经验，使中国经济再次腾飞。

邓小平最终为中国确立了市场经济化、政治稳定化，即政左经右的新权威主义航向；把自己的形象定位在“加紧政治控制、推进经济自由、巩固中共统治”的新权威。

三、政治改革三大遗产

1980年，邓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深刻剖析中共集权主义、特权制等封建主义弊端，尖锐指出中共重大错误的根源是制度问题，明确提出要政治改革、创造比（他肯定的）西方资本主义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制度。尽管此次改革不幸夭折，但经政治局通过、载入“邓选”的此篇文献，是邓政改思想的光辉顶峰，将为日后政改提供深刻的理论依据。

1987年，邓主导的十三大通过赵紫阳提出的政改方案，从民主政治、加强法制等七大专题，详细论述政改的目标和措施。“六四”赵被废黜，邓仍说：“十三大决定，一个字都不能动！”此《政改方案》政治上的合法性、实践上的可行性，无疑是今后新政改的良好基础和较高起点。

1992年，邓的《南巡讲话》表面是论述经济问题。但这是他生前最后、也是最杰出的政治大手笔。邓强调“不问姓社姓资”，淡化意识形态，为将来可能的政改扫除无谓的障碍。他提出“学习新加坡经验”，为政改指引方向、提供榜样。尽管中共不愿学习新加坡的政党政治和议会民主，但法治精神和中立专业的公务员制度，都可成为未来政改的突变口。

毛泽东死后，中国每前进一步，皆是对毛理论和实践的批判与反动。邓则为中国继续前进提供了广阔天地，即使在最艰巨的政改领域，也提供了上

述三大遗产。邓小平最宝贵的政治遗产，就是后人不必“批邓”而重新政改，以顺应时代潮流逐步政治民主化。

邓还有另一份遗产。若新领袖长期坚持“只经改不政改”的邓小平晚年思想，使腐败和治安等社会问题继续严重恶化，将激化社会矛盾，引发政局震荡——人们相信他们不会保守和愚蠢到如此地步。（目前情况如何？笔者不敢妄议，看官自有明断！——阎2017年注。）

四、历史、现实、未来

毛泽东时代，是只许拥护、而且必须拥护的独裁专制时代；邓小平时代，是不许反对的开明专政时代，人们有了沉默与中立的“不拥护”的权力。百姓只要不在政治上有组织地公开反对中共，就能在经济文化领域具有相当广泛的自由；民间社会初见雏形。20年前毛逝世，留下一个政治、经济、社会危机深重、闭关锁国前途渺茫的国度。当邓离世时，尽管存在着道德危机严重等社会问题，但是人们看到经济比较繁荣、政局相对稳定、国际关系融洽、充满信心与活力的中国，正在现代化的轨道上高速前进——这就是邓小平对中国、乃至对世界的真正贡献。

20世纪已走完95年漫长历程，最后5年即将来临之际。我希望并且深信：21世纪的中国，必将政治民主、经济富强、法治健全、人民自由，在国际舞台上扮演更举足轻重、更富建设性的角色——届时，历史将为邓小平最终盖棺定论。

在我文章之后，联合早报用黑体字介绍我的经历，从清华毕业，到法国、美国的诸单位，直至任东亚所研究员；最后一句是：“现从事中国政治、社会问题的研究、分析和写作。”《海峡时报》的同仁反应强烈：“您来时报好几个月了，早报故意不提您是我们的同事。太小气了！”曾经同为英国殖民地的新加坡，与香港一样，英校生看不起华校生、英文媒体高华文媒体一等。早报按新加坡法定周休一日半，海峡时报却按西方惯例休两天，

待遇还比早报优厚许多。还是冯总深刻："早报急着发表，是怕邓小平久拖不亡；将来发表时，不得不注明作者是我们时报的专栏作家啦！"企业之间为经济利益，竞争得你死我活；事业单位为名誉声望的竞争，也用尽手段。名、利；名、利！个人和集体都躲不开，只是侧重不同而已！

12-5 有关港台和钓鱼岛的文章

1995年12月2日《海峡时报》周末评论/分析版（此后我的专栏文章多在此版），整版刊登我用半个月精心撰写的四千字长文《台海从此不平静——中台关系的回顾、分析与展望》。我回顾，今年将以中台关系戏剧性变化而载入史册。我分析，大陆对李登辉竞选总统的三策是：上策，压李退选；中策，逼李迟选；下策，迫李低票当选。大陆最不愿意的是：李高票当选、台独大胜。我展望，大陆将继续加强"文批武吓"保持适度压力。我认为，冷战长期延续，热战不会发生！大陆的战略考虑应是"三不影响"：不影响经济发展、东亚和平、世界均势。将按我杜撰的"弹簧理论"对付台湾：不管它，乱蹦乱跳；轻压，反弹厉害；重压，它即就范；狠压，弹簧破裂、刺伤手指，两败俱伤。结束语必然要调侃政客："对中台关系不应盲目乐观，也不必过分悲观。政治是妥协的艺术，政客都是现实主义者。人们应相信：政治家不比凡人聪明，但也不会比我们太愚蠢。"

这是我以《海峡时报》雇员身份发表的第一篇文章。10月写四篇评论五中全会的开门红文章时，还未正式上班，因此文末介绍作者是"中国政治分析员"。这篇"台海"及此后的近百篇文章，均在文章后注明"作者在海峡时报中国部，原文是中文，由某某翻译。"

海外讲座，首尾常讲笑话。在东亚所时，主持人曾介绍："请政治学家阎淮演讲。"我于是顺着主持人的介绍开讲："某家生四子，父亲说，老大聪明当科学家，老二能干当企业家，老三笨且坏就干政治家吧！"听众看着在场官员哄笑。我继续："爹地说老四比老三还坏更蠢、什么也干不了，就

滥竽充数弄个政治学家吧。我这德行，也就只能混成政治学人了，不敢误人子弟，今天就来误人父老叔伯吧！”我过去以“独立政治分析员”身份接受时报采访时，同样经常取笑各国领袖。现在是该报的专栏作家，还想保持一贯劣习；就在首篇文章最后，如上所述，调侃包括新加坡在内的所有政治家。我在测试各方的容忍度。结果：送审冯总、毫无异义，发表之后、上峰泰然。此后我愈发大胆放肆。

新加坡是全世界中国与台湾之外，唯一华人居多数的独立政治实体，并与双方关系皆极佳；是除美国外，最关心两岸关系且与之休戚相关的。上述台湾问题的长文发表后，新加坡朝野反响强烈，我彷佛成了两岸关系专家，又被最高层命题作文。我在国内对台湾问题毫无研究，到海外也是靠对中共的了解混饭吃。临时抱佛脚，恶补中台关系，又赶出两篇：12月中旬，《捕鱼纠纷——中台冲突的火药桶》和《在中国，谁决定对台政策？》分别以半个版的篇幅发表。

中台关系的三篇文章，也引起台湾在新机构的重视，驻新加坡台北代表处文教秘书张泰来和贾慧分别“约饭请教”。此二人皆为职业外交官，新世纪都任台湾驻外副代表，相当于副大使。

此后，中台之间风吹草动，大陆即闻风起舞（武），我则奉命随风起文。仅在1996年台湾首次总统直选前后、两岸关系异常紧张的第一季度，我就又发表六篇有关台湾的文章。其中一篇于3月13日马来西亚中文的《南洋商报》以《全面战争不可能爆发——专家认中台紧张会持续一段时间》为标题，翻译转载。转文第一句即是“这是新加坡海峡时报一名作者蒋安（译音）的看法。”整个译文基本符合我的思路，但从中文翻译成英文、再翻译回中文，难免个别意思不准确。他们得不到中文原稿的原因如下：

此前，1月在新加坡新闻部长的招待酒会上，陈继豪副部长介绍我就是“江安”时，港台和马来西亚驻新加坡的几位记者站站长，希望我今后可以

提供中文底稿，利于他们翻译转载时的准确性；新加坡电视台长也表示，电视台也想经常采访我。这一切请求，当即被冯总以知识产权归时报，而断然拒绝。

1996年5月，台湾陆委会主任张京育与几位新加坡的台湾问题专家座谈，彼此交换看法。这是我94年访台后，首次与台湾高层再次接触。张对我的文章很感兴趣，我也请教了许多问题，对我此后的多篇中台关系的文章不无益处。

1997年4月，我发表了最后一篇论述中台关系的文章《无新意、有善意、需创意！》，就江泽民对台问题的最新讲话精神——若中国统一，台湾领袖可任国家副主席，作评论说："96年8月笔者曾建议：将来两岸采用联邦或邦联的模式，统一在PRC和ROC两个中国之外的CHINA中国的国号之下，如日本、蒙古、马来西亚等世界约三分之一的单名国家。也可如英国，其全名"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大不列颠（即英伦三岛，包括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与北爱尔兰，在人口、面积、实力皆相差甚远，但两地区在国名中却可并列，给人启迪。"

1996年下半年临近"九七大限"，香港问题升温，我被要求撰写有关文章。在恶补后，于香港回归前的八个月里完成五篇命题作文——中国怎样领导香港（1996.9.28）；倍受争议的香港驻军（12.3）；港府修改刑诉法中英再掀大争执（12.19）；台湾与香港（1997.5.8）；北京需要并能实现香港的继续稳定与繁荣（5.18）。

《钓鱼岛是中国固有领土》（1996.9.21）

1996年7月，日本"青年社"在钓鱼岛上修建灯塔，掀起海外华人新一轮保钓运动。1990年访台湾时，受邀在"爱盟"（因保钓而成立的）19周年庆典演讲，被"爱盟"领导马英九、胡志强、郁慕明等人补了一堂"保钓"教育课（在大陆对此一无所知）。我觉得不能沉默，遂请教1989年离国赴法时

在香港帮助我的郭少棠教授（亦为保钓义士）。自报此题目，得到批准发表。

《中国对日本，为什么不强硬？》（1996.10.4）

1996年9月26日，港人陈毓祥欲登钓鱼岛，不幸溺水身亡；使如火如荼的海外保钓运动更上一层楼，相比之下，中国政府却对日软弱。气愤之下写出此文，我分析中国软弱的四条原因：一、全球战略：联亚（洲）睦邻抗美；二、经济发展：需要日资；三、微笑外交：避免中国威胁论；四、民族主义：引发民主的双刃剑。我的结束语现在仍管用："海外保钓运动风起云涌，中国再不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亡羊补牢犹为未迟，后发制人的中国应该在不严重损害上述四点的情况下，以比过去稍微强硬的态度和行动，逼迫日本回到'搁置主权、共同开发'的旧日共识上。彻底收回钓鱼岛，一劳永逸解决此难题，为时尚早。"

12-6 中国时局分析

对中国大陆时局的分析预测是我专栏文章的重点，占总篇数的一半。按其内容可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会议评论

人称："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国民党税之多寡，无亲身体会；共产党会是真多，在国内深受其害，到海外身受其利。在东亚所就吃过党代会和人代会的饭（写其论文），到报社就更频繁了。春天的人大政协，秋天的中共中央全会，是中国政治生活的重头戏。（1994年四中全会和1995年五中全会关于人事决议的内涵，都让我蒙对了，抬高了我在东亚所和时报的声望。）

1996年3月，人大政协两会期间我撰文四篇：会前预测、会中分别介绍两会的概况、会后综述会议三大特点（强调依法治国、反腐呼声高涨、突出地方利益）。

《六中全会与精神文明》（1996.8.13）

预测全会关于精神文明决议的重要性和局限性。文中说：“笔者再次强调‘制度文明’。例如，肃贪反腐必须：健全人事制度，不能贪；严厉制裁法律，不敢贪；中薪养廉，不必贪；强化职业道德，不愿贪。前三项属于制度文明，只有最后一项是精神文明。可惜中共还未认识制度文明。”六中全会结束后，我研究其一万五千字“关于精神文明的决议”，概括四大特点：意识形态浓厚，强调经济建设，紧缩文化控制、加强江泽民地位。时报分两天刊登（11.6，11.8）。

《中共十五大：中国今年最重大事件——邓时代终结与江时代开启》（1997.2.15）

文称：“邓小平已经没有能力主导下半年的十五大，无论届时他在世与否。十五大都将是20年来，第一个没有邓小平本人及其影子的党代会，它将是邓时代的终结。”（不料，邓竟在四天后去世，同事戏称被我咒的。）

《十五大的预测和分析》（1997.2.16一整版）

我对于会议的召开时间、筹备工作、高层变动，进行分析预测。2月18日，香港《信报》又将英文文章翻译成中文转载。

第二类、领袖褒贬

依时间顺序主要有以下几篇，括号内是发表时间：

《李瑞环：最年轻的第三代领袖》（1995.12.19）；《李鹏为加强地位出席亚欧会议》（1996.4.6）；《张万年：最高军事将领》（1996.4.26）；《胡锦涛和第四代领袖》（1996.9.26）；《江泽民在邓后仍将掌权》（1996.6.21）；《江泽民已牢固控制军队》（1996.6.27）；《元老作用的回顾与展望》（1996.7.5）；《江泽民现在拥有不可动摇的地位》（1996.10.12）；《贾庆林任北京市长拉开十五大人事序幕》（1996.11.11）；《彭真：资格最老、一生坎坷、晚年失意、临终起落》

（1997.4.28）；《中国领袖排行榜》（1997.4.29）；《中国的元老的演变》（1997.5.5）；《已故领袖子女今安在》（1997.5.11）。

邓小平逝世前后轶事

1997年之前，邓在世界各国媒体上已经死了无数次，我也经常被各路朋友询问。我只能回答，没有确切消息！1995年4月，比邓小平小一岁的陈云去世后，各界倍加关注邓的生死存亡。早报立即约我写“悼念亡邓”的文章，准备随时发表。1995年底早报等不及，即以“评论活邓”的形式发表。1996年底遵时报冯总之嘱，我把上文进行修改，加进两年以来新的思考，时报翻译成英文，以备不时之需。

1997年2月，邓小平病故的消息不断传来，我也不断地被要求证实。19日晚10时，铁哥们宋克荒（中共元老宋任穷之子）在中国北京中南海的家里，用39局保密电话打到我在新加坡的家中：“大老板走了，海里封港；你听外面的汽车声音。”离国前我在康华公司，都说邓朴方是我们老板，大老板就是老邓了。邓亡，中南海戒严；电话里果然不平静。二十多年前，1971年9月，也是宋从北京寄信甘肃，告我林彪及妻、子死讯。我随即电话冯总：“邓已亡！消息准确，不要问来源。中国不会匿丧不报，今夜肯定公布，快准备稿件，明日见报。”11时，科技部叶丹局长也来电话报同一消息。果不其然，几小时后，20日凌晨2时45分，新华社正式公邓亡布消息。

《邓小平：盖棺未定论的政治家》（1997.2.20一整版），刊登早已准备好的文章。

《简朴后事、客观评价、真挚情感》（2.26一整版）

邓小平追悼会次日，时报又是一个整版刊登我评论治丧活动的文章。对比21年前毛泽东去世时，劳民伤财的隆重活动，我对邓的后事评价较高。并以一个良好的祝愿结束全文：“中国第三代领袖完全独立自主地处理的第一件全世界瞩目的大事——邓小平的治丧活动顺利圆满结束。这是一个良好的

开端、一个吉祥的预兆。我希望：正如江泽民日前对哈萨克斯坦总统所言，‘中国的发展会更好，对人类和平发展和进步作出更大贡献。’”

第三类、年度预测和总结

《1995——江泽民权力巩固之年》（1996.1.16一整版）

文中说，“江泽民在处理人际关系、运用政治权术方面，确实比其前任、锐意改革的胡耀邦和赵紫阳，比其同僚、‘大愚若智’的李鹏、深藏不露的乔石、锋芒毕露的朱镕基，略胜一筹。历史在前进、时代在演变，毛泽东的伟人时代一去不返，邓小平的强人时代稍纵即逝，江泽民的能人时代已经降临。1995年，尽管有不少自然灾害，仍是农业空前大丰收的一年；同样，尽管有不少政治风波，也依然是江泽民政治大丰收的一年。”

《1996——讲政治、论统一、保稳定》（1996.1.25一整版）

“论统一”是指中国当年提出的“统一思想、统一步调、统一行动，以统一保社会稳定。我最后说：“不期望江泽民能加速政治改革、推进全面现代化，至少应对日益恶化的官员腐败和社会治安，采取有效措施予以改善。如是，则百姓有幸，江的合法性基础将加强。”20年啦，腐败和治安一直是中国的痼疾和癌症！

《中国1996：经济健康、外交顺利、政治稳定》（1997.1.12两整版）

简单摘要如下：“经济软着陆，通货膨胀由94年的21%、95年的14%，降到6%，而经济增长10%近年首次超过通膨。中国与美、俄、日、印等大国关系明显改善，中国领袖出访36个国家，有41国领导来访。政治加强控制而持续稳定，强力镇压异议分子。鲍彤刑满仍被软禁，王丹和刘晓波再次入狱。托克维尔说，一个坏政府最危险是它企图变好时。中国现在没有‘变好’，近期也无此企图。因此，它既没近忧，又无远虑。”我如此犀利的观点已被新加坡高层默认。这就是王岐山近年推荐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主要论点。



1997年1月，《海峡时报》周末版第一、二两个整版套红刊登作者笔名Jiang An的文章。

这篇文章被刊登在“星期日版”的第一、二两个整版上，首版套红、特大号字体的通栏标题。冯总说：“周日版是销售量最多、影响最大的，上层（李光耀的代称）已同意，您今后重要文章都刊登在这里。”

第四类、民族及军队

《西藏：中国的另一块心病》（1996.10.31一整版）

针对我的文章，次日有读者发来整整一页纸的问题。过去来电话表达看法、提出疑问者常有，电话转我，简答之。这次要认真对待。我在第三日（11.2）的报纸上公开作答。

《新疆：危险的信号、崭新的难题——民族分裂与恐怖主义结合》（1997.3.29）

《中央军委与中国军队》（97.3.2整版，香港《信报》3月4日翻译成中文转载）

《谁掌握枪——中国军队与党的关系》（97.4.13整版）

我的失误

前面提到我“过五关斩六将”的光辉战绩，但也有“马失前蹄走麦城”的劣迹。

1、1996年9月《中共恢复党主席制度的益处》。文中说：“明年十五大

改总书记为主席制的消息，年初即传出，虽未被官方证实，但目前更为海外媒体广泛传播。我认为若恢复党主席制有三点益处：1、江泽民任党政军三主席，有利于邓后党政军一元化。2、李鹏总理任满，改任三个副主席，不任人大委员长，避免委员长高于总理。3、胡锦涛任总书记，名正言顺领导书记处，第三、四代核心顺利过渡。”十五大召开时，我已离开报社，也无人记得一年前我的预测说辞，但毕竟是我的重大失误！

2、1997年2月《十五大的预测和分析》。对中国盛传常委可能增为九人，我认为有可能，是为误判。十六大常委才变成九人，朋友取笑挖苦："你五年早知道！"

3、新世纪我重返美国，冯总仍经常咨询我。我认为2002年中共十六大，江泽民会全退。结果，他无耻、我无能，我栽了！

12-7 对中国的批评

《中国政府VS魏京生——为什么？怎么办？》（1995.12.30）

1995年12月，被中国关押了20个月的魏京生，又被重判14年。我要求发声，冯总婉转反对。我坚持："刚来报社40天，就遇到中国民主运动标志性人物魏京生再次被重判事件。我这次沉默，今后就失去发言权。若李资政怪罪，你就说劝阻无效；我从此金盆洗手'改正归邪'。"冯总骨子里是自由主义者，放行。

这是我在新加坡公开"干涉中国内政"（中国对海外批评的说辞）的首次，也可能是末次，要把话说够！我以故事开头，"幼时被告知；左邻单身女子乱搞恋爱，要干涉；右舍父母打孩子，人家内务不能管。成年方明白：青年恋爱个人隐私，无权干涉；打孩子犯法，家庭暴力人皆该管。"中间四千字，分析"杀猴儆鸡"的目的，预测"人质外交"的释放形式：（肯定不会关魏14年！）

1、吴宏达（已入美籍的民运人士）模式，驱逐出境；但只对“外国人”有效。

2、王丹模式，出狱后控制（半年前又被捕），不可能。王和魏首次出狱都不愿出国并再次“犯事”入狱，政府不会再让他们在国内而狱外。

3、王军涛模式，保外就医直飞美国。中国肯定经过讨价还价，在最有利的时机、以最有利的价格，把魏京生卖给美国。魏同王军涛一样，极不愿离开祖国，但政府会运用各种手段逼魏就范。”（果不其然！1997年底克林顿总统访华前，魏京生保外就医、直接流放美国。——阎2017年注）文章当然还要以故事结束，“过去看古装戏，官兵捉不到义士，抓其亲属、迫其就范。现在看警匪片，匪徒被困，以自己妻儿亲属为人质、逼警察放行。——人心不古，世道真变了！”

关于魏京生的这篇文章发表在年底，1996年的新年在喜忧参半中度过。朋友赞赏：“新加坡官媒为民运人士喊冤、反对中国政府，头一遭，好！”《联合早报》中国同行羡慕：“也就英文报纸自由度大，俺们中文的，屁都不敢放一个！”哥们担忧：“可别砸了饭碗？”我：“不至于！最严重是今后不许踩雷。”嘴上硬、心里颤，将来若是戴着枷锁跳舞，就不好玩了！节后平安无事，虚惊一场。此后，放开手脚、甩开臂膀，尽情放言。以下都是我自己的选题。

《北京重判王丹的利弊得失》（1996.10.31）

我的强烈不满，已在去年重判魏京生时表达，重话轻话、讽刺挖苦用尽。夫复何言？但是在新加坡的中国知识分子不能沉默！当天疾书短文，摘要如下——

“天安门学生领袖王丹被捕17个月后，刚才得知：北京法院仅用几小时，便迅速以‘颠覆政府罪’重判11年。可以预料，国际舆论必然为之哗然。中国可以不顾反华势力的抨击和人权组织的抗议。但一般世人皆不认

为：给领导写封异议信、与海外民运组织通个电话就是煽动叛乱，更不相信：被严密监视、手无寸铁的27岁病弱青年能够颠覆政府。——这毕竟与国际惯例不符，距百姓常识太远！

六中全会闭幕次日重判王丹，为其精神文明决议实例注解，为意识形态全面紧缩添砖加瓦，使异议分子不敢在十五大前异动。92岁的邓小平健康日差，北京希望邓归西时，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历来对北京镇压异议分子反应最烈莫过美国与香港。现在，美国总统大选，香港推选特首；注意力内转，真是良辰吉日！

去年重判魏京生14年，海外媒体喧哗不到14天；按此比例，这次不过十余日。北京装聋作哑，硬着头皮一顶即过。同过去一样，中国取得眼前利益，但长远所失恐难预料。镇压反抗、巩固政权，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我只期望中国在这方面也像经济领域一样：尽快与国际接轨，做的更高明些、更文明些！”

当天评论版已经整版排上我谈西藏的文章，而我希望在王丹被判刑的次日，我的抗议声音能发出。结果只能在东亚版用半个版刊登此文。于是，竟出现：同一天、同一份报纸发表同一作者的不同文章。

《文革三十年，中国为什么鸦雀无声？》（1996.5.31一整版）

全文四部分：问题的提出、近期直接原因、中期社会原因、长期政治原因。结束语，“笔者希望：中国第三代领袖能认真解决制度问题，使中国真正走上民主与法治的轨道。在文革35或40周年时，能公开严肃地总结文革教训。让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放心——文革的悲剧永远不会再重演！”

2016年文革五十年，清华大学文革时在校学生、百余古稀老翁经过半年筹备，从全国和全世界汇聚北京拟召开“文革反思会”，遭无关方面无理阻挠，两易会场而不得。最后我提议不预定，明日径直去一我熟悉的“合川”小餐馆。我们电话通知外国和外地同学30人于次日中午赴会，其余百余人只

能下午回清华露天集会。二十年前，我“公开总结教训”的期望落空，“让世人放心”的奢望又如何？不管看官是否放心，反正我忧心忡忡。

《天安门风云人物今安在？》（1996.6.4一整版）

5月中旬又逼近那个日子，我拟定题目，越洋电话联系“人物”，完成文章。要求一定整版刊登在“六四”当天，可以有广告，最好不要其它文章来捣乱。结果如愿以偿，上半版我文章，下半版IBM广告。文章这样开始：“七年前的今天，北京发生震撼世界的天安门惨案。当年——中国政府通缉的‘反革命暴乱的组织者’，海外媒体赞誉的‘民主运动的斗士’；如今——身在何方？手操何业？心想何事？笔者日前与其中十几位熟悉的朋友通话，取得第一手数据，以飨读者。”正文分三部分：一、民运精神领袖方励之，详细介绍。二、首批被通缉七位知识分子，严家祺、包遵信、陈一咨、万润南、苏晓康、王军涛、陈子明，较详细介绍。三、被通缉的21位学生领袖，重点介绍通缉名单前五名，其后简要介绍其他人。上述诸位，大部分是我朋友，只有少数可以回国。文章最后写道：“我想起歌曲《松花江上》：九一八（六月四），九一八（六月四），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流浪！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一堂？”冯总说；“能让您纪念‘六四’已不易，这段太煽情，建议删掉。”我忍痛割爱。

《中国为什么管制经济信息？》（1996.3.29）批评中国发出《关于授权新华社对外国通讯社在中国境内发布经济信息实行管制的通知》。

《中国监禁国际货币组织雇员背后的故事》（1996.8.2）抗议中国逮捕IFM雇员洪扬的事件。

12-8 我感兴趣的自选专题

《中国政坛的“清华帮”》（1996.5.19）

清华大学成立于1911年，校庆定在每年“五一节”前的周末；学校逢五逢十的周年大庆，活动丰富，老同学们参加也踊跃。1996年85周年校庆，距我上次参加校庆已十年；虽然近两年回国，北京的老师和同学经常聚会，但外地同学见面很少，这次特想回去凑个热闹。无奈年初春节回国团聚及随后的马来西亚和泰国的两次游玩，三周的年假已用完，只好假公济私啦！我游说冯总：“中国政坛现在是‘大清王朝北大荒’，清华高官占据要津、各方关注。我对此小有研究，想这次校庆出差回去，‘公私合营’、公私兼顾，进一步了解，回来写一篇高质量的文章。”获批准！4月25日我回国一周，返新后发表《中国政坛的“清华帮”》，摘要如下——

一、清华校友高官多，政治局和常委占1/4，3位人大副委员长、3位政协副主席及领导人中唯一女性；中央委员会中1/10。

二、名师荟萃高徒满堂，中科院和工程院的院士中1/3在清华学习工作过；清华现教授有科学院院士16人，工程院院士15人。

三、为什么清华高官多

1、入校学生起点高，文革前优秀中学生考工科，清华为工科之首。

2、重视基础教育（六年制，两年基础课、两年专业基础课），毕业专业适应性强；培养学生干部领导能力，朱镕基、胡锦涛、吴邦国、黄菊都是品学兼优的学生党员。

3、分配基层、成长较快。文革毕业生，工科分配基层厂矿，比分到机关学校的文理生，更能施展才能。历来“清华一条虫，出去一条龙”，而清华之龙则升迁必速。70年代，胡、吴、黄已处级。

4、文革后，重视年轻有知识的干部，素质高已升官的清华学子，大量迅速高升。胡吴黄80年代初局级、80年代中省部级、90年代初成为中央领导。

四、下世纪清华帮更重要。我预测：2002年胡锦涛总书记，吴、黄政治局常委。清华毕业的第四代领导还将有：统战部副部长刘延东，唯一女士；

习近平37岁任福州市委书记，最年轻的省会书记。

（我的预测又都蒙对了，唯一没猜准：习近平能任总书记。）

《局限在农村的民主选举》（1996.12.4）

1996年冬，北京重判王丹后，国际舆论普遍谴责，中国转移视线，极力宣传乡村的民主选举。西方媒体认为它将自下向上蔓延，是中国民主政治的开端。我不以为然，主动撰文反驳，简摘如下——

一、农村确有民主选举。1987年中国颁布《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经过近十年的试点和推广，全国一百多万村庄有了民主选举的村领导，其中1/3不是党员。此乃巨大进步，并且不可逆转。

二、民主选举只在村庄。中国宪法：中国是中央、省、市、县、乡五级政府。“村民委员会”是群众的自治组织，不是一级政府，与五级政府有完全不同的组织架构和产生方式。

三、中共不允许民众政治。首先在实践上，中共压制独立候选人参选和当选，避免骨牌效应，形成反对势力。其次在理论上，若允许独立人士竞选，他势必组织其支持者助选，形成反对中共候选人的政治团体，即是反对党雏型，犯了中共大忌。现在只有在中共首肯的候选人中挑选，即“差额选举”，而没有真正的民主选举。

结论：在坚持一党领导、禁止反对党存在的中国，乡村的民主选举不可能蔓延到城市，更不是民主政治的新曙光。

又被我不幸而言中了！但我未预料到农村选举现在竟演变成金钱与暴力的角斗场。

《评“留学美国”一书》（1997.1.26）

1996年《中国可以说不》出版，掀起民族主义热潮，世界媒体关注。冯总希望我评之。我说：“不愿参加民族主义大合唱，批判也是抬举它，我不屑！若不是李光耀指示，不评也罢。我倒想夸奖《留学美国》。”该文简摘

如下——

题记 副总理钱其琛之子钱宁所著

《留学美国———一个时代的故事》，最精彩的是钱宁说的“我面对另一个社会，对自己社会的一切——社会制度、政治传统、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所保持的简单而坚定的信念开始怀疑。”——这将对中国社会产生重要而长远的影响！

一、简明历史、丰富纪实。这是一部颇具历史深度和宏观高度的“简明留学生史”。

二、精彩批判、深刻启示。钱宁：“母亲看到我在海外几年外表变化不大，十分放心高兴。但是，我知道，内心深处不少东西改变了。”我认为，此书最具启发意义的就是这代留学生、特别是钱宁这样的高干子弟的“改变”。我在题记中引述钱宁的四个“怀疑”，他对中国的社会制度、政治传统、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逐一对照美国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

三、重要作用、长远影响。笔者赞同钱宁观点：在不同文化的冲击和不同社会环境的熏陶下，留学生学到并带回中国的，不仅是科学知识、先进技术和异国文化，一定也包括不同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

这篇文章又被刊登在《星期日版》的第一、二两个整版上。首版彩色、特大号字体的标题。两周前我对1996年回顾的文章也是同等待遇，半个月内一个人能两次获此殊荣，冯总说在《海峡时报》150年的历史上，实属罕见。

文章发表反响巨大。冯总告我：“李光耀见你文，也对钱书感兴趣。”我说：“是对钱宁的老子感兴趣吧？李前总理当然对钱现副总理熟悉啦！”我还真冤枉老李啦，后来发现他在《回忆录》说“这是一本坦率直言的书，充分反映了年轻一代的观点。”

读者来信来电不断；生人找书、熟人借书。新加坡书店未进此书，准备去订购；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朋友拿去我新年回国刚买的钱书，远处“旧雨”

只能排队；我也因此文结识诸位“新知”，五月再次回国时新添购书新差事。

12-9 告别新加坡

1991年秋，太太和独子离开中国到美国夏威夷与我团聚。太太是美国人羡慕、她却蒙羞的家庭主妇，她坚持花费数百美元办理了可以打工的工卡，我却没忍心让她在美国和新加坡工作一小时。儿子抵美第一周恰巧赶上托福考试，成绩又恰巧500整，便边打工边游玩，准备来年上大学。1992年秋三人分离：我移居新加坡，太太回中国上班，儿子留美国读书。此后几年，太太绝大部分时间在北京干公务员，偶尔来新加坡探亲；她不来新的原因是：儿子每年暑假回北京（寒假旅游美国大陆），我可以经常回国，她父母年迈多病，热爱工作不愿当家庭妇女，不喜欢新加坡等一切外国。因此，1997年之前的五年，我们三人小家庭，在上演“新中美”三国演义。

1996年，儿子以成绩平均绩点（Grade Point Average，缩写：GPA）3.9分，即10门功课9A1B的异常优秀的成绩，毕业于夏威夷大学金融系；他不愿继续深造、不愿在美工作、只愿回到中国。我说服儿子到华人的新加坡，深爱儿子的太太也年过半百，愿意半退休、经常来新陪伴我们。当年秋天，我们家庭在新加坡团聚一个季度。在中国成长、美国上学的北京青年，“六四”翻越被校长紧锁的校门、到广场声援大学生的中学生，能喜欢少民主、缺自由的弹丸之国吗？不到三个月，儿子打道回国，海归谋职，太太也尾随而去。我对儿子说：“我朋友陈元、王岐山、周小川都是银行头头，去那里不困难。但是你若干好了，说你靠关系；若干不好，说有关系还干不好？国企人事复杂，进退维谷动辄得咎，还是去外国银行吧。”儿子：“正合我意！”

1996年底，数家外国银行同意儿子面试，突然传出邓小平病危消息，面试暂缓。邓熬过新年，面试恢复，三家满意，等待春节后录取通知（20年前

海归金融人才奇缺）。正月十三，邓逝世。中国是否继续开放？是世纪末全世界的大谜；国际金融机构在中国的去留前途未卜，谁还招人？冬去春归，大局底定，外银安心，恢复业务。儿子决定去法国银行。

1997年夏，父亲住院，我回北京。与父母、妻、子、弟妹三代团聚，其乐融融感触良多。儿子在美国时，以其成绩，读世界最好的大学没问题，我要打工挣钱交高昂的学费。儿子到新加坡、太太也愿意来，我要努力捞更多的银子，让他们过最好的生活；我们一起看了昂贵的私人豪宅（还可接父母同住），还准备给儿子买不菲的汽车。而现在，外企低管的儿子，安居北京狠挖资本主义的墙角；公务员的太太，享受社会主义的高福利、更不愿来新加坡低就家庭妇女。我还在一人在新加坡孤独地替资本家打工赚钱，图个啥？父母年老体弱、来日无多，何不回国陪伴二老？经过艰苦卓绝的思想斗争、好似顿悟，又像八年前离国，不听众多亲友劝阻、毅然绝然决定回国定居。我电话《海峡时报》的冯元良总编辑，推心置腹诉诸衷肠。冯总竭力挽留无效，请示上级，恩准我免去六个月的辞职缓冲期，即刻免费离去。否则按合同：必需再干半年，或交相当于六个月工资的赎身费。曾有大公司挖报社的计算机工程师，替他交钱了事。

10月携太太回新加坡，卖掉房子汽车、关闭银行账户，退还永久居民（俗称绿卡）、取出全部公积金（数额是我此前实得收入的一半之多）；把全部家具电器日用品，加上刚买足的比中国物美价廉的各种用品，装满一集装箱海运回国。同时与五年来结交的学术界（东亚所、东南亚研究所、新大、南洋理工大学等）、新闻界（海峡时报、联合早报、新加坡电视机构等）和政商界等各界的中国、新加坡及其他外国的百余朋友，多边和单边、告别和饯行，二三十饭局连绵不断。特别是冯总于11月5日和27日，分别在新加坡最豪华昂贵的中、西餐厅宴请我和太太，希望继续聘任我为《海峡时报》在中国的特约记者；我说，我在中国为外媒工作不方便，再说也想自由

自在地彻底休息。其间11月中旬，纽约《世界日报》老板王友兰、张钢、潘维明等老朋友旅游新加坡，我租了辆面包车接待；并和赵二军一家三口与他们多次聚餐，也算和二军家告别。

1997年12月初，我离开生活和工作了五年半的新加坡，这个华人在海外的社会地位最高的国家，这个为我储备了不少退休金、为申请美国绿卡提供一些资格的地方。

第三节 零距离管窥新加坡

12-10 一党独大的权威体制

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认为新加坡经济发展迅速、社会秩序良好，提出“要学习新加坡”。随之，中国骤起一波波“新加坡热”。在新加坡，各种中国取经团蜂拥而入，还为中国设立了新加坡大学的“干部班”和南洋理工大学的“市长班”等。在中国，为新加坡建立了苏州工业园区、天津生态城等；上海等地学习新加坡的公积金和拍卖汽车牌照制度。与官方热衷学习新加坡实践经验（形而下的硬件）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对新加坡的社会制度（形而上的软件）多持批判态度，认为它是“自由经济加专制政治的模式”。新加坡是继阿尔巴尼亚之后，中国最高领袖（毛与邓）至死始终给予好评的唯一国家（中国长期好评的国家历来寡见）。

因此，诸多“雾外看花”的朋友，希望“只缘身在此坡中”的我，深度评论新加坡。犹豫再三增加此节粗浅介绍，对新不感兴趣者可略过。本节内容分三层次：一、法律规定实际状况，二、耳闻目睹亲身经历，三、笔者浅薄分析评论。前两层次事实判断，孤陋寡闻一叶不知秋；后一层次价值判断，个人偏好见仁见智。

先介绍自然状况，这对了解其社会状况有益。

新加坡原属英国殖民地，1965年建国。其土地面积约是香港的一半，人

口也是香港的一半——上世纪末300万、其中3/4是华人。新加坡是一个岛屿，与马来半岛隔着筑有桥梁和堤坝的狭窄海峡。除了阳光和空气，人类赖以生存的一切资源和原材料皆是舶来品。国人熟悉香港，故比较之。

世人多认为新加坡是开明专制国家，国人曰“新权威主义”。按照牛津辞典解释：民主国家应是全民直接或间接选举的政府系统，具有言论自由、宗教和政治选择权。新加坡显然“算”民主国家。

多党制：除了建国后一直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外，还有几个合法的小反对党。

立法：单一国会制。平均五年一次大选，全国选民（必须投票的强制投票制）一人一票在若干选区，选出几十名议员，组成立法机构：议会。

行政：内阁制。国会多数党党魁获总统任命为总理，总理在议员中挑选十几位议员担任部长，组成内阁。阁员每五年经受一次选民直接考验，保证其精英性，即德才兼备。

司法：三权分立的独立司法。全盘继承英国的司法制度，包括英已废除的鞭刑，直至1994年，新加坡的司法终审权还在英国枢密院。此后终审权归新加坡的数个大法官，反对党和异议人士的上诉全以失败告终。笔者观看实施鞭刑，狱医立即敷药，野蛮的文明！

笔者亲身经历的1997年大选——

1996年11月21日政府公布“新选区划分报告”，预示大选将至，但是外人不知猴年马月开选，反对党临阵磨枪。仅仅25天后的12月16日，颁布“选举令状”，解散国会，定于短短25天后的1997年1月2日投票。新加坡法律规定：国会有权（当然是遵循多数党的旨意）提前或延后大选。这次大选距上次已6年、而下次只是4年后。可以看出：执政党有权选择对自己有利的年份大选，并在具体投票时间上令反对党措手不及。

我12月12日回中国，与一个月前从新加坡返回北京谋职的儿子商议对

策。16日听说要大选了，便更改机票，17日即返回新加坡凑热闹。平时冬眠的五个反对党苏醒了，他们的竞选海报满天飞、竞选资料遍地流。26日晚，我参加了民主党在其参选的武吉甘柏选区的造势大会；27日晚，又去了工人党在劳工聚集的西海岸的誓师大会现场。中国和新加坡的知识分子朋友都不愿惹事，他们怕怕！我只好单身前往。

两次反对党大会都聚集了几万群众，大部分是下层劳工和小商小贩；台上反对党领袖慷慨激昂，广场里贩夫走卒群情激愤，反政府口号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但是整个晚上没有任何违法过激言行，次序比欧美的露天演唱会还文明，周围的警察悠闲地踱着方步看“南洋景”。民主选举，真是苍生草民的出气筒、宣泄器和狂欢节！散会时，我问身边刚才起哄最厉害的人：“选他们吗？”答；“我不是这个选区的，来看热闹、出出气！”次日，反对党的言论主张出现在政府控制的报纸和电视上。

1997年1月2日晚，在对政府不满的新加坡朋友家聚餐，22时至次日凌晨3时，观看电视直播选举开票。结果执政党得票率65%，工人党14%，民主党11%，其它3个小党共10%。国会83席中，执政党获81席，工人党和民主党领袖各一人进国会。欧洲许多国家和台湾，除了选区议员外，还有根据政党得票比例分配的“非选区议员”，这样对小反对党更公平。从理论讲，有这种可能性：若在所有选区大党皆以51%获胜，得到49%选民支持的小党将在国会一无所有。新加坡不可能实行此制度，因为李光耀在国会响应反对党质询时曾说：“执政党没有义务培养反对党！”他们千方百计压制打击反对党及其领袖。

最受反对党诟病的是“集选区制”。新加坡各族裔的比例是：华人75%，马来人13%，印度人9%，欧亚混血3%，号称四大族裔。新加坡实行族裔混居制度，每个居民小区的族裔比例必须与全国相同；利于族裔和谐、避免某民族聚集区聚众闹事。（例如：大至中国新疆、小至北京牛街，经常或偶尔敏

感。）我买房子的原房主就不是华人，我必须要报房管局审查；因我的入住，未破坏该小区的民族比例。获准！（若同时期同一小区，若干华人都买了少数族裔的房子，不批！）有利必有弊，若按最民主和科学的“单选区”制，每个选区选一个议员，少数族裔极难当选；清一色的华人国会，岂不被全世界耻笑和斥骂？聪明的李光耀们在1988年发明了“集选区”，即把3至6个单选区合并成一个集选区，3至6名某党候选人一组、捆绑参选，其中必须有一名非华人。这种集选区与单选区并存的选举制度，保证了国会中必有少数族裔，使国会保持多元种族的形态。反对党实力薄弱、很难凑足3人以上参加集选区竞选，故反对集选区制。曾发生这样的事，执政党预测某单选区可能失守，就把此单选区合并到集选区，使反对党无计可施。因此反对党极力反对集选区制。

此外，政府利用控制的公共资源影响选票。我见到：1997年大选前，执政党对某“危险”选区许愿，我党若当选，政府免费为你们20年的老房翻修。我知道：某次选举前三个月，政府向全民分发国营企业股票；貌似贿选，但发全民，形式合法。于是，人民就总是要票选这个物美价廉的人民行动党政府。

在“多党民主体制”华丽的合法外壳下，新加坡就这样成功地维持了“一党独大的权威体制”。

鲜为人知的史实：人民行动党五十年代一成立，即是“社会党国际”的成员，六十年代还进入其执行局；但是，1976年因为“它在执政后的高压独裁的统治方式”，被英国工党等提议而开除。

12-11 其它社会制度

言论自由

新加坡大部分平面和电子媒体都由政府控制，它们对官员丑闻和本地灾难无保留地报道，对反对党尽量客观中立。如前所述，政府不希望我的民运

朋友万润南和吾尔开希等人，在新加坡进行公开的政治活动；却允许我在政府报纸上，公开为他们这些异议分子张目；但绝不容许为新加坡不同政见者说话。反对党也有自己的报纸，只是非大选期间读者甚微。我以为，政府媒体相对开放公正，也由于国际媒体大都可以在新加坡自由发行和播放的竞争效应。相比欧美民主国家政府基本没有对内的媒体，新加坡政府媒体特别自律。

新加坡自由媒体比政府媒体自由度大，但影响力小。政府媒体中，我所服务的英文媒体的自由度，超过被我们戏称为“人民日报新加坡版”的华文媒体，因为《海峡时报》面向较西化的读者；从我的专栏文章即可看出。

由于言论自由的不充分，政治选择权亦因一党独大而受到限制，故新加坡仍被视为开明专制国家。

廉洁高效的公务员

新加坡从英国继承了独立司法制度、公务员制度两大法宝（类似刚回归时的香港）。我亲身经历的两个例子——

杨胜德，贸易发展局局长兼裕廊工业区主席，吴庆瑞的爱将，是新加坡五个最高级的公务员之一（民选的政务官部长，不属于常任制的事务类公务员）。杨听过我在总理公署的讲课，参加过东亚所我的讲座，我们共同多次参加吴庆瑞的私人宴会。1993年1月，奉吴庆瑞之命，杨陪同赵二军和我参观他管辖的亚洲最早、东南亚最大的工业开发区，其中馆藏艺术品丰富的博物馆令我印象深刻，中午当然要宴请我俩。当晚吴庆瑞夫妇宴请二军，作陪的只有杨胜德和我；席间谈起几日观感，也聊裕廊的艺术品，杨不无得意。当年底杨东窗事发，94年初因“介入古董买卖，开立不实发票赚取中间差价约20万美元”被判刑四年，收回非法所得，并没收数百万元的公积金。吴不胜惋惜，但说咎由自取、绝不插手。

二号人物吴庆瑞因婚外恋，而被一号人物、好友李光耀逼辞官场，便是

李和新加坡对政务官道德严格要求的明证。

新加坡85%的居民住在福利性的“政府组屋”。房管局的技工定期来我家例行检修。我问：“咖啡、茶，还是可乐？”他从工具包拿出一瓶白水，笑答：“我带了。”我再劝：“大热天，来点冰箱的冷饮吧！”他一脸严肃：“任何饮料都是花钱买的，我得到你的有价物品，就算受贿！”——真让我服了！以上二例，从最高级的大官到最低级的工人，公职人员有法必依、违法必办！

目睹之外必多耳闻，仅举一例。某警察依法在政府数据库调阅某涉案人，顺势查阅无关女性联系数据，拟交友之用。此越权被计算机揭发，尽管该警察未使用此数据，仍被判刑。执法必严！谁还敢越雷池一步？

国企主导的经济

新加坡所有重要行业中，排名的第一、二的大企业都是政府控股的，这些超级国营大企业，几十年来皆盈利多多，不像其它东西方国家国企净亏损。1989年对全国500最大企业的调查发现，国企、外企、本地私企的平均利润率分别为28%、7%和2%。我分析：国企高盈利的原因是，高薪从全世界聘请一流经济专家、职业经理人，完全按经济规律和市场需求经管理营企业，绝无行政干预。

例如，我二十余次亲身享受的、多次在全世界被评为名列前茅的国营新航（和新加坡机场），其服务确是中国无法望其项背；我这么抠门者，也忍痛费钱躲避中国民航。再如，拥有百多家分店的国营职总超市，确实物美价廉服务上乘，许多分店全年无休，节假日全日无休。

有钱不能使鬼推磨，但却能使人投您票！享受到红利的百姓，当然心甘情愿的把选票送给发大红包的政府。这也是维系开明专制的经济基础。

纵向保险的公积金制度

公积金的积累：若工资100元，我领取80，20存入我的公积金账户，雇主

也存20；年底双薪、年终几个月的年奖，皆按此比例领取和存放。故，相当于实际领取收入的一半在我个人的公积金账户，年利率为4%。

公积金的使用：购置房屋、支付医疗费用（保险不足部分，如东亚所保险只许住双人病房，我住单间的超出费用，就得动用公积金）和退休养老，以及直系亲属的救济等；上述各部分有严格的比例规定。若放弃公民或绿卡、离开新加坡，公积金可以立马全数兑换成外币，取出走人。

弊端：它只是个人收入的纵向再分配，缺乏横向分配的社会互助共济功能；低薪工人公积金太少，难以支付各种需求。此外，贫富差距过大也是新的一大问题，我们专家教授是普通工人收入的十倍以上。

益处：李光耀对各种形式的“大锅饭”深恶痛绝。吴庆瑞说，“中国的公费医疗、欧美的社会保险，都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消耗。新加坡决不吃‘自助餐’，太浪费！”

因材施教多次分流的教育

“人智商、天决定，多数人小时候即能看出长大适合的职业。”基于这种认识，新加坡“小四分流”，小学五年级开始学习不同科目；小学毕业上不同的中学，决定将来是劳力或劳心；高等教育，只有1/4可上大学，其他人上职业教育的“大专”。

上世纪新加坡只有两所大学，本世纪又创办两所。人才显然不够，他们大量高薪从欧美聘请高级专业人才，新世纪前后也少量从中国引进。我以为，这在经济上是非常合算的。

小结

1978年李光耀对来访的邓小平说：“怎么说我们都不过是福建、广东等地目不识丁、没有田地的农民的后裔，中国却尽是中原的达官显贵、文人学士的后代。”邓闻此言，沉默不语。（《李光耀回忆录》）由白丁雇农后裔建立新加坡，联想到囚徒后代建立澳大利亚，我只能感慨：关键和要害是制

度！

第十三章 参加各种会议及帮助流亡者

——重返美国二十载（1998～2017年）

第一节 哥伦比亚大学客座研究员

13-1 不适应在中国和欧洲生活

1997年12月回到中国。要在北京安营扎寨首先要解决营寨。国际无业游民，再无人报销酒店了，原来单位分配的两室小单元连新加坡运回的家具都放不下。看了几十处楼盘，最后选中亚运村北的半成品房。25层高楼150平方米的顶层，前面视野开阔、能看清北京城，开发商说南面不会再建高楼。讨价还价一次付清100万元人民币，交5万定金，签定购屋合同。

1998年春节后我去看房，发现马路南面开始施工，原来要建30层的写字楼。找我的开发商，我说：“当初就是看中视野好才买。你们说前面无遮挡，并有示意图。现在情况相反，我要退房！”对方：“房可退，定金不退！”律师朋友说：“示意图无法律效用，口头承诺没用。”我束手无策时，天降贵人。在京港两地经营房地产的好友李湘鲁从香港回来，在京城大厦宴请我时，得知此事出手相助。李托人斡旋，扣一千元手续费了事。李湘鲁坚拒我宴请答谢、重礼回报他和中间人，真够朋友！

1989年出走到1997年回归，“八年了，别提它啦！”这句文革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的经典台词，正是我重返祖国的心情。借用“两个文明”的套话，这八年物质文明突飞猛进、天天向上提升，精神文明突降猛退、日日向下沉沦。只因为没有重视我一再强调的“制度文明”！准备在国内长期生活，主动或被动，我与众多熟人恢复了联系；包括小中大学同学，机关公司同事，七竿子打得到、八竿子打不着的亲友。有人出十万元，让我帮某人升任广西某县组织部副部长；有人请我向陈元的开发行或周小川的建行贷款若

干万，变成呆账后，三方分肥。还有小官遗憾当初不知我在中组部，没有提拔他；更有小商后悔那年不知我在康华，未能投资他。与中层官友餐会，公开带情人小蜜者有、对司机吆三喝四者众。某商界翘楚在华侨大厦地下层的歌厅，请北京市领导的三五秘书，托其办事。我与双方熟悉，遂被拉去，也想开眼界长见识。红包交接完毕后陪歌小姐进来，此处场景少儿不宜，故略去若干字。散场时，秘书们各带走一二人，还不忘照顾我："老阎，别装蒜！你也选一两个，钱不用出，记在我们账上。"我哪敢呀！

至于高层，官场商界学术殿堂，乌烟瘴气暗无天日。正是：忍看朋辈成新贵，城头变换大王旗。我与新贵玩笑："你们是蒙坑拐骗不敢偷，吃喝嫖赌不愿抽。猪八戒的仇人，十项全能中'八不戒'。"

在中国生活近半年，确实不适应；到欧洲看看，我还有权在法国、亦即在欧盟，长期居留、生活和工作。1998年5至8月，我与太太先后自北而南走访英国、法国、西班牙，由富至穷；一百美元住旅馆，英国二星、法国三星、西班牙四星。回程游玩芬兰，四国都有朋友，了解风土人情、指导旅游行程。其中两个月在法国，距上次来巴黎重领中国护照已四年；与各界各路朋友聚会叙旧，好不热闹。印象较深的两件事。其一，法国上海同乡会沈会长，九年前就照顾过刚抵巴黎的我，五年前旅游新加坡时还特意探视车祸住院的我。沈热情豪爽交友甚广，结识首次来法的阎太，认为不能委屈她，便请我们住进巴黎市中心、由她代管的林青霞的豪宅公寓。北京希尔顿顶层的总统套房（新加坡老板曾住过）也不如林宅舒适。享受一个月后，足球世界杯在巴黎开赛，张国荣来看球。管家的朋友当然要为主人的朋友腾房，我们遂搬到另一朋友家。其二、众多朋友中，最盛情的当属万润南。他已弃政从商，在美国办了IT公司，最近回法国处理在巴黎的生意，我们在他家聚餐享用珍馐也是家常便饭。在法国我是无车族，近郊朋友聚会、远郊旅游探幽，司机非万莫属。6月下旬，我们两对夫妻西欧五国游，我没有欧洲驾照，又不适

应长期左侧驾驶，几千公里全靠老万辛苦。在卢森堡和德国玩够后，我太太稍感疲惫，想早些回法国休整，最后一夜住德国齐姓朋友家。次日在科隆早餐；上午旅游荷兰，午餐在阿姆斯特丹王某的饭馆解决；下午参观比利时，晚餐由布鲁塞尔的卢某宴请；夜晚车行法国东部，巴黎的宵夜只能自费了。

与法国众好友切磋请教，分析我在法生活的优劣。利，居留无障碍，社会福利好；弊，语言环境差，收入机会寡。万润南提供了宝贵的建议：“我们一起去美国发展吧！”。

13-2 决定到哥伦比亚大学研究

1998年9月，从欧洲返回中国稍事休息后，只身飞赴离开六年的美国。张钢在纽约接机并接我住在他长岛的家里，一周后何频又劫持我去附近他家居住，其间张、何二人分别陪我吃喝玩乐；还陪何频去华盛顿“美国之音”做节目，同时与何一家三口开车旅游、访亲问友。我还应邀到一些老朋友家拜访作客：从法国移居来美的严家祺高皋、陈一咨和刚从中国来美读书的女儿、胡平和项小吉家等。曹长青新买住房，我住在那里几天帮助小装修大清理。还分别与朱嘉明、艾端午、陈奎德、郑义等聚餐叙旧。普林斯顿的程晓农开车陪我看望住在附近的刘宾雁、阮铭、苏绍智、苏晓康等家庭。

10月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前所长（美国这些所长大多轮流坐庄）、著名的汉学家黎安友从外地讲学归来。6日我们如约在哥大附近的中餐馆见面，双方各自叙述了夏威夷分别后的经历。他欢迎我到他们所工作，我提交了学术简历和研究计划。在座的还有老朋友、哥大汉学家司马晋。9日我到黎安友办公室，他给我哥大东亚所的表格，让我回去填写好。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他前妻维特克女士与江青的合影，我们就聊起1972年维特克采访江青的轶事。14日和15日到东亚所与行政副所长商谈具体事宜，签定两年工作合同。26日到哥大国际处领取赴美签证的I一20表，29日飞回中国。

最后讲述最重要的万润南。我抵美次日，已经在纽约的万就来张钢家看我。我们不约而同地提到哥大东亚所。我们的共识是：纽约是世界的首都，哥伦比亚大学是世界名列前茅的常春藤大学，哥大东亚所是研究中国问题的重镇，黎安友又是我的旧识。我应该先留在这里！9月我在朋友家瞎混，10月就到曼哈顿上城的哥大联系了。万润南准儿媳回中国度假，她在96街的公寓房就归我了。在纽约期间，万经常开车接我出去玩，通过他还认识了访美的四通副总裁、才子王缉志，再见了来美的朋友、斗士曹思源。10月底万送我上飞机回中国。

12月到美国驻华大使馆办理签证。签证官用英语询问我。我答："对不起！不懂英语，请讲中文。""不懂英文，去美国干什么？""我想他们会配翻译。""我不能给你签证，让请你的机构补充详细说明！"8年前我从美国回法国搬家，到美国驻法使馆签证也受阻，多亏杜维明所长带着白人太太亲临使馆申明。这次黎安友不会空降北京了，我只能写信说明签证受阻，传真黎安友。很快接到黎的挂号信，内有他写给美使馆的说明信。其中有令我汗颜的评价："阎淮先生是有造诣的知名学者，他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著作。他的两篇有关中国政治的有价值的论文被编入英文的《邓时代的中国如何决策》中。他发表的一系列有价值的论文都刊登在新加坡东亚所的系列报告中。总之，阎先生是一名严肃的学者，我们对他的邀请是基于期望与其进行有效的学术交流。"

1999年1月轮到再次去签证了。覆审签证官一看我提交的黎安友的信，惊讶："黎教授的亲笔签名信呀？我上过他的课！我们哥大的邀请也敢拒签？就像中国使馆拒签你们清华的邀请一样不可思议！"他低头看了一下卷宗："初审签证员是新来的菜鸟，也可能当年没考上哥大，想报一箭之仇。回头我训他！"他还我护照时里面夹了张名片："请代问黎教授好！"我想：名校效应，哪国皆有；别看只读了两年清华，这牌子还挺唬人！新加坡大量引

进中国科技人才，李光耀和吴庆瑞都说过：“清华、北大、交大、复旦、科大，五所大学的理工科毕业生，不用审查，需要就进！”

13-3 在纽约撰写的文章

1999年春赴美，任哥大东亚所客座研究员。具体工作是：每月参加一次全所会议，半年提供一个讲座，一年交出一篇论文；在中国来访学者的政治讲座上，担任主评论员；懂中文的研究员们，谁高兴了就双边或多边地侃大山吃大餐；平时不坐班，在家写论文。同样叫“东亚所”，美国比新加坡轻松多了；其舒适度可以与夏威夷东西方中心媲美，都是美国的嘛！

我的两篇年度论文提纲如下（老调重弹不必详述）——

《世纪之交的中国领袖》

第四代（胡锦涛、吴邦温、温家宝）与第三代的异同

第四代将全面取代第三代领袖第四代领袖个体仕途展望

《政治改革与民主化进程》

政治改革的回顾、现状和预测民主化进程艰巨而漫长

政改与民主化的实践与理论

5月我生活和工作纳入新常态，便向世界各地朋友通告。24日接到新加坡《海峡时报》冯元良总编辑电邮：“元良近日为中国时事的报道及分析大伤脑筋。没了您的深入分析文章，《海峡》的中国版及言论版真是逊色不少。可否请您替我们撰稿？”我即回复：“在新期间，蒙您照顾铭记心间；离新之后，片刻未能忘怀。在中国为海外媒体撰写政治评论多有不便，故有负重托。本想在美休闲停笔，您既不弃，我可承诺半年。唯恐搁笔多时文墨生疏，吾当尽力，若不堪用，则请弃之。”

在《海峡时报》发表的六篇评论文章如下：

《大使馆被炸后的中美关系新趋势》（1999.6.12），《中国将如何反击李登辉的“两国论”》（7.17），《中国对台的非军事手段》（7.24），《中

国联俄抗美一一21世纪新格局》（9.2），《中俄结成战略伙伴抗衡美国》（9.30），《进入WTO对中国政局的影响》（11.27）。

其中关于中、俄、美关系，我阐述了现在仍不过时的观点一一

“如果说，一个半世纪前的鸦片战争标志欧美列强开始侵略中国；那么，三个世纪前俄国就已经侵占大片中国领土了。新老沙皇一直是是中国零距离的威胁。现在历史旋转，三百年来首次出现强大的中国和相对虚弱的俄罗斯。后冷战时期，世界新格局是‘一超四强’，超级的美国和西欧、东北亚（日韩）、俄国、中国四个强国（或集团）共五方。前三方是有条约的盟国，都有美军驻扎。中国必须、也只能与俄国连横抗美，形成新的东西方对垒。这与半个世纪前旧对垒的区别是：其外部形态由意识形态对抗、变为利益对抗，其内部形态由俄国领导、变为平等互利，甚至某种程度的中国主导。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主动向俄国示好。”

这六篇一千多字的中文文章，译成英文，被配上漫画，都用一个整版发表，各付我一千美元。半年一到，我即封笔。我与冯元良就只保持好友的个人关系，联系至今。朋友不解：“一个字一美元，是美国中文媒体的一百倍，干嘛不写了？”一个月一篇与一周一篇文章，同样要密切关注时事、跟踪热点新闻，事倍功半。回到自由世界的美国，胸无大志解决温饱即可、不想奔小康的我，只想过闲云野鹤的自由自在的日子。万润南对我评价：“游山玩水访亲拜友。”

1999年8月，我在家中餐请前来纽约旅游的香港《开放》杂志总编辑金钟夫妇，曹长青夫妇和万润南作陪。不久后收到金钟寄自香港的信函：“谢谢纽约的招待。兄可否为《开放》写介绍组织部运作的文章？”我即复函：“弟离开中组部已十余载，近况不甚了解，文章难写。承蒙错爱，深表歉意。欢迎再来寒舍一乐。”足见我之懒惰！18年后，再向金钟兄致歉！

新世纪我彻底封笔，但为感恩还经常回答老朋友、《海峡时报》冯总的

时局咨询，最后一次是2002年中共十六大前。我当时对国内恩人江泽民“已忘初衷”、不实行宪政民主完全绝望，但绝不批判攻击他。我认为江已“核心”两届半共13年，十六大必然党政军职务全退；无论世人如何评这13年，只凭他是中共领袖按时裸退第一人，也可青史留美名！我还反驳江留任军委主席的预测：1、江没当过一天兵，不似邓小平；2、现在政局稳定，不像1989年；3、江可通过他安排的军委其他将领，实际控制军权，不必留军委主席虚名。——结果我大错而特错啦！江泽民比我聪明多了，我都能想到的有百利而无一弊的事，他能想不到？我只能用政治学原理，“权力是腐蚀剂”解释；顺便发现，权力还是昏晕剂，利令智昏呀！1999年底家严逝世，江来电话吊唁；此后还不时直接间接地问候母亲，回忆文革中只有他和姜大姐两人留着北京相互照顾的艰难岁月。2006年家慈过世，江的慰问，是我们最后的联系。

13-4 与万润南的密切关系

1999年初，我重返美国定居时，万润南开车陪我在纽约几个华人区看了多处房子，皆不满意。最后还是回到原点，老万的楼上那个单元——新泽西州泽西市的有健身房、游泳池和24小时警卫的公寓。泽西市东隔哈德逊河与纽约毗邻，属于大纽约都会区；坐地铁十分钟到世贸中心，开车去“哥大”比华人聚集的纽约皇后区近多了。唯一不便的是，不懂英语的我居住在非华人区，大厦只有我们两户“黄人”。老万则大包大揽，口译笔译全部承担；并且我新的计算机、电视、手机等全套电器设备，都是他帮我选购、安装及调试。

我要买汽车，老万高招：“我卖掉旧轿车，咱俩合资买一辆吉普，经济实用适合旅行。”此后，我们经常共同驾车参加各种活动，他回法国、我回中国，相互接送极其便利。谁出国，家门和信箱钥匙交对方，邮寄和传真的

信件全权处理。退役警察的黑人保安见我们同出同进、一起健身游泳、互开信箱，还以为我们是亲兄弟。（老外看华人都一个俊样！）多亏我们的太太偶尔分别从中国和法国来美小住，否则真误认我们是“同志”了，尽管十年前我们都退党。由于我正好在他楼上，因此两个停车位紧靠。一次下雨，我们匆忙停车，车轮压了两车位的中间隔脱机。次日出门时，一位邻居老美“哼哼”教诲我们：停车不要压线！真佩服老外管闲事的公德心！我们解释，两个车位都是我们的。此后，我们干脆停车在两车位中间，让左右的汽车有更大的停车空间；“临车”们都感谢我们。

老万在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大厦里，租办公室开办了科技公司，研发生产可视电话，销路很好。偷渡美国的福建农民，多年未见家乡亲人，利用可视电话了却了相思病和思乡病。据闻福建农村春节时，排长队、花重金打几分钟可视电话，与美国亲人视频，电话两端哭成一片。我经常去老万公司帮忙，还他盛情；也与公司的六七个雇员烂熟，有些至今还是朋友。我来纽约后，与老朋友王友兰接触更频繁；王是《世界日报》的老板，也是法拉盛喜来登酒店的老板。我请王帮忙，让老万的公司利用几个周末，在喜来登免费设摊位销售产品，王和其亲友也买了不少。但是好景不长，随着计算机视频的开发，可视电话逐渐被取代。世纪交接之际，老万结束公司转战美西硅谷。“九一一”世贸被炸，我们庆幸已迁出。

老万尽管淡出民运，仍关心并有影响力。他认为，魏京生1978年就提出“第五个现代化是政治民主”，并两次坐牢，可以领导民运。魏对万也很尊重，因此彼此接触较多。我们去曼哈顿办事，经常顺路到哥大为魏提供的办公室看望；魏从华盛顿开车回纽约经常在老万家小坐大聊、小酌大吃。按惯例，万和我一方的朋友来访必是两人的贵客而共同款待，我与魏也就算朋友了。我的同学同事、万的下属亲友，凡住在附近或来访纽约，都成为我俩双方的朋友。

1999年12月27-29日，魏京生主持的中国海外民主运动联席会议在纽约召开。老万当然站脚助威，我第一天也去看看热闹，会会老友。28日万送我上飞机，回中国与父母妻儿弟妹团聚。春节后返美，发现美国网上出现署我名字的文章《一场伪称“民运联席会议”的台湾情治人员的聚会闹剧》，揭露台湾官方出钱操纵会议的、我所不知、难辨真伪的所谓“内幕”。（现在中国“百度”网还可查到。）发文当时，我在国内，别说后两天会议情况不知，即使想发文也上不了海外网站。尽人皆知我特别爱惜羽毛，海外几十载从未沾上任何丑闻绯闻，竟空前绝后，首次被人栽赃污名。找谁说理？窝囊！

13-5 在纽约的会议与朋友

1999年4月，哥大东亚所举行中国宪政研讨会，我是主评论员。近十年的老朋友、明镜集团老板何频也与会，他说正筹办名曰“多维”的网络媒体，请我推荐适合人员。对我更重要的是，何还介绍同来的儒雅渊博的明镜总主笔高伐林与我认识。久闻高的大名：与顾城、舒婷等一起参加1980年青春诗会的新派诗人，毕业后跨入团中央宣传部，来美近十年著作半身。此后至现在，无论美东美西，我与何、高二人交集不断，过从甚密，引为知己。他们介绍我与许家屯认识，更使我在洛杉矶能就近照顾许老直至为他抬棺送终。

1999年8月14-15日，普林斯顿大学的中国时局讨论会，我应邀作了长篇发言。这是继91年普林斯顿“从五四到河殇”研讨会之后，我与余英时为首的普林斯顿中国学社众学者的再次重聚。

1999年11月2日，参加纪念王策被捕周年座谈会。我本不愿再参加民运会议并发言，但是王策是我夏威夷的好友，去年又在西班牙家中款待我，因此破例。这是我在民主中国阵线首届法国分部主席一年任满、充当所谓“学者”之后，空前绝后地在非学术会议上的非学术发言。次日的《世界日报》

报道："参加会议的有：严家祺、阎淮、万润南、杨月清、司马璐等。王策好友阎淮表示，王策一介书生是民运中彻底的温和派，他和平改革的理念不应被中共所不容。"杨月清和其夫林保华（笔名凌锋）"六四"后曾在香港协助我联系港支联而赴法。十年后又相见，分外亲切。28日凌锋回纽约后，我与他们夫妻午餐，并一直聊到下午四点。



1991年5月，夏威夷朋友聚会，右四王策，左前作者。

王策座谈会后，我和老万送司马璐回家，请上戈扬和胡小胡，到附近川菜馆聚餐，饭后聊到半夜。司马璐，早年参加中共并赴延安，后脱离中共成为著作等身的海外中共史专家。戈扬是老革命、右派平反后任《新观察》主编，"六四"在美国宣布退党，新世纪在纽约与司马璐结婚；万和我在美国与二老接触较多。胡小胡，戈扬长子，来美探亲期间，胡、万、我，三位清华同届同学，来往频繁。

冯胜平，中国民联早期骨干，"六四"后中断博士论文答辩，全职投入民运。我们在各种活动中偶有接触，相识不相知。他对民运失望后淡出，在华尔街作经纪人。冯住在普林斯顿，极其热情好客，经常举行家庭派对，当然是以其夫人区兰的高超厨艺作后盾。1999年10月和感恩节，我两次有幸去大快朵颐，也与冯成为好友。近年我几次造访美东，都在他家居住，接受

冯、区夫妇的盛情款待。

王友兰，1990年在纽约结识，亿万富婆平易近人，她曾用自己的豪华吉普教我驾驶。我重返美国，得知她罹患肺癌。但她心胸宽广、依然乐观豪放。常邀请我郊游，小巧玲珑的她头裹彩巾，貌似好动的小伙子艺术家。回到她家，摘除头巾，露出因化疗而形成的光头，又俨然一个活泼的小尼姑，她还亲自下厨为我们准备晚餐。但是，千禧年的5月她还是不幸驾鹤西去。王友兰追悼会12日在法拉盛的殡仪馆举行，我悲痛地送这位在海外十年的好友最后一程。由于《世界日报》及其台湾母报《联合报》支持统一反对台独，中国驻联合国副代表沈国放与会并致辞。

申请绿卡。国人出国定居，先申请永久居民——因美国永久居民证为绿色，美国老大，故各国的永久居民也随称绿卡。过若干年（美国是五年），若愿意可以申请入籍当外国公民，否则就如我：永久只是永久居民、中国公民。我的法国绿卡到期未更新，失效；新加坡绿卡为拿回大额公积金，放弃。为在美国长期居留，必须申请美国绿卡。研究美国移民法，发现“杰出人才EB－1A”绿卡较好，可以没有雇主。朋友介绍冯律师，他读法学博士时曾在克林顿的白宫实习。在我提供的可推荐我的名单中，冯事成后告诉我，写推荐信的是：黎安友、司马晋、李可柔、杜维明、郭颖颐和冯元良六位。在此，再次衷心感谢他们！

2001年我到俄亥俄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一年，后在旧金山两年、考察体验硅谷。那几年乏善可陈一笔带过。应该提一笔的是：太太不愿长居国外，只偶尔来纽约、俄亥俄的哥伦布市和旧金山，仍是煤炭部高级工程师。新世纪我们终于分手。此后我便定居在气候宜人、华人众多、来去中国方便的洛杉矶，过着闲云野鹤的退休生活至今。

第二节 定居洛杉矶的闲云野鹤

13-6 每年回中国三、五个月

出国近30年，前10年在法国时访问了欧洲多国、在新加坡时游览了亚洲数国；重返美国20年，除了开车陪朋友游访北美的加拿大和墨西哥外，平均1/3的时间在中国，其它国家从未涉足。同期，朋友陈小鲁等已旅游百余国家，弟妹们也都去了几十国。他们说：“你现在美国，有钱有闲有绿卡，身体好易签证，何不多去些国家；将来回中国定居（我拟75岁后长住中国），国内旅游软硬件改善，再玩不迟。”但是，我浓郁的华夏神州情结却解不开——

1999年底，父亲在住院半年后突然去世，享寿82岁。我匆忙赶回北京只见遗体一面，安慰陪伴悲伤的母亲两个多月后才返美。以后每年回中国三、五个月，陪伴老娘。

2005年母病重，8月回北京与母亲一起生活近半年（其间考了北京驾照），2006年春节后急忙返美。（美国“九一一”后，绿卡离美不能超过半年。）两个月后的4月母又病重。我不能让7年前父亲突然去世、未能生前见一面的悲剧重演，立刻赶回北京，陪伴母亲度过她生命最后的时光，5月底还哄她打麻将、看肥皂剧。

2006年6月4日早10时，母亲平静地去世在我的怀里，享年85岁。擦干眼泪后，聊以自慰的是：61年前我哭闹着诞生在她怀里，从此不安分的我没少让她操心；现在她安详地长眠在我怀里，放心地离去。父母都离开后，我在中国就不再局限于北京了，开始与亲友游览中国，访问故交了。

我1994年能回国后，每次青干局（和组织部系统）的同事、101中的同学、清华大学的校友都为我接风饯行；2006年后，与他们的交往更频繁。

2006年6月下旬与崔武年开车去渖阳，辽宁原青干处的朋友接待。席间某正局级说；“老阎，‘六四’你英雄！”我答：“我草包逃兵，你们潜伏

‘敌营十八年’（80年代热播电视剧），真好汉！”7月去苏州看望退居二线的冯瑞渡。他说：“我在市委副书记任上，陪伴了十几位副省级书记和市长，其中好几位现在监狱里。”我说：“像你这样廉洁老实，能平安软着陆的真不多！”随后到上海，与分别十几年的原市青干处朋友聚餐，最重要的是看望万润南的父母，替老万尽孝。二老住在北京时，我每年去看望，他们迁沪后，已几年未见；那天还请二老和万妹到避风塘餐馆便餐。在北京当然每年都要去看望老万的岳父母，2010年李昌去世后就只能看望冯兰瑞了，万夫人李玉也经常能见到。

2007年青藏铁路通车，火车去、飞机回，旅游异域似的西藏。还去了天津，原市青干处的朋友说：“20多年前你来选拔的第三梯队，现在没有落马的。”我说：“碰巧了！希望今后别有倒霉的。”08年奥运会当然不能缺席，在北京的儿子给买了不少门票。09年美国盛行猪流感，美国华人盛传“不回国是爱国”，我就爱国了一次。

2010年清华校庆，我们毕业40周年，同班30人，从世界各国、中国各省回来近20人，同年级150人也来近百位。学校请、同学请，大吃大聚、大折腾一周。有江浙同学，毕业40年仍在边陲小城。当年“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江南才俊，没有“输在起跑在线”，却因出身平民没有“官系”，在人生马拉松的转弯时，处处掉队落伍。智商超群的他们，情商可能“稍逊”，但“官二代”也并非人人是智商情商高手，试看今日之神州，哪个干部子弟还在当初分配的穷山僻壤？我愧对他们！我请某同学到我的旅馆小住几天畅谈深聊，用儿子的车载另一同学伉俪北京数日游，以此聊表心意。上海世博会必凑热闹，当然还要看望老万父母，二老已经行动不便，我只能在餐馆打包到万家。

2011和2012年，中国没有热闹事的平淡年。我就是例行私事，家人团聚、同学交流、朋友恳谈、同事聚会。

2013年，清华同学邱承光因发表与父亲邱会作谈话的《心灵的对话》，与亲属失和。我认为，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所谓“林彪四大金刚”的回忆文章中，邱的回忆录和《心灵对话》最深刻。我提议去无锡看望慰问承光，得到青干局四哥们的支持，我们烟花三月下江南一周，和邱承光一起游览了宜兴、茅山和浙江湖州。四月的清明节，北京的富强胡同一定要去，在紫阳遗像前三鞠躬。十八大前，陈小鲁、马小力、张北英、王彦君“四签名”（柯南•道尔《福尔摩斯探案》中一本的书名）与任小彬、崔武年、马小力“三剑客”（大仲马名著）分别致信党中央，要求党代表和新中委公布财产；结果“泥牛入海无消息”。这几年在北京与这六人多次聚会，他们中有人认为前任领导无魄力，对新领袖寄予希望，说：“应该给他面子。”我说：“那要看他给不给人民里子！”

2014年9月，《中国新闻周刊》连续两期的封面文章是有关中组部的。记者杨敏在总第676期，讲述这些文章的采访撰写过程。其首句是：“有关中组部的封面文章，从2013年底开始采访，到今年6月见到中组部原常务副部长李锐，8月采访原青干局阎淮，马拉松式采访算是结束了。”是年4月，杨敏发现我回国，给我打电话说：“青干局的人都说，除李锐带来的李志民外，您最元老、最了解内情。想采访您。”我以青干局存活八年、我只待四年为由拒绝。八月杨又电话我：“李锐也让找你。”同事推荐可以不睬，长官发令只能遵命！杨敏采访我后，在她撰写的《“第三梯队”建立前后》（《中国新闻周刊》2014总第675期）中数次提到我。那天杨还说李锐很想见我，我立刻电话李老预约时间。8月23日我屁颠屁颠地去拜见老首长，97岁的李锐精神矍铄、记忆非凡、十分健谈。我们侃大山一下午，张阿姨又要留饭，我要开车载他们下馆子，最后双方皆未得逞。但我满载而归，李锐继20年前我首次回国看望他、赠我二书，这次又再次题字赠我两本书：《李锐口述往事》和他女儿李南央撰写的《我的父亲李锐》。

2014-16年，回国主要是清华校庆聚会。新世纪清华校友网为校友设立“自由论坛”，我们“老五届”大部分已退休，格外活跃。十年前校方把万润南除名，我也共进退；2013年第五代上台，特赦万，万告我，我重入校友网。一看宽松了，我就得瑟了，在网上肆意发挥针砭时弊，得到不少认同，成了清华网上小名人，许多同学希望校庆时能在清华与我一晤。于是近几年都是春夏回国三五个月，除了历年的老朋友团聚外，又增加清华不同圈伙的十余次大小聚会。

另外值得一提的还有：

2015年3月，到北京通州宋庄画家村看望独立画家，同去的戴晴午饭后就要急忙赶回北京，不能参加下午活动。她解释：我的“警卫人员”今天也要来，我说别把国外回来的朋友吓着，我保证下午四点归家。我这才明白她微信署名“在如来佛手中”的含义。戴晴看了我回忆101中和清华文革的两篇文章，问：“真好！怎么没见过？”我如实相告：“在海外发表。”戴感慨：“国内见不到好文章啦！”

2016年5月，和罗点点夫妻等六人驾车从北京到湖北神农架往返旅行半个月。与点点认识多年，这次又加深了解。我一直认为：在红二代中，对家长亦即“红一代”反思彻底、认识深刻之最者，非戴晴和点点二位女士莫属。10月在纽约又与点点之兄罗宇交往相处两周。



2015年3月，到北京宋庄看望独立画家。最右崔武年，摸羊头的是戴晴，抬脚的是作者。

13-7 观看旁听有关中国的会议

洛杉矶是美国仅次于纽约的第二大城市，与中国的距离仅为纽约的2/3，因此经常召开有关中国的政治性和学术性会议。在海外，这种会议大都是开放的，欢迎民众捧场。赋闲在此，便饶有兴趣地与会，一看热闹，二看朋友。

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纪念反右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2007年6月在洛杉矶召开。来自中国和欧美的几十人发言，听众一二百人。我与离开纽约多年未见的吴国光、胡平、陈奎德、林培瑞等叙旧言欢。当年的右派十余人赴会，受到欢迎和敬重；其中方励之夫妇是1991年普林斯顿会议的熟人，林希翎是在法国时的朋友，我与他们在会议期间有更多的接触。中国来的名人有钱理群、戴晴、叶永烈、章立凡。

中国民主运动2008年洛杉矶大会

2008年10月，世界各地的民联、民阵、和民联阵三个成立25年以上的民运组织的骨干成员几十人，像我这样的旁听者几十人，加上各种记者，共约百余人参会。首日上午全体大会，三组织的领导致辞，自由发言的有许多近年新成立的一人党或几人党的党魁，如前缀有中国的：过渡政府总统、民主党（海外总部）秘书长、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民主党美西负责人、社民党秘书长等。我与大部分参会者熟悉，他们让我讲话，我婉拒。下午三组织分别召开代表大会，总结工作、换届选举。我先到民联和民联阵的会场和熟人聊天，最后到我曾任首届法国分部主席的民阵会场，老友相见分外亲切热情，首届美国分部主席杨建利也在这里。八九民运已经近20年，民运组

织多了、民运成员少了。此次民阵九大要选出理事会15人、监事会5人，而会场不够20人，他们要选我。我坚拒，说早不参加民阵活动，每年还要回国。大家谅解，表示还是好朋友。第二天上午，会议代表到洛杉矶市政府前集会，举行“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的专题演讲。我历来对街头运动不感兴趣，当然不会参与。下午回到蒙市，讨论“明年‘六四’20周年全球纪念活动安排”。散会后，我又开车陪“老同事”杨建利旅游一天，最后送上飞机。

洛杉矶族群领袖研习营

2012年4月，在洛杉矶南面的长滩市，由杨建利的公民力量组织主办。老友杨建利四年前洛杉矶一别，一直保持联系；此次请我参加豪华食宿的会议，一是感谢上次的款待，二是进一步“请教”。



与贡嘎扎西一别经年，到2017年在纽约的刘晓波追思会上才再次相逢。

三天研习营的宗旨是“促进中国各地区、种族和宗教之间的信任、了解与合作”。大会重点发言的“族群领袖”有：世界维吾尔大会主席热比娅、内蒙古联盟主席席海明、达赖驻北美代表贡嘎扎西，美国教授林培瑞、在台湾执教的王丹。大陆来宾是：北大教授夏业良，社科院研究人员张博树、《中国改革》杂志前社长李伟东。各类媒体来了不少，有博讯网的韦石、独立媒体人温云超（北风）。

在最后自由讨论时，大会主席杨建利特别对我的与会表示感谢，并请我

对中国时局发表“高见”。推托不掉，不上讲台，站在座前，即席简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天翻地覆、巨大宏壮的变化，你还可以用更伟大壮丽的形容词。但是我要说，在政治领域没有本质的改变。依然是——国家体制：宪法明文规定共产党永远领导；立法行政司法：三权统一于党委之下；武装力量：国军仍然是共军；公检法的司法系统：党的政法委统帅；人事制度：党管干部、书记管行政首长；新闻文化：中宣部统管、无独立媒体；宪法第35条：言论结社等六大自由残缺不全。总之，有宪法、无宪政，有民主党派、无民主和党派！我这是客观的事实判断，无个人好恶的主观的价值判断。对此，‘民主派’说糟得很！‘当权派’说好得很，这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见仁见智，各有所好。”我人坐下，掌声响起。有记者问：“阎先生，在民主方面难道没有进步吗？”我只得回答：“毛泽东时代是一人独裁；文革后是邓小平和陈云的‘双峰政治’；十三大五大常委、三人说了就算；十四、十五大七个常委、四人即多数；最近两届是九龙治水，五人可定夺。最高层的决定权，翻了五倍，民主决策的巨大进步呀！”哄笑声不断。

21日下午，几十名与会者前往威斯汀酒店“晋见”（此会议用语）达赖喇嘛。杨建利体贴地私下问我：“你还要回国，方便去吗？”我回答：“当年在纽约中央公园的万人集会上听过他演讲，钦佩！这次近距离接触的机会，难得！”杨便把我安置在前排。达赖首先介绍西藏流亡民主的发展，他赞成邓小平对他的代表所言：“不独立，什么都可谈！”随后说自己已退休，但他主张的“中间路线”仍会被民选的“嘎伦赤巴”所坚持。在问答过程中，达赖说他还向热比娅等其他民族领袖宣传中间路线。坐在旁边的热比娅鼓掌点头表示同意。达赖表示，温家宝的政改言论和薄熙来事件预示中国正在变化；他支持刘晓波和广东的“乌坎村民”。

对于达赖这位77岁老人的表面印象：身体健康、知识渊博，思维敏捷、

急智幽默，慈祥和蔼、平易近人。而内在的，我认同达赖“不独立、不暴力，高度自治的中间路线”。20年前我曾撰文分析，为什么维族刚动乱就“暴恐”，而藏族“平叛”近40年未掀大浪？除了宗教原因，达赖的“非暴力中间路线”是关键。现在达赖已八十高龄，一但离世，“西藏青年大会”就另起炉灶；其六万成员分布全球，宣称“将采用一切可能的途径和手段，坚决争取西藏独立。”——那时就不好玩了，西藏千万别步新疆后尘！

13-8 洛杉矶的其它社交活动

体育运动

我小学开始打乒乓球，初中大跃进成“亩产万斤”般的三级运动员，高中大学喜新厌旧、转向激烈的足球。在工厂累得半死，运动少了；坐机关恢复乒乓球，在国务院机关和中直机关比赛中小有斩获。在新加坡东亚所代表新大参加全国联赛、在《海峡时报》与马来西亚媒体对抗赛，皆东方不败。在纽约哥大参加清华队，打败“联合国军”、报“八国联军”的仇。

2003年到洛杉矶，被揽入“知青队”，获乒乓球团体亚军。“南加州知青协会”04年内哄，华人海外组织的老常态，分裂出誓不两立的“美中文化协会”。每年春节，原来一个迎春晚会变为两个，都送我票。我说：“什么时候你们再分裂，我就能看四场春晚了！”原“知青乒乓球队”的朋友大都进入“美中”，但实力削弱，我们“美中队”此后只能在三四名之间徘徊。

2008年南加华人运动会，游泳比赛前夕，“知青接力队”主力突病；队长与我在同一健身馆，知我能游，请我救场。次日，因我在400米和800米接力中表现尚可，我又被换上几个单项，侥幸得了三五个金银牌。哪知闯祸了！“知青”首次超过宿敌“美中”，取得游泳团体总分冠军。历届冠军“美中”拥有原“八一女队”专业运动员、我的朋友王某，她开玩笑说：“你叛徒！”队长严肃：“明年参加美中队，戴罪立功！”俗话说，做人难，做好人更难！我说，会运动的好人难上加难！我从此退出华人体育江

湖。

中国未统一，两岸清华先统一。洛杉矶的清华校友会包括北京的清华和台湾新竹的清华毕业生，并加入南加州中国大专院校联合校友会。随后，台湾一统天下的联合校友会被大陆众多院校渗入，两岸外交官都参加我们的年会。2012年，几年一次的“大专杯乒乓赛”举行，我当时正在洛杉矶，就被清华校友会拉入。我荣获50岁以上壮年组冠军，并且一路都是3:0淘汰对手，次日各报报道。最后三轮战胜的分别是台大、文大和政大的台湾高手，他们不服：“比赛在您的俱乐部进行，您熟悉场地，下周末请到我们俱乐部来切磋。”中国清华不能示弱：“好！若你们胜一盘、3：1，我以后常去，否则只此一次。”结果那天，我还是以3:0全胜所有台胞，以后每天仍去前大陆世界冠军高军的俱乐部打球四五十局，然后游泳一千米。

参加“抗议美国电视辱华示威”

2013年10月美国广播公司（简称ABC）电视节目中，一男孩在回答“美国欠中国1.3万亿怎么办”时，说是“把中国人都杀光！”主持人说：“有趣的想法。”华人社会激愤，11月9日美国20多个城市上万华人示威，要求ABC道歉，是美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华人游行。



2013年11月，洛杉矶，作者参加抗议美国广播公司辱华示威。

洛杉矶是ABC总部所在地，必然是抗议的重点。这天恰逢是一年一度的洛

杉矶清华、北大、交大校友野餐会时间。清华校友会联系华商赞助几辆大巴，在野餐公园载上三校同学和我联络的美中协会与知青协会的朋友，到ABC办公大楼。9时抗议大会开始，各届代表和各方人士自由发言；五千华人挤满整个街区，抗议示威要求ABC正式道歉。民众挥舞着五星红旗、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洋紫荆旗，两岸未统一、中港台民间大统一，但两岸外交官均未亮相。整个抗议过程，ABC大门紧闭，无人出来与我们沟通。11时集会结束，我们要求递交抗议信，警察打开院子大门。我们走到办公大楼前，把抗议信插在门上。近百人随着送信的代表，涌进警察一直不让进入的院子，把抗议的旗帜和标语，插满ABC的庭院。12时我们返回公园，开始三校的野餐和联欢。事后白宫正式响应："ABC已从网上取下该节目并加强节目审查，主持人已道歉并出具书面道歉。"

反对"抗议梁警员事件"

2014年11月，纽约华裔梁彼得警官巡逻时，因紧张开枪走火，打死无辜黑人。2015年，大陪审团判定梁的误杀和渎职罪名成立，梁可能被监禁数年。

2006年2月20日，全美华人预定在各地游行集会声援梁、抗议法院判决。美国第二大城市、华人第一多的洛杉矶当然不能缺席，他们当然也不会让我闲着。我一反上次游行的积极态度，反对这次活动。我向游说我的各方阐明："若无辜华人被无能警察击毙，警察不该负责吗？若法院判警察有罪，你们会抗议法院吗？若法院判警察无罪，华人会善罢罢休吗？黑人的生命与华人同值！恕我不再能帮助组织此次种族主义的行动。"当天洛杉矶市政府前仅有数百人集会为梁"申冤"。2016年4月，梁上诉后被高等法院判处5年缓刑。

接待朋友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我的同龄人、小中大学同学，以及大部分朋友

同事都65岁以上了。按中国官场规定，正部级都该退休了，遑论其他官人商人学人，来美公费考察几近绝迹，私费旅游倍增。按台湾话说，我很“四海”，只要是熟人，来的都是客；有钱潇洒住酒店，勤俭凑合住我家。我算无证的“三陪”：陪吃、陪住、陪玩，好在美国同性或异性三陪皆不禁止亦无须办证。近十年，每年接待的中国朋友5-10批，旺季主卧和客房都住朋友，我睡客厅沙发。陪客旅游访友，北上遥至旧金山，200公里的圣塔芭芭拉常去；南下远到墨西哥，邻近圣迭戈抬脚就走；东面几州诸多国家公园游烂了，五小时的拉斯韦加斯就靠华人维持的！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洛杉矶的两位早已退出民运、事业格外有成的八九风云人物。

李禄，被中国政府通缉的天安门学生领袖，被认为是其中最聪明的。逃亡法国时与我几面之交，很谈得来，后在美国同年获得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现是公司设在洛杉矶的投资家兼对冲基金经理，我们就近时有来往。外界盛传他可能成为巴菲特的接班人，李对我说，他只是向老巴推介入股比亚迪，使巴获得数十亿回报；他并无意管理巴的公司，还是自己干痛快。亿万富翁李禄生活简朴随便，仅举两例。某年有朋自远方来，夫妻住我家，我约李共进晚餐，顺便还他多次请我之情。他太忙，十点才到我家，道歉之余说尚未吃晚饭。我说叫宵夜外卖，李说吃冰箱存货，结果他打扫了我们晚餐打包的剩饭菜。另，某日我应邀到李公司被启蒙金融常识，中午我说请你大餐算缴学费。李说下午都忙，因此每天中午只是点心咖啡。公司附近高级咖啡馆林立，李只带我到星巴克连锁店，我为他花费不到十元。后因李把拥有的多维新闻网股份卖给中资背景者，致使其创始人、我更好的朋友何频退出多维；我与李禄又都忙于自己的事，故近年少有来往。

刘永川，全美学自联首任主席。“六四”后积极活动，促使老布什政府容许全部中国留美学生学者获得绿卡。直接受惠者达八万之众。刘1993年获

斯坦福博士后在美国多所知名大学任教，现为研究方法和数据科学著名专家。因居住洛杉矶，我们偶有往来。我们第一次朋友聚会吃饭时，我表示：“我虽然没拿六四绿卡，但很多朋友是受惠者。你因此不能回国，我应该替他们感谢你，今天买单。”刘说：“一切都是历史了，我现在已受洗加入基督教，脱离政治专心致力于科学研究。”我说：“历史永远记住你和你的团队的功绩。”事后与许多老留学生谈起刘永川，他们都赞不绝口。

第三节 对三位著名流亡者的帮助

13-9 与万润南的美西交往

在清华小型餐会上，一同学说某人是万润南的跟屁虫：我当即说：“我还不如她，我是所有流亡者的跟屁虫！”我能回国了，但“饿者变饱汉，更知饿汉饥”！我愿尽绵薄之力帮助不能返国者，在新加坡和纽约工作时如此；到美西退休了有小钱和大闲，则更是志愿者和义工。

在旧金山，先到的老万帮我找的出租公寓，距离他与儿子同住的豪宅仅三公里。每天下午一人跑步到另一人家，茶点小聊；再一同跑回自己家，稍事歇息；另一人自己跑回家；雨雪有阻，否则几乎天天如此。与在纽约一样，我们单方的本地和来访的亲友都成了双方的朋友，共同款待；如万孙女出生，亲家母、清华学长来旧金山，即如此。我们一起开车远赴洛杉矶、近游周边景，是日常生活的新常态，不值一提。值得一提的是万的父母已年逾耄耋，不能像上世纪末能长途旅行到美国与爱子相见。国内关系斡旋，让万写份“认识”交政府，未通过。万与我商议，我们共同修改成“不认错的最深刻认识”，但还是被拒绝。我敬佩万的气节！他只能每天17时，与中国早8时的父母视频。我还是每年回国时，为万传递信息和物品。万太李玉半年在美国为丈夫尽妇道，半年在北京为父母尽孝道。

2003年以后，我迁至洛杉矶；万的儿子回中国发展，卖掉豪宅，老万夫

妻搬到旧金山机场附近。我们还经常在南北加州之间驾车互访。其间老万购置了豪华的瑞典“富豪”轿车、配置了刚发明的导航仪，在朋友的电召车公司开出租车，迎送来访北加州的富贾鸿儒。万对我说：“我曾把出租车开到极致，这就是我的职业素养；这段日子，是我生命中最动人的乐章。”六四后，国内无关方面曾放风，万卷走巨款；万退出民运后，有人说他贪污了民阵经费。作为好友，我清楚其清白；因为好友，我的辩白苍白。他自食其力开出租车，即为明证！

2004年6月15日晚6时，我从洛杉矶开一天汽车如约准时到达万在北加州的家门口。按门铃无反应，座机手机均无人接。可能临时有接送机场的紧急差事，那里信号不佳。等了半小时，又过半小时，天暗下来；我对极守时的老万担心了。约7时半他来电话，半小时后到家。晚8时，大汗淋漓、衣服湿透的老万才与我一同走进他家。他说：三小时前开车回家，突然心剧疼、头发晕，他忍痛把车停到路边，就不省人事了。半小时前冻醒，不知何时浑身湿透，第一时间电话向我道歉，第二时间电话取消餐馆订座。当晚我们泡面充饥，夜宿万家。次日我载他看医生，诊断严重心肌炎，心肌部分坏死。从此，他不能长途开车，我每年去看他数次。

2005年，老万迁至东湾佛利蒙市。几位华人博士在佛市成立一家开发“绿激光”医疗设备、产品销往中国的公司，聘请万为营销总监。万的海外人脉关系为公司筹款几十万美元，国内人脉为公司建立销售网。那几年万事业顺遂病情稳定，我看望他时也常去距他家几分钟车程的公司。2007年前后，中国医药总局领导贪腐频频更换，因此万公司销售不顺，公司M总裁独揽销售大权，闲置老万，我捧场三万后来全打了水漂，老万损失更多。

2008年初，万搬到在旧金山西北百公里的退休小区买的新房，开始了完全退休的生活。小区内配套实施齐全，但距离最近的华人超市和中产阶级必去的仓储超市要40分钟车程。老万不能长途开车，坐别人车太紧张更不行。

我每次去，都在路上买齐各种中西生熟食品。到达后请上他和隔壁的我中学龚同学，一起去镇上唯一的港式中餐馆（木须肉用叉烧肉可见水平），饭后大量打包带回万家。龚某总说："老阎又来扶贫啦！"我必答："在纽约和旧金山，老万对我恩重如山！"有几次李玉在，我就开车载她在周围远行一天。2008年后我每次都住在万家客房，不用再去旅馆了。

2014年初，万润南离开旅居15年的美国，结束我们密切接触的15年，返回法国巴黎定居。我们保持着微信电邮电话的热线联系，我每年回北京都与李玉见面。

13-10 在洛杉矶照顾陈一咨

2008年洛杉矶民运大会与陈一咨重逢，会后登门拜访，纽约一别，新世纪首次见面。他已患晚期胆道癌身体虚弱，我开始了对他长达六年的照顾，直到他去世。陈经名中医治疗病情稳定，每天练气功、吃中药、用艾草灸。我与陈家在相距不远的相邻城市，应他要求每周去看望一次；一般是下午两点他练完气功后，五点太太下班前。笃信佛教、希望清净的陈太不愿人来；同样相信佛教、愿意热闹的老陈特希望来人。陈行走困难，下午是半日保姆上班时间，可以给我开门锁门。平常我只是带些时令水果、畅销书籍（如吴李邱回忆录等）、老友近况和大小道消息，主要是陪他聊天解闷；每年从中国回来，就是茶叶、土特产和中国的擦边书。而不平常的事件有——

2009年张钢和太太来洛杉矶住我家一周，张与陈18年前冲突，一直无来往；张得知陈病情，在我陪同下、带着我库存的中国特产（我说张从澳门带来）去看望陈，主动和好。后来我又开车带张夫妻去北加州看望万润南。

陈的女儿毕业后回中国发展，一般圣诞新年与夫婿带孩子看望老陈，夏天是妹妹从西安来照顾兄长。2010年在陈的家中，我与陈妹一起庆祝他七十大寿。陈难得高兴，说："希望五年后我还能给你作70大寿，然后彼此一直作下去！"我答："俺胸无大志，咱们就作到90为止吧！"陈开怀大笑。陈

妹说："大哥这里只有您一个老朋友，他就盼着阎大哥来。"当年底我满65岁，因缴税超过十年享受老年健康保险，我选择了与陈和许家屯同一个家庭医生；更方便带他看病和替他取药。2011年陈的身体好些，只是起床后腰老疼；说来洛杉矶好几年，还没看过市容和大海。我看他的床垫已经塌陷，就带他去买了新的硬床垫，答应他腰疼好些带他进行多个"洛杉矶一日游"。3月15日我请许家屯晚餐，餐馆距陈家很近，双方愿意见面。我去接陈，首次见到对一咨特好、对陈友特烦的陈太。许与陈历史性聚餐，许左陈右，大吵一架不欢而散；事后我招致陈太埋怨。2012年夏，陈的妹妹和妹夫又来美国。陈要求："本想我身体好些，你陪我们兄妹一起游览洛杉矶；现在我身体还不行，麻烦你先带他们吧。"我只能导游陈一诒夫妇了，老陈从此再也没有跟我出过家门。



1990年4月，柏林会议后，作者（左一）与陈一咨（右二）难得的合影。

《陈一咨回忆录》

陈一咨写回忆录的想法由来已久，2009年搜集资料，2010年动笔（动电脑）。他写完几章，就把打印稿交我"斧正"，一周后我"学习"完，把像"批改过的作文"交还，与他讨论。错别字、笔误，陈立马改正。我的有些意见，经过争论他接受，如他提到胡耀邦时称"胡叔叔"。我说："当面叫胡，或与熟人对话，可用。第三人称叙事时，不必显得亲切，不用为佳。"

有些他不接受，如他提到某太子夸他有总理之才。我说：“无第三者在场的夸奖，不提也罢。”讨论中，有些史实不清。我曾多次应他的要求，当场致电纽约的何频、北京的组织部王同事等等，让陈与对方直接对话澄清事实。当年秋陈交我前三章、年底交四五章，次年春交六七章。2011年8月，我送还最后的第八章和“前言后语”。陈一咨说：“我想在书中感谢你，行吗？怕吗？”我犹豫片刻，答：“你感谢了许多国内朋友，我怕啥！”

2013年9月，陈把香港新世纪出版社5月发行的《陈一咨回忆录》，签名题词赠我。他翻到《说明》页，让我看——在致谢每章帮助者的最后，写到：“我还要感谢的是，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洪朝晖、罗小朋、王小强、阎淮等友人对本书写作的指导与帮助。”

为什么陈一咨要在书中感谢，我“犹豫片刻”？我用学术语言：陈在书中负面评价了众多熟人，我皆熟悉。这是我与陈的最大最多最激烈的争论。我说：“谁都不该贬！尤其张钢带着太太和礼物来看望你，他现在还不能自由回国！更不应骂万润南，你还为母奔丧和扫墓回国两次，他呢！”陈生气不听。我也动气了：“儿时唱：骂人不理骂自己！他们何人？自有公论！你贬损别人，只能有损你的书和你的人！”陈说鲍彤答允写序，未果，不知是否与此有关？不出所料，看过陈书的许多朋友都说：“他骂了一切心存芥蒂的友人，把他们都视为雠敌。器量太小了！”陈在回忆录的《说明》中，为各章提供数据而感谢了一百多人，而我是“对全书写作过程中指导与帮助”的仅数人之一。我为此而犹豫、而忧郁。

我1984年在莫干山认识陈一咨，国内参与他的体改所、青年经济学会、政改办的经济和政治改革工作，海外参与他的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学术工作。他的远见卓识和广阔胸怀，团结了众多精英志士，成就了一番事业。但是在晚年，身体虚弱事业受挫，心理健康和精神状态明显欠佳；人性的弱点、人品的瑕疵便显现出来。英雄迟暮、哲人其萎，我只能引以为鉴！

陈一咨去世

2014年4月陈身体极度虚弱，女儿吴笙来美。14日17时，吴给我打电话："父亲15时去世，你明天可来家告别、商议后事。"15日10时我如约到陈家，陈妻肖雨和吴笙接待。我到客房向躺在床上、好似安详熟睡的陈一咨三鞠躬。墙壁上挂着体改所几十人署名的挽联和陈的几张照片。

我一个人陪伴老陈良久，思绪万千悲痛心疼，他还不满74岁呀！随后我与肖雨吴笙商量具体的善后事宜。下午我联系世界各地的老陈好友，赵二军和万润南请我以三人名义送一贵重花圈。18日我再去陈家，陈的女婿已到了；我们检视各项有关事宜的落实情况。

4月21日9时，遗体告别仪式在中华殡仪馆举行。纽约来的洪朝晖主持、罗小朋致悼词，百余人参加。11时，陈的家人与专程从纽约赶来的洪与罗、张艾枚、于大海、李进进等和我，护送遗体到火葬场火化。12时，陈家亲属请上述十几人午宴。这些人大部分是我的十年未见的老朋友，大家低调叙旧几小时，下午我把几位送到机场。

13-11 与许家屯结成忘年交

2009年《华盛顿邮报》欲了解习近平，询问何频。何想到我曾考察过习，通过万润南找到隐居的我；便产生了该报上我的文章，何也与我恢复联系。6月何频与高伐林来洛杉矶采访许家屯，他们是多年的忘年知己，已采访多次，这次也介绍我与许认识。我佩服"六四"时许的表现，也看过他离国后的著作。93岁的许家屯住在洛杉矶东一百公里、用《许家屯香港回忆录》的稿费购买的二层小楼。私人助理李海伦照顾起居，经济状况好时雇有保姆，小女儿退休后、于几年后也来同住。

从此我成了许家常客，一两个月去看望一次，当然不能空手去了。他家没保姆时，我还从淮扬餐馆打包，带些许老喜欢吃的江苏家乡菜。每年回国

前去请示："国内嘛事要办？"返美后汇报中国见闻，买些碧螺春茶叶等江苏土特产，说是许的部下送给老首长的；为老爷子一减思乡愁，二增自豪感。与许老讨论交流时，谈历史：同龄的家父与许都是"三八式"的新四军，我又出生在江苏，格外亲切；讲现实：许认为中国都好、美国皆坏，共同语言较少。看未来：他满怀期望、企望和乞望能"叶不落归根"，我不忍心让这父辈的鲐背老人绝望，违心安慰他："可能不久就可以回国了！"我还问："那你为什么离开中国？后悔吗？"许答："江泽民和李鹏要狠整我，'小杖则受、大杖则走'。胡锦涛和习近平很好，将来会让我回去！我不后悔当初的抉择,我当然不能支持镇压！"就为这最后一句，我敬佩许老爷子！下面是几年中，印象深刻的事情——

2010年12月，许家屯在美墨边境的圣迭戈市中华历史博物馆，举行离国20年首次、也是唯一的公开演讲，畅谈他出掌新华社香港分社、以及来美后的心路历程。我随同前往，看到演讲厅听众爆满，散会后许被围得水泄不通，欲合影、签名者竟需排队。许又露出久违的、香港人熟悉的"许氏招牌笑"。

2011年3月在例行家访时，许家屯说眼睛更加模糊了。美国65岁以上的老人都有国家的医疗保险，交够10年税的，享受较好医疗条件的"红蓝卡"；否则像许，就是较差的"白卡"，医生不愿看白卡病人，不是急诊就要排队等待很长时间。15日下午我托好友眼科张医生给许门诊检查，结果是白内障严重，预定24日手术。晚上我预订了在当地最豪华的、唐国强等明星来洛杉矶举行见面会的御珍楼餐厅，宴请张医生夫妻，以示感谢，许老和海伦作陪。御珍楼距陈一咨家很近，陈知道我认识许，想见。我征得许同意，接陈过来。酒过三巡菜快扫净，腾出嘴来开始辩论：老布尔什维克与民运骨干、许老与老陈，针锋相对各不相让。陈平时两人交谈都像大会上做报告底气十足，许一生气也嗓门就高，我们劝阻无效，两位吵得周围食客侧目，服务员

都过来劝架。最后不欢而散。24日白内障手术完毕，海伦陪许老到医院附近的我家午餐和休息。许对老陈余气犹在："小阎你是小反动，老陈是老反动、大反动！我过去对他的较好印象荡然无存。"海伦打圆场："阎大哥劳民伤财挨你骂，还笑嘻嘻，好人哪！"

2011年5月，何频一人来洛杉矶，我接机后直接去许家屯家，我们在许家住了三天。许对何阎二人，深入详细全面地谈了他的革命历史、对当今世界的看法和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展望。当然每次的热门话题、保留节目总是回国！许通过党内的层层渠道，争取回国的种种努力，都是泥牛入海无消息，他希望、失望但不绝望。每每此时，我眼湿、喉涩、心疼！我根本不看好，但不能说破，只能安慰。20年啦，风烛残年行将就木的95岁"老朽"，高抬贵手放他一马，又何妨？！离开许家，何频住进我家附近的希尔顿酒店，处理他的"公私"业务。临行前一天，何到我家作客聊天，约好许家屯下午到我家附近餐馆为何频饯行。时间已过，我们在餐馆左等不来、右候不到，海伦在高速公路上开车载许、不敢接电话。过了一小时，海伦才从家中来电话。原来：赴宴路上海伦顺口说起："朋友回国归来，讲国内腐败猖獗。"许大怒："你们这些反动分子，就会污蔑我党和国家，看不到美国更腐败堕落。太可气了！我没心思去吃饭了，开车回家去！"海伦下高速、停路边，费尽口舌、检讨加道歉、劝了半天毫无效果，只得打道回府。我哑口无言片刻，感叹："这种坚贞的老迈的党外布尔什维克（许早被党开除），还不让回国，天理何在？"玩笑冲淡气氛："咱俩小反动吃，我还省了一半银子呢。"

2016年6月29日，许家屯逝世，享年100岁。

6月23日晚，回中国四个月、返美十几天的我，为刚从纽约来洛杉矶参加文革五十周年研讨会的何频、冯胜平、高伐林接风，香港《文汇报》前总编辑金尧如的公子金建一作陪。餐后与我们驱车直奔百公里外的许家屯家。许

四月病危两度入院，抢救过来坚持回家；现已病入膏肓，护士陪伴在旁。我们进入卧室，许老安静地昏睡在床上。随后我们与海伦及从中国赶来的许的次子和次女，一起商量许的后事。金建一介绍，父亲去世时的殡葬经纪很专业，于是立刻请来该经纪，商定了殡葬活动的大事细节。我回到家已凌晨3时。

6月28日开完文革研讨会，估计许可能维持几天，何频、高伐林、冯胜平和我开车南下墨西哥散心，当晚住在圣迭戈旅馆。刚睡下来了电话，海伦哭着说："刚才，12点12分，老爷子走了！"何频和高伐林立即在网上发布讣告和有关照片，我们几人似睡非睡，天没亮就赶回洛杉矶，与许家人见面，落实六天前确定的相关事宜。加州规定，人死后凭医疗证明报告政府，批准后方可火葬。再确定追思会日期，大约需要十天。我们四人驾车东游，与许家保持热线联系。



2016年7月，向百岁老人许家屯告别。

7月9日，我们在美西游览后，南下墨西哥再返洛杉矶，直奔许家，与她们商定后两天的安排。

7月10日12时至17时，在森林草原墓地举行遗体告别。几十位亲密好友和家属参加，其中有万里次子万仲翱。花圈过百，有赵紫阳、万里、彭冲后人送的。我以个人和以清华校友的名义（众多校友得知消息委托我代送花圈）送了两个花圈，我们全程陪同家属接待来宾。

7月11日12时至15时，追思会在同一殡仪馆举行，百余位亲友参加，何频代表好友讲话。礼堂左边首排坐着许的亲属，右边首排是何频和我等四位“往年之交”。追思仪式结束后，何频、金建一和我等许家屯晚年交往密切的八人，扶棺移灵前往火化。晚餐许家宴开四席答谢好友，夜11时我送何高冯三人上飞机回纽约。结束了近20天的送别许家屯活动，也结束了我与可亲、可气、更可敬的许老爷子的八个年头的忘年之交。

2014年向东方送走执着追求民主的万润南，回到他的第二故乡、自由的法兰西；向西方送去笃信佛教的陈一咨，去他向往的佛国；2016年的现在又送党外布尔什维克许家屯，去见他终生信仰的马克思。美国加州三位可敬的流亡朋友都离开这里，我“跟屁虫”的身份和志愿者的使命也告终结。准备迁移美东。

第四节 文革五十周年的三场研讨会

13-12 清华“文革校友”文革反思聚会

2016年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端50周年、终结40周年。“不忘初心”的中国知识分子，要冲破重重阻力，隆重纪念和彻底反思。纪念本是中性词，但因众多逝去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逢五逢十的冥寿，官方需要经常大肆纪念，“纪念”就被误解神圣；其实坏事也需纪念，如“南京大屠杀”。4至6月，我先后在中美的三个文革研讨会上发言。

2013年，清华同学孙怒涛提议校友们撰写回忆反思文革的文章、结集出版，我没理睬。担任“文集顾问”的好友向孙主编举报：“阎淮在写回忆录，文革部分肯定精彩。”孙随即礼贤下士数次约稿。我被感动，次年把三万字的《一个老红卫兵的回忆与反思》交出。2015年，《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由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出版，国内流传甚

广、各界反映较大。校友网上逐篇刊出，拙作得到最多好评；海内外许多网站都转载我文。孙怒涛决定藉势于次年举行名为“校庆座谈会”的文革反思聚会，百余校友踊跃报名，杨继绳、秦晖、阎长贵、唐少杰和我等8人被推举为特邀发言嘉宾。



2017年4月，北京，清华校友为作者接风，杨继绳欣然答应写《代前言》。

2016年初孙怒涛组建会议筹备组。我3月回国，与筹备组看了几处会场，最后选定北京奥运村附近的亚奥国际酒店，3月21日签约并缴纳定金。随后我陪“欧盟援华环保小组”到东北等地考察评估，4月中旬回京，22日会议的一切准备工作全部就绪。

4月20日晚，突然接到孙怒涛电话，说亚奥酒店刚以治安理由毁约。我秉承“危机时，见好则收、遇坏就上”和“无事不惹事、遇事不躲事、出事不怕事、完事不想事”的“八事原则”，立即申请加入筹备组，协助处理变局。

21日上午，我开车载杭州来京的孙怒涛，一同参加筹备组紧急会议。我们想到清华附近拥有10桌大包厢的“郭林家常菜”。因与戴晴、吴伟等有饭局，我先行离去。孙怒涛等中午去“郭林”视察试吃。满意！订菜、签约、交定金。在微信群通知：“座谈会改为聚餐会，只是吃喝玩乐吹拉弹唱，可

带白酒一醉方休！”原定讨论一天，中餐谢绝烈酒。现在如此通告，就是向无关方面求饶，高抬贵手、放我们古稀老朽一餐！

21日晚，筹备组等人在大鸭梨烤鸭店就餐，检视明日聚餐准备工作。突然家住昌平、中午签约的同学来电话：“郭林家常菜来电话说煤气管道检修取消明日订餐，让立刻去取回定金。我说住在远郊区，明天再取。他们说马上来我家送定金，并要拿回菜单，今夜一定要把一切了结！”顿时欢声笑语变成莫言无语！同时，清华发言教授来电话：“领导不让参加此会。”有人无奈：“胳膊拧不过大腿，算了吧。”孙怒涛以拳擂桌：“我心有不甘呀！”我趁势建议：“这里北面小街上的合川大酒楼有二三十人的大房间，周五中午不会紧张，我们不预定，明天一开门就去占了。研讨大会改成国外和京外校友参加的小型会议。”大家赞同，立刻在餐馆包间里行动起来。微信群通知聚餐会取消，明天下午在清华园开“见面会”。我们不敢使用微信，就电话逐一通知“临时海归”和“专程进京者”。电告敏感人物杨继绳：“明天上午去看望你，请在家等候。”（次日“看望者”用汽车把杨“劫持”来参会）对更敏感的蒯大富则暂不通知，明天上午再告之，结果次日蒯已去清华来不及赶到合川。

2016年4月22日9时至14时，清华文革时在校同学30多人，三易会址后终于在合川大酒楼（北京亚运村店），艰难地举行了微型的文革五十周年反思研讨会。囿于是餐厅不是会场，只有杨继绳宣讲了《为什么历史学成为当代显学》，其他到场的发言嘉宾只简单介绍自己的论文提要，主要时间是自由发言。我的感慨议论是：“清华文革校友大部分是执政的共产党员，开会却要地下党作风；党的一大两易其址，我们却三易会场。都是70后的耄耋老朽，响应党中央‘彻底否定文革’号召，开个反思文革会，就洪水猛兽了？几个自信怎么荡然无存啦？”15时至18时，近百文革校友集聚清华园，先在大礼堂前合影留念，再到清华荒岛畅谈海聊，歌曲才艺戏剧清唱穿插助兴。

散伙后，我开车先送蒯大富夫妇回旅馆，再与孙怒涛一同回我们的酒店。蒯太说：“清华的团派、四一四、老兵，三大派的头头在这小轿车中大联合了。”我接茬：“若出车祸，三派都没责任，敌对势力就栽赃老共了！”

5月，孙怒涛设立清华文革反思微信群，百余校友专门讨论夭折的四二二讨论会的论文。孙通知我：“后天讨论你的发言，正好赶上‘516’，有顾忌吗？”我答：“516？我的荣幸！我是上无敬区、中无误区、下无禁区。好话：百无禁忌；坏话：活猪也不怕开水烫！”讨论的结果，我不好意思说，当然是好评如潮。海内外网上盛传、美国出版的《明镜月刊》2016年7月号刊登万言拙作《独具毛泽东特色的中国文革——在“清华文革研讨会”上的发言》论文最后注明日期“2016.4.22”。文前的副标题和文后的时间，是我强调必保留的，以此纪念那“开而未开”的“清华四二二”！

13-13 洛杉矶加大知青研讨会

新世纪初，美国加州理工学院邱新睦的研究知青的论文写道：“崔武年和阎淮的《谈谈老三届》，是国内知青研究领域的第一篇专题论文。作者运用大量的事实和数据，论述和分析了知青老三届的教育基础、特殊经历和现实状况；认为老三届是自觉对社会负起责任、经过磨难和反思的一层人。该文有理有据、平实可信、有很强的说服力，可以视为国内知青研究的开端。”

我到洛杉矶后认识了“南加州知青协会”的领导邱新睦，为感谢上述的谬奖，我应邀为邱主编的《知青》杂志撰写文革回忆文章，并参加他们知青协会的活动。

2016年5月，我在北京接到邱的电邮，邀请我作为南加州知青协会的代表，参加6月在加大洛杉矶分校（UCLA）召开的知青研讨会并重点发言。推托不掉，只好应允。

6月22日，我在加大图书馆召开的知青研讨会上的发言《毛泽东的乌托邦与知青上山下乡》，要点如下——

一、独具毛泽东特色的中国文革（上述清华研讨会论文的主要观点）

毛式乌托邦导致知青下乡

1、“五七指示”是毛乌托邦理想的集中表现

1966年8月8日的《关于文革的决定》即“十六条”，把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即“扫四旧”定为文革的重要目标。

此前的5月7日，毛写了《给林彪的一封信》，简称“五七指示”。提出：“工人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农民以农为主，也要……学生以学为主，也要……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也要这样做。”

如果说《十六条》是毛泽东文革“大破”的纲领，那么《五七指示》就是文革“大立”的纲领。毛泽东对整个社会模式构思宏大的美妙设计。这就是毛心目中的共产主义、大同理想世界！

毛对社会中主要的三种成分，认为工农是皮、知识分子是毛，其关系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相结合。毛对各种知识分子最不放心，文革中的具体做法是：大知识分子的干部，到“五七干校”；中知识分子的大学生，毕业分配“四个面向”，即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小知识分子的中学生，则基本全数下乡。

2、下乡是毛的理想、知青的不幸

1968年12月毛发出一句顶一万句的最新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毛的目的真是想让中学生接受农民再教育，与工农相结合，铸造一代新型知识农民。尽管有人高调“青春无悔”，我却低调“青春无奈”。自愿选择，存在悔与不悔；被迫下乡（包括农场兵团），只能无奈！否则，怎么不让您的宝贝子孙，再下乡“土插

队”，而只想出国“洋插队”？

三、文革中最凄惨不幸的就是下乡知青

1、知青在“三大差别”的下风口

“走资派”和“走社派”的父母辈去干校，干部“解放”一批，回城一批；最后干校废除，全部衣锦还官；年老的离退休，补发工资，发点小财；体壮的升官增禄，权财双收。

我侥幸早生两年，混进大学；两妹一弟，全部下乡和兵团。马列讲“三大差别”：城乡差别，我在县城、弟妹在乡下；脑体差别，我技术员费脑力，弟妹种地拼体力；工农差别，我是职工拿旱涝保收的工资和享受小病多药的公费医疗，弟妹是农民赚工分。“三大差别”倒霉的知青都在下风口！

2、祸延几代、一生梦魇

文革1700万知青中，后来上各种大学者150万。不足10%的佼佼者，上至总书记、下至各类成功人士，现在可以和保尔•柯察金一样：“当他回首往事时，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他们可以自豪地说：我青春无悔！其他超过90%的知青，回城后绝大多数人迅速或缓慢地被边缘化，成为城市中最不幸的弱势群体。他们的父母、子女的幸福都或多或少受到影响。五十年前，毛泽东，杰出的乌托邦主义者和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的中国美梦，成为知青们终生的梦魇！（美国《新史记》杂志2016年出版的总33期，全文发表此论文）

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了在美国的华人和洋人学者，还有中国来的复旦大学的金光耀教授等人。

13-14 洛杉矶文革国际研讨会

2016年6月24日至26日，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等四机构在洛杉矶召开“毛泽东遗产和当代中国：文革五十周年国际研讨会”。参加会议的学者有六十余

位，主要来自美国，其次是中国大陆的十几位，还有几位其它国家的。媒体评价：这是文革研究的一次全球性的、水平最高的会议，具有里程碑式的地位。

我由于忙着病危的许家屯的有关事宜，只把清华研讨会的论文作为书面发言提交会议。会后美国的《汇报》2016年7月号，是《文革50年纪念专号》，刊登了19篇文革专论，第一篇就是我的《独具毛泽东特色的中国文革》，《明镜月刊》7月号也刊登此文。其摘要如下——

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上的共性：领袖独裁、官员特权；党内清洗、党外整肃；思想钳制、舆论一律。但是中国、且只有中国发生文革，只因中国有“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的，世界最伟大的天才毛主席。”（林彪1966年9月18日）。毛确实既异于世界各国的共产党领袖，又不同于中国其他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一、毛泽东独断朝纲、决定文革的起承转合

1、文革的发端

1966年中共八大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七大常委，只有毛一人积极文革，周林二人不得要领地紧跟慢跟，刘朱陈邓四人糊里胡涂地就作为革命对象先后分别被批判整肃。

2、文革的继续

1969年中共九大的五位常委中：周恩来在1967年说,“文革三年算一次吧，已经是相当长了，一年发动，两年胜利，三年扫尾。”林彪和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报告也认为文革应该立即结束，需要发展经济。康生态度暧昧。只有毛一人坚持继续文革。

3、文革的结束

1976年毛逝世。“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毛若不死，文革未已。文革前的七大常委，文革中三人惨死（刘整死、林摔死、周累死）。毛若像善终

的朱陈邓三人，活过九十岁，在座诸公，还能想：考硕士、读博士，留欧美、当教授，混高工、发小财？做你的中国特色的黄粱美梦吧！

二、毛泽东早年经历的刻痕

1、知识的局限

我在长沙第一师范看到毛自豪的话：“我没有正式进过大学，也没有到外国留过学，我的知识，是在一师打下了基础。”泽东的骄傲，中国之悲哀！

2、对下层的同情

对毛影响甚深的是他17岁时长沙的抢米风潮，饥民受到镇压。他说：“我从此把它记在心上。我觉得跟‘暴民’在一起的也是像我自己家里人那样的普通人，对于他们受到的冤屈，我深感不平。”毛从小就萌生公平、正义、平等的民粹思想，经常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3、反智倾向

43岁的毛在回忆近20年前在北大图书馆的四个月，耿耿于怀：“我的职位低下，他们大多数不把我当人看待。”反右时，大右派罗隆基说：“现在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对毛刺激极大。1964年毛说“读书越多越蠢”。

三、毛泽东异于各国共产党领袖

1、作世界革命领袖的强烈欲望

斯大林逝世，毛泽东当世界革命领袖的愿望生成；赫鲁晓夫下台，世界领袖的桂冠唾手可得。马恩“发明”阶级斗争、列斯“发明”无产阶级专政、毛就“发明”专政下继续革命。文革即是继续革命的实验和典范。

2、反对修正主义和防止资本主义

文革前毛泽东认为：全世界，在野的共产党基本已经变成修正主义，执政的社会主义大部分开始资本主义复辟；在中国，亲密的战友七大常委中，

只有林彪表面还可以，刘周朱陈邓都是变修了的走资派。为了防修反资，必须打掉走资派、发动文革！

3、彻底的民粹主义

毛泽东根深蒂固的民粹思想和对现代管理知识的匮乏，对现代政治必是“精英政治”，现代管理皆是“科层制的官僚制”深恶痛绝，极力推崇“巴黎公社精神”。他企图不断发动运动和借助民间力量，约束官僚权力、限制权力腐化。

只有彻底民粹的毛泽东有如此气魄！只有毛在掌权后，还敢号召“造反有理”！李锐说：“前社科院长胡绳晚年觉悟了，说毛泽东不过是个民粹主义者。”

4、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

1966年8月，毛主持制定的《十六条》,把“扫四旧”定为文革的重要目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哪个国家敢彻底破除、哪个国家能彻底破除？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写了《给林彪同志的一封信》，简称“五七指示”。如果说“五一六通知”是毛泽东文革“大破”的纲领，那么“五七指示”就是文革“大立”的纲领。对整个社会模式在此都有构思宏大的美妙设计。这就是毛心目中的共产主义、大同世界！

结语

毛不在了，毛的体制还在，文革的土壤和基因还在；因此，具有文革特征的社会现象有可能、并已重演。2012年“九一八”，全国范围的官办非法游行；“打砸抢烧砍”层出不穷，暴民横行闹市、竖行要冲、无法无天。正是：下有义和团、上必仍慈禧！当时我断言：文革距我们只有半步之遥！

同样只要毛产生、产生毛的体制健在，克隆、复制、山寨，乃至三D打印小号微型的毛，并非科幻。“红唱黑打”的薄熙来即是！

在中国乃至世界，人类万年文明史中，浩劫能几何？50年前，我们有幸或不幸亲历了，当年太愚蠢！半个世纪后的古稀之年，腰弯腿曲、发秃须白，耳背眼花、几近痴呆，一把年纪、半截入土，终于明白些许。

君子动口不动手，不敢干点嘛，总可说点啥？！于是，就码出这些字，费了这些话。

第五节 2015至2017年三次赴纽约开会

13-15 中国研究院中国式病毒研讨会

2014年，万润南返回法国，我不必再去北加州；陈一咨逝世，在洛杉矶照顾他的任务终结。2015年轻松了，何频希望我秋天去纽约参加关于中国式病毒研讨会，多伦多的校友邀我“当面请教”并观赏红叶。我离开纽约15年了，加拿大只去过西部，于是欣然答应北美东部秋游。

2015年9月，由旅居美东的中国学者组成的民间智库“中国研究院”（负责人何频），在纽约长岛举行中国式病毒研讨会，来自美东的纽约、新泽西、华盛顿的十几位学者参会发言。

我的发言摘要——

国内学者对腐败只是着眼中国本身的问题。何频提出的“中国式病毒”，是对世界精神健康的极大威胁。

20年前我在新加坡政府研究所，应李光耀之命，撰写论述中国腐败的两万字文章。最后提出对中国的建议：经济改革健全制度——不能贪，政治改革健全法制——不敢贪，适当高薪——不必贪，道德教育——不想贪。新加坡把此建议提供中国，结果不得而知，也可想而知！

中国现在是人人恨腐败，人人想腐败。谁若认识个小官，都想走关系捞点儿好处。政治学上讲，社会有三种形态：极权社会，威权社会，民主社会。

我通俗地说：极权社会：把政治经济全管制了，腐败不容易发生。民主社会：政治经济全部放开，不易腐败；有点小腐败，容易纠正。威权社会：政治管住，经济放开。政治权力，必然要寻租经济利益，因此腐败蔓延。例如民主化前的亚洲诸国：中华民国，在大陆和台湾，腐败都很严重；韩国前总统，没有不腐败的；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家族腐败到什么程度？菲律宾的马科斯夫妇大家更了解。南美的军政权也腐败了得。

我认为：是威权社会造成了中国的腐败不可避免性，目前的中国必然腐败！韩国、菲律宾、中华民国，太小了，他们当年也可能产生“韩国病毒”等等，但影响太小了。

中国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世界最大的加工厂和市场，世界500强，都进入中国。这些企业，整天找关系、避规则、钻空子。很多高干子女，在给他们当买办。我要是想到中国办个企业，也会去找哥们儿，不找平民子弟。

另外谈谈人性。我觉得“中国式病毒”主要是制度决定的，我不同意说是人性决定的。人性我总结三句话：“趋利避害，善恶并存，千古不变。”人类文明近万年，中华文明3700年，人性没有本质的变化，人是变聪明了，但未变善。斯坦福大学著名的囚徒实验，最近拍成电影了；还有电击实验，都说明权力腐蚀人性。所以我说，腐败、病毒，是制度决定的；在制度面前，人性什么也不是。新加坡75%的华人，香港95%的华人，制度一变，都是良民。而中国，不时就出现刁民和暴民。不只是中国，全世界的共产制度都一样。

何频提出“中国式病毒”的意义就在这里：病毒正在侵蚀我们大家赖以生存的唯一地球，套用北京奥运口号——同一个世界、同一个病毒。虽然美国百姓没有关注这个问题，但是500强的企业家、有良知的思想家、有远见的政治家，都应该重视。要让他们知道，当今就是要将“中国式病毒”的威力

看得重一些。不是需要他们救中国了，而是要救救世界、救救普世价值了。

这个普世价值，在中国荡然无存了。过去，我不恨共产党；现在，我有点恨了。恨他们把中国三代人四代人全部的道德摧毁殆尽：从老太太“碰瓷诈倒”到天真幼童——你问他“长大干嘛？”“我想当贪官！”

中国已经找不到一片绿洲了！本应该是最正直、最善良、最纯洁的那些人，像象牙塔里的科学院院士，“心灵的工程师”的教师，“白衣天使”的医生护士，都被污染得面目全非。这才是这个制度对中国造成的最大祸害：13亿，几代人！德国纳粹、日本军国主义，那还好办，就一代人么，变坏了，制度一改，还容易再变好。但像中国几代人，人心变坏，还要继续坏下去，还要坏到世界上去，要挽回就难了！

卢梭在《忏悔录》中说：“一个民族的面貌完全是由它的政府的性质决定的。”官为器、民为水。腐败不仅会毁灭一个政权，更会使人民道德堕落。

何频是老朋友啦！25年来，我第一次当面这么夸你。只因为提出这个令人深思、敲响警钟的世界性、世纪性的严重严肃严厉的问题。

我的即席发言被收录在美国的《内幕》杂志第46期和《中国再入险境》（中国研究院主编，明镜出版社，纽约，2016年）一书中。这本书还收录了我在中国研究院其它两次研讨会上的发言：

其一，2015年习近平与马英九历史性会面，好友冯胜平撰文《和平统一在望、台湾在劫难逃》，征求我的意见。我反驳冯的文章，后来作为中国研究院研讨会上的书面发言：《和平统一无望、台湾续写民主》。我的结语是：“两岸现状——一国两府、一国两治、一国两区、一中两国。近期展望——台独无望、统一无期、维持现状、改善关系。”此文后收录在哈耶出版社2016年出版的朱可新着《习马会内幕》，以及《大事件》杂志第51期。



2015年10月，作者参加纽约“中国病毒”研讨会。

其二，在中国就认识的老友翁寒松，赴美出书《中共是怎样炼成的——毛泽东周恩来44年权斗史》的评论。我不同意翁书的两个结论：毛周斗争史是浓缩的中共史；周始终占据上风，借机阐述了自己的治学观点：“新修史着，应四个方面突破：新史料、新史识、新方法、新高度，翁书皆欠缺。讨论三层次：事实判断、价值判断、情绪宣泄。学术论著：应事实判断多些，诱导读者得出作者的价值判断，情绪宣泄少少易善、‘零宣泄’最佳。老翁稍差！”我以自己学术讨论的态度结束：“我是文革前清华工科生，学制六年，学两年就革命了。尽管有毕业证书，但不是毕业，甚至都不算肄业，只是辍学。文革后流行‘自学成才’，我是社会学科的‘自学未成才、不学有歪术’的伪学者。我在学术讨论中告诫自己：不计态度、只辨真伪，不论动机、避免诛心，不动感情、非中取是。即不针对对方的立场、动机、态度、情绪等非学术因素评论。我期望上述评论，不违背这些条条框框清规戒律。”

离开美东15年啦，物是人非！纽约、新泽西、华盛顿依然故它，朋友们小的长大了、大的变老了。会上会下遇见许多故交，而特意登门拜访的只有年龄和学识都高于我的阮铭、阮若瑛夫妇，严家祺、高皋夫妇，还有一对都出自北大、都姓陈的教授夫妇三家。

13-16 中国政治变局与前景研讨会

“中国政治变局与民主前景研讨会——正义与邪恶的博弈、国际社会的道义责任与选择”，2016年10月初，纽约。

前一年我在中国研究院的三次发言公开发表后，一些民运老朋友与我恢复联系。其中有钱达，现任台湾中华复兴党主席（极蓝急统），是原“民阵”同事。他从台湾民主基金会得到两万美元筹备此会。他邀请我赴会，并通过我请到何频和冯胜平，冯又请了罗瑞卿之子罗宇，使此会“增光添色”（钱达语）。

首日会议，在纽约大学举行，使用英文，发言者洋人教授居多。备受瞩目的是刘亚洲上将的胞弟刘亚伟的发言，“透露他内心的矛盾及对中国政治前景和前途的忧虑”（香港《动向》杂志评论语）。

后两日的会议，移师华人区的喜来登酒店，六七十位华人与会。除了大纽约地区的人士，仍活跃的民运人士从欧洲、亚洲、澳洲、加拿大和美西，几乎到齐；曾任和现任的党主席二三十位。

第二天上午，第一单元的发言者是魏京生、陈破空、我、胡平。

我没有发言稿，只在魏京生发言时拉了个提纲，以“中国民主化展望”为题，简单回顾我27年前在法国参议院、26年前在台湾陆委会、25年前在美国国务院、24年前在新加坡总理公署……所阐述的一贯观点：从党内民主到全社会民主的路线图，重复我四年前在族群领袖研习营对中国政治现状的事实判断：依然是党国、党军、党统司法、党管干部、党控新闻文化，宪法赋予的言论结社等六大自由残缺不全。总之，有宪法、无宪政，有“民主党派”、无民主和党派！应该“让一部分人先民主起来”！若省、部长们民主了，哪个“右派”没有几个高级朋友，“右意”可以上达天庭了。若全党民主了，八千万党员就是民意，全民民主指日可待！我最后说：“我个人性格是乐观主义，但对中国时局是悲观主义，我可能有生之年见不到民主中国

啦。”

下午罗宇、何频、冯胜平先后发言，表达与大部分人激烈发言不同的温和理性的态度。何、冯、我和罗，是会议“温和派四人帮”，受到会议主流派会上会下多次批判。尤其以两位教授为甚，说冯和我“灭民运士气、长共党威风”。冯性情中人，气得说不出话；我回敬：“会议号称国际研讨会，就应有学术性。这又不是民运誓师大会，不存在士气与威风问题，否则我们还不来呢！”

明镜电视、阳光卫视和新唐人电视全程录像，并及时传到网上。华人报纸杂志也派员采访并作报道。我不愿惹事，拒绝了新唐人和几家报刊的采访要求。

13-17 “习近平的下一步”研讨会

2016年10月11日，中国研究院和《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联合在纽约主办研讨会。

先是《中国战略分析》杂志创刊小型会议，杂志社社长李伟东，双总编张博树和王天成介绍了这个季刊的筹备情况和创刊号的主要内容。我建议：“杂志应加强学术性，像你们的名称一样，增强‘战略’和‘分析’；尽管经费来自美国民主基金会，但千万别办成‘民主运动’刊物。要像原来陈一咨的《当代中国研究》那样，每期出版前多向国内专家约稿，出版后大量向中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发送。”

随后在主题为“习近平的下一步”的研讨会上，十余人发言。明镜电视台全程录像并在其网站播放，《大事件》杂志2017年1月在第63期登载了全部发言。

《我对“红二代”不抱希望》——这是杂志为我的发言所拟的标题，以下是没有讲稿的即席三千字发言整理文字的摘要。这是我最新的发言，代表我的政治观，这里比较详细地记载——

一、中国民主化路线图

首先，在党内外的促进之下，在体制内外的压力之下，党内有开明和民主思想的人，将会推进党内民主——民主本是政治体制，没有党内党外之分，这里暂且用“党内民主”这个词吧——让党内派别成型，像越南那样：最高领袖差额选举，拥护不同领袖的人形成不同派别。其次，工会、共青团和妇联这些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相对独立，成为在共产党领导下、真正代表那部分群众利益的政治团体。其后，民主党派强化政党意识，不再自称“智力集团”，而要成为共产党的诤友而不是小兄弟、干儿子。再后，社会团体和群众组织依据宪法和有关法律、达到结社自由，成为对下的利益集团和对上的压力集团，逐步形成公民社会。最后，解除报禁和党禁则水到渠成，宪政民主成为现实。

党内有限民主的设想：先在几百个中央委员范围、再在几千个省部军级干部范围内实行言论自由、民主选举更高级领袖。国内象样的知识分子、公知母知、体制内外的异议分子和“同意分子”，谁没有几个省部级朋友，再不济也能有认识的、或能“搭上话”的个把高干。于是党内外的社会精英和意见领袖的高见和低见，自然就反映到“先民主起来”的“次最高层”。党内外、体制内外、江湖与庙堂的良性互动，将缓慢、不停止、不可逆转地形成和巩固。

二十多年前，我提出上述“中国民主化的路线图”的保守主张，就遭到众多激进革命派的反对；我悲观地预测：可能我们这些人看不到这个前景了。前几天在中国政治变局与民主前景国际研讨会上，我对中国民主前景的发言，还与何频、冯胜平、罗宇一起被几位著名教授批判。

二、对“红二代”不抱希望

刚才主持人提到了，1991年我在《明镜月刊》发表《回忆与反思、感恩

与忏悔》。我算是“红二代”，当时就公开进行了“忏悔和道歉”。1995年又发表文章回忆清华文革，我是清华保守派“老红卫兵”总部委员。我提到：老红卫兵在“红八月”充当了“扫四旧”的打手，重现了红卫兵的“前辈”——纳粹党卫军“水晶之夜”的“悲惨世界”。红二代，认真反思、深刻忏悔的不多；就整体而言，我对他们不抱任何希望。我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像薄熙来这种人，太太杀死个英国人像踩死个蚂蚁，“打黑”完全是“黑打”，哪有一点人性？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都是吃狼奶长大的；前30年吸毒，后30年排毒。刘宾雁说过，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个“小毛泽东”。我说：在“红二代”心中，就是“中毛泽东”和“大毛泽东”了。“延安儿女”“开国元勋后代”“将军合唱团”等等“红二代”组织，我有很多朋友在其中啊。他们对内，按老子官衔排座次；对外，过去到重庆去骗吃骗喝；现在还到老区混吃混喝。有些人已经落伍、被边缘化了，还是“八旗子弟”习气，“遗老遗少”心态！

你看“红二代”，现在，不管仍然掌实权的、还是已被边缘化的；前30年，无论家庭受迫害的、或是一直吃香喝辣的，他们大都建议：将12月26日定为国家节日——我说，将来把9月9日定为节日，可能更合适一些。没有50年前的“九月九”，文革能迅速结束，你们老爹能“翻身得解放”吗？你们自己能升大官发大财、当将军留西洋吗？

三、寄希望于“习近平的下一个”

研讨会主题是“习近平的下一步”。我说：中国的民主化不能寄希望于“习近平的下一步”，而是“习近平的下一个”！

习近平刚上台讲了宪法呀、法治什么的；但是近三年，提出了“两个30年互不否定”，“九号文件”虽不是他的原话，但是“几不讲”也是事实。公民社会，宪政，全世界大都公认的东西，在中国都成了禁忌。按原教旨的马列主义、从正统共产党的角度，习近平确实是优秀的共产主义接班人，保

卫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杰出红二代！

宪政民主，只能寄希望于平民子弟，即习近平之后。他们对这个现代社会拥有新认识，新理念，知民心、接地气；他们没有“打江山、坐江山、保江山”的抱负和包袱。他们家族或亲友中，肯定有困难时期饿死过人的、有长期“四世同室”的、有“地富反坏右”和被“杀关管”的“政治贱民”的子孙。他们掌握了最高权力，才能真正实现：“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国的未来才有希望！

13-18 明镜电视采访我80分钟

这两年去美东，都是先后住在冯胜平和何频家里。2016年10月中，何频在家中电视采访我80分钟，在明镜电视播出，录音整理文章两万字，刊登在《名星》杂志2017年1月出版的第22期。

采访中，回答何频的问题，我简单介绍了青干局、第三梯队，以及考察一些政治明星的情况，当然较多地牵涉到习近平。因此，何频把“考察习近平”五个大字放在那期《明星》的封面和书脊上，而采访文字也以《采访习近平的人》为题目，并冠以“封面人物”的栏目。这些内容都容纳在本书中，您已经读到，不再絮叨。只把最后部分我的新近观点抄录如下——



2016年10月，明镜集团总裁何频（右），以电视节目主持人的身份采访作者。

何频：你怎么看习近平做的这些事情？阎淮：人们常连着说“独裁专制”，这是两个概念，“独裁”没什么，别“专制”就行。

你个人独裁了，集权了，也可以干点好事。习刚上来时，提到依法办事、宪法，但现在以言治罪，明显地有专制的倾向。当年胡赵时代的“宽松，宽厚，宽容”，这三个词很难用到现在的政局上。作为知识分子、无论左中右，要在现在的局势和“三宽”中选择，恐怕都愿意“三宽”。而现在是“三不宽”吧？

何频：刚才您很有趣，似乎要把“独裁”和“专制”分开。

阎淮：“独裁”是他们“赵姓”（“赵家人”是民间对权力者集团的一种代称）自己政治分赃的家务事，与我何干？“专制”就牵涉百家姓中其他“九十九姓”啦；赵家之外的我们，不干！

何频：你觉得习近平把常委的很多权力拿到他手中，是正确的选择吗？

阎淮：我不赞成、但也不反对独裁，过去九常委“九龙治水”时，没有明确的分工。只知道总理管经济，但是从来没有明确说谁是管什么的，很多责任分不清。从这点说来，独裁——可能你也理解我的意思，责任和权力相对统一了，你有权力，就有责任了！现在事情搞不好，你不能推给其他六个常委，那就是你习近平的责任。成绩是你的，失误也是你的。比毛泽东那个“权力无限大，责任无限小”好多了。

何频：你不反对习近平个人集权，但是你反对中国现在的制度，是不是这个意思？

阎淮：对！我反对任何专制制度，我特拥护24字“核心”的价值观，尤其是：民主、自由、法治，若加上人权就齐全了！

何频：你觉得习近平有可能会改变这个制度吗？

阎淮：我觉得可能性很小。何频：也不能说完全没有？

阎淮：对于学者来说，不可轻易使用全称判断，不能说全无。我们加州经常地震，你们这里地震概率可能是万分之一，但不能说全没有。同理，这个比喻也适用于习近平。

何频：习近平二十大以后会继续当总书记吗？

阎淮：也有两种可能性，先说可能性有无，再说可能性大小；即先定性、再定量。胡锦涛时期，没人讨论他十年任满后，继任的可能性。两任“清华牌”总书记，我都认识，一个学长、一个学弟，我评价胡：“十年无作为，一朝留清史”，因为裸退。

何频：我说江泽民不“裸退”，是无耻；胡锦涛“裸退”是无能。

阎淮：我宁可无能、绝不无耻！可能有人说我无能，但绝无人说我无耻。而到习近平就有超两届的可能性了。很好解套，党内“民主”嘛，一选举就“众望所归”啦。可能性超过五成。

何频：几十年和你的交往，我从你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

阎淮：话说反了吧？我从你身上学到的东西更多。

何频：最开始我就读了你很长的文章，讲中国这个权力的体系，我就一直希望你能把你的经历写成一本回忆录，听说你现在已经快写完了？

阎淮：在你的鼓励和鞭策下，蹒跚前行。

何频：很多的事情，希望你回忆录出来后，我仔细拜读。我们以后还可以做更多的这样的访问，向你请教。今天就谢谢你了。

阎淮：谢谢你的抬举！

回忆录之事，既已被何频公开，就不宜再拖延。2016年10月离开纽约，我躲到美国中东部一小城的朋友家，隐名埋姓闭门谢客，其间怠慢许多赴洛杉矶的好友访客，一天十数小时，半年终于完成此书。



2017年4月，李锐百岁寿宴，作者坐在李锐夫妇身后。

2017年春回北京，4月13日李锐的百岁家庭寿宴、28日与清华校友杨继绳等聚会，我斗胆提出作序请求，老首长和老学长欣然同意；我诚挚感谢他们，为拙作雪中送炭增光添彩、划下圆满句号。

2017年5月10日我如约去李锐家，取他所撰写之序。头脑清晰精神矍铄的李老赠我近作《李锐期颐集》，问我："题写什么？"我说："请题：阎淮老部下……。"李老嘟囔说："你老什么老？"孰料他竟写下"阎淮小友存览"。我惶恐："友，实不敢当！"李老指着《序》说："我写了：我们是'两头真'的老人，你认同我们"两头真"的理念，就是'两头真'的后生，就是我的'小友'！"《变革远未成功，后人更需努力！》是百岁老人为我作序的标题，作为李老的小友和政治后人，我愿为"远未成功的变革"，更加努力！



2016年7月11日，作者（右四）为许家屯扶棺移灵前往火化。

13-19 在全球刘晓波追思会上发言

2017年7月，我来到美东，与明镜出版社的编辑商讨，对本书做最后的修改。恰逢我景仰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在被中共长期监禁中罹患肝癌，不幸辞世。7月30日，应邀参加主会场设在美国纽约的全球24小时刘晓波追思会，我在会上以“中共体制与刘晓波”为题发了言，通过网络传播。摘要如下——

极权体制，是制造和产生英雄的体制。

人祸之后，必用喜剧英雄粉饰太平；风波之时，必有冤死的悲剧英雄被“杀猴警鸡”。

文革结束后，体制内，国家级的悲剧英雄有被气死的胡耀邦，软禁至死的赵紫阳。

而体制外，国家级、国际性的悲剧英雄，即是刘晓波！他们三人已经铭刻在人民心中，也必将被载入历史的英名录。

1901年诺贝尔和平奖设立之后，104位个人得主中，有坐过牢的，有被软禁的，有流亡不能归国的；但是被囚禁至死的，此前只在纳粹德国发生过，但即使是极其残暴、毫无人性的纳粹，也不得不让和平奖得主在监狱中领奖。号称“和平崛起”的堂堂大国，却连无耻的“第三帝国”都不如，难怪诺奖委员会批评中国政府，要对刘晓波之死负重大责任。



在纽约的刘晓波追思会上邂逅阔别多年的吾尔开希（左）。

和平时期，经常产生英雄的国家和民族是可悲的，而经常制造悲剧英雄的政府和体制是可耻的。这正是刘晓波希望和平地改革、改造、改变、改进的体制。

当年中顾委反对“六四”镇压的四位“两头真”的老人，三人已经相继去世，只有我的老上级一一百岁李锐，仍在坚持宣扬民主宪政。两个月前，李锐为我的回忆录作序《变革远未成功，后人仍须努力》。他赠书题词称我“小友”，我不敢当。我们谈到十八大后，老人的两位老部下，我最好的中组部青干局同事，公开上书中央，要求“解禁赵紫阳，释放刘晓波”，结果一一当然是没有结果。老人说，你们三人都是我们“两头真”老人的小友和后来人。

现在刘晓波彻底自由了，但他追求的自由却距我们渐行渐远。

我虽然年长晓波十岁，但继承他宪政遗志的使命却历史地落在我们的肩上。年长者继承年幼者遗志，也是现行体制的新常态。改革现行体制，是我们幸存者、先出生的后来人，义不容辞、不可推卸的责任！

将来中国必将设立“刘晓波日”，让我们共同争取这一天早日到来！

后记

一

2011年应同学之邀写《回忆与反思、感恩与忏悔》，回忆北京101中（本书第二章第三节）；发表后大学朋友建议我回忆清华文革，认为更有意义、会更精彩。2012年撰《清华老红卫兵头头的回忆与反思》（本书第三章），小范围传阅，好评纷至。知己的“劝进者”倍增，力主我撰写回忆录。2013年动笔本书，一懒二笨，笔耕五年，终于完稿。

我72年的生命图谱已展现无遗。自序中使用文雅词语，描绘本人特质。现在读者应知，用粗俗话说，我是“赖活着不如好死”和“宁愿折腾而苦、决不平庸而福”的生活弄潮儿和政治顽主！

先秦哲人称，“立德、立功、立言”乃三不朽，为后世读书人追求的最高境界。鄙人一世无成、一事无成，不敢奢谈立德立功立言，留下三十余万言，算是对历史、对自己的一个交代。

二

常有人问：“辞国退党，后悔否？”——72年，始终中国公民，以下所提之“国”皆指中华人民共和国。

前文提到的前友人熟人：政界混到正副国级，部长局长比比皆是；商界干到亿万富翁，富可敌国者有之；学界院士博导两位数，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大有人在。我仍一介三无草民（无功名、利禄、学术职称），最近准备回国定居；故土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只能租房。

但是，我不后悔！他们（少数？多数？）蝇营狗苟、委曲求全，（偶尔？经常？）违心伪装、双重人格地活了一辈子。我，自我本我、自由自在

地活了两辈子；现在享用挖资本主义墙角、蒙骗帝修反老外所获，昼心安理得，夜睡眠安稳。

时有人问：“若留国内，将如何？”我多年如是答：“两种可能。其一、坚持本我、特立独行，两袖清风、体制排斥，被边缘化。其二、忘却初衷、自我异化，随波逐流、体制同化；若高明，荣华富贵；若倒霉，身陷囹圄。”

鲍彤近言：“若留官场，自己必贪！”我重新认识：客观，威权社会政治权力含金量极高，制衡机制民众媒体监督极缺，功名利禄酒色财气诱惑极强，吾等凡人修炼欠缺抵御极难。主观，乐善好施有求必应，对方变相回馈亲友，我即贪官。老鲍德能皆高我几筹，我何德何能、焉能不腐败堕落？！

三

亲友阅过书稿，劝我切莫出版、至少目前不宜，否则极其不利。

毛泽东曾要求：不怕杀头、坐牢、罢官、离婚、开除党籍，即著名的“五不怕”。官职、党籍、婚姻，我早已主动放弃；杀头不至于、死亡迟早事；中国的牢房还没坐过，若进去可填补履历空白；如“监视居住”则省却房租。

窃以为：最坏的待遇是，在海外不让返国回乡。留学生自愿留洋，我是被迫辞国。《回忆文革》的“作者百字小传”中，最后一句是“从心所欲不逾矩时，叶不落归树。”解惑说：“七十岁后回国定居。”期望此书出版时，我能在宪法第35条“公民具有言论出版自由”的祖国怀抱里自由生存。

“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接自己去。”俗话说的是虚岁。孔至圣享年72周岁，孟亚圣83周岁。本命年之我，已经活到圣人阳寿，夫复何求，还怕神马？

四

依照惯例，最后致谢。码字过程中，海内外一干朋友热情无私的协助，我永远铭刻心田！但眼下文字上，我既不感谢国外任何人，避免被“境外反华势力”和“无识之士”牵连；也不感谢国内任何人，避免牵连无辜！我只感谢骨灰安放在八宝山红军墙上的生育、养育、教育我的父母。晚年我曾评价他们：“抗日有功、内战有过、建设有错”，得到认同。我为“两头真”的父母而骄傲！

读明朝洪应明的对联，遐想几句，终结本书——

闲看庭前花开花落，荣辱不惊；遥望天外云舒云卷，去留无意；近观大海潮起潮落，心如止水；追忆往事功成功败，皆随风去。

2017.7.31于纽约

网络接骂处：yan_huai@hotmail.com

版权

书名：进出中组部——一个红二代理想主义者的另类人生

作者：阎淮

责任编辑：高伐林校对：李湘兰

封面设计：纽约客设计所出版人：何频

出版：明镜出版社

网址：www.mingjingnews.com

电子邮件：mirrorpublishing@yahoo.com版次：2017年第一版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

未经书面许可，不得擅自转登该书内容本书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本出版社立场ISBN：978-1-63032-065-2

附一：简体版编后记

互联网的发展，使得人类社会的信息交互速度达到历史从未有过的高度，《共产党宣言》有云："中世纪的市民靠乡间小道需要几百年才能达到的联合，现代的无产者利用铁路只要几年就可以达到了。"今天无产阶级实现联合的技术条件又比宣言的年代大大进步了——当然，信息监控和管制也在不断加强，这是阶级斗争的一部分，乃应有之义。

感谢互联网，我有幸读到了阎淮先生的这部回忆录，读完之后，收获良多。阎淮先生人生经历非常丰富，且行文幽默，文中有大量的小故事，很多故事读来令人忍俊不禁，一个个鲜活的故事，还原了很多历史的生动的细节。比如讲到工军宣队进驻清华，领队的连长看不惯知识分子，要整治阎淮，结果阎淮的朋友、陈云之子陈元来清华后，发现连长原来担任过陈云的警卫员，于是连长和阎淮化敌为友——看到这个细节，我们大概就能明白为什么文革中的军队号称要支左，结果却支持了保守派。

我从网上得到的这部回忆录是繁体版，排版不佳，阅读比较吃力，读完之后我便很想将此书转为简体版，以便更好地在国内传播，但此事让我纠结很久，因为这种行为虽然有利于宣传和教育群众，却会损害阎老的利益，私有制社会的知识产权就是这样的！再三纠结之下，我决定写信直接征求阎老的意见。因为从书中我能深深感觉到，阎老是心胸开阔、至情至性之人，想必能理解这种做法的无奈之处——反正简体版也不可能在境内合法出版的，"境内的版税收入"本就是个不存在的东西，唯一的顾虑是境内的读者读了简体版，就不会再花钱买正版啦！不出所料，阎老非常大度的表示，他已经早就宣布过多次，为支持海外民主出版事业，放弃全部版税，高风亮节，真是令人钦佩！

关于文革，现在已经有了大量的分析文章。本书出版后，王希哲先生写

了一篇文章，记录了和阎老的“单边谈话录”，我自作主张收入附二；另有对左翼现实主义作家曹征路的一个访谈，讨论了他的一部以文革为题材的小说，我觉得可以和此书相互印证，便也自作主张的将此访谈收入附三。其他还有大量的研究、论述，此处不再一一收录，毕竟本书主要目的是将《进出中组部》一书转成简体版，而不是文革研究综述。

从回忆录的内容看，阎老持有的应该是温和自由派的立场，我和阎老在追求民主的道路上是同路人，但毋庸讳言，在具体的理论、路线上，我和阎老是有分歧的。

二十世纪是革命的世纪，无产阶级革命在俄国、中国这样落后的农业国爆发并成功，先进的理论和落后的现实之间矛盾不断（比如共产国际一度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农民党），在革命大潮沸腾喧嚣之下，各种各样的思想、理论、阶级力量混合交织在一起。

譬如反右时，有章伯钧这样的真右派，有对党提意见的正直的知识分子和基层群众，有先主张双百方针后发动反右的毛泽东，有欺上瞒下通过反右扩大化加强官僚势力的刘邓集团。

再譬如文革中的各种乱象，老革命、老干部们有的赞同社会主义方向，也有以刘邓为代表的“到站下车派”走向了人民群众对立面，变成“走资派”，群众中的造反派也很复杂，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一部分，也有小农意识浓厚、利用运动为自己争权夺利的另一部分，虽然毛泽东已经提出了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但实际上全国真正理解的人少之又少，甚至有人连“社会主义是什么”都说不清楚（比如把“社会主义”等同于“党的领导”），群众看不清斗争方向、诉诸于人身攻击，从而轻易的陷入到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漩涡中。

再譬如1989年的民主运动过程中，学生和知识分子中有稳健派、激进派、投机派，有的拥护社会主义，有的反对社会主义、崇尚西方政治制度，

而北京工人和市民阶层则主张反腐败、要求基层民主，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也都发出自己的呼声。

各次运动中，诸多力量和诉求互相掺杂，此起彼伏，令人耳晕目眩，一时间难以区别，这也是历史上每一场革命、每一场社会运动的普遍规律。而身处运动之中的当事人，往往没有历史的、阶级的自觉性，这就是历史局限性。

当人类社会进入新的世纪，资本主义终于一统全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让位于资本集团互相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不论是欧美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还是中国的官僚垄断资本主义，亦或是其他各国形形色色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被击溃了，革命大潮退去，社会运动降温、冷却，就像物理、化学反应一样，试管中的各种混杂的、难于区别的成分，在冷却过程中逐步分层、离析、结晶，凝结成为历史的经验教训。今日我们反思社会主义，反思文革，反思修正主义，反思“人民群众如何才能当家作主”，便极大地依赖于这些经验教训。

正是在这个历史的意义上，我们并不能对阎老提出过高的要求，那就违背了唯物主义的原则了。阎老身为红二代，在成长过程中，始终对人民群众抱有敬意，即使在运动中有一些过激的行为，但终归是有底线的，而且我们无法苛求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年轻人的觉悟水平。最重要的是阎老在1989年的人生选择确实让人无可指摘，当年阎老是一名已经进入中组部的年轻干部，且有陈云家族的护佑，可谓锦绣前程一片大好，在1989年的民主运动中，也没有站在风头浪尖成为后来政治迫害的对象，仕途本可以完全不受影响，甚至借陈云、江泽民之势青云直上，却因为目睹官僚集团对人民群众的血腥屠杀，激于义愤而毅然决然的放弃一切，选择了自我流放，此行此举，实在是令人万分敬佩！

至于在海外和民运分子的交往、就职于各种境外机构，同样也不能苛

求。89之后，在一段历史时期内，人民群众的反抗已被彻底粉碎，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被彻底打压、分化瓦解，民主运动失去了自己的阶级力量，中国资本主义进入了蓬勃发展的上升期，血汗工厂、断指车间欣欣向荣，历史的经验还没有被总结，“公知”们的“三十年启蒙”还在进行时，作为追求民主、反对官僚特权、反对专制制度的阎淮先生，当时已不可能找到自己真正能依靠的阶级力量了，又能怎么办呢？即便如此，在流亡海外多年经历中，阎淮先生一直坚持不入外国籍（为此还在2019年离京返美时受阻，据理力争半月后才获放行），一直坚持爱国爱人民的立场，做到这样的程度，我们实在无法要求更多。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认为，阎淮先生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已经做出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的限制和个人认识水平的限制下，所能做出的最无可指摘的选择，因此，我对阎老抱有深深的敬意，我想，阎老晚年回顾此生的时候，应该可以做到“问心无愧”了！

今天，我们已经具备了完全不同的历史条件了。

从国际范围看，世界正在迎来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全球资本主义在几十年的高歌猛进过程中，不断拉大贫富差距，生产相对过剩危机已经积累到相当严重的程度，直到爆发次贷危机。危机之后，美国的应对手段是什么呢？是量化宽松。如《共产党宣言》所言，“这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少的办法。”持续了十多年的量化宽松，已经让资本主义体系进入到了末日狂欢的阶段。如果说次贷危机还只是新自由主义失败的预演，那么从川普上台到疫情以来欧美各国的表现，简直是不可思议，让人瞠目结舌，就连鼓吹“历史的终结”的福山，也不得不反思“美国民主的衰败”，开始讲“政府治理能力”了。作为一个直接的结果，便是国内“公知”群体的集体大溃败和社会舆论的集体左

转。今年，美国败走阿富汗、塔利班成功夺取政权也可以看作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和之前美国从越南撤军不同的是，当年越南背后有中苏的支持，而今天美国已经虚弱到了这个地步，连一个山沟里的封建武装都无法战胜了！

从国内的情况看，中国是一个有核国家，GDP 已经成为全球第二，有多达三亿受过良好教育的产业工人，有完整部类的工业体系，有发达的电力、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建设，有大一统的国内市场，有全球最大的资本集团——国资委，消灭了土地的地主私人所有制，城市化基本完成，农民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基本上退出了历史舞台，小生产已经全面的让位于社会化大生产，自由竞争已经让位于垄断，连餐饮、零售这些传统上最为分散的小生产方式都已经被互联网平台所替代，组织成了极为高效的流水线。如此种种，决定了中国的生产能力在很长时期无法迁移到其他国家和地区，这一点在疫情之后表现的尤其明显。中国作为这样一个工业化大国，出现了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无产阶级的队伍，这个阶级掌握了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生产力，而且很长时间内，不会因为脱实就虚、经济空心化而被瓦解、打散。

在政治上，中国人民经历过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经历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尝试与失败，经历过资本主义的复辟，有着方方面面的经验与教训，现在，这些历史的经验教训已经总结出来了。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前，群众还无法区别“老革命”和“走资派”，不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那么今天，情况已经变得非常清楚了。官僚集团整体已经失去了天然的正义地位，“官二代”、“赵家人”已经成为贬义词。

知识分子也普遍的无产化了。改革开放初期，知识分子群体普遍站在小私有者的立场上支持改革开放，邓小平通过“干部年轻化”提拔知识分子，将工农出身的干部替换掉，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当时大学生档案里的身份默认就是“干部”。但是今天出现了“阶级固化”，单方向的固化——向上爬的道路越来越狭窄了，而下降为无产阶级的道路是一路畅通的！于是知识

分子群体开始本能的反抗资本主义了。年轻学生们之前上学时令人恶心、昏昏欲睡的马克思主义课程，突然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了对应，“剥削”、“剩余价值”这些词语，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开始自发的在学生、知识分子群体里面复兴了。

而官僚资产阶级呢？他们一方面力量非常强大——可以说有着全球最强大的政府，但另一方面，也越来越陷入到了理论与现实的窘境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张皮在剥削日益严重、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经济危机步步逼近的状况下，已经越来越难继续维持下去了，只能紧紧抱住国家主义、狭隘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当成最后的救命稻草了。

今年是建党100周年，全党都在大讲“不忘初心”，那么什么是初心呢？全党上下无人敢提《共产党宣言》中的那句名言：**“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而是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偷梁换柱。比如习的100周年纪念讲话中，频繁出现“民族”一词，却一次都没有提“私有制”！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的这段论述实在是太经典了：

马克思的学说在今天的遭遇，正如历史上被压迫阶级在解放斗争中的革命思想家和领袖的学说常有的遭遇一样。当伟大的革命家在世时，压迫阶级总是不断迫害他们，以最恶毒的敌意、最疯狂的仇恨、最放肆的造谣和诽谤对待他们的学说。在他们逝世以后，便试图把他们变为无害的神像，可以说是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去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现在资产阶级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在对马克思主义作这种“加工”的事情上正一致起来。他们忘记、抹杀和歪曲这个学说的革命方面，革命灵魂。他们把资产阶级可以接受或者觉得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放在第一位来加以颂扬。现在，一切社会沙文主义者都成了“马克思主义者”，这可不是说着玩

的！那些德国的资产阶级学者，昨天还是剿灭马克思主义的专家，现在却愈来愈频繁地谈论起“德意志民族的”马克思来了，似乎马克思培育出了为进行掠夺战争而组织得非常出色的工人联合会！

是的，今天毛泽东已经变成了“中华民族的”毛泽东了！共产党的最高纲领——实现共产主义——也和宪法里的“工人阶级领导”一样，只能停留在纸面上了。

资本追求利润，国内市场既然已经饱和，已经全行业产能过剩，那就必然要求对外输出，比如“一带一路”，其本质就是资本输出，而这个过程，必然会剥削、压迫第三世界的劳动人民（好吧，也许剥削压迫的程度会“文明”一些？第三世界被压迫的人民群众可以感恩戴德了！）也必然会和欧美帝国主义相对抗，这个对抗又会被解读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百年来被入侵被殖民的苦难历史的报仇雪恨”——即所谓“入关学”。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了混合物，一种国家主义、狭隘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与民主革命、国际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混合物，这将是未来无产阶级运动所需要面对、需要解决的问题。

最后再谈谈民主制度的问题。当年的窑洞问答，主席认为找到了跳出“历史周期律”的办法：“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路子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都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但是“人民来监督政府”，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一来，政府不让人民监督怎么办？二来，人民有没有能力来监督政府？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我们的回答是：第一个问题，需要通过列宁党的方式夺取政权，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第二个问题，在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的情况下，斗争的

矛头就需要转向官僚主义，警惕官僚主义者成长为新的资产阶级。但官僚主义的根源在哪里呢？历史的分析表明，官僚主义的直接原因是无产阶级政治训练水平低、阶级意识不够发达、从而不能遏制官员官僚化的倾向。

以阎淮先生的回忆录为例，我们可以看到，北京二中平民学校和干部子弟云集的北京101中学差异极大，前者偏向自由散漫，而后者则对红二代学生们在各个方面都有非常严格的训练，包括参加劳动、参加政治生活、学习如何做组织工作、思想政治工作，而且干部子弟们身处权力中心，父母掌握政权，天天耳濡目染，时间一长，在政治意识、政治能力方面就和平民子弟有了天壤之别。平民阶层缺乏足够的政治意识和政治能力，无法正确把握社会运动的方向，从而走向失败，文革中的混乱和89年民主运动的各种问题都表明了这一点。

那为什么在无产阶级革命已经成功的国家里，人民群众无法普遍的接受良好的政治教育、政治训练呢？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当时的社会条件，在于社会化大生产的不够发达。实际上，当我们说“人民群众”时，我们需要意识到，当时的无产阶级在人民群众中其实是“少数派”！建国初期，我国还是个农业国，只有800万工人，占人口比例不到2%，且集中于少数几个大城市，90%的人口是农民；直到文革时期，人口中仍有80%是农民，且这时候的工人大多是工业化过程中从农村招工进入工厂的，仍然残留了大量的小农思想。而农民作为小生产者，即小资产阶级，既有作为劳动者支持合作化、支持社会主义的一面，也有作为小生产者支持分田单干、支持私有制的一面，这也是为什么改革开放后私有制复辟的突破口选在了农村，再次证明了“小生产是经常的、每日每时的、自发的和大批的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当时的教育水平也普遍低下，文革前夕，中国的文盲率在30%以上，人口中只有6%的比例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精英，也属于小资产阶级，残存大量的资产阶级遗留观念，也是天然的倾向私有制的。另

一方面，当时的无产阶级没有经历过雇佣奴隶制，对“什么是资本主义”经验不足，阶级觉悟不够，很多老工人在文革中站到保守派的一边——对他们而言，是共产党从建国前的旧社会解放了他们！无产阶级还没有成熟，没有自己的阶级意识，不能自己代表自己，就只能由官僚集团来代表他们，社会化大生产只能由官僚集团来进行组织。考察以上的各种历史条件，可以说，文革的失败、共产党的变质的确如王希哲和阎淮所说，是一个“必然”。

而现在已经具备了新的历史条件了。随着教育的普及，知识分子普遍无产化，无产阶级普遍知识化，管理社会、组织生产的知识写在了教科书里，普通人唾手可得，不再是只有少数人专享的特殊技能。同时，没有写在教科书里的“帝王心术”，官僚集团的“统治艺术”，各种“潜规则”、政治手腕，也不再是少数人、少数家族内部口耳相传、不为外人所知的了。这一方面，阎淮先生的回忆录有很大价值，帮我们揭开了这一层神秘的面纱，可以从中了解到官僚集团内部的运作机制。这是无产阶级政治训练的一部分，就像周星驰电影中的台词所言：“贪官要奸，清官要更奸。要不然，怎么对付得了那些坏人呢？”无产阶级只有在斗争和运动中不断的自我教育，提高政治训练水平，普遍的具备治理社会、组织生产的能力，才能够把“当官”这件事情下降成为一个和会计、行政等职位一样的普通职位，不让社会分工变成社会等级分化。试想，当一个普通的工人稍加训练就能胜任市长、省长、乃至国家主席的职位时，这些现在高高在上的官员们还有什么特殊性可言呢？那时，“官员”才能变成真正意义上的“公仆”。

我们是不幸的一代人，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经济蓬勃发展、生活日益改善的黄金时代已经逐渐离我们远去，留给我们的是资本越发残酷的剥削和压榨；我们是幸运的一代人，中国的无产阶级终于可以摆脱自发，走向自觉，新一轮无产阶级运动的高涨就在眼前，我们终于可以直面我们的历史使命，

终于有机会开创我们自己的历史了！

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无产阶级也终将解放，阎淮先生的理想，终将由无产阶级来实现。

2021年秋

附二：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与陈云的远见

——与阎淮的晤谈

王希哲说：我佩服陈云，他是毛后共产党内最有深远眼光的一位；也佩服阎淮书中所写陈云长公子陈元，最能克绍乃父箕裘：“统治阶级要有统治意识”。自文革至改开，父子从不为任何“政治正确”价值观批评所动，始终扣紧“统治阶级利益”这个主链。

老高按：去年明镜集团出书不多，我作为责任编辑，电子书编了若干，多是共和国档案史料；但印刷纸本书，我只编了两本：一本，是前中组部干部阎淮的《进出中组部：一个红二代理想主义者的另类人生》；另一本，是中共创始人之一陈潭秋的儿子陈楚三的《人间重晚晴：一个所谓“红二代”的人生轨迹》。

说来也巧，两本书都是从出生迄今的回忆录，两位作者都年过古稀，都是清华校友，都在十年动乱中积极参加运动，都是清华文革中的风云人物（一个是保守派，一个是温和造反派），两位作者都是“红二代”，还都在书名上反映出来（只不过在“红二代”这个词上，一个加了引号，并用“所谓”这个词来表示否定；另一个虽然没有加引号，但强调的是“理想主义者”和“另类人生”）……

伴随着出书，我在我主持的《历史明镜》视频节目中，分别对两位作者做了多次访谈。因为他们通过写书和接受访谈披露的史实，确实具有大量独家内容，因此两书都很受读者重视，尤其是《进出中组部》，既因为作者叙述了参与对若干后来官拜正国级、副国级领导人考察拔擢的内幕，也因为作者披露了中共领导集团最高层在选人用人问题上的良苦图谋和实施手段（这个图谋和手段，简而言之，恰好就是关于“党”的两个成语：结党营私，党同伐异），于是各方反映相当热烈，印刷和网络盗版盛行一时。

到前天为止，对《进出中组部》，我听到的都是正面肯定，尤其是好几位名人的加持称许：李锐和杨继绳分别给该书写序；杨建利写了一篇《因良知而洒脱》的读后感；著名学者徐友渔在其著名的《友渔读书》视频节目中一连用了三期来谈阎淮此书，此外徐友渔还用了两期谈陈楚三的《人间重晚晴》……

我说的是“到前天为止”。王希哲发来一篇长文《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与陈云的远见——与阎淮的晤谈》，对阎淮提出了尖锐批评。王希哲是海外左派领军人物，他从对阎淮这本书的批评引申开来，涉及对中国发展历程功过的分析和对未来前景的设想。他对阎淮的批评用词并不太尖刻（是否因为彼此相熟？），但是批评的分量却很重。前天我仔细拜读，深感值得推荐给大家一阅，也相信值得思想者深思。此文已经在《独立评论》和明镜网刊登，所以我想作者不反对我在此披露。

对希哲某些观点，我马上就感觉无法苟同，但其通篇立论是在哪里失足，其中是否能筛选、提炼出某些正确合理的思想养料，我一下还理不清思路。全篇只见希哲兄长传短吊地密集攻门，不见阎淮兄如何防守反击，虽然我理解希哲兄顾及阎淮兄在国内处境的好意，终觉是个缺憾。于是写信问阎淮是否有自我辩护、反驳老王的文字？他告诉我：当时希哲是从西海岸特地飞到东部来与他晤谈，有备而来，事先有详细提纲；而自己则没有思想准备，只作为朋友见面闲聊，所以当时没有记录，过后也不思量。而希哲事后给他的短信中也承认是“欲借兄书倾弟自家胸中多年块垒”。

阎淮在读到王希哲这篇文字之后，是否会对这次晤谈写下自己一方的回忆加以订正？是否对老王的看法写出回应文章？目前我不得而知，且留一个悬念。

王希哲的看法，可能会引起不少争论。我有言在先：敬请各位读者网友文明发言，有话好好说。

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与陈云的远见——与阎淮的晤谈

王希哲

介绍：

阎淮，“红二代”。原清华老红卫兵，后由陈元派遣进中组部青干局，负责中共第三梯队考察提拔。陈云、邓小平、江泽民家族皆为其仕途背景。时李锐手下。书称由其考察“提拔了胡锦涛、习近平、李克强……”。89后“叛党”，海外参加民运。数年后途穷，再由“江叔叔”网开一面回国。（以上简介多处表述不确，老王实在不应犯这类低级错误。——老高注）近来出版一书《进出中组部》，所揭内容相当深刻。据说，引起了当局不满和对其的控制。原已应邀出席今年2月老王社长组织的第二次曼谷座谈会，缘此书故，被禁与会。老王读此书，对书中特别的亮点“中国官僚阶级”与陈云家族的关系，极感重要。值阎兄访美机会，专飞普林斯顿友人家约阎兄晤谈此书。阎兄先明示他的晤谈言论不作公开，后又表示不妨少作公开。老王权衡利弊，考虑阎兄处境，觉还是只整理发布老王社长一方的谈话为妥。谢谢读者。

2018年7月1日

王希哲：

阎淮兄，我希望对你整个书发挥一下我自己的看法。我注意你的书特别强调一般共产党国家得到政权以后新阶级形成的问题。你好几次提到德热拉斯的《新阶级》一书，文革中间你提到，后来六四你也提到。这个问题我想谈谈。

为什么人们对中国共产党革命后，成为了新的统治阶级那么不满呢？中国革命是毛泽东共产党领导的农民为主的革命。我们先撇开它是是马克思主义党，先假设它就是一个历史上一样的农民革命，造反夺取政权的团体，像

李逵说的，杀进汴京，夺了鸟位。如果说当年毛带着他的革命成功队伍进了北京，不说不做李自成，他就做了李自成了，就做了皇帝了，周恩来就做了宰相了，下面各级战将干部就封官进爵，当然，汉以后基本就不裂土了，但无土之王还是有嘛。如果这样，1949当时新阶级就形成了，没有任何人能说什么话。他造反成功了，理所当然他就是皇帝呀；跟随他造反革命的，理所当然就应立马财产权力再分配，剥夺旧阶级，全革命队伍成为新统治阶级呀。不然，人家提脑袋造反革命干什么？天公地道，谁能有话说？

问题就在，你是共产党，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自称无产阶级的党。毛就进京前对他的队伍发警告了；“我们不作李自成”，就是说我们不做新的官僚阶级，我们与旧式的农民革命不同，我们永远是无产阶级，做人民的勤务员。两次曼谷座谈会，第一次我就重点谈这个问题：农民起义队伍即使有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灌输，在既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它能不能不变质呢？它的最终变质，作“李自成”，是不是一种必然性呢？后来我认识到，它变质是一种必然性。

阎淮：对，我同意是一种必然性。

王：如果变质是一种必然性，那么毛的不允许他的党，他的革命胜利了的农民队伍“不作李自成”，就是在与一种必然性作斗争，作一种最终必定要失败的绝望而又悲壮的奋斗。毛后半生的全部悲剧，根源就在这里了！毛他想不作李自成，但是，他的高中下层官僚内心本能的渴望，又在他们老婆孩子社会关系的怂恿下，就是要做作各级李自成的。解放初期有个农村干部刘介梅，拿他的“忘本回头”作典型，就是因为农村基层干部得了田地又有了权力，强烈欲望要做新地主了嘛。本来说革命后要有长期一段新民主主义，让人民自己发家致富，后来为什么很快要合作化呢，公社化呢？就是毛发现不行，个体农民成长不得了。农民有了田地很快两极分化，很快要形成新的地主阶级，新贫雇农阶级。共产党革命结局仍然是旧农民革命的重演，

革命就失去意义了。毛极力地要去压制这种趋势，不让新的地主阶级出现。

阎淮：毛是非常不希望的。

王：毛又发现，非但农村基层，中央地方高中级干部普遍也是如此。开始形成“官僚阶级”了。他说“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文革就是在毛的这个认识基础上发动了。这点，戚本禹在他的回忆录中，揭露了不少中央高干中惊人的腐败例子。他还问过周恩来，毛的共产党“官僚阶级”提法，是否源自德热拉斯。阎淮你的书也举了不少例子证明文革前，共产党官僚阶级已经严重存在。

但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文革前，“官僚阶级”作为资产阶级性质的一个阶级，还没有真正形成。因为那时的共产党官僚再腐败，也只是搞些特权“多吃多占多享受”，他们还没有也不允许攫取和占有可以增值的私人资本，在权力加资本的经济运作下，去盘剥压迫工农弱势民众。他们还是“无产阶级”，是无产阶级上层的官僚特权阶层。

中国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真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呢？实际是文革被“彻底否定”，右派官僚对造反派全面反攻倒算，取缔了人民宪法“四大”权利，全面推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改开”以后，才形成的。

你的书里有非常重要的两个人的说话，一个是陈元，一个是邓朴方。一个政治上，一个经济上。政治上，陈元1984年在李锐主持的“干部子女座谈会”说：“统治阶级要有统治意识”。“如果一个阶级对自己的子女都没有把握，他就不配称为统治阶级。对干部子女政策的出发点应是阶级利益，它是阶级政策的一部分。”而这个“干部子女座谈会”，原意是胡耀邦为遏制干部子女已经肆无忌惮的特权在社会造成的恶劣影响指示召开的。在陈元的“统治阶级利益和统治阶级政策”发言下，胡耀邦本要求发出的《关於对干部子女管理教育问题的通知》，无疾而终。说明这时的共产党官僚层，才明确地有了自己的阶

级意识，明白地确认了自己是社会的“统治阶级”，其子女，自属这个“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且应共同地享有“统治阶级利益”了！

然后是邓朴方，在经济上。书中引述了一段邓朴方与陈一咨惊人的对话：

邓问：“一谘，你说说看，改革是什么？”

陈答：“任何改革都是利益和权力的再分配。要使那些穷苦老百姓富裕起来，政府就要给每个人创造平等竞争的机会和环境。”

邓笑着说：“你说的是原则。现实地说，我觉得改革就是：谁有本事，谁就从国家那儿捞一块！”

邓朴方接着说：“过去国家把什么都管起来了，现在国家要松绑，要放权，就是要利益共享，谁能捞一块，就让他捞一块。”

陈说：“照你这个说法，那谁离权力近不就可以捞得多，还是一般老百姓吃亏吗？”

邓说：“你看历朝历代，总是能人先得利嘛！”

中国当前“改革”的全部秘密，就都在这里了！由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大公子邓朴方，毫无隐晦大大方方地全盘托出了！：

原来“改革就是”，“有本事”的共产党大小官僚们都去“从国家那儿捞一块！”从原来的特权阶层转化为拥有资本的权贵资产阶级。

这其实是近40年“改开”，人民天天眼见的事情。只是没能想到邓朴方代表的共产党官僚“统治阶级”，早已把它作为自觉的阶级行为罢了！

德热拉斯的《新阶级》指出，共产党官僚阶级的权力基础并非基于拥有财富，而是对于国家所有财富的控制，即邓朴方说的“过去国家把什么都管起来了”，现在，邓朴方告诉我们，彻底否定了文革的中国共产党官僚层，

已经不满足于“对国家财富的控制”，而是要去“松绑”、“拥有”，去攫取，去瓜分了！

过去谁要求“国家把什么都管起来”？毛泽东！因为他不允许出“李自成”。他就不得不高度“专制”。现在毛泽东死了，右派官僚政变当权了，就“要国家松绑”“要国家放权”——“谁能捞一块，就让他捞一块”，我们终于能作“李自成”了！陈元、邓朴方们，真的是很有阶级意识的。

攫取和占有国家财富，从无产阶级的官僚特权阶层演变为权贵官僚资产阶级，真正是在“改开”后才形成的。这个认识，涉及文革的是非问题。共产党1949革命胜利得天下，到文革才十七年，它虽是一个农民革命的党，但毕竟有马克思主义灌输，干部队伍整体演变成与人民阶级对立的官僚阶级，还没有那么快。虽经济条件决定了干部队伍内部从延安起就分有等级差别特权，但滥用特权压迫人民的干部，至文革前，毕竟还是少数。大多数干部确实还是好的。你阎淮的书就说，你父亲是好的。你父亲是中央部级干部。你家的猫偷了条鱼衔回来，你爸爸都要去补钱。对你影响很深。其实今天哪位红二代写他们的父母，都会有这类故事。我相信。我相信那时候干部，大部分确实是这样的。说明他们还没有完全官僚阶级化。但由于毛泽东提出了与工农尖锐阶级对立的“官僚主义阶级”的概念，把所谓走资派定性为“反革命修正主义”，文革一来，对各级干部的打击面就相当大了，所谓“打倒一切”，而且往往斗得还很残酷，大面积地混淆了两类矛盾，由此又延伸到了群众中混淆两类矛盾的不同派别的武斗。文革走向了极左，后期更脱离了群众，人民普遍对文革产生了抵触和厌倦。我组织“李一哲”给毛主席写信，贴出大字报《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为老干部说话，肯定文革大方向的同时，要求纠正中央文革（也实际是毛主席）的极左倾向。四十多年了，我至今还是这个立场：既不全盘美化文革，更不“彻底否定文革”，一切要有分析。

但阎淮你的立场很奇怪。你认为官僚阶级是共产党的制度造成的，延安时代就存在，文革前更存在，现在更更是存在。既然如此，你文革中就应该是个彻底的造反派呀，你就应该至今也肯定文革，但你为什么又与今天的反共公知精英们一样，要彻底否定文革，甚至与他们一样表现出对文革那样不容置辩的仇恨呢？这符合逻辑吗？

现在一提起文革，就一片黑暗，一片恐怖，鼻涕眼泪流，要人“忏悔”，其实是完全相反的两类人。

一类说，文革迫害，残害了大量的“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家庭和无辜平民群众。所以一片黑暗，一片恐怖。

是的，文革中确有这种情况。但这些事是谁干的？不正是你阎淮们干的么！你的书真实记录了当年北京的“红八月”是怎么开始的：派出所所长来清华找到你。你是清华红卫兵的头头。他把“地富反坏”名册交给你，要你带队去抄家。有人提出，还应去抄“黑帮”的家，那派出所长赶紧说使不得，这些“黑帮”今天被打倒是“黑帮”，明天说不准平反又是“红帮”了，惹不起的，别干。还是只抄“地富反坏”的家保险。这派出所长的确经验老到，很有阶级意识。阎淮一听有道理，就带队去抄“地富反坏”家了。战果非常辉煌，你书中有记录。

找红卫兵抄家，这绝不会是那派出所所长个人的起念。上面没有人指示，他敢做这个？北京的各院校高干子弟“老红卫兵”能全北京（再蔓延全国）铺开干这个？从戚本禹回忆录那儿看到，实际是叶剑英的很神秘的“北京工作组”那里下来的。红卫兵抄家“战果”也归了他们，周恩来甚至不许戚本禹过问。所以，“红八月”抄家滥打滥杀不是中央文革发动支持的，恰是中央文革认为是“走资派”转移文革斗争大方向而反对的。不错，那时的“老红卫兵”阎淮们以为这也是毛主席的文革，去抄“地富反坏”家是紧跟毛主席干革命，但他们很快就发现，那确不是文革要他们干的，文革要他们

干的，是要他们去揭发批斗他们的爹妈。于是他们觉悟了，他们不干了，他们甚至组织“老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联动）造反，要反对中央文革，要抵制批判毛主席的“错误路线”了。联动被取缔后，他们便鸟兽散，包括阎淮在内的大部，就逍遥各地山水间不干了。所以，他们实际早就认识到了，他们所干的“红八月”，现在的反共公知精英和平民一提起文革，就一片黑暗，一片恐怖，鼻涕眼泪流，要人“忏悔”的文革中确曾发生的一切，不是文革，而是反文革。他们应该忏悔，应该道歉。但他们忏悔、道歉的，不应该是文革，而应该是他们在文革中的反文革！其实这个道理反共公知精英们心里也都明白。为此书写序言的杨继绳就指出过，老红卫兵们的行为，实际是代表了刘少奇官僚势力对文革的抵制和反抗。但今天的反共公知精英和当年的“老红卫兵”却真正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怀着一个共同的彻底否定和抹黑文革的目的，搅浑水，把自己当年的反文革干的坏事，倒说成是文革，来“忏悔”来“道歉”了。陈小鲁等如此，阎淮也如此。还被反共公知精英们赞赏为“真诚”！

还有另一类说，文革迫害，残害了大量的老干部及其子女家庭，所以一片黑暗。控诉文革黑暗，大体就是这两类了。

这确是文革。文革要整“走资派”，受了共产党革命利益真诚要“跟毛主席干革命”的工农群众及其子女（如王大宾、蒯大富等），和对共产党的革命和干部心怀仇恨要乘机“打着红旗反红旗”报复的民众，混杂起来组成造反派，一下子把从中央到地方一大片干部都打击了。不少打击得很过分，后来被渲染成“迫害”“残害”，也是可以的。这些事是谁干的呢？是造反派，和害怕被说成是保守派也要显示“造反精神”的原保守派（骨干一般是共产党培养依靠的劳模群众），加一些也要“紧跟毛主席干革命”被先后“解放”“结合”的大小干部们干的。

但是非就在：文革前，吸人民血与人民整体阶级对立的共产党官僚阶

级，真的已经形成了吗？阎淮坚持说，这个“官僚阶级”已经形成了。既然已经形成了，那么，文革群众起来，一下子把从中央到地方一大片干部（官僚阶级）都打击了，甚至不少打击得过分了点，又有什么不对呢？没有罚不当罪呀？按理说你阎淮应该支持毛呀，可后来你为什么又反对毛了呢？为什么开始抄“地富反坏”家你们那么积极血腥，待中央文革把你们的矛头扭转过来，要打击你们的父母——“官僚阶级”了，你们便不干了，说是毛的“错误路线”了，要抵制了，抵制不成，便作“布尔什维克”消极隐退了呢？

这么简单的道理：若文革前“官僚阶级”已经形成，文革打击干部一大片，是打击那个阶级，便是对的，应该肯定的；若文革前“官僚阶级”没有形成，文革应打击的应是少数作恶特权官僚，打击干部一大片，便是错的，是应该纠正的。这点上，阎淮完全失去了逻辑。

希哲恰是认为，文革前整体的“官僚阶级”没有形成，部分的高中基层干部变质，还只是一个尚不拥有资本的无产阶级中的特权阶层，人数不多。残酷打击一大片是错的。所以1973-74年才写信写大字报批评毛主席和中央文革，要求纠偏（只要求纠偏，并无否定文革）。这是符合逻辑的。

问题又来了：既然文革中打击干部一大片不对，甚至“迫害”了，“残害”了，那么干了这件错事的文革造反派，和害怕被说成是保守派也要显示“造反精神”的保守组织和人物，他们后来要不要“道歉”“忏悔”呢？不必要了，因为1976的十月的共产党右派官僚政变上台后，一轮又一轮的对他们的咬牙切齿的政治报复：杀的杀，关的关，斗的斗，判的判，“清理”的清理，最后还要秘密“记录在案”，永不录用（阎淮书揭露），他们的文革负债，已经百倍千倍地还清了，还“道歉”个什么？他们只是需要总结文革正反教训，以传左翼后人，与改开后才真正形成的共产党权贵官僚资本阶级，作持久的顽强斗争罢了。

我们现在可以看见，右派精英与一般平民对文革的控诉，总集中在“红八月”高干子弟们的打人抄家恐怖记忆上，而对造反派和准造反派们对干部的“打击一大片”，还真没有什么控诉。所以，他们对右派官僚政变上台后清理“文革整老干部打砸抢的三种人”，却不见清理处分当初制造了“红色恐怖”的高干子弟，很不理解，又看到他们占尽了文革后升官接班，经商暴富，出国买办等各种风光好处，更为不满觉很不公平。提出也要查查他们。对此，负责此事的阎淮在书中说了：

我（阎淮）私下向清华领导交底：“老人家们此举专为整治批斗他们的造反派，岂能拿自己子弟开刀！成立青干局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对付造反派红卫兵。”

阎淮向李锐汇报情况，并请示“老红卫兵头头”的问题。李锐：“你对清华领导说得好，就是那么回事！”随后，李锐让部办公厅立即通知北京组织部，并转发全国各大学——“文革初期保守的老红卫兵不是造反派，其头头不属於记录在案范围。”阎淮说，这与日后陈云对“北京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的头头孔丹来信的批示是一致的——“这些红卫兵不属於‘三种人’，其中好的还应是第三梯队的选拔对象。”

杨继绳提出说，这是陈云们清理文革罪恶使用了“双重标准”。不对！那是杨继绳公知精英们，自家搞错了。用陈云的说法，是陈楚三（烈士陈潭秋之子，文革温和造反派）和杨继绳们故意“将水搅浑”了，对陈楚三们要“特别警惕！”。

陈云官僚们看得非常清楚，也分得非常清楚：造反派整他们才是文革，高干子弟们当初的打人抄家“红色恐怖”，决不是什么文革，也决不是什么罪行，那恰是他们对毛泽东文革方向的干扰和扭曲，是反文革，这干扰和反文革，其实就是他们当初在背后唆使策划，为了掩护他们的。那是有功，怎是有过？怎能说是“双重标准”？就拿阎淮说，你是清华红卫兵抄家的带头

人，但你却是被陈云们视为文革中“表现特别优异”，进入中组部作了考察中共第三梯队人选的青干局负责人的。“清理三种人，记录在案”的责任，就委托在你的身上了。对你们，阎淮们，不但“绝不应当追究。还应当依靠他们和三种人进行斗争”！

这道理老王早就一再说过了，没人听。杨继绳和公知精英们呀，你们现在就听听陈云们的话吧，不要再把当年高干子弟红卫兵的“红八月”行为算到文革的头上啦！那不是文革，那是反文革；那是有功，不是有罪；陈云们用的是一个标准，“统治阶级利益”标准，不是“双重标准”。你们就不要再来“搅浑水”啦！

我非常佩服陈云。他是毛后共产党内最有深远眼光的一位。也佩服阎淮书中对阎淮影响最大的陈云长公子陈元。“生子当如孙仲谋”。看书中，陈元所具的睿智，亦最能克绍乃父箕裘：“统治阶级要有统治意识”。“如果一个阶级对自己的子女都没有把握，他就不配称为统治阶级。”自文革至改开，此陈家父子二人，从不为任何“政治正确”的价值观批评所动，始终扣紧了“统治阶级利益”这个社会演变的主链。

去年，我与李伟东就已经这样谈过一次陈云了。读了阎淮的书，更加深了对陈云的认识罢了。

李伟东说，89六四后，邓小平要加紧搞市场经济，即加紧推行资本主义，南巡，逼在邓小平陈云前首鼠两端的江泽民加紧搞资本主义（美其名“特色社会主义”），不然要“换人”，连换下三个“总书记”。陈云原主张的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大鸟笼”下开放的小市场。陈云看挡不住邓小平了，他知道资本主义市场和股票金融一搞起来，是根本不可能回头的。于是提出，换人也好，但要换上我们自己的子弟。“接班人还是我们自家的子弟可靠，今后总不至于挖共产党祖坟”。于是，派一位“太子党核心人物”（陈元？）与江谈判：可以支持江，但江必须让红二代上位。江泽民赶紧同意交易，决计将“省部级以

上与中央密切的国营大企业，元老家族一家安排一个，进入这些企业的核心管理层”。一个家族分一个国企的结果，就是今天权贵资本主义的滋生发展的源头。

毛泽东是决不允许跟随他打下天下的共产党干部们去搞资本主义，追求私人和家族的发财显贵的。开始就说了，毛要求他们必须是“无产者”。即便搞点特权，也无非是多吃一点多占一点多享受一点。毛一直压制着共产党干部变质的自发性。压制到了极点，便是“斗私批修”的文化大革命。邓小平江泽民“彻底否定”毛泽东的文革，放开了共产党新旧官僚们的手脚，放手让他们去搞资本主义，“先富”起来。但毛泽东的官僚无论大小原来都是无产者，两手空空，你要他们从摆地摊起家，一点一滴积累起资本吗？他们自然要利用他们或他们的父辈当年打天下获得的权力，将毛泽东时代属于人民共同财富的“国企”，先“股份公司”化，再私有化，攫取到自己手里，将自己迅速转化为大资本家。

右翼会说，“我们主张资本主义，但获得财富的机会要平等。反对红二代们依托政治权力吞噬原国有财产，成为权贵，盗国集团。”

社会主义的原国有财产要不要私有化？除非你是社会主义左派，根本反对私有化。你若是右派你告诉我，不将原国有财产私有化，怎能完成中国的资本主义演变？那么，私有化给谁？都给外国人？行不通。都平分给全民？苏联解体试过，也行不通。希哲早就问过胡平：“胡平，你那么主张资本主义，主张私有化，那么私有化给谁？能私有化给你胡平们吗？”胡平是所谓“黑二代”。“黑二代”显然希望中国的私有化能私有到非红二代“平民”，最好私有到因共产党革命，家族曾被剥夺的“黑二代”手里。他们把这叫“转型正义”，是迟来的对共产党的正义“清算”和赔偿。胡平们“黑二代”在文革中是极力地反对“血统论”“自来红”的。认为“血统论”“自来红”剥夺了他们“黑二代”道路选择，背叛家庭，争当红色革命接班

人的权利和前途。因为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时髦。但当今日邓小平“改开”时代，资本主义时髦了，当年争着要红的“黑二代”们便纷纷退红复黑（解说当年是被“洗脑”），回归家族阶级立场，要与“红二代”们争夺私有化“平等机会”了，还因为“共匪”当年非法剥夺了他们父祖的财产，因此今日应比“红二代”更有权利优先占据原国有财产了。

陈一咨很天真。“什么是改革？”他回答邓朴方的问题：“任何改革都是利益和权力的再分配。要使那些穷苦老百姓富裕起来，政府就要给每个人创造平等竞争的机会和环境。”

邓朴方、陈元比他明白得多。瓜分国有财产，权力再分配，真要“给每个人平等竞争机会”，共产党纵其手中之鹿请天下共逐之，中国的原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关系的大颠覆，大动荡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陈云所谓“接班人还是我们自家的子弟可靠，今后总不至于挖共产党祖坟”的名言，说明他的忧虑，说明他预见了不可阻挡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景下，必将潜藏着共产党革命历史、革命人物最后被“挖祖坟”的危险。紧紧掌控着中组部的他，未雨绸缪，便遣陈元传令青干局李锐、阎淮、陈伟兰（陈云幼女）们部署共产党高干“自己的子女”政治接班，并各家族将原社会主义国家财富，瓜分一块，以今后红色豪门联盟的经济力量来维持共产党的政权地位不动摇。这个决策，对共产党官僚统治阶级家族有利，但实际上，在中国社会性质大变动的进程中，对保持社会各阶级的稳定不发生剧烈的动荡，颠覆，也是根本有利的！

当然，社会舆论最不满的，是共产党元老家族的瓜分国有资产。一般口碑最受“政治正确”赞誉的，是应如毛刘周朱任这共产党五大常委第一级家族后人的无人发财，甚至一贫如洗。陈云是谋深远的。他不为这“政治正确”所动。他知道中国资本主义化下，若共产党自家的“孩子”不能现在迅速利用权力转化为占据国家主要财富的资本家，继续掌控住国家全部经济命

脉，那是非常危险的。教条地让自家孩子守住“红”的本色，坚持要他们作中国资本主义化下的“无产阶级”贫民，如毛泽东子女李讷毛远新般处社会底层，国家财富就只能急速地私有化到非红二代乃至“黑N代”手里，阶级力量阶级关系就将发生颠倒性的变化，“颜色革命”就不可避免了。“红N代”那时，将空有愤怒没有任何财富力量作抵抗手段了，中国革命历史价值观就必将颠覆了，共产革命就将被那时的法院“依法追诉”判定为“犯罪”了，共产党就是“匪”了，共产党的“祖坟”就要被挖了，就要接受复辟的“黑二代”们的“正义审判”，上绞架了，内战也就不可避免了。决不可图虚名而处实祸。

共产党“自家的孩子”作了大资本家，就不颠倒革命价值观了么？也会的。“存在决定意识”，新的阶级地位决定了他们必须要有新的阶级意识阶级理论来为他们的阶级转化辩护。他们有人早已不断地跟着反共右派精英“反思”和“真相”共产党革命，甚至不断地跟着反共右派恶骂毛泽东了。但他们的血脉使他们毕竟不能彻底地否定共产党和清算共产党。陈云相信，子女再不肖总不致去仇父祖，“挖祖坟”。因为这一挖，就挖空了自己的立足之地了，就什么都说不通，他们也就什么都将没有了！

果然，改开40年，中国虽然已然质变，中国的颜色革命就是杳不发生。非红二代的或黑N代的新资本家及右翼公知，是无力发动颜色革命的，只能徒唤奈何。况，大批非红或黑N代的新资本家，还只能依附共产党权力或依附“红N代”垄断性大资本家，才能获得有限发展空间。中国的颜色革命动荡极可能获免。这正是当初西方观察家误判，以为中国“改开”资本主义发展了，“中产阶级”壮大形成力量了，颜色革命就必将到来，却终于盼不到，失望不解的根源所在。他们应该明白了，秘密就在掌控住了中国全部经济命脉的大资本家，仍然是“红N代”。这是陈云的老成谋国，生前的深远谋划。

台湾就是这个教训。国民党败退到台湾，掌握住政权，为羁縻本土势力，定政策由“外省人当官”，经济上则另开一条路，去让“本省人发

财”。以为如此平衡，省籍沟壑可长安无事。日据时期，本土已经颜、林、林、辜、陈五大财阀。台湾土改，大批地主农家子弟获得土地补偿，投资工商业发财，什么王、蔡、张、徐、吴数十家旧“望族”新财阀更先后涌出，掌握住了台湾主要财富。他们便成了立志埋葬国民党的台独民进党的后盾和金主。长荣张荣发便曾是陈水扁的直接雇主。国民党没有本土财阀支持，只能靠政权资源。搞“民主化”政权一失，财源随失，便大势去也，只剩点“党产”苟延坐吃。民进党穷寇必追，“割喉割到断”，杀人杀到死，剑及履及紧盯党产做文章，判国民党党产为“不当党产”查封没收，又再狠手剥夺国民党社会基础“军公教”个人的原优厚年金，国民党在台湾便只剩进坟墓一路了！共产党的老敌手最后竟由民进党送终。看国民党，再看共产党，不得不说，陈云眼光老辣。

（上面是第一天与阎淮的长篇谈话，阎淮的插话和意见，没有收录）

我说最后一个问题。阎淮书中的结论是说，中国能够实行多党的宪政，你为此89后出走巴黎干了几个月“民运”。陈元说你“大节叛党”。但我赞成胜平（冯胜平）的意见，中国还不能实行所谓普世的宪政，还是要先搞共产党党主立宪。党主立宪就是共产党领导制定并严守宪法接受宪法制约的一种宪政。

中国与现在西方的宪政国家不同，中国是一个有仇恨的社会。如果中国在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共产党与国民党签了双十协定，民主建国，双方真有诚意，那时，还可以跟国民党一起搞宪政。但一旦内战发生，一党打倒另一党，战争消灭另一党，暴力实行了社会改造，就没法再普世宪政了。现在流传甚广共产党毛泽东抗战胜利后的许多向国民党要民主宪政的文章，还有许多赞美美国民主的文章，说共产党失信，不兑现诺言。其实这些资料最早

恰都是我搞出来的。我那时也认为是共产党得天下后没守诺言。后来才醒悟，不是的！是国情变了。那些鼓吹宪政文章，都是抗战胜利前后，内战爆发前的东西。内战爆发了，中国国共两大政治势力战争决了胜负了，革命暴力土改了，镇压了“反革命”了，中国社会有了你死我活政治仇恨了，国共两党就根本无法再在一起搞宪政了，甚至也无法与先后从国民党分化出来的所谓“民主党派”一起搞宪政了。57年自由鸣放都难。条件变了，刻舟焉能求剑？

美国独立战争、林肯战争后，宪政也是一二百年才搞出的结果，且今天的美国共和、民主两党本质亦不过是二百年前华盛顿革命党一党的两派分化。共产党执政又过近70年了，现在能搞宪政了吗？还是不能。中国今天还是个政治仇恨社会。我在海外民运混了十几年，发现国外和国内的反共势力与共产党的仇恨，还是非常深的，刻骨的，反共社会层也还是很广的。他们声称要推翻共产党实行宪政。但这个推翻共产党后的宪政，怎么可能是"普世民主宪政"？只能是反共宪政，也即反共专政。

他们说，“共匪的革命本来就是无理的，非法的。仇恨也是他们造成的。难道可以不清算吗？不要转型正义吗？”有道理。可是，你们的反共先人就没有对共产党播下仇恨了？谁先谁后？这个真不好辩论，也不必去辩论。问题在中国，现实是共产党革命已经发生，他们也早得了胜利，你与共产党的政治仇恨也已造成，怎么办呢？“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若中国需要普世宪政，美国宪政进程了二百年，也给共产党一二百年看看吧，现在才70年。

其实中国宪政不远，还是有希望的。宪政不是主观人为的。宪政反映的是社会客观现实力量对比下的阶级关系，它是社会各势力斗争博弈中已经客观形成的阶级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宪法确认。人为设计搞出推行的“宪政”，该国家一定混乱，失败直至内战。由内战的结果来确定该国“宪政”所能实

际实现的程度。

为什么共产党党主宪政可能？无他，因为共产党领导下的资本主义。

共产党高中级官僚转化为大中资产阶级，领导发展中国的“特色”资本主义，但共产党广大的传统无产者基层党员和社会传统的拥共阶层群众，不可能都转化为资产阶级，至多拥有些小资产。“红N代”搞资本主义，为了维持自己的合法性，他们还必须强调“不忘初心”，不能改旗易帜，不能完全丢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红色意识形态。现在有激进左派说，“特色”共产党口里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意识形态是假的，是用来掩饰的。对，他们的“特色”就在这里了。但任何假的东西，只要他被迫始终披在身上，就总会对他有制约，就总会多少发生真的效果的。这就为广大基层共产党员基层拥共群众逐渐结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左翼反对派，提供了正统的合法性，占据了道义的优势，牵制共产党中央右派官僚集团不能向资本主义走得太远，并尽可能地逼迫他们，保留和恢复，甚至扩展更多的有利国家和人民大众的社会主义因素，如工人平民的监督各级官吏的言论自由权、自由选举权，民众的住房、教育、医疗等的福利。

这两大势力之间，是阶级斗争性质，但没有你死我活的仇恨。左翼反对派是建设性反对派。他们的斗争博弈，是同一历史价值观下国计民生政策的竞争。在这长期斗争中，宪法的至高无上地位，便将愈趋形成。于是，中国的民主社会主义，就将在这两大政治势力斗争的基础上步步实现；中国的共产党党主宪政，也将在这两大政治势力斗争的基础上步步实现。

2018年6月28日普林斯顿

附三：反思不是妖魔化：和曹征路谈《民主课》

深圳，2011年10月

曹征路，深圳大学文学院。

严海蓉，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

严：您的《那儿》、《霓虹》、《问苍茫》、《豆选事件》都是把故事放在了当下的场景。但是《民主课》讲述的故事主干不在当下，而是在文革时期。文革是怎样进入您的小说创作视野的？

曹：能让人激动起来的原因每个人都不太一样。对我自己来说，尽管对历史感兴趣，以前也写过历史题材的小说，但这几年对当下更关注一些，我这些年的小说也都是现实题材。因为我认为当下的中国确实到了一个关键时期，文学应该有所作为。写文革其实就是写当下，因为当下的很多思想争论都和文革史、甚至革命史有关。能不能科学地认识历史，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教训，不但关系到中国走什么道路，甚至已经关系到政权的合法性和中国的主权独立了。所以，要把自己的看法说出来。写小说，只是方式之一。在中国，有一大批知识分子早年真诚地投身革命，或者被潮流裹胁到革命队伍里来，他们对革命是拥护的，也确实从革命的成功中找到了个人的位置。但其中大多数人对革命的理解是偏狭的，革别人的命容易，革自己的命很难。文革中受了冲击受了委屈，不得了了，一辈子耿耿于怀，我有不少朋友都是这样的精神状态。作为个人这样想想本来也无所谓，但这种思潮如今被放大了，被利用了，以至于30多年以后还被当作改旗易帜的工具，作为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就不能不站出来说出真相。我写小说本来就有个小小抱负：写出我亲眼看到的历史变迁，写出我能感受到的精神困境，做的怎么样另当别论。

严：我最感兴趣的问题是想请您谈对文革的认识，因为这是这部小说核

心的东西。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有控诉文革的伤痕文学,但是从革命和社会主义民主的角度来反思文革，到今天还是一个禁忌。所以我就想请您谈谈您是怎么想到去写这部小说的。

曹：我上午想到这么一个问题:在80年代的时候，为什么老百姓拥护改革？其实在80年代我和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厌倦政治、渴望思想解放、希望有变革，否则我也不会到深圳来。可是到了90年代以后，特别是看到了这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渐地成形，了解到国际资本这样迅速地控制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整个看法就改变了。这几年学术界对文革的认识再次热了起来，把否定文革当作“底线”，尽管说法不同，妖魔化却是一致的。我不敢说自己的看法百分之百正确，但我提供的是生活本身，是文革的真实过程，我挖掘的是历史逻辑，用艺术的方法去概括那个时代。我写的是一个小城市，但大体上全国也都是差不多的情形。

严：您的这个转变大概是90年代什么时候？

曹：我自己是95年以后，逐步有了一些思考。其实这个变化从邓小平南巡以后就开始了，对国际资本放低门槛，然后一系列内部调整，政策法规悄悄改变。那时表面是控制物价，控制通胀，实际上是完全接受了世界银行设计的GDP主义。即通过数字发展来保持政权合法性，随后就是大面积地对资本降低门槛，我们保面子，人家得里子。那么我们心目中的改革，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那种改革，基本上就已经不存在了。那么就变成什么样的改革了呢？完完全全地听命于国际资本，所谓的“全球一体化”。90年代的口号就叫“深圳香港化，广东深圳化，全国广东化，实现现代化”。那个时候老百姓对生活改变的感受还不是那么明显，两极分化还不那么突出，这些年才逐渐领教了教育医疗住房改革的厉害。那时只是在劳动关系上感受深一些，那时这些深刻变化还是在上层言辞的中间，还是在法律制定，大的规划里面。但是时间越长，老百姓感受越深。

所以我反过来想：为什么80年代的时候谈改革，老百姓基本上是拥护的。那个时候听说房子要拆迁，大家很高兴，因为拆迁就意味着生活条件的改善。那时大家都相信改革是为了改变生活质量，而不是为了资本增值。但是今天就反过来了，一谈拆迁，全家大哭，因为他的补偿完全不能够维持他原来的生活，所以才发生那么多抗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我个人的感觉，80年代的改革，动机是好的，路线也基本对头。包括邓小平本人，他在文革期间，受了冲击，也接触了一些老百姓，体验到了一些被压迫，被屈辱的那些苦痛，所以他要求变革，起初是正面的。所以在80年代的一些政策还是可以的，这个要一分为二。但是到了90年代以后，大规模的对外资妥协，对国际资本的妥协。这个妥协的一个结果就是，原来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方向变了，不是把市场经济当作手段，而是完全按照别人设计的道路走了。所以WTO那个谈判，我到加拿大去，有人问你们中国究竟是什么国家？我说是社会主义啊，人家就笑我。我这才听说，原来谈判初期人家还提出过劳工权益问题，可我们国家代表说：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劳工问题绝对不能谈。你怎么能让人相信你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那么WTO到底和外国签订了些什么协议，我们至今都不是十分清楚。零零星星得到了一些信息，但是我们看到的是有些农产品，如具有悠久种植历史的大豆，中国有自己的生产能力、有消费需求，今天却已经被外资垄断，为什么会这样？到了90年代以后，中国的这个改革就已经完全改变了方向，就是按照邓小平自己说的，出现了那四个矛盾（工农、城乡、东西、贫富），两极分化，走到了邪路上去了。确实是走到邪路上去了，完全不管不顾了，甚至自己身后的名声都不要了。当初你参加革命干嘛？

严：现在听您这样一说呢，就跟小说的思路不完全一样。因为在小说里，当时当权派的利益已经相当强势，使得全局要服务于他的利益。那个时候当权派就已经形成了一种集体意识。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您在小说里探

讨文革造反的问题，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现在您似乎在说：80年代这一段还是良性的，到九十年代才是恶性的。

曹：准确地说，应该叫集体无意识。他们利益一致，也相当强势，但在观念形态上还不是资本主义的。在80年代起码我是看不到的改革企图是恶劣的，到了90年代就看得越来越清楚。我只是从自己的观察来了解时局变化，认识这些东西。当然这里面肯定也有一个逐步变化的过程，有种种不得已的现实考虑。我是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

严：这的确是我们老百姓在80年代的体验。但是如果有更多80年代的资料给我们看的话，可能就会发现，80年代决策层对社会主义的坚持已经发生动摇了。所以对私有化，政策研究者倡导者们并没有觉得是原则上方向上错误的东西，而是一个如何可行的技术操作层面的问题。

曹：对，你这个讲法完全有可能，我们今天回过头去看完全有可能。但是，就我个人来说，我自己是有这样一段经历，是有反复的。80年代我是拥护的，90年代我是逐步觉醒的。那么，我拥护和觉醒的根据就是老百姓。按照我的看法，人民，或者无权无势的老百姓，他们才是衡量制度或者政策对不对的唯一标准，其他都是假的，什么生产力，摸石头过河，那个都是鬼话。老百姓能不能得到实际利益，谁得到了好处这个问题才是关键的。

严：这里面可不可以讨论：其实老百姓也有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问题，还有根本利益的问题。我记得，您曾用蜜月期来形容80年代。在这个蜜月期里，中国农村的改革似乎采取了一个“照顾眼前利益，放弃长远规划”的策略，比如在统购统销方面，政府提高了粮食收购价格，农民口袋里的收入短期里增加了，但是国家在农业基础建设投资（包括水利建设）、农村公共服务、整体规划方面投入越来越少，基本上是置之不顾或放弃。所以这个时期，“行小惠”的政策用短期利益置换了长期利益。当时很多人比较容易看到老百姓的眼前利益的增长，误以为这种短期利益和农民的长远利益是一致的，

眼前好了，将来会更好。

曹：老百姓是可以这样想，但是知识分子就不可以这样想，所以才需要知识分子，才需要把自己看到的想到的东西揭示出来给大家。其实作为个人来讲，在整个历史过程中，知识分子是得益群体。我现在退休了，可以拿到超出意料的退休金，我非常满足。所以说，这个制度安排知识分子是得益的。但是你作为一个人，你个人得益了，心里还是不舒服，因为你得的是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我一起当过兵，插过队的，我了解到有相当一批人现在生活非常困难，不是一般的困难。这些东西让我心里不舒服。

严：很多人对改革开放的反思不会联系到文革，但是这篇小说却是从文革开始。

曹：最直接的原因：现在文革的问题，你也提到，已经成为一个焦点。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主张资本主义的精英们也看到了今天的危机，但要维持它不倒，就要论证改革开放的合理性，就要清算文革，清算毛泽东，甚至清算整个革命史，这是一个必然的思想逻辑。我看到有一个什么北大的教授，甚至提出北京的历史博物馆应该把陈胜吴广剔除出去，认为共产党你既然掌了权就不应该鼓励造反。这个思想逻辑是一贯的，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一直在维护的统治秩序，上智下愚，尊卑有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肉食者谋。他认为统治秩序是不允许挑战的，造反、革命都是对秩序的颠覆。我这样写当然是去批判这样一种精英。在我看来，革命就是对原有秩序的质疑和批判，而造反在精神上和革命一脉相承，而革命和历史上历次农民起义又是一脉相承，由此人类社会才不断进步。所以毛泽东才会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他在杭州看《白蛇传》那次，看得热泪盈眶，突然站起来喊：“不革命行吗，不造反行吗？”裤子都掉下来了。他是解开裤带坐在沙发里看戏的，他就是这样感情用事的一个人。那么为什么在杭州呢？就是开7000人大会，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他是受

到巨大压力才会这么触景生情。他是真正从历史的内在逻辑上来思考这个问题的。我对文化大革命感兴趣当然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还有一些具体的原因：现在一些主流的宣传，歪曲了文化大革命，掩盖了文化大革命的具体过程。那么还原这个真相就还原了当时人们的一些思想感情。做小说的角度，不像写论文，可以这么条理清晰。它是从感觉，个人经验出发，但是我要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在中国发生革命是正当的，必然的。造反是有道理的，合逻辑的，任何一个文明国家都不能无视人民群众的正当权利。

严：你们这一代人，和共和国一起成长，你们的丰富经历也是历史的见证，有这样一个还原的工作要做。但是对很多人来说，对那段历史没有直接的体验，不知道它的丰富性，不知道真相。什么是真相？真相存在吗，这一切都被打上了问号，而且甚至这一切都被当成了一种宏大叙事，被解构掉。但是你们是历史的见证者，你们经历了文革，所看到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和主流叙述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矛盾始终存在。

曹：过去在这个宣传过程中我的感受也不是特别深刻，也不清楚它的真实含义，直到中国面临着向何处去的时候，这个问题才逐渐尖锐起来了，迫切起来了。如果不是这个原因，我也可能不会选择这个小说来做。它一直存在着，只不过我们不愿意去讲就是了，但是你现在搞得太过分了，特别在在网络上，一说就是文革余孽，唱什么歌都会联系到那个地方去，很恐惧。他们为什么会恐惧？因为那个时代是人民大众的狂欢日，是群众感觉到平等的时代。而自认为精英的人感觉难受了，不再是人上人了，处处要看群众的脸色，那确实不好受。

严：小说关于文革提出了“民主课”这样的视角，和主流的“（精英）权力斗争”的视角很不一样。小说的题目紧紧扣联了当下社会的一个关键词，这是我看到小说的题目就立马看下去的动力。这部小说所体现的经验和认识的积累是怎么形成的？在创作的时候，有没有使您非常纠结的问题，还

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

曹：我把顺序倒过来回答。首先这个小说展示的是个客观的历史过程，只要按时间顺序把文革的大事排一排，就可以清晰地看到因果关系和发展逻辑，我虽然写的是一座小城市，但大体上全国各地也差不多，大同小异。怎么派工作组，怎么抓反革命，怎么产生红卫兵和后来的造反派，军队怎么支左，怎么成立革委会等等。所以在事件的梳理上没有什么可纠结的，应该说是水到渠成。也是在基本事实这一点上，文革的控诉者们混淆了是非，隐瞒了部分过程，误导了今天的青年。有一种说法叫红卫兵“奉旨造反”，似乎红卫兵是个统一的组织，造反是一件很风光的事，不敢承认他们先有了对学生的迫害，后来才有了学生的造反。造反就意味着挑战权威，意味着政治风浪，对青年学生而言，压力还不尽然是学校的处境，还有家庭，和家庭来自历次政治运动的惨痛教训。谁也不是先知先觉，谁也不清楚历史会向哪个方向演变。一个人不是被逼急眼了，谁愿意去冒风险？谁不想过安稳日子？直到1966年底，中央明确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了，各地的造反派才逐渐占了上风。当然，进入70年代以后，造反派已经被各种名目的运动清除得七七八八了。明白了这个历史过程，你就能明白，不同立场的人对文革有不同的感受和说辞，是必然的。说到我自己的认识，也是有反复的，历史捉弄人。在我亲眼看到了资本主义以后，认清了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运转逻辑以后，自己的思想感情反而变化了，我开始重新思考那些被我们抛弃的认为毫无价值的群众斗争方式。这也就是老百姓经常谈论的，假如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会怎么样？也是知识精英经常会叹息的，假如没有革命会怎么样？这，大概就是你说的“扣联了当下社会的一个关键词”。民主，是知识精英们十分渴望的，民主也是工人农民十分想要的，只是各自的内涵不一样。精英要的是宪政，是少数人的话语权，工人农民要的是平等，是大众的话语权。从这个意思上说，把文革理解为一堂民主课是恰当的，这样的课堂没有老师，

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然后选择自己的道路。至于说有些人要把文革解释为权力斗争，以为把领导人妖魔化就可以蒙蔽视听，用宫闱密闻那一套来理解政治，不值得一驳。

严：这一代知识分子在学院里面一路读书读过来，并不了解生活中的实际情况。

曹：1966年，哪怕自己被贴了大字报的老师，学校的老师，在运动初期被冲击过，一听说中央是支持学生造反的，那种狂喜，一般人都很难想象。我们学校的老师都半夜里跑到街上去抄大字报，看大字报，听北京来电，北京消息，然后自己刻钢板，印传单。为什么？长期受到压抑。所以文革中上层和下层面临的实际问题是不一样的。中央面对的问题国家发展道路问题，是在苏美争霸的格局下的独立自主问题；而底层面对的实际上只是一个长期积累的干群矛盾问题，客观上是不一样的。所以路线斗争这个提法其实和下面的关系不大。你比如说打右派，实际受伤害的很多都是左派，都是革命的积极分子。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就是因为官僚主义文化，胜利了当官了要摆谱了，听不得不同意见了。很多被打成右派的人无非对某些干部的某些做法不满意，也谈不上反对，因为当时大家思想上并没有系统的纲领。无非是批评某些领导某些干部的作风，讲起来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多吃多占，好逸恶劳，作风霸道，乱搞女人，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一次又一次运动中，他们（“右派”）吃了大苦头，包括文化大革命初期仍然是这样。一开始被批判，被揪斗的，仍然是这样一批人。所以，后来的宣传基本上不符合实际。文化大革命初期打人，破四旧，搞出生论血统论的，肯定不是受压制的人。只有政治上得势的人，肆无忌惮的人才会去打人，欺负别人。这个是常识，是生活的逻辑。而那些夹着尾巴做人的人，包括他们的子女，是没有机会做这些事情的。但这段历史被歪曲了，故意让不同时段的不同人群混为一谈，统称为红卫兵。似乎这样一来自己就解脱了。实际上他们要秋后算

帐的是文革中的造反派。从1968年解放军支左开始，造反派逐步受到压制，受到清理，“清查516”，“一打三反”，一批一批被镇压掉。其实按照后来定义的“十年浩劫”里，造反派在第三年第四年就被弄掉了。到了1976年，邓小平他们翻过来之后更是大面积的整顿，叫清理三种人。所以他们给“四人帮”定的是“反革命罪”。他们真正想镇压的人是造反派，真正想解决的思想问题是不允许造反。

严：主流的文革叙述是伤痕文学，将文革简化成伤痕。叙述主体以知识分子为主，也有干部。文革里面肯定是有很多伤痕的，但是你关于伤痕的思路不是“伤痕文学”的套路：假如遭受不期然的委屈和苦难是伤痕的话，在《民主课》里遭遇伤痕的不仅是造反派，知识分子，还有以前的老革命者。你把这些不同时期、不同人的伤痕经历串连在一部小说里。那你怎么看待伤痕？

曹：从大的方面看，整个革命是就是一个充满伤痕的历史。革命并不是像后来人想的那样美妙，泾渭分明，上马杀敌，妙手著文。整个革命的过程就是充满痛苦，充满伤痕的历史。我在里面特意写了两个人物，痛苦的两个革命老人。我要追问的是，你们为什么要革命？是为个人向上爬，当老爷？那你这个革命是没有价值的。文革是同一个道理：如果真心为国家好，知识分子受点委屈，其实也没有什么大委屈，工资一分钱不少，无非就是扫扫地，参加一些体力劳动，到农村去，还拿工资，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农民从来就是这个样子的，祖祖辈辈都这样生活。极个别的，受到打骂，侮辱，甚至自杀了，那是极个别的，不是主流。而且在文革中知识分子受到虐待，虐待他的人一定是知识分子。这个在大专院校里面都十分清楚。想出稀奇古怪的方法、说法，上纲上线的，不是工人农民。即使说受到灾难，委屈，也和农民也没什么不同，凭什么你们要比农民高一等？所谓的伤痕——女知青下农村被大队书记强奸，编一个故事拍电影，被流氓一样的造反派侮辱拍成电

影，那根本就是胡扯，谈不上的。我插过队，68年下乡。我们下乡的时候农民对学生害怕得要命，哪敢欺负我们。女知青在农村神气得不得了。像你这样，女的戴个眼镜，农民看了都稀奇死了：哎呦，女的还带眼镜子，他都崇拜得不得了。到了70年代中期，有的人可以招工招干上大学，有的人不行，才需要贫下中农推荐，农村大队书记给你盖章，那样情况下才出现给大队书记拍马屁的事情，早期根本不存在。那个时候知青经常互相串连，一个地方有事几个公社都来人，逢年过节是要闹事的，动不动就去公社闹点事的，馋了还要偷鸡摸狗。他（农村干部）都怕得要命，哪里敢欺负你。个别情况不敢说没有，总体上不是那样。编造是为了唤起同情，我被欺压了，有了伤痕，被同情的对象就变成了知识分子。

严：您说的这个非常有意思。在伤痕文学中，性别和身体占了很大的分量，尤其唤起读者同情的是女知识青年的被凌辱。

曹：对，他就是用一般人情世故来想象知青，做一些煽动性的东西。我这样写当然是有意识的去辩白这些东西，总体上不是这么回事。

严：文革还同“恶”有许多的关联。澹然关于《民主课》的评论题为“怒放的恶之花”。我的理解是“文革”被认为是恶的，和“文革”是恶的，毕竟还不是一回事，主流是一直想把二者当成一回事，而这个区别——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但是的确需要区别的——也正是小说所揭示的东西。您是怎么看待文革与“恶”的关系？

曹：你这样说是对的。但是澹然写的“恶”不是这个意思。他这个恶呢，说的不是罪恶，不是邪恶，而是审美意义上的恶。也就是冷酷，过激，过分，是这个意思。比方说毛泽东批判《武训传》的时候说，你们都想做好人，我来做恶人好了。鲁迅讲：我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来揣测他人。他说的恶意不是邪恶，而是说极端、得罪。他是审美意义上的恶，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恶。那你说的这个意见为什么是对的呢？文革被叙述成恶和文革真实中有

没有恶，这是两回事，这确实是。

严：那你怎么看待文革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各样过分的事情，甚至是一般意义上恶的事情？

曹：我认为评价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运动都要看主流，看本质。就个人来说，每个人都可能有不幸，每个时代也都有个人不幸，而且每一种个人不幸也都大同小异。如果你看不到本质，看不到主流或者有意识地将主流和非主流混在一起，那我们就不可能达到科学或者清醒的认识。今天对文革确实需要一个清醒的认识，一个实事求是的评价，只有实事求是才能真正接受教训。文革有没有坏的现象？有。有没有丑陋的东西？有。确实是有这些东西。比如我自己就很反感那个年代某些做法。但是那个不是主流。

严：当时您最反感的做法是……

曹：迷信崇拜，形式主义。比如把一个口号教条化，把一项中央精神教条化，为了满足这个教条，就像今天做的一样，就是歌功颂德，甚至把它推向极端。

严：就是和今天关于GDP的做法差不多。

曹：对的，就是和GDP做法差不多的。70年代的时候街上经常有宣传队，很大的鼓，比这个桌子还大的鼓，敲那个鼓："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当时普通老百姓都看出来了，你一天到晚讲"就是好"，那文化大革命要完了。我有个邻居是个照相馆的师傅，他就跟我讲："唉呀，完了完了完了，老毛完了。"他那个时候就讲这个话了。那时候的老百姓也不像今天宣传的这样，不敢说话。大家说话还是很随便的。因为好人还是多。那些告密打小报告的，如果不是因为特殊原因，很少。那个时候人心淳朴的多，因为大多数人是解放的宽松的，不像今天这样，一般还是说实话的。所以我说我那个邻居，照相馆的老师傅，解放前就是小业主，运动来了也被批斗了一下，运动走了还是神气活现，还是那个样子。他那个时候就敢说："老毛完了。"

那个时候毛主席还没有死。天天敲那个鼓，把他敲得烦得很。当然有恶的东西，比如批斗干部时候有人抓头毛，干部就在头上摸油，抓不住，然后他又偷偷抓一把沙子揉进去。这个肯定是不好的。问题是那个不是主流。

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说是人民大众开心？平等。最大的好处就是让人民看到了平等。过去共产党为什么能够打赢？官兵平等嘛，共产党身先士卒，所以他能打胜仗。国民党为什么老打败仗？装备这么好老打败仗？他不平等，当兵的不愿意卖命。所以解放战争一打，成建制的国民党官兵很快就变成了共产党的解放军。

当然文化大革命之前的17年，尽管成就也很大，但也确实带来很大问题。这个17年确实让一些人官气滋生脱离群众，说假话说大话风气越来越严重，甚至欺压老百姓这种事情都是有的。所以文化大革命给大家找了一个发泄的地方，“妈的，他神气个屁，我非要把他揪出来。”批斗的时候忍不住去囊他一拳，也有可能。这个完全有可能，但是这个不是主流。很多事实证明，那些干部被批斗了，没有权力了，到车间和老百姓一起劳动了，大家对他一样很好的，开开玩笑，打打闹闹，并没哪个把他当坏人看。无非就是暂时失去了权力，当时还能忍受，但是翻过来以后他们就受不了，觉得下了地狱。所以老百姓开心了，他们就肯定不开心。他觉得自己受委屈了，觉得得到的东西失去了。实际上他和老百姓还是有差别的，最起码他的工资比老百姓多嘛。人家工人一个月拿三四十块钱，你一个月拿七八十块钱，甚至一百多块钱，那还是不一样的。但那个老百姓不在乎，因为起码他们觉得在精神上或者人格上平等了，甚至捉弄你一下，他们也觉得很开心。老百姓觉得平等就是最大的收获。至于你有什么问题，走不走资本主义道路，他又搞不清楚，那个时候谁也搞不清楚什么叫资本主义道路，没见过资本主义，谁能搞得清楚？是吧。

所以文革在68年之后就基本失去了方向，就是这个原因。一开始是讲有

一条“资反路线”，大家起来造反。批了“资反路线”，把干部搞得威风扫地了。后来又搞什么“揪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各地都在揭盖子，揭了半天大家又发现他没什么大不了的，无非就是拉帮结派，搞点小动作，欺压老百姓，多吃多占，无非就是这些，没什么大不了的，所以很快就失去方向了。那么后来两派怎么形成的呢？就是因为后来成立革委会，一成立革委会就面临着你的人占的名额多还是我的人占的名额多，谁上去了谁下来了，面临着权力分配，这样呢就产生了两派，而这个两派的背后就牵扯到当地历史上的恩怨，把这个恩怨牵扯进来，所以每一派后面又都站着老头子（老干部），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越弄越厉害，后来有些地方就开始搞武斗。在基层呢，文革大概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当然我讲的不是中央。对于中央，在国际背景下有一个道路选择问题。在基层，老百姓没有这个问题，他也不知道什么道路问题。

严：您是不是说：当时老百姓把“走资”理解成一种干部特权，对文革目标的理解是把特权打下去？

曹：有这个意思，把特权打掉他就满足了。

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时人们对“走资”的认识是不是跟我们刚刚从一个半封建的社会走出来有关？

曹：生产力水平很低，物质水平很低，还没有进入温饱阶段。物质生活还相当困难的情况下，大家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就是分配不公，稍微有一点点不公，和今天的这种不公还不一样。另外有的干部作风很坏也是个原因。因为工农干部还有这个特点：怕别人说他没水平。他越是怕别人说他没水平，越是要表现出来有水平，动不动要训人，老虎屁股摸不得，这样和知识分子也搞不到一起去。这也是一个原因。

严：台湾的朋友杜继平也读了《民主课》，我想替他问三个问题。您是怎么把握现实主义的写作方法?怎样既表现典型，又不显得呆板？这个问题其

实对我们社会科学也存在。社会科学中使用个案研究，也面临着你凭什么觉得某个个案是有意义的？每个个案必定是具体的、特殊的，但是个案的社会学意义是特殊性里面应该有体现某些社会性，结构性、时代性的东西。所以文学面临的方法论问题和社会科学是相通的，但是我特别想听您从文学的角度谈谈。

曹：优秀的写作者肯定对表现对象有一个本质的认识，仅仅感性是不够的。比方说社会学，你不能说在田野调查前，头脑中完全是一张白纸，不可能的，起码你有理论，你有你的思想体系。文学创作也是一样的，他一定对文学本质有过方方面面的思考。我个人是不赞成把文学理解为一种技术操作的。写文革，我自己的认识也是有过程的，10年前的认识和今天的认识也是不一样的，它有一个深化的过程，那我就会对事物本质有一个把握。从描写对象来说，我认为只有体现本质的那种个体才是有价值的，而这个个体恰恰又是丰富的，能尽可能吸收历史内容的，这样的个体，我就要选择他。

严：个体承载了许多内容，那怎么使他/她活起来，使他/她真实？

曹：细节。尽可能使特定时代、特定环境中的特定人物的生活细节有充分展示，使它丰满。细节越多，生活质感真实感越强。反过来如果细节少，就不可能成功。为什么说有些形象是概念化的？因为它不是来自生活，而是来自一种理念，甚至是某种特殊理论的需要。所谓概念化就是细节少，血肉少，只有骨头没有肉。为什么我们看到一些作品觉得假，尽管我不了解那个生活，可还能看出假来，就是因为我没有看到生活逻辑，没有看到血肉。而血肉是不可能靠想象获得的，它一定是真知，确知，痛知。

严：我觉得您作品给人的真实感还来自于您在写作中体现了许多矛盾。如果是概念化的东西，按照概念一切都是给定的，角色就沦为木偶，他就是做选择也是给定的选择，缺少真实的生命力。然而在您的小说里人物所面对的社会很丰富，很复杂，而这个丰富复杂的现实在人物内心引起的反应也是

复杂的。比如说肖明对爱情追求的矛盾，解放军曹干事也有自己的矛盾。而恰恰是人物对矛盾的处理上，体现他们所处时代的特色。他们怎么处理爱情，就和我们今天很不一样。

曹：生活从来不是玻璃板水晶球，其实每个人都是在矛盾中生活着。即使在热恋中也不可能一帆风顺。只有把人放到特定的环境里面，那个矛盾才是特定时代特定人物固有的。比如说肖明对支左部队有明显看法的，按照她当时的思想水平和认识，支左部队压抑了造反派，偏离了斗争大方向。实际上按照我的看法，当时的支左部队只能是这么做，只能一碗水去端平，不能推波助澜。但站在肖明的角度，她的反对就是真实的。她也只能去反对，她是那么一个地位，她又有一个那么纯洁的理想主义的革命冲动，她只能那样做。那恋爱也是这样，懵懵懂懂的，说来就来，作为女孩子她也搞不清楚，但是一旦爱上了又是那么强烈，她又不得不压抑自己，因为当时的思想观念，意识到自己是不应该的，犯了大错的，不停地批判自己，这个也是真实的。那个年代，女孩子不能烫头发，头上扎小辫子的颜色微妙变化一下都觉得很快活，她这种爱美的天性是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表现出来，比如说文化大革命时期，女生为什么喜欢穿军装。那是那个时代的风气，并不是后来人想的，穿军装就是要打人，不是这样的，而是那种东西有时代的美感，是追逐时髦。

严：杜继平还有一个问题：这个小说还包含了对整个社会主义革命的反思。作为一个新社会，它是刚刚从旧社会里面脱胎出来的。正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的，社会主义“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您在《民主课》里的主要角色如：肖明、姜政委、刘查理、叶三虎及“我”等人，都不是平平板板、非黑即白的人物，他们的思想、感情、行为、命运也都既受外在社会、政治力量的左右，又与个人内在

的性格、价值观脱不了关系。比如，小说里的姜政委，那样具有社会主义信念的干部仍难免趋炎附势，也抛不开对功名、地位的执着追求，甚至连红卫兵造反派的小头头张宇也会摆官谱、耍派头；另如：党员干部和群众普遍对权威的盲目崇拜等等。您能不能从文化革命的角度，从民主的角度谈谈您的理解？

曹：是这样的，为什么那个时代大家觉得民主？所谓民主的真义，在那个时代，我自己认为它的前提条件就是平等。那么文化大革命，当时的说法就是大民主，在当时的情况下就是大家都可以说话，可以贴大字报，而且有些情况下说了还管用，所以大家觉得解放了。在文革中有这样感受的人是相当普遍的。所以，在文化意义上说它是一种革命，我觉得是有道理的。而且从今天的角度看，毛泽东思考的问题一直是个真问题，从延安和黄炎培对话到进北京“去赶考”，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两个务必”，到解放以后对干部的严厉要求，甚至是苛刻无情的要求，都体现出他对“历史周期律”的担心。举个例子：当时济南市委书记，是个老革命，仅仅是想当省委书记——其实大革命时期他就是省委书记，不过解放后安排他当市委书记省委常委，他不满，就向上面提出职务要求。结果毛泽东就作了一个很严厉的批示：他这样的人就不配做共产党员，永远不录用。这个决定本身是很过分的，但是毛泽东对这个一直是非常痛恨，因为在他的思路里一直对干部腐化变质有警惕性，生怕牺牲了几百万人建立起来的事业付之东流。所以他对革命队伍的要求有些不尽人情，过于严厉了。他错误也恰恰就在这个地方：不承认差异，他把革命队伍要求得太理想化了。他觉得共产党员都能像他那样去想问题，到后来他认为知识分子也是革命队伍的一员，也会像他那样想问题。所以才会像对干部一样对待他们，下去劳动劳动，他认为就可以改造好了。其实他根本搞错了，这是个判断上的错误。

那么回到民主这个问题上来，其实毛泽东思考的一直就是这个问题。他

提出的这个口号我不知道你琢磨过没有？他一直是在选接班人，但是他一直在说要培养千百万个无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我认为他这里面是有思考的。找一两个接班人不难，只有找千百万个接班人才是可靠的。这个想法有点象美国总统杰佛逊要给老百姓发枪，如果政府不能为人民做什么事，那人民有拿枪捍卫自己的权利。美国宪法史上好像有这个话。毛泽东我认为就是有这个想法：让人民有权，有权也就是用民主的方法，参与当家作主，所以在企业里面搞“两参一改三结合”，再规定干部要实现“三同”，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其实都是一以贯之的。因为在他看来官僚主义政治是最可怕的东西，一生最痛恨的。他的一个老师谢觉哉就说过一句话：毛泽东是真正将官家文化反对掉的。所谓官家文化就是官僚主义，所以他一直主张扁平化管理，让工人农民参加管理，让干部参加劳动。能不能实现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在他的头脑中的理想社会就是那么个东西。所以我理解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场民主课，其实他自己也搞不清楚要怎么搞。这些纠结一直在他心里，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解决。所以你前面提到的主流认识，说文革是权力斗争的视角，在我看来根本就是小人之心，燕雀安知鸿鹄之志。1965年，刘少奇在党内地位就下降了，已经下降到后面好几位了，所以他要解决刘少奇的问题很容易的，根本就不用自下而上去发动群众，犯不着。所以，他找到的途径就是去革这个文化的命。中国这个文化确实需要革命，就是官家文化需要改变，这个东西不改变，任何时候都搞不好。读书就是为了做官，做官就是为了当人上人。为什么晚清的时候“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百姓怕官”？就是因为这个官家文化在。人民不能从精神上站起来，就永远不能主宰自己，也就是人民的历史主体性确立不了。我理解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在晚年没有办法的办法，找不到出路，甚至（我是瞎猜）他都有可能明白自己死后是什么样子。他能想象到，他死后这个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没有什么大区别，所以他才来了一个试验性的，放手自下而上地去揭露自己的阴暗面。他有一段语录：我们

搞过这个运动，那个运动，但是都不能解决问题。现在看来，只有自下而上去揭露我们的阴暗面，才能解决问题。那为什么要自下而上地揭露问题？我想他是想保留一些革命的火种，造反的火种。就像杰佛逊让人民有枪的道理是一样的。在我看来，中国共产党的真正历史使命也在这里，怎么样让人民在精神上站立起来。这才是民主的真义。

严：给老百姓赋权。

曹：对。但是中国老百姓没有这个传统，他从来都是害怕官的，怎么办呢？就是通过这种发动群众的办法。让大家起来，自下而上。而那个时候确实有条件，因为大家积怨太深。但是真正把群众发动起来了以后，他又害怕了，因为失控了。害怕了怎么办？就要重新将军队派出去，恢复秩序。这样一来，旧的东西又要自然成体系，成系统了，建章建制，制礼作乐，这些东西又回来了。

严：那我看您是将小说人物身上这种矛盾的东西，反复的东西，新转旧的东西，放在上述两种趋势并存而且是互相交换位置的这个脉络里面去呈现的。

曹：比方说姜政委刚开始支左的时候，他是想支持左派的，他是想紧跟毛主席的，而且想建功立业，这么一种心态。但是到了一定程度，他又开始注意自己的形象，要给自己留下一笔，他很自然地这种官家文化的东西就出来了，发展到可以漠视别人的人格，漠视一切合理化建议，他都可以做。

严：而这些东西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东西，而是在我们这个时代矛盾交错的脉络底下慢慢展开的东西。

曹：对，因为时代给了他这么一个条件。

我那个里面还写了一个老的市委书记，是一个老红军。我亲眼见过，非常可怜，连老婆都没有，但他离不开女人啊，到了一个地方，就临时找一个女人。甚至可怜到，60年逃荒要饭的女人，他就拿几斤粮票，几毛钱到公园

里去找这样一个女人来。那么这种事情被揭露出来就是非常丑陋，非常难看。几次自杀都死不掉。你说他有多大问题？也没多大问题，只好把他调走。走的时候，他只抱了一个竹壳的暖水瓶，坐长途汽车走的。这是我亲眼见到的。你说这样的人有什么纲领，什么路线？那不是胡扯吗？实际上他也就是这么一个可怜的角色。但是他是追随革命，希望成为一个革命者的，而且受了批判以后，他也是真心想成为劳动人民的。他是真诚的，我相信他是真诚的，苦孩子出身，也没什么文化。痛哭流涕那确实是真的，不是假的。

严：所以您认为文化革命有两个层次的东西。在高层，有一个在世界体系大格局里的道路选择问题，路线问题。而老百姓直接面临的是怎么看待不平等问题，特权问题，怎么让老百姓说话这样的问题，不是反“走资”的问题，而是在社会主义文化中可能还算人民内部矛盾的东西。所以在文革中上面的路线之争和下面的老百姓对现实问题的认识没有一个很好的结合。

曹：实际上没有结合。

严：所以后来就出现看起来的好像吊诡的东西：在文革时候明明将走资的危险说得清清楚楚，我们后来却偏偏“走资”了，而且这个“走资”好像是在老百姓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完成了。

曹：说到底是我们人民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没有自己的主体性。其实，那个时候的工人阶级并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工人阶级。那个时候的工人阶级，用我的眼光看，就相当于西方福利社会的白领中产阶级，就是生活有保障，国家对你负责任，所以他们什么都不考虑，是一个腐化的工人阶级，这样子的。那个时代的工人阶级没有自己的阶级意识。

严：您是说当时的工人阶级意识是社会主义福利国家的产物，所以他的阶级意识不同于一般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阶级的意识。

曹：是个安全感很强的一个群体。

严：而且当时很多工人认同文革要冲击的体制，加入了保守派。

曹：今天的农民工其实和欧洲早期的工人阶级有点像。当然欧洲的工人是失去土地了，今天农民工没有失去土地，但是他也是没有什么退路了，城市里也没有着落。

严：对，他越来越是马克思讲的无产化的劳动者。

严：杜继平还有一个问题。在小说里，您借着肖明的信，批评了很多干部、知识分子在历次运动中对自己的得失荣辱很看重，很计较，甚至用个人的得失来衡量整个运动的得失。肖明说：我们不能站在个人角度看问题，那样我们永远得不到解放。那能不能谈一谈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当中所发生的这些“意识”问题。

曹：我觉得是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人们所说的不觉悟。意识不到自己在历史中的位置，甚至是受了剥削，受了欺负还认为是理所当然。还有一种我认为是被误导。西方对中国的这种谋略可以说思考得相当完整，有一整套体系。那么为了完成这种谋略，在国内他也培养了大批代言人，在各个领域，政策上，这些人倒是很有阶级意识。比如火车撞车，那些人马上就意识到要瓜分铁道部，这个反应非常快。他们的追求就是为了把铁道部私有化。一说这个煤矿收归国有，他马上意识到是“国进民退”。其实我觉得当局要收回煤矿不过是想减少事故，和什么国呵民呵没什么关系。他们倒是阶级意识很强，正是因为这样的一种宣传时间长了，被洗脑了，所以才会出现你说的这样情况。

严：您讲的不觉悟的情况，也就是从个人得失来看整个运动的得失，在文革当中、或在文革刚刚结束的时候多不多？

曹：应该说是相当多的。就是不觉悟的人相当多。就是我自己以前也是这样想的。用老百姓话说：我们就是小老百姓呐，我们就只能看眼前，我们只能顾自己呀。用老百姓降低自己，自我贬损的角度来理解事物。我这里不是指一般的工人农民——他们无所谓，他们没有得也没有失——我是指有得

失的这些人，他们的不觉悟就是不考虑长远，不考虑根本，他考虑的就是眼下我怎么样。所以他受了冲击，受了屈辱，就拿这个来作为衡量事物的标准，评价历史的标准，很多都是这样的。那么这种东西被利用之后就会放大，放大之后就会变成为，比方说今天在改革开放以后它就会放大为，衍生为“政治运动就是革命暴力，革命暴力就是革命，革命就是造反，造反就是不合理的。”所以他们对历史的评价就变成：一方面用个人得失来评价历史，另一方面用革命中领导人的隐私错误来为自己开脱洗刷，觉得他们本来就不是好东西，他们和我是一样的人。用这种方式来解脱自己。一个用他人的功过是非来选择立场的人，是谈不上独立人格的，一个没有独立人格的人，怎么可能谈得上自由？为什么说文革是最近一个热点呢？因为对文革的评价就牵扯到对改革开放的评价，对毛泽东的评价就牵扯到对政权合法性的评价。它当然不是针对具体的历史评价本身，而是牵扯到眼下政治利益需要。

严：它被赋予了强烈的象征意义。您的写作一直是现实主义的，您希望和原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区分开来，那您怎么评价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曹：是这样的，延安文艺讲话以后，中国一大批作家，不光是解放区的作家，包括国统区作家都意识到应该到民间去，应当去表现工农兵，而且也意识到这是新文化的方向。所以，那个时代出现一大批作品是按照那个方向走的。但是后来走向了极端，特别是当社会主义遇到困难的时候；特别是经历过几次文艺批判以后，伤害了很多人，比如武训传的研究、后来红楼梦的研究、胡风集团。不断批判，不断折腾，让大家觉得这个路子越走越窄，所以那个时候，1960年前后，就出现一股风气，就是只能写欢乐，只能写光明，只能歌颂。广东有个秦牧，那个时候发明了写历史掌故的散文，把历史故事拿出来，翻一下。北京有个杨朔，到处写莺歌燕舞，写春光，写美酒。他们的成名意味着文学创作已经走进死胡同。所以到后来70年代末期、80年

代初期批判这个所谓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有道理的。那个时候我认为完全是对的，那个时候它需要解放，反对束缚，因为这样下去文学就没有生命力。然而任何事物过度了就走向反面，非常有意思的是，当初批判杨朔的一批文艺理论家和作家今天恰恰是沿着杨朔道路往下走的人。30年以后，正是他们在搞所谓的现代主义艺术来掩盖矛盾的，来歌功颂德，来扭曲生活。这非常有意思，他们又走到另外一个轮回上去。所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是。任何小说都要虚构，虚构就要有意识地剪裁，把一些不需要的东西去掉，需要的东西就是要把它典型化。那么这样一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就变成一个恶劣的工具，它要掩盖矛盾，掩盖真相，为某些政治利益服务，所以说80年代去反抗它，完全有道理，完全合理也有必要。可是走到极端以后，它又走到另一个窄道上去。当初这批反抗的人自己走到领导岗位，有了话语权后，他又用相同的方法来压制另外一批人，又不允许人家说真话。所以我现在就主张恢复现实主义的传统。我讲的现实主义是真正的现实主义，实际上回到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托尔斯泰那个现实主义上去，那才能表达现实主义的真谛。我们不掩饰文革中的丑恶，文革中过激的东西，阴暗的东西，或者革命的阴暗面，不需要掩饰，革命是很痛苦的，是有大量的血腥的，阴暗的东西，要掩饰它干嘛？但是，正是这个不掩饰才能把握革命的本质，事物的主流，历史的动向。其实我觉得中国人，从人的角度，从精神要站起来，一定要革命的，一定要反抗的，一定要造反的，一定要建立自己的文化，否则在世界这个大格局中永远处于挨骂的地位，永远处于不被人家接受的位置。你越是想去迎合西方的精英，越是处于被动的地位。

严：所以您现在使用的现实主义的手法，是对前面的否定之否定。

曹：没错。我写过一个《期待现实重新“主义”》，就是这个意思，现实主义在中国不死，在今天有它自己的历史条件，有它的精神背景现实背景，客观需要，所以现实主义不死。

严：关于现实主义不死，您能再多讲一点吗？今年7月在上海大学开会的时候，纽约大学的张旭东教授阐述了他对当今文学价值的看法。在他的文学视野里，现实主义没有当代的意义，没有地位。这个观点当时在会上引发了争论。所以您能不能多讲一点？

曹：这个说法理论上实践上都站不住。中国的小说进入现代以后和西方的小说走了两个不同的方向。西方的小说走入现代以后，从传统的写实走入写意；而中国的小说恰恰相反，由写意，因为中国古代艺术都是写意的，进入写实。这两个从表面看来相反的发展方向其实都是对现代性的追求。因为这两个社会形态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无论是写实还是写意，都有它存在的合理性。你不能简单地认为写意的就是进步的，写实的就是落后的。或者现代主义就是代表进步，现实主义就是代表落后，用进化论是解释不了艺术形式的。谁也不能证明宋词高于唐诗，也不能证明元曲就是高于宋词，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艺术趣味，形式没有高下之分，不能证明先进还是落后。至于喜欢不喜欢，可以因人而异，比如欧洲人喜欢中国的剪纸艺术，认为那个很抽象，而中国人喜欢油画，认为那个更逼真。但是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有一个很大的误解，以为艺术和技术一样，要现代化就是要全盘接受别人的艺术观念，别人的艺术手段。别人用刀叉，我们用筷子，太落后了，以为现代派就等于现代化。他们认为艺术生产是和物质生产同步的，是和技术进步相匹配的，这是个认识上的误区。那么利益上的误区就是认为要被西方人承认就是要用西方人的思维方法、逻辑观念来认识中国人自己的生活，实际上恰恰上了西方人的当。在西方人的眼里中国就是落后的，野蛮的，中国人就是不文明的，需要鲁宾逊来解放礼拜五。我参观过加拿大温哥华的一个中国展览馆，看到的就是黄道婆纺纱，农村木制水车，他们理解中的中国人就是那样的中国人，跟古代印地安人差不多。他们不了解中国人其实有很多种层次，很多种生活。中国人对西方人的了解和西方人对中国人的了解不一样

的，而且中国人的文化未必就是野蛮的，落后的，中国对人类文明进步是有贡献的。所以80年代以后文化界提出告别革命，躲避崇高，大家以为那个东西才是最先进的思想，其实恰恰搞错了。

在民国初期，王国维就说过："读西方小说如游中式名园，非历遍其境，方领略个中滋味。"那是在那个时代的西方小说。"读中国小说如游西式花园，一目了然。"那么他的意思是：中国的小说是单线条的，他说的是传统小说，人物不复杂，情节很单纯，所以象西方花园，一眼看到底。读西方小说不是这样的，如中国名园，曲径通幽，曲里拐弯，才能明白他的意思。我觉得他说的话很有道理，就是因为当时中国小说和西方小说处在不同的阶段。一次大战，二次大战以后西方人对世界的看法发生变化，他们认为再用那样的方法来表达自己的感受不够了，他需要写意。他们古代艺术没有写意的，不像中国的戏曲绘画书法。他们没有经过那个阶段，所以认为写意是最高境界。像苏珊桑塔格，"正经不起来"的"政治波普"就一定要写意。中国的小说到了晚清以后承载了很大的革命任务。梁启超要新小说，鲁迅要改造国民。他们把写小说当作革命的功能的一部分，甚至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中国走向了一条写实的道路，西方走向了一条写意的道路。这两个东西都是各个国家不同的历史地位，历史处境所决定的，并不等于"你写意就是先进的，我写实就是落后的"。我还有个佐证：三十年代，我们国家是文艺最繁荣的时期。国民党有个"繁荣十年"，那个时候的上海滩就有现代派。有一个《现代》杂志，团结了一批现代主义作家，施蛰存、穆时英。但是很快就销声匿迹，为什么？因为民族矛盾上升，他们就被认为是公子哥，是汉奸，很快就被抛弃了。那么中国从五四到三十年代它也经历了从改革开放到今天这样一个相似的过程。比如五四时候的问题小说，与文革后的伤痕文学，一样的。五四以后的乡土小说，文革后的寻根文学；五四以后的现代派，文革后的现代主义；五四以后灰色人生描写，叶圣陶一派的，文革

以后的市井小说，新写实，是吧，完全都在重复五四以后的主题和写法上的变化。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重复？我得出来的一个结论是，历史上凡是没有出现过的，它一定会出现，在历史的台阶上没有充分表现的，它一定会重新表现，一定会被文人们挖掘出来，充分宣泄一下，然后才能进入下一个阶段。所以在五四到三十年代，表现不充分的东西，建国以后被压抑了嘛，文化大革命以后就要重新充分表现一下，又走过这样一条道路。在今天，还有大量的历史真相被遮蔽着，现实主义当然还有自己的空间。一些人总是要把文学说成是超越其他学科的高明文字，但如果连当今人类最前沿的思想成果都不知道，对生活的理解还停留在八十年代，这个高明又体现在何处？如今被认为是很先锋的现代主义现在已经市场很小了，要搞纯文学，路子只能越走越窄，相反现实主义现在重新抬头。在今天的美国，从哈金介绍的“伟大的美国小说”的定义看，恰恰是现实主义的那些要素。而在中国，那些公认的先锋作家的代表作，也恰恰是现实主义路子的作品，并不是批评家们鼓吹的那些试验。

严：刚才您是从文学史脉络来讲现实主义的重生。前面您还讲到现实主义在当今还有社会的现实条件。这方面能不能再讲一点？

曹：我们今天面临的时代非常奇特，或者说非常严峻。一方面是两极分化的现实越来越明显，国内社会矛盾越来越激烈；另一方面，我们的主流媒体却在向西方靠拢，越来越娱乐化，越来越后现代化，要解构，要游戏，是两个不同的方向在拉扯。表面上看同时存在，其实是两种意识形态在争夺。那么在中国，有求知欲望的读书人仍然存在，特别是迷茫的青年人很多，像“蚁族”，一大批读书人，或者是受过教育的人现在都很迷茫。他们恰恰需要清醒地认识这个现实，而现实主义给人的艺术感受恰恰是在认知层面，不是在感官层面，所以它有它的生存空间，而且这个生存空间我相信会越来越大。人们不会满足于宣泄一下快活一下就完了。中国为什么会成为西方最大

的一个加工基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中国劳动力的文化水平高。因为建国以后中国的扫盲取得空前的成功。现在年轻人中初中以上，识字人群占了大多数，和刚解放的时候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一批年轻人，最先接触的就是文艺。

严：所以中国还有很蓬勃的打工文学。打工群体中的文艺青年用文学来表达自己，比方说写诗，写日记，写信，反思性是很强的。

曹：而且现在资讯工具发达，虽然很粗糙，网络之类，但是渠道很多。所以人们的理性认识需要不断去进步的。不仅仅是满足一下，宣泄一下就可以解决的。我相信会越来越多样化，大家会分层，不会简单的停留在这个水平。

严：前面您的分析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现实矛盾的严峻和主流媒体的娱乐化的矛盾产生的客观需要；另外一个中国现在也有这个条件，有创作者，有具有相当文化水平的读者。

曹：对，至于是不是纸媒或者网络，问题不大，只不过是传播的渠道不同。而且我认为年轻人中间有思想的不少。《问苍茫》发表之后，我参加过好几个他们自发的座谈会，深圳这些打工者俱乐部啊，读书会啊，包括你们香港的劳工组织都有过来参加。他们也有思考，不过思考的问题比较眼前。他们提出来的问题，比我们在校的大学生一点也不差。

严：您写作的背景还跟今天关于红色文化的争论牵扯到文革非常有关系。

曹：实际上我写它也是有这个原因。我以前发表过一个中篇小说《支左轶事》，是写支左指挥部里面的生活。但是因为发表时候有些忌讳，有关文革，毛泽东语录的辩论，都删掉了。不过现在发表到网络上就没什么忌讳，人家能搞我们也能搞。网络上有些攻击都是非常恶劣的，带有谣言性质。我这样写还是很严肃的，当时的支左干部确实很迷茫，他们也搞不清楚究竟是

怎么回事，怎么会落到这么一个下场，一心一意想为老百姓做事情结果走得这么灰溜溜。他们也没有想到。

严：这个和文革本身灰溜溜的结局有关。

曹：和历史逻辑也有关。毛泽东到了后来，一定是心灰意冷，不得不去启用一些他不喜欢的人，采取不喜欢的制度。他又不放心将权力交给那些支持他的四人帮，当然他是从大局考虑，国家不能散，不能倒。一定是心灰意冷。他强调他一辈子做了两件事，后一件是他心里非常清楚他得不到好的。他知道中国人是一个什么问题，但是他不知道解决的路径是什么。说到底毛泽东就是太理想化了。他认为能把他所想到的任务都解决，能实现，实际上他不知道自己也有非常大的历史局限。

严：现在有些从事文革研究的人提出，如果文革能保留群众组织的半独立性，而不是把这个空间最后取消掉，对于后来改革开放，群众组织还是可以有所制衡。

曹：这个设想有道理，但是不可能。今天的中国工人之所以没有力量就是没有真正的工会。但是反过来想有没有这样一种原因：我们的人民还没有觉悟到那样一种程度。即使毛泽东主张保留就可以保留下来吗？他们还没有这样一种自主意识，我觉得还没有。

严：有些研究者认为，到文革的后期，不同派别的工人经过几次反复开始意识到要走到一起。

曹：有觉醒。“我们被利用了。”我了解的造反派，他们有这样的认识。但是到了这个时候，他们的群众组织也在削弱。他们的号召力很小了。因为中间经历很多次淘洗，办学习班，将他们孤立起来，一次又一次运动，到后来他们的力量也很小了。比较典型的实例就是1974年，搞了一次“批林批孔”运动，造反派有一次死灰复燃，重新起来向当时军管会、革委会造反，但是那个时候响应的人时候已经很少了。虽然轰轰烈烈贴了很多大字报，已经

掀不起大浪了，就是说群众自愿参加的程度已经大不如前。所以邓小平复出后要整顿，要三项指示为纲，很快就把他们这些人抓起来了，否则也抓不起来。

严：您认为，当时人们不起劲的原因是厌倦吗？

曹：厌倦是一个很大的原因，但是最根本是文革提出的这些口号离他们太远。所谓抓走资派，评水浒，和他们没关系。

严：这关系到您前面提到的目标问题，特权问题被打下来后，运动的方向没有了。

曹：他们失去了运动的目标，讲起来都是大道理，“防修反修”，这谁都会讲，包括当权派，他也会讲大道理，谁也不反对就等于什么也没有。当初毛泽东设想的是自下而上的揭露我们的阴暗面，他的目的也部分的达到了。就是说，包括当时的当权派也意识到，自己是脱离群众，他愿意洗心革面，重新回到群众中去，当时是这样的。通过回到车间劳动，回到基层劳动，他也愿意和群众在一起。这个目的是部分达到了。坏就坏在后来翻案了，理论上把这些全部颠覆了。他们认为自己是受迫害的，他们是革命的，你们是地痞流氓，又把这些重新颠倒过来。特别是周恩来逝世之后，利用了群众的悲痛。那个时候群众已经完全跟着他们走了，认为希望在他们身上，而不是在毛泽东身上。

严：那当时群众在他们身上看到什么呢？

曹：看到了秩序。大家都认为政治没意思，谁上台都一样，应该改善生活，哪怕是受一点委屈，地位降低一点也不要紧。所以文革之后有一个电视剧最流行，叫《渴望》，表现的就是人们在动荡以后渴望安逸稳定的平民生活。世界上没有什么阶级，只有好人和坏人。

严：《民主课》中的造反者是一个少女，造反者的性别是情节设计的要求，还是带有一定的必然性？

曹：两个原因都有。从情节设计上有阅读趣味的好处。从事物本质来说，女性容易和革命的本质联系。有这样一个说法：衡量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看女性的地位。那么，在中国，革命的硕果仅存就是女性地位的提高。前不久去北京看戏，几个博士说：某某人做了一个调查报告，说中国60年来社会角色没有改变，官的后代还是官，资本家的后代还是资本家，读书人的后代还是读书人，基本上没有改变，说人家把数字都统计出来了，这个社会没有变动。我说不对吧，至少有两个大的变动：一个是妇女地位的提高，第二是文盲的减少，就是普通底层的人有了识字的机会，这两个否定不了。女性地位的提高是中国革命的成果，这个是不能否认的。我在小说里特别做了一个对比，肖明和她妈妈的对比，同样是受到不公正对待，同样是受到打击，但是她们的人生态度完全不同。她母亲是正儿八经受的旧式教育，最后她的要求就是做回一个动物；而肖明经过了打击，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自主性质的造反，她就要做一个大写的人。这是完全不同的。妇女地位的提高是在斗争中实现的，是在实践中完成的，不是谁赐予的。

严：很有意思。一些做工人运动研究的朋友也观察到在90年代后期，工厂反改制反私有化的斗争中妇女是最决绝的。

曹：这在很多领域都表现出来。体育界最明显。文艺界也相当突出。有些女性比男的有思想。在知识界，读博士的肯定女的比男得多。我觉得这是很大的前景，说明中国革命不革命是不一样的。今天到韩国日本去，妇女地位跟中国完全不能比。我们学校老师好多都到韩国去交流过，她们讲，那边女教授讲完课回家，可怜巴巴的，对我们羡慕得要死。

严：很高兴和您有这个谈话，谈出了很多我在小说里没有读出来的东西。